

# 巴黎城记

〔美〕大卫·哈维 著  
黄煜文 译

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揭开请拨 95105715 或短  
信发送至 106695887808



# 巴黎城记

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Paris,  
The Capital of Modernity

[美]大卫·哈维 著 黄煜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by David Harvey**

Copyright © 2003 David Harve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0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本书译文由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安排中文简体字版授权,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5-138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美)哈维著;黄煜

文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33-9162-2

I. 巴… II. ①哈…②黄… III. 巴黎市—地方史

IV. K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168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7 字数:35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创造性的破坏： 巴黎的现代性空间

唐晓峰

本书的作者大卫·哈维是一位从地理学角度，以激进批判立场，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后现代思想），研究城市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大家。他的关于巴尔的摩等城市社会问题的《社会公证与城市》（1973年），曾引起巨大反响。这本关于巴黎的研究，又为城市社会与历史地理研究贡献了一部力作。

哈维出生于英国，曾就读剑桥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19世纪肯特郡的历史地理问题。他后来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971年起参加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小组，开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一方面是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一方面是针对美国当代社会诟病的批判性关怀，哈维的理论立场很快形成。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他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补充地理视野，提出极具特色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其用意在于强调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空间、位置、环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观察社会时需要关注的核心性问题。

这本《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所讨论的是欧洲近代城市史上的一桩有名的老案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在法国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时任塞纳省省长，由拿破仑三世任命，成为巴黎大规模改造的总负责人。奥斯曼对于巴黎的改造，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一切问题正由此而起。

哈维形容道：这种一刀两断的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



世界视为白板，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创造性的破坏”，事件出现了不可拆分的两面：破坏与创造。

奥斯曼拆除了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重新设计巴黎城市空间，将巴黎，及其生活、文化和经济，从狭窄、肮脏的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市中心林荫大道，建立纵横交错的给排水系统，修建广场、商场、公园、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纪念物，等等。在奥斯曼的手里，巴黎出现了惊人的改变，在景观与功能上，都成为一座旷世新城。

关于奥斯曼的这一场大拆大建，大作大为，后人喝彩者有之。他们认为，新巴黎的建筑风格与质量，规划的宏大比例，细节的微妙处理，都有严谨的理性考量与果敢实施，为巴黎走入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优质的城市基础。当然，创造以破坏为代价。从原生态文化价值、古典审美的一面来看，奥斯曼无疑犯下了不可补偿的罪过。对奥斯曼的讨伐也不绝于世。

奥斯曼—巴黎现象，是现代性登场的典型一幕。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而对于其大结局的评判仍不确定；历史仍没有结束，哈维的讨论正将其引入新的层面。

哈维的研究仍属于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考察，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题目。不过，哈维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独特视角，选择一个具体城市为剖析案例，仍有许多新鲜论断。

---

## 资本的空间性

---

地理学视角的特色是空间关怀。本书以空间关系考察作为起点，并纵贯全书所论各项大事。在这里，空间不是外在场所，而是事物自身的属性，即空间性，这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点。资本的登场与运行，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哈维告诉我们，资本需要并创造了怎样的城市空间。

竞争、适应、合作、环境转变、空间安排和时间安排，关于

这类问题的讨论常见于哈维的书中。他善于把社会变革、经济、人生、城市地貌、建筑，融为一个体系，揭示一个复杂的历史地理过程。地理空间关联到众多主题，众多主题均有空间特征。哈维说：“我将在整体与部分之间采取折中途径，试着从一连串交错而连锁的主题（只要少了一个环节就无法恰当理解）来理解第二帝国巴黎历史—地理的转变。”“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构成特定时空下社会转变的驱动力量。”

地理关系是一种驱动力。“我将尽可能重建第二帝国巴黎的形成过程，以及资本与现代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与时间结合在一起，还有社会关系与政治想象有时如何通过这样的结合而被启动。”

城市本身是一个建筑形态，更是一个空间形态。新巴黎城不只是现代性的场所，更是现代性本身。阅读哈维，除了关注其一般性的理论智慧，尤其要注意他所提供的地理学视角下的独到观察。理解空间，把握空间性，是认识现代性不可或缺的路径。

在第三章“序幕”的结尾，哈维说明：“本书的主题将以螺旋的形式向前推进，从空间关系开始，行经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以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

奥斯曼新巴黎的现代性空间中的魂是资本。虽然在主观上，帝国政治空间被列为首要，但资本空间的进展很快压倒政治空间，成为巴黎城市的主体。哈维说，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拥有以及经营。

奥斯曼开辟了宽阔的大道，但只是将货物与人员从中古时代的束缚中解放是不够的，奥斯曼必须动员的力量就是资本的流通。资本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奥斯曼设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甚至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最终，他只成功地让巴黎变成了一座由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在巴黎内部结构中，投资形式的差异，构成了真正的都市分区的边界。

信贷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土地是信贷的重要基础。地产的意义与定位成为城市的一个本质。对于现代性的城市，不能只看景观，还要看根基，有时，景观只是假象。在信贷体系所进行



的革命，也将造成空间关系的革命。在巴黎，这个过程是由金融资本与土地财产的更紧密的整合完成的。

新的资本运行空间是高效的，或者说空间吸收资本的能力是高效的。资本的进入，财产权的高高树立，出现了新的社会威权。福楼拜说：“财产被提升到了宗教层次，并且与上帝密不可分。”空间财产化，空间就是金钱，城市空间获得了新的本质。巴黎的空间性是建构的以及相因而生的，而不是被动反射的。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以及通过消费所造成的私人占用公共空间的现象，三者所形成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具有关键性。

在资本的推动下，巴黎出现新的空间架构，在这个架构下即产生群聚效应，也可以有各自的发展线路，“如此便可展现出城市演进的新历史地理学”。

需要强调的是，在本书中，空间不是一个可随意替换的字眼。在城市的有形与无形的事物中，充满了尺度与区隔，抹掉这些尺度与区隔，事物将陷入一团混沌、抽象、模糊而无法确指。空间，是认识城市的一个关键，城市从古典形态转变为资本主义形态，包含深刻的空间转型。现代性的巴黎，乃是一个社会综合空间的存在形态。

---

## 空间压缩

---

在不少章节的前面，哈维都用马克思的话破题，说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欣赏。例如第四章“空间关系的组织”，开头引述马克思的话：“生产越是仰赖交换价值，乃至至于仰赖交换本身，对流通成本来说——通讯与运输的工具——就会让交换的外在条件显得越重要……资本一方面必须致力于拆除所有空间障碍……并且征服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则必须致力以时间来废除空间。”以各项措施改进流通性，是打造巴黎现代性的必要工作。速度造就新的时空，其中，时间将空间压缩。犹如火车向前开动，车厢中的乘客被向后挤压（书中插图）。

城市空间在扩大，但速度将空间压缩，巴黎的现代性空间是辩证的。这种辩证性的空间在古典地理学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哈维称自己的理论立场是辩证的、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

哈维始终认真考察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路线。他感到，19世纪中期巴黎所发生的事对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对马克思来说，1848年同样标志着一个思想与政治上的分水岭。……1848到1851年间在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宛如救世主的显现，没有这个事件，他不可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撰有《法国1848年革命》等文，指出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六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君主派抬头。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正是在路易·拿破仑政变后的七个月后受命开始的。一切都在加速，这一段历史仿佛也是被压缩的，在极短的时间内竟发生了或孕育了如此多的影响深远的事情。

时间与空间的废止、压缩的观念，在1830与1840年代，与铁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广泛流行于欧美思想界，当时有许多思想家在思考，当新的运输与信息交流技术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可能。哈维认为，同样的概念也逐渐出现在马克思笔下。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个观念还隐而不显，但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便明确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运用这个观念来表示资本主义在地理扩张与加速资本流通上所隐含的革命性质，同时也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周期性的“时空压缩”的倾向。

---

## 空间归属

---

城市毕竟是一个人居场所。巴黎现代性的创造，对于资本是节日，对于人文却是断裂与痛苦。在新的巴黎中，居民丧失了归属感，群体意识解体，他们分散为新的没有历史深度的阶层、人群。在他们的周围，已经没有认同的环境依据。金钱共同体取代了所有社会联系的纽带关系。多元、流动、零碎是新的人文特征。巴黎虽然可以成为世界的首都，却无法拥有自己真正的市民。

“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本雅明)人们的时空视野、地理想象都要改变，他们“内心的地理世界必须调适”。巴黎都市的空间体验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新的百货公司、咖啡馆，以“外向”发展的形式，溢出到新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于是公共空间与私人



空间的疆界变得模糊，其间充满互渗的孔隙。

由于贫富区域的区隔，城市中出现了过去只是由环境主义与种族主义建构的“他者”，“资产阶级例行性地将生活在贝尔维尔‘边界’上的工人描绘成野蛮人”。原有的人际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不复留存。例如，巴黎劳动市场在地理分布上变得零碎，这使原本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工人与雇主分隔两地，于是加速了传统师徒关系的崩溃。

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活的变迁，早已惊动了目光如炬的伟大的时代作家们。回首他们的笔下，一切居然都在鲜活地呈现。所以，他们的大量描述恰如其分地成为哈维研究的生动证据。哈维引人注目地援用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多位作家的众多作品，也使这些诗歌和小说的历史思想重现光芒。在这一部分，哈维显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例如，关于巴尔扎克，哈维提醒我们，他的写作“绝大部分都是以巴黎为中心——人们几乎可以说，巴黎是他的核心角色”。“《人间喜剧》透露各种与城市相关的事物，如果没有《人间喜剧》，城市的历史地理可能因此就被埋没”。“巴尔扎克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细致地解开并表述了随时随地充满于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的社会力量”。“通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巴黎的辩证过程与现代巴黎如何构成便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文学家的生动刻画，穿插在严谨的理性之间，这使本书的阅读饶有兴味。而与此同时，哈维这样做，也为读者在理论阐述与现实情景之间架起了桥梁。本来，巨变对于生活的冲击，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所以，当你阅读奥斯曼的、巴尔扎克的，以及哈维的巴黎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类似情景。或许，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2009年10月  
于北大中关园

## 序 二

# 现代性的巴黎与巴黎的现代性

汪民安

本雅明无与伦比的《拱廊计划》的存在，使得对第二帝国的巴黎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既要从小雅明这里获得启示，但也必须奋力地挣脱开本雅明的束缚。或许，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给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定位：如何清除本雅明的幽灵？如何给巴黎建造——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提供一种另类解释？如果说，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试图将巴黎和现代性结合在一起，都试图用巴黎这个现代都市来充实现代性的内容，都试图将巴黎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一个完美案例，那么，哈维想要构建出一个怎样不同的现代性概念？

在本雅明这里，现代性主要是作为一种体验而得到特别强调的。现代性是遭遇新奇之物的经验：瞬间变化的经验，碎片经验，商品和商场经验，交通、街道和人群经验，车间和厂房的经验，赌博、行窃和拾垃圾经验——所有这些巴黎经验，都是历史的新奇之物，都像梦幻一样呈现——正是在这个新奇和（资产阶级）梦幻的意义上，人们说它们是现代的。巴黎街头的漫游者承担了这些现代经验。为此，本雅明不得不像转动万花筒般地对巴黎进行眼花缭乱的现象描述。波德莱尔及其抒情诗是他捕捉巴黎经验的核心。

哈维也描述了现代经验，不过，他借助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通过《人间喜剧》，他揭开了现代性的面纱。这个现代性同本雅明的经验现代性有大量的重合之处：人群的漩涡，麻木



不仁的感知；漫游者在挖掘秘密，绘制城市地图；街道是巴黎的丰富诗篇；拜物教的盛行；偶然性，短暂互动，机缘式的表浅接触；未来时间和过去时间在现在巅峰一般的汇聚，等等；这些处在现代性神话之核心的经验，在本雅明那里，在西美尔那里，在众多的其他现代性理论家那里，都得到过详细的描述，这是现代性的一般经验。但是，哈维的另外一些论述是独属于他个人的，并且专门针对着巴黎：脱去外省人的身份，对乡村的拒斥，从而对过去的完全否定；巴黎内部空间的封闭和穿透；努力克服时空的束缚，从而将自己从世界和空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巴黎的道德秩序在空间模式中的再现，社会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镌刻；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构和空洞；阶级力量横陈和彼此撞击；对金钱的追逐导致对亲密关系的压制；资产阶级的欲望、野心和抱负席卷了一切，流通资本的绝对主宰，等等。这样的巴黎，“被五花八门的现象和匆忙的速度所包裹”。

我们看到，同本雅明相比，哈维特别强调了两点：巴黎内外空间的关系；巴黎崭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或者，更恰当地说，哈维强调的是空间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巴黎的空间构型，如何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支配？巴黎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是如何镌刻在巴黎的空间关系之上？空间，是如何历史性地被锻造而成？这样的问题就偏离了本雅明的重心：在本雅明那里，只有空间，只有外部，只有流动，只有漫游者，只有体验，也就是说，只有现象，只有碎片，而既不将现象，也不将碎片纳入到政治经济的宰制逻辑中；或者，经济过程本身就是现象；或者，每一个碎片都是孕育着无限总体性的种子；或者，体验本身就可以获得自主性；或者，漫游者能够独自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美学。在本雅明那里，并没有一个内在性的东西宰制着一个外在现象。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不断地返归空间的主体，但是，他沉浸在对空间的特殊体验之上。空间与其说是受制于政治经济逻辑，不如说是受制于个人的目光和脚步等敞开的感官机器。正像阿多诺所批评的，在本雅明这里，政治经济关系并没有辩证地决定空间的生产形式——这一说法的潜台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这个庞大的拱廊研究计划中并没有作为教义牢牢地潜伏下来。在巴黎纷繁的现代经验的背后，本雅明对任何决定性的经济基础都

(故意地)视而不见——这是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但是，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经济并非不能获得形象的结晶。

哈维这本书正是对此的补足。这本书，同他后来的主要著作一样，一直在有些孤独的马克思主义氛围中呼吸。在这个氛围中，他找到了列菲伏尔，更确切地说，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支。列菲伏尔的创造性贡献，就是将空间强行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使得这种政治经济学充斥着—一个空间维度。

事实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将空间和地理的问题提出来了，但是，他对时间（历史）魔力的强调，对终极性的解放叙事的强调，使得他最终将已经萌芽的空间论述压抑住了。在马克思这里，生产，意味着对物质进行生产，而空间不过是这种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而列菲伏尔则创造性地将空间本身作为生产对象来对待。物质生产，也可以是对空间的生产。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现在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越来越趋向空间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同之前的社会的一个重大差异。列菲伏尔甚至断言，资本主义正是不断地通过对空间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才将各种危机摆脱掉，从而存活到了20世纪——显然，这甚至是将殖民主义的扩张（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全球化）作为一种空间生产的形式来看待。如果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生产，我们会将目光置放在各种各样的都市建造、规划和设计方面来——都市的大规模建造，正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露出的显赫特征。就此，商品生产变成了空间生产：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地被生产出来的，它是一个产品，剩余价值正是在这空间的生产中汨汨流出；空间也是资本在其上流通和运转的媒介，是各种权力竞技和角逐的场所，是各种政治经济奋力捕获的对象。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中期巴黎的庞大改造被哈维视作是列菲伏尔所谓的“空间生产”。本雅明将改建后的巴黎体验作为重要主题，尽管这种空间体验同空间生产并不是没有关联；哈维则将巴黎的改建，将巴黎的空间生产作为重要的主题，尽管这种空间生产同空间体验也紧密相关。从本雅明到哈维的转变，就是列菲伏尔所说的，人们“兴趣的对象有望从空间中的事物转变到实际的空间生产方面来”。

如果是探讨巴黎的“空间生产”的话，那么，巴黎的空间首先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出现的。是政治经济学在驱动着这一生产。或者说，空间之所以得以生产，就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图谋。19世纪中期巴黎庞大的改造故事，就不是游手好闲者街头的散漫闲逛，而是资本和政治的残酷角力。在这里，人们或许看不到本雅明笔下的抒情诗人；给他们留下至深印象的是反而是一个外科医生般的冷静解剖：改造的动能，过程，结果以及遍布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纠纷，就是这本书的内容。与其说这是在炫耀着文人的才华和诗意，毋宁说，它表达了历史—地理学的耐心和审慎。

改建巴黎的主人公是市长奥斯曼。1853年，由第二帝国的皇帝路易·波拿巴指定他挑起巴黎改造这个大任。奥斯曼精于权术，意志坚定，野心勃勃，精明老到，事必躬亲。新皇帝要通过打造一个新的巴黎，来打造一个新的历史。第二帝国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脱颖而出，要同过去决裂，要表现新皇帝的意志和威权。对此，奥斯曼心领神会，他也因此能够施展拳脚，大胆地对巴黎开肠剖肚。他掌权之际，巴黎，这个法国当时的中枢，正痛苦地承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巴黎一片混乱，骚动不安；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的苦难、堕落和丑恶不折不扣地弥漫在巴黎的每一片空气之中；农业歉收使得农民纷纷拥进巴黎，使得巴黎僻静但却肮脏的角落都塞满了人群；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扑面而来，劳动力和资本出现了双重过剩；生产和消费变得繁复、琐碎、多样和细致。这一切，都使得古老而陈旧的市政结构负荷累累，气喘吁吁。巴黎的拥挤不堪令人窒息——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在这种堵塞的城市结构中遭到了压制。扩建迫在眉睫。巴黎，急于将自己从这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

皇帝和奥斯曼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巴黎的剧烈改造，其重要根源是化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危机：剩余的资本和大量的失业工人只有借助巴黎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来消化。这种改造要照顾到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新空间关系乃是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在都市转型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必须痛苦地进行调整以配合其他部分。”巴黎被资本意志和利益分配的意志所垂涎。但是，要进行规模庞大的改造，除了资金之外，还要确保现实的生产和改造能力，这是改造巴黎的前提。这样，生产

能力——它包括技术、生产组织，以及更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处境——也成为要考察的对象；最后，改造也受制于当时的都市意识：如何理解都市？都市与自然、环境、生态、疾病、卫生和情感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都市改造怎样摧毁了城市的记忆，并且锻造出新的城市记忆？这是人们改造巴黎的认识论背景——奥斯曼及其官僚的视野和抉择脱离不了这种背景。事实上，所有这些并不是割裂的，它们分头表明了改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根源。从政治上来说，要展现帝国权力的气度，要展现巴黎作为欧洲核心的尊严；从经济上来说，要化解经济危机，要让资本通过改造进一步增殖，让各个阶级都有利可图；从社会上来说，要消除拥挤，改善交通和居住；从生产方面来说，要有劳动力和技术的保障；从文化上来说，改造要符合新的城市观念和意识形态。巴黎的改造，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不同领域互动的结果。这本书，分头考察了这所有的领域，它们形成了一个片的断故事，这些不同的片断编织成一个整体，绘制了巴黎改造的全景图，在某种意义上，也绘制了19世纪中期的巴黎全景图——事实上，这本讨论空间的书籍，宛如一本历史之书。对空间生产的还原，也一定是对历史情势的还原——这同样是列菲伏尔的教训。这也是哈维反复说到的“历史—地理”的含义：用地理和空间的维度将历史的单纯直线炸开；或者，反过来，用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将单纯的封闭性的空间物理牢牢地裹住。

空间一旦生产出来，就意味着它同过去的决裂——不仅是同旧巴黎的决裂，而且是同旧巴黎的社会关系的决裂——新的空间生产，也就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对空间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新的宽阔大道、百货公司、咖啡馆、餐馆、剧院、公园，以及一些标志性的纪念建筑，它们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即重新塑造了新的阶层区分，塑造了新的社会关联，阶级的区分不得不铭刻在空间的区分之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也开始泾渭分明：彼此隔离的空间的禁令和穿透，都会重新安顿社会秩序。在此，每个空间都在塑造人的习性，都在划定人的范围，都具备一种控制能力，都在暗示着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每个空间也是权力和财富的景观展示，它们怀抱着实用之外的象征目的。巴黎新空间的生产，在重新塑造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同时，



也是对旧共同体的摧毁；它在塑造新的情感结构的同时，也是对旧的情感结构的摧毁；它在塑造一种新的城市概念的同时，也是对旧的城市概念的摧毁。一个新的巴黎被打造出来，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巴黎人被打造出来，一个新的巴黎政治经济关系被打造出来。

这是绝对的断裂吗？哈维更愿意称此为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它指的是，历史，会在某一个时刻点，将其重大的能量聚焦起来，一举将过去摧毁。历史，正是在这种对过去的摧毁中创造出新的面貌来。哈维将1848年视作是这样一个重大时刻。正是在这一年，许多重要的东西从过去中孕育出来。福楼拜和马克思都告别了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前者转向了文学现代主义，后者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奥斯曼，则同样地要向旧的巴黎告别，他要在巴黎的废墟中奠定一个新的巴黎——这是奥斯曼的创造性破坏。奥斯曼的目的，就是通过建造巴黎，同过去彻底决裂，从而证明这是一个全新的与旧时代毫无瓜葛的帝国——尽管存在这样的抱负，但是，他也明白，现在不可能同过去绝对断裂。就像马克思，福楼拜和波德莱尔等人一样，尽管同过去决裂，但是，如果没有过去，如果没有刚刚完成的《人间喜剧》的伟大启示，他们是不可能同过去决裂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意味对过去的眷恋消失殆尽，它只是意味着，要在过去的废墟中新生。这是对现代性一刀两断的决裂神话的一个破除。马克思、福楼拜、波德莱尔证明了这点，奥斯曼尽管想掩饰，但私下也偷偷承认这点。

显然，这是试图将都市的空间生产同现代性概念连接起来。为什么选择巴黎作为研究对象？巴黎的改造正好承载了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它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征兆，是现代性的一个充分案例。巴黎，打开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窗口。（欧洲的）现代性，它的种种面向，就是在19世纪中期的巴黎身上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从一个大都市入手，来讨论现代性的一本书；也可以说，这是从现代性入手，来讨论大都市的一本书。就此，城市的剧变，是现代性的剧变；反过来，现代性的剧变也是城市的剧变。《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这个书名，恰如其分地将书中这两个要素暴露出来：巴黎和现代性。既非巴黎，也

非现代性，而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尽管书中将大量的篇幅对准了19世纪中期巴黎的剧变，但是，正是通过巴黎的这种剧变，哈维的现代性概念得以成形：创造性的破坏。与其说，现代性剧变意味着同过去一刀两断，毋宁说，现代性是从过去的废墟中孕育出新生。

因此，将巴黎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分析，是历史地理学的绝佳选择。同时，巴黎的改造，几乎是日后对空间生产所做的研究的一个范本。几乎所有的空间生产模式都能在巴黎的改造中找到切近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哈维对巴黎的研究，几乎有一种历史—地理学的示范效应（事实上，书中的很多章节，总是会令人从历史中回到现实，从19世纪巴黎回到今日的北京），他差不多为空间生产理论提供了一种原理。而这同本雅明完全不同。本雅明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阿多诺批评本雅明缺乏足够的辩证法，这是想用一种框架来束缚住本雅明，而本雅明是不属于任何框架的，他既不遵从别人，别人也无法遵从他。他偏离了几乎一切伟大的既定的思想建制，尽管他也悄悄地出没于各种思想建制中（西美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本雅明煽动热情正在于此，人们涌向本雅明，正在于他的神秘莫测，他的似是而非。在他的笔下，占据19世纪中期的巴黎舞台的，不是老谋深算胸有成竹的市长先生，而是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之徒；在此，巴黎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暧昧；不是更现实，而是更浪漫；不是更政治化，而是更诗意化；这符合今天人们对巴黎的想象。相反，对哈维来说，巴黎是个现实的历史过程，尽管他并不排除文学的方式。但文学对于本雅明来说，可以直接抵达历史的深邃核心。对哈维来说，文学是都市主义者的研究手段，是历史地理学暴露城市欲望的一个中介。

哈维的巴黎是对本雅明的巴黎的补充，而不是一种对抗。本雅明的巴黎，看上去像是美学；或者说，本雅明的历史是以一种美学面貌出现的；而哈维的巴黎，是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他的历史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无法效仿，而哈维的研究可以说历史地理学的完美一课。在此，人们不仅理解了巴黎的历史全景，而且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理解了一个学科要达到的规范，一种学科建制的楷模。本雅明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天才，哈维则是一个能让众人学习的典范。

# 目 录

序一 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唐晓峰） .....	I
序二 现代性的巴黎与巴黎的现代性（汪民安） .....	VII
图版目录 .....	XVII
图表目录 .....	XXI
导论 与过去决裂的现代性 .....	001
第一部分 表述：巴黎 1830—1848 .....	025
第一章 现代性的神话：巴尔扎克的巴黎 .....	027
第二章 梦想身体政治： 革命政治学与乌托邦构想，1830—1848 .....	068
第二部分 物质化：巴黎 1848—1870 .....	101
第三章 序幕 .....	103
第四章 空间关系的组织 .....	116
第五章 金钱、信贷与金融 .....	127
第六章 租金与地主 .....	135
第七章 国家 .....	151
第八章 抽象与具体的劳动 .....	164
第九章 劳动力的买卖 .....	183
第十章 妇女的状况 .....	194
第十一章 劳动力的再生产 .....	206
第十二章 消费者主义、景观与休闲 .....	220

第十三章	共同体与阶级·····	236
第十四章	自然关系·····	259
第十五章	科学与情感，现代性与传统·····	267
第十六章	说辞与表述·····	283
第十七章	都市转变的地缘政治学·····	311
第三部分	尾声·····	329
第十八章	建造圣心堂·····	331
注解	·····	361
参考书目	·····	373
谢辞以及提供图文的机构与人士致谢表	·····	381
索引	·····	382



## 图版目录

- 003 图 1 1848年6月摩德勒里街的街垒，梅索尼耶绘
- 004 图 2 《暴乱》，杜米埃绘(1848)
- 006 图 3 杜伊勒里宫中的街头流浪儿，杜米埃绘(1848)
- 007 图 4 1848年6月25日早晨神庙区街垒
- 009 图 5 皇宫附近的拆除工程，马维尔摄
- 011 图 6 因破坏而进行人口移置，杜米埃绘(1852)
- 012 图 7 1850年代初期的巴黎中央果菜市场；普罗沃的平版画
- 013 图 8 巴尔塔于1852年首次设计的新巴黎中央果菜市场；马维尔摄
- 013 图 9 巴尔塔设计的巴黎中央果菜市场：“钢铁雨伞”（1855）
- 014 图 10 工业博物馆(1855)
- 015 图 11 歌剧院街，马维尔摄(1855)
- 018 图 12 《小丑》，杜米埃绘
- 028 图 13 新里沃利街，杜米埃绘
- 032 图 14 资产阶级的田园乌托邦主义，杜米埃绘
- 037 图 15 乡村生活的现实面，杜米埃绘
- 040 图 16 罗伯·马盖尔，杜米埃绘
- 045 图 17 《意大利大道与神庙大道上的阶级》，杜米埃绘
- 050 图 18 《美德街》，马维尔摄
- 058 图 19 《时空的挤压》，杜米埃绘(1843—1844)
- 069 图 20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杜米埃绘(1848)
- 071 图 21 《加冈图瓦》，杜米埃绘
- 072 图 22 《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洛瓦绘
- 073 图 23 《共和国》，杜米埃绘

- 080 图 24 《女性社会主义者》，杜米埃绘
- 092 图 25 1840 年代的新道路系统
- 102 图 26 新巴黎，古斯塔夫·多雷绘
- 104 图 27 《新巴黎》，杜米埃绘
- 106 图 28 旧巴黎的街道，马维尔摄
- 108 图 29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里福等摄
- 111 图 30 奥斯曼的照片与讽刺画，珀蒂绘
- 113 图 31 巴黎拒绝了奥斯曼
- 114 图 32 奥斯曼与街道细部陈设，马维尔摄
- 115 图 33 商业法院，马维尔摄
- 117 图 34 铁路的匆忙景象，杜米埃绘
- 119 图 35 法国铁路网的成长
- 121 图 36 奥斯曼新大道地图
- 124 图 37 搭公共马车去旅行，杜米埃绘（1856）
- 125 图 38 火车旅行的演变，杜米埃绘（1864）
- 129 图 39 证券交易所，夏尔戈绘
- 130 图 40 投资的诱惑，加瓦尔尼绘
- 131 图 41 不动产公司的营运，1856—1866 年
- 136 图 42 地主的阴谋，杜米埃绘
- 136 图 43 秃鹰先生，杜米埃绘（1852）
- 137 图 44 有害健康的住宅，马维尔摄
- 138 图 45 巴黎房地产价格的变动
- 140 图 46 巴黎周边的贫民窟，马维尔摄
- 142 图 47 拆除工程与资产阶级，杜米埃绘
- 144 图 48 房地产税基的增加，1855—1880 年
- 145 图 49 运入巴黎的建材容积，1850—1870 年
- 153 图 50 路易·拿破仑企图引诱共和国，杜米埃绘
- 154 图 51 拆除与建设工作，杜米埃绘
- 158 图 52 巴黎街头艺人，杜米埃绘
- 160 图 53 人口密度与职业分布图
- 165 图 54 《工人》，杜米埃绘
- 169 图 55 大企业数量
- 169 图 56 大企业所在地，依产业分类

- 170 图 57 位于维雷特的工厂
- 172 图 58 戈布兰的织毯业，多雷绘
- 176 图 59 1840 年代的新服饰店，杜米埃绘
- 178 图 60 海狸河两旁的制革工厂，马维尔摄
- 180 图 61 集体蒸汽引擎系统
- 184 图 62 来自利穆赞的巴黎建筑工人，杜米埃绘
- 195 图 63 《啤酒馆的女子》，杜米埃绘
- 197 图 64 歌剧院与咖啡厅的妇女，多雷绘
- 200 图 65 格里塞特与罗瑞特，加瓦尔尼绘
- 201 图 66 好妻子与资产阶级家庭，杜米埃绘
- 207 图 67 《汤》，杜米埃绘
- 209 图 68 巴黎的出租房间与贫穷率
- 210 图 69 房东驱赶孩童与宠物，杜米埃绘
- 218 图 70 家庭灾难，杜米埃绘
- 222 图 71 景观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杜米埃绘
- 223 图 72 军事阅兵
- 224 图 73 大道落成：塞瓦斯托波与欧仁亲王
- 225 图 74 布洛涅森林一游：欣赏歌剧与烟火表演，盖拉尔绘
- 226 图 75 节日与舞会
- 228 图 76 愉悦的火车，杜米埃绘
- 229 图 77 碎石与大砾石，卡姆绘
- 230 图 78 大蓬裙服饰，杜米埃绘
- 231 图 79 大道生活——托尔托尼与大饭店
- 237 图 80 铁路上的阶级关系，杜米埃绘
- 249 图 81 移置所造成的流浪者，达尔茹绘
- 250 图 82 西岱岛上的拆除工程
- 252 图 83 市中心与市周边的工人阶级住宅
- 255 图 84 工人阶级白天在巴黎中央果菜市场附近的街头生活与在酒馆的夜生活，克雷蓬绘
- 261 图 85 巴黎的新鲜空气与阳光，杜米埃绘
- 262 图 86 布洛涅森林，马维尔摄；以及位于肖蒙高地的新公园，沙尔庞捷、伯努瓦绘
- 263 图 87 神庙广场
- 264 图 88 在街上横流的污水，马维尔摄

- 265 图 89 新下水道系统，瓦朗坦绘；以及资产阶级与特权阶级，佩尔寇克绘
- 269 图 90 现代性与传统：马奈《奥林匹亚》与提香《乌比诺的维纳斯》
- 277 图 91 拆除的景象
- 279 图 92 怀念失落的巴黎，杜米埃绘
- 281 图 93 里沃利街
- 285 图 94 遭受围攻的巴黎
- 286 图 95 沙龙中的群众，杜米埃绘
- 291 图 96 乡村与城市，杜米埃绘
- 298 图 97 1848 年巴黎街垒
- 308 图 98 1848 年要求离婚权的女人，杜米埃绘
- 313 图 99 第二帝国的历史，杜米埃绘
- 314 图 100 倒落的旺多姆凯旋柱，布拉克艾摄
- 316 图 101 资产阶级的矛盾，杜米埃绘
- 320 图 102 巴黎公众集会地图，1868—1870 年
- 323 图 103 奥斯曼成了窃贼，迈利绘
- 324 图 104 卡伊冶金工人罢工，普罗沃绘
- 326 图 105 1871 年 3 月选举
- 333 图 106 圣心堂
- 338 图 107 巴黎公社的末日，巴黎烧成废墟
- 341 图 108 围城期间，人们以鼠为食，卡姆绘
- 342 图 109 梯也尔与巴黎公社，杜米埃绘
- 344 图 110 蒙马特的大炮
- 346 图 111 巴黎公社成员堆筑的街垒（1871）
- 347 图 112 巴黎公社成员墙的枪决景象，达尔琼绘
- 348 图 113 死去的巴黎公社成员
- 349 图 114 《旺多姆凯旋柱的倾覆》，摩尔与维耶绘
- 351 图 115 巴黎公社的最后几天，巴黎大火
- 352 图 116 马奈与杜米埃对巴黎公社的感受
- 358 图 117 巴黎工坊中的自由女神像
- 359 图 118 圣心成了吸血鬼



## 图表目录

- 105 表一 巴黎人口，1831—1867年
- 118 表二 法国国内运量模式，1852—1869年
- 139 表三 房地产在个人财产中所扮演的角色，1840—1880年
- 167 表四 巴黎的就业结构，1847与1860年
- 167 表五 巴黎的经济依赖人口，1866年
- 168 表六 巴黎各产业产值，1847—1848年与1860年
- 188 表七 巴黎各项职业年收入与每日工资率，1847—1871年
- 239 表八 依社会经济范畴区分的财产继承状况，1847年
- 242 表九 普洛1870年巴黎工人分类简表

# 与过去决裂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在于它采取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如同一道命令，它将世界视为白板（tabula rasa），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因此，不管现代性是否将以温和而民主的方式呈现，还是将带来革命、创伤以及独裁，它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与过去完全决裂，是表示对于事物的实行或表述，必须要在各种不同的领域进行，例如在文学与艺术方面，在都市计划与工业组织方面，在政治、生活、风格等其他方面；或者说，还是意味着在上述各种领域中，事物的转变将在某个关键的时间与地点发生，而从发生转变的这个时空开始，现代性在各领域所聚集起来的力量将发散出去，吞没整个世界。要在这两种意义之间做决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现代性的神话倾向于后者的诠释（特别是通过它的同源词汇：现代化与发展），虽然如此，绝大多数现代性拥护者在受到逼迫之下也会承认，发展的不均衡往往在各个领域造成相当大的混乱。

我之所以称现代性的观念是神话，乃是因为即便已经有许多证据证明与过去完全决裂是不可能的事，但决裂本身所带有的说服力与颠覆性却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首先由圣西门（Saint-Simon）提出，并且受到马克思重视的现代化理论（并非现代性的理论）就认为，除非造成变迁的因子早就潜伏在社会秩序既有的条件中，社会秩序是不可能改变的。令人不解的是——难道不是

吗？——圣西门与马克思这两位在现代性思想的万神殿中居于崇高地位的思想家，在明白否定与过去完全决裂的可能性的同时，却也坚持以革命造成变迁的重要性。虽然彼此的意见容许有不同，但至少最低限度仍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共识，那就是“创造性的破坏”。俗话说，破旧立新，要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不将旧的社会予以取代或销毁。因此，如果现代性是个有意义的词汇，它就必须显示某个创造性破坏的关键时刻。

3

1848年，戏剧性的事件席卷了全欧洲，尤其是巴黎。当时的巴黎在政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上表现出与过去完全决裂的态度，对此，有人提出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合理的论点。1848年以前的都市观点，顶多只能粗浅地处理中古时代都市基础建设的问题；而在1848年之后则出现了奥斯曼（Haussmann），是他强迫巴黎走入现代。1848年之前有古典主义者如安格尔（Ingres）与大卫（David），以及色彩画家如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之后则有库尔贝（Courbet）的现实主义与马奈（Manet）的印象派。1848年之前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如拉马丁（Lamartine）、雨果（Hugo）、缪塞（Musset）及乔治·桑（George Sand），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如福楼拜（Flaubert）与波德莱尔（Baudelaire）。1848年之前，所谓的制造业者多半都是散布各处的手工业者；之后则绝大部分手工业都被机械与现代工业所取代。1848年之前只有小店铺沿着狭窄、弯曲的巷弄或骑楼开张；之后在大马路旁出现了巨大笨拙的百货公司。1848年之前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顽固的管理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1848年之前，运水人是个重要职业；但到了1870年，随着自来水的普及，运水人几乎完全消失。从这些方面来看——还有更多的方面——1848年似乎是个关键时间点，许多新事物于此时从旧事物中孕育。

那么，巴黎在184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全境充斥着饥饿、失业、悲惨及不满，而随着人们涌进巴黎寻找生计，许多问题也就集中于此。共和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决心与君主制对峙，并至少逼迫君主制进行改革，使其能兑现当初的民主承诺。如果政府做不到，将一直会有人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这种局势一直维持了好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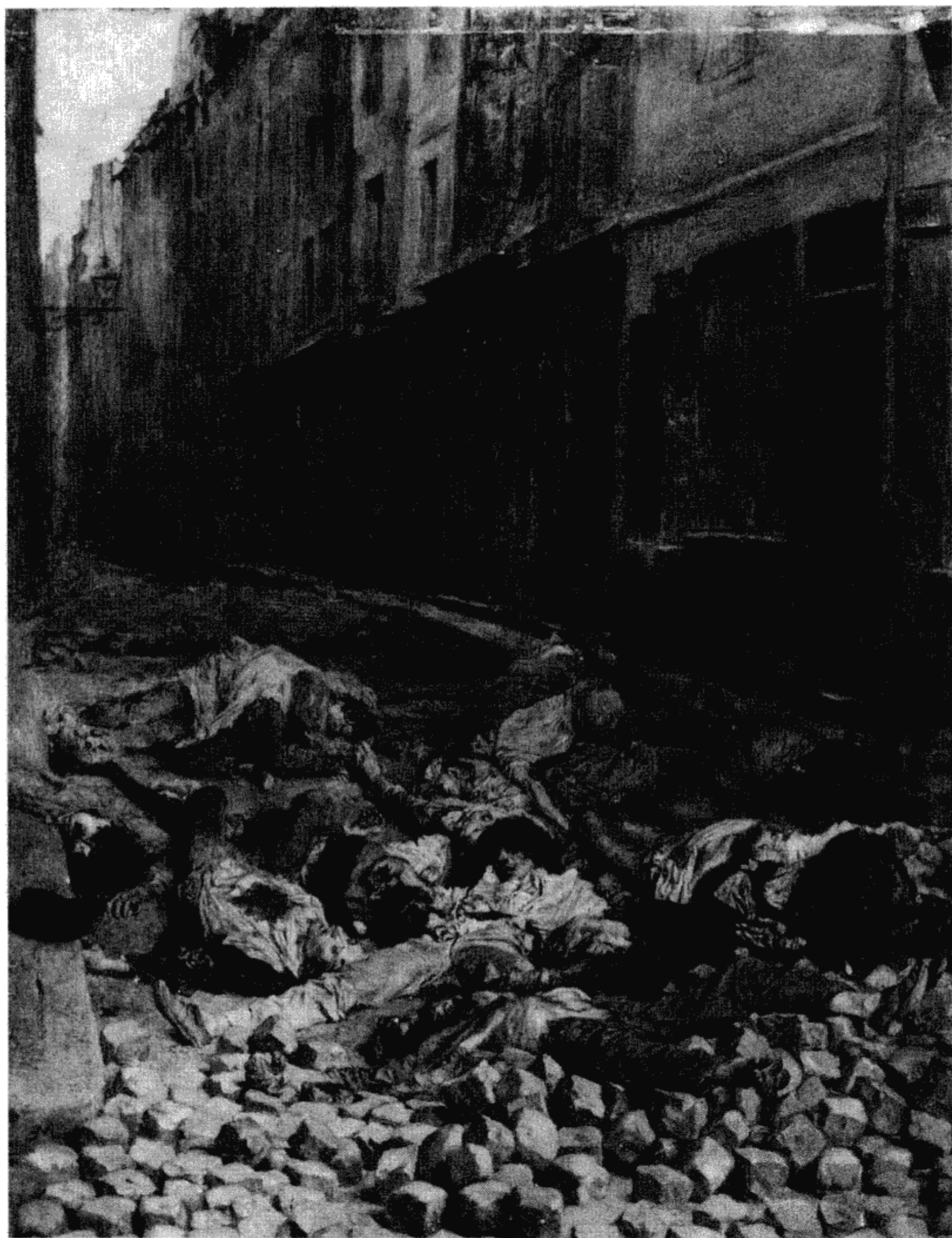


FIGURE-001

埃内斯特·梅索尼耶 (Ernest Meissonier) 的画作，画的是 1848 年 6 月在摩德勒里街 (Rue de la Mortellerie) 的街垒。这幅画描绘了原本强调以乌托邦社会主义路线来重建巴黎身体政治的革命运动，如今却因死亡与破坏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



1840年代的罢工、街头示威以及阴谋暴乱都受到控制，而从政府毫无准备的状况来判断，当时应该鲜少有人认为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

1848年2月23日，在卡普辛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的外交部前面的小规模抗议失去控制，军队对示威者开枪，杀死了50多人。之后所发生的事非常离奇。一辆载着几具遇难者尸体的运货马车，由火炬引领，在巴黎巡回。丹尼尔·施特恩(Daniel Stern)描述过所引述传说的说法，集中在一具女性尸体上面(而我之所以说是传说，是因为运货马车的驾驶员作证，上面并没有女性尸体)。<sup>1</sup>根据施特恩的说法，在大批沉默的群众集结于街头之前，有个男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用火炬照



FIGURE-002

杜米埃(Daumier)于1848年所绘的《暴乱》(L'Émeute), 捕捉到1848年2月暴乱当中某种可怕的骚乱特质。伴随着令人忧虑的凶兆, 这幅画似乎预示着死亡的结果。

4 亮年轻妇女的尸体; 之后, 有个男人抬起尸体, 展示于群众面前。这是个强有力的象征。自由长久以来就被想象成女性, 而如今看来她似乎已经被射杀了。根据几个人的叙述, 当晚似乎异常安静。即使市场也一样。到了快天亮的时候, 警钟响遍了全市。这是革命的信号。工人、学生、对政府不满的资产阶级、小地主都齐聚街头。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他们, 军队大部分很快也失去了战斗意志。

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先是匆促地任命路易·莫莱(Louis Molé), 然后又任命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为首相。梯也尔著有卷帙浩繁的法国大革命史, 他在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 1830)初期就曾担任过首相, 不过却因为无法让政权稳定地沿着英国式君主立宪路线发展而下台。一般威信梯也尔曾建议国王撤往凡尔赛(Versailles)以重整仍效忠王室的部队, 并准备在必要时出兵击溃巴黎的革命运动(这个战术后来被用来对付1871年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年迈而腐化的国王并没有听从梯也尔的建议——如果他听到的话。他将王位让给八岁大的孙子之后, 就跟皇后一起跳上马车, 化名史密斯夫妇(Mr. and Mrs.

Smith) 逃往英国去了。此时, 巴黎已落入革命分子之手。保守派议员逃走, 而国民会议 (National Assembly) 想为新王建立摄政政权的短暂尝试也终告失败。临时政府在巴黎市政厅 (Hotel de Ville) 宣布成立。由 11 人所组成的团体, 其中包括拉马丁 (浪漫派诗人, 赞同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 及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老社会主义者), 被拥戴为临时政府领袖。群众进攻国王过去的寝宫杜伊勒里 (Tuileries), 并且进行劫掠, 摧毁内部陈设并且把所有的绘画作品割个粉碎。平民百姓乃至街上的流浪儿轮流坐到王座上, 之后王座就被拖到街上, 在巴士底 (Bastille) 前焚毁。

许多人目睹了这些事件。巴尔扎克 (Balzac) 虽然急着赶往俄国与心爱的汉斯卡夫人 (Madame Hanska) 会面, 但还是忍不住亲自到杜伊勒里一观究竟。福楼拜赶到巴黎, 以“艺术家的观点”观看整个事件, 并在 20 年后的《情感教育》中写了与这事件相关的长篇, 其内容详尽, 史家甚至认为他描写得相当精确。波德莱尔被卷入了这场行动。后来成为改造巴黎幕后策划者的乔治-欧仁·奥斯曼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当时在波尔多 (Bordeaux) 附近的布莱 (Blaye) 担任副省长, 他在事发后两天得知这个消息, 跟法国外省的人一样, 他感到惊讶与不安。奥斯曼认为临时政府不具正当性, 于是辞去官职, 并且拒绝接受政府对他的再任命。

临时政府于 4 月底举办大选, 而制宪会议 (Constituent Assembly) 则于 5 月召开, 正式宣布共和国成立。法国外省多半把票投给了右派, 而巴黎则多半投给了左派, 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当选了。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让激进组织得以繁衍壮大的空间。政治俱乐部形成, 工人协会产生, 还有那些对工作问题最关切的人也推动了官方委员会的组成, 这个委员会定期在卢森堡宫 (Luxembourg Palace) 开会, 针对社会与政治改革的议题进行研究, 而委员会后来也成为所谓的“工人议会” (the workers' parliament)。国民工作坊成立, 用来提供工作与薪资给失业人士。这是个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时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精彩地表现出当时的情景:

随着生意停摆, 焦虑以及渴望闲逛使得人们走出户外。非正

式的服装掩盖了社会地位的差异，阶级仇恨也被隐藏起来，希望燃起，群众满怀善意。到处都充满着嘉年华式的欢乐以及露宿野外的兴致，一开始巴黎所弥漫的愉悦气氛，难得一见……

[弗雷德里克 (Frédéric) 与保安官]造访了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社团]，红的与蓝的、狂热的与严肃的、清教徒式的与波希米亚式的、神秘主义的与嗜酒的、坚持处死国王的与批评杂货商欺诈的，每个地方的佃农莫不诅咒地主，穿工作服的攻击那些穿华服的，至于富人则是处心积虑地对付穷人。有些人希望得到赔偿，如先前死在警察手里的殉道者，有些人则恳求得到资金来发展自己的创见，例如法隆斯戴尔分子 (Phalanstèrian，傅立叶的信徒 [Fourièrist]) 的计划、地方市场方案、用来提升公共福利的系统，通过这些计划，便在愚蠢的迷雾中闪现出智慧之光，在裸露的胸前挂着剑带的小学徒就马上说出各种劝世良言，并且懂得宣誓来彰显自己的权利，同时嘴里还能吐露漂亮流利的辞藻……为了让自己的作法看起来合理，一定得不断地以尖刻的语气批评律师，并且要尽可能地以如下的方式表达：每个人都应该为这栋建筑……社会问题……工作坊贡献力量。<sup>2</sup>



FIGURE-003

杜米埃以喧闹的手法重新描绘出巴黎街头流浪儿轮流霸占法国王座的情景，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也快乐地在废弃的杜伊勒里宫中奔跑追逐。王座随后被拖往巴士底，并在那里焚毁。

但是整个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债务仍未偿还，而随着地主、收租者与雇主的反动情绪逐渐升温，资产阶级也开始忧虑自己的财产权利（福楼拜写道，“财产被提升到了宗教层次，并且与上帝密不可分”）。四五月间所发生的小规模骚动更加深了这一层忧虑，而在逮捕了几位激进领导人之后，骚动才得以平息。反左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国民工作坊一方面无法组织具生产力的工作，另一方面却又不让工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由右派主导的共和政府决定在6月关闭国民工作坊。大批群众开始上街抗议。格德利亚 (Guedella) 曾有一段相当经典的描述：“群众很饥饿，他们在没有希望、没有领袖、没有鼓舞的状况下战斗，他们只能躲在石块堆

成的大型街垒后头愤怒地射击。有四天的时间，巴黎不断闪烁着黯淡的亮光，连枪炮也用来对付街垒；风暴席卷了硝烟弥漫的市区；妇女被无情地射杀；而在恐怖星期日，一位负责跟街垒谈判的将领遭人以不光明的手段暗杀；巴黎大主教怀着和解的赤诚，在日落时分前去和谈，却遭到射杀。这是个恐怖的时期，巴黎在斗争下被折磨了四个夏日。之后叛军崩溃，共和国存活下来。”<sup>3</sup>国民会议解散了政府（当中包括了拉马丁）并将大权交给了路易·卡芬雅克（Louis Cavaignac），他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将领，长期驻守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Algeria），经验丰富。在获得军权之后，他无情而血腥地镇压叛乱，街垒也被粉碎。

#### FIGURE-004

这幅 1848 年 6 月 25 日早晨神庙区（Faubourg du Temple）街垒的银版照相图非常稀罕而珍贵，它描绘了恢复秩序的部队在试图重新占领巴黎时所受到的抵抗。

六月事件并没有结束。中间派共和主义者现在已不被信任，国民会议逐渐分裂成保皇的右派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左派。而在当中竟出现了以拿破仑侄儿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为凭借而兴起的波拿巴主义幽灵（specter of Bonapartism）。路易·拿破仑此时虽然仍流亡英国，但他却在 6 月时被选为国民会议议员。他一方面说不会接受这个职位，另一方面却又在信中透露出不祥的





信息：“如果法国交付职责给他，他知道该如何履行。”于是这样的看法逐渐深植人心，人们普遍认定路易·拿破仑——而且只有他——能够重建秩序。9月，路易·拿破仑在另外一场大选中又再度获胜。这一次他接受了职位。新宪法所创设的总统职位采取美国模式，由全民普选选出，于是路易开始为总统大选拉票。在12月10日的选举中，他得到了540万张选票，对手卡芬雅克得到140万张，而拉马丁则只得到8000票，成了笑柄。然而总统任期只有四年，而路易又无法在国民会议取得奥援（1849年只有一小撮波拿巴主义分子当选；议会中绝大多数都是保守的保皇派）。路易一方面对宪法缺乏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却也开始展现出他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能力，并且对“红色分子”（the reds）展开镇压。

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路易·勃朗、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in]、维克托·孔西代朗[Victor Considérant]等）于1849年夏天被迫流亡。借由收买人心——特别是针对各省份（得到像奥斯曼这样的官员的暗中协助），更重要的是，得到天主教徒（打击意大利革命分子以协助教皇返回梵蒂冈[Vatican]）及军方的支持——路易·拿破仑阴谋策划他的夺权之路（国民会议不智地废除普选制，重启新闻检查，并且拒绝延长总统任期，这些作法无形中帮了路易的忙），并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国民会议被解散，主要的议会人物（卡芬雅克、梯也尔等）都被逮捕，巴黎内部的零星抵抗很快就被消灭（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博丹[Baudin]死于街垒之中，这件事后来成为帝国缺乏正当性的象征）。虽然乡村地区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孤立抗争，不过新宪法（以革命八年[Year VIII of the Revolution]的宪法为范本）还是在12月20日的公民投票中以750万票对64万的悬殊票数通过。路易·拿破仑在“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的呐喊声中，以胜利者的姿态骑马绕行全城数个小时，之后才进入杜伊勒里宫，并以此为居所。往后路易·拿破仑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取得群众，才宣布帝国成立（又再度在公民投票中获得压倒性的多数）。经过尝试的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统治终告失败。独裁与专制主义（是好是坏都还未确定）便是对这场失败的回应。<sup>4</sup>

明显支持波拿巴主义的奥斯曼，于1849年1月又开始担负起省长职务，一开始是在瓦尔（Var），然后是在欧塞尔（Auxerre）。



当他受到邀请前往巴黎就任新职的时候，刚好是1851年12月1日的晚上，他正在爱丽舍宫（Elysée Palace）参加晚宴。路易·拿破仑跟他握手，告诉他他将要担任的新职，并且要求他在第二天一早去见内政部长，届时他会得到指令。当晚，奥斯曼发现现任部长并不知道路易·拿破仑要他向奥斯曼发布什么指令。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奥斯曼去见内政部长，却发现部长一职已经改由路易·拿破仑的同父异母弟莫尔尼公爵（Duke of Morny）担任。政变正在进行，而莫尔尼也正确地推断出奥斯曼站在他们这一边。奥斯曼起初被任命到邻近意大利的边陲地区（边界问题复杂，需要谨慎处理），之后则被指派到他喜爱的波尔多地区。而当权力已形同国王的总统路易·拿破仑巡视全国，为帝国的成立作准备的时候，最后一站选择的刚好是波尔多，路易·拿破仑在这里发表了重要演说（他宣布，“帝国就是和平”），时为1852年10月。奥斯曼在路易造访波尔多时适时表现出他营造盛大场面以宣扬帝国荣光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他对波拿巴主义的支持与旺盛精力）。1853年

FIGURE-005

这张由马维尔（Marville，摄于1850到1851年间）所拍摄的照片，显示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与皇宫周遭地区的拆除工程正在进行中。



6月，奥斯曼又被召回巴黎。奥斯曼在他的《回忆录》(Memoires)中讲了这么一段传说，在奥斯曼宣誓就职那天，皇帝交给他一张地图，上面以四种颜色（以颜色来表示计划的优先级）标示巴黎街道系统的重建计划。根据奥斯曼的说法，这就是他未来20年所忠实执行的计划（只做了些许的延伸）。

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个神话。<sup>5</sup>早在七月王朝时期就有许多关于巴黎现代化的讨论以及实际作法（由朗比托[Rambuteau]主持，他在1833到1848年间担任巴黎市长）。1840年代，进行了无数次计划与提案的讨论。路易·拿破仑在1848年当选总统后，就开始进行都市更新计划，并由贝尔热(Berger, 后来奥斯曼接替了他的工作)来担任这项任务。此时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已经开始拓宽，圣马丁街(Rue Saint Martin)也一样；在奥斯曼就职前一年，勒塞克(LeSecq)与马维尔(Marville)已经拍摄了不少1851到1852年的破坏照片，杜米埃也尖刻地批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这些都可以证明巴黎的更新计划早在奥斯曼之前就已经开始。<sup>6</sup>除此之外，皇帝于1853年8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西梅翁伯爵(Count Simeon)领导，负责对都市更新计划提供建议。奥斯曼宣称这个委员会很少开会，并且只提出一些临时性的报告，而报告当中尽是陈腐不实的建议。然而事实上这个委员会是定期开会，并且在1853年12月提了一份极为详尽的计划给皇帝。虽然这份计划对皇帝（皇帝其实经常征询奥斯曼的意见，但奥斯曼却说次数不多）的影响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奥斯曼故意对此事略过不提。除此之外，奥斯曼所进行的工作，既比皇帝所期望的多，又比皇帝所期望的少。皇帝指示他要注意既有可以显示出身份的都市结构，并且要避免直线道路。对于这两点，奥斯曼都予以忽视。皇帝对于自来水的输送或郊区的兼并缺乏兴趣，但奥斯曼却对这两点很有热忱——并且自作主张地进行这两项计划。一直到现在，有许多研究著作都是以奥斯曼的《回忆录》作为根据，然而这本书却充满了虚伪的陈述。

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否认仍透露出某种信息。奥斯曼的说法不只显示出他的自我中心与爱慕虚荣（他在这方面的倾向的确非常强烈），而且有一部分还显示出奥斯曼极力想对抗的事物。奥斯曼必须建立一个与周遭事物以及皇帝彻底决裂的神话——这个神

话一直维持至今——因为他想显示过去与现在毫无关联；他与路易·拿破仑无论如何都无需感谢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思考与作法。否认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建国神话（对任何新政权来说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有助于让人相信施行仁政的独裁帝国乃是唯一的选择。共和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于1830与1840年代所提出的方案及计划，都不切实际并且不值得考虑。唯有奥斯曼想出了可行的解决方式，而他的方案之所以可行，乃是因为他的作法是以帝国的权威为基础。从这个意义来看，1848年的骚乱的确造成了思想与行动上的决裂。然而，奥斯曼在给皇帝的信件中却承认（这些信件后来成了1866年出版的《巴黎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Paris*]序），“现代趋势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通过过去来解释现在与准备未来。<sup>7</sup>

如果奥斯曼所做的决裂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激进，那么我们就应该跟圣西门与马克思一样，坚持在旧外貌下寻找新面孔。然而，新面孔的出现（如圣西门与马克思所坚持的）不可否认还是具有革命意义。奥斯曼跟他的工作伙伴都愿意以前所未见的庞大规模来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从共和民主废墟中所形成的帝国授权他们放手去做。接下来，让我预先介绍我所认定的各项转变。

希托夫（Hittorff）曾经是七月王朝时代负责改造巴黎的其中

FIGURE-006

杜米埃早在1852年就已经注意到破坏期间的人口移置问题。有趣的是，他之后再也没为这个问题伤过脑筋。





一位主要建筑师。用来连接凯旋门（Arc de Triomphe）与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的新大道，争论了许久还无法定案，后来是由希托夫拟定计划。从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条大道可说相当宽广——120英尺。1853年，希托夫与奥斯曼见面，后者坚持大道两旁的建筑物要相隔440英尺，而大道本身则要有360英尺宽。<sup>8</sup>于是奥斯曼将计划的规模扩大到原来的三倍。他改变了思想与行动的空间规模。举另外一个具指导性的例子来说，巴黎的食品供应主要是通过巴黎中央果菜市场（Les Halles），但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效率与功能不彰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七月王朝时代就已经引起争论。前任市长贝尔热在当时担任总统的路易·拿破仑命令下，将重新设计巴黎中央果菜市场列为首要之务。图7所描绘的是旧市场（不久就被拆除），商人们都尽可能地将货物放在旧大楼突出的屋檐底下。路易·拿破仑下令停止兴建巴尔塔（Baltard）1852年的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市场堡垒”（the fortress of Les Halles）——因为他完全无法接受巴尔塔的设计形式（图8）。“我们想要一把钢铁制成的雨伞”，奥斯曼于1853年把这个想法告诉巴尔塔，巴尔塔这才知道问题在哪，最后他也真的交给奥斯曼这

FIGURE-007

普罗沃（Provost）的平版画描绘1850年代初期巴黎中央果市场的状况（它跟马维尔所拍摄的照片有相似之处；见De Thèzy, 1994, 页365）。新的巴黎中央果菜市场在右边，而旧的则在左边，商人们将货物堆放在旧大楼突出的屋檐之下。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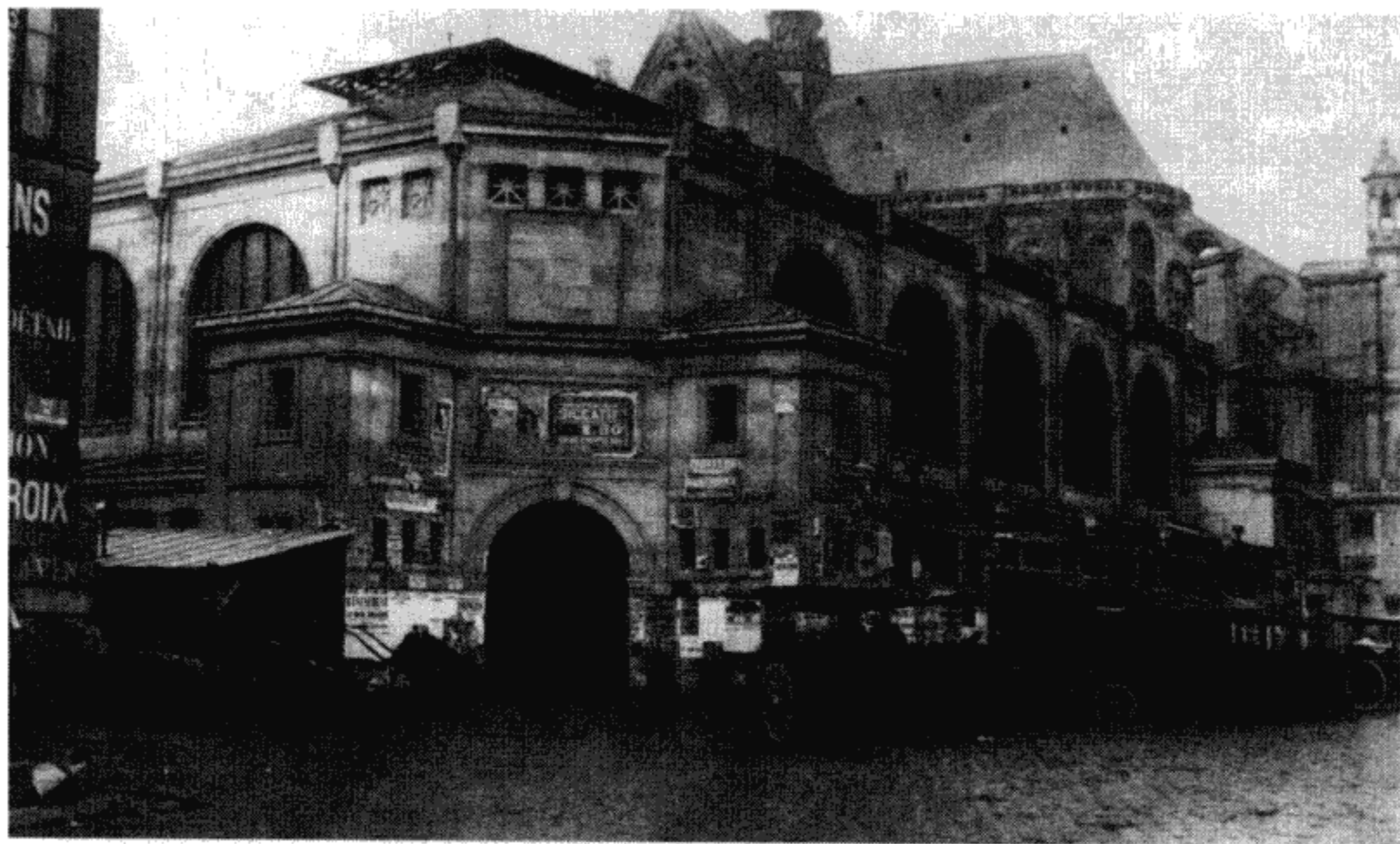


FIGURE-008

巴尔塔于1852年第一次设计的新巴黎中央果菜市场（又称堡垒[La Fortresse]），马维尔以照片记录下它的形貌。皇帝与奥斯曼都反对这个设计，并且随即予以拆除。



FIGURE-009

巴尔塔最后设计出“钢铁雨伞”（Umbrella of iron），奥斯曼觉得这栋1855年完成的巴黎中央果菜市场的古典现代建筑正合他意。



样一件成品，不过在此之前，奥斯曼还是将巴尔塔的几件混合设计打了回票（从此巴尔塔就与奥斯曼结下难解的仇恨）。这幢建筑后来被认定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见图9）。在《回忆录》中，奥斯曼说他挽救了巴尔塔的名声（当路易·拿破仑问道，一个曾在1852年做出可怕作品的建筑师，怎么可能在两年后造出这么杰出的作品时，奥斯曼厚颜无耻地回答：“因为市长换人了！”）。

后来为了举办1855年万国博览会（Universal Exposition）而又兴建了工业博物馆（Palais de l'Industrie，图10），这座博物馆的庞大空间远超过巴尔塔的作品。现在，将这些新空间与19世纪初期具有重要地位的拱廊街（图11）做比较。形式与材料都一样，但在规模上却有巨大的变化（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于巴黎的空间形式有着浓厚兴趣，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没有将这一类型的拱廊街登录在他的拱廊街计划[Arcades project]中）。建筑史家卢瓦耶（Loyer）曾经仔细重建了19世纪巴黎的建筑与建造方式，他明确说明了当时的工作原则：“资本主义对于建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他写道，“就是改变了计划的规模。”<sup>9</sup>

FIGURE-010

特里邦(Tribon)与利克斯(Lix)所绘制的工业博物馆，它的内部空间远比巴黎中央果菜市场来得宽敞，再次说明了新建材、新建筑形式以及新组织结构模式足以造成规模上的巨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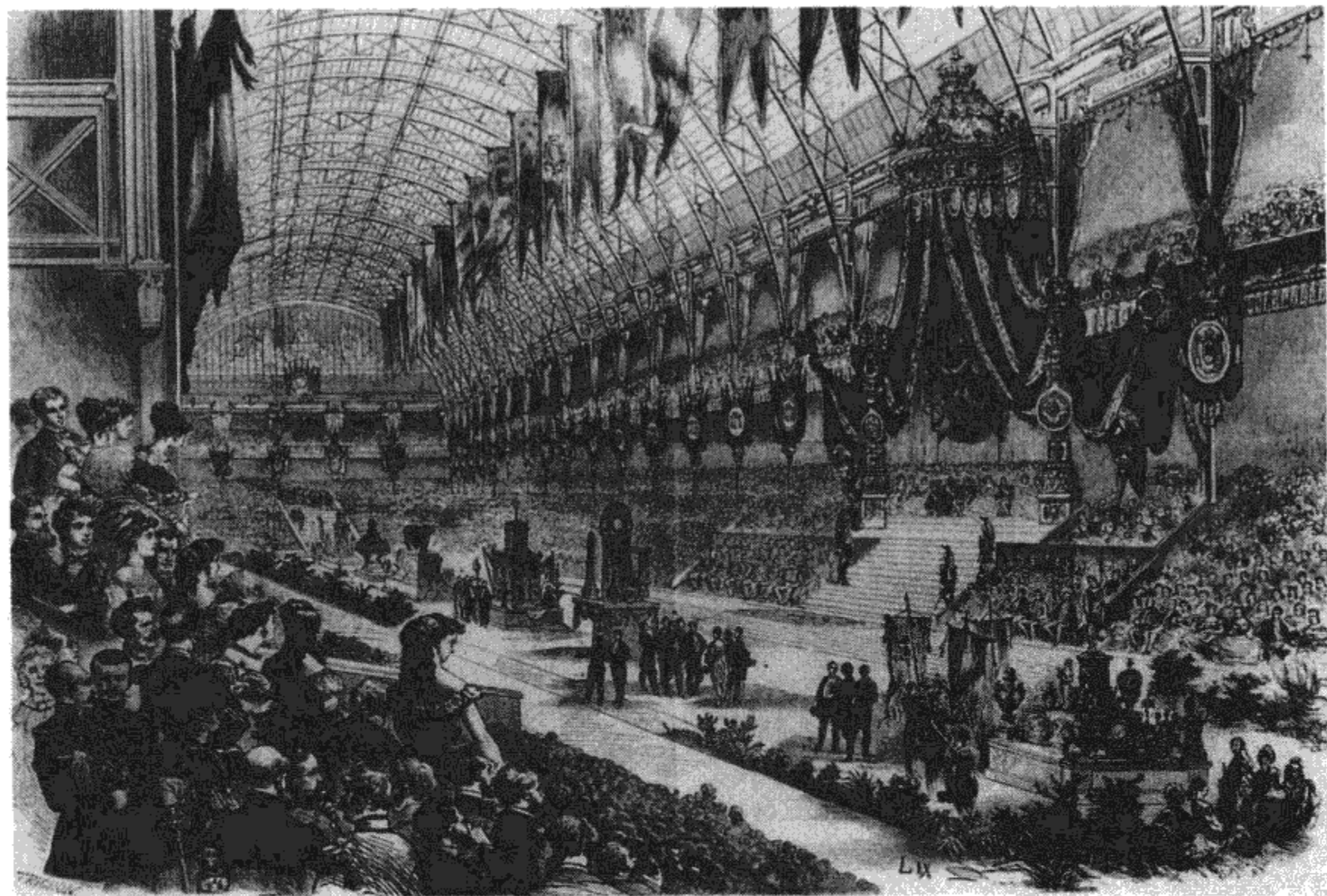






FIGURE-011

马维尔所拍摄的拱廊街照片——歌剧院街 (Passage de l'Opéra) ——显示出1820年代大量建造拱廊街的时期与1850年代建造巴黎中央菜市场与工业博物馆的时期之间,在规模(虽然形式并无不同)上的重大差异。

奥斯曼与过去全面决裂的神话固然值得我们质疑,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新科技的启发与新组织形式的推动下,他所协助建造的规模的确实有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使他能将巴黎(甚至包括巴黎的市郊)视为一个整体,而非七拼八凑的混乱计划。

在另一个与建筑完全不同的领域,福楼拜所完成的著作也显示出与过去的完全决裂。福楼拜在1848年之前是个悲惨的失败者。他为了如何写作以及该写什么而感到痛苦万分,甚至因此而在1840年代精神崩溃。虽然福楼拜努力改善自己的风格,并且不断探索哥特式(Gothic)以及浪漫主义主题,但却只能写出拙劣的文学作品。即便是福楼拜最好的朋友(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 Camp]及路易·布耶[Louis Bouilhet])也在1849年直接告诉他,他的

《圣安东尼的诱惑》(*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是个完全失败的作品。布耶于是劝告饱受打击的福楼拜去研究巴尔扎克,而根据斯蒂格马勒(Steegmuller)的说法,布耶还建议,“如果福楼拜能写一本关于资产阶级的小说(一个总能引起福楼拜兴趣的阶级,然而他却错误地相信这个主题不值得写),强调资产阶级的情感面而非物质面,并运用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来写作,他的作品将会开创出文学史的新猷。”两年后(在福楼拜到东方旅行之后),布耶建议福楼拜将地方省份某位医师娘的自杀悲剧当成写作题材,并且以巴尔扎克的风格来表现(描写地方省份的生活场景)。

福楼拜咽下自己的自尊(他早先还说,巴尔扎克根本不懂如何写作),于1851到1856间努力进行写作。《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出版的时候(现在仍是)被人公开赞誉为第二帝国文化中最重大的文学事件与文学杰作。<sup>10</sup>《包法利夫人》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法语世界第一本现代主义小说。然而无论如何,只有在1848年斩除了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之后,福楼拜才得以走出自己的路。从福楼拜的观点来看,埃玛·包法利(Emma Bovary,她是

14

无聊而且陈腐的浪漫主义幻觉下的受害者)的自杀,就跟1848年革命浪漫主义分子在街垒中自杀没什么两样(他后来在《情感教育》中将这些人描绘成盲目无知)。福楼拜在写到拉马丁时说,“人民拥有的诗人已经够多了”,而“诗人什么事也做不了”。福楼拜贬低巴尔扎克对他的影响(这一点很像奥斯曼否认自己受前人的影响),但他也清楚知道当中的两难。他写道:“要完成一件能传之久远的作品,就必须有坚实的基础。思考未来让我们痛苦,而过去则一直从后方拉着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总从我们的指间流逝。”<sup>11</sup>

现代性的使徒波德莱尔,每天都生活在这种两难之中,他往前疾行的同时却又东倒西颠,1848年时,他先是支持街垒,随即又倒向另外一方。<sup>12</sup>他早在1846年的沙龙中就已经发出反传统的声音,催促艺术家去探索“现代生活的史诗性格”,因为他们的时代“富于诗意与美好的题材”,例如“上流生活的场景以及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人、罪犯以及娼妓游荡在巴黎的地下社会之中”。“奇见妙闻就像空气一样包围了我们也渗透了我们;但我们却毫无感受。”他写道。他将作品献给资产阶级,要唤起他们的英雄主义:“你们开始合伙,组成公司,放贷,为的是以各种形式来实现未来的理念。”不过讽刺的是,波德莱尔另一方面却又诉诸圣西门的乌托邦主义,试图利用诗人的空想与商人的机巧来达成解放人类的目的。波德莱尔卷入了自己与传统以及与“思想贵族”的斗争之中,并且在偶然间也受到巴尔扎克的启发,他提议,应该将资产阶级当中想要推翻传统阶级权力的人结合起来,组成同盟。他希望双方能相互滋养,直到“最高的和谐降临到我们身上”为止。<sup>13</sup>

然而,这样的同盟永远不可能实现。毕竟,艺术家将“流离失所的生活”描绘成英雄主义,这种作法怎么可能不对资产阶级构成冒犯?波德莱尔的余生因此就被撕裂成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一个摆脱世俗常轨而愤世嫉俗的偷窥者;另一方面,他却又是个热烈追寻自己目标的人。1846年,这种紧张还隐而不显,但1848年却改变了一切,他在2月与6月,也许还有5月,参加了叛军的阵营。他被资产阶级秩序党(Party of Order)的反叛行为所惊吓,但对于浪漫主义的空言幻语(代表人物是诗人拉马丁)也同样感到沮丧。在幻灭之下,波德莱尔转向

社会主义者皮埃尔·蒲鲁东 (Pierre Proudhon)，并一度将他视为英雄，之后又与古斯塔夫·库尔贝 (Gustave Courbet) 联系，他同时受到这两个人的现实主义的吸引。他在回顾的时候写道：“1848年之所以吸引人，只因为它充满了过度的荒诞。”不过，将“过度”召唤出来是有意义的。波德莱尔记录了自己的“狂野兴奋”以及“对毁灭所产生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愉悦感”，尽管如此，他厌恶最后的结果——即便他重回当时看起来似乎是比较有利的传统保护力量中。在革命浪潮的高峰时期，波德莱尔协助编辑反动报纸，他日后写道，“没有贵族，就不可能产生理性而有担当的政府形式”（这完全是一种巴尔扎克式的情怀）。在路易·拿破仑政变之后，他只稍微表示愤怒，便随即不再过问政治，并且转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与愤世主义者，他只承认自己曾在革命脉搏开始跳动的时候沉迷于政治之中，“革命以及对理性的崇拜，巩固了牺牲的教条。”他写道。<sup>14</sup>然而他后来居然表现出对路易·拿破仑的崇敬之意，认为他是个兼具战士与诗人气质的国王。

1848年，街垒以及杜伊勒里宫的劫掠，构成苦乐参半的创造性毁灭，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感受也产生了矛盾。为了抓住现在并创造将来，传统必须被推翻，如果有必要，运用暴力也在所不惜。但传统的丧失却又会破坏我们理解的基础，并且使我们茫然无力。他在1860年时写道，艺术家的目标因此必须要将现代理解成“短暂的、无常的、偶然的”，与其他处理“永恒与确然不移的”艺术相对立。波德莱尔说，福楼拜在文字中显现出进退两难的心情，他忧心“在事情进展得不够快速之下，恐怕还未能萃取并获得成果，幽灵就已逃脱无踪”。<sup>15</sup>然而匆促行事所带来的却是大量死亡。“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生命”不应被忽视。

在《巴黎的忧郁》(*Paris Spleen*)中，波德莱尔以优美的文辞写下《老小丑》(*The Old Clown*)的故事。他将巴黎描绘成大型剧院。“每个地方都充满了欢乐、金钱与放浪；每个地方都保证明天一定有面包可吃；每个地方都爆发出汹涌的生命力。”第二帝国的“帝国纪念日”(fête impériale)正在热烈庆祝。但在“混乱、嘈杂、欢乐、喧嚣”当中，波德莱尔看到了“一个可怜的老小丑，弯腰驼背而衰弱，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在“喜剧扮相下”，“更加深了”他的悲剧的绝对性。这个小丑“沉默不语且静止不动。他

已经放弃了。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图12）。波德莱尔感觉到“有一只歇斯底里的可怕之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让叛逆的泪水不会流下”，模糊他的视线。他想要丢钱给小丑，但群众推着他往前走。回头一看，他对自己说：“我刚才所看到的是一个老作家的原型，他在他那个世代曾经如此显赫，然而他已经活过了他那个世代，这个老诗人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他因为贫穷以及大众的遗忘而日渐堕落，而他的小屋也不再被这多变的世界所眷顾。”<sup>16</sup>

对马克思来说，1848年同样标志着一个思想与政治上的分水岭。他此时正流亡伦敦（虽然在3月时他的确到过巴黎），1848到1851年间在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宛如救世主的显现。没有这个事件，他不可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与过去的完全决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的“青年”马克思与《资本论》（*Capital*）的“成熟”马克思之间一览无遗，然而这种决裂并不比奥斯曼或福楼拜的转变来得激进，虽然如此，它还是具有重要性。马克思早年受到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影响，但却在1848年毫不留情地批评两者。他写道，虽然乌托邦主义曾一度为工人阶级意识开启了新愿景，但它现在已跟这个目标毫无关联，相反，它还成为革命的障碍。1840年代的法国，各种观念混杂发酵着（这是第二章的主题，详见后述），在这种状况下，马克思会将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浓缩成严谨而艰难的、集大成式的社会主义科学是可理解的。然而，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若主张要与过去完全决裂，就是犯了严重错误，这种说法等于把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一笔勾销，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或没有任何关联。马克思撷取各家观念，如圣西门、路易·布朗基（Louis Blanqui）、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艾蒂安·卡贝（Etienne Cabet），即便他反对他人的想法，他还是将他们的思想信手拈来，借由批判与反对来形塑概念。他在《资本论》

FIGURE-012

杜米埃动人的“小丑”（The Clown），捕捉到了波德莱尔散文诗中的某种情感。群众四散而去，唯独一个男孩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而他则凝视着远方，宛如一些现在已被遗忘的高贵人物。





中所呈现的劳动过程，是在回应傅立叶（Fourier）的观念时所形成的，傅立叶认为，未异化的劳动，其定义就是热情的吸引与游戏的愉悦。对于他的说法，马克思的响应是，为了完成重要计划，全心投入与毅力是免不了的，而劳动过程不管再怎么高贵，都无法完全脱离辛苦工作与集体纪律的艰难。无论如何，马克思总是认定要改变社会秩序，必须既有的事物状态已经出现新的形貌，才能成功，就这一点来说，他采用圣西门的看法。

如果我们将这个原则严格套用在1848年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事件上，我们将会对福楼拜、波德莱尔以及奥斯曼，乃至马克思本人有更特别的看法。奥斯曼、马克思、福楼拜以及波德莱尔全都是在1848年之后才锋芒毕露的，这对现代性与过去完全决裂的神话来说是一项支持，不过另一方面也显示这些人在1848年之前的经验对他们随后在各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思想与实践上的转变也有着极大的关联。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说明的核心紧张：1848年之后，这个剧烈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受到1848年之前思想与实践的影响？马克思跟福楼拜及波德莱尔一样，都深受巴尔扎克影响。保罗·拉法尔格（Paul Lafargue）是马克思的女婿，他提到马克思对巴尔扎克“赞誉有加，他甚至计划在完成经济学研究之后，要写一篇《人间喜剧》（*La Comedie Humaine*）批评”。<sup>17</sup> 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的作品整体来说已经预示了未来社会秩序的演变。巴尔扎克不可思议地“预期”到一种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在1830与1840年代还处于难以察觉的“胚胎期”。巴尔扎克为现代性的神话揭开面纱，让我们察觉到现代性其实是从复辟时期（Restoration）就开始发展，因此所谓1848年后的激进断裂，其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连续性。即便是在文学生产领域，福楼拜和波德莱尔也在隐约中仰赖巴尔扎克所构筑的视野，从这一点便可看出当中的连续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作品更是明确地表现出这种连续性。如果说革命运动利用的是既有秩序中潜在的紧张，那么巴尔扎克所描写的1830与1840年代的巴黎就表现了这种本质。第二帝国的转变便是从这些可能中脱胎而出。我将以这种观点，于第一章检视巴尔扎克对巴黎的描述。我在书中大量引用了杜米埃的艺术作品，他的作品也具有同样的预示性质。杜米埃经常被拿来与巴尔扎克作比较，他不断地评论巴

黎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因此形成庞大的数据来源。波德莱尔曾抱怨那些观赏杜米埃作品的人只会看着画中的戏谑之处而不懂得思考艺术。之后，艺术史家将杜米埃从讽刺画家之林拯救出来，并且将焦点集中在他较好的艺术品，不过由于他非常多产，因此人们认为他的作品素质参差不齐。

这里我比较关心的是杜米埃所选择的主题以及他（还有其他人，如加瓦尔尼[Gavarni]与卡姆[Cham]）与看画者分享的戏谑本质。杜米埃经常做的，是在事物还在萌芽阶段时，就能看到变化的过程，并且将过程以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早在1844年时，他就挖苦新服饰店的组织方式，并预示了1850与1860年代的百货公司经验。他对于清除与破坏的评论（帕斯龙[Passeron]认为这是一种劣质艺术）大部分发表于1852年，也早于大规模破坏之前。他有一种奇妙的能力，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看出城市的样貌以及城市将如何演变。<sup>18</sup>

18 在剧烈变化的过程中，不管是观察城市还是描述城市，都是可怕的挑战。小说家如巴尔扎克，以及艺术家如杜米埃，都是这方面的先驱，他们表现的方式很有趣，但却间接。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虽然有许多研究与论文以个别的城市为主题，但当中鲜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更不用说能对人类状况的理解有所启发。当然也有例外。我总是拿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作为一个理想范本，虽然这本书是不可能仿效的。<sup>19</sup>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想要通过城市中的物质生活、文化活动、思维模式等多样的视野来传达城市的整体感。最有趣的都市写作通常要兼具片断与通盘。难就难在要同时看到整体与部分，而在这一点上，《世纪末的维也纳》发挥了它特殊的魔力。这种困难充斥在都市研究与都市理论当中。我们有丰富的理论来处理城市“当中”所发生的事，唯独缺乏的是城市“本身”的理论；至于现有的城市理论，通常看起来面向太单一也太僵硬，完全无法表现出都市经验的丰富与多样。我们不可能用单一向度就能轻易探究城市与都市经验。

这种以片断来研究整体的作法，最杰出的例子莫过于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所做的巴黎研究。<sup>20</sup>这种研究方式近年来成了许多人关注及感兴趣的焦点，1999年，拱廊街研究的英文译本



终于定稿问世，更为此带起了热潮。我的目标当然不同于本雅明。我将尽可能重建第二帝国巴黎的形成过程，以及资本与现代性如何在特定的地点与时间结合在一起，还有社会关系与政治想象又是如何通过这样的结合而被启动。我希望，研究本雅明的学者也能在这本练习之作中得到帮助。不可否认，我运用了许多本雅明的洞见，而对于如何理解他的著作（甚至是批判，这一点已在检视空间形式的规模时提过），我也有一些粗浅的看法。对我来说，他的拱廊街计划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从各种二手数据中汲取大量信息并予以组合，然后再将这些组件（他称之为历史的“风化土砾”）一一摊开展现，仿佛它们原本就属于某个巨型万花筒，而从这个万花筒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如何形成以及巴黎如何成为孕育现代（不管在技术上还是感性上）的中心地。本雅明显然正在构思某种大概念，虽然如此，他的研究并没有完成（也许是无法完成），因此不容易看清他的理论形貌（如果有的话）。不过跟休斯克一样，本雅明确实不断地返归某些主题，持续地将整体结合在一起，让整体性的视野成为可能。拱廊街（一种空间形式）成了反复出现的动机。本雅明也坚持（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也是如此，例如亨利·勒费比尔[Henri Lefebvre]），我们不只是活在物质世界里，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梦、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表述也以强有力的方式协调着物质性；因此，他对于景物、表述以及如梦境般变幻不定的景象有着浓厚的兴趣。

对于本雅明的读者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巴黎的片断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两者就是无法搭配，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管它；强加特定的主题（不管是本雅明的拱廊街，还是我对于资本流通与累积以及阶级关系无所不在的关注）在经验上面等于是粗暴地对待事实，将会遭受顽强的抵抗。然而我无法满足于这种作法，与这种作法相比，我毋宁更为信任过程与事物之间的固有关系。我也相信我们有能力表述并传达片断与整体之间的联结与关系的内容。但我也要承认，如同任何理论家都必须承认的，抽象化不可避免会带来暴力，而将复杂的关系诠释成简单的因果链也总会带来危险，甚至可能会形成某种机械的决定论。诉诸历史—地理研究的辩证与关系模式，应该有助于避开这种陷阱。

一种作品（对休斯克与本雅明还有我都是一样）必须极度仰

赖其他人所作的档案研究。巴黎档案已经被研究得相当彻底，二手资料也多如牛毛（从一长串的书目可以看出），因此，要将这些以不同视野写成的无数研究汇集成一个动态成果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仰赖二手资料（许多来自完全不同的概念架构，理论也与我运用的不同）在某些方面会造成局限，并且总是会产生可靠性与可信度的问题，更不用说它们彼此是否兼容。我在阅读这些数据时，经常要留心当中的理论架构。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视野，巴黎档案研究的制作都相当谨慎（例如加亚尔[Gaillard]的杰出研究就是我极为仰赖的<sup>21</sup>），而我也努力维持这些重大发现的完整性。

这种作法也与许多当代学术实务相左，当代学术倾向于将事实建构成论述形式，目的是为了将前者理解成可受批判与解构的文化建构物。

这样的研究方式非常重要。而从这种研究观点来看，数据的“完整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高度可疑的，因为完整性与真实都是论述所产生的效果。例如，1847到1848年巴黎工业的统计研究充满了保守派的政治经济假定，它将在家承包的工人归类为“小生意人”，加强了家庭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的重要性。我们若能了解统计数字背后的预设立场，会有很大的帮助。<sup>22</sup>至于手工业者苦于缺乏技术、堕落与失去工作尊严，因而成了阶级斗争的要角，朗西埃（Rancière）对于这个“神话”所提出的挑战，也值得严肃看待。<sup>23</sup>

不过一本综合性的作品，如我在此所尝试的，无论如何都得建构出自己的一套工作规则。它不能只满足于不断解构他人的论述加工，还必须进一步将社会过程具体化，甚至于在形塑社会生活与历史地理研究时承认论述与知觉的力量与重要性。对此，历史地理唯物论的方法论，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发展它（明显的成果是于1985年出版了最早的巴黎研究）并且相信它是一件有用的工具，能用来理解特定时空下都市变迁的动力。<sup>24</sup>另一方面，巴黎档案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形成了优秀而严谨的学术传统，我深切受惠于这种研究态度，并且也从中看到许多在历史累积下形成的各种观点。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中的完善设施（奥斯曼建立的机构）以及视觉数据收藏品（包括马维尔的照片，在奥斯曼的监督下接受委托，将

创造性破坏的事物记录下来),现在都集中到巴黎市立博物馆照片档案室(Photothèque des Musees de la Ville de Paris)中,这让本书的准备工作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第二部分的巴黎研究是《意识与都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于1985年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及巴兹尔·布莱克韦尔[Basil Blackwell]共同出版)中论文的修改与扩充版本。最末一篇《圣心堂的建造》(*The Building of the Basilica of Sacré Coeur*),也是从《意识与都市经验》的文章中略作修改而成,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79年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巴尔扎克研究是过去论文的修正与扩充版本,曾分别发表于《世界地理学》(*Cosmopolitan Geographies*),由维奈·达沃克(Vinay Dharwadker)编辑(2001年由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以及《城市残像》(*Afterimages of the City*),由琼·拉蒙·雷西纳(Joan Ramon Resina)编辑(于2002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第二章以及这篇导论则是全新的文章。



第一部分

表述：巴黎 1830—1848





# 现代性的神话：巴尔扎克的巴黎

巴尔扎克通过精准的地形学轮廓，取得了世界的神话结构。巴黎是巴尔扎克的神话学繁殖地——巴黎及其二或三位大银行家（纽沁根[Nucingen]、杜提耶[du Tillet]）、巴黎及其伟大医生欧拉斯·毕安训（Horace Bianchon）、巴黎及其大企业主赛查·皮罗托（César Birotteau）、巴黎及其四或五个轻佻的女人、巴黎及其放高利贷者戈布赛克（Gobseck）、巴黎及其各色各样的拥护者与士兵。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不断地发现这一点——通过相同的街道与街角、相同的斗室与壁龛，这世界的人物走了出来。个中意义无它，即地形学乃是传统神话空间的平面图，能彰显空间，就必能开启空间。

23

——瓦尔特·本雅明

巴尔扎克在《老姑娘》（*The Old Maid*）中表示，现代神话跟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相比，比较不为人所理解，但却更有力量。现代神话的力量源自它们的想象方式，现代神话产生于日常经验中，是无法争论也无法讨论的现实，它们不是起源的奇迹以及人类热情与欲望的传说冲突。巴尔扎克的观念，认为现代性必定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波德莱尔后来在自己的批评文章《1846年的沙龙》（*The Salon of 1846*）中也同意这一点。波德莱尔试图辨识现代所构成的“新热情形式”以及“美的特定种类”，并且批评当时



的视觉艺术家未能“睁开双眼看到并且认识到围绕在他们四周的英雄主义”。“我们的城市生命充满着诗意与奇妙主题。我们被环抱、浸润着，仿佛处在一种不可思议的气氛之中；尽管我们没有注意到”。祈求新的元素，“现代美”，波德莱尔在他的文章下了如此结论：“伊利亚特的英雄们跟你们相比——伏脱冷（Vautrin）、拉斯蒂涅（Rastignac）与皮罗托（他们全都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角色），不过是侏儒。”“而你，欧诺瑞·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所有从你的子宫里出生的角色当中，你是最英雄、最杰出、最浪漫，也是最诗意的。”<sup>1</sup>

24

巴尔扎克以散文来描绘，但我们无法指控他没有看见周遭日常生活的丰富与诗意。他问道，“置身于这座永不止息的万城之后的心脏地带，难道你还会吝惜时间，不注视那些足以引起你注意的戏剧、灾祸、绘画以及有趣的偶发事件？”“看看你的四周”，“人类蜂窝以黑色细流区隔，并且依照各自移动、翻搅及酝酿的观念来分野。”<sup>2</sup>在波德莱尔发表他对视觉艺术的宣言之前（并且在本

FIGURE-013

杜米埃所描绘的新里沃利街（1852），捕捉了一些巴尔扎克对巴黎的预想式描写，里沃利街遭受“建筑狂”（看看背景有个人拿着鹤嘴锄）的围攻，看起来就像条“湍急的溪流”，是“一个庞大不可思议之物，是一种结合了行进、机器以及观念的令人惊异之物”，“事件与人群在当中跌成一团”，“即便是过个马路都令人倍感威胁”。

雅明企图在他未完成的巴黎拱廊街计划中，解开现代性的神话之前一个世纪)，巴尔扎克就已经将现代性的神话置于显微镜下，并且利用漫游者来做这件事。而巴黎，被资产阶级力量塑造成资本之城的首都，就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

19世纪初，巴黎表面上看来混乱的快速成长，使得城市生活变得难以辨识、解码与表述。当时几位小说家努力说服自己接受巴黎的种种变化。他们的实际做法也成了被仔细考察的对象。<sup>3</sup>他们记录许多在他们身旁流动的物质世界以及社会过程。他们探索各种表述世界的方式，并且协助形成关于城市是什么以及城市可能成为什么的独特想象。借由召唤出与社会形式、制度及习惯相关联的人类欲望表现，他们偶尔会以道德教化或间接的方式，来思考其他选择或可能（如欧仁·休[Eugène Sue]在他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中所做的一样）。他们解码巴黎，使其能为人所阅读，并且提供各种方式来捕捉、表述与塑造表面上看起来才刚开始发展而且经常处于断裂的都市变迁过程。

巴尔扎克是怎么做的，这实在令人感兴趣，因为他的写作绝大部分都是以巴黎为中心——人们几乎可以说，巴黎是他的核心角色。但《人间喜剧》(*The Human Comedy*)是一部卷帙浩繁、芜杂、不完整而且外表零散的作品集，里面搜罗了约90部小说与短篇故事，全都在20多年间写成，从1828年开始，到1850年巴尔扎克51岁去世（归咎于喝了太多咖啡）为止。要从这个丰富得令人难以相信且经常令人混淆的作品集中，挖掘出现代性以及巴黎的神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33年，巴尔扎克有将他的各篇小说结集成“人间喜剧”的想法，而到了1842年，他拟了一个计划，决定将作品集区分成几个场景，私人的、外省的、巴黎的、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农村的生活，另外则再补充一系列哲学与分析的研究文章。<sup>4</sup>不过巴黎几乎出现在每个地方（有时候只是一块投射在农村景色上的阴影）。所以，根本没有选择可言，巴尔扎克不管到了哪里都只是在追寻巴黎的踪迹。

身为都市主义者（而非文学批评者），通读“人间喜剧”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当特别的经验。“人间喜剧”透露各种与城市相关的事物，如果没有“人间喜剧”，城市的历史地理可能因此就被埋没。巴尔扎克那种能预见未来的洞察力以及表述能力，势必要比当时

的文人雅士更能在读者的情感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创造了一股公共舆论的气候，使人能更清楚地了解（甚至是接受，不管是在无意之间还是勉强接受）现代都市生活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则为第二帝国巴黎的系统性转变塑造出想象的前提。我将说明，巴尔扎克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细致地解开并表述了随时随地充满于资产阶级社会子宫中的社会力量。巴尔扎克去除了巴黎的神秘面纱，同时也去除了覆盖在巴黎之上的现代性神话，因此而开启了新视野，这些新视野不只表现在巴黎是什么，也表现在巴黎能成为什么。重要的是，巴尔扎克揭露自己在表述时的心理基础，同时也将阴暗而难以透视的欲望表现（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欲望表现）显示出来——这种欲望表现湮没在巴黎档案馆毫无生气的文献之中。通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巴黎的辩证过程与现代巴黎如何构成便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

## 巴尔扎克的乌托邦主义

---

“社会要有良好的规制，唯一牢固的基础，”巴尔扎克写道，在于权力必须由贵族来运作，而贵族的地位又由私人财产来加以确保，“不管是以地产的形式还是资本的形式。”<sup>5</sup>地产与资本之间有着重大区别。它显示出土地财富与金钱力量之间有时存在着致命的冲突。巴尔扎克的乌托邦主义则完全诉诸前者。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所谓的巴尔扎克纷扰世界中的“平静之点”（the still point），指的是“对土地财富抱着一种和善而温暖的幻想，以为土地财富就是乌托邦理想具体实现的样貌”。这里存在着“从巴黎与大都会商业斗争的竞争动力中所解放出来的平和状态，不过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停滞未发展的状况，在当中，其实也可以想象出同样的平和与宁静”。<sup>6</sup>

巴尔扎克从最早期的小说（如《舒昂党人》[*The Chouans*]）开始，就经常以安详的乡村景象为题材。《农民》（*The Peasantry*），他最后的小说之一，以一封巴黎保皇派记者所写的长信起头，描述了乡村地产与环境的恬静景象，与“巴黎无止境而令人战栗的戏剧光景及悲惨的生存斗争”形成对比。理想化架构出小说中的行动，并且提供特别的看法，社会结构因此能从中得到观察与诠

释。在《驴皮记》(*The Wild Ass's Skin*)中,乌托邦的主题登上了舞台中央。拉斐尔·德·瓦伦坦(Raphael de Valentin)寻找安逸,好延长他饱受威胁的生命,他“觉得自己有一股本能的需要想接近自然,想让自己的起居简单,想过着我们很容易就沉醉其中的乡间闲散生活”。他需要恢复精力与元气,唯有接近自然才能得到这股力量。他发现了“一个地点,在这里,自然就像嬉戏中的小孩一样无忧无虑,而且似乎乐于隐藏宝物”,至于周围映入眼帘的则是:

一栋素净的花岗石住宅,外缘覆盖上木材。这栋农舍的稻草屋顶,与当地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图案,苔藓与开花藤蔓也让农舍看起来充满着思古幽情。一缕轻烟,稀薄得连鸟儿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从倾颓的烟囱中蜿蜒上升。在门的前方是一大张长板凳,刚好介于两丛巨大的金银花之间,上面开满了红色的、散发着甜美香气的花朵。农舍的外墙几乎已被藤蔓以及任意生长的玫瑰和茉莉花丛所掩盖。农人并不在意这田园之美,也不照顾花草,而是让自然交给了精灵与无瑕的天恩。

居民也同样具有农村气息:

狗的吠叫声让站在那里张口惊视的健壮孩子开朗起来,然后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白发老头。这两个人与他们周遭的环境、气氛、花朵与农舍正好搭配在一起。健康充满于繁茂的自然之中,让童年与老年拥有各自的美。事实上,在每个生命形式中,早期阶段都具有知足而无忧无虑的习性,这种习性嘲弄了现代哲学学究式的说法,也有助于治疗热情澎湃的心。<sup>7</sup>

27

这种乌托邦观点成了判断所有事物的标准。例如在《驴皮记》某个狂欢场景的末尾,巴尔扎克评论说,在场的女孩早已沉沦于邪恶之中,然而,当她们清醒时,还是会想起过去那段已逝的岁月,与家人一起在乡村田园里度过纯洁与天真的时光。这种田园乌托邦主义甚至在都市里也有能与它搭配的对象。在巴黎过着一文不名的日子,拉斐尔早先曾亲眼目睹一对母女贫困但高贵的生





FIGURE-014

杜米埃经常嘲弄资产阶级的田园乌托邦主义。男人自豪地指着，从这里看过去，他的乡村房子是多么美丽，又说，明年他计划要让这栋房子漆成苹果绿。

活，她们“持续不断地劳动，愉快地忍受，并且见证了由高尚情操所激发出来的虔诚顺从。在这对母女与她们周遭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和谐”。<sup>8</sup>然而，只有在《乡村医生》(*The Country Doctor*)里，巴尔扎克才打算主动构思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选择。它让书中的医生——一位热忱奉献、具有同情心以及改革想法的中产阶级——放弃自己并做出最大的努力，让长期处于无知而贫困的农村产生必要的改变。医生希望通过共同体的努力合作，同时强调私有财产的快乐，在土地上组织出和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巴尔扎克隐约暗示，面对农民的唯一是图与个人主义，这样的计划是脆弱的。在《人间喜剧》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种乌托邦动机的回声，社会关系可以从这个立场来了解。

巴尔扎克大体上希望由贵族来领导。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很清楚：“想领导国家的人，必须要有领导国家的本事；他们必须要有领导的心智与灵魂，以控制他们的双手。”但“现代贵族”必须在



此刻出现，他们必须了解“艺术、科学与财富构成了社会三角形，三角形中被刻上了权力的盾徽”。统治者必须“有充足的知识来明智地下判断并且必须知晓臣民的需要以及国家的状况，它的市场与贸易，它的领土与财产”。臣民必须“有教养、顺从”，并且“有责任”参与“统治技艺”。“行动的手段，”他写道，“在于实力而非历史记忆。”他赞美英国的贵族（我们将发现，圣西门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识到改变的需要。统治者必须了解，“制度都有它转变的时候，此时，词语的意义改变，观念披上新的外衣，政治生活的条件取得了全新的形式，但却不影响基本的物质”。<sup>9</sup>然而，最后那句“不影响基本的物质”，引领我们回到了巴尔扎克田园乌托邦主义的静止点。

现代贵族需要以金钱的力量来遂行统治。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除了资本家（虽然是土地形式）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什么样的阶级形态可以支持这种乌托邦幻境？巴尔扎克清楚地认识到，阶级区分与阶级冲突不可能被废除：“贵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着社会的思想，正如中产与工人阶级代表了社会有机而活动的一面一样。”和谐必须从阶级力量之间“明显的对抗”中建构出来，如此，“运动的多样性所产生的不兼容……才能转而为共同的目标工作”。此外，这些说法具有浓厚的圣西门乌托邦学说的色彩（只不过圣西门指望由实业家而非贵族来领导）。因此，问题不在于存在着社会差异与阶级区分。对于那些对城市“面貌作出贡献的各种类型”来说，要与“整体的性格达成极佳的和谐”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和谐是秩序的诗歌而所有的人都迫切需要秩序。既然如此，所有事物彼此之间进行合作——简单地说就是团结一致——难道不是表现秩序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吗？”他认为，即便是工人阶级也被“拉向秩序与勤勉的生活方式”。<sup>10</sup>

从差异中所创造出来的阶级和谐理想，很遗憾地，被多种过程所破坏。工人“被社会用力推回泥淖之中”。巴黎人成了新时代虚假幻影的受害者，其中最大的骗局就是平等。有钱人“在他们的品位以及个人财产的联结上要比30年前来得更为独占”。贵族需要金钱才能生活并且确保他们的新社会等级；然而，对于金钱力量的追求却也败坏了他们的潜力。富人最后屈从于“狂热的自我表现欲中”。<sup>11</sup>对金钱、性以及权力的追求，成了一场精巧、可

笑以及毁灭的游戏。投机与无意义的逐利与享乐破坏了社会等级。腐败的贵族无法担负起这项历史任务，至于巴尔扎克轻蔑的核心焦点——资产阶级，也无法提出文明的选择。

这些失败都是与巴尔扎克的乌托邦相比所做出的判断。田园主义提供了情感的内容以及进步的贵族来确保阶级的基础。虽然阶级的视野大不相同，但马克思仍然大为赞赏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资产社会的分析所显露出来的先见、敏锐与洞察，并且从研究“人间喜剧”中产生许多灵感。<sup>12</sup>我们也要赞美“人间喜剧”这部作品，因为它明确去除了现代性与巴黎的神话，同时也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认识自我时所带有的拜物教性质。

---

## 巴黎及其外省：城市中的乡村

---

巴尔扎克的乌托邦主义带有一股特别的地产、外省乃至田园的气息，实际上，乡村与外省的社会关系对比并不会如此鲜明。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无数角色（巴尔扎克自己也是）要艰苦地从外省的生活方式转变成首都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如《高老头》（*Old Goriot*）中的拉斯蒂涅，成功地与转变取得妥协，相反，《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的僧侣则被城市的繁忙所惊吓，他将自己锁在房间里，直到能返回都尔为止，并且发誓绝不再踏进巴黎一步。在《幻灭》（*Lost Illusions*）与《交际花盛衰记》（*The Harlot High and Low*）中，吕西安（Lucien）无法完全达到要求，最后便自杀了。还有其他人，如贝姨（*Cousin Bette*），他们怀着农民的诡计，费尽心思破坏他们密切接触的首都社会环节。由于外省与首都的界线充满了间隙，因此外省与首都之间也充满了深刻的对立。巴黎将其阴影投射到各地，然而只要走得越远，强度也就随之减弱。布列塔尼（Brittany）在《舒昂党人》中被描绘成遥远的边境殖民地，至于勃艮地（Burgundy）与安古兰（Angoulême）则远到足以发展出自主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法律是以当地的方式来理解，并且以当地的方式来执行，每件事物所仰赖的是地方性而非全国性的权力关系。

外省阶级关系的特有模式出色地展现在《农民》之中。巴尔扎克在这里“明显描绘出许多作家所忽略的阶级主要类型”，并且

提到“那些我们称之为‘弱者’的人，不断地阴谋对抗那些想象自己是‘强者’的人——即农民反对富人的现象”。弱者拥有许多武器（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最近主张的），这一点被清楚地揭露了。巴尔扎克描绘“这位正在工作丝毫不感到疲倦的工兵，一点一滴地将土地啃咬成碎块，将田野切割成100个小块，依次地切割，资产阶级召唤他到宴席之中，一方面觉得他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盟友”。在“牧歌式的乡村生活”的背后，存在着“丑陋的意义”。农民的规约并非资产阶级的规约，巴尔扎克写道：“野蛮人”（不只一次拿来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所描绘的北美印第安人相比）“与他的近亲，农民，从来不使用清晰的言语，只会对他们的敌人设陷阱”。<sup>13</sup>

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猛烈地结合在一起，但行动中真正的首脑却是地方律师、商人、医生以及其他专心而不顾危险地借由放高利贷、垄断控制、法律诈骗以及编织复杂的互依与策略联盟网（借由机会主义的婚姻来固结）积聚资本的人所构成的杂牌军。这个团体在地方的力量大到足以反抗并颠覆巴黎的中央权威，包围贵族力量，并且为自己的利益而协同合作。农民不可避免地被拉进地方资产阶级利益对抗贵族的同盟之中，即便结果对他们并没有好处。资产阶级律师里固（Rigou）被描述成各种样子，有人说他是“山谷里的吸血鬼”以及“贪婪的主人”，里固持有压迫的抵押单据，并利用这些单据从他用“秘密铁线”所控制的农民身上榨取强制的劳动力。科尔特魁斯（Courtecuisse），一个向里固借钱买了一小块田产的农夫，不管他跟妻子多么努力工作，却仅能支付贷款的利息。科尔特魁斯一直受到终止回赎权的威胁，因此他丝毫不敢违逆里固的意志。而里固利用农民的力量——特别是他们长期而可怕的贫困、憎恨以及他们捡拾落穗与拔取木柴的传统权利——来破坏贵族的商业能力。一位观察入微的农夫说道：

吓唬那些住在艾格（Aigues）的士绅，这样才能充分而完善地维持你的权利；然而资产阶级真正想在山谷里做的，是将士绅赶出去并且将艾格的田产拍卖掉。不过我们对此没有兴趣。如果你帮着资产阶级大块地分割田产，那么等到未来革命发生，我们就没有国有土地可分了？你不会从土地得到任何东西，就像老里

固一样；然而一旦让资产阶级把土地嚼烂吞下，他们会吐出更为细碎且更为昂贵的土地。你将为他们工作，就像其他人为里固工作一样。看看科尔特魁斯吧！<sup>14</sup>

虽然对农民来说，反对贵族并且责难贵族应该为农民的堕落情况负责，要比抵抗农民所依赖的地方资产阶级容易得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于地方资产阶级权力的憎恨不会浮出水面。这种情况能控制多久呢？巴黎与乡村的资产阶级对此难道没有理由心生恐惧吗？就乡村是个不稳定与阶级战争的地点来看，它对巴黎世界的威胁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看起来是巴黎统治一切，其实真正发号施令的却是乡村。<sup>15</sup>

32

巴黎人，不管是什么阶级，都活在一种否定与不信任自己农村出身的状态中。外省移民整合到巴黎的复杂仪式，只能用这样的词汇来解释。《幻灭》一开始严词批评了安古兰的小镇外省主义，而当吕西安与巴日东夫人前往巴黎宣泄他们的热情时，巴尔扎克也描述了极为困窘不悦的场景。与权贵关系甚佳的埃斯巴夫人，带着吕西安到了歌剧院，他已经将身上所剩不多的金钱花去大半。许多人对他品头论足，说他是“裁缝师的木头模型”或者是“盛装打扮的店铺伙计”。当他实际上是药剂师的儿子，而且没有权利主张他母亲的贵族血统时，所有人都躲着他，包括巴日东夫人。巴日东夫人起初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巴黎时，她在吕西安眼中是个“高大、干瘪、皮肤满是雀斑的女人，肌肤暗沉无光并且还有一头醒目的红发；瘦骨嶙峋、矫揉造作、虚伪、外省口音，以及糟糕透顶的穿衣品位”。然而她却幸免成为歌剧院中众人苛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当她是埃斯巴夫人的“外省穷亲戚，任何巴黎家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灾民缠身”。<sup>16</sup>在埃斯巴夫人的指导下，巴日东夫人很快就学会了巴黎的风尚，只不过现在她成了吕西安的敌人而非爱人。

巴尔扎克经常提到外省出身者借由仪式而进入巴黎生活圈的场景，不管这些人是商人（如赛查·皮罗托）、野心勃勃的年轻艺术家（如拉斯蒂涅），还是与权贵关系甚佳的女人（如巴日东夫人）。一旦打进这个圈子，他们绝不回头，即便他们最终在巴黎失败而招致毁灭（如皮罗托与吕西安）。对外省出身与外省权力的热



FIGURE-015

在杜米埃的眼里，乡村生活的现实面根本不是牧歌式的。资产阶级要不是碰到可怕的意外（通常是因为与乡村生活相处不顺遂所引起），就是觉得无聊。





切否认，演变成巴黎生活的创始神话：巴黎是个自足的实体，完全无需仰赖它所鄙视的外省世界。在《贝姨》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否认带来的惨重代价：一个农村出身的女人因为嫉妒而费尽心机地毁了一个贵族家庭。巴黎非常仰赖外省，但却又极力想否认这一点。

---

## 湍 流

---

外省与乡村生活的闲散与巴黎日常生活的匆忙形成强烈的对比。留意巴尔扎克用来传达巴黎匆忙的各种隐喻：这座城市，他写道，“不停地往前走并且从不休息”，它是“个巨大而丑陋的奇迹，一个运动、机器与观念的惊人组合，一座有着一千则各式罗曼史的城市……一个永不止息的万城之后”。在“巴黎的湍流中”，事件与人群在杂乱地跌成一团。甚至连穿越马路都令人感到威胁。每个人“顺着自己的路线走，审视四周，一下子往这儿跳，一下子往那儿跳，不是怕沾到泥，就是为了赶时间，或者是因为他看到其他人慌乱地沿路狂奔”。这种压缩了时间与空间的狂热步调，有部分导因于巴黎已经成为“用来制造享乐之事的巨大首都作坊”。它是个“缺乏道德、原则以及真实感受”的城市，但所有的感受、原则以及道德却能在当中找到起点与终点。这种被戏剧性地召唤出来的东西，西梅尔（Simmel）日后将其定义为现代性的城市中所特有的“麻木不仁”：

感情抵抗不了往事件奔去的漩涡急流；事件的奔流与逆流而上的努力，减低了热情的强度。爱被转化成欲念，而恨则被转化成一时的奇想……在客厅以及在街道上，没有人是多余的，没有人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或绝对有害的……在巴黎，每件事都可以被容忍：政府、断头台、教会、霍乱。你总能在巴黎社会中受到欢迎，然而如果你不在那儿，也不会有人想念你。<sup>17</sup>

商品市场的混乱，与迷惑混合在一起：

佩兰-加斯兰街（rue Perrin-Gasselin）是迷宫中的分支道



路……宛如形成了城镇的内脏。街上群集了无数各式各样的商品——各式各样与混合的，发出恶臭与优雅的，鲱鱼与细洋布，丝绸与蜂蜜，奶油与薄纱——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店铺，巴黎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如同大多数的人不会感觉到他们的胰脏发生了什么事一样。<sup>18</sup>

要找出巴黎如何运作，要穿越表面外观、疯狂的乱象以及万花筒般的移动效果，要穿透迷宫，你就必须“开膛剖腹，才能找到当中的灵魂”。然而也就在那里，在核心的位置，资产阶级生活的空洞让人一览无遗。运作中的支配力，其诠释方式各种各样，然而在支配力的后面却隐约可见一些人物，如折扣商人吉戈内(Giggonet)、银行家戈布赛克，以及放贷者里固。黄金与愉快就是它的本质。“以这两个词作为指引的灯火”，一切都将揭露出来，我们发现，“不是轮齿没有卡好轮沟，而是每件事物都在刺激着金钱往上行进”。在巴黎，“社会各阶层，不管是低层、中层还是高层，都在‘需要’(Necessity)这个无情女神的鞭子底下跑跳嬉戏：需要金钱、荣耀或娱乐”。<sup>19</sup>资本的流通主导了一切。

特别是由“我们称之为投机的怪兽”来接管。《欧也妮·葛朗台》(*Eugénie Grandet*)记载了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储藏黄金的守财奴成了投机于利息票据的收租者，借以让自利等同于货币利息。马克思在写作时，也许心里面想的正是葛朗台：“对富有的无尽贪婪，对交换价值的热情追逐，普遍可以在资本家与守财奴身上看到；不过守财奴只是发了疯的资本家，而资本家却是理性的守财奴。”<sup>20</sup>这句话可以用在葛朗台身上。不过实际上，各式各样的投机才是真正的支配者。工人阶级投机，“他们让自己精疲力竭以获取他们朝思暮想的黄金”，乃至因此而革命，“因为革命总是意味着黄金与愉悦的应许！”下层中产阶级中“形色匆忙、心怀不轨且投机的”分子，评估巴黎的需求并且计算着要满足这个需求。他们在全世界搜索商品，“将汇票贴现，流通各种有价证券并予以兑现”，同时，他们也为“小孩的幻想预作准备”，“暗中打听大人们突发的念头与恶习”。他们甚至“从疾病中榨取股息”，无论真实的病痛还是想象的病痛，他们提供的都是假药。<sup>21</sup>赛查·皮罗托，香水制造商，他率先运用广告的手法来说服大家相信他的



产品是最好的，以此而打败了其他对手。而在更大规模的层次上，对于房产与地租的投机也重塑了城市：

巴黎也许是个怪物，但它是怪物中最偏执的。它沉迷于上千个幻想当中。在某个时刻，它专心于砌砖，如同一个迷恋泥抹子的贵族一样……然后它陷入沮丧的泥泞中，破产、变卖家当并且提出陈情书。但是几天之后，它又重整旗鼓，兴高采烈地在假日出游与跳舞……它患有每日发作的狂症，但也患有一个月、一季、一年的狂症。因此，只要时候一到，所有的人都会开始毁坏或重建某件东西，不管用什么方法。<sup>22</sup>

然而，从不动产投机中所得到的收益，既缓慢又反复无常（《贝姨》中狡猾的资产阶级克雷维尔[Crevel]从邻近地区的改善而实现地租上涨的获利，有些人，如赛查·皮罗托，因为没有足够的信用来等待，结果所有的财产全捐输给了无耻的金融業者）。我们甚至看到了某种现在称之为“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现象：“借由建筑高尚、优雅而且有门房的房屋，铺上小径，并且设立店铺，投机的建筑商以收取高租金来赶走他们不喜欢的人物、没有财产的家庭以及各种坏房客。而这种方式也使得地区可以甩掉不

FIGURE-016

杜米埃描绘了巴尔扎克笔下下层阶级“形色匆忙、心怀不轨且投机的”人物，并且连续描绘了罗伯·马盖尔（Robert Macaire）这个庸医、投机分子以及夸大不实、总是外出寻找快速成功机会的人。他经常在这里将分好的东西卖给“那些准备好要损失金钱的人”并且建议售货员，如果他能将他的产品磨成粉末或弄成药水当成治病的药方来卖，那么他将可以实现更多的利润。当被告知袋子里装着谷物时，他只是回答：“那更好！”

体面的人。”<sup>23</sup>大金融家不只准备好要毁灭诚实的资产阶级投资者如皮罗托，还要——纽沁根男爵就是如此——骗取穷人的金钱。“你知道什么才是他所谓的好买卖吗？”纽沁根夫人对着惊讶万分的高老头问道：

他以自己的名义买下未开发的土地，然后找一些傀儡在上面盖房子。这些人为了盖房子而跟承包商制定了契约，并且付给他们远期支票。他们以小额的价钱将房卖给我丈夫，然后便宣告破产，将他们的债务留给成了冤大头的承包商。<sup>24</sup>

新社会的权力指导线存在于信贷体系之中。一些聪明的金融家（巴黎的纽沁根与戈布赛克，布尔戈涅[Bourgogne]的里固）占据了权力网络中的节点，因而能支配一切事物。巴尔扎克将资产阶级的权力与价值虚构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个由想象资本——借由创造性会计所扩大的票据信用来进行支配——所统治的世界，在当中，一切事物（如凯恩斯[Keynes]后来在《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所主张的，而最近层出不穷的金融丑闻也说明这一点）所遵循的预期与期待，只跟诚实的辛苦劳动有着偶然的关系。想象世界进入到个人行为之中，添上财富的装饰，特别是穿上外在符号的外衣（华服、马车、仆役、家具精美的公寓），并因此而举债，都是为了达成财富所必经的序曲。想象与幻想，特别是信用与利息的想象，成了现实。这是现代性的关键创建神话之一。而这就是所有繁复社会外观以及“湍流”的所有混乱不安所要隐匿的东西。巴尔扎克剥开了恋物癖（这种观念认为金融上的诈骗是偶发的，不是结构上的）并且将想象予以暴露，以揭发其中资产阶级价值的全然空洞。以此唯“政治经济学阁下”之命是从，甚至带有革命的意涵：

各阶级的需要——被虚荣心所消费——被过度挑起。政治令人畏惧的程度并不亚于道德，它必须扪心自问，要从哪里得到收入来满足这些需要。当人们看到国库的流动债务，并且逐渐习惯于每个家户都以国家为榜样而拥有流动债务时，就应该惊讶地发现，

法国有一半被典当给了另外一半。如果账目结清了，债务人就会遥遥领先债权人……这或许显示所谓的工业时代将要终结……跟贵族比起来，富有的资产阶级有更多的头让人家砍，即使他们有枪，他们也会从那些制造枪支的人当中找出敌人来。<sup>25</sup>

在1848年，这个真理实在太明显了。

---

## 地狱及其道德秩序

---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在为黄金、权力与愉悦所进行的冷酷斗争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原子的与混乱的竞争关系，但巴尔扎克穿透了这层混乱的表象世界，将对巴黎的理解建构成阶级力量横陈与撞击下的产物。在《金眼女郎》(*The Girl with the Golden Eyes*)中，他部署了令人吃惊的隐喻混合来描述阶级结构。但丁在下降到地狱时所看到的各层景象（似乎启发了巴尔扎克对“人间喜剧”标题的全盘选择）首次被引用：“巴黎被称为地狱，这并不只是句玩笑话。这个绰号的确取得恰如其分。充满了烟、火、强光、沸腾；一切事物突然间烧了起来、摇晃着、安静下来，又再烧起来、发出火花、发出噼啪声，并且烧尽。”<sup>26</sup> 巴尔扎克快速地移动隐喻，我们发现自己先是穿越典型巴黎公寓建筑的各个楼层，随着我们往上就会看到各阶级的层化现象，然后将巴黎看成是一艘由各种船员搭乘的阶级之船，最后，进入到巴黎身体的器官部位与组织——要不是被当成娼妓就是被当成女王。

但整个阶级结构从头到尾是清楚的。在社会最底层是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工人指的是“过度使用劳力、将他的妻子束缚在机器或其他东西上，以及让小孩去当齿轮工的男人”。制造业者是中间人，他拉着指导线（资本通过看不见的线，领导家庭工业进入统一的生产系统中，马克思对此进行评论时，不断提到这个语汇）好让“这些傀儡”动起来，并且答应给这些“流汗的、自动自发的、有耐心的、勤勉的大众”足够的薪水，让他们能“迎合那些取代了我们称之为投机的怪兽的城市奇想”。结果，工人们“开始值夜班、受苦、辛勤工作、诅咒、禁食并徐徐前进：他们累得精疲力竭，为的是赢得他们魂牵梦系的黄金”。无产阶级

——巴尔扎克估计有30万人——一般都在城里各处的酒馆中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挥霍一空，耽于玩乐，偶尔爆发出革命的狂热，之后则又返回岗位继续辛苦的工作。就像火神（Vulcan）固守在轮子前一样（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提到这个景象），有些合于美德典范的工人表现出“能力的极限并且结合了心灵与身体的力量而在生活中发挥了社会潜力”。另外还是有人会小心地存钱当个小零售商——具体的例子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针线商”，他过着相当不同的生活方式：高尚的家庭生活、读报、上歌剧院以及到新开的布料店去（女店员正等着跟他打情骂俏）。他对自己的家庭有着独特的野心，并且重视教育，这个往上流动的手段。<sup>27</sup>

第二层由“批发商跟他们的员工，政府雇员，极为廉洁的小银行家，骗子与傀儡，上级办事员与下级办事员，司法官员、律师与公证人的办事员所构成，简单地说就是下层中产阶级中形色匆忙、心怀不轨、投机的成员，他们估计巴黎的需求并且计算着如何满足它”。追求黄金与愉悦的欲望炽烈燃烧着，自利的连枷驱使着，他们也“任由狂乱的生活步调毁了健康”。因此，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他们沿着大街晕眩地拖行自己的身子，脸上堆满了“疲惫、呆滞与萎靡”，“眼睛无神，双腿也不听使唤”。

第三层则“好比是巴黎的胃，城市的利益在当中被消化并且被压缩成一种以事务为名的形式”。在这里，“经由尖酸而怨恨的肠子作用”，我们发现到由“律师、医生、出庭律师、生意人、银行家、大贸易商”所构成的上层中产阶级。不顾死活地吸引并累积金钱，这些人一早下楼，“走进悲哀的深渊，让许多家庭饱受折磨”，却一点怜悯心也没有。在这一层中，我们发现了在巴尔扎克所有著作中扮演着支配者角色的演员阵容（杜米埃的罗伯·马盖尔讽刺系列让这种形象传之久远），而巴尔扎克对这些人也多有批判。这就是现在正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即便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当中包含着毁灭自己的作法、活动以及态度。<sup>28</sup>

在这一层上面则是艺术家世界，他们努力（如巴尔扎克自己）要获得原创性，但却“被破坏，虽非可耻，但却被破坏、弄得疲惫、被折磨”以及（同样如巴尔扎克自己）“不断被债主骚扰”，因此他们屈服于邪恶与愉悦，作为他们在长夜漫漫中工作过量的补偿，“他们试图以艺术征服荣耀与金钱，化解俗世的玩弄，但却徒



劳无功”。“竞争、敌对与中伤是天分的死敌”，巴尔扎克说道（我们只需看看《幻灭》中所描绘的记者天分的腐化，就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sup>29</sup>然而，现在这个拥有霸权的中产阶级却生活与工作在最令人心惊的状况中：

在我们离开这四个社会阶层，巴黎的贵族财富就建筑在这上面之前，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处理道德因素之后，也对物质因素进行调查？……难道我们不应该指出有害的影响，其腐败行为直接与市政府的施政抗衡，而市政府竟还得意洋洋地允许这种行为存在？如果大多数中产阶级市民所居住的房屋空气是污浊的，如果街上的空气喷出有毒的蒸汽到不通风的后院，还要知道，除了鼠疫之外，这座大城4万栋房屋的地基还都全浸在污物中……有半个巴黎晚上睡在从街道、后院以及户外厕所所散发的腐败气体中。<sup>30</sup>

39

20年后，奥斯曼被召来所提出的生活状况也就是如此。但中产阶级的工作条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幻灭》中生动描绘出皇宫附近的出版社，其办公室肮脏无比）。他们“生活在有害健康的办公室里，充满疫病的法庭中，装着铁窗的小房间内，一整天都被沉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与“宽敞、通风、华丽的沙龙，公园环绕的华夏，富有、闲暇、快乐、富裕的世界”（以圣日耳曼区为中心所形成的独特社会为典型）形成强烈的对比。然而，在巴尔扎克忧郁的叙述中，上层社会的居民并不快乐。他们因追寻逸乐而腐化（沉迷于鸦片与通奸之中），在真实的“虚荣火堆”（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描写纽约时给的称号）旁感到厌烦、乖僻、消沉与憔悴，苦恼于研究下层阶级的喜好，为的是让下层阶级堕入邪恶，使其成为获利的来源，他们是“空虚的存在”，期盼着“绝不会出现的愉悦”。这就是巴尔扎克赋予乌托邦希望的阶级，但也许正因那些理由，上层阶级才表现出真实人物最丑恶的一面：“纸糊的面孔，早早出现的皱纹，萎靡在富人的脸庞上作了鬼脸，反映的只是黄金，而非已经流逝无踪的智力。”<sup>31</sup>

因此，巴尔扎克简要地说：“无产阶级辛苦劳动，中产阶级贪得利益而退化、堕落，艺术家阶级遭受精神折磨，以及达官显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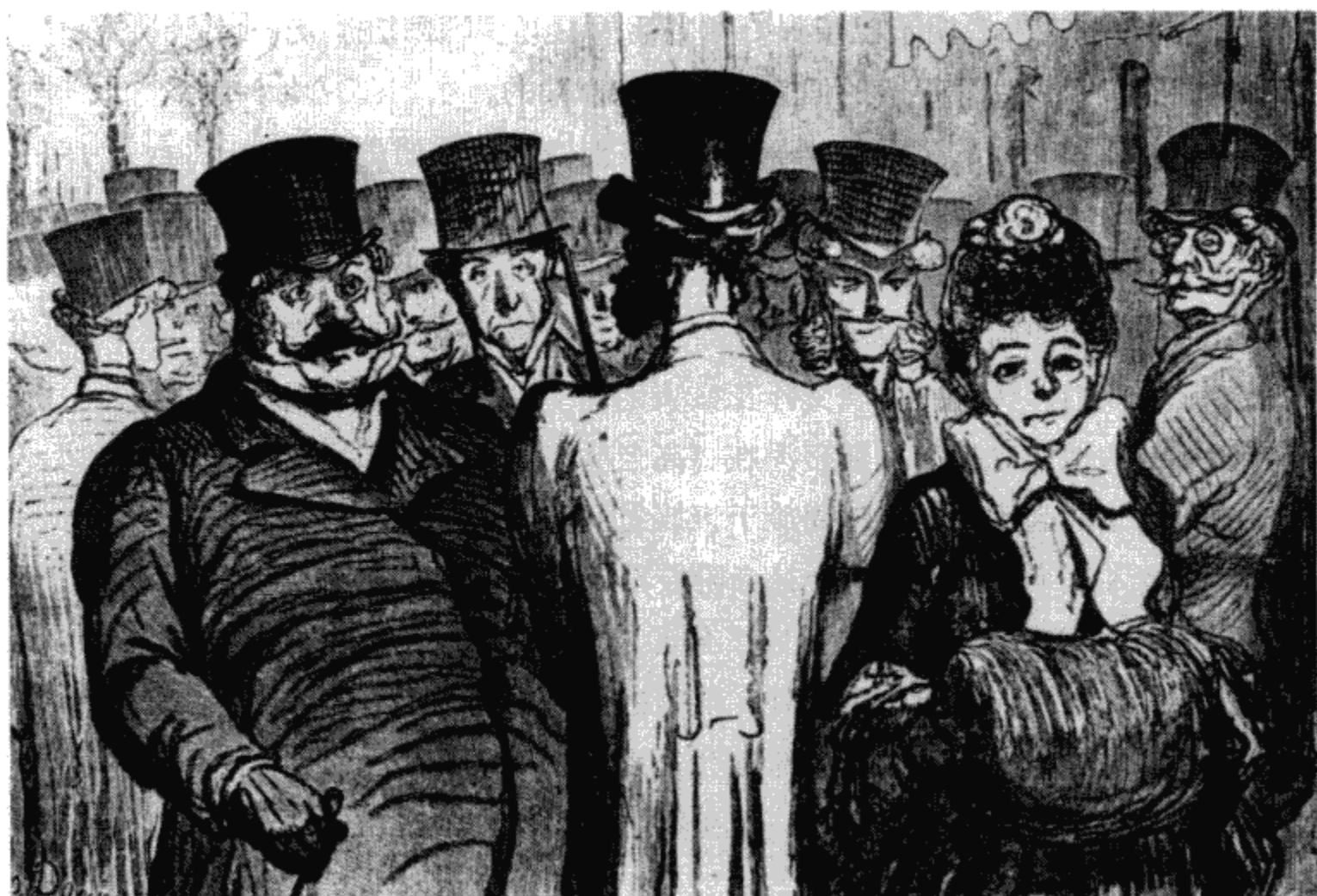


FIGURE-017

杜米埃捕捉到巴尔扎克笔下各种阶级的特有相貌，巴尔扎克描绘了在意大利大道（Boulevard des Italiens，上图）上的富裕阶级，以及在神庙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下图）上“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

## 论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

耽于享乐，这些现象说明了巴黎人日常生活的丑恶。”<sup>32</sup>城市的“万花筒”经验以及“如死尸般的面容”就是这样来的。

这些看起来严谨的阶级区分（以及省区出身与社会历史的重要区分），却为个人参与高风险的金钱、性与权力追逐所造成的快速变动所抵消。举例来说，吕西安在《幻灭》的末尾一文不名、无权无势，丢脸地回到外省故乡，却在与大罪犯伏脱冷合作下重新到巴黎夺取权力。伏脱冷在《交际花盛衰记》中安排吕西安与银行家纽沁根的情妇私通。拉斯蒂涅在《高老头》里跟贫困却又装派头的寄宿生一起生活，但却周旋于贵族之间（向家里借钱买衣服，才能打入这个圈子）。“每个社会阶层都将他们的子女往上一层推”，所以“富有的杂货商之子成了公证人，木材商之子则成了行政长官”。<sup>33</sup>如我们所见，借由外在财富的妆点，的确有可能通过投机的手法与诈骗的方式，经营社会关系而获致财富。然而这个过程也存在无数的陷阱与限制，而身份与认同也逐渐在巴黎社会秩序的复杂空间中黏结在一起。

巴黎每个区各有其“模式，能够显露出你是谁，你的工作，你的身家背景以及你所追求的目标”。用来区隔阶级的有形距离，被理解成一种“经过具体化与神圣化的道德距离，而正是这种道德距离将阶级区隔开来”。社会阶级的区隔，既以空间生态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离的方式表现。巴黎将“它的头放在阁楼上，居住的是科学家与天才；二楼住的是装得满满的胃；一楼则是店铺，是腿与脚，因为忙碌的商人一直在此匆忙地进进出出”。巴尔扎克引起我们对城市隐藏空间的好奇，并将它们转变成令人感兴趣的神秘之物。“人们不喜欢向公众说故事，因此对公众来说，地方色彩便成了一本合上的书，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巴尔扎克羞怯地说。<sup>34</sup>但巴尔扎克马上就打开这本书，并显现出空间性以及空间性所表述的整体世界。空间模式其实与道德秩序环环相扣。

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曾经写了一篇引人联想的论文，他将城市说成是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社会关系被铭刻在社会空间中，使得空间模式不仅反映出道德秩序的再生产，

而且也是道德秩序再生产的发动时刻。这个观念直接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出现：“在历史的每个时期，上层阶级与贵族的巴黎都有着自己的中心，正如同无产阶级的巴黎总是有着自己的特定空间一样。”<sup>35</sup> 纹路细致的各式变化被嵌入巴黎的社会空间形式中：

在巴黎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各部分的面貌都显现出各种不同的类型，而这些类型却又与整体的性格搭配得天衣无缝。因此公寓管理员、看门人或门房，不管巴黎这头巨兽的核心神经系统叫什么名字，总是要与他运作的所在地点相搭配，并且与他运作的所在地点结合在一起。圣日耳曼区的公寓管理员，制服上缝着穗带，悠闲自在之余还投资政府股票；昂坦道区（*Chaussée d'Antin*）的门房享受着物质上的舒适；证券交易所区的门房各顾各地看报；蒙马特区的门房兼做生意；在红灯区，女门房本身就是由退休娼妓来担任；在沼泽区（*Marais*），女门房受人尊重，她们个性倔强而且想法怪异。<sup>36</sup>

这种空间模式执行了道德秩序（即便超越了公寓管理员与门房所能照管的范围之外）。在《费拉居斯》（*Ferragus*）中——《十三人社的历史》三篇故事中的第一篇——只要有人逾越空间模式，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进入错误的空间，就会死亡。错置的角色妨碍生态和谐，污染道德秩序，因此必须付出代价。这使得巴黎成为危险的地方，因为人们太容易在当中迷失，并且被湍流横扫到各处，最后发现自己身处在错误的地方。“我深信”，《费拉居斯》的茱儿夫人（*Madame Jules*）说，“只要我走进这个迷宫一步，我就会摔进深渊跌个粉碎。”<sup>37</sup> 茱儿夫人，一个纯粹而完美的创造物，出于对父亲费拉居斯的孝心，冒险进入与她的身份不合的巴黎某个地区。“这个女人已经迷失了”，巴尔扎克宣告，因为她已经误入歧途。茱儿夫人受到感染，最后死于“某种道德并发症，这种病症影响极大，乃至于让她面目全非”。奥古斯特（*Auguste*），茱儿夫人的仰慕者，也注定死亡，因为“他为了追索自己未来的噩运，仔细巡查了茱儿夫人秘密抵达的建筑物的每个楼层”。伊达·顾洁（*Ida Gadget*）负责照顾费拉居斯，也鼓起勇气造访茱儿的资产阶级住处，下场也是死亡。

茱儿夫人的父亲费拉居斯是十三人社的秘密社员，曾宣誓要全力支持彼此。巴尔扎克说，他们身上装了翅膀。他们“在社会的最高处与最深处呼啸，不屑于在任何地方停留，因为他们拥有无限的力量”。他们自外于并且高于道德秩序，因为他们无法被坐落或安置。奥古斯特与茱儿（还有警察）到处寻找，就是没有费拉居斯的下落。他只在他想出现的时间地点出现。当每个人都被空间所困住时，空间却任由他差遣。这是他的秘密力量的关键来源。<sup>38</sup>

然而，巴尔扎克作品的视野有一个演变。原本空间的严密在《十三人社的历史》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但在后来的著作中却逐渐软化。如沙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的观察，在《邦斯舅舅》（Cousin Pons，巴尔扎克的最后一部作品）中，邦斯舅舅被公寓管理员所击倒，因为公寓管理员不只控制着邦斯居住的地方（她负责为他供应三餐），她也能构筑阴谋之网（运用公寓管理员体系的“神经系统”）与阴谋者联盟——这些阴谋者网络蔓延整个巴黎，足以接近邦斯舅舅的公寓及其艺术收藏品。<sup>39</sup>以这种方式来控制与生产空间的能力是一种权力，通过这种权力，即便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能颠覆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伏脱冷，由大罪犯摇身一变成了警察总长，他相当了解巴黎的空间生态，并以其指挥与控制空间生态的能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巴黎的空间性逐渐被理解为辩证的、建构的以及相因而生的，而非被动的或仅仅是反射性的。

---

## 街道、大道与景观的公共空间

---

巴黎的某些街道就如同败德的男人一样，有着不好的名声。另外也有高贵的街道，体面正派的街道，以及还年轻、民众还未能对它的道德性产生意见的街道。要命的街道，年龄比年老的贵妇还大的街道，受尊敬的街道，总是干净的街道与总是肮脏的街道，工人阶级、勤勉商人的街道。简言之，巴黎街道拥有人性特质，而这样的面貌也留给我们难以抗拒的印象。<sup>40</sup>

42 这段文字很难说是对个别街道的客观描述。巴尔扎克书中人物所怀抱的希望、欲望与恐惧为他们所穿越的街道以及邻近地区

赋予了意义与性格。他们也许耽于享乐，也许感受到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压力，但他们绝不会忽视自己的处境。巴尔扎克所提供的，情境主义者 (situationists) 日后称之为巴黎街道与邻近地区的“心理地理学” (psychogeography)。但巴尔扎克的作法是通过笔下各种角色的多重视野，而不光只是以自己的角度来呈现。<sup>41</sup> 巴尔扎克的角色甚至会随着场景的不同而改变性格。要进入圣日耳曼区 (及其附随的贵族特权)，或者是要与王宫广场 (Palais Royale，当中伴随着出卖灵肉的主题，如女子出卖肉体，以及文人出卖文采给令人不适的营利的新闻报刊) 的混乱合而为一，参与者必须接受不可抗拒的要求。而抗拒的唯一形式就是移动。在《幻灭》中，吕西安无法引起圣欧诺瑞街 (Rue St Honoré) 时尚世界对他的注意 (尤其他在歌剧院的表现简直是一场灾难)，也无力掌控王宫广场的低级出版世界，于是他逃往索邦 (Sorbonne) 附近的左岸禁欲世界，成为一个身无分文但却绝对诚实的大学生。他在那里有一群紧密的朋友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度过难关。然而当他与女演员寇拉莉 (Coralie) 走过市区时——寇拉莉迷恋于吕西安俊俏的外表——吕西安也接受了寇拉莉的判断，她认为吕西安原本居住的地方不仅贫穷，而且认为只有傻子才会待在那里。吕西安不仅转换了视野，甚至还改变了政治立场，转而攻击他老朋友的作品。

我们学习从多重的视野来了解巴黎。巴黎一方面有着难以掌握的迷宫般的万花筒特质：通过旋转的万花筒，我们看到无数巴黎景象的组合与色调。而万花筒中存在着一些固定的中心点，巴黎的景象便环绕着这些中心点而彼此结合成更持续而固定的事物。圣日耳曼区，右岸诸大道的商业世界，证券交易所 (“全都是些说话喋喋不休、来去匆忙的娼妓”) 以及皇宫、圣欧诺瑞街、索邦周边的学生区，以及巴黎各处被工人阶级笼罩的阴影 (虽然我们想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找出在工业雇佣制度下人们所蒙受的种种无尊严与无保障，但巴尔扎克在作品中的确很少提到工人阶级，只有在《贝姨》中以相当寻常而一般的方式描述了恶名昭彰的小波兰 [Petite Pologne] 与圣安东尼区 [Faubourg Sainte-Antoine])。除此之外，城市景观也让巴黎显得容光焕发。歌剧院、戏剧院、大道、咖啡馆、纪念碑以及公园与花园，一个个看起来就像是城市织品





FIGURE-018

巴尔扎克为巴黎街道所呈现出来的人格与情绪所着迷。这张马维尔摄于1850年代的照片捕捉了某种阴郁感。它描绘了当时的淫窟美德街 (Street of Virtues), 这条街与格拉维耶街 (Rue des Gravilliers) 相接, 而1860年代第一国际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的巴黎总部就设在格拉维耶街上。

上闪闪发亮的针线, 为都市生活织上了意义之网, 若没有这些东西, 巴黎将黯淡无光。尤其大道就像诗一样, 巴黎主要就是借由这些大道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借由街道的指示, 我们可以从鸟瞰的角度描绘出整个巴黎的全貌, 并且尝试将所有的人、事、物安置在巴黎每日生活的迷宫与花花世界之中。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巴尔扎克是怎么想出《高老头》那段杰出的开场白。“只有站在蒙马特与蒙鲁吉 (Montrouge) 这两个高地之间, 才能欣赏”整个巴黎的景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崩塌中满是黑泥的贫民窟, 这是一块充满了苦难以及欺骗乐趣的谷地”。伏盖夫人 (Madame Vauquer) 的出租公寓所在的街道就位于恩典谷教堂 (Val de Grace) 与先贤祠 (Pantheon) 之间, 此处,

没有任何车子经过，让局促于恩典谷教堂与先贤祠之间的街道陷入深沉的寂静之中。两栋建筑的无趣圆顶遮蔽了街巷的日光，整个气氛显得阴沉而无味……最逍遥自在的路人到了这个人车罕至的地方也会感到沮丧，举目所见尽是阴暗的房屋以及监狱般的高墙。在这里迷路的巴黎人会发现自己身处于出租公寓或赡养院之中，这里的人既穷困又懒散，老人行将就木，而快乐的年轻人则注定要做单调的工作。这里可以说是全巴黎最严酷也最不堪闻问的一区。

巴尔扎克把行经这个区域的整个过程比拟为往下走进地下墓穴，他先是穿透邻近地区，然后进入房子与花园，进入房间与人群之中，他的描述就像激光一样精准。白天时大门旁边的小门以及晚间紧闭的大门将封闭的花园与街道完全隔开。爬满蔓藤的墙边还种着架着树棚的果树与葡萄树，“伏盖夫人每年都忧虑地监视着树上坑坑巴巴盖满灰尘的果实”。墙边“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往菩提树丛”，树下摆了一张“绿漆圆桌，尽管已经热得可以孵蛋，但桌旁有椅子可以让喝得起咖啡的房客享受一下大热天的时光”。三层楼的房子“以切割的石块砌成，石块的黄色色调让巴黎每一栋房子几乎都蒙上平庸的外表”。走进房子就是沉闷的客厅，里面弥漫着一股“出租公寓的气味”，饭厅（里面摆放的家具描写得相当仔细）的气氛更是阴沉，“每件物品都很肮脏，明明没有破布一类的东西，但却给人一种褴褛破烂的印象”。在这段描述的末尾，我们看到伏盖夫人，她……

戴着薄纱帽，穿着起皱的拖鞋缓慢走着。衰老的肥胖脸庞中  
44  
耸立着如鸚鵡嘴般的鼻子，小手胖得挤出涡纹，身体如教堂老鼠一般臃肿，身上则穿着撑得不成形的衣服，整个人的模样与房间摆设刚好搭配起来，四壁散发出悲惨的气息，被压抑与遏止的希望终究成了绝望。伏盖夫人早已习惯窒闷的房间，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她的脸就像秋天第一道冰霜一样新鲜，眼角尽是皱纹，表情可以一下子从芭蕾舞者般的一贯笑容变成债主般的晚娘面孔。简单地说，她整个人提供理解出租公寓的线索，正如出租公寓暗

示她这种人的存在。<sup>42</sup>

环境与人格之间的连贯令人印象深刻。从高处往下看，我们不仅可以从巴黎整体的角度来看，也能从整个都市组织的特定生态位置来看伏盖夫人以及公寓里其他所有住户。巴黎的生态学与巴黎居民的人格乃是彼此的镜像。

---

## 内部空间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恐惧

---

内部空间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疆界的多孔性以及势必穿越疆界以维持巴黎居民生命的交通，绝对无法让内部空间抵挡住不速之客的猛烈穿透（这个词所带有的性暗示适合用在这里）。从这一点来看，如马库斯所显示的，公寓对外力入侵的无力抵抗的确提供了具体平台，让这类关系能轻易地在当中展现出来。<sup>43</sup>巴尔扎克小说中有许多情节，背后的推动力都来自人们针对外界对其亲密世界的威胁——人们总想穿透、居住并征服其他人的室内生活——进行身体与情感上的抵抗所致。成功的穿透总是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墓园中的最后安息之所——此时所有对亲密关系所造成的威胁将被完全去除。那些（主要是女人）心甘情愿向真爱以及亲密关系屈服的人，承受着致命的结果（有时是一种凄美的牺牲，就像《交际花盛衰记》里头吕西安的爱人，那个改头换面的交际花一样）。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以及对崇高情操的寻求不断要面对的是对死亡结果的极端恐惧。

然而，巴尔扎克对于资产阶级的批评，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在于他认为资产阶级无法有亲密关系以及内在情感，因为资产阶级将所有事物都转化成冷酷的计算以及利己主义，他们只在意货币的价值、虚幻的资本以及追逐利润。巴尔扎克笔下的资产阶级人物中，最愚蠢的克雷维尔，在《贝姨》一开头就试图获得他的亲家母的感情。然而当阿德琳由于丈夫挥霍积欠的大笔债务而不得不对克雷维尔低头时，克雷维尔却无情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克雷维尔故意当着阿德琳的面刁难她，并且表示租金的损失影响了他的资本，而为了这一点，克雷维尔不可避免要摆点姿态。亲密关系的主题以及危险无所不在。在《金眼女郎》中，亨利·德·马

赛（Henri de Marsay）在杜伊勒里看上了一位美丽女子。他热切追求她，甚至因此穿越了护墙并且越过了重重社会与人际障碍，只为了要接近她。亨利被蒙住双眼，引领着穿过神秘的走廊，在隐秘的闺房中得到帕绮塔（Paquita）的爱，而闺房（如同伏盖夫人的出租公寓一样）告诉了我们帕绮塔的一切：

闺房挂着红色织物，上面镶补了印度棉布，内外的皱折像极了科林斯式的石柱，布的顶端与底部用罍粟色的布料绑紧固定，布上则绣着黑色阿拉伯风格图案。在棉布映衬之下，罍粟色的布料泛出象征爱情的粉红色。同样，窗帘也是用印度棉布织成，以粉红波纹绸为衬里，滚边则用罍粟色与黑色布料交错缝制。六个镀银烛台，每个烛台上插着两根蜡烛，这些烛台安装在挂上挂毯的墙壁上面，照亮了整个房间。房间天花板的正中央挂着一个笨重的镀银大灯架，泛出令人目眩的白光，至于墙壁与天花板之间的嵌线则镀上金箔。房间的地毯让人联想到东方的披肩，上面的图案完全是波斯风格，让人回想起波斯的诗歌，这地毯可是奴隶们一针一线缝制而成的。家具上覆盖着克什米尔羊毛织斜纹呢，上面搭配着黑色与罍粟色的花饰。时钟与装饰的大烛台是用白色大理石与金子制成。还有一些高雅的花架，上面长满了玫瑰，以及白色或红色的花朵。<sup>44</sup>

在这个亲密空间中，德·马赛体验到“无法以言语形容的愉悦”。随着德·马赛逐渐在这个普通人愚蠢地称之为“想象空间的愉悦世界”中迷失自我，他也变得“体贴、温柔与有口才”。但帕绮塔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已注定。“狂热中带着死亡的恐怖，在这当口她将德·马赛紧紧拥在怀里。”帕绮塔告诉德·马赛，“我一定会因你而死。”亨利后来愤怒地发现她与人有染，于是返回将她带离房间以便实施报复，然而他却发现帕绮塔与她的女性爱人发生激烈争执，帕绮塔甚至因此被刺死，至于刺死帕绮塔的女子竟是亨利同父异母的妹妹。帕绮塔的“身子被行凶者的匕首乱刺一通，显示出帕绮塔是多么奋力地要保护生命，亨利珍惜的生命”。闺房的有形空间被摧毁，而“帕绮塔沾满鲜血的双手则深印在软垫上”。

在《朗热公爵夫人》（*The Duchesse de Langeais*）中，情节的

发展刚好相反，但结果却相同。女人为了避免亲密关系，便百般闪躲、调情、小心维持关系、采取策略式的婚姻等。蒙特里沃(Montriveau)将军对于已婚的公爵夫人不断玩弄他的感情感到愤怒。蒙特里沃在公共空间(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舞会)中强行绑走公爵夫人，并且将她送往他个人的密室——一间充满哥特式风格，宛如修士苦行之用的密室。蒙特里沃在自己的亲密空间中，威胁要在公爵夫人的额头上烙下有罪的印记(只看到隐约火光闪动，加上附近密室传来可怕的惨叫声)。被绑架的公爵夫人屈服了，她宣称她的爱有如被禁锢的灵魂——她说，“女人一旦有了爱情，就好像在自己身上烙印一样”。情感遭到烙印的公爵夫人返回舞会，在历经种种不幸波折之后，终于逃到遥远的地中海小岛上的小礼拜堂，成为侍奉上帝的特里萨修女。几年后，蒙特里沃终于找到了失踪已久的爱人。他的绑架计划又再度成功，只是这一次他拿到的只是冰冷的尸体。蒙特里沃对着眼前这具“充满着庄严之美的尸体沉思许久，唯有死亡的静默才能赋予遗骸崇高的意涵”。<sup>45</sup>

巴尔扎克将这个主题延伸到男女关系之外。在《未知的杰作》(*The Unknown Masterpiece*, 马克思与毕加索都相当推崇这个作品，但两人所持的理由并不相同)中，一个有天分的学徒被介绍给一位名画家，但这个学徒不准进入内部的工作室，因为里面有一幅正在绘制中的杰作。这位画家想拿他的肖像画与美女两相比对，他相信他的画要比活人更具有生命力。学徒为了让画家能比对，便坚持女友(不管她愿不愿意)必须为他牺牲(他们的爱情因此而毁灭)，在画家面前裸呈。不过学徒也提出了交换条件，他因此得以进入存放珍奇画作的工作室，并亲眼目睹画家口中的杰作。然而学徒却发现画布上空无一物。学徒鲁莽地说出此事，老画家遂恼羞成怒。当晚，老画家将他所有的画作烧毁，随后便了断自己的生命。<sup>46</sup>

在《贝姨》中，一个来自外省农村的亲戚处心积虑地让自己成为贵族妇女眼中如天使般的亲密伴侣，而她的目的只是为了毁了这些贵妇人。在《邦斯舅舅》中，同样的主题则逆转过来。邦斯一辈子唯一的身份就是古董收藏家。邦斯对于每一件收藏品都非常在乎，但他却完全不了解自己收藏的东西价值何在。邦斯将收藏品都放在他所住的公寓里。一股汇集起来的力量(公寓女管



理员带进来的，她宣称这么做是为了照顾邦斯) 闯入邦斯的密室，结果造成邦斯的死。非法闯入邦斯的公寓，巴尔扎克写道，“等于是纵敌入城，将匕首刺入邦斯的心脏”。<sup>47</sup> 闯入之后所衍生的结果造成邦斯的死。但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就邦斯的例子来说，他的死因是商品价值穿透了他的私人空间；身为收藏家的邦斯，将他的私人空间排除于金钱价值之外，此时却遭到撼动。当本雅明写出下面这一段文字时，脑子里一定——或者说应该——想到了邦斯：

内部空间是艺术寻求庇护的地方。这位收藏家的确是内部空间的居住者。他致力于将事物理想化。他肩负着西西弗斯的任务，在收藏古董的同时，顺便剥除掉这些古董的商品性格。他赋予这些古董鉴赏的价值而非使用的价值。收藏家不仅乐于营造一个遥远而古老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好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所得到的物质享受并不优于真实世界，但却能免于实用价值的奴役。<sup>48</sup>

为什么价值或欲求亲密要面对这种危险？为了要对那些喜好肤浅与社交之物的女人施以惩罚，为什么甘冒失去亲密关系的危险就等于烙上爱情的印记或拥抱死亡？为什么要无情嘲弄那些不计代价要避免亲密关系的资产阶级？亲密关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人性特质，但这种特质却在追求交换价值下不断地受到无情的威胁。巴尔扎克的乌托邦主义想象了一个安全而恬静的地方，让人们可以在当中过着安宁的生活并且拥有珍贵的财产，仿佛外在真实世界的艰难颠沛以及商品化完全与他们无关似的。虽然如此，巴尔扎克所编织的梦却总是遭受最大的挫折（如蒙特里沃与公爵夫人的爱情）与毁灭（如帕绮塔与德·马赛）。

47

这样的主题直接在《邦斯舅舅》中得到回响。希波夫人 (Madame Cibot) ——带头闯进邦斯公寓的女管理员，她的行为带来致命的后果——梦想以她得来的不义之财在退休之后返回乡村居住。不过希波夫人不敢这么做，因为算命先生曾警告她，总有一天她将惨死于乡下。希波夫人最后在巴黎度过余生，终其一生都未能过她最想要的田园生活。资产阶级之所以饱受责难，并不

是因为他们逃避亲密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全神贯注于金钱价值而无法有亲密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

真正伟大的男人都渴望无限，帕绮塔所回应的正是这一点。浮士德所表现出来的神秘热情，诗意地移转到曼弗瑞德（Manfred）身上。这股热情驱策着唐璜深入探索女性的内心，如同众多追逐幻影的人，以及神秘主义者在上帝当中寻得归宿一样，他希望能在这当中找到无限的理想。<sup>49</sup>

巴尔扎克在哪里才能找到无限？难道一定得从内部亲密关系中逃到外部世界，或者通过亲密关系体验某种崇高的狂喜时刻，即普通人愚蠢地称为“想象空间”的东西？巴尔扎克在这两种可能之间摆荡着。

---

## 时空的废止

---

“在巴尔扎克所有的著作当中，”普莱（Poulet）说道，“最常出现的主题就是以心智能力来宣告时空的废止。”<sup>50</sup> 巴尔扎克写道：“我拥有最坚定的信仰，相信基督所言，人可用无垠的意志移山，可在大能的协助下废止空间与时间的法则。”巴尔扎克相信他能将一切事物内化于自己的心智之中，然后再通过自己高超的心智能力将事物表现出来。巴尔扎克只有靠着“构成人内在双重性的内在感官的力量”才能活下去。即使被“对于事物的深刻直觉所耗尽”，灵魂也还是渴望成为“宇宙的同心圆镜，用莱布尼兹的华丽词汇来说”。<sup>51</sup> 巴尔扎克的内部就是这样建构的。邦斯的内部空间从双重意义上来看是相当珍贵的，它不仅是邦斯的同心圆镜，也是欧洲艺术生产界的同心圆镜。帕绮塔的闺房散发异国的风情，东方、印度、东南亚以及东印度群岛，奴隶女孩与殖民地的妇女，令人心醉神迷。蒙特里沃用来绑架朗热公爵夫人的房间，则充满了中古修士小房间的纯哥特式禁欲感。内部空间反映了某种外在世界的面向。

时间与空间的废止在巴尔扎克当时是人们相当熟悉的主题。这句话应该源自于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双韵诗句：

“上帝！让时间与空间废止吧／让恋人幸福。”<sup>52</sup>歌德（Goethe）在《浮士德》（*Faust*）中大量运用这类隐喻，到了1830与1840年代，这个观念广泛地与铁路结合在一起。这个词句很快就在欧美的思想界流行，当时有许多思想家正思索着新运输与信息交流技术（从运河、铁路到每日发行的报纸，黑格尔甚至将后者称之为晨祷的替代品）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会产生什么后果与可能。有趣的是，同样的概念也出现在马克思身上（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还隐而不显，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便明确表现出来）。马克思运用这个观念来表示资本主义在地理扩张与加速资本流通上所隐含的革命性质，同时也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周期性的“时空压缩”倾向。<sup>53</sup>

然而，巴尔扎克时常将这个观念，描绘成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崇高时刻，世上所有的力量全在此时内化于心智之中，并且成为单子化的个别物。这样的说法“看起来”具有强烈的天启性质，很难让人忽略当中的宗教意涵（巴尔扎克明显是在玩弄宗教、神秘主义以及秘术的力量）。不过，这个崇高时刻并非是个消极被动的时刻。伴随着时空废止而出现的令人目眩的洞见，为在这个世界的行动预留了空间。在《绝对之探求》（*The Quest of the Absolute*）中，玛格丽特（Marguerite）在与父亲激辩之后，做出下面的反应：

父亲走了之后，玛格丽特只是傻傻地站着，陷入迷惑之中，看起来仿佛整个世界已经从她身边溜走似的。她不再身处于熟悉的起居室，她不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她的灵魂插上双翼，往思想已经将时空废止的世界翱翔，而神圣的力量也将隔绝未来的面纱除去，眼前是一片坦途。对她来说，她整天都活在父亲攀登楼梯的脚步声里，而当她听到父亲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一股冷冽的战栗传遍全身。玛格丽特脑子闪过不祥的念头，她像一枝箭似的无声无息地奔往黑暗的楼梯，上去只看到她的父亲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头。<sup>54</sup>

不受时空限制的天启崇高时刻，让人既可掌握世界的整体性又能在世界中作出决定性的行动。这个崇高时刻明显（这一点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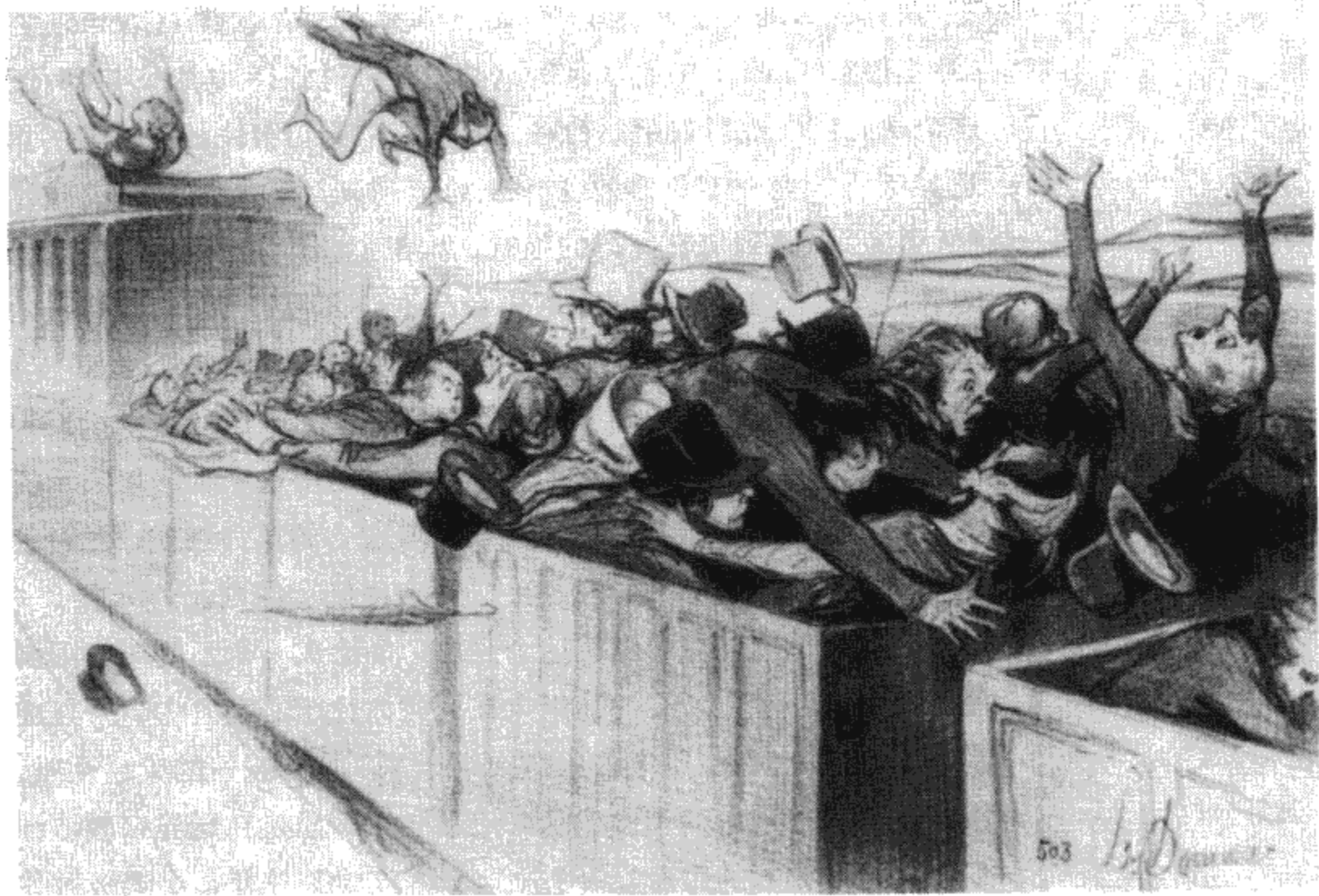


FIGURE-019

巴尔扎克对时空废止的强调，与1830和1840年代铁路的出现很有关联。这张杜米埃在1843到1844年所画的漫画，主题在于“推挤与紧压”，从画中可以明显看出当火车往前走时，乘客纷纷往后倒的窘态。

49 以从蒲柏的双韵诗句中看出) 联结着性激情以及对“他者”的拥有(恋人、巴黎、自然、上帝)。尽管如此，这个崇高时刻让巴尔扎克拥有某种概念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巴尔扎克无法将巴黎与巴黎之外的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提供野驴皮给拉斐尔的商人问道：“怎么会有人喜欢梦想破灭，胜过于随心所欲召唤世界的能力，迅速地游走四方不受时间的约束与空间的阻拦，拥抱与遍观所有事物的快乐，侧身于世界的边缘向另一个世界提出质问并且聆听上帝的声音？”<sup>55</sup>拉斐尔成长于一个“严格遵守时空规则而令人感到沉闷无比的家庭”。他因此深深地受到“热情具有废止时空的特权”的吸引。麻烦在于每当拉斐尔表达自己的欲望时，皮肤就会紧缩，因此也让他越来越接近死亡。他唯一能做的回应，就是谨守比他父亲加诸他的时空纪律更为严格的规定。由于移动是欲望的功能，因此拉斐尔必须将自己封闭在空间之中并且将严格的时间秩序加诸自己身上，以避免任何欲望的表达。<sup>56</sup>

50 资产阶级不断地想降低并去除时空藩篱，这种革命的欲望此时有了世俗的表现方式。巴尔扎克精心描述了资产阶级经商时的世俗面向。“大批的律师、医生、出庭律师、商人、银行家、大贸

易商”，他说道，必须“吃光时间、榨光时间”，因为“时间压制着他们；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而时间总从他们指间溜过，他们既不能拉长时间也不能缩短时间”。废止时空的驱动力无所不在：

人们拥有过多的能力废止只与自己有关的空间，完全将自己孤立于自己居住的环境之外，并且借由近乎无限的火车头动力来穿越遥远的有形的自然距离。我在这里并且有能力到别处！我依赖的不是时间，不是空间，不是距离。世界是我的仆人。<sup>57</sup>

想要废止时空的理想，显示资本家与资产阶级是如何建构他们所谓的崇高。征服时空和主宰世界（大地之母）成为许多资本家的幻想，然而这却是取代性欲望的一种崇高表现。这里也透露出重要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神话。对巴尔扎克来说，未来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瓦解到现在的时间当中，而这也是希望、记忆和欲望汇合的时刻。“对未来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现在的喜乐变成原来的三倍。”他写道。这是个人的启示与社会革命的巅峰时刻，是巴尔扎克喜爱和畏惧的崇高时刻。

---

## 巴尔扎克的整体观点

---

暂时废止时空的幻想让巴尔扎克采取了阿基米德式的立场来调查并了解世界，可能的话，甚至改变世界。巴尔扎克想象自己“在世界各地穿梭，随心所欲地安排万事万物……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世界，而世界完全不能羁绊我”。巴尔扎克顾盼自雄：“我思忖一个念头的产生需要多久的时间，手持罗盘，立于高耸危壁之上，脚下一百英寻处便是大海，浪花之下时而涌现巨浪，我寻找未来，为它添加艺术作品，就像工程师在空旷的地上建筑城堡与宫殿。”<sup>58</sup>这明显响应了笛卡儿的工程师与歌德的浮士德。动态与静态、流动与运动、内部与外部、空间与地方、城镇与乡村，这些词汇之间的辩证关系都可以研究与表述。

巴尔扎克努力想拥有巴黎。但他过于敬爱巴黎，将巴黎当成“道德个体”与“有知觉的存在物”，因而只想支配巴黎。他的占有欲并不是要摧毁或减弱巴黎。他需要巴黎来滋养他的意象、思



想与情绪。巴尔扎克无法将巴黎当成死物（如奥斯曼与福楼拜往后所做的那样）。巴黎拥有人格与身体。巴黎——“最令人喜悦的巨物”——经常被描绘成女性形象（引发巴尔扎克的男性幻想）：“与赤贫老太婆完全沾不上边的美女如新王朝新铸的钱币一样清新，其优雅的气质与巴黎另一个角落追求时尚的淑女不分轩轻。”巴黎“既悲伤又快乐，既丑陋又美丽，既活力十足又死气沉沉；对热爱巴黎的人来说，巴黎是有知觉的存在物；每个人、每栋房屋都是这个大娼妓细胞组织的一部分，而这个娼妓的头、心脏和不可预测的行为，对身处当中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但巴黎的脑子却是男的，是地球的思想中心，“是领导文明前进的天才；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创意无限的艺术家的深谋远虑的政治思想家”。<sup>59</sup>最后的产物就是整体观点——浓缩于巴黎相貌与性格的精彩描述中（例如《金眼女郎》的开场白）。我们不断被驱策着将巴黎视为一个整体，并且以整体的角度去掌握巴黎。看看引自《费拉居斯》的这段文字：

巴黎的街道、店铺招牌、工厂与大楼看起来就像是不断消逝的街景：微观下的巴黎只是一堆细小阴影、鬼魂与死人的集合……茱儿看着费拉居斯的脚，在塞纳—马恩省河长谷地中，在沃吉哈尔（Vaugirard）与默东（Meudon）的斜坡之间，贝尔维尔（Belleville）与蒙马特——真实的巴黎——包裹在烟雾的蓝色脏幕中，在日光下突然澄清起来。费拉居斯鬼鬼祟祟地俯瞰巴黎4万栋房屋，手臂从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纪念柱扫向伤兵院（Invalides）镀金圆顶：“都是因为爱看热闹的人乱挤乱推才让她在那里被偷走。”<sup>60</sup>

《高老头》末尾，拉斯蒂涅在同一片墓地：

看到脚下的巴黎沿着蜿蜒的塞纳—马恩省河两岸展开，住家的灯火闪烁，拉斯蒂涅的目光紧锁在旺多姆广场纪念柱与伤兵院圆顶之间。那块地方是他希望征服的花花世界。他看着发出嗡嗡声的蜂巢，眼神预告着他将前往掠夺，神情看起来仿佛他的唇已尝到了蜂蜜的滋味，他挑衅地说：“这是我俩之间的战争。”<sup>61</sup>

这种整体观点流行于整个19世纪。当奥斯曼开始重新塑造巴黎时，配备了气球与三角测量塔，并且同样以自己的想象将巴黎据为己有。然而这里有个重大差异。巴尔扎克妄想号令、穿透、分解巴黎，并且将巴黎的一切内化成他心中的知觉存在，至于奥斯曼则将幻想的驱动力转化成具体的阶级计划，在表述与行动的技术上完全交由国家与金融家来领导。有趣的是，左拉（Zola）在《猎物》（*La Curée*）中又重拾茱儿与拉斯蒂涅的视角，不过此时主角换成投机客沙卡尔（Saccard），他打算在投机热潮中割开巴黎的血管，大赚一笔（见页116，122）。

## “希望是欲望的记忆”

“希望，”巴尔扎克写道，“是欲望的记忆。”<sup>62</sup>记忆与欲望的联结有助于说明现代性的神话如何以强劲的力道到处流通。巴尔扎克的小说绝大多数都以历史为背景，并且把重点放在1814年王制复辟之后。巴尔扎克经常在小说中哀悼帝国在灾难性崩解之后，法国一直未能建立“真正”的进步主义贵族、天主教与君主制的政权。过去的遗产对巴尔扎克的影响很大。在他笔下许多人物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历史时代：他们被区分成“帝国的记忆与移民的记忆”。记忆因此被历史所扭曲，有时还与历史冲突。

这便是《夏倍上校》（*Colonel Chabert*）的主题。<sup>63</sup>一位皇帝钟爱的著名军事人物，却被遗弃在日耳曼埃劳（Eylau）战场上等死。他被剥光衣服扔到乱葬坑里，却奇迹般地从死人堆中爬了上来，被附近村民所救。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完全丧失记忆，面容枯槁之下没人相信他的真实身份。夏倍往巴黎方向走去，但走到半道却被当成疯子拘禁了两年，一直到他停止称自己夏倍上校才获得释放。夏倍回到巴黎已是复辟之后，他寻求法律援助以恢复自己的身份与权利。皇帝——夏倍的保护者——已经死了。夏倍被认定死亡，个人资产被分光，妻子改嫁侯爵还生了两个小孩。有位律师正好担任伯爵夫人的代理人，禁不起说服而接下夏倍的案子，不过他敦促夏倍最好能够妥协，不要试图通过冗长而昂贵的法院途径来主张之前他所拥有的权利。夏倍的妻子拒不认他。在难以

忍受的对峙中，夏倍提醒她，最初是他带她出皇宫（娼妓的居处）的。她把夏倍赶到乡村别墅，并且利用自己身为女人与母亲的立场说服夏倍放弃诉讼（看在小孩的份上），与此同时，她则密谋将夏倍送到疯人院去。夏倍听到消息后随即逃逸无踪，数年后，律师回想起来只认为这是桩无赖汉假冒案。1840年，夏倍化名雅辛特（Hyacinthe，他不再使用夏倍这个名字），终老于毕塞特（Bicêtre）收容所中。夏倍已经抹去所有与他妻子有关的记忆，但仍然自豪地提起当年战场上的英勇，借此来获得另外一种身份。他已经没有任何欲望，因为历史力量与社会制度已经将他击倒。即便律师也感到幻灭。夏倍说，教士、医生与律师都穿上黑袍，“因为他们哀悼美德与希望的死亡”。律师自称已经“厌倦巴黎”，便决定退休，与妻子回到乡村居住。

《夏倍上校》末尾又再度出现田园式的乌托邦主义，显示巴尔扎克一直觉得自己可能跟乡愁一起输掉这场战争。为了要概念化与表述巴黎，就必须解决最麻烦的问题，即克里斯蒂娜·布瓦耶（Christine Boyer）所说的“臭气冲天的乡愁”。<sup>64</sup> 巴尔扎克的失败并非孤证，而是普遍现象。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他反对乌托邦主义，因为乌托邦主义经常往后看而非往前看，对革命有害：

死人的传统对于活人的脑子来说就像是噩梦。当他们努力革新自我与周遭环境，创造前所未见的事物时，面对革命危机，他们竟焦急地求助于过去的幽灵，借助由来已久的名号、呐喊以及服饰来变换自己的外表及语言，以呈现出新世界史的景象……19世纪社会革命不能援引过去的诗歌，它的目标应该是未来。除非剥去所有跟过去有关的迷信，革命无法开始。<sup>65</sup>

然而，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马克思在主张意识的真正基础在于实际日常生活的物质条件时，却也认为革命人士应该自由创作未来的诗篇，并且任由自己的想象力建构世界，他要如何在两者间自圆其说呢？

巴尔扎克对这个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区别历史（受到排列与铺陈）与记忆（潜在且未经整理，但会出其不意地爆发）。<sup>66</sup> 夏倍应该屈服于官方的死亡纪录并且抹去自己的记忆，然而这么做

却让他成了疯子。蒙特里沃在《朗热公爵夫人》中也必须面对同样的教训：“只有完全牢记我们是谁”，才能抵御由生返归到死的过程。本雅明在此采取批判立场。他攻击历史主义在普世史中“借由同质而空洞的时间”来铺陈自身达到极致的过程。布瓦耶在解释本雅明的话时提到，我们应该注意历史“需要从划一的形式中解放，这种划一形式泯灭了历史差异，并将历史变成前后一致的叙事”。本雅明写道：“以历史的方式来陈述过去，并不表示‘如实’（兰克[Ranke]）呈现过去，而是抓住历史中的某个时刻。”这意味着“记忆与历史相反，记忆所响应的总是比实际记录多，它以意料之外的方式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像夏倍上校提醒妻子的那个关键时刻，让她想起自己的出身来自皇宫附近。布瓦耶认为，在本雅明的世界里，“对自然形成的传统链接的记忆如同救世主在危机时刻突然显现，指出一条通往未来世界之路”。巴尔扎克则认为，记忆是“唯一能让我们活下去的能力”。<sup>67</sup>记忆是主动与充满活力的，是自发且具想象力的，而非冥想与被动的。记忆可以通过当下的行动将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合为一体，如此便可如本雅明所说的，在危险的时刻爆发。记忆将潜藏于过去的力量带到当下，如果没有记忆，这些力量只会在我们的脑中继续沉睡。

记忆也可以集体运作。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曾写道：

54

巴黎本身即是巴黎市民的集体记忆，巴黎跟记忆一样，联结着事物与场所。巴黎是集体记忆的处所。处所与市民的关系乃是城市最特出的建筑与景色，而随着某些人造物成为城市记录的一部分，新的人造物也出现了。从积极正面的意义来看，伟大的观念流经巴黎的历史并且塑造了巴黎。<sup>68</sup>

巴尔扎克勤奋地在“人间喜剧”中建立这种联结。他补充并且强调伟大观念流经了巴黎历史。巴尔扎克使巴黎令人难忘，并且运用想象力将巴黎建构成一个集体记忆的特殊处所，如此便为革命时刻“闪现”的政治敏感度奠下基础。当根植于巴黎的革命性转变出现时，现代性的神话也浮出水面。记忆“闪现”于1830年，如其闪现于1848与1871年一样，在革命情感的表达上扮演着关键角色。<sup>69</sup>这几次的革命无疑都负载着传统的诉求，但另外也有

人强力主张与传统决裂的现代主义，要求走出完全不同的未来道路。因此，并不是希望引导记忆，而是记忆与欲望联结在一起时产生了希望。也许就是基于这个理由，雨果与波德莱尔才会认为巴尔扎克是革命思想家，尽管他具有反动的政治观。

---

## 拜物教与漫游者

---

要把巴黎表述为有知觉的存在，不只有拟人化（巴尔扎克就肆无忌惮地这么做）的危险，而且也可能将巴黎变成拜物教的对象。首先，“拜物教”指人类有一种习惯，认为某些事物（在这里指巴黎）具有可以形塑和改变世界的神奇、神秘且通常是看不见的力量，会直接影响乃至决定我们的生命。巴尔扎克许多小说所描绘的都市环境似乎就具有这样的特质（例如《高老头》中的伏盖夫人）。不过，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挖掘出拜物教更深层的意义，拜物教具有真实基础，并非出于想象。我们借由生产与流通各项物品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物质来促成社会关系）。同样，这些物品也暗示着某种社会意义，因为它们是社会劳动与有目的的人类行动的具体成果（物质具体显示并表述了社会关系）。对马克思来说，逃脱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市场运作的方式。例如，金钱（一种物品）赋予金钱持有者社会力量，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种拜物教力量的俘虏（追逐金钱和承认金钱价值，乃是理解人际行为的核心）。马克思因此认为，分析者的任务乃是超越拜物教、穿透表象，更深入地理解规范社会关系演进与物质希望的神秘力量。“如果一切事物都跟表面上看来一样”，马克思说，“也就不需要科学了。”我们无法抹灭拜物教（除非通过革命），但可以面对并理解它。然而，如果我们单以表象来诠释世界并且在思想中复制拜物教，那么永远也无法去除危险。<sup>70</sup>

资本主义的巴黎必定属于后者这种拜物教对象。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它建筑在商品流通之上，也在于巴尔扎克所经常主张的，每个人“都在无情女神的鞭策……急需用钱之下”不断来回奔走、跳跃，并且被“我们称之为投机的怪物”所吞噬。街道、邻里、公寓、楼梯和门口都隐含着社会意义。巴尔扎克将街道拟人



化以强调这个事实。内部空间将外在的社会力量予以内部化，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力量。巴黎居民经历了混乱、湍急的人潮、各种社会互动与偶然的相遇，面对陌生的事物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脚步与心态（例如培养麻木不仁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显然无所不在，社会关系便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各项物品之中。任何物品的重新制造都将造成社会关系的重新排列：在建造与重建巴黎的过程中，我们也建造与重建了自我，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把巴黎想成有知觉的存在，等于承认巴黎隐约是个身体政治体。

在巴黎生活总是不断屈服于巴黎的拜物教力量。吕西安（《幻灭》和《交际花盛衰记》）、伏盖夫人和高老头（《高老头》）、阿黛儿（Adele，《贝姨》）、邦斯（《邦斯舅舅》）和赛查·皮罗托，还有许多人都是拜物教力量的受害者。但巴尔扎克和其他他所创造的角色如拉斯蒂涅、德·马赛和“十三人社”的其他成员，都试图飞越拜物教——理解、面对甚至支配拜物教。巴尔扎克妄想废止时间与空间，显示他决意找出阿基米德支点以逃脱拜物教，并且命令和改变都市世界。对巴尔扎克来说，废止时空乃是准备戏剧性地和具洞察力地介入这个世界，而非准备以冥想的方式来退出这个世界。崇高的洞察时刻所达到的澄澈心态，必须与其他能穿透巴黎拜物教的做法联结，否则将沦为神秘主义。

所谓的其他做法要通过漫游者才能实现。巴尔扎克有时被认为是漫游者这种文学人物的创造者（不过证据显示这种人物至少在帝国时期，也许还要更早就出现了）。<sup>71</sup>巴尔扎克最早的作品《婚姻生理学》（*Physiology of Marriage*，许多人认为这是“人间喜剧”的滥觞）中呈现出这样的人物：

1822年，一个美好的1月早晨，我沿着巴黎大道从宁静的沼泽区走到时尚的昂坦道区，第一次看到——其中带有某种哲学的趣味——服饰与脸孔的奇妙变换，从骡步街（Rue du Pas-de-la-Mule）到玛德莲教堂（Madeleine），大街的每个部分都自成一个世界，足以代表巴黎各区不同的风俗习惯。我前去与大学朋友共进午餐，他已经有了家累，而且还生了两个小孩（也许太早了点），我不晓得生命将为我预备什么，也未曾怀疑有一天我将会大胆地走进婚姻。我那年迈的数学教授就住在朋友家附近，我暗自

承诺要在与友人宴会之前先去探望这位卓越的数学家。我很快就找到通往大书房的路，书房内覆满了灰尘，显示学者孜孜不倦地从事于研究。此时有件令人吃惊的事正等待着我。<sup>72</sup>

巴尔扎克的漫游者不只是审美家、到处游荡的观察者，他同时怀有目的、企图挖掘出巴黎社会关系的秘密并且穿透拜物教。巴尔扎克描绘自己属于“极少数的皈依者，在行走时绝对全神贯注”，“啜饮和玩味着巴黎，熟悉巴黎的生理结构，知道巴黎脸上每一颗疣、痣和面疱”。这种构想带有一点民主和反精英的色彩。每一个人都可以扮演漫游者，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超越和逃脱拜物教。而这就是巴尔扎克不断主张要检视巴黎和搞清楚事情的重要之处。“置身于这座永不止息的万城之后的心脏地带，难道你还会吝惜时间，不注视那些足以引起你注意的戏剧、灾祸、绘画以及有趣的偶发事件？”当你“穿过这座巨大的灰泥笼子”时，“看看你的四周”，“人类蜂窝以黑色细流区隔，并且依照各自移动、翻搅及酝酿的观念来分野”。不只是男人可以这么做。例如，希波夫人在探索巴黎的空间与社会关系（在艺术收藏家、公寓管理员、贵族、律师……之间游荡）就怀有特定目的，她想编织一张阴谋之网让邦斯陷进去，好让他的艺术收藏曝光。巴尔扎克笔下的漫游者胸怀目的而且主动，并非毫无动机随处晃晃而已。

57 巴尔扎克的漫游者（或女漫游者）绘制巴黎的地形，并且唤起了巴黎的生活特质。巴黎因此变得特别容易辨识。巴尔扎克唤醒了“成千流离失所的生命”，而在他最具全景性的小说中，如《贝姨》，他将漫游者融进巴黎这个知觉存在的强制召唤之下。“人间喜剧”借由无数彼此交涉的生命片段——拉斯蒂涅、贝姨、德·马赛、纽沁根、希波夫人、伏脱冷——而抓住巴黎的整体。“整个系统，”詹姆森写道，“假设社会彼此依存的关系是存在的，然而这种关系无法直接从外表看出……各个角色、事件巧合、会面、激情之间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这些关系纵然存在，但我们却无法意识到。”这种技术是万花筒式的。“借由这种技术，”詹姆森继续说，“巴尔扎克可以更贴近个人经验，我们总是受限于自己的个人世界，尽管如此，我们绝对相信还有一个外在表面，让我们的个人世界与他人的个人世界彼此共存。”这就是巴尔扎克同时处理巴

黎各层面的世界并将其表述为拜物教对象的方式。<sup>73</sup>

波德莱尔坚称巴尔扎克既是幻想作家也是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对巴黎所采取的社会观点，逐渐（或已经）受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金融家阶级以及国家（与金融家结盟）的限制，巴尔扎克坚毅而无助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奋战。然而巴尔扎克颇有先见之明，他悲伤地做出这样的预言：“当文学缺乏一般系统的支持时，它就欠缺坚实的基础，随着时光流逝，它也将灰飞烟灭。”<sup>74</sup> 如果资本不愿巴黎拥有形象，那么巴尔扎克式的奇想与民主化的绘图力量就会被销毁抹灭（往后几年经常发生这种状况）。但我们还是得以挖掘出巴尔扎克的观点。这不仅仅是一时的兴趣而已，巴尔扎克的技巧其实带有颠覆的性质，它与一般表述的被动形式完全不同。巴尔扎克看穿了资产阶级的内在深层价值，因此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神话。他仔细观察周遭环境的细节以及巴黎的内在有形特质如何影响社会关系，以此来了解社会关系表现的方式。巴尔扎克揭露了对农村出身与农村记忆的否认。他显示以货币计算、资本虚构形式的虚假（例如信贷与利息，这两者驱动了社会关系和都市过程）、不断在他人的欲望上投机（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为基础的价值是完全空洞的。巴尔扎克也常常提到统治者的想法与恐惧。当资产阶级看似无休止的资本累积时代，以及利息与信贷的虚构魔术突然中止的时候，巴尔扎克无意间写了一篇恰到好处的墓志铭：“我用我的思想来包裹世界，铸造世界，塑造世界，穿透世界，掌握世界，或自以为自己能掌握世界；然而我突然独自醒来，发现自己处于幽暗光影深处。”<sup>75</sup>

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改动原文，并且运用巴尔扎克的能力，以个人的思想投射出资产阶级世界的同心圆镜：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思想来包裹世界，铸造世界，塑造世界，穿透世界，掌握世界——或自以为自己能掌握世界；然而他们突然独自醒来，发现自己处于幽暗光影深处。

# 梦想身体政治：革命政治学与 乌托邦构想，1830—1848

59

昨日美丽的乌托邦，将成为明朝振奋人心的事实  
——第一次共产党大会闭幕演说，贝尔维尔，1840年7月1日

在《现代生活的绘画》(*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中，艺术史家克拉克(T. J. Clark)认为奥斯曼对于第二帝国巴黎的重新形塑，背后仰赖的是资本主义对于巴黎是什么与巴黎会是什么的再想象。克拉克指出，资本“并不需要地上的砖瓦或祭坛来呈现自我，也不需要城市居民的心里铭刻地图。人们甚至可以说，资本宁愿让巴黎失去图像——不具形式、难以想象、无法阅读与误读、无法产生空间主张的冲突——然后再大规模生产自己的图像以取代原先资本所摧毁之物”。<sup>1</sup>这个说法相当有趣，但克拉克在谈到商品化机制与景观取代过去景物的同时，却对被取代的巴黎景象少有着墨。

60

1830与1840年代在法国大为流行的浪漫主义与社会乌托邦主义，在1848到1851年间的反革命浪潮中受到全面打压。许多积极参与1848年革命的社会运动者都遭到杀害、放逐或打击的命运。不可否认，1848年以后整个法国境内的气氛为之一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于政治斗争都有了新的看法。例如，社会主义变得更“科学”(如马克思所坚持的)，不过这个观念要取得成果还需要一个世代的努力，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则变得更实证主义、更具管理性格且更为冷酷。对一些评论家来说，这就是现代性和现



FIGURE-020

杜米埃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1848)捕捉到当时人们所感受到的基本特征。静态而肥胖的资产阶级贪婪地看着橱窗中的商品,至于行进中的干瘦工人则专注看着报纸(工人报?)找寻灵感。

代主义的转折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帝国巴黎所发生的故事,同时也是1848到1851年反革命时期各种复杂而充满压迫、毁灭或收编的故事。一般民众,特别是进步派人士,是如何看待和想象1848年之前的巴黎与社会呢?他们能预见到未来的演变吗?帝国要竭力对抗的又是什么?

## 共和国以及巴黎身体政治

61

1848年10月22日,约有8000名工人前往波尔多公墓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由民众捐款建成的)前举行纪念仪式。1844年,弗洛拉在出版了她最有名的著作《工会》(*L'Union Ouvrière*)后不久,就死于波尔多。弗洛拉在书



中大声疾呼总工会的组成应该连同妇女解放一同进行，像她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先驱能在1848年成为人们景仰的对象，似乎有点出人意表。不过这个事件还具有另一层意义。1789年以降，共和国、革命，特别是自由，都被描绘成女性形象。这与中古时代晚期以来王权统治的政治理论恰恰相反，传统政治理论认为国家与民族是由坎托罗维奇（Kantorowicz）所谓的“国王双体”（the King's Two Bodies）所构成——国王一方面是人，一方面是国家与民族的化身。<sup>2</sup>法国大革命期间，国王形象与“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受到激烈的嘲讽。将自由帽——弗里吉亚帽（Phrygian cap）套在国王头上，用来表示他的无能（下垂的帽尖就像无法勃起的阴茎一样）。杜米埃，一位坚定的共和派人士，曾因粗鲁地将路易·菲利普描绘成加冈图瓦（Gargantua，这个臃肿的家伙靠着广大的贫苦工农喂食，王座之下则庇荫了一群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于1834年被捕入狱。阿居隆（Agulhon）精彩地描述了19世纪的形象斗争过程。<sup>3</sup>在1830年革命中，自由与革命的动机又再次以醒目的女性形象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1848年后，类似画作在法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反共和派人士也用女性形象来表达他们的意念，只不过他们将女性描绘成呆子（如法国的“玛丽安娜”[Marianne]王后）或者是放纵、淫荡如同娼妓一般。拥有身份地位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比较欣赏穿着古典服饰举止合宜的静态人物图像，图像周围则环绕着正义、平等与自由等必要象征（这种图像形式最后表现在法国赠送给纽约市的自由女神像上，见图117）。革命分子则期待从图像中得到更多灵感。巴尔扎克在《农民》的凯瑟琳（Catherine）人像中捕捉到这点，

（凯瑟琳）令人想起画家与雕刻家为了自由女神像和理想中的共和国所找来的模特儿。她的美，赢得了年轻男性的宠爱，有着同样的成熟韵味。她有着同样强壮而又柔软的身体，同样肌肉发达的下肢，圆胖的手臂，眼中闪烁着火花，骄傲的神情，发丝浓密而虬蟠，男性化的前额，赤红嘴，微笑的双唇朝后卷起，散发出一股凶残的气味——德拉克洛瓦和戴维·当杰（David d'Angers）捕捉了这种笑容并将其转化成一种赞美。容光焕发的褐发棕肤女



FIGURE-021  
杜米埃的《加冈图瓦》  
(1834) 精确地表现出身体政治的观念，臃肿的路易·菲利普一面接受臣民的喂食，一面保护王座底下的资产阶级食客。这幅讽刺画让杜米埃蹲了六个月苦牢。

性，人民的形象，叛乱的火焰似乎就要从她清澈的茶色眼睛喷出。<sup>4</sup>

福楼拜采取了否定观点。在《情感教育》中，他描述了1848年入侵杜伊勒里宫期间所目击的情景：“在入口大厅，有个妓女站在成堆的衣服上，摆出自由女神的姿势，她睁大眼睛，全身不动，令人不寒而栗。”<sup>5</sup>

杜米埃的作品是从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为了响应1848年共和政府的邀请，杜米埃参加了绘制共和国象征的绘画比赛——因此具有双重的趣味。共和国身体政治不仅被表现为女性形象，而且还被赋予了强而有力的母性特征（其实以当时的状况来说，不画成女性才令人惊讶）。杜米埃描绘的是一个养育人民的社会共和国，与资产阶级权利的政治象征或街垒妇女的革命象征大异其趣。杜米埃回应了丹东（Danton）的革命宣言：“面包之后，人民最需要的是教育。”这种养育性的身体政治版本深植在1840年代的左派社会主义和乌托邦计划中。

理想共和国的想象与理想城市的想象两者密不可分。福柯（Foucault）写道：“有一长串的乌托邦或计划是在这个前提下发展

起来的，即国家就像座大城市。”其实，“像法国这么大的国家，政府最终应该以城市为模型来看待它的领土”。<sup>6</sup>从历史来看，这种联结始终非常强烈，而对当时的激进分子与社会主义分子来说，这两者很明显是同一种东西。例如，圣西门分子对于物质和社会工程特别感兴趣，因此便全心投入于新社会和空间形式的生产上，如铁路、运河和各种公共工程。而他们也没有忽略都市发展的象征向度。迪韦里耶（Duveyrier）于1833年所描述的“新城镇或圣西门分子的巴黎”（The New Town or the Paris of the Saint-Simonians），“以巨大的女性雕像（女性弥赛亚，母亲）为神庙，作为城市的核心建筑；这是个庞大的纪念碑，袍子上的花环可以当成散步长廊，而长袍的折痕则成了用来游戏与设立旋转木马的圆形竞技场的墙壁，至于女神右手所持的地球则是个剧院”。<sup>7</sup>虽然傅立叶主要的兴趣是前工业时代的农业共同体，不过他也发表了相当多有关都市设计与计划的看法，并且不断抱怨城市令人心惊的状况与都市生活的堕落形式。1840年代，几乎没有例外，社会

FIGURE-022

德拉克洛瓦的著名画作《自由引导人民》将自由之神描绘成街垒中的妇女。这幅画原本是用来庆祝国庆节，路易·菲利普就是在这一天登上王位，然而这幅画也煽起了民众的情绪，因此国王便买下这幅画并加以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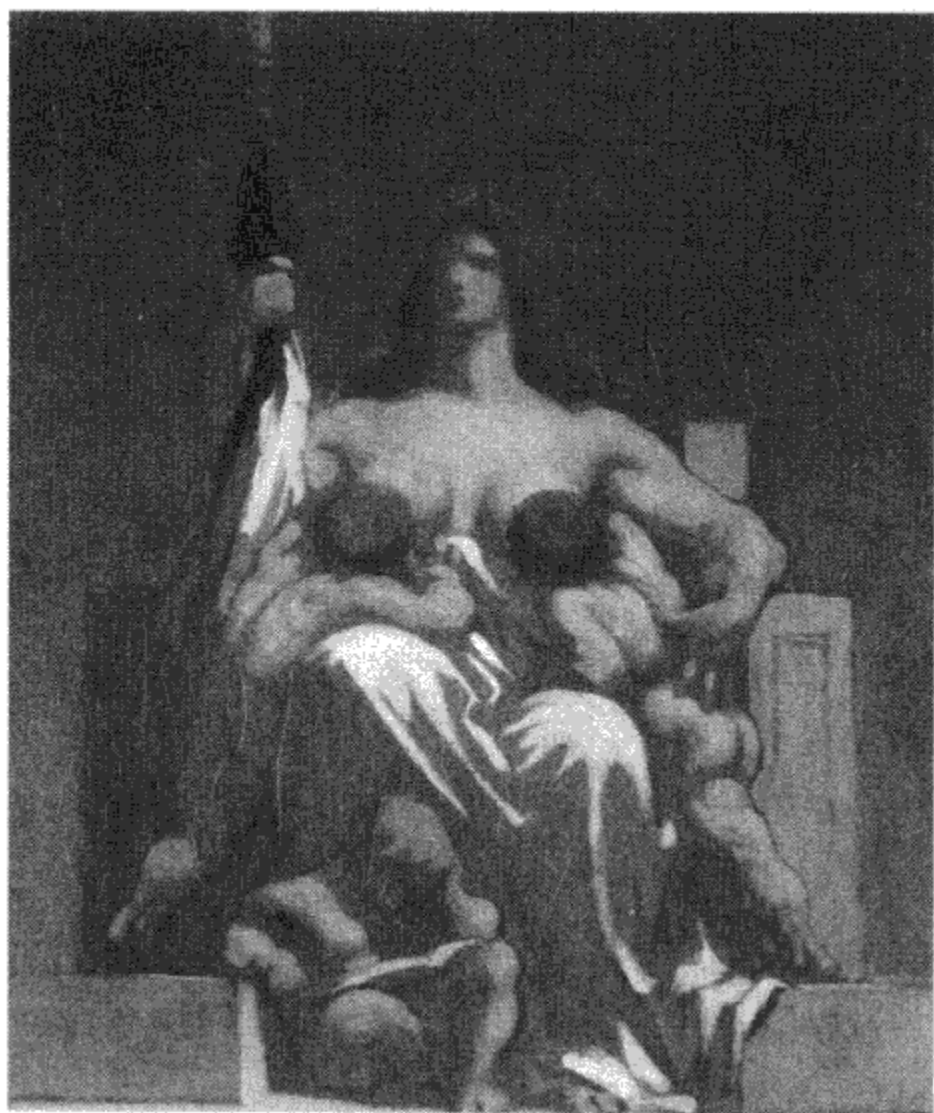


FIGURE-023

革命政府希望有赞扬共和国精神的新艺术作品出现，因此杜米埃创作了《共和国》。两个精力充沛的婴孩吸吮着她的乳房，另一个婴孩则抱着一本书坐在她的脚边，杜米埃表现出喂养人民的身体政治，并且严肃表达了丹东的名言：“面包之后，人民最需要的是教育。”

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与改革者全都注意到城市是一种政治、社会与物质组织的形式——如同身体政治——是未来好社会的基础。如人所预期的，建筑与都市行政开始受到巨大冲击，塞萨尔·达利（César Daly）的巨大身形开始将观念转化成建筑形式与实际计划（当中有一些在1840年代开始动工）。<sup>8</sup>

对共和国与城市的思考，两者间的联结越来越清楚，但身体政治的实际构成与治理方式，其中的细节却消失在混乱当中。从1820年代开始，思想家团体形成、组织、不合，然后分裂，只留下碎片般的思想供人捡拾，然后再重组为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派系化与碎裂化、分裂与重组不断进行着。理性启蒙运动原则结合了浪漫主义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科学虽然受到热烈欢迎，但也被赋予了空想、近乎神秘主义的地位。现实的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混杂了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渴望思想能大一统的思想家（如圣西门与傅立叶）只留下混乱的作品，几乎无法从中推论出任何结果。政治领袖与思想家为权力与影响力而彼此倾轧，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与过度的虚荣心则夺走了他们的生命。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思想也进行无数次调整，使1848年的观念与1830年相比大不相同。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思想乱流呢？

65

浪漫主义与基督教神秘主义，科学虽然受到热烈欢迎，但也被赋予了空想、近乎神秘主义的地位。现实的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混杂了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渴望思想能大一统的思想家（如圣西门与傅立叶）只留下混乱的作品，几乎无法从中推论出任何结果。政治领袖与思想家为权力与影响力而彼此倾轧，人与人之间的敌对与过度的虚荣心则夺走了他们的生命。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思想也进行无数次调整，使1848年的观念与1830年相比大不相同。如此一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思想乱流呢？

## 让世界回归正轨

“现存的这个社会，”圣西门在1819到1820年的某个时刻说道，“实在是个混乱失序的世界。”<sup>9</sup>当然，唯一改善情况的方式就是重新让社会回归正轨，这暗示着某种形式的革命。然而圣西门痛恨革命的暴力（他差一点就上了断头台）并且倾向于和平、渐进与理性的变革。他说，身体政治病了，需要复苏。但最终结果还是一样：世界需要回归正轨。



这种混乱失序的世界感——克里斯托弗·希尔 (Christopher Hill) 曾经有过精彩描述——早在1640到1688年之间就已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轰轰烈烈地出现，在这段期间，克伦威尔 (Cromwell) 不仅夺取了权力，还处死了英王查理。<sup>10</sup>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1830到1848年充满了投机与实验的法国。1830到1848年间，乌托邦、革命与改革的观念大为流行，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法国大革命留下了双重遗产。一方面，对于理性、权利与启蒙的恶感极为强烈，但却又急需与这些原本要非难的对象妥协。在这一点上，1840年代的历史学家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做了出色的历史分析并且保留了原本将会流失的历史记忆。但革命也为“人民”（无论这个词真正指的是谁）留下了改变现状的可能，即动员集体意志，尤其是在巴黎的身体政治之内。1830年革命证明了这个能力，而有那么一段时间，看起来仿佛立宪君主制与资产阶级权利，可以如1688年王位继承后的英国一样彼此合作，将共和派排除在外。然而幻灭随之而来，金钱贵族从世袭贵族手中取得权力（伴随着许多宪法自由的倒退，如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引爆了负面思考（杜米埃粗鲁地将路易·菲利普描绘成加冈图瓦）。结果让共和派的力量再度兴起。不过在这背后逐渐浮现另一些急迫问题——折磨人的贫苦与不安全感，如癌症似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工作与劳动如何能完善地组织起来以减轻日渐集中于大城市（如巴黎和里昂）的受压迫农民与新兴工业工人阶级的命运。这个问题在工人与进步派知识分子当中刺激出社会主义思想。

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例如，弗朗索瓦·巴贝夫 (François Babeuf) “平等者的共谋” (conspiracy of the equals) 就宣称经济与政治的社会主义是法国大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法国大革命“只会是另一场革命的开始，一场更大、更神圣且是最后一场的革命”。巴贝夫试图以武力推翻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但却在1791年督政府 [Directory] 的命令下上了断头台，成了革命烈士）。博纳罗蒂 (Buonarotti)，巴贝夫的共谋者，由于他是意大利人，因此逃过上断头台的命运。1828年，博纳罗蒂完整地将他与巴贝夫的阴谋出版（内容应该美化了不少），后来使马克思与列宁认为巴贝夫是革命共产主义的先驱（罗斯 [Rose] 认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sup>11</sup> 武装革命是布朗基几次欲阴谋复兴的传统，如四



季社 (Société des Saisons) 就曾在1839年企图推翻七月王朝未果。该秘密会社的誓词主张, 贵族“之于社会身体, 有如癌症之于人的身体”, “社会身体返归正义的首要条件便是铲除贵族”。革命行动、消灭君主制与贵族, 以及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共和政府, 是让社会身体摆脱“腐烂状态”的唯一方式。<sup>12</sup>

布朗基在这个论证之上另加了两项自己的看法。当布朗基于1832年因阴谋不法而被逮捕起诉时, 他在充满疑心的法院院长面前宣称他的职业是“无产阶级”——这是“3000万法国人的职业, 他们靠工作过活并且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布朗基在辩护时, 呼吁发起“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 并且当众抨击“无情的机器一个接一个地碾碎了2500万农民与500万工人, 抽取他们最纯净的血液, 注入特权阶级的血管中。机器的齿轮, 以最惊人的技术组装起来, 二十四小时不断运作, 逼迫穷人只能过着仅能维持其卑微生命的生活, 所有的愉悦也都成了悲惨, 连剩余的一丁点收入也要取走一半”。布朗基憎恨乌托邦蓝图, “没有人能接近未来的秘密,” 他写道, “革命清除障碍, 展现地平线, 并逐步揭开面纱, 开辟道路与小径, 通往新的社会秩序。那些佯装口袋装着未知世界完整地图的人, 他们是真正的疯子。”<sup>13</sup>布朗基的确有改造计划。发动革命者绝大部分是失去社会地位的激进分子, 他们必须取得国家权力并且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建立独裁政权, 以教育群众使其拥有自治的能力。布朗基并没有入狱, 他不断地进行革命阴谋, 灌输恐惧给资产阶级, 尤其是共和派人士。本雅明说, 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 布朗基才终于“绝望地罢手”。他默认社会革命的步调无法跟上(也许根本不可能跟上)19世纪物质、科学与技术的变迁。<sup>14</sup>

圣西门(死于1825年)和傅立叶(死于1837年)提供相当不同的观点给社会主义/改革派, 他们主张的是反对革命的乌托邦思想。这两位关键人物在寻求其他做法的同时, 也不忘反省革命的错误。他们留下的遗产充满对普世性的渴求(他们两人都自比牛顿), 然而作品的内容却不完整, 经常让人混淆, 因而形成多重的诠释。

一般来说, 圣西门被认定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创立者。<sup>15</sup>他认为, 分析者的任务在于研究社会的真实状况, 并且要从基础上

认识该做什么才能让身体政治进入较和谐且具生产力的状态。因此，他的作品都以公开的信件、小册子或备忘录的形式展现，并且都会呈交给有影响力的人物（国王、外交使臣等）阅读。要从这些文献中整理出通则是相当困难的事。而从1802年开始，到最后未出版的有关新基督教的作品（圣西门死后，于1826到1827年出版）为止，圣西门的著作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动的状态。

圣西门认为，身体政治在过去拥有和谐的形式（如12世纪、13世纪的封建主义），后来因为出现矛盾而瓦解，然而从矛盾中又诞生了新的身体政治。新身体政治的种子存在于旧身体政治的子宫中。这种具有历史性的人类演化观点影响了日后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圣西门所处的时代，身体政治出现了危机，因为“封建的教会体系在往工业与科学体系”过渡时并不是进行得很完全。<sup>16</sup>法国大革命提出世袭特权的问题，但雅各宾派（Jacobins）却因为试图以中央集权的力量来推动立宪与司法权力而失败。他们诉诸恐怖和暴力来遂行自己的意志。圣西门写道，“18世纪是批评的与革命的”，但19世纪必定是“创造的与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于工业者（the industrial）——圣西门认为，只要是参与有益的生产活动的人就可算是工业者，如工人与农人、企业主、银行家、商人、科学家、思想家与教育家——工业者被闲散且寄生的贵族与教士阶级所统治，这两个阶级的心态源自封建主义的军事和神权力量。

68 宗教的权力应从教士移转到学者——科学家与艺术家——手中，而世俗的权力则应交给工业者当中的领导分子。后者的兴趣将会是把政府的干预降到最低，并且设计出成本最小、效益最高的行政组织，以促进直接生产者的活动。政府的功能在于确保“有用的工作不受阻碍”，因此因袭颀颀的政府应该让出权力给有效能的行政组织。这个体系应该更进一步推广到全欧，而不只局限于一国之内（圣西门之所以有名，部分原因在于他预见到欧洲要发展和平进步的经济组织，就必须成立欧洲联盟）。“所有人都要工作”，圣西门早在1803年就如此宣布，而且如果要治好社会身体的病，我们就必须诉诸适当的生产组织与有用的工作。他强调个人进取心与个人自由，有时候似乎也响应了许多政治经济学者的自由放任理想（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

然而圣西门关心的是政治制度的确切性质，特别是能将个人自由予以最大化并且通过集体计划来促进有用工作的政治制度。虽然圣西门经常提到涵盖所有工业者的大型社团理想（里面包括了工人和农民，以及雇主、金融家和科学家），但反映劳动分工的社团原则还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圣西门建议政府要建立三个部门，分别由工业者选举产生——发明部（由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组成，负责计划公共工程系统，如运河、铁路和灌溉设施，务使其能“涵盖所有法国境内的良田美地，达到让法国富庶、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目的”）、执行部（由科学家组成，负责检视计划的可行性和组织教育机构），以及审查部（由工业者组成，负责决定预算并执行大规模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sup>17</sup>

圣西门并不认为工业者具有同构型。但他也不相信工业者之间的分工能让所有工业者拥有共同的利益或引导他们反对权力科层。生产者、银行家、商人、科学家和艺术家往往以群众是无知的为借口（因此教育大众是当务之急），径自在权力科层中做决策。所谓“天生的领导人”是根据技术能力与所作的贡献来定义，“依据能力来分配职位，并且论功行赏”。人民主权并不是一项有利于统治的原则，“人民心知肚明，除非做白日梦，否则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统治”。圣西门也相当关注道德动机的问题。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自利相当重要，但如果要让经济能实现集体目标，就应该以其他的动机来改善利己主义和自利。这正是基督教一直想做但从未做到的事。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新基督教形式，必须如同政治经济的计划目标，实现普世性的幸福。“四海之内皆兄弟，”圣西门说，“社会上所有分子应该一起努力改善最贫穷阶级的道德与物质存在。”<sup>18</sup>为此，圣西门开启了通往千禧年思维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水闸，并以此为剧烈变革的基础。

圣西门的观念如何传播出去，这是段复杂的故事。圣西门最亲近的追随者，在他死后选择（有人认为经过删改）一些可以传达他观念的篇章出版，七月革命（圣西门分子并没有积极参与七月革命）之后，人们开始对圣西门的思想产生兴趣。1830年代初期有许多会议吸引大批民众参加，这些会议获得改革派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支持，并且发起了教育工人的运动，不过朗西埃认为，许多工人其实并不欣赏这场运动的动机与父权心态。<sup>19</sup>1830年代初

期，有人开始为工农争取工作权，并且组织团体以减轻工农的贫困与不安全，这些人或多或少接触过圣西门的观念。许多有关新都市形式的想法，都是受到圣西门的影响（随后说明）。然而，妇女与宗教逐渐成为争议性议题，于是工人教育运动便分裂成两支，一支以深具领导魅力（有人说他会催眠术，实则是假托上帝的旨意）的巴泰勒米·昂方坦（Barthélemy Enfantin）为首，另一支则由较不狂热的圣阿芒·巴扎尔（Saint-Amand Bazard）领导。影响所及，整个运动开始四分五裂，但运动的能量却大量虚耗于宗教性的仪式活动上。圣西门派的女性主义者在离婚和组织妇女工作的议题上发展观念（有时与傅立叶主义接触）。她们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势力大到成为杜米埃讽刺画里的主题，而她们在1848年革命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些圣西门分子采取基督教路线，至于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则转向社团式基督教社会主义。勒鲁认为个人主义是身体政治中最主要的道德疾病；社会主义——一般认为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勒鲁于1833年所创——可以修补各部分之间的互惠关系，使其合为一体，并且修复身体政治。身体政治的角色并不是要强加一致性于每个人身上，而是“自发地协助那些了解自我需求的个人进行自我发展”。<sup>20</sup>另外还有一些圣西门分子则转而效忠傅立叶。马克思从圣西门身上吸收了社会科学研究、生产主义、历史主义、矛盾，以及社会变迁的不可避免性等观念，但却转而认定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另外还有一些人如佩雷尔家族（Pereires）、昂方坦和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通过科学工程师与金融精英来追求资本与领导结合的观念。他们成为第二帝国统治、行政与资本累积（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如苏伊士运河和铁路]）结构中的主要人物。

这些科学工程师与金融精英之所以能得到发展，部分反映出路易·拿破仑运用了圣西门的观念。<sup>21</sup>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让未来的皇帝着迷不已。早在1840年代，路易·拿破仑当时被囚禁在哈姆（Ham，在布洛涅[Boulogne]发动革命，却不幸失败），他在狱中研读刚独立的尼加拉瓜政府开挖连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运河（以拿破仑为名）的提案书。路易·拿破仑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消灭贫穷》（*The Extinction of Pauperism*）。他认为工作权是

基本原则，并且提议政府要立法成立工人协会，负责强制购买（由国家提供融资）荒地。他相信，这些荒地经过开垦之后，不仅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也能借由生产与贩卖农产品来提供可获利而健康的活动。用来偿付国家贷款与地主赔偿金的循环基金，可以用来资助这项计划。社会主义领袖与改革者认同路易·拿破仑的理念，有些人（如路易·勃朗和乔治·桑）甚至亲自到哈姆探望他。雇主与经济学家嘲弄路易·拿破仑的提议，并且将他描述成闲散而毫无能力（从他革命失败可以看出）的乌托邦梦想家（当他于1848年当选共和国总统时，很多人认为他不过是个空想家，因此低估了他的潜力）。虽然路易·拿破仑的构想受到圣西门的影响，但却也带有傅立叶的色彩（最晚在1848年，路易·拿破仑应该已与傅立叶团体接触，而在帝国初期，他对傅立叶的想法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依照傅立叶的法隆斯戴尔来建造“工人之城”[*cités ouvrières*]，以解决工人阶级的居住问题）。

那么，我们要怎么看傅立叶呢？身为一个自学者，傅立叶于1808年出版了他的基础性作品《四次运动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在书中，他试图借由两种基本原则，让“社会混乱转变成普世和谐”：农业的结合与热情的吸引。即便傅立叶的支持者也坦承这部作品“既冗长又难懂”，谈到理论的精深之处，往往一语带过，但说到性与食物的和谐趣味，却又描写甚详，除此之外，当中也“批判了当代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粗疏”。傅立叶有些论证（例如，行星的交配）很奇怪，人们看了只能一笑置之。这位孤独而又饱受批评的思想家，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他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却对既有秩序的瑕疵有着精细而深入的理解与批判。傅立叶企图隐藏一些骇人听闻的、与热情吸引以及性有关的观念（例如，有些行为当时的人认为是性变态，他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死后，追随者想尽办法掩盖这些看法，并且小心翼翼删改他的作品。于是傅立叶的作品俨然成为和平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通过《法隆斯戴尔》这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在七月王朝末期以及1848年革命的初期阶段，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甚至是政治力量”。不过随着革命失败，许多领导人（如孔西代朗）必须逃亡国外，运动也就失去了直接的影响力。<sup>22</sup>

傅立叶攻击“文明”，认为文明是有组织的、用来压抑健康热



情本能的体系（他的说法成了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的先声）。潜伏的贫穷问题源自生产、分配和消费组织的无效率。主要敌人是商业，商业寄生在人类幸福之上并且摧毁了人类幸福。虽然我们注定必须工作，但我们仍需要组织工作，以保证我们能满足欲望、幸福、舒适以及实现热情。努力从事辛苦而单调的工作，分秒都不懈怠，并不会让人更为高贵或实现更多可能。文明不仅每年饿死了几百万人，也让“所有人的情感生活受到剥夺，动物至少还能自由地依循本能的激励，但人只能活在连动物都不如的状态下”。<sup>23</sup>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生产和消费必须在共同体中集体组织起来，我们称之为“法隆斯戴尔”



FIGURE-024

女性主义运动在1830与1840年代风起云涌，杜米埃因此画了一连串有关“蓝长袜”（指醉心于艺术与文学的妇女）、离婚和社会主义妇女的讽刺画。在这张画中，男人被指控试图阻止妇女参加公共集会。她们并没有惩罚这个男人，反而让他与自己的罪恶感角力。

(Phalanstères)。法隆斯戴尔提供各种工作以及各种社交与性的聚会，保证成员们能得到快乐并满足欲望与需求。傅立叶费了极大的力气详细说明法隆斯戴尔应该如何组织以及依据什么原则组织（他用相当复杂的数学排列来描述热情的吸引。例如，个人与个人之间就要有相应的热情吸引，如此才能确保和谐与快乐）。

## 1840年与之后

如果圣西门、布朗基和傅立叶提供了最初的火花，那么其他的学者则是让这把火往四面八方延烧开来。1840年，出版了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What Is Property*)；艾蒂安·卡贝深具影响力的乌托邦作品《伊卡利亚之旅》(*Voyage in Icaria*，卡贝在完成这本书的前不久，才刚完成法国大革命的大部头研究，他在当中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描绘成共产主义的英雄)；弗洛拉·特里斯坦的《漫步伦敦》(*Promenades in London*)——暴露出伦敦工人阶级的悲惨与沦落；路易·勃朗的社会民主主义作品《工作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Work*)；皮埃尔·勒鲁的两册研究

《论人性》(On Humanity, 探索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根源); 阿格里科尔·佩蒂吉耶 (Agricol Perdiguier) 的《同业公会书》(Book of Compagnonnage, 试图改革迁徙劳工体系); 另外还有其他书籍和小册子对社会状况提出了批判, 并且提供了解决方案。<sup>24</sup> 维莱姆 (Villermè) 对法国纺织工业劳动状况的研究受到广泛阅读, 而弗雷吉耶 (Frègier) 对于巴黎社会底层问题的分析则让许多资产阶级读者触目惊心。浪漫派作家 (雨果、拉马丁、缪塞、乔治·桑) 支持激烈改革并且与工人诗人交好, 第一次有组织的共产党大会在贝尔维尔举行, 巴黎发起了大罢工, 共产党工人试图刺杀国王。水闸已经打开, 尽管想压抑与控制, 却已无法阻挡骚乱发生 (但还未达到革命与反革命的程度)。

要捕捉这段时间出现的各种激进言论, 寻找其中的强度, 发现其中的创造性与共通性, 是相当困难的。不过这些言论对于问题的本质倒是有一致的看法。受挫的弗洛拉·特里斯坦在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工会》(出版于1843年)中, 引用了无数在她之

72

前的评论者:

在他们的著作、演讲、报道、回忆录、调查与统计中, 他们指出 (政府与富人确认并证实了这一点) 工人阶级在物质与道德上目前都处于无法忍受的穷困与痛苦。他们显示, 遗弃与忽视势必让大部分工人 (因不幸而产生怨恨, 因无知与超时工作而变得残忍) 对社会产生危害。他们证明, 基于正义与人性, 政府与富人有责任立法允许工人成立劳动组织, 除此之外, 为了社会的总利益与安全着想, 也应该强烈建议这项措施。然而经过快25年的时间, 即便舌灿莲花的雄辩家也无法唤醒政府关注七八百万工人因受忽视与绝望所将对社会造成的危险, 大部分工人到最后发现自己只能在自杀或窃盗之间选择!<sup>25</sup>

当特里斯坦为了她的运动宗旨而大声疾呼时, 当时人们对于她所描述的景象却没有异议, 显然工人自杀的问题在当时相当常见。

然而, 各家对此所提出的诊断却大不相同: 文明与商业 (傅立叶)、贵族与教士的过时权力 (圣西门、布朗基)、个人主义 (勒

鲁)、对不平等(尤其对女性)的漠视(特里斯坦)、父权制度(圣西门派女性主义者)、财产与信贷(蒲鲁东)、资本主义与未受管制的工业主义(孔西代朗,勃朗)、国家机制的腐败(浪漫主义者,共和派人士,甚至雅各宾党)、工人无法在共同利益之下组织联合起来(卡贝和共产党)。清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该做什么,转变中的社会运动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此时变得更加混沌不清。对于身体政治的诊断与治疗问题,也因为共通语言的意义正快速而叛逆地转变而变得更加困难。休厄尔(Sewell)显示,1793到1848年间,语言的变化在变迁的政治诠释与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up>26</sup>不过其中也有共通的主题,差别只在于各种观念混合的方式:平等、自由、共和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结社等观念,基于实用而彼此混合。勒鲁于1833年——就在他与圣西门派决裂后不久——向人权学会(Society of Rights of Man)揭橥的原则便是其中一种典型:

本党一致认为平等是我们的目标,支持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首要责任,共和体制是我们的手段,人民主权是我们的原则。最后,结社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最终结果,也是实现人民主权的途径。<sup>27</sup>

73 然而,当中所提到的词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 平 等

每个人都同意不平等是个问题。但如果目标是改善不平等的现象,那么哪一种平等是应该争取的?以什么方式?为谁争取?自从法国大革命将“平等”写在旗帜上后,这些就成了极具争议的话题。到了1840年,共识被淹没在翻滚的各种诠释当中。布朗基继续主张世俗平等主义的激进雅各宾理念——然而必须仰赖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1840年共产党大会(超过1000人出席)上,轮番上台发言的人不断指出,如果没有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是无意义的。虽然幸福平等对圣西门派来说非常重要,但要从教育、适当治理与资源集合各方面来提升工人阶级,则有赖能力与技术较高的工业精英来进行立法创制。身体政治整体的健康与幸福比个人的幸福更为重要(勒鲁就是在这一点上与圣西门派决裂,而圣

西门派也因此有时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原型)。共产党与雅各宾派想同时拥有政治权力与生存机会的平等，不过工人却鲜少支持革命行动来推翻整个体系并建立平等的共产主义，他们仅仅想被当成人一样看待（与资产阶级一样），并且拥有少许的安全以及公平的工作待遇。<sup>28</sup>工人不愿接受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尤其是圣西门派）的施舍心态，这些人试图教育工人（而非给他们稳定的工作），这种傲慢态度要比雇主的冷漠更难以忍受。阿格里科尔·佩蒂吉耶是个工人，他坚持这样一种平等：“你们应该了解，与富人相比，我们并不是由较不精巧与较不纯粹的物质制成的，我们的血液与我们的身体与富人没什么不同。我们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应该像兄弟一样地生活。自由与平等必须结合在一起，共同统治人类这个大家庭。”<sup>29</sup>

不平等也显现在妇女的从属地位上。傅立叶在1808年表示：“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社会进步和变迁与妇女自由的进展成正比，而社会的衰败也与妇女自由的缩减成正比。”<sup>30</sup>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与热情吸引解放的必要条件。昂方坦也推动妇女解放（虽然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而几位参与圣西门运动的妇女努力地将这些观念与实际作法联结起来，发行她们自己的刊物《妇女论坛报》（*La Tribune des Femmes*）来论辩性解放与妇女平等的议题。尽管傅立叶派分子轻视性与性别问题，但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却深受傅立叶观念的吸引。例如弗洛拉·特里斯坦认为女性应拥有与男人同工同酬的工作权以及法定的离婚权。当时女性束缚于婚姻之中，地位无异于受奴役的娼妓，离婚权是用来解放妇女的最重要的改革。然而性解放的问题逐渐退烧，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自主与工作权的问题，这两项主张是女性脱离男性支配的条件。有人投稿到《妇女论坛报》，上面写着：“当我们提到自由或平等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拥有财产；没有财产，我们只能是男人的奴隶。凡提供我们物质需求的人，总要求我们屈从他们的想法以为交换。”

但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另一道藩篱（我们感到既熟悉又沮丧）。“我们很难找到工作。好工作都给了男人；我们只剩下薪水低得难以糊口的工作可以选择。只要有人发现我们可以胜任某项工作，薪资马上就降低，因为我们不许赚得跟男人一样多。”<sup>31</sup>特里斯坦

并不像乔治·桑那样，以浪漫的眼光来看待工人阶级妇女或农村妇女。不识字的、无法律地位的、年纪轻轻就被迫结婚因而仰人鼻息的、被剥夺权利的，像这样的妇女最后只能让自己成为刻薄的丑恶妇，丈夫成天往酒馆跑，子女则在外头成了窃贼与暴徒，她未能营造温暖的家庭，家庭因此也失去了支持的功能（包括无法支持她自己）。特里斯坦从男性利益着眼，提出诉求：女性的教育与解放是男性工人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然而，蒲鲁东并不同意她的说法。他认为家庭是神圣的，妇女应待在家里，受男人的控制，这样就够了。

物质平等主义与道德平等主义之间是一段复杂的对话，前者指的是在安全条件下获取生活薪资的权利，后者指的是无论阶级、性别，每个人都能受到有尊严的对待。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作家（如早年的蒲鲁东、特里斯坦、圣西门、卡贝及其他的改革者）都主张个体尊严与自尊，这种想法原本就深植于基督教的训示中，他们只是去除了教士的实践。激进化的基督教（圣西门与勒鲁的提议）固然反教士，但真正的重点在于，对许多人来说，它似乎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解放神学的派别繁多，从千禧年思想到神秘的冥想。不少领导人物不是接受（如昂方坦或甚至傅立叶，他们喜欢称自己是“理性的弥赛亚”），就是被迫接受（如卡贝）“新弥赛亚”的地位，他们宣扬“福音”，并且提供一条通往拯救社会疾病的道路。平等应该视为神明赐福还是世俗理性的胜利，我们并不清楚，像浪漫派诗人拉马丁就仰望“工业基督”能保障大家的工作权。

## 社 团

75

只要研究当时的文献，人们一定会发现社团原则这件东西，它要不是政治制度与政治行动的手段，就是其目的。不过，社团的意义很多，有时它的定义相当狭隘，以至于让人认为它的重要性不如其他原则，如工会（特里斯坦）或共同体（勒鲁）。此处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将集体性组织起来，以满足物质上的要求，并且创造适合教育与个体实现的环境。傅立叶在1822年出版的小书《农业和家庭社团》（*Agricultural and Domestic Association*）中也提及这一点，他主张的基础便是建立法隆斯戴尔。不过，傅立



叶的观点只局限于农业生产（甚至是属于园艺一类的农业生产），而他也从未调整社团理论使其适应工业环境。除此之外，对傅立叶而言，社团仰赖的是慈善捐款或私人的股票投资，并不包括劳工组织。

对圣西门分子来说，工业者组成社团是相当基本的观念，但这个观念要在两个特定的层次上运作。身体政治内部所分化的各种利益（尤其因劳动分工与职能分化而引发），要经由社团才能表现出来。如科学家与艺术家有他们自己的审议组织。但这些组织必须嵌入“普世性社团”之中，通过工业者阶级联盟而建立的普世性社团，在共同利益下运作、集合资源，并且依照生产力与天分来贡献与收获。不难理解，这些观念又在第二帝国时期再度出现，并且成为组织、行政、信贷和金融的原则，就连工人社团也在皇权的保护伞下获得有限的权力。大型利益与阶级联盟社团，可以融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利益，其理想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许多激进分子（忠于自己的阶段根源与阶级视野）觉得工人与农民仍不够强大或知识不够充分，无法发起行动。卡贝在1840年代初期寻求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在屡次遭到拒绝后，他走上另一条道路，并且以建立共产主义式的共同体主义为目标。勒鲁也同样寻求资产阶级的支持（基于基督教的价值），并得到足够的资助（主要来自乔治·桑），在吕萨克（Lussac）进行他最终未能成功的农业公社和印刷业。

由工人组成独立社团的观念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曾受到压抑，但在1830年革命时又再度兴盛，并且从看法特异的圣西门分子比谢（Bucheze）的作品中得到直接的帮助。比谢反对普世性社团原则所带有的由上而下的视野，他主张由下而上的生产者社团，并且把目标放在让工人从薪资体系中解放，并且让他们免于受竞争不当结果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工厂拥有者与雇主就跟贵族与地主一样，是寄生者。路易·勃朗在他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工作组织》中大力采用这种看法，蒲鲁东也赞同这项见解。不过，勃朗认为国家权力与政治立法有责任建立社团并资助社团，同时还要监督社团的管理（很类似于他后来在1848年所坚持的，国家应资助国民工作坊）。蒲鲁东则希望政府能完全置身事外，并且期待以自治模式将工作坊转变成社会的改革

空间。但蒲鲁东的想法持续在变，部分因为他不信任社团能解决问题或工人必定能做出正确的事。一方面，他要求工作坊之间应彼此竞争，以培养坚强的纪律；但另一方面，他又说并不是每个工作坊都得为社团。樊尚（Vincent）重建蒲鲁东的观点如下：

基本上，蒲鲁东希望组织一个彼此联结的互助社团群。这个社团群可以克服既有社会的矛盾并且改变既有社会。计划中的社会变革以组织百人左右的小公司为第一步，让小公司员工产生手足般的纽带关系。这些社团主要是经济性的……但也可以产生教育和社会互动的功能。他主张，这些社团将会对类似社团的建立产生示范作用，因为它们崇高的道德情操与卓越的经济功能……能够化解“自由与管制的对立”并且融通“自由与秩序”……社团的决定性功能，在于引进一种能在生产与消费上达成和谐的平等社会，社团因此可以根绝资本家与工人、闲散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sup>32</sup>

这种观点与傅立叶或路易·勃朗的观点大异其趣，虽然如此，却与卡贝有些共通之处。不过蒲鲁东也担心社团也许会窒息个人的自由与进取心，但他从未试图废除资本与劳动的区别，他只是想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能够和谐与公平。蒲鲁东也认识到互助社团需要金钱与融资才能运作。他急于将想法付诸实践，因此他在1848年革命期间成立了人民银行，不过随即失败。

虽然如此，工人结社的观念却在各行各业落地生根并且大受欢迎。它成了共和派与工人为主的出版物的主要头条与讨论话题。而各方歧异，主要是一派主张应该让各社团保持竞争关系，以确保劳动纪律和技术创新，而另一派则认为最终每一个行业都应出现垄断控制。工人结社运动的最高峰是1849年的工会法（在社会主义派女性主义者让娜·德鲁安[Jeanne Deroin]的奔走下，大部分获得通过），然而当法律要公布施行时，运动领导人却遭到逮捕，运动也受到镇压。当时，巴黎约有300个社会主义社团，分布在120个行业中，成员有5万人。超过半数的社团仍继续维持到1851年政变，之后这些社团就完全受到打压。<sup>33</sup>

## 共同体 / 共产主义

蒲鲁东极力反对共同体。他认为，如果“财产是偷窃”，那么“共同体就是死亡”。<sup>34</sup>1840年共产党大会上，许多演讲者认为**共产主义与共同体**是可以彼此互换的词汇，而蒲鲁东则憎恶集权式的政治权力与决策。德萨米（Dézamy），组织共产党大会的重要人物，在1842年写成一部详尽的共同体法规，里面还有一份共同体的建筑平面图。工业园区与有害的设施都移到乡间，菜园与果园则往城市靠近。共同体法规构成整个法律体系，规范了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分配与经济法、工业与农业法、卫生法、教育法、公共秩序与政治法，以及家庭关系外的两性法，都详尽地予以制定，“为的是防止脱序与放荡行为”。这些法律全都包含于共同体的概念中。共同体意味着“团结与兄弟手足之情”，充满了“最真实与充分的一致性，所有的事物都完整地搭配在一起：教育、语言、工作、财产、住居、生活、立法和政治活动等”。<sup>35</sup>对许多人来说，如蒲鲁东，这种做法似乎过分压迫人。

77

德萨米原为卡贝的亲密战友，然而在好战的程度上以及理想共同体的组织上两人有了歧见，因而分道扬镳。然而，在1840年代末期，卡贝在共产党的影响力远大于德萨米，卡贝在伊卡利亚提出了和平的方法，以及人们较能接受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共同体将会压抑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特权、支配、富裕、闲散与家庭生活，将分散的个人财产转变成不可分的、社会的或共同的财产。共同体将会调整所有的商业与工业。因此，共同体的建立将是人类所尝试过的最大的改革或革命。”<sup>36</sup>蒲鲁东与卡贝，一反傅立叶、昂方坦与德萨米的见解，支持传统的家庭生活，并且主张女性在生活中所带有的负面性（尤其卡贝这么认为）将会在共同体路线的生产与消费再组织中大幅消失。

卡贝与蒲鲁东是精力充沛的辩论家与组织者，在1840年代末期，卡贝的伊卡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实力逐渐壮大，并且获得的助力主要来自工人阶级，而非来自拥有知识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在立场上倾向于傅立叶派或圣西门派）。至于失去社会地位的激进分子则支持布朗基或走激进路线的共产党员。1842，超过1000名巴黎工人在卡贝所办的《人民报》（*Le Populaire*，这份报纸在1848年的发行量达到5000份以上）上联署发表宣言：

有人说我们生性慵懒……这并非事实！为了生活，我们愿意工作，而且我们比那些出言中伤我们的人更勤奋。但有时候工作缺乏，有时候工时太长，不是累死我们就是有损我们的健康。薪资不足以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不合理的薪资、失业、疾病、税、老年——老年很早就降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陷入悲惨境地。为数众多的我们来说，恐怖莫此为甚。对我们或我们的子女来说，也无未来可言。真是了无生趣。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生产者。没有我们，富人将一无所有或者将被迫自己工作来赚取面包、衣服、家具与住所。何其不公！我们想有个不同的劳动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成了共产党员。<sup>37</sup>

卡贝努力要与具改革心态的共和派人士进行阶级合作，然而却遭受拒绝，迫使他在1840年代末期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运动。1847年，卡贝的思想转向基督教，并且突然决定移民美国，他认为在美国建立伊卡利亚是唯一的解决方式。约翰斯顿（Johnston）推测，卡贝的性格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如随后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那样）：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乃是通往激进进步的唯一道路。然而，卡贝的想法却与工人不谋而合：朗西埃不断显示，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要求的是尊严、自主以及与雇主同样的待遇，而不是诉诸尊严扫地的街头抗争”。<sup>38</sup>卡贝吸引了许多追随者，马克思因此抱怨卡贝让许多共产党员放弃了欧洲的革命任务。卡贝与马克思之间还有一条清楚的分野，他们在思考解决方案时所根据的地理规模大不相同。卡贝的思考规模从未超越小型而单一的共同体，人们在当中可以面对面接触，并且保持亲密关系，他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这样的架构中推行。

---

## 工作与劳动的组织

---

学者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提出各方面的批判，但他们承认，既有社会体制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系于工作与劳动的问题上。现实状况不断恶化，与理想世界的落差也逐日明显。劳动价值被

资产阶级窃取与利用，这样的想法也在人群中散播。然而，解决的办法却莫衷一是。

例如傅立叶就认为解决之道在于让各种工作跟他苦心孤诣所想出来的“热情吸引”彼此相符。社会的劳动分工将完全消失，而工作将等同于游戏。这也许是傅立叶体系中最不可行的方面，因为只有在避免大型工业而只留下最小规模的工业时，这种现象才会发生。当某种类似傅立叶法隆斯戴尔的组织出现时，这些组织运作起来比较像是实验性质的地区消费与生活合作社，而非充满活力的生产型企业。尽管如此，傅立叶坚持劳动决定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我们内在的人性特质，而这个想法也成为周而复始的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下劳动过程的批判主题，延续至今仍回响不已。另一方面，圣西门派则准备好要重组大规模劳动分工并寻求更高的效率。但这需要工业精英的行政与技术能力，由工业精英指派工人担任职务，而工人则须愿意听从工业精英的指挥。工人的获利取决于道德上的设定，即一切事物都是为了让最贫穷的阶级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有趣的是，这种设定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若合符节）。

圣西门的学说很少提到工作经验的重要。几乎所有的劳动体系，例如后来被称之为泰勒主义(Taylorism)与福特主义(Fordism)的劳动体系，都完全能与（列宁相信这一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兼容。圣西门派在第二帝国时期变得很有影响力，他们对于劳动问题采取折中立场，轻松地将寻求正义的道德命令抛诸脑后。蒲鲁东于1858年对正义原则所进行的稳健辩护，更加凸显了圣西门派在这方面的不足。“圣西门派与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抱持着梦想，认为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将可以令人类从吝啬而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取得庞大的生存资源，然而这种梦想对傅立叶来说是一场强取豪夺的梦魇，因为他知道地球的自然命运乃是成为一座园艺天堂，一座变幻无常的英国式花园。”<sup>39</sup>

后来被称之为工人自主管理（autogestion）的模式在1840年代大量出现，如蒲鲁东的互助主义，卡贝的公社主义，甚至勒鲁的基督教共同体主义也兴起成为竞逐的流派。蒲鲁东提出劳动货币（numéraire）的说法，用以反映这项事实：劳动者创造价值，因此需根据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而获得报酬。而蒲鲁东也因为这项说



法而卷入各种争论之中。蒲鲁东的思想主要放在小规模工作坊或小企业上，并且对于任何组织大规模计划的尝试都感到不适，在他看来，这些计划所造成的细微分工将会造成堕落。这使得蒲鲁东回头接受竞争这个必要之恶，并且认为竞争是一种协调机制。他试图从正面的角度来美化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并且赞扬他所谓的“无政府互助主义”是用来配置劳动力的最适当社会形式，整个社会将可因此获利。蒲鲁东的想法在1848年后招来马克思一连串的严苛批评。<sup>40</sup>

有趣的是，蒲鲁东的论点在近年来又再度复活，特别是在皮奥里（Piore）与萨布莱（Sable）出版了《第二次产业分隔》（*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之后。他们认为1848年丧失了一次依照不同的原则——由工人控制的小规模公司——来组织劳动的大好机会。不过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使得专业化更有弹性，而小规模企业也能进行自主管理，加上1970年代以来生产散布到新工业区（如“第三意大利”），因此似乎又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根据皮奥里与萨布莱的说法，1848年错失的组织形式绝大部分是蒲鲁东提出来的，而非出自傅立叶、卡贝、路易·勃朗、圣西门或共产党员的想法。倘若竞争可以沿着“互助”路线来组织，那么竞争就会是有利的，资本所有制以及对金融机构的依赖也将不会是坏事。

80 皮奥里与萨布莱认为，如果蒲鲁东的想法发生于19世纪中叶，我们将可幸免于大规模资本（通常是垄断性的）工厂体系与共产主义工厂体系所带来的灾难。

无论从过去或今日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都相当有争议性。有弹性的专业化固然能吸引劳工，但这么做也容易造成无人负责与过度分散的形式，并让资本以转包与弹性的方式进行累积，关于这一点，皮奥里与萨布莱都避而不谈。我认为，资本主义近来的发展正是属于后者，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帝国巴黎的工业组织贪婪地对小规模结构转包进行剥削，其程度远大于对大规模工厂的剥削（见第八章）。<sup>41</sup> 尽管蒲鲁东的想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圣西门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也提不出好方法。劳动问题在1840年代的法国曾引起争论，而其置于台面上的诸种议题至今仍有讨论的必要。如果我们能发现，今日反全球化的声浪乃是对蒲鲁东互助主义、勒鲁基督教共同体主义、傅立叶的热情吸引与解放理论、卡贝的

共同体 / 共产主义观点等说法的回响，那么我们便能从1840年代的法国汲取一定的历史教训，同时也能深化对相关议题的掌握。

## 都市问题：奥斯曼之前的现代性？

在1840这个别具意义的年份里，29岁的工程师 / 建筑师塞萨尔·达利发行了《建筑与公共工程杂志》(*Revue Générale de l'Architecture et des Travaux Publics*)，成为未来50余年讨论建筑、都市设计与都市化问题的主要媒介。<sup>42</sup>达利在介绍创刊号时写道：

工程师与建筑师负责进行庇护人类、家畜与农产品的工程建设；他们耸立起数千间厂房与生产设施以容纳庞大的工业活动；他们建造巨大的城市与华丽的纪念碑，整治横贯城市的河流，并在河畔围上高耸的堤防、从岩石凿出的水湾，以及足可停泊整支船队的码头；他们开挖道路与运河，铺设桥梁于河流与深谷之上，贯通隧道以穿越山脉的阻挡，以此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将水从低湿之地运往干燥的不毛之地，以此大量扩展农耕地并改善土质；他们不畏艰难，在全国各地刻下持久耐用的纪念碑，以褒扬天才的力量与人类的事功；当人们想到这些工程的庞大效益和绝对必要性，以及其所带来的数千个就业机会时，自然会赞叹这些壮观的建设完全有赖于科学，并且感受到科学只要有些微进展就能让世界各国蒙受利益。<sup>43</sup>

81

这段话的语调是圣西门式的，乍看之下有点古怪，因为达利本人应该是深受傅立叶影响才对。《建筑与公共工程杂志》经常融合圣西门派大规模公共计划的喜好与傅立叶派的坚持（即根据理论充分、“科学的”与和谐的[意即傅立叶分子]原则来陈述）。孔西代朗，当时最重要的傅立叶分子，也在杂志上投稿，偶尔与孔西代朗合作的佩瑞蒙（Perreymond，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也为了重整巴黎内部空间而在杂志上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

当时绝大多数的官员、思想家与学者，不管直接或间接，都对都市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因为都市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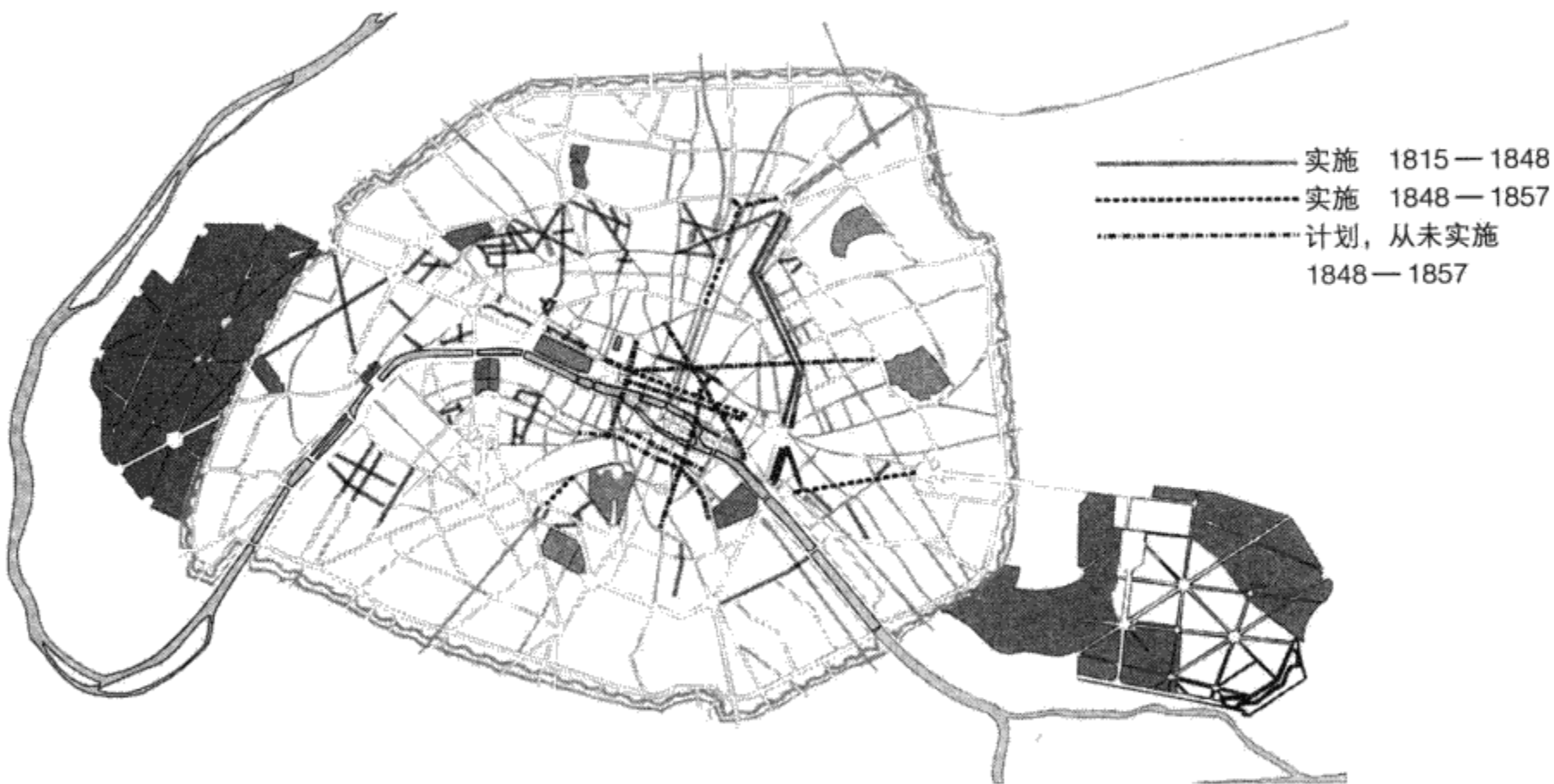


FIGURE-025  
1840年代所实现与计划的新道路系统

82

题太明显也太急迫，没有人可以回避这样的议题。崭露头角的阿道夫·梯也尔于1833年接任商业与公共工程部长，他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在纪念碑计划上，并且通过法案资助运河、道路与铁路建设。梯也尔的主要贡献，同时也是他饱受批评之处，在于他以巨资兴筑新要塞系统来防御巴黎。35年后，在命运的捉弄下，梯也尔必须攻下他一手兴建的要塞群以击溃巴黎公社。巴黎市长朗比托着手设计并执行计划以改善交通运输（包括以朗比托命名的街道）。从1832年霍乱疫情侵袭巴黎之后，都市公共卫生便成了重大议题。建筑师雅克·希托夫（Jacques Hittorff）从事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和其他几个计划的设计工作，这些设计都是为了促使巴黎市中心往北部和西部移动。这个迁移计划在空想的建筑物的驱策下（其样式如同巴尔扎克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所描述的玛德莲教堂）创造了新巴黎，使其往北部和西部移动，远离拥挤的市中心。朗克坦（Lanquetin），一位在1830年代末领导巴黎市议会的野心企业家，他委托了一项巴黎重生计划，内容不仅宏大而且在财政支出上也颇为惊人。这是段充满朝气的时期。皮农（Pinon）曾略为不精确地称之为“1840年的乌托邦”，事实上，巴黎一些具体的街道计划后来的确完成了（见图28）。<sup>44</sup>

然而，这类活动与奥斯曼的做法有两点不同。首先，付诸实行的都市规模并不具备宏大的眼光（违背了原先的观念）。其次，朗比托不太愿意超出市政府的预算，财政保守主义是规矩，而朗比托以此为傲。

当时并不缺乏观念，绝大多数的大思想家都对都市问题有所思考。傅立叶于1790年代第一次造访巴黎，“宽阔的大道，美丽的建筑与皇宫启发他设计了新型‘统一形制的建筑规则’，日后这个规则成为他的理想城市蓝图的基础”。1796年，傅立叶震撼于“现代城市的单调和丑陋”，因此他“构思了一个新型城市”，设计的方式可以“防止火灾蔓延并且去除城市中与人们作对各种污臭之物”。<sup>45</sup>到了1808年，傅立叶清楚地看到“都市污秽的问题与割喉的经济竞争，这些都是社会病人膏肓的症状”。不过他为都市生活所做的设计——经过数年的苦思——却比较适合自给自足、性关系单纯的农业园艺社会，反而不见容于当时巴黎的工业活动，以及因交通便利而产生的广大商业关系网络。本雅明指出，“傅立叶是从拱廊街中认识到法隆斯戴尔的建筑规范的”，但马雷（Marrey）对此表示怀疑。<sup>46</sup>拱廊街绝大部分建于1830年代之前，是位于一楼的商业空间；傅立叶的类似空间则是用于居住且位于二楼，同时比较接近卢浮宫与凡尔赛宫的长廊风格。傅立叶一直到1830年代才明确提到拱廊街。然而，法隆斯戴尔的确在都市设计史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只是不一定跟傅立叶所期待的完全一致。法隆斯戴尔为实业家提供了建筑原型（经过调整，并且去除了许多社会特征，特别是那些与性和社会关系有关的特质），这些实业家想进行集体与合作生活机制的实验，例如“工人之城”在第二帝国初期所做的尝试。但法隆斯戴尔并未提供重建都市身体政治使其能构成一个整体所需的新都市计划。傅立叶的构想充满了太多的怀旧情感，同时规模也太小，对于重建巴黎这样的大城市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帮助。

当时其他的思想家也面对相同的困境。蒲鲁东虽然偶尔显示他有构思大规模制度的能力（他的直觉展现在重建金融机构上），但他从来没有真正逃脱里昂的手工业规模，他的灵感多半来自此处。勒鲁（预料之中）与卡贝（令人失望）的实验都只局限于小规模共同体。卡贝的理论在美国落实的结果证明是场灾难。共

83

产党员具有思考大规模制度的能力。德萨米的都市法规与傅立叶有些许出入，德萨米不仅强调集体财产权与激进平等主义，而且也主张工作与生活的公社组织，公社依照地域划分，成员要如兄弟般彼此互助合作。工业大军要“执行庞大的工程计划，如开垦、造林、灌溉、运河、铁路、筑堤等”。为了仔细关注健康与公共卫生事务，公社则应该设在最适合健康的位置。<sup>47</sup>将各个地区编码以确保土地能在符合人类健康与幸福下合理使用，管理与规制公社，使其能提供每个人平等的教育、生计与食物。德萨米的想法虽然不算大规模，但已经相当广泛，他吸收了卡贝与傅立叶最好的部分，再加上巴贝夫与布朗基的原则与圣西门的行政理想。不过，德萨米还是丢不开乌托邦与怀旧情绪，他还是强烈依恋着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共同体理想。

变幻无常的都市生活与乌托邦计划之间因此存在着鸿沟，不过也有例外。圣西门找来了重要的实业家与科学家计划，还找来了技术人才和工程师重新思考城市的必要规模。圣西门坚持，新路线的种子只能在与现状有矛盾的地方找到。虽然圣西门派在1830年代初期所发起的运动已经烟消云散，但他们的观念却仍在技术精英如金融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之间盛行（如达利的陈述所显示的）。非圣西门派的人所设想的改革，完全局限于地方性的激进化社会关系中，或者局限于城市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做法不成功，便会另外选择在“没有羁绊”的地方重起炉灶，建立新的共同体，如美国（卡贝）或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当时由法国占领，经常受人讨论。自认为是圣西门运动之父的昂方坦，于1843年写了一本遵循圣西门路线的著作，详细介绍殖民阿尔及利亚的计划）。

最大的例外是傅立叶派的孔西代朗和佩瑞蒙，他们扩大了傅立叶的和谐与热情吸引观念，并将其融合圣西门的思想。他们认为建设中的铁路将会破坏人类的利益，并且主张铁路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堕落的主要推手。他们并不反对改善交通运输，而是反对实行方式的不合理；反对权力与资本逐渐集中于大城市金融精英之手；反对只刺激工业与都市发展而忽略了最根本的农业；反对“直线”剥夺了感官欣赏自然的趣味。孔西代朗与佩瑞蒙提议铁路网应收归国有，而铁路建设应根据理性和谐（即傅立叶派）



原则且不仰赖私人资本。政府对这个提议印象深刻，于是发出铁路建设的国家特许，然而却将铁路网的辐射中心设在巴黎，并且增设条款允许私人剥削。有趣的是，本雅明大量引用孔西代朗反对铁路的说法，却对他的正面提议只字不提。<sup>48</sup>

孔西代朗和佩瑞蒙也对巴黎问题提供许多改善意见，这些意见都相当切实可行，完全没有空想乌托邦主义的气味。佩瑞蒙从1842年开始，发表了一连串文章，有系统地剖析巴黎问题，这些文章集结起来定名为“巴黎市研究”。<sup>49</sup>混乱、失序与拥挤包围了市中心，市区各部分缺乏和谐的关系，因此，如何让市民活动往北部和西部迁移便成了最主要的关切点。佩瑞蒙对巴黎的状况做了仔细而实证的诊断，之后便以傅立叶的原则来寻找解决之道。他认为巴黎必须回归传统的市中心，然后往外联结众多发展中的区域，但联结的方式必须具有整体性与和谐性。这个作法使得巴黎内部交通发生剧烈重组（包括将铁路铺设到更好的位置上以及开辟大道），巴黎市中心也完全改头换面。佩瑞蒙提议，将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到新桥（Pont-Neuf）段的塞纳—马恩省河左岸支流完全填平，同时清理西岱岛（Ile de la Cité）上所有地产，所得空间可让重获活力的市中心发挥其商业、工业、行政、宗教与文化等机能。

佩瑞蒙提供工程说明与资金计算来证明计划的可行性。他已经做好贷款的准备，并且对朗比托的财政保守主义多有批评。佩瑞蒙的计划不论从胆识或野心来看，都与日后奥斯曼的构想平分秋色。如果将这份计划与佩瑞蒙的铁路提案合参，不难看出巴黎都市空间的角色与结构与整个法国空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佩瑞蒙的构想几乎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式的，但他与奥斯曼最大差异在于他避免让资本流通，并且使私人无法在土地与财产上做投机生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佩瑞蒙宏大而可行的计划从来没有受到重视。

另一项大型提案出自梅纳迪耶（Meynadier）之手，他的著作《美丽而不朽的巴黎》（*Paris Pittoresque et Monumentale*）出版于1843年。跟佩瑞蒙一样，梅纳迪耶坚持一方面要清理，另一方面要建筑更多合理的道路系统来整合铁路系统，才能为巴黎市中心带来新的活力。马尔尚（Marchand）指出，梅纳迪耶对新大道所

做的详细规划，在许多方面预示了奥斯曼的提案（特别是他对直线的支持）。<sup>50</sup> 清理、铲除有害健康的住宅被列为首要任务，特别是旧市中心。梅纳迪耶非常关注健康与卫生的问题，也致力于推动巴黎的公园体系，使其能与伦敦并驾齐驱。如果在城市中无法获得自然的回春力量，那么建立通往市郊和乡村的道路便可提供这样一个宁静的选择。巴尔扎克的田园梦想便可在乡村小屋的形式中获得实现。从许多方面来看，奥斯曼于1850年代的确实现了许多梅纳迪耶的提案。

虽然孔西代朗、佩瑞蒙、梅纳迪耶乃至朗克坦都受到圣西门派与傅立叶派观念的启发，但他们却拟定了实际的计划而非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在这种思想背景的酝酿下，我们必须了解奥斯曼实际做了些什么。奥斯曼在开始改造巴黎时省却了跌跌撞撞的摸索过程，这一点，必须归功于那些思想先驱（奥斯曼一定读过达利的杂志）。奥斯曼的问题在于这些观念有其政治前提和乌托邦梦想，而这些前提与梦想在各方面都受到波拿巴主义的憎恶。因此，奥斯曼才不断宣扬与过去完全决裂的神话。奥斯曼所做的事有很多早在1830与1840年代就已经成形，但这不表示我们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我们在导论中提到的，现代性在1848年后进入了全新而具有特色的时期，而奥斯曼便是其中最大的推手。

---

## 什么东西消失于1848年？

---

世界并没有在1848年回归正轨。社会主义革命失败，许多革命催生者要不是躲藏、流亡，就是在1851年12月政变之后完全被压制下来。1848年后开始的反革命让所有的希望破灭，并且扼杀了原本在1830与1840年代涌现的各种层出不穷的可能。1848年7月在巴黎街头发生冲突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性概念。第一种现代性概念纯然是资产阶级式的。它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追求言论自由与市场行动自由，它所谓的自由和平等是与金钱力量携手并进的。此派最有力的发言人是阿道夫·梯也尔，当初如果君主制没有滥用大权，那么梯也尔很可能满足于立宪君主制的统治。梯也尔曾在1830年代担任部长，因此1848年2月时他有十足的动机企图挽救君主制。1848年4月以后，梯也尔成为国民会议中秩

序党的领导分子，他努力将国家政策导向保护资产阶级的权利与特权。

第二种现代性概念不如第一种来得有连贯性，它建立在社会共和国的观念，要求养育法国人民，并将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民从贫困与堕落的生活环境中解救出来，不管是乡村还是繁荣的城市。它对私有财产抱持着暧昧的态度，并且对于所谓的平等、自由与共同体感到困惑，但它深切相信劳动的社团形式与公社活动，将可为更适当的社会关系形式与粮食供应基准立下新的基础。这个运动有许多附和的声音——路易·勃朗、拉马丁、布朗基、蒲鲁东、让娜·德鲁安、卡贝、孔西代朗、勒鲁——而且通常有许多发展方向。不过它的追随者也构成相当强大的力量，足以对资产阶级产生威胁——资产阶级本身也受到各保守地方省份的传统权利的威胁，不管是哪一种现代性，都足以引起地方传统势力的戒心。建立社会共和国的要求在6月街垒中被粉碎了，至于资产阶级的期望则于1851年12月的政变中被压制下来。政变后成立的第二帝国试图建立第三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混合了专制独裁，以及对私有财产和市场的尊重（然而这种尊重令人无法放心），同时还加上拉拢民心的种种举动。

1848年的崩解造成各种结果。如果社会共和国的概念遭到压抑，那么巴黎与共和国间的强大联结所构成的身体政治要如何维持？如果巴黎作为有知觉的存在以及身体政治的地位遭到否认，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表述巴黎呢？结果便是表述的危机。因此，1848年革命乃是将各类彼此迥异的表述方式予以区别开来的关键要素。不仅让奥斯曼与他的前辈贝尔热和朗比托有所差异，也让巴尔扎克和福楼拜描写巴黎的手法大不相同。<sup>51</sup>

巴尔扎克的宽阔笔触是印象派的，他创造出如同幻影一般、永远处于流动之中的都市世界心理地理学。在巴尔扎克的世界中，哪怕是漫游者都有机会掌握绝对的知识，渴望彻底了解巴黎及其个中秘密。福楼拜则用外科解剖刀来写作，将事物大卸八块，一句一句分离，制造出实证主义式的美学，在他笔下，巴黎成了静态的艺术作品。然而，巴黎被转化为审美对象之后，就失去了巴尔扎克原先所精彩表现的社会、政治与个人意义。福楼拜世界中的漫游者所意味的是失序与异化，而非探索与发现。在《情感教

育》中，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是个在巴黎市区中到处行走的漫游者，他从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不在乎自己在做什么。“弗雷德里克从未看清楚[巴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线”永远模糊不清。<sup>52</sup>

87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回想巴尔扎克如何结合各种环境，包括房间陈设的细微差别以及房客本身的人格（《金眼女郎》生动描写了帕绮塔的闺房，或《高老头》则表现出伏盖夫人的性格）。福楼拜了解这种写法。在《情感教育》中，弗雷德里克一看到阿尔努夫人（Madame Arnoux，他疯狂地爱上她）就开始胡思乱想：“她姓什么，住在哪里，生活得怎样，有过什么经历？他希望知道她卧室里有什么家具……”但当福楼拜真的开始描写家具、房间，乃至整个邻近地区时（其细腻和谨慎与巴尔扎克不分轩轾），这些环境与屋主的关系却完全出于偶然。我们可以思索下面这一段文字：

最后，他走进闺房，彩色玻璃窗使得室内明暗不定。门上方装饰着三叶形木雕，栏杆后面，三床紫红的褥子拼成一张沙发，上面扔着一只白金水烟筒。壁炉上没挂镜子，却有一个金字塔形的木架，上面陈列着一整套古玩：老式银表、波希米亚花瓶、宝石别针、玉石纽扣、法琅瓷器、中国瓷人偶和一个披着镀金银斗篷的拜占庭小童贞女。这一切与地毯的淡蓝色、矮凳的珠母微光，以及挂上褐色皮革的四壁的浅黄色泽，融合在一片昏暗的金光之中。角落的基座上摆着青铜花瓶，插上的鲜花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萝莎内特（Rosanette）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粉红缎子上衣，纯白克什米尔长裤，戴着一串皮亚斯特币编成的项链，红色头巾上箍着一圈茉莉花枝。<sup>53</sup>

无怪乎弗雷德里克（与读者一样）会对这一切的不协调“大吃一惊”。这段描写和巴尔扎克在《金眼女郎》中对帕绮塔闺房的处理（见前文）有着显著的差异。弗格森（Ferguson）下了个结论：

巴黎终究跟阿尔努夫人一样，并非昙花一现而难以征服。福楼拜之所以如此用心地结合两者，是因为弗雷德里克用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两者。巴黎的一切都“与她联系着”，弗雷德里克相信，

“任何想让她成为情妇的尝试终究是徒劳无功”，同样，对巴黎也是如此。巴黎就像狮身人面兽，个中奥秘弗雷德里克无法解开。他想要征服这个女人和巴黎，但还是败给了妄想带给他的颓唐。福楼拜在这里以及其他书里都运用了巴尔扎克的模式，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福楼拜就是要反转巴尔扎克的模式。巴尔扎克和福楼拜都将巴黎与女人及带有男性欲望的漫游者联结在一起。但比拟的方式却强调了这些世界间的差异。巴尔扎克用来隐喻占有的方式，在福楼拜笔下却完全有着相反的意义。在《情感教育》中，欲望只存在于梦中，从未能够实现。<sup>54</sup>

不论对错，巴尔扎克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如乌托邦思想家和乌托邦理论家，他们试图找出重建巴黎的恰当方法），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巴黎，并且让巴黎成为自己的城市。借由重建巴黎，就算不能重塑社会秩序，至少也能让他们自己改头换面。然而在1848年之后，占有巴黎的却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客、金融家以及市场力量，他们依照自己的特定利益与目的来重塑巴黎，留给广大人民的只剩下失落与剥夺感。这就是福楼拜消极接受的情况。因此，在福楼拜的书中不存在将巴黎当成一个整体而做的统一定义，遑论是“有知觉的存在”或“身体政治”。福楼拜将巴黎转化成舞台，不管舞台盖得多美丽，摆设有多高贵，都只是人类活动的背景陈设。巴黎因此成了死物（奥斯曼所规划的巴黎亦是如此）。《情感教育》出版于1869年，此时奥斯曼已经完成他的工程，书中对巴黎各处无生命的景物有着细致而精彩的描写。巴黎在我们的眼里成了遗世独立的艺术作品（可以独立地予以赞赏与批评），但却完全失去了它作为“有知觉的存在”或“身体政治”的独特性格。

我们也许能这么推论，巴黎身体政治的观念于1848年被粉碎了，并且被埋葬在商品化与第二帝国景观的商业世界之下。这或许就是克拉克心里所想的。不过克拉克认为巴黎身体政治在第二帝国来临时以及奥斯曼化之后完全丧失，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路易·拿破仑以男性与父权（相对于女性）的形式召唤“皇帝双体”，帝国的身体政治遂成了一种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架构下，受到删改的圣西门原则才能发挥影响力（昂方坦在1858年



出版的《人学》，一开头就以公开信的形式赞扬路易·拿破仑)。第二帝国的历史，就是一段试图环绕皇权来重构身体政治概念以面对资本累积力量的历史，而克拉克正确地认识到，资本累积力量与这种政治形式刚好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经济自由化（始于前圣西门分子米歇尔·舍瓦利耶于1860年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条约）逐渐侵蚀皇权。帝国声势下滑的原因除了资本之外，还受到共和派（其中绝大多数都主张私有财产自由与企业自由）或工人反对的影响。1848年，身体政治明显失去的是国家养育全民的观念，如杜米埃的画所展现的。

89 骚动的论辩也消失了。法国在1830到1848年间出现了丰富的路线论战。这段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思想上与政治上都开始成形。思想界动荡不安，各种视野与空想纷纷出笼。有些比较狂野而怪异的想法甚至带有科学小说与乌托邦的特质，不过当中也有具备强烈实践倾向的，因此形成过多的政治运动，以及为数不少的实践方略，其中有些还真的付诸实行。对于阶级严密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穷人的悲惨情形、城市有害而混乱的失序以及群众（包括农民）的贫困，人们普遍认为必须要有所作为。过度严密的结构会在内部不断产生压力，到最后压力将会反过来击碎结构。这件事后来在1848年革命中发生了。至于往后碎片如何重组回去，再度形成同等严密的帝国结构—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被驱逐出境，有创意的新奇想法也被压制—则是另外一段故事。帝国繁盛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在资本力量下逐渐衰落。

帝国最后在1870到1871年的战争与革命暴力中解体。不过，随着现代性的独特资本主义形式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支配并形塑这座资本之都，巴黎此时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1848年之前，针对如何表述巴黎的问题曾出现许多讨论，1851年后，这些讨论无形中帮助巴黎走向唯物主义式的改造路线。然而，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说最烂的建筑师与最好的蜜蜂有什么差别的话，在于前者在实际动工之前会先在想象中建立结构，那么1830到1848年间的想象活动等于是为后来的人铺路，即便那些实际执行工程的人否认前人为他们提供了灵感。

第二部分

物质化：巴黎 1848—1870



FIGURE-026

古斯塔夫·多雷 (Gustave Doré, 1860) 使尽他所有的讽喻技巧来描绘巴黎的剧烈转变——奥斯曼在上方仔细研究着巴黎地图，下方则是马车夫在工人的欢呼声中运走了中古时代的建筑物。

## 序 幕

巴黎如同大海汪洋。测量它，它却深不见底。调查它，报道它！然而就算再怎么谨慎周到，派了再多探险家不断搜寻，巴黎永远都将维持处女地的模样，它就像座人烟罕至的洞穴，潜藏着难得一见的花朵、珍珠，以及前所未见的怪兽——珍奇的事物俯拾皆是，文学钻研者即便身处其中也难窥得全貌。

——巴尔扎克

如果每件事物都跟表面上看起来一样，我们就不需要科学了。

——马克思

1850年的巴黎因为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可能而骚动不已。有人认为巴黎病了，巴黎遭受政治折磨，因阶级斗争而分裂，并且在堕落、腐败、犯罪与霍乱中日渐沉沦。然而也有人认为巴黎充满机会，不管是个人野心或社会进步都可在此找到可能。如果有人能找出解开巴黎神秘面貌的正确钥匙，那么整个西方文明将为之一变。不管人们的意见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巴黎人口在这段时期急速增加，1831年有78.6万人，到了1846年竟已达到100万以上（表一）。巴黎的工业经历了一段惊人的增长期，巴黎甚至加强自己在传统上原已拥有的核心地位，因此成为法国境内交通、金融、商业、文化，当然还有政府行政的中枢。巴黎有这么一段辉煌的去，怎么可能没有辉煌的未来？

然而在1850年，巴黎似乎受困于双重的紧身衣中，这两件紧身衣彼此拉扯，将巴黎包裹得密不透风。首先，巴黎受到最广泛且深刻的资本危机的影响，而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人知道资本危机是什么。巴黎过去曾经遭遇许多次经济危机，但这些危机通常是由天灾或战争所引起。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却不一样。人们无法轻松地将它归因于上帝或自然。尽管如此，1846到1847年间的确发生农作歉收的问题，带给乡村许多苦难，庞大的难民潮因而涌入都市寻找就业或救济。资本主义到1848年已经臻于成熟，即便最盲目的资产阶级护卫者都看得出，1847年在英国发生的悲剧是肇因于金融现状、鲁莽的投机（特别是铁路事业）以及过度生产，而这些因素也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鸿沟。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同时感受到相同的危机，因此很难将问题归咎于单一国家的政府失灵。这是资本主义在完全发展之后过度累积所造成的危机，



FIGURE-027

杜米埃的《新巴黎》( *Nouveau Paris*, 1862 )捕捉到奥斯曼化之后所造成的各个方面的变化。这幅画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匆忙的人群好开心啊，他们多了这么多的交通工具。”画中的资产阶级看着手中的表，妻儿的神色则显得迟疑，路上一片车水马龙的景象。



资本与劳动力出现巨量剩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难以获利的窘境。1848年,到底是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改革,还是以革命推翻现行体制,选择已迫在眉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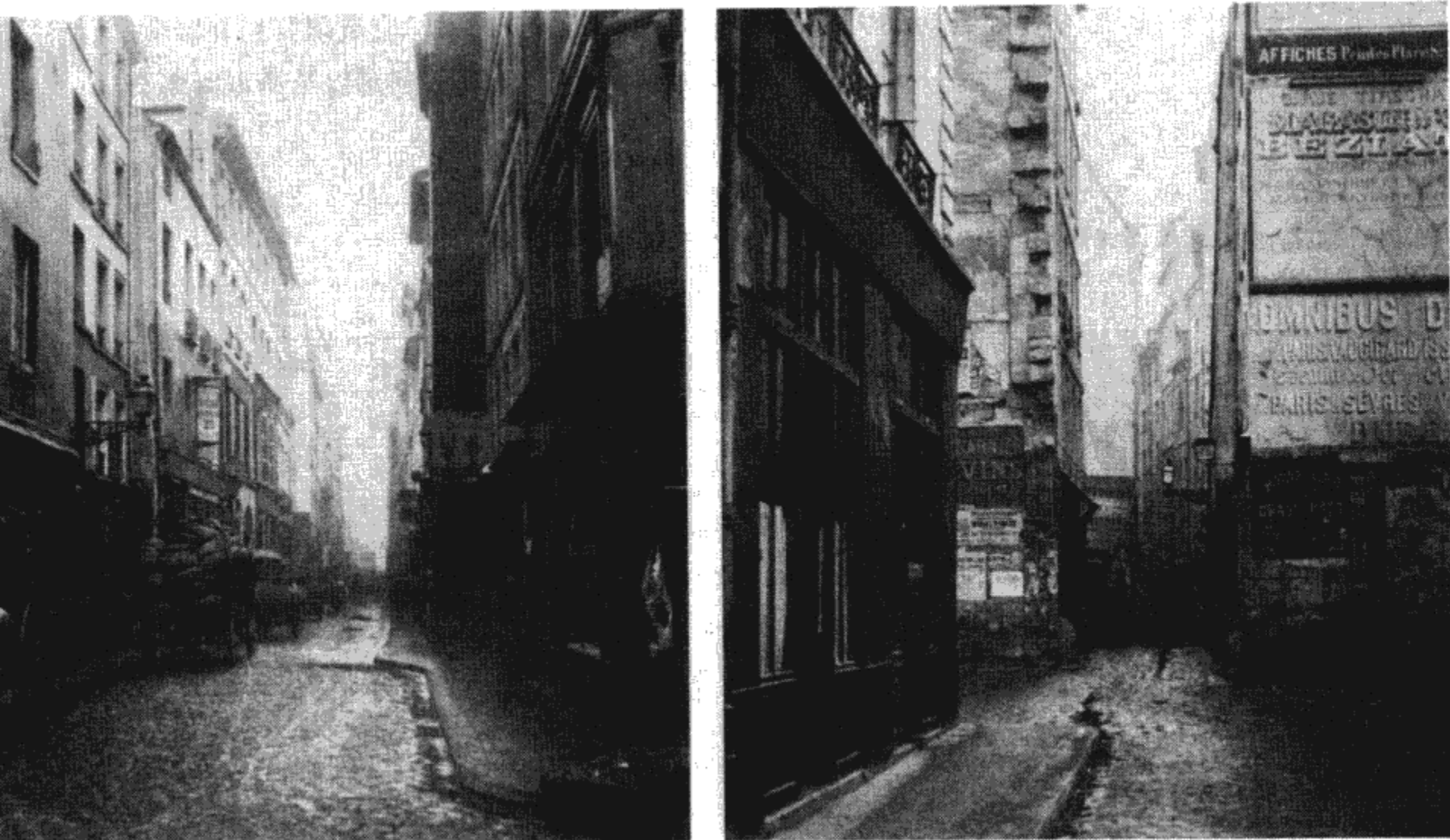
表一 巴黎人口, 1831—1876年

年份	旧巴黎	1860年合并地区	1860年后的巴黎	变动率
1831	785 866	75 574	861 436	
1836	899 313	103 320	1 002 633	16.39
1841	936 261	124 564	1 059 825	5.70
1846	1 053 897	173 083	1 226 980	15.77
1851	1 053 261	223 802	1 277 064	4.08
1856	1 174 346	364 257	1 538 613	20.48
1861			1 696 141	10.24
1866			1 825 274	7.61
1872			1 851 792	1.45
1876			1 988 800	7.4

资料来源: 舍瓦利耶(1950)

巴黎选择走向革命,并非完全出于偶然,也不只是基于巴黎闻名的革命传统——只要有一点经济困难的征兆,巴黎市民就会产生政治解读,接下来就是游行示威、树立街垒,并且宣称他们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一环。<sup>1</sup>另外一件将巴黎绑住的紧身衣则是18世纪的社会实践与基础建设所构成的扎实结构——支配着制造、金融、商业、政府与劳动关系——更别提还有中古时代的基础建设架构,各项活动与实践都受到这些陈旧之物的掣肘。虽然七月王朝时期已经开始针对都市更新进行讨论,并且也零星进行了一些工程,但巴黎早已拥塞不堪。舍瓦利耶写道:

这些年来,环顾四周,发现巴黎已经面目全非。不断扩大的城市充塞在陈旧的道路系统、公寓、房屋和通道之中,市民们摩肩接踵,填满了每个街角,贵族和士绅的昔日住所成了工作坊和出租公寓,花园和庭院建起工厂和原料储藏室,停放其中的马车则任其腐朽,不堪闻问;狭窄的街道突然拥进大批人潮,哥特式



墓地也宣告客满，重启已被遗忘的下水道，但管线早已负荷不了，垃圾与恶臭堆到了邻近乡镇。<sup>2</sup>

96 一方面，伴随而来的人类苦难、堕落、疾病、犯罪与出卖灵肉，大家已经司空见惯，这是当时工业资本主义极为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巴黎古老的都市基础设施已无法与新制造业市镇日渐繁复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组织匹敌，这些市镇不只出现在法国的主要贸易对手英国，也出现在比利时、日耳曼、奥地利，甚至法国其他地区。虽然巴黎从1830年革命之际就积极提升国际劳动分工的地位，但所做的并不是彻底改变生产体系，而是回复旧生产方法。劳动内容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碎——背后有巴黎制造业产出特殊性与巴黎内部市场规模做支撑——成为推动巴黎制造业前进的基础。不过巴黎的商业——长久以来，商业对于巴黎的经济体制一直占有比制造业还要重要的地位——却受限于雍塞的街道、关税壁垒以及货物经销流通经常性的无效率。巴黎无法满足苛刻的资本累积的新条件，因此在1847到1848年的危机中遭遇到双重且更为长久的痛苦，它的恢复之路充满了各种特殊的

FIGURE-028  
旧巴黎的街道——这里有两张马维尔摄于1850年代初的照片——狭窄而不利于通行，除了卫生条件差（阴沟的秽物一年到头都在路面横流），路旁也经常会出现倒塌的建筑物。右边照片上有块客运和铁路旅行的广告牌，许诺一个远离巴黎的空间世界。

障碍，更兼政治与文化演进所带来的怀疑、困惑与恐惧。

社会各阶层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场危机。例如有结社传统的手工业工人就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家控制了生产与流通，让工作内容失去了完整性与技术性，使他们失去独立、尊严和尊敬，他们因此面临长期失业的威胁。二月革命允许工人将劳动和工作权的问题排入政治议程，并且允许他们主张受到尊严与尊敬对待的权利，能与身体政治的其他分子立于平等的地位。如我们所见，社会共和国对他们来说就跟政治共和国一样重要。在这一点上，手工业者竟与资产阶级达成一致的共识，不过这群资产阶级的来源相当奇怪而纷杂，从小雇主、零售商人（新生产流通体系也对他们构成威胁）到失去社会地位的激进分子（新闻记者、艺术家、作家以及顽固的雅各宾派革命分子如布朗基）、浪漫派诗人和作家（如拉马丁、雨果和乔治·桑）——他们相信，浪漫化的手工业传统能维持相对安全的环境，让工作和劳动具有高贵性。虽然浪漫派分子很快就从真实工人堆栈的街垒中醒悟，但184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手工业工人的意识交融之后，还是产生了一连串关于养育式社会共和国该如何运作的期望，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

这种社会主义情感直接惊动了资产阶级。除了畏惧“红色分子”之外，资产阶级也对亟待解决的政治经济危机感到困惑，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解释与反应。有些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与金融的结构与做法跟不上时代，因此试图进行现代化，开放资本流通，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推力。巴黎的进步派人士企图以国家强力干预的方式，处理并且更新已不堪使用的巴黎基础设施。但他们的努力受到其他资产阶级派系的阻拦，要不是受困于财政保守主义（让法国在经济不景气时完全瘫痪的元凶），就是受挫于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大部分是遥领土地或农村土地，在国家残破不堪的时候拥有一块土地似乎能给人一点救赎的希望）。许多地主在1848年逃出巴黎，购买力也随他们而去。巴黎的工业、商业与房地产市场因而受到重创，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淖之中。

一连串令人困惑的事件让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那个白痴”（这个词出自无懈可击的资产阶级阿道夫·梯也尔之口，而非马克思）取得了权力，他在1848年12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全民普选），四年之后称帝。我们在此不对

这些事件多做叙述，因为早有丰富而优秀的作品对此做过探讨，其中最早出现的当然是马克思的《法国阶级斗争，1848—1850》（*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和《雾月十八》（*Eighteenth Brumaire*）。<sup>3</sup>我们只要提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工作问题和社会主义分子对危机的反应，在1848年6月的野蛮镇压中被排除在直接政治议程之外，当时巴黎工人还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关闭国民工作坊（第二共和国为了响应工作权需求而设）。随后的选举显示民主社会主义情绪仍然存在而且相当活跃，更糟的是，这种亢奋的情绪不仅存在于巴黎和里昂（预料中的事），就连一些农村地区也是如此，这不禁使法国人回想起过去革命的根源与反动传统有相当一

部分来自乡村。面对这样的威胁，资产阶级便联合起来支持流亡的民粹主义者路易·拿破仑，使其于1848年12月当选共和国总统，之后又轻易顺从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所发动的政变和1852年12月所成立的帝国。

另外一个对社会秩序所构成的威胁，源自一般经济危机所造成的资产流失与减损。资产阶级陷入自相残杀的状态，没有任何一派拥有权威或正当性来遂行自己的意志。资产阶级各个派系都认为路易·拿破仑容易控制，于是便在妥协之下选择了他，就这样，路易·拿破仑被安置在一个可以玩弄人民意志、派系主义与传统对拿破仑传奇的拥戴（尤其在军中）的位置上，并借此巩固了个人权力。不过这也使得路易·拿破仑必须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例如改革与现代化、控制劳工运动及其诉求、搞活经济，以及让憔悴的法国从1848到1851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病症中恢复元气。

第二帝国为期18年，完全未如梯也尔和马克思（来自政治光谱的两端）所预言的那般“痴呆”与“滑稽”。第二帝国是一场相当严肃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验——它是同时拥有警察力量和民意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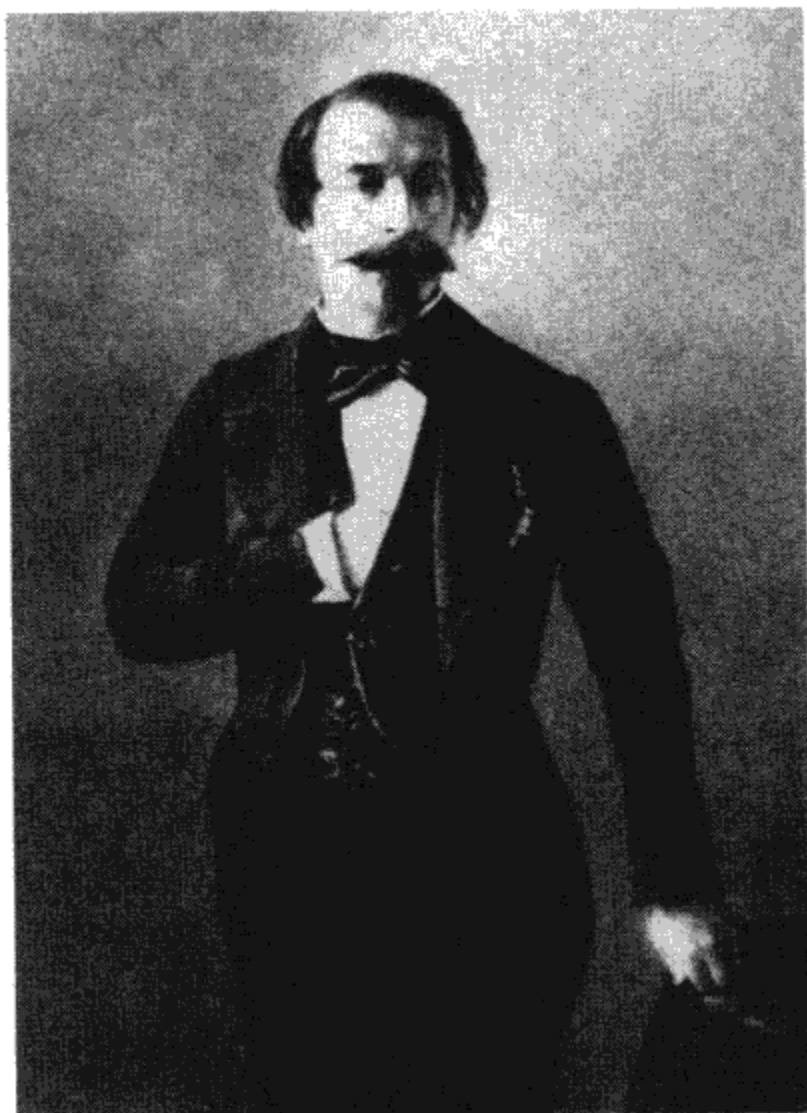


FIGURE-029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肖像照，由里福（Riffaut）、马耶尔（Mayer）和圣维克托（Saint-Victor）合摄。

础的独裁国家。第二帝国和许多同类的实验一样，最后因内部冲突和对外战争而崩解，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严酷的劳动纪律以及从先前限制下解放的资本流通。不过，在第二帝国时期，该实行什么样的新社会实践、制度架构和结构或社会投资，并不十分清楚（不像现在这么明确）。第二帝国必须适应急速发展和索取无度的资本主义，在当中，多重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有意识地为自己寻求各项优势或解决方案，却发现自身的行动反而造成自己不愿见到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皇帝与他的幕僚试图将巴黎——及其生活、文化和经济——从牢不可破的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虽然这时有相当急迫而明显的需求——例如改善通往巴黎中央果菜市场的交通路线、清除市中心周边的贫民窟，以及改善火车站之间以及前往市政中心的交通要道——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国家在私利和资本流通上所扮演的角色；国家对于劳动市场、工业和商业活动、居住和社会福利供应等的干预程度。最难处理的是政治问题，既要让巴黎经济重新立足，又要避免引起力量仍然强大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强烈抵抗，防止中产阶级产生不安全感（表面上看起来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却无时无刻不处于被边缘化的威胁当中），以及避免逼迫工人走上暴动一途。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必须说，皇帝一开始虽然能肆无忌惮地玩弄阶级力量，但到头来他反成了阶级力量的阶下囚。皇帝之所以能为所欲为，恰恰显示出1848年革命所造成的混乱有多大，这场大乱影响的不只是经济与政治，还包括了传统表述世界的方式和依据这种表述方式而进行的各项行动。巴黎的生活在1848到1851年间完全处于骚乱之中，这场骚乱除了影响绘画（库尔贝在这段时期打入那个无法理解他的意义的艺术世界）、文学、科学和管理，同时也波及了工业、商业和劳动关系。只有在喧嚣归于沉寂之后，对帝国专制主义的反抗口径才趋于一致。

1870年的巴黎，情况与1850年有着根本的不同。当中的变化扩及各个层面，影响也非常深远，尽管如此，却不足以防止另一件巴黎史上的大事发生，即催生1871年巴黎公社的暴乱。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之间虽然有连续性，但同时也有许多差异。18年的帝国统治深深刺激着巴黎人的心灵意识，其深刻程度与奥斯



曼将巴黎开肠剖肚、重组城市的血肉组织不相上下。

100

1853年6月，帝国成立后七个月，巴黎的命运被交到奥斯曼手中，此举无疑将改变巴黎的历史。<sup>4</sup>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英文版页8—10），奥斯曼将重建巴黎的重要性予以神秘化，并且塑造了一种与过去完全决裂的观点，谈到他本人时，则说自己所做的完全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意志。虽然没有所谓的完全决裂，但的确存在着转折点。迥异于他在《回忆录》中为自己所塑造的形象，奥斯曼其实有着相当浓厚的马基雅维里气质。他胸怀野心，醉心权力，并且热情投入（他对公职有着非常特殊的看法），准备以长期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奥斯曼获得路易·拿破仑的直接授权，因而拥有破格的个人权柄，而他也准备淋漓尽致地发挥。奥斯曼精力充沛，组织力强，一丝不苟，不过他向来轻视别人的意见，甚至反抗权威（即便是皇帝的命令），游走于法律边缘，并且采用我们现在称之为“创造性会计”的财务策略，除此之外，奥斯曼也一意孤行，完全无视民意。奥斯曼老早就展现出这些特质，相对于贝尔热的财政保守主义与民选市长的限制，这种特质无疑更能讨好路易·拿破仑，果不其然，日后即由奥斯曼取代贝尔热的位置。奥斯曼判断，皇帝对他的支持应该至少可维持到1860年代初，因此他立即将市议会（谨慎的贝尔热受民意限制而动弹不得）与计划委员会（奥斯曼宣称他得到皇帝的默许，然而这完全是他杜撰的）排除于决策体系之外。简言之，奥斯曼是倾向专制的波拿巴主义者，他不仅成功地在政界存活下来，而且还大放异彩。然而当波拿巴主义于1860年代逐渐屈居自由主义之下时，奥斯曼也开始失势，最后于1870年1月以牺牲者的姿态遭到免职，与此同时，自由民主派人士埃米尔·奥利维耶（Emile Ollivier）成为首相。

奥斯曼最让人好奇的一点就是，他一方面非常了解总体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深知巴黎作为一个都市经济体所面临的特殊危机，以及危机背后的脉络，但他的注意力却经常集中于令人头痛的细节问题上。他仔细地监督街道陈设的设计（例如煤气灯、小报摊，以及街道便斗的设计），并且坚持各个环节都必须成直线排列。奥斯曼将横跨塞纳—马恩省河的苏利桥（Sully Bridge）转了个弯，如此一来先贤祠便能与巴士底纪念柱成一直线，而在杰出的工程成果下，他顺利地将胜利纪念柱（Victory Column）移到新



FIGURE-030

珀蒂 (Petit) 的奥斯曼肖像，以及将奥斯曼描绘成“直线的阿提拉” (Attila of the Straight line) 的讽刺漫画，他手上拿着圆规和三角板，主宰巴黎地图的绘制。

开辟的沙特莱广场 (Place Châtelet) 正中央。更奇怪的是，奥斯曼坚持要建筑师巴伊 (Bailly) 将商业法院的圆顶取下，好让整个视线与新辟建的塞瓦斯托波尔大道 (Boulevard de Sebastopol) 的动线成一直线。在局部地区则特意营造不对称的景观，好让整座巴黎市产生均衡对称的效果。

到了奥斯曼被免职的时候，他所推动的都市转型已经上路，力道之强已无人可以阻挡。奥斯曼化——其代表作厥为歌剧院大道 (Avenue de l'Opéra) 的落成——在奥斯曼去职之后仍持续了好几年。而这种持续有一部份仰赖奥斯曼所网罗的、由优秀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所组成的坚强而忠诚的团队——阿尔方 (Alphand) 负责公园，贝尔格朗 (Belgrand) 负责供水和下水道工程，巴尔塔重建巴黎中央果菜市场，建筑师如希托夫负责建造纪念碑，达维乌 (Davioud) 负责建造喷泉。这些人都有着强烈的人格与极高的天分，起初 (有时可说是持续性地) 他们与奥斯曼颇

有冲突，之后他们逐渐明了，没有奥斯曼的支持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正如没有皇帝的支持，奥斯曼无法全力施展一样。这个团队合作的成果一直留存至今。神庙广场(Square de Temple)中央的公园出自阿尔方之手，正对着神庙广场的第三区政厅则是希托夫的杰作，至于旁边可遮风避雨的中央市场则由巴尔塔一手主持。这些工程的价值已经获得证明，建筑师和行政官员的声名大噪，都市计划展现的逻辑也受到肯定，人们普遍同意巴黎往后30多年的发展基本上完全遵循奥斯曼所定的路线。

101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一个全新的行动和思想规模被建立起来，难以逆转。关于这一点，最佳的代表作就是转型后的巴黎中央果菜市场。它不只是栋建筑物或表现出某种建筑风格，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出“商业都市主义的新概念”，在都市里规划出完整的区块，使其具有单一功能。这项创举让城市出现全新的风貌。不过范赞腾(Van Zanten)认为，当时的奥斯曼似乎迷失了：“1860年代初，1853年的初始计划要不是已经完成就是正在进行中，接下来的新计划对原本的计划做修改、加强和延伸，然而新计划却造成规模改变、失焦和不协调……前十年的工程缔造伟大的成就，但现在的工程却完全失去控制，并且引起1867到1869年的财务危机，最后导致奥斯曼下台。”<sup>5</sup> 奥斯曼希望而且也曾短暂地获得完全的成功，但他却未能留住胜利的果实。

102 该怎么诉说第二帝国巴黎剧烈转变的故事？简单而直接描述历史—地理变迁也许就相当足够。事实上，这方面已有几部杰出的作品。<sup>6</sup> 然而，如果我们未对巴黎内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运作和互动有适当的理解，又怎能完整地描述这段转变的过程？像奥斯曼这种对细节锱铢必较的人，如何能维持巴黎的整体景观？将整体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可能会让原本彼此交织的繁复互动体系失去联系。然而，无法捕捉细节和理解组成部分的运作方式就无法认识整体。我将在整体与部分之间采取折中途径，试着从一连串交错而连锁的主题（只要少了一个环节就无法恰当理解）来理解第二帝国巴黎历史—地理的转变，并且在追求相互关系的同时还要避免陷入乏味的重复当中。在此我必须提醒读者，在理解主题时要心存整体视野，整体中各部分的相互关系构成特定时空下社会转变的驱动力量。



FIGURE - 031

巴黎就像穿着华服、态度傲慢的女士，忘恩负义地在1870年斥退奥斯曼，即便奥斯曼曾送她各种华贵的礼品，她也毫无顾念。

这些主题依照不同的标题集合起来。我将以空间关系作为起点，部分是因为我认为空间关系的物质性及其社会影响是整个分析的核心，同时也因为空间关系经常被人放到最后才加以讨论。我并不是指空间关系在整个分析上具有特权，然而如果在论证过程中需要给予某个论点一个优先的地位（凡事总有起头），那么为什么不先从空间关系的生产开始，只是以往人们并不这么做而已。空间关系之后的三个主题——金融资本、土地利益和国家——彼此联结，构成社会生产可分配成利息、租金和租税的理论。将分配放在生产之前似乎有点奇怪，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评论的，这里存在着“初始的由生产所决定的分配”，这是理解资本主义运作的关键。本书章节

安排的基础在于，新空间关系（外部和内部）乃是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在都市转型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必须痛苦地进行调整以配合其他部分。国家当然不是只有分配方面（虽说没有税收，国家就动弹不得），因此国家的其他方面如国家行动、正当性和权威也都会在随后的章节适当地提出来说明。

之后则要检视生产和劳动过程。技术、组织和位置的转变与不断变迁中的空间关系（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兴起和巴黎内部的组织重整）以及信贷、租金成本和国家政策（如此正说明了分配与生产在都市脉络下彼此连锁）密不可分。不过生产者也需要劳工作为主要生产力。这使我们考虑到巴黎的劳动市场以及连带的各项条件，如人口增长、移民、工资率、失业的工业预备军、技术水准、工作态度和劳动组织。

妇女的劳动参与相当重要，但也引起争议。妇女是沟通劳动市场与家庭中劳动力再生产的桥梁，妇女在巴黎整体社会中的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此可运用社会学脉络从长期角度来思考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大部分发生在巴黎以

103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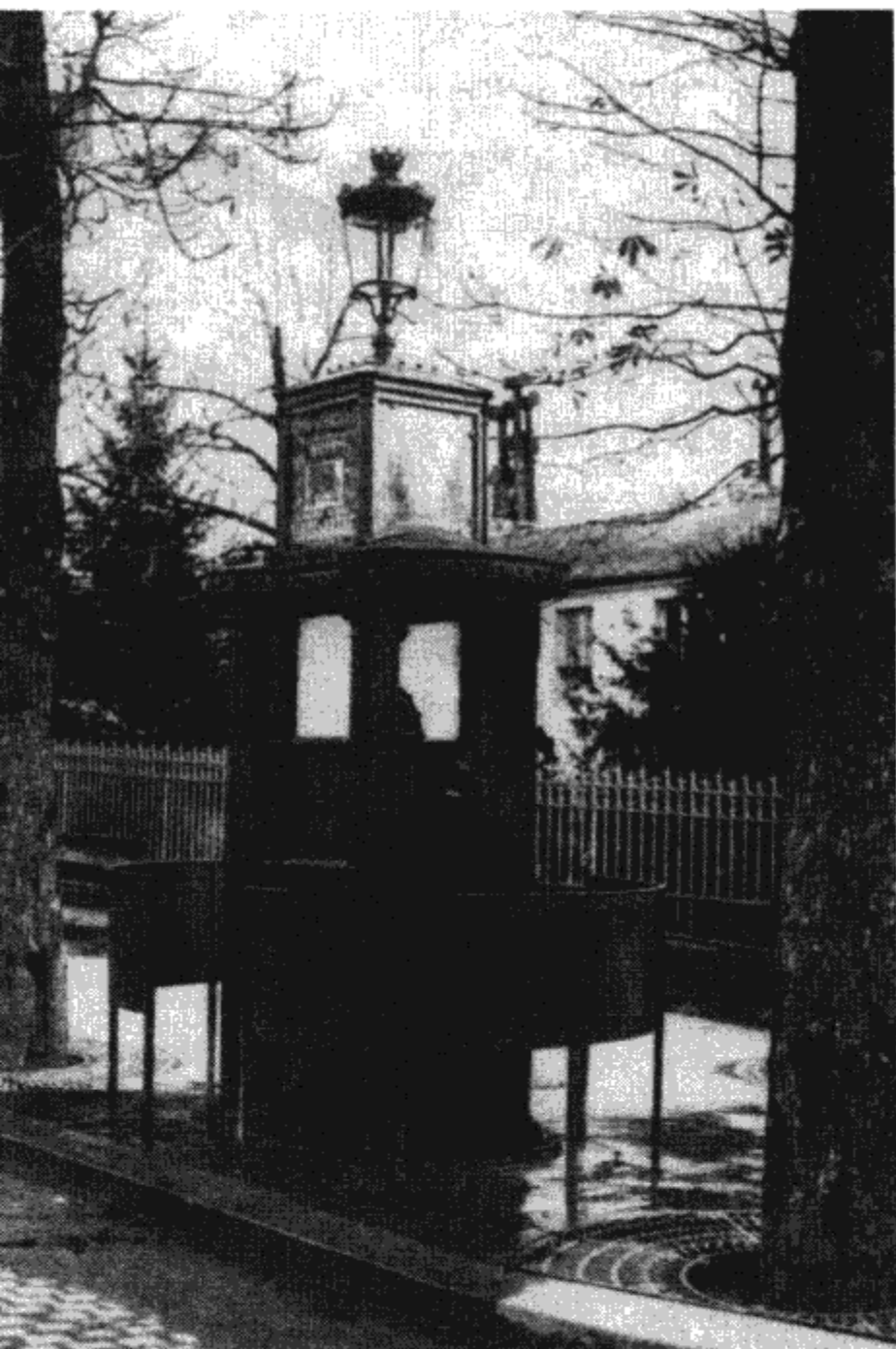


外的地区，因为巴黎劳动市场的来源主要是1850与1860年代移入巴黎的外省移民。我们不禁思索，巴黎是如何通过消费结构和景观结构来再生产阶级关系并对阶级关系进行社会控制。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比较容易思考社会中相互加强且历经剧烈转变的共同体和阶级的现实与概念。

虽然城市经常被视为是根据人类需要、需求、欲望、能力与权力所营造出来的人造物，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城市对生态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新陈代谢以及和自然维持“适当”关系的问题往往在当中浮现。例如，1832年与1849年的霍乱疫情就尖锐地凸显出都市健康与公共卫生的问题。这些议题在第二帝国巴黎很受重视。当时提出了许多关于科学与情感、修辞与表述的问题来探讨人们知道什么、如何知道，以及人们如何将自身观念落实在工作中，让工作能更具社会性、经济性与政治性。在此，我

FIGURE-032

奥斯曼格外留意细节。左图，他结合新煤气灯和街头便斗（专供男性使用的街头厕所）。右图捕捉到了街道细部陈设（煤气灯）和热情追求直线与建筑风格一致（拍摄地点是塞瓦斯托波尔大道）的混合体。马维尔在当时所拍摄的数百张街头照片，现已成为完美的细部陈设资料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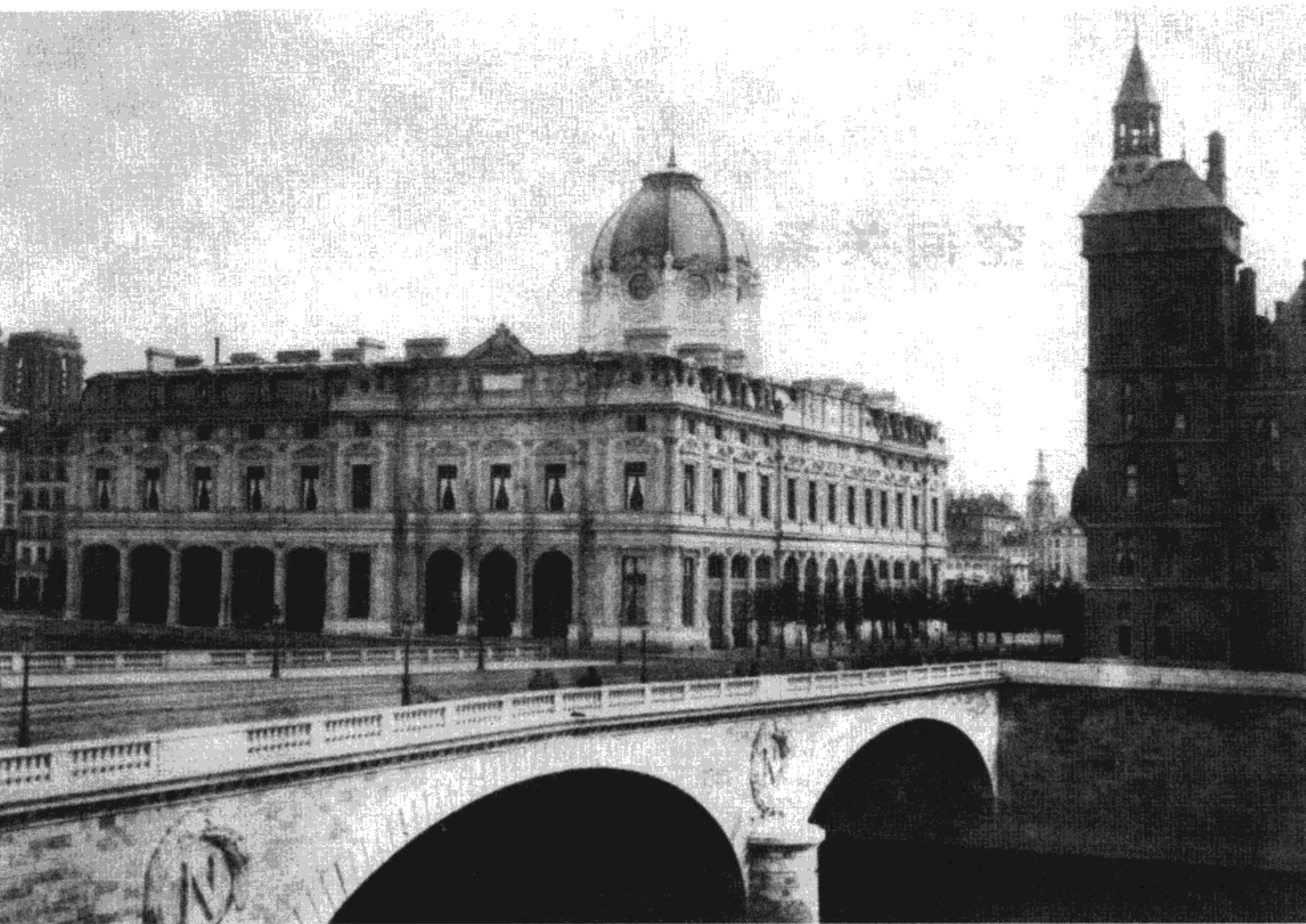


FIGURE-033

奥斯曼对于直线极为热衷，他坚持巴伊必须重新设计新商业法院。法院圆顶被移到建筑物侧边，从塞瓦斯托波尔大道看去，刚好与法院附设监狱塔楼构成对称。为了巴黎整体的对称而牺牲了建筑物的对称。照片为马维尔所摄。

尝试重构意识形态与意识状态，至少清楚说明它们的内容，使其能有助于当下的思索。这么做可以让我们更能理解所谓的“都市历史地理学的地缘政治”（最后一章）。可以想见，本书的主题将以螺旋的形式向前推进，从空间关系开始，行经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以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

# 空间关系的组织

生产越是仰赖交换价值，乃至至于仰赖交换本身，对流通成本来说——通讯与运输的工具——就会让交换的外在条件显得越重要……资本一方面必须致力于拆除所有空间障碍……并且征服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则必须致力以时间来废除空间。

——马克思

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关注法国国内空间的整合问题。但一直要等到1850年，“引进了现代大规模资本主义结构和方法之后，才使空间的征服与合理安排，以及空间必须更有效地适应新需求，成为迫切处理的对象”。<sup>1</sup>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到的，关于巴黎内部空间的改善问题，在七月王朝时期曾有过零星的讨论，也进行了部分的改善工程。到了1850年，改善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路易·拿破仑决心从两方面着手。早在1850年12月，路易·拿破仑就已经明白表示要全力美化巴黎，并且改善巴黎市民的居住环境。他说，我们将“开辟新的道路，并且改善人口密集区空气和光线缺乏的问题，我们要让阳光照射到全城每个角落，正如真理之光启迪我们的心智一般”。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表示，即将成立的帝国将致力于和平的工作。他宣布，“我们要大量开垦荒地、开辟道路、挖掘港口、疏浚可通航的河流、完成运河及铁路网的铺设”。<sup>2</sup>这些计划完全反映出圣西门信条的影响。1853年6月23日，奥斯曼就任塞纳—马恩省省长，受命根据计划改造巴黎。



FIGURE-034

如杜米埃所呈现的，铁路将巴黎周围的乡村整合到都市网络的同时，也造成城市的混乱与匆忙。然而无论如何，时间还是最重要的！

表二 1852到1869年，法国国内运量模式

年份	商品（每吨的千公里数）					旅客（每位旅客的千公里数）		
	道路	运河航行水	沿岸船运	铁路	总计	道路	铁路	总计
1852	2.6	1.7	1.3	0.6	0.6	2.6	0.99	2.35
1869	2.8	2.1	0.8	6.2	6.2	2.8	4.10	5.56

资料来源：Plessis (1973), 页 116

新生的社会与政治系统开始运作，并且将渴望已久的梦想与视野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与此同时，权力也开始高度集中。1848年，资本和劳动力过剩所造成的冲击，此时通过空间关系改善计划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投资而加以吸收。帝国成立后不到一年，杜伊勒里的建筑工地已吸收了数千名工人；铁路工程吸收的人力更是无法计算；到了1851年，仍处于荒废状态的矿场和炼铁厂也在需求暴增下欣欣向荣。借由重整运输和通讯系统而长期吸收过剩资本与劳动力，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似乎就这样克服了。

成果看起来相当辉煌，而其影响更是惊人。铁路网从1850年的少数几条路线（精确的数字是1931公里）扩展成1870年（图35）长达17400公里的复杂网络。交通运量与工业产出同时扩大为原来的两倍，而这些运量也从其他运输模式转移到铁路上面（表二）。虽然帝国大道衰颓，但与铁路系统相连的支线道路，其交通流量却逐渐增加，道路质量也逐渐改善。电报系统在1856年还付之阙如，但十年后却已铺设了2.3万公里，而且利用者不限于政府。波德莱尔写道，“拿破仑三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证明了任何人只要能控制电报和全国性媒体，便能控制整个法国”。<sup>3</sup> 不过电报也促进市场与金融决策的协调。人们可以持续取得巴黎、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等地的商品价格，之后，就连伦敦、柏林、马德里和维也纳等地的商品信息也能实时披露。虽然皇帝未能履行港口和海上贸易的承诺，但他将过剩的法国资本投资于国外事业，所获的利益已不仅是将功补过所能形容。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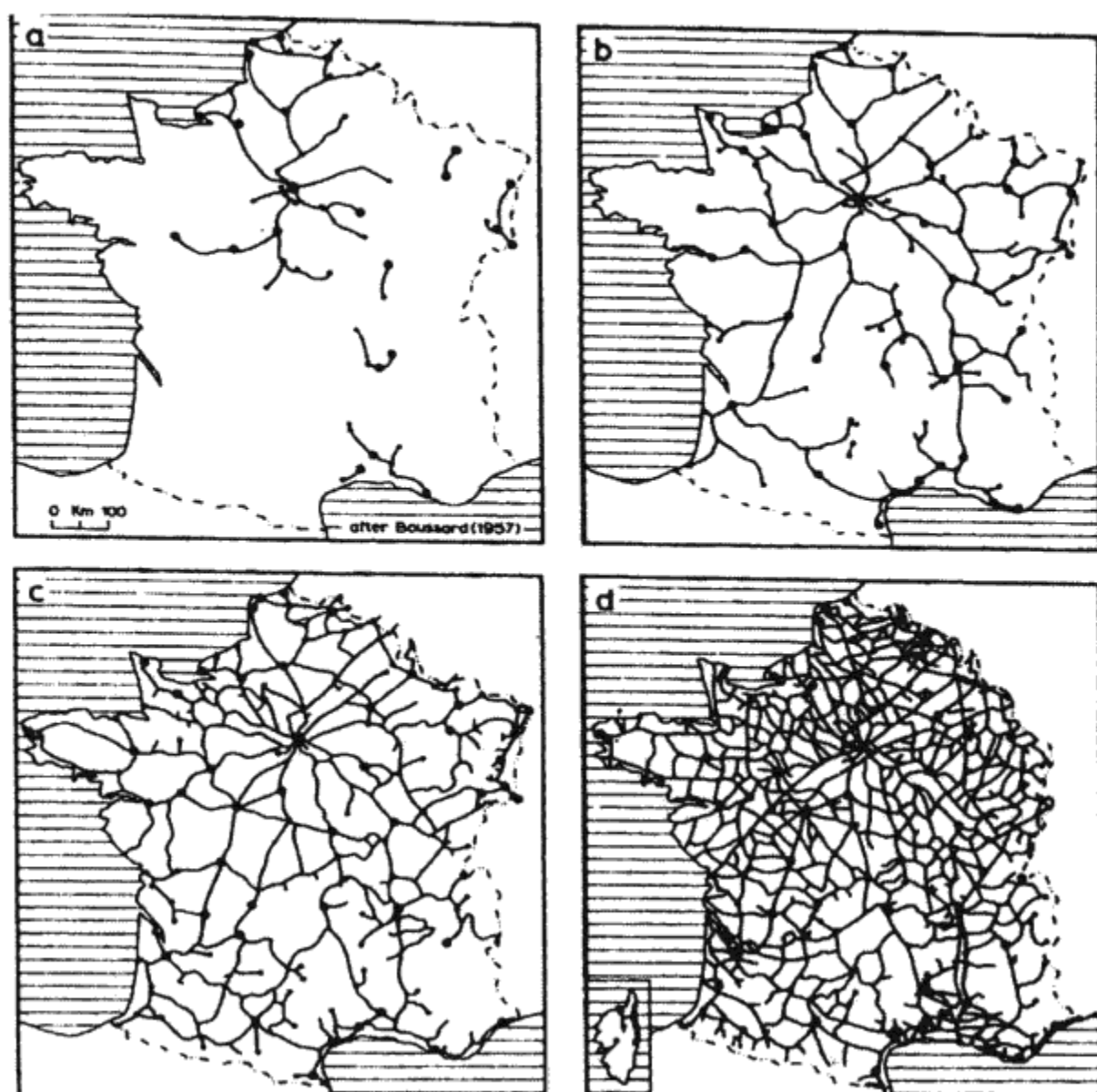


FIGURE-035  
 法国铁路网的变化：  
 (a) 1850  
 (b) 1860  
 (c) 1870  
 (d) 1890

运河。运输和通讯系统，作为新世界市场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在 1850 到 1870 年间广泛地建设完成。

如果不是路易·拿破仑当政，法国是否仍会进行大规模运输和通讯系统的建设，这个问题曾引发不少争论。毕竟在当时，只要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莫不对运输和通讯进行大规模投资，反观法国，虽然从 1852 年开始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也仅能勉强跟上列强的脚步，甚至还落后一些。只有在少数例子上，法国才能合理宣称其指导原则和物力乃是促成计划完成的核心力量，例如苏伊士运河。人们也同意皇帝及其幕僚（以财政部长佩尔西尼 [Persigny] 为首）的圣西门倾向使他们在推动政府政策的同时也进行金融改革，这种特殊的混合对于 1852 年后的大繁荣有直接的贡献。吸收过剩资本与劳动力的作法很快就遭遇瓶颈。问题出在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力”雇用总是意指可获利的雇用。一旦较能获利的铁路路段在 1855 年完成，再加上奥斯曼的首波道路网在 1856 年完成，国家就必须另想良方让运输工程能继续进行下去。到了



1860年代中期，整个建设计划开始与资本主义的金融现实发生冲突。因为这个计划的推行不仅来自皇帝及其幕僚（包括奥斯曼）的指令，其组织也必须通过资本家社团才能进行。因此，计划本身必须受制于借由资本累积来获利的强力却矛盾的逻辑。

111 举例来说，将新铁路网的中心设于巴黎，表面上看是为了政治与战略的原因，实际上完全是为了经济需要，巴黎因此成为法国的首要市场和首要制造业中心。经济的群聚效果自然为巴黎吸引了新的运输投资和新形式的经济活动，因为巴黎是铁路网的中心，也是最能获利的地方。群聚效果也为巴黎工商业开启了地区间与各国间的竞争，并且使其更容易取得出口市场。巴黎工商业的地位因此随着转变中的国际劳动分工而改变。巴黎聚集原材料的成本降低（当煤产地加来海峡[Pas-de-Calais]的煤价上涨时，巴黎的煤价居然下跌）；影响所及，巴黎工业的投入成本变得比较便宜。货物流入工厂和流出进入城市的频率、数量和速度都增加，不仅降低资本周转率，也开启大企业在生产与分配两方面营运的可能。

零售业革命——大型百货公司首先在1840年代开始兴起——与商人和生产者间权力关系的变化，有一部分乃是新空间关系造成的结果。<sup>5</sup> 巴黎的粮食市场得以摆脱供给经常出问题的当地粮商，并逐渐将货源转到外省与国外粮食产区，以此掀起一波“真正的消费革命”。<sup>6</sup> 原本在巴黎相当繁盛的菜园、果园和饲养家畜的地方到了1870年大部分都消失无踪。<sup>7</sup> 资产阶级希望吃到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南部的新鲜蔬菜，穷人可以吃到西部的马铃薯和东部的芜菁，饮食因此得到改善。移动的不只是货物，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涌入巴黎（有效增加了需求），郊区的店家也往巴黎集中，巴黎劳动市场则将其触角伸展到更远的地区以满足快速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外在空间关系的转变，迫使巴黎必须加紧让自身的内部空间更加合理。奥斯曼在这方面的功绩，理所当然成为现代主义都市计划的伟大传奇。<sup>8</sup> 在皇帝的支持下，再加上当时需要大型公共工程计划来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奥斯曼于是便有体系地计划对巴黎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空间架构进行重整。投资所涵盖的不只是新的道路网，还包括下水道、公园、纪念碑和象征空间、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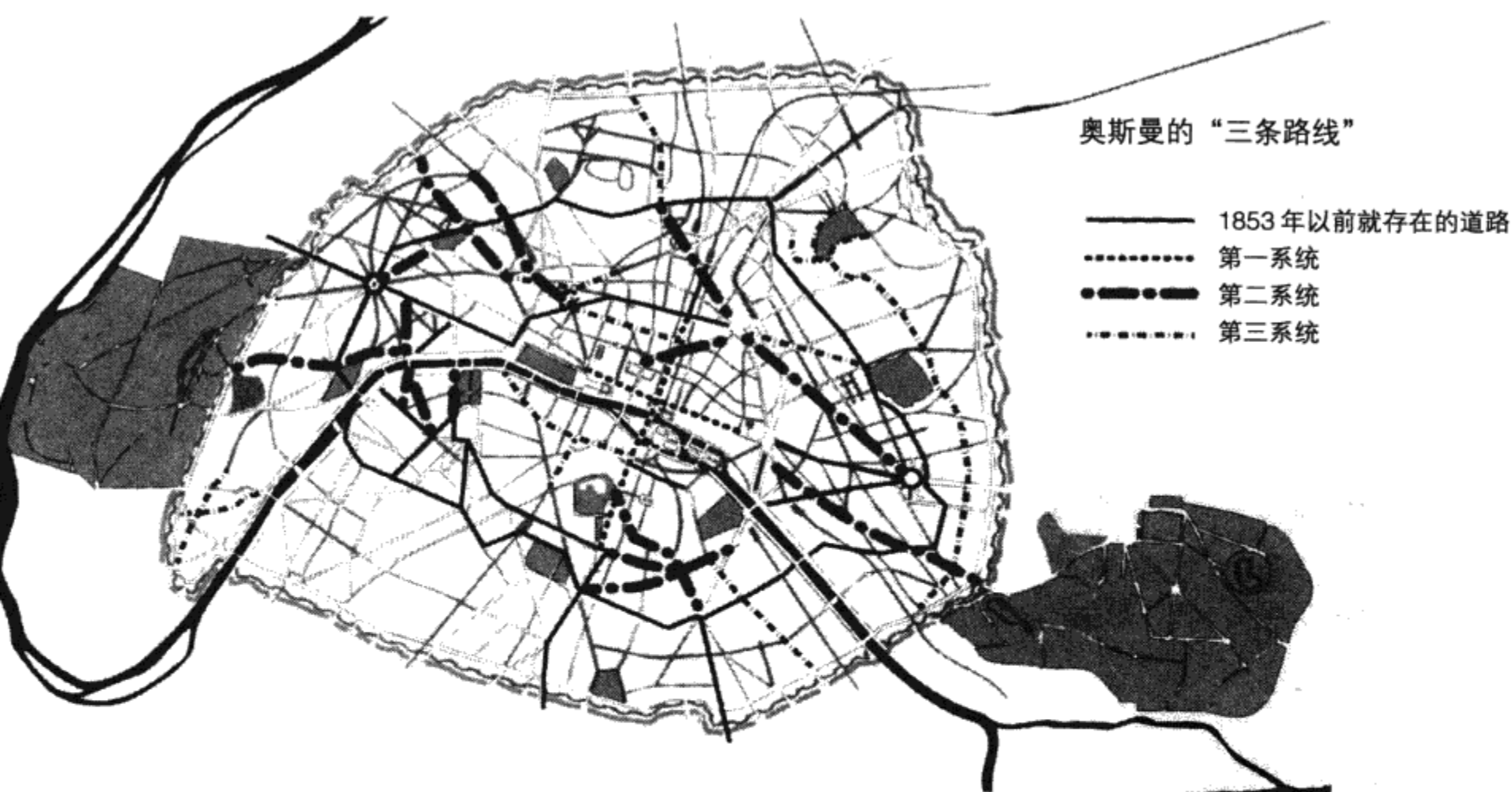
教堂、官署、住房、旅馆、商业建筑等。

奥斯曼所部署的都市空间概念无疑相当新颖。他并不是要兴建“与各地区毫无关联也毫无纽带关系的大道通衢”，相反，他希望能有一个“通盘的计划，能够周详而恰当地调和各地多样的环境”。<sup>9</sup> 都市空间应视为一个整体，城市各个分区与不同功能应互相支持以形成可运作的整体。这种对都市空间整体的持久关怀，引领奥斯曼致力于将市郊并为巴黎的一部分，但皇帝对此并不是完全支持，因为市郊的任意发展将对巴黎都会区空间秩序的合理演进构成威胁。1860年，奥斯曼终于成功了。在这个崭新而扩大的空间中，奥斯曼创造了繁复的地区行政等级——他自己当然立于顶端——通过这个等级，权力与责任将可有组织地分散与委派给20个行政区，巴黎复杂的整体性就可以受到更好的控制。奥斯曼在每个行政区建筑区政厅，象征行政机构在人民面前的在场。通过立法和游说，奥斯曼宣传：对巴黎空间关系进行合理而有秩序的发展将产生公共利益。他还因此在各地与个人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私有主义及地方主义奋战，但最后并不成功。

112

FIGURE-036  
奥斯曼在各个建筑阶段所  
兴筑的新大道

奥斯曼对精确空间协调的热情，表现在以三角测量法绘制地



图上，1853年，出现了第一张精确的巴黎地籍簿和地形图。施行直线逻辑、坚持对称与均衡、重视整体逻辑、为空间设计的规模和风格定调的幕后首脑，毫无疑问是奥斯曼，而非皇帝。但是真正使奥斯曼成为现代主义都市计划肇建者的，乃是规模本身的宏大以及计划与概念的全面性。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在许多年后强调，“不做小计划”，奥斯曼的行事风格确是如此。

113

然而不管奥斯曼与皇帝打什么主意——建立西方的首要之都以与帝国时代的罗马匹敌、庆贺新帝国的成立、将“危险阶级”和有害的住房及工业从市中心驱逐出去——他们的努力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改善巴黎市内货物与人员的流通量。新建火车站之间、市中心与市郊之间、左岸与右岸之间、进出中央市场、来去于各处娱乐场所（白天到布洛涅森林，晚上到大道）、工业区与商业区之间（前往新百货公司）的流动，因为长达90英里宽敞大道的辟建而变得快速，同时也大幅降低移动的成本、时间与拥塞不堪。在佩雷尔兄弟的协助下，奥斯曼于1855年将所有公共马车公司合并为一家民间独占企业——巴黎公共马车公司，旅客数量因此从1855年的3600万人增加到1860年的1.1亿人。新道路系统还有一项额外的好处，它整齐地环绕在传统发生革命动乱的中心周围，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调派维持秩序的部队前来。新道路系统也将新鲜空气带进有害健康的地区，白天有耀眼的阳光照射，晚间则有新设的煤气灯照明，如此便加强了都市主义的外向形式，大道上的公共生活成了城市外貌的表征。除此之外，奥斯曼对下水道所进行的革命性建设，其杰出的工程成就直至今日仍不失光彩。

这个成果需要无情的执行力，也需要花费时间、金钱、技术，更重要的是仰赖奥斯曼不可思议的精力和行政能力。没有人怀疑奥斯曼在改善运输工具上的热情和长期投入。1832年，奥斯曼首次被任命为内拉克（Nerac）这个偏远农业市镇的副市长，要不是因为他懂得规避市长的权威并诉诸创造性财务这种法律模糊地带，五年后，内拉克不可能拥有几公里长的地方道路和新桥梁，以及与邻近主要市镇联结、路面平整的快速道路。

不过巴黎内部空间的剧烈转变也不全然因奥斯曼而起。将塞纳—马恩省河主轴线的交通流量分散到各个铁路终点站——七月王朝时期曾有过长期辩论（见图25）——并不是奥斯曼的成果，

这项建设早在奥斯曼之前就已完成，而且因为这项建设，迫使奥斯曼必须大兴土木。奥斯曼随即理解到，当前“首要之务”就是“兴建大道将火车站——现在已是进入巴黎的主要入口——与市中心直接联结在一起”。<sup>10</sup> 环绕巴黎并且赋予市郊增加动力的内环铁路，其实也不是奥斯曼兴建的。而我们将看到，在不动产市场上，在工业场所和劳动过程上，在营销和分配系统上，在人口分配和家庭形成上，奥斯曼所做的是调整而不是指挥。因此，重塑巴黎内部空间其实是为了响应已经正在进行的过程。另一方面，重塑巴黎内部空间，这种做法也形成了一种空间架构，已经进行的过程——工业和商业发展，住屋投资和住宅区规划等——可以在这个架构下产生群聚效应，也可以有各自的发展路线，如此便可展现出城市演进的新历史地理学。

奥斯曼相当了解自己的角色限制。虽然他有专制的权柄并且经常沉醉于华丽的幻想中，但他也知道，如果巴黎要转型，光是将货物与人员从中古时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奥斯曼必须动员的力量就是资本的流通，但到最后这股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他。这也是帝国成立之初不得不面对的状态。如果帝国要存续，就必须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用来转变巴黎内部空间的公共工程，可以吸收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通过在现有环境下建造特定的空间配置，可以促进资本的自由流通。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之后，资本便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原则重新组织巴黎的内部空间。奥斯曼想将巴黎打造成法国的现代之都，也许还能成为西方文明的现代之都。然而到最后他只成功地让巴黎成为由资本流通掌控一切的城市。

新空间关系对于巴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深远，对于巴黎人的感性更是影响巨大。面对行车时间缩短的世界，空间关系被急速压缩，巴黎人因此感到手足无措。第二帝国经历猛烈的时空压缩之后，时空的矛盾效果也开始在各地出现。新运输系统的投资方针，重申要朝着行政、金融、经济和人口往巴黎集中的方向进行。然而这种做法又再度唤醒人们对这个棘手问题的注意：国家的政治权力应该在地理集权与地理分权间求得平衡，而在建构公民权利与政治认同时，各个行政区的角色便成了争论的焦点。<sup>11</sup> 在许多人眼中，中央集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巴黎就是中央集

权”，皇帝骄傲地宣称，“巴黎是法国的头与心脏”，奥斯曼进一步补充。<sup>12</sup>然而这种说法对于地方共同体的生存与意义构成挑战，甚至连巴黎内部的地方共同体也深感威胁；政治利益的地理疆界越来越模糊，对乡土的政治认同也越来越仰赖诉求，而非只是居住。

规模问题不只奥斯曼关心，金融家与资产阶级也相当关注。工人运动的新国际主义与地方自治的渴望与斗争结合在一起，两者虽然看起来很不搭调，却在1840年代成功煽动了工人情绪，往后甚至巴黎公社（坚决主张地方拥有自治权利）也沾染上他们的特殊政治色彩。通过发行通货和商品交换，世界逐渐整合为一，1855年和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即是为了赞颂世界的整合而办。这两次博览会的焦点不只在于技术发展，还在于空间联结下所产生的新世界，这种联结的实现主要通过现代的通讯网络和商品交换而达成。雨果在1867年的《巴黎指南》描述了当时他在万国博览会的见闻，并且天真地赞颂欧洲统一的实现（圣西门于1820年代就曾提出欧洲统一的观点）——摆脱国家疆界，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然而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紧张感正在升高，三年后，普法战争毁灭了欧洲统一的美梦，也为第二帝国画下句点。万国博览会合并了普世资本主义文化的幻影及其空间关系，就连雨果也在当中受到蒙蔽，未能看出对土地的忠诚与认同中所蕴涵的意义与力量。

运输和通讯方面获得了改善，然而交通拥塞的状况并没有舒缓多少，只有在速度与规模上有点小差异。1855到1860年间搭乘公共马车的旅客人数增加到原来的三倍，由此可知交通拥塞的真正原因。杜米埃有许多讽刺画都是针对这些新运输形式，他的画凸显了道路上、车站里以及大道旁的匆忙与快速；过度拥挤所产生的压迫感；人们必须不断地在个人隐私和公共空间之间取得平衡（见图19、34、37和38）。火车车厢按照阶级来划分，公交车则以“上层或里层”来做分野，然而不管是哪一种车厢，只要遇到拥挤的状况就很难维持

FIGURE-037

大道上增加的公共马车班次并没有解决巴黎交通拥挤与不便的问题，至少从杜米埃1856年画的这幅画是看不出来。







FIGURE-038

铁路旅行蕴涵着深刻的意义，人们在火车上体验到旅行的公共空间，发现要保持私密非常困难，杜米埃许多讽刺画都提到这个问题。早期曾为区隔上层阶级旅客与一般旅客而制造了孤立车厢，但却因为有旅客在这种车厢中被杀害而作罢。在画中，杜米埃（1864）对于三流车厢大加赞赏，虽然可能有人被闷死，但绝不会有人被杀死。

个人的隐私及私密。铁路交通的革命，不只是空间关系的物质性，还包括了社会关系、私密性与感受。<sup>13</sup>市郊以及更远的农村地带都被卷入巴黎生活的混乱当中，这也表示在都市化的过程中，人们无处可逃，至于中产与富裕阶级拼命地在如今比较容易抵达的乡村中寻找休闲与愉悦，这一点很快就成为印象派绘画的重要主题。

行车时间的缩短也扩展人员、商品和观念所能移动的空间距离。因此重新从不同的规模思索并策划都市进程变得十分必要。不只奥斯曼和他的助手们必须调整（无疑，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示范）。

金融家、商业利益者和实业家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思维并找到组织方式，好在更大的地理规模上进行运作。奥斯曼将市郊并入巴黎市中，即代表着规模的变化。都市主义者如佩瑞蒙和梅纳迪耶，他们早在1840年代就已鼓吹这种做法，并且也开始调整伏尔泰和狄德罗以来规划都市空间的传统，使其能与巴黎混乱而不断加速增长的现象配合。巴尔扎克也有将巴黎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高老头》中有一段著名的结尾，拉斯蒂涅站在拉谢兹神父墓园（Père Lachaise Cemetery）的高处岸望巴黎，自忖要将巴黎抓在手里。不过拉斯提尼雅克想的只是个人的晋升。

许多年后，左拉在《猎物》（La Curée）中重返巴尔扎克的场景。沙卡尔，第二帝国的大投机者，与安洁儿（Angèle）在蒙马特高地的高处共进晚餐。沙卡尔俯瞰巴黎，想象“巴黎二十区下起了黄金雨”，他高兴地谈着“如何融掉这几个区，让黄金能黏在加热与搅动大白者的指上”。安洁儿眼中“泛起莫名的恐怖，她看着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直挺挺地站在倒卧的巨人身上，挥舞着拳头，讽刺地撅起双唇”。沙卡尔描述巴黎如何被大十字（Grand Croisée）切成四块，并且将被“第二层网状物”、“第三层网状物”的“施工者”进一步细分，“巴黎的血管被切开，数十万工人和泥水匠以此维持生活”。沙卡尔“干燥而兴奋的手不断在空间中切割”，安洁儿“面对这把活生生的刀刃不禁微微一颤，钢铁般的手

指无情地在广大阴暗的房顶上游走切割……小小的手，毫不客气地在巨大的猎物上盘旋着，最后令人不安地落下，它毫不费力地将巨大的巴黎大卸八块，在蓝色的晨光中，似乎泛起钢铁般的奇异光彩。”<sup>14</sup>左拉因此从高处和从整体的角度重新创造了巴黎的创造性毁灭。然而却是由野心的投机者捕捉了整体，将其切割之后，仰赖内部维持生活。

空间关系的重塑和空间规模的转变，就都市进程来说是主动而非被动的时刻。通过运输和通讯对空间进行真正的组织，是所有历史和地理分析必须捕捉的首要的物质事实。不管是巴黎内部或巴黎以外地区，第二帝国在空间关系上所进行的革命，其实只是延续前人的步伐，然而无疑在变动的步调、空间规模以及地理延伸上，1852年后的做法确实与之前有很大的差异。至于这场革命如何完成，则仍有待探寻。

# 金钱、信贷与金融

信贷体系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建立。

117

——马克思

1851年12月2日早晨，埃米尔·佩雷尔赶到詹姆士·罗斯柴尔德宅邸，向这位卧病在床的银行家再次保证政变的准备工作相当顺利。佩雷尔兄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随后的决裂和钩心斗角，一直持续到佩雷尔兄弟垮台为止，再过一年，1868年，詹姆士才去世，成了上层金融界的传奇战役。这场斗争日后也成了左拉的小说《金钱》(*L'Argent*)的主题。<sup>1</sup>在这场斗争的背后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即金钱和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上层银行界纯属家族事业——讲求私人与保密，只与富裕的朋友合作，不与外界往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金钱的处理相当保守，保守的程度可从他们认为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与真实的计价单位看出。这种坚持对罗斯柴尔德相当管用。1848年有份工人刊物抱怨说，罗斯柴尔德仍然“力量强大，足以与新生的共和国抗衡”，并且是“旧王朝无法节制的强权”。“他们不只拥有身份地位，而且还是信贷的象征”。另一方面，佩雷尔兄弟从1830年代初期就受圣西门思想的影响，他们试图扭转罗斯柴尔德的象征意义。佩雷尔兄弟长期以来一直视信贷体系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神经中枢。在群众骚乱的时期，他们呼吁民众储蓄，并动员民众将钱存进大大小小的信贷体系中，让这些体系能推动长

期计划。佩雷尔的主题是“资本联合”，至于做法则是对未来发展进行庞大而无耻的投机事业。归根究底，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佩雷尔兄弟之间的冲突，反映出资本主义内部金融上层结构和货币底层结构间的深层紧张的关系。<sup>2</sup>在1867年，如果那些控制硬币（如罗斯柴尔德）的人想要击垮佩雷尔兄弟的信贷帝国，可想而知，结果将是两败俱伤。1851年的问题在于要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巴黎资产阶级才刚经历过一场经济危机，因此普遍了解这场危机的经济根源，不过对于采取哪种做法，大家的看法莫衷一是。<sup>3</sup>政府采取的是圣西门路线，试图以直接干预、大量信贷，以及改革金融结构等混合做法来促使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能转化为有形的新基础建设，成为经济复苏的动力。这是一项借由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大量流入黄金来促进温和通膨与刺激扩张的政策（原始凯恩斯主义）。上层银行界及客户对于这项政策深感怀疑。罗斯柴尔德上书皇帝，大力抨击这项新做法。然而政府对于银行界的奥尔良派政治倾向有所疑虑，因此立场倾向于支持行政官员如佩尔西尼、佩雷尔兄弟以及奥斯曼，这些人认为全民信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他们的做法抛弃了马克思所谓的以货币为基础的“天主教主义”，而将他们的银行体系变成“生产的教皇国”，并且拥抱马克思所谓的“信仰与信贷的新教主义”。<sup>4</sup>这当中的宗教想象被非出于偶然。天主教会直到1840年代仍严正表示信贷等同于放高利贷，并且试图以立法的方式来禁止信贷。对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新金融体系是不道德的，是个必须加以正视的议题。在天主教徒的眼里，身为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和佩雷尔兄弟，以及身为新教徒的奥斯曼，都不可能帮得上忙。许多天主教徒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娼妓，加瓦尔尼的讽刺画诙谐地表现出这一点。对帝国的道德责难一直要等到帝国崩溃后才浮出水面，而且是以算旧账的方式来指责过去帝国所实行的金融措施是不法且充满罪恶的。由此看来，要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必须克服的除了政治、技术和哲学障碍，还有道德的障碍。

第二帝国所进行的金融改革，细节极为复杂。<sup>5</sup>但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无疑就是佩雷尔兄弟所成立的动产信贷（Crédit Mobilier）。这家银行起初成立的宗旨是为了让铁路建设和所有铁路周边的产业能够重新开始营运，除此之外，它也是一家投资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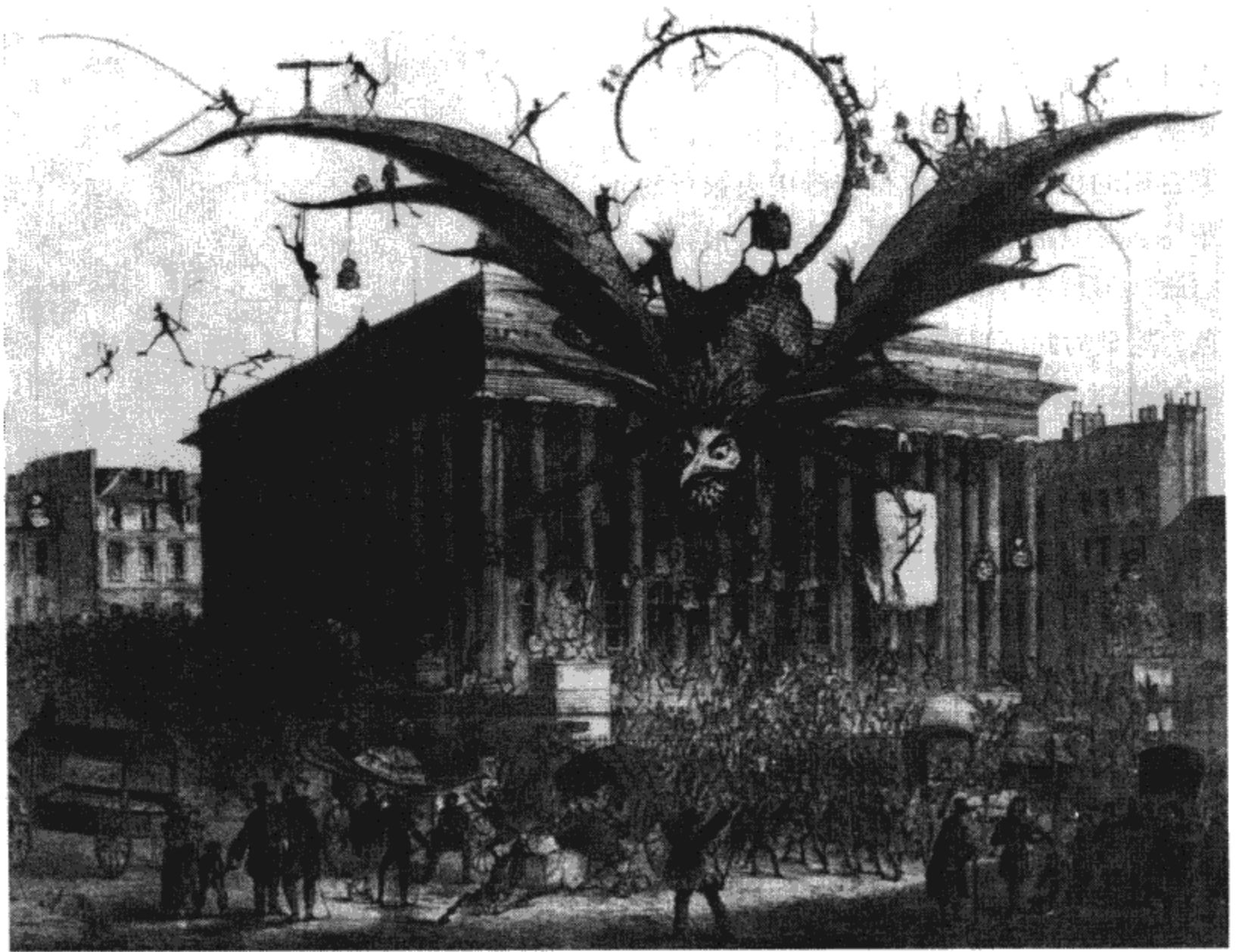


FIGURE-039

证券交易所“玩的是别人的钱”，小仲马（Dumas）说。夏尔戈的讽刺画将巴黎证交所描绘成吸血鬼出没之地。

行，持有各家公司的股份，并且为这些公司筹募必要的资金来推动大规模计划。银行也对一般大众发行债券，并且以其控制公司的盈余来保证债券的报酬率。动产信贷因此成了无数小储蓄人（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机会投入资金，因此佩雷尔兄弟所做的就是所谓的信贷“民主化”）与各种产业公司间的中介者。佩雷尔兄弟甚至希望将动产信贷转变成全民控股公司，通过集合资金与购并的方式，将所有的经济活动（包括政府）全都置于公众的控制之下。许多人（包括政府）都对这种计划发展（我们现在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存有疑虑。虽然佩雷尔兄弟最后失败了——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加上自己过度投机，因而招致失败（罗斯柴尔德在上书给皇帝时就已经预言了他们的命运，并且从中促使此事早日实现）——但他们的对手却被迫采用他们的新方法。罗斯柴尔德早在1856年就开始回头接触同样形式的组织，到了第二帝国末期，新的金融中介机构开始出现（如里昂信贷[Crédit Lyonnais]，建立于1863年），并从那时起支配法国金融界，直到今日。



佩雷尔兄弟知道，如果动产信贷未能兼并与控制足够数量的机构，就无法产生影响力。法兰西银行（一家民营但却由国家管制的机构）逐渐取得法国中央银行的角色。对佩雷尔兄弟来说，法兰西银行的财政政策过于保守，它严格地维护货币成色，甚至为此而采取紧缩银根及提高贴现率等佩雷尔兄弟认为有害经济增长的政策。<sup>6</sup>法兰西银行因此成了与佩雷尔兄弟理念对立的重要金融机构。法兰西银行几乎只做短期商业票据以及贴现商业交换票据的业务。土地信贷（Crédit Foncier）——1852年12月10日（动产信贷成立后不久）结合各家金融机构所成立的新银行——为



FIGURE-040

许多保守的天主教徒认为收取利息与卖淫无异。在这幅加瓦尔尼的讽刺画中，一位穿着漂亮衣裳的年轻女子诱惑一位百般不愿意的顾客进到投资商店（臭名远播的商店），她向顾客承诺会亲切而温柔地对待他，只要顾客愿意出钱，她保证给予丰厚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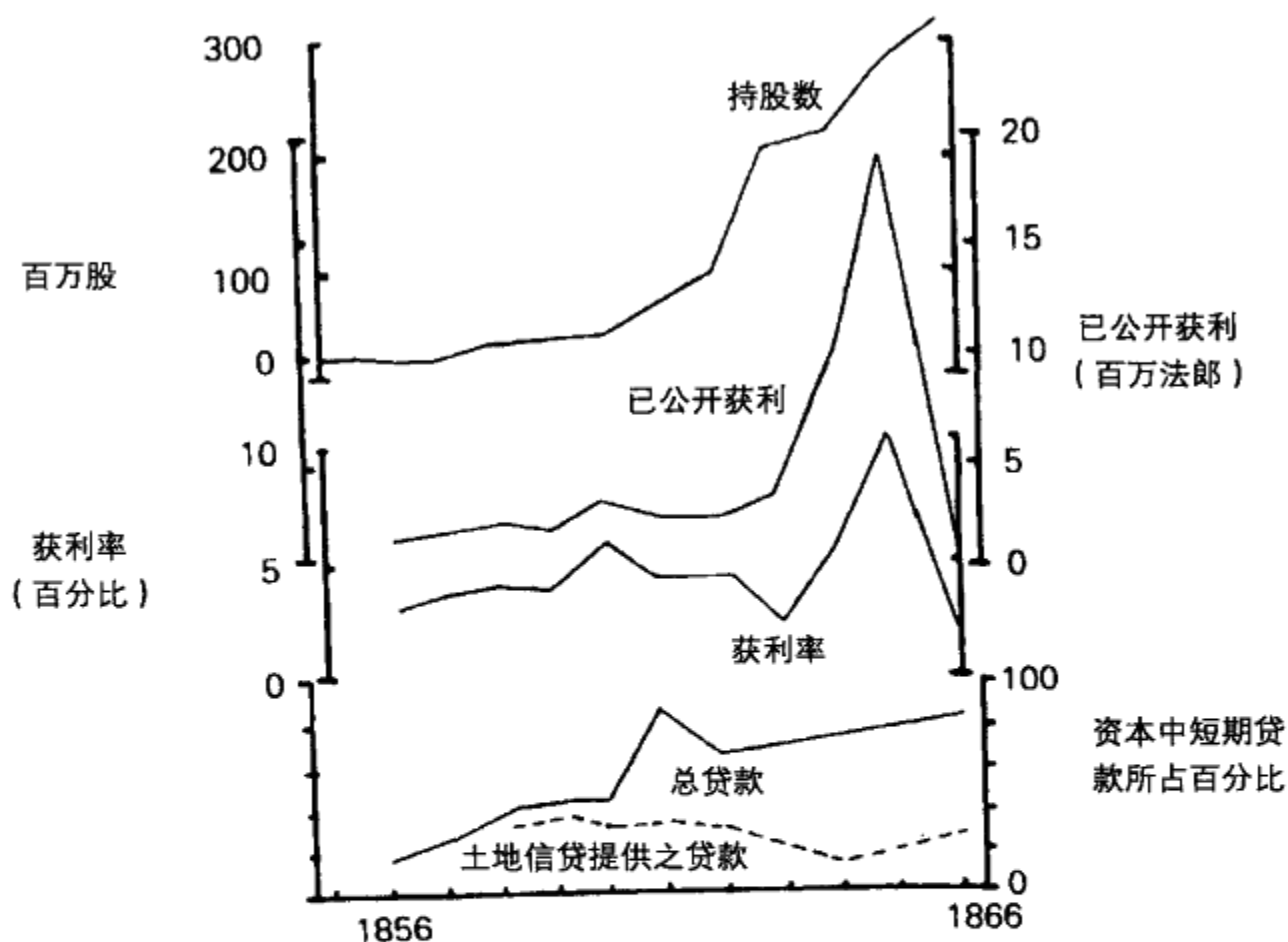
土地和不动产抵押市场带来合理性与秩序。土地信贷是在佩雷尔兄弟影响下成立，因此成了佩雷尔兄弟的重要盟友。其他组织，例如巴黎贴现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成立于1848年）和工商信贷（Cré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1859年），处理的是特种信贷。而在佩雷尔兄弟所建立的帝国内部，则在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了各式等级井然的机构，例如不动产公司（Compagnie Immobilière），专门负责土地开发的金融事务。巅峰时期的动产信贷兼并了20家法资公司与14家外资公司，构成极为强大的组织。

这些组织对巴黎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影响。的确，如果金融机构不进行重组，则转变将不可能维持原先的步调。不仅是因为巴黎需要贷款（稍后我将讨论这个主题），也因为奥斯曼的计划所开启的空间需要金融力量去开发、建设、占有以及经营。因此，佩雷尔兄弟“在各方面与许多地方都成了巴黎市长的民间助手”。<sup>7</sup>巴黎不动产公司从佩雷尔兄弟于1854年所创立的组织中脱颖而出，在1858年接下了奥斯曼的第一件大案子——完成里沃利街和卢浮宫饭店（Hotel du Louvre）。新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可以从这件案子中得到例证。筹募资本并且沿着里沃利街建筑购物区及卢浮宫饭店，这是一项因应1855年计划主办的万国博览会而起的投机事业。原先的计划是要建造由一间间商店组成的拱廊街，但这个想

法引不起大家的兴趣，因此佩雷尔兄弟接受了将整个购物区合并成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提案，这是一项全新而同样投机的构想。百货公司于1855年开幕，却因经营不善而未能获利。佩雷尔兄弟因而必须对整个事业进行重组并改变资本结构，一直到1861年，百货公司才转亏为盈。<sup>8</sup>与此同时，佩雷尔兄弟实际上也筹募资本贷给百货公司，使其能偿付当初集资的债务。在1861年之前，如果有人质疑这种创造性会计（或甚至拒绝投资更多金钱），佩雷尔兄弟将遭遇严重的财务困难。但他们用了一些小伎俩顺利度过短期的危机，并因此获取了长期利益。

不动产公司继续沿着香榭丽舍大道 (Champs Elysées) 和马尔塞尔布大道 (Boulevard Malesherbes) 以及歌剧院和蒙索公园 (Parc Monceau) 周围建设。然而，公司的获利越来越仰赖投机操作。1856到1857年，有四分之三的收入来自住宅和工业设备租金，只有四分之一来自土地和不动产买卖。到了1864年，这个比例完全反过来。<sup>9</sup>不动产公司可以通过动产信贷（持有不动产公司半数股份）扩大资本，并且借由跟土地信贷的良好关系进行财务杠杆操作来支撑获利（佩雷尔向震惊的股东解释，不动产公司所进行的建设计划，其资本有半数是以5.75%的利率向土地信贷贷款，计划原本预期的报酬率是8.7%，后来竟达到11.83%）。不动产公司逐渐

FIGURE-041  
不动产公司的营运，1856—1866年（引自Lescure, 1980），分为总股数（1866年后急速增加，而后随即在1867年崩跌），已公开获利和获利率（1865年后急速下跌），以及1860年后逐渐增加的短期贷款。



转为短线金融，这使得它特别容易因法兰西银行调整利率而受害（佩雷尔兄弟因此对法兰西银行的政策与低利率做法深感不安）。不动产公司也把建筑工程外包给由动产信贷资助的公司（因此在建筑业集中了大量人力并提高了就业人口。见表四），并且将大楼贩卖或租赁给动产信贷旗下的管理公司或商业集团。

佩雷尔兄弟善于整合上下游金融体系，以此他们开始投资铁路建设以及各项运输、工业及商业事业，并且在现成的环境里创造大量投资。“我想把我的理念写在景观上面”，埃米尔·佩雷尔说道。事实上，他们兄弟俩的确做到了。但不只是他们这么做。即便是罗斯柴尔德也相当低调地将北车站（Gare du Nord）附近的名下地产变成可获利的不动产事业，而许多建筑商、承包商、建筑师或地主也利用相同的方式寻求获利。虽然这种方式并非土地开发的唯一体系，但却是将巴黎奥斯曼化的主要推手。投机事业对巴黎的经济与生活影响很大，上面说的只是冰山一角。巴黎资产阶级极度沉迷于金钱、金融与投机（“做生意玩的都是别人的钱”，小仲马打趣地说），证券交易所因此成了堕落腐败的中心，许多地产便在鲁莽的投机行为中被吞噬殆尽。投机对日常生活的毒害，在随后左拉的《猎物》与《金钱》中，通过沙卡尔（隐约影射了佩雷尔兄弟）这个人物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猎物》中，沙卡尔被塑造成一个从事转变巴黎的大投机客，而在《金钱》中，沙卡尔则成了策划东方投资计划的金融家，他说：

开垦田野，修筑道路和运河，土壤中冒出新的城市，病人恢复生机，只要我们将新血注入枯干的血管，刺激身体的系统，这一切就将发生。是的！金钱将造就这些奇迹……你必须了解，投机、赌博是核心机制，就跟心脏差不多。是的！心脏吸引血液，经由小溪从各个来源取得血液，收集血液，再将血液经由河流往各个方向送出，建立一个巨大的金钱循环，这就是大企业生命的真实写照……投机——它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诱惑，也是逼迫我们生存与斗争的终极欲望。我亲爱的朋友，没有投机，就没有生意……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如同投机，充满了秽物。人们在爱情中，只考虑自己的满足与喜悦；但没有爱，就没有生命，而世界将归于毁灭。<sup>10</sup>

《猎物》提到的过程与《金钱》完全相同，只是发生的地点在巴黎。沙卡尔在风闻“转变巴黎的大计划”后，打算利用这个内线消息大赚一票（他甚至“冒险进到市长房里，查阅那张著名的巴黎地图，‘威严的手’曾以红墨水在上面画下第二条路网的准则”）。“在市政府发现未来”，充分了解“什么会在买卖房地产时被巧取豪夺”，并且“熟悉各种古典诈欺手法”，沙卡尔

知道你如何将价值50万法郎的东西卖到100万法郎；你如何获得偷窃国家宝库——它不仅微笑，还闭上双眼——的权利；当大道直接穿过旧市区精华地段时，你如何骗走六层楼的房子，还让一堆冤大头一致为你鼓掌。在情势未明朗，投机的弊病仍隐而未发时，他就已经成了大赌徒，因为他比他的上司更早看出巴黎将有一个石头与灰泥的未来。<sup>11</sup>

这个大投机客不只负责形塑巴黎及其都市形式，也渴望号令全世界。而他的工具便是资本的联合。在圣西门信条初次发表的70年后，左拉应该能很自在地以最狂妄的形式来援引圣西门的说法，这正说明了这种思维模式持续存在于19世纪的法国之中。左拉引用的这道公式，“金钱加上科学便能产生进步”，在各层面广受回响。很明显，不筹募投机资本，就不可能有现代性。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方法，将涓涓细流的小额资本汇聚成庞大的资本流通，如此才能以必要的规模执行计划。这就是佩雷尔兄弟以及金融制度变革所要实现的目标。

然而，金钱民主化的同时，也出现巨大的金融权力集中化的现象。1860年代中期，在巴黎登记的公司董事会席次有920席，其中158席为前六大家族所有——佩雷尔兄弟拥有44席，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32席。<sup>12</sup>新“金融封建制度”的巨大权力招来一些怨言，这些怨言不断扩大并且通过畅销作品向公众揭露，例如迪谢纳（Duchêne）的作品。<sup>13</sup>这股权力不仅各国间感受到了（佩雷尔兄弟的诽谤者说，佩雷尔兄弟威胁要以他们控制下的新国际纸币取代黄金），连都市组织的各领域也都感受到了——佩雷尔兄弟将各煤气公司合并成一个管理一元的独占事业，将工业以及街道照明带到巴黎大部分地区；成立（同样是合并）巴黎公共马车公

司 (Compagnie des Omnibus de Paris)，以及企图独占码头与仓储贸易。<sup>14</sup>

信贷体系的重组，对于巴黎的工业与商业、劳动过程以及消费模式有着深远影响。毕竟每个人都需要贷款。唯一的问题是，谁能以什么条件提供贷款给谁。受季节性失业所苦的工人需要贷款维持生活；小手工业师傅与店铺老板需要贷款以满足季节性需求——这条链子无穷地延伸出去。负债是存在于所有阶级和所有活动领域的周期性问题。但1840年代的信贷体系既独断专行又反复无常，同时它也无需担保（只有土地与不动产才能提供真正的担保）。1848年出现许多要求信贷体系进行改革的声音。工匠、小手工业师傅、技术工人寻求某种由地方和民主控制的互助信贷体系。蒲鲁东所进行的人民银行 (People's Bank) 实验，打着“金钱商人，你的统治到此为止！”的旗号，提供无息贷款，最后人民银行因蒲鲁东于1849年被捕而瓦解。<sup>15</sup>但这个理念并未消失。当工人于1860年代进行组织的时候，他们逐渐想到的还是互助信贷的问题。他们的工人信贷 (Crédit au Travail) 开始于1863年，崩溃于1868年，他们始终无法解决“48家合作社的未偿贷款问题，其中18家破产，只有9家能支付”。<sup>16</sup>政府的袖手旁观，以及令人惊讶的是工人们的冷漠，是工人信贷瓦解的元凶。消费合作社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许多家庭在面临周期性失业与迟延给付的实质收入时，都宁愿采取对抗的态度，不履行对当地店铺的债务，因而造成合作社的经济负担。最后只剩下市立当铺仍支撑着巴黎群众。无息贷款的梦想似乎因此越来越遥不可及。1867年工人委员会 (Workers' Commission) 的一位成员说：“无息贷款翻转了商人、地主、政府赖以维持生活的整个私有财产体系。”<sup>17</sup>

124

信贷体系通过资本联合而合理化、扩大化与民主化，但它却存在着不受控制的投机风险，除此之外，所有储蓄金都被吸收到一个集中而等级化的组织体系中，这使底层的人更容易受到具有金钱力量者独断专行、反复无常的伤害。不过，在信贷体系进行革命，也将造成空间关系的革命。在巴黎，这个过程取决于金融资本与土地财产是否能做更紧密的整合。至于整合的方式为何，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 租金与地主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建筑业投机的真正标的，是地租而非房租。

125

——马克思

1848到1852年间，巴黎房地产市场经历了19世纪最严重也是最长时间的繁荣衰退。一些资产阶级聚居的地区不景气的影响最大，空屋率达到六分之一，租金掉了一半，而房地产价格（如果买卖做得成的话）也大量下滑。<sup>1</sup>到了第二帝国时期，这种现象开始反转，最后竟成为19世纪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巴黎土地享有相对稳健的高报酬率，土地价格也不断飙升。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巴黎的房地产所有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定位出现剧烈变化。巴黎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它的交换价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当中，完全支配了使用价值。如左拉所认识到的，巴尔扎克《贝姨》所描述的沙卡尔大量投机与小额炒作，或甚至《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高老头》中更有系统的剥削，凡此种种，呈现出一个充满差价的世界。

巴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有着长远但不怎么光彩的历史。当路易·菲利普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发出他那封著名的邀请函，“让自己富起来”，巴黎资产阶级便报以疯狂的投机热，并且一直延续到1840年代。在这个时期，投机的公寓楼房设计成了第二帝国时代的基准票价，并且有效解决了高密度



FIGURE-042

杜米埃经常批评地主以及房地产拥有者。图中，地主串通起来要在下一个到期日上涨租金。



FIGURE-043

贪婪的地主经常被人冠上秃鹰先生的恶名。杜米埃(1852)描绘他欣喜于拆除工程，因为每拆一栋房子，他的房租就可以往上调200法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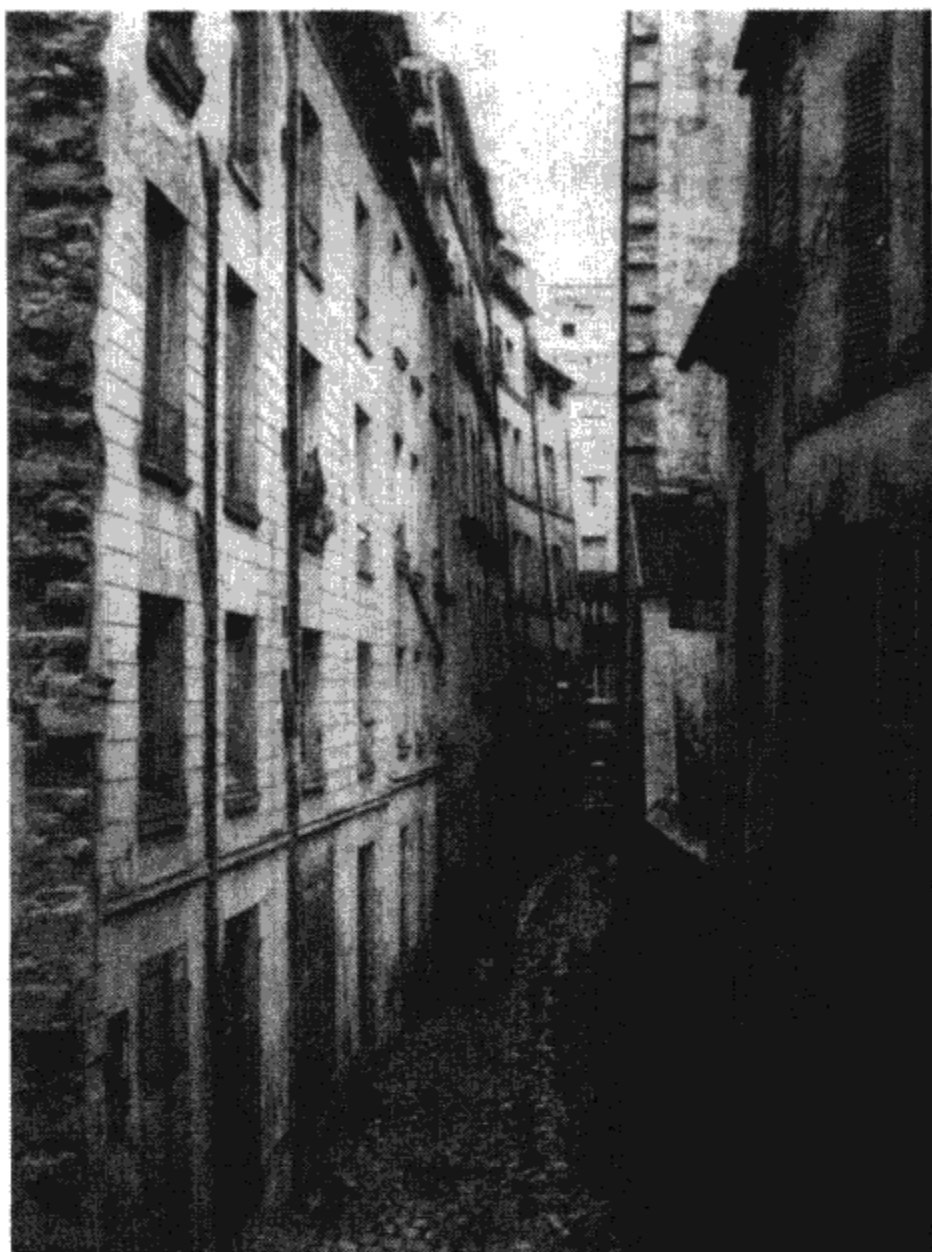
127 的都市生活问题。资产阶级转往这个方向，有部分的原因在于房地产是极少数向他们开放的一个安全投资形式。房地产投资之所以有利可图，原因很单纯，只要住宅供应落后于人口增长，资产阶级便可因土地的稀少性而获利（这也使得专事剥削的地主秃鹰先生这号虚构人物，在1840年代成为民众非难的典型焦点，并在1848年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巴黎住宅数量从1817年的26801

栋,增加到1851年的30770栋,人口则由713966人增加到1053897人。1820年代,工人住宅的报酬率是7%,而且似乎一直维持这个水平,然而获利的代价却是任由这些住宅沦为维修不善、拥挤不堪且有害健康的区域,欧仁·休的小说以及巴尔扎克的《贝姨》对此有相当鲜明的描述。在资产阶级地区,由于越来越难找到房客,而房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报酬率降到5%(但很少低于此数)。<sup>2</sup>尽管如此,与国债3%的利率相比还是相当有利。

多亏多马尔(Daumard)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得以看出随后的主要变迁轨迹。巴黎的房地产虽然是资产阶级用来储藏财富的最佳选择,但在1840年代,这些房地产仍有半数掌握在零售商与手工业者手中,另外三分之一则由自由派专业人员和商人把持。到了1880年,整个形态完全改变。零售商与手工业者拥有的房地产剧降到13.6%,而自由派专业人员则掉到8.1%,他们的房地产都被自称地主的阶级所取代(53.9%)。只有商人(特别是在加入了“公司”这个新范畴后)仍维持原有的地位(表三)。零售商在周

FIGURE-044

马维尔的照片证实,1850年代早期,许多巴黎住宅的状况不卫生又摇摇晃晃。



边地区仍保有一定的影响力,1870年占了销售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880年却减少到18.1%。尽管商人、公司以及自由派专业人员拥有不成比例的市中心房地产,但却远不如地主那样具有支配性。下层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因此逐渐被排除于房地产所有权之外(尤其在市中心),取代他们的是地主与商人这些上层资产阶级。这样的变迁与商业、金融业以及制造业结构的重大变化若合符节,手工业者、小生产者和零售商开始臣服于大商业与金融业的霸权。除此之外,证据显示所有的社会团体都逐渐从事买卖地产的投机活动。

所有权开始并维持高度分散。多马尔估计,在1846年,平均每位地主只拥有两块房地产,尽管有些地主的土地相当广大,但绝大部分都相当狭小。巴黎各区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差异仍持续存在。加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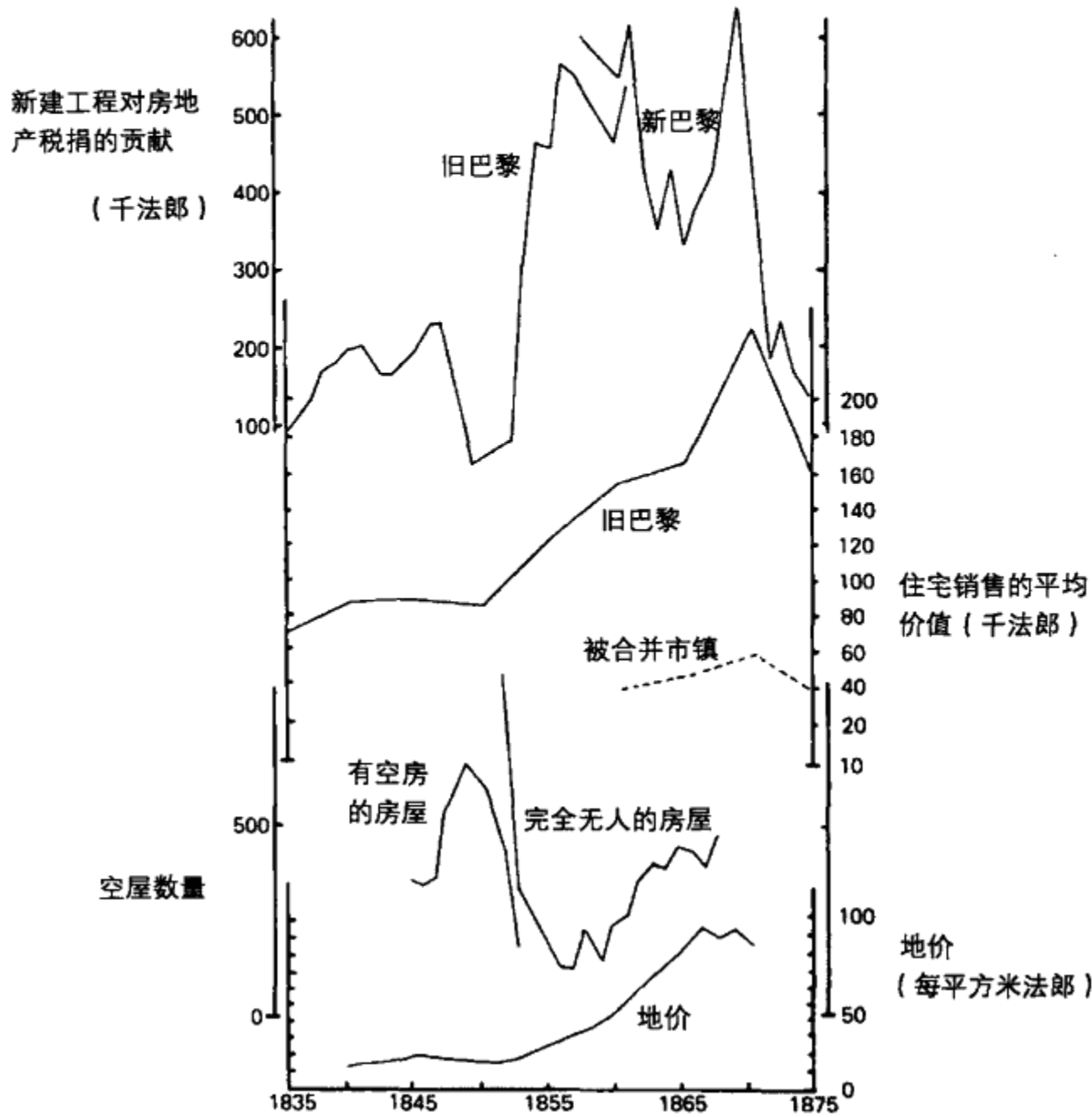


FIGURE-045  
 巴黎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可以区分为三类：新建工程对房地产税捐的贡献（注意 1855 年后地价税令人难以置信的上涨幅度，以及 1866 年后的崩跌）；1848 年到 1866 年住宅价值的缓步提升（但被合并市镇的价值却相当低）；1852 年后空屋率的剧降以及土地价格的上涨（根据 Daumard, 1965; Gaillard, 1977）。

亚尔认为，如果在 1850 年代可以看出什么模式，只能说“土地不断扩大的”大地主主要位于右岸而非左岸，位于市区中心而非市区周边。<sup>3</sup>所有权集中的趋势——多马尔在右岸的一些中心地区发现这一点——只是模式的持续，而这种模式早在 1850 年乃至更早之前就已出现。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巴黎空间运用方式在往后空间的重整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左岸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与风格（除了贵族大地主外，还掺杂着手工业者与零售商）使得左岸不断地强烈反抗着奥斯曼的工程，其结果至今仍明显可见。相反，聚集于右岸中心的商人，在七月王朝统治之下，不只愿意接受改变，还主动地进行推广与计划工作。

表三 房地产在个人财产中所扮演的角色，1840到1880年

	巴黎人的财产中，房地产所占百分比			社会团体拥有巴黎房地产百分比			
	1847			1840	1888		
社会经济范畴	巴黎内	巴黎外	总计	%	总计	市中心	市周边
地主 <sup>(a)</sup>	38.9	21.3	61.1	8.9	53.9	49.1	59.3
商人 <sup>(b)</sup>							
现职	16.0	5.3	21.3	14.2	14.5	17.7	11.0
退休	23.5	20.5	43.7				
公司					3.5	5.9	0.9
零售商 <sup>(c)</sup>							
现职	18.0	7.0	25.0	48.8	13.6	9.6	18.1
退休	38.8	2.2	41.0				
公务员	13.0	33.4	46.4	4.3	2.2	3.1	0.7
国家雇员	10.7	16.5	27.2	4.0	0.6	1.0	0.2
各种雇员自由派	14.0	10.2	24.2	2.3	2.7	2.8	2.6
专业人员 <sup>(d)</sup>	37.5	7.3	44.8	17.2	8.1	10.1	6.0
各种工作 <sup>(e)</sup>	8.7	0.9	9.6	0.3	0.8	0.5	1.1
家庭雇工	15.8	2.3	18.1				
日雇工	15.6	1.6	17.2				
仆役	2.8	5.3	8.1				
总计	27.4	17.3	44.7				

(a)包括那些在登录时将自己列为地主的人。

(b)包括实业家、批发商与商人。

(c)包括手工业者。

(d)医生、律师、教师等。

(e)也许还包括了房地产所有权栏中登录的家庭雇工、日雇工以及仆役。

资料来源：Daumard (1965)，页 237, 241；Daumard (1973)，页 216

在巴黎，都市房地产的拥有者在七月王朝时代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一般认为这批人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奥尔良派。他们的社会态度与权力在1850年的巴黎景观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除非基于个人利益、一时兴起或追求地位，这些人鲜少从事改良工作。他们将资本投入有稳定收入的事业中，或者以零售商为例，他们只投资有使用价值的事物，他们不愿投资现有环境的建设，因此他们的资本无法构成具生产力的资本流通。与传统建筑业相对的投机建筑业，相较之下仍受限制，偶尔出现一次，而且规模很小，所在的位置也在巴黎周边（这意味着当时都市朝西北方向扩张，新市区主要分布在昂坦道周围及以外地区）。住宅不





131

敷使用，因此出现了贫民窟，例如恶名昭彰的小波兰。现有的住宅相当昂贵，而且屋况大多很差。地主大多拒绝政府的改良工作，部分是因为小地主固有的目光短浅，部分是因为产权过于零碎分散，利益的分配无法尽如人意，难以获得改善的共识，再者是因为小地主们担心改良后所带来的高税金会降低他们的收入。巴黎外在基础建筑的落后，与急速增长的需求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如此，当局还是无所建树，这主要还是受到地主态度及其政治权力的影响。如果巴黎要现代化，就一定要改变这个状况。

奥斯曼抵达巴黎时，他所面对的环境对他来说有几点有利之处。皇帝路易·拿破仑的登基并非仰赖奥尔良派之手。而奥尔良派此时在政治上也采取守势。除此之外，对于贪得无厌而漠不关心的地主的积怨（民众讽刺地称他们是秃鹰），在压抑了数年之后终于在1848年工人运动中爆发。1849年，即便在六月事件以及“秩序党”选举胜利后，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对地主所有制仍相当敌视（他们时而高喊蒲鲁东的口号：“财产就是窃盗”），在巴黎尤其如此。在政治纷扰之外，又遭逢巴黎房地产市场周期性的不景气。地

FIGURE-046

马维尔所摄的这张照片（可能摄于1850年代中期）捕捉了无数贫民窟的生活状况，这些贫民窟不是分布在巴黎周边，就是分布在市中心进行破坏时所留下来的开发空地上。

主在饱受损失之下，不得不表示只要是能保证他们的权利永续与市场复苏的措施，他们都愿意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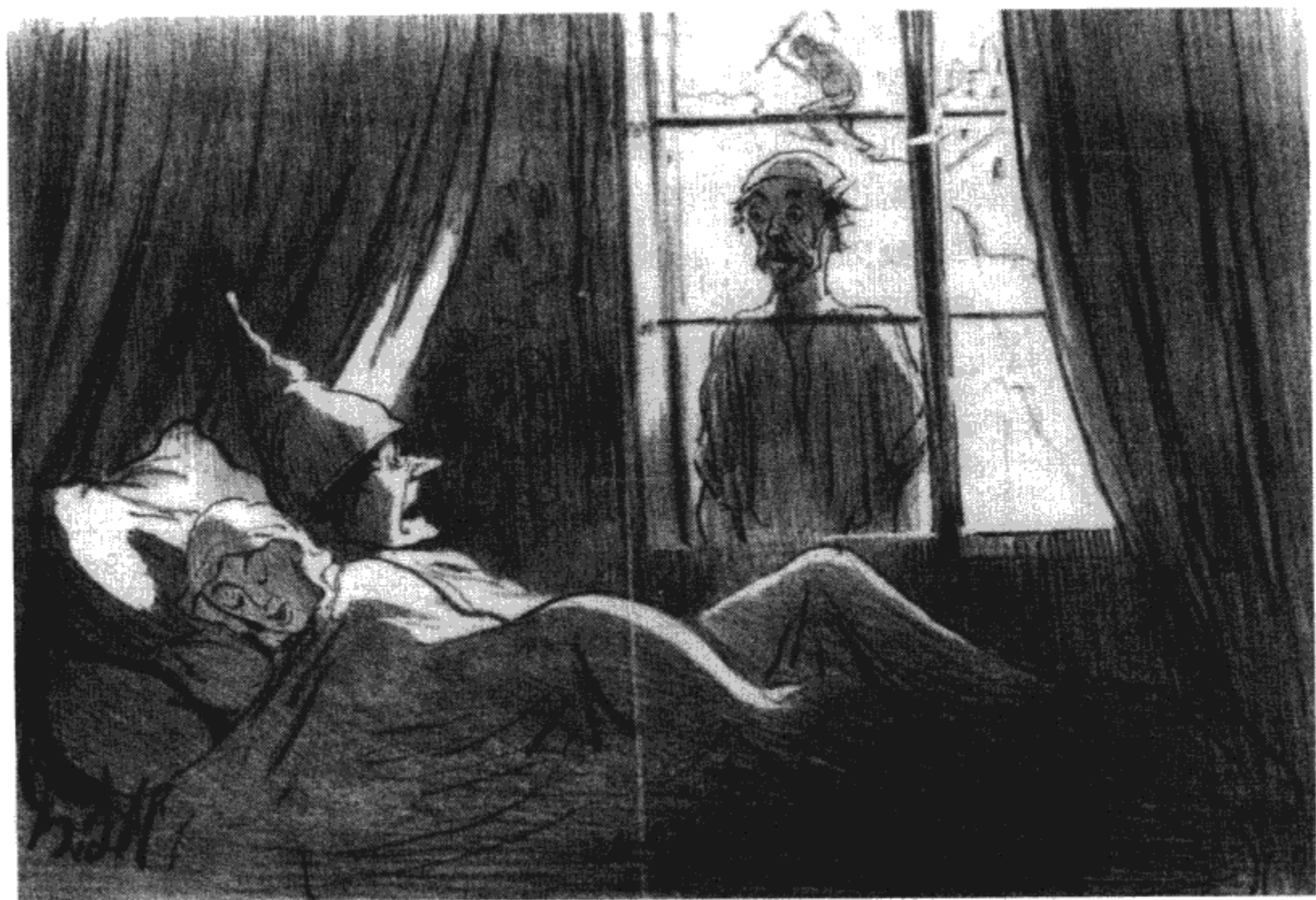
帝国在两方面施以恩惠。一方面无情地打压左派，另一方面则奠定巴黎房地产市场快速恢复元气的基础。到了1855年，空屋率降到历史低点，房地产价格则急速上涨，然而掌握大量详细信息的路易·拉扎尔（Louis Lazare）却抱怨报酬率只有12%或只比12%多一点。多马尔针对巴黎几条新大道上的中心区域住宅进行了审慎的数据重建，扎实地整理出第二帝国时期的房地产报酬率。<sup>4</sup>

报酬率 (%)	>5	5-5.9	6-6.9	7-7.9	8-8.9	9<
样本数 (%)	4.6	6.8	32.7	36.7	13.8	5.2

以此来看，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老住宅的报酬率会少到什么程度。房东可以轻易地向房客大吼大叫。简言之，巴黎房地产市场在不受波动的影响下（股票市场的常态），成了一个安全而高报酬的投资市场。

巴黎地主阶级与帝国之间已经奠下了政治亲善的物质基础。<sup>5</sup>然而在一开始，地主阶级并不领情，虽然帝国越来越将其视为资本援助的基础，不过在1857年仍充满了对立的情绪。奥斯曼与地主阶级的关系向来不睦，即便在关系最好的时候也顶多呈现模棱两可的局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地主阶级对帝国的拥戴不如预期热情。起初，奥斯曼的都市空间构想与地主惯有的短视与零散有着极大分野。奥斯曼虽然支持私有财产制度，但他对于特定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却不屑一顾。他粗鲁地对待特定的反对势力，因此引起了民怨。除此之外，要让每个分散的地主获利都能均平是非常困难的。加亚尔指出，到了帝国末期，许多地主抱怨他们并没有享受到公共建设所带来的庞大投机利益。<sup>6</sup>奥斯曼还必须与地主的财政保守主义战斗，后者不愿投资改造都市空间以增加生产力，也不只是投资于买卖，而且要投资于破坏、重建以及根据集体原则来长期管理都市空间（对于主张私有制的传统地主来说，集体原则是相当陌生的观念）。

简言之，奥斯曼所鼓吹的正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土地私有财产制，他的做法因此与较传统而顽固的态度与实践发生正面冲突。



133 奥斯曼早就预料到他会遭遇顽强抵抗。他让地主的两个发言渠道无法影响更新市容的决定。计划委员会实际由他发号施令；至于市议会的成员则是指派而非选举产生，因此很轻易就被奥斯曼收编。尽管如此，奥斯曼为了安抚地主对高税捐的恐惧，便以举债的方式来筹措资金，此举等于以扩大税基来取代税率增加。奥斯曼基于“公共利益”以及第二共和社会立法对“有害健康”的非难，而取得征收土地的大权。奥斯曼准备利用这两个理由来进行土地征收，然而其征收方式却是原本提出这两点理由的提案人所想象不到的。由于地主在道德层面上居于下风，奥斯曼遂能在几乎未经抵抗下猛烈而快速地击中问题的核心。

FIGURE-047  
拆除工程影响了每一个人。杜米埃这幅画（1852）描绘工人正催促这对资产阶级夫妇赶紧起床，因为他们的家便是鹤嘴锄接下来要铲平的对象。

地主随后通过司法部门与国家议会（两个由他们支配的机构）发动成功的反击。1858年，地主再次取得改良价值权，也就是奥斯曼之前保留给巴黎市政府的权利（包括大量金融获利）。地主逐渐为被夺走的土地取得有利的补偿判决，并且通过错综复杂的法令与法律判决，于1860年代初扭转对奥斯曼的颓势。奥斯曼日后表示，这场“私有主义对公共利益”的胜利，以及补偿所造成的成本上升，再加上判决结果使营收减少，等于为巴黎埋下1860年

代财政问题的祸根。多马尔的数据清楚地显示，1858年后地主所收到的补偿金远高于市场价值。<sup>7</sup>左拉《猎物》中的沙卡尔便是借由收购低价房地产而获利。地主巩固与帝国的结盟关系，这么做有一部分是以牺牲奥斯曼为代价的。虽然地主并不是造成奥斯曼下台的主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奥斯曼下台时，地主之间的确已经蓄积了相当程度的不满。

不过，值得更仔细关注的是更深层的运作过程。它们说明冲突不只来自纯粹与部分的资本主义实践在房地产运用上的冲突，也来自在此浮出水面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形式当中固有的紧张关系。奥斯曼试图控制这种紧张。虽然这种紧张最后反客为主控制了奥斯曼，但并不损及他的杰出。事实上，奥斯曼的杰出正表现在他能清楚看出，如果巴黎要进行转变与现代化，就必须动员全新的房地产所有权实践。

---

## 现有环境下的资本流通

---

第二帝国时期，要动员资本使其流入巴黎现有环境的改造计划，是件浩大的工程。阿尔布瓦克斯（Halbwachs）写道，“资本像空气流入真空般涌入”，但涌入的资本是通过新金融体系所动员的联合资本。<sup>8</sup>奥斯曼的策略分两方面。如果他无法找到有意愿或有足够资源的开发公司来承担他所构思的庞大计划，他只好运用国家力量，动员金融体系并直接担负起这项任务。巴黎市将能从自身的投资中获取改良价值，并因此成为——如一些批评者所抱怨的——最大的投机者。民间地主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觉得那些获利理应归属于他们，然而最后却都流入市政府的金库里。1858年，地主便以此为依据，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法律反击。

134

但奥斯曼又提出另一项更有利的策略，其力量更强且更具强制性。奥斯曼主张，“最好的做法就是任由竞争来刺激投机”，并且“承认人民的真实需要并设法满足他们”。<sup>9</sup>为此，奥斯曼在市政府与金融和不动产业者所构成的小团体（建筑商、开发商、建筑师等）之间组成联盟，在“联合”或“金融”资本的大伞之下集结起来。这是奥斯曼心目中绝佳的独占竞争组织。事实上，要推动计划也必须如此，因为市政府只能提供土地，无力提供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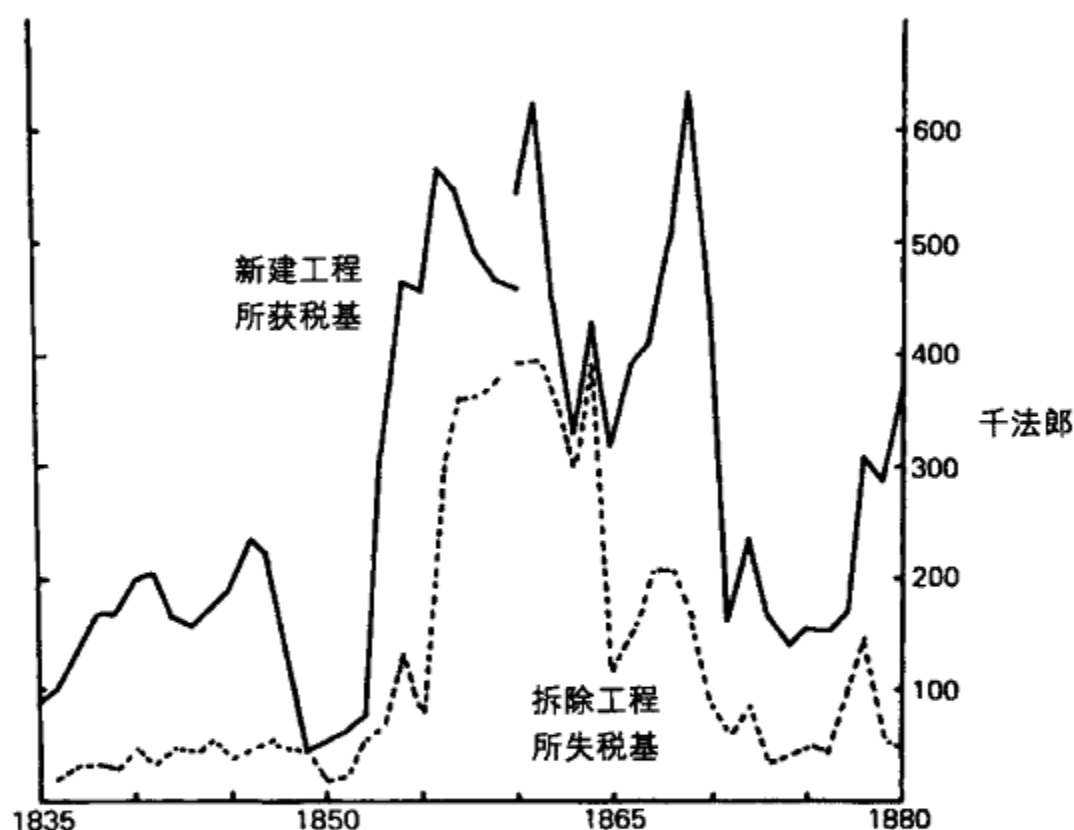


FIGURE-048  
1835—1880年巴黎新建工程所增加的房地产税基(实线)与拆除工程所损失的税基(虚线),两者之比较(Daumard,1965)。

借由这种方式,左拉说:“新道路成了投机事业,如同股票市场上的投机一样。”<sup>10</sup>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建筑物都成了虚拟的资本形式。然而为了获利,公司必须够大,才有能力取得外部性的效果(例如,拥有绝佳不动产场所,随着周边土地的开发,土地价值也将快速提升)并且能等待(有时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土地价值上升后再予以实现。

更新计划把大量特许交给了少数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有接触政府的特权(包括从新成立的土地信贷取得资金),而在他们背后则有一批金融大军(如佩雷尔兄弟)撑腰,由各行各业组成,其中包括了保险业、建筑业与建筑管理公司。他们筹措联合或金融资本,并且只运用在土地开发上面,这种资本形式是从帝国特定结构中诞生的创新物,除此之外,这种资本形式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及土地利用形式。不过,联合或金融资本的本质却将金融家的任务局限在满足富裕阶级或大商人住宅及商业建筑的需求上。这些资本大量投入巴黎的中心与西部,将当地建设成主要由资产阶级居住的区域,并对奥斯曼的新大道产生装饰的作用。不过,这些资本对于土地所有权的长期冲击(不同于短期买卖,以佩雷尔兄弟来说,短期买卖逐渐成为他们营运的主轴)相对较为轻微,1880年,公司拥有的市中心土地还不到6%(见表



三)。尽管如此，开发体系仍引起传统地主的嫉妒、恐惧与愤怒。虽然一些民间地主、小建筑商、建筑师等也在某程度上参与了更新计划，但他们发现，要继续参与是越来越难了。<sup>11</sup>

中低收入的住宅供应完全被排除在这个开发体系之外，而由另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土地和住宅开发体系来处理，负责这个体系的机构是由“相对较为穷困”的小地主所组成。“借由征收土地以及土地信贷的资金挹注，这个体系开始缓慢进展”，并且在住宅建设上获得大量的投机机会，特别是在巴黎的北部与东部边缘地带，这些地区构成了真正的都市边界，其价格低廉，甚至连资金微薄者也能进行投机（律师、商人、零售商、手工业者，甚至包括工人），让人口增长与低收入住宅需求的攀升转变成他们个人的小额利益。在第二帝国时期，有些开发商建立起相当大的事业，他们的事业主要位于巴黎周边的行政区，与市中心的土地开发体系完全无关。这些周边的开发商无疑受到市中心更新计划的刺激，他们以自身在现有环境下的投资模式来筹募资本。1860年，市郊地区并入巴黎，周边的开发商对此表示欢迎，他们希望并入巴黎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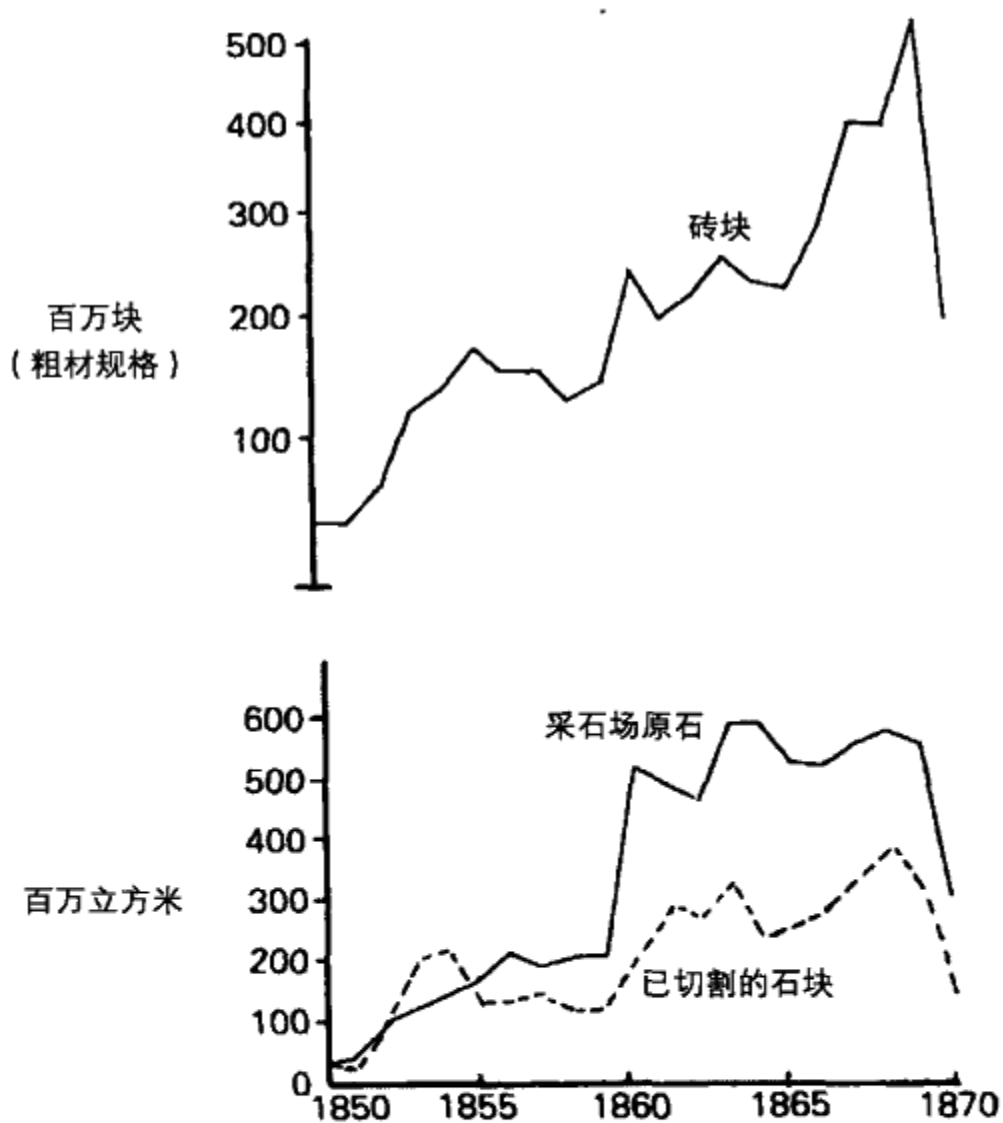


FIGURE-049  
1850—1870年，运往巴黎市内的建材容积。值得注意的是，在1860年后，采石场原石与已切割石块数量已趋于平稳，但砖块数量（与低质量住宅建造的投机有关）在整个1860年代却不断上扬。

可以提升土地价值，使他们在土地征收中获利，并且取得贷款的特权。但到最后是一场空，当这些利益未能实现时，开发商不免有受骗之感，因此便成了批评奥斯曼施政的急先锋，一直到1860年代末为止。<sup>12</sup>

尽管如此，住宅建设的惊人进展——拆除工程开始之初，拆除的房屋量大于建筑量，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使得巴黎的住宅数量大为增加，1860年代，住宅数量的增加率甚至超越了人口增长率，前者达到27%，后者只有11%。而在这惊人的进展下，也出现了同样惊人的多样发展。加亚尔提到，巴黎被分成两种开发与建设类型，“每个类型各有其地理领域、居民以及韵律”。位于巴黎周边地区（贝尔维尔、巴提纽尔[Batignoles]以及类似地区）的小规模、大部分砖造的低收入住宅建设始于1850年代，到了1860年代，由于之前的移民潮已到了组织家庭的年纪，再加上市中心人口往外迁移，这两重压力使得周边地区的住宅建设出现爆炸性的增长。<sup>13</sup>运入巴黎的砖块数量（这是用来显示建设活动的良好指针），一直到1870年为止，持续不断地增加。这类投机活动造福了一定数量的人口，而其获利来源则是已经相当微薄的工人收入。相较之下，用来装饰奥斯曼新大道外观的石块，其运入巴黎的数量波动，与征收土地的面积以及贷款供给的额度有较密切的关系。第一波浪潮一直持续到1854年，资金的竞逐（主要在铁路建设上）与高利率钳制了增长，直到1859年，而1864年与1867—1868年的金融纷扰则使得建设急速萎缩。<sup>14</sup>

值得注意的是，当1860年代高收入住宅需求达到饱和时，建设部门的增长步调也就跟着慢了下来。至于专以满足工人阶级需求而兴起的巴黎住宅市场，则走上与奥斯曼赞助的都市更新计划不同的道路。虽然奥斯曼的计划的代表不同于传统土地开发的创新形式，然而人们却过分强调其光鲜亮丽的外观，而忽略了其他部分。事实上，真正令人玩味的乃是在建设现有环境的过程中，资本流通越来越自由，连巴黎周边地区的小都市开发商也同受影响。从这一点来看，不管是在行政组织上还是空间上，奥斯曼将市郊整合到都市架构中的做法，在促进土地开发体系完善，使其脱离前一时期的衰退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对于这个开发体系，工人阶级似乎缺乏实质的响应。当中虽曾出现少数寻求以合作社

组织进行开发的做法，然而最后都无疾而终。从这个意义来看，巴黎开发过程中的多样发展，其共同支柱乃是资本的流通。

137

## 租金与土地利用形式

大开发商与小开发商之间还有一项共通点：他们逐渐倾向于从增值的土地与房地产获利，而非投资于租金这类稳定的收入来源。开发商与实际所有人之间的差异，对地租与房地产价格的水平与模式产生重大的冲击，并因此造成巴黎内部各种土地利用形式。我们在此遭遇第二帝国时期另一项重大转变：土地和房地产的租金与价格在特定的资本主义逻辑下逐渐发挥土地使用配置的功能。

巴黎的土地与房地产价值在第二帝国时期增值到原来的两倍以上（见图43）。细节难以重建，要指出其地理分布及如此繁复的时间变迁韵律也相当困难，并非轻易即能描述。<sup>15</sup>内城街道的土地价格可能只有新大道沿线土地的一半，而巴黎各区的土地价格差异更大。正因土地价值存在着陡峭的落差，才让大开发商有了从中运作的机会，而且新道路系统也创造了不可思议的良机来捕捉上涨中的场所租金。例如，佩雷尔兄弟以每平方米435法郎的价格，买下马尔塞尔布大道的中点位置，以开拓新的道路，连通他们以50法郎买下的蒙索公园附近土地（约一公里远），以及再远一点，之前以不到10法郎的代价所买下的土地。更新工程所到之处，土地价格水涨船高。塞瓦斯托波尔大道沿线土地，从1850年的每平方米25法郎，飙涨到1857年的1000法郎，1867年万国博览会后，左岸某些地区的土地，两年内竟增值了10倍。<sup>16</sup>在这种地理差异与时间变迁下，难怪投机在巴黎土地市场中如此活跃。但随着投机的进行，曾经刻画巴黎租金地貌、起伏不定的各地复杂模式开始被熨平，代之以较有系统的土地价值地图。借由这种方式，隐含于新道路系统中的空间关系系统化，便能更有系统地组织土地价值与利用方式。无法支付租金的土地利用方式被迫退出，由能支付租金者予以取代。

如一般预期，此时的地价模式显示，地价明显从市中心往市区周边层层下降（1870年，巴黎周边土地价格仍在每平方米15到

30法郎之间),并且清楚区别出资产阶级所居住的西区与工人阶级所居住的东区,两者之间刚好隔着高租金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显现出右岸的朝气蓬勃与左岸的死气沉沉。各地区的土地价值结构中也会出现明显的价值落差,不过其表现方式主要反映在土地利用形式上。举例来说,地价从市政府周边的每平方米1000法郎,到圣丹尼斯街(Rue Saint-Denis)的600法郎,再往东到了工人阶级区,则在150到250法郎之间。而在位于关键道路——新大道上——交叉的绝佳地点或繁荣的商业区,以及后街与住宅区的低价之间,也存在着普遍的分野(以现代的标准来说)。

当我们思考房地产价值所呈现的地理与时间变化时,就可以明显看出租金对土地利用形式的影响——由土地投机所推动的过程。房地产繁荣程度可以从巴黎房地产总值的上升看出,从1852到1870年,总值从25亿法郎增加到60亿法郎,其中原有的房地产就贡献了15亿。同一时期,巴黎旧市区住宅的平均售价增加为原来的三倍(见图45)。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复杂的变化值得注意。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整体房地产租金与价值的上升,以及各地理区域间逐日加深的区别,看出整个房地产市场背后一般化的运作过程。

奥斯曼认为房地产市场反映的是供需问题,他指出,如果当初没有开放巴黎周边的新土地以供开发,住宅租金绝对上涨得更快。奥斯曼的批评者则响应说,拆除工程限制了住宅供给,更新计划则造成移民潮,因此刺激了需求。双方说法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此让这个问题变得有些复杂。首先,建设成本随着建筑业效率的改善而降低。其次,之前光是上涨的土地成本——对开发商与建筑商来说,这是重要的获利来源——并不足以解释上涨的租金与房地产价值。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出自加亚尔,他认为巴黎住宅市场多半已被“资产阶级化”(或我们可以说“士绅化”)。<sup>17</sup>

奥斯曼的政策与贷款渠道独厚高价值的住宅建设。下跌的建筑成本,加上使得空间使用更为经济的室内设计,这些都让某些收入增加的中产阶级得以购入高价值住宅。巴黎住宅的价值因此不断上涨。不过,尽管高价值住宅的有效需求增加,却也出现建筑过剩的现象。例如,佩雷尔兄弟在1860年代发现,要卖掉马尔塞尔布大道上的房地产并不容易——而这只是一连串沮丧的开始。

一旦启动“增长机器”的逻辑，就很难停止。而这个逻辑有一部分寻求的是保护所创造的房地产价值，以及保护那些满足于逐渐形成的空间区别的住户。

因此，第二帝国时期所目击到的，不仅是市中心在更新之后所出现的士绅化现象，还包括在西部快速兴起、专属于资产阶级居住的区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对较为穷困”且专门供应住宅给下层阶级的住宅建设体系，他们缺乏高价值建设所享有的各项特权。成本下降不足以抵消上升的物价，因为工人家庭大多挤在一间斗室之中，很难再经济地利用空间。除此之外，我们将发现，1860年代的家庭形成，大多源于1850年代未婚的移民潮，这种现象改变了住宅需求的性质。市中心的拆除工程与士绅化，限制了当地低收入住宅的供给，并且迫使低收入住宅的需求转移到其他空间（例如左岸的寄宿宿舍，结果使当地的房租高涨）或巴黎周边的新建住宅地区。虽然巴黎周边地区的建筑业极为繁荣，但似乎仍未出现建筑过剩的迹象。工人阶级住宅市场的房地产价值上扬，对于这种现象比较好的解释是，一方面建筑过程本身具有投机性，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工人可支配所得的比例增加，因此他们不得不把钱花在买房子上。除此之外，还逐渐出现空间区隔的现象，主要由资产阶级拒绝居住在某些地区所造成。由于土地开发越来越转向低收入的投机住宅建设，而这些地区本来就很难吸引资产阶级地主或房客前往居住。东部与西部的区别（西部房地产的平均价格高于东部任何一区），便在这个二元而阶级导向的住宅供应体系下巩固起来。

投机过程也引起不同类型的使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金融与商业用途提高了证券交易所与昂坦道一带的租金，使得其他用途都无法在当地立足，因此便产生了往西北部中心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一点是其他地方所缺乏的。左岸的房地产发展缺乏这样的商业中心，但却吸收了不成比例的教育与宗教机构，因此拥有完全不同的动力。虽然租金在流离失所的市中心工人与增加的学生数目所产生的需求压力下上涨（欧德翁剧院[Odéon]附近一间附家具的房间，1860年时一年要500法郎左右，到了1864年，却涨到800法郎以上），但都市更新的步调仍然缓慢，投机行为也因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特殊性质以及缺乏来自金融、商业或工业等对土地利用



的激烈竞争而饱受限制。<sup>18</sup>工业也必须应付浮动的房地产价值，为了坚守高租金的市中心区，它必须大幅重组劳动过程或者放弃交通便捷的优势，如此方能让支付高租金的做法可行与可接受。因此，那些与市中心市场紧密联结的工业，倾向于群聚在内城的东北部，也就是手工业工人的分布地区，这里的租金虽然高于周边地区，但却比内城西北部的商业与金融地区或西部的资产阶级住宅区来得低。若不如此，工业就必须往外到周边地区寻找较便宜的土地，或者是性质特殊值得支付高租金的土地（例如，交通系统的交叉点）。

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重组（受到新信贷体系兴起的刺激），走的是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路线（在一些具有强烈传统主义色彩的地方受到顽强抵抗，例如左岸），并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逐渐将巴黎内部空间的组织，与不同使用者以竞价取得空间控制的方式结合起来。工业、商业、政府与住宅使用彼此竞争，如同不同种类的工业之间与不同质量的住宅之间进行竞争一样。1870年的巴黎要比1850年的巴黎有更大的空间，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资本的流通已经完全释放到重建既有环境及其空间排列的任务之中。通过土地与房地产投机而组织起来的土地利用竞争的新环境，迫使使用者必须尽可能地进行调适。工人人口大多分散到周边地区（离工作地点相当远）或者是数家同住一屋地挤在接近市中心的高租金地区。工业也同样面对改变劳动过程或迁往市郊的选择。

通过重建巴黎来吸收过剩的劳动力与资本，产生了各种负面效果，例如流离失所的人口与空间区域的增加、距离工作地点太远、高租金以及过度拥挤，因此当时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计划完全是病态的。然而，当时的人如路易·拉扎尔却搞错一件事，他们将所有这类的病态效果全归咎于奥斯曼的邪恶才智上。当然就这一点上来说，批评者完全呈现出传统法国人的做法（这种做法至今仍未消失），他们将所有病态现象全归咎于理应是万能的国家所做的错误政策与施政。因此，这个国家以及奥斯曼实际上拥有多少力量，便值得我们仔细考虑。

# 国家

然而，正因维持了广泛的国家机器及其为数众多的分支机构，141  
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才得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

19世纪中叶的法国，为了符合时代需要，试图进行国家结构与实践的现代化。国家如此，对巴黎来说也是如此。路易·拿破仑在工人与激进资产阶级的诉求破产下取得了权力。身为唯一有能力压制“红色分子”的候选人，路易·拿破仑在选战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共和国总统。同时，身为唯一有能力维持秩序者，他也获得广大的支持来构建帝国。虽然如此，皇帝仍迫切需要（并非聊胜于无）稳定的阶级联盟来支持他，并且还需要某种政治模式来进行有效控制与行政。路易·拿破仑所开启的模式（到了1860年代被迫逐渐放弃），是科层化且具有民意基础的专制统治。他利用由人民领袖领导庞大国家军队的景象，让每个人在为全民福祉而进行的国家发展计划中都有自己的位置。由上层精英政治所施加的强大规训，要与底层所表现的人民意志配合无间。行政事务就是领导与控制。

人们很容易将第二帝国人事与政策的举棋不定，解释成是一位机会主义梦想家所做的决策，由于他的幕僚群既腐败又贪婪，连带使他的决策既独断又左右摇摆。我将分别从葛兰西（Gramsci）142  
与泽尔丁（Zeldin）的角度——两人分居政治光谱的两端——来观

察第二帝国这个作为法国政府与政治重要转折点的时期。第二帝国所推动的各项试验性措施，有助于让法国的各项制度更能符合现代的要求，但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矛盾。<sup>1</sup>之后，我将把焦点放在巴黎政治的转折过程，及其对巴黎历史地理的影响。

---

## 国家对资本流通的干预

---

“国家生产性支出”的观念源自圣西门的教条，并且得到皇帝以及一些重要幕僚——以佩尔西尼和奥斯曼为首——的松散支持。所谓国家生产性支出，指的是债务融资支出无需额外抽税，也不会对国库造成额外负担，但前提是支出要有“生产性”，并且能促进经济活动增长，如此一来，在稳定的税率下经济增长可扩充政府岁入，使其足以支付利息与分期摊还的成本。国家出资的公共工程——皇帝要求奥斯曼执行——至少原则上可以协助吸收剩余的资本与劳动力，在不额外增加纳税人成本的前提下维持充分就业，以此产生经济增长。

奥斯曼仰赖的主要税基是入市税 (octroi) ——商品进入巴黎时所课的税。奥斯曼打算增加这项税收，以对巴黎的开发案进行补贴与赤字融资。例如，奥斯曼一方面把土地交给开发商，另一方面却又严格管制建筑风格与材料，由于这些材料运进巴黎时必须课税，因此等于变相增税，同时也附带衍生出奥斯曼建筑昂贵住宅以供富人居住的强烈偏好。

奥斯曼狡猾的融资伎俩已有其他作品详加介绍，在此不予赘述。<sup>2</sup>到了1870年，他的工程已耗费25亿法郎，当中有半数来自预算剩余、国家补助与土地转卖。奥斯曼于1855年通过直接公开认购（创新的做法）借了6000万，之后又于1860年试图再借1.3亿，这笔贷款最后在1862年由佩雷尔兄弟的动产信贷认购五分之一后才告募得。1865年，经过激烈辩论才授权通过的2.7亿法郎借贷案，也是在动产信贷主动出面协助下才获得解决。奥斯曼还需要6亿，然而获得贷款的希望极为渺茫。因此他开始把脑筋动到公共工程基金 (Public Works Fund) 上，这是一笔独立于市政预算之外的流动债务，用来平衡长期公共工程的收支。建设成本一般来说先由建筑商支付，计划完成后再由市政府分期支付（包

FIGURE-050

一开始,路易·拿破仑所面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维持统治的民意基础。杜米埃在其著名画作中将1851年发动政变前的路易·拿破仑描绘成机会主义分子拉塔波伊尔(Ratapoil),画中的他正试图劝诱不情愿的法国——一如往常地被描绘成自由女神的样貌。对于拉塔波伊尔的殷勤,她的回应是,他的热情来得太突然,令人难以信任。



括利息)给建筑商,分期年限可以展延到计划完成后八年。由于建筑商必须筹募资本,因此事实上这笔资金对市政府来说算是短期贷款。1863年,有些建筑商的财务出现困难,他们要求市政府就已经完成一部分的计划立即支付。市政府转而求于动产信贷,后者在皇帝的催促下,以市政府写给建筑商的信函为担保(规定计划的完成期限及支付时程)贷款给建筑商。奥斯曼实际上等于是通过建筑商向动产信贷借钱。这笔贷款完全隐藏在公共工程基金中,不受外界监督。到了1868年,奥斯曼已经以这种方式筹措到近5亿法郎。

奥斯曼与佩雷尔兄弟及动产信贷的关系如此紧密,无怪乎受罗斯柴尔德家族提拔的自由派(即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列昂·赛(Leon Say)会在1865年揭露奥斯曼的不法行径。这个事件也为反对帝国者平添攻击火力。朱尔·费里(Jules Ferry)的《奥斯



FIGURE-051

拆除工作正式开始后，到处都是建筑工人。杜米埃描绘两名工人猜想圣杰克教堂（Tour St.Jacques，巴黎今日一处孤立的地标）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是因为要用气球把工人运上去才能拆除。

144

曼的神奇账户》(Comptes Fantastiques d'Haussmann) 揭露这整个过程，其中一些内容在1868年新闻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在财政上持保守心态、缺乏想象力且具有政治动机的资产阶级无疑是造成奥斯曼下台的主要推手。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更深层的问题，即国家对资本流通的干预形式。1853到1870年间，“巴黎市的债务从1.63亿法郎增加到25亿法郎，1870年，债务负担已占了市政预算的44.14%”。市政府财务因此变得极为脆弱，无法承受任何带息资本流通所造成的震撼、困难与不确定。奥斯曼无法掌控巴黎的未来，更甬提稳定经济，他自己甚且“受制于他与皇帝主子所创造的机器”。萨克利夫(Sutcliffe)的结论是，奥斯曼在全国性政治议题的逼迫下下台反而是因祸得福，因为过度延伸的市政府财政结构“不可能熬过1870年代的国际不景气”。<sup>3</sup>

不论什么时代或地点（此时浮现脑海的是1970年代的纽约），国家机制若是企图以举债的方式填补支出，以为如此便能解决劳动与资本过剩的大问题，那么终将成为狡猾矛盾——具体表现在带息的金钱资本流通上——下的受害者。奥斯曼的命运与佩雷尔兄弟如出一辙。虽然皇帝及其幕僚推动法国的现代化，不过却也使法国陷入当代资本主义金融无所不在的矛盾中。他们将国家置于金融市场的掌握中，并因此付出代价（此后许多国家也走向相同的路）。



## 劳动力的管理

“我宁可面对 20 万杀气腾腾的大军，”皇帝说，“也不愿面对失业者群起反叛的威胁。”<sup>4</sup>1848 年革命在巴黎的爆发与覆灭，使得首都的充分就业成为急迫的议题。公共工程的赶工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不再有成群的叛乱分子上街叫嚣，眼前看到的尽是忙着上工的砖匠、木匠与其他工匠；如果铺路石被人拔了起来，那也不是为了堆筑街垒，而是为了埋设水道与煤气管线；住宅不再受纵火的威胁，反而因被征收而领到丰厚的赔偿金”。<sup>5</sup>到了 1860 年代中叶，巴黎的就业人口中超过五分之一投入于建设工程。虽然这是件杰出成就，但从两个方面来看却相当脆弱。首先，西尼尔 (Nassau Senior) 指出，“建筑业停摆一个星期就足以让政府惊恐不已”。其次，生产性支出似乎是永不停止的工作循环，它将沉重的债务负担加诸未来的劳动之上，使大多数人口必须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被迫无休止地工作。一旦公共工程延宕——1868 年后就曾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而出现这种现象——就会造成税收减少与建筑业失业，问题将十分严重。不同于资产阶级，工人并不反对奥斯曼。奥斯曼是工人就业的来源，工人知道这一点，但失业问题却迫使工人采取激烈手段，造成日后有不成比例的建设工人参与巴黎公社。<sup>6</sup>

145

政府使用其他对策来刺激贸易。为了彰显帝国光彩，军队必须更换新制服，宫廷服饰章程也须正式制定；时尚成了巴黎内部象征地位与名声的必要之物。这对服饰业来说是相当大的刺激，这股影响从 1852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1850 年代末为止。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过剩劳动力都可借由这种方式加以吸收。例如法国各地的劳动后备军，为了响应巴黎重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而在 1850 年代大量涌入巴黎。因此虽然贫穷率（劳动力过剩的近似指标）在 1853 到 1862 年间从每 16.1 人有 1 人贫穷，降到每 18.4 人有 1 人贫穷，但贫穷的绝对人数并没有减少，到了 1869 年，贫穷率居然回升到每 16.9 人就有 1 人贫穷。<sup>7</sup>

奥斯曼针对这批庞大的工业后备军所提出的政策，其中的演变相当有趣。传统认为市政府慈善事业是一种权利，市政府有责

任照顾穷人（即便这些人来自外省），然而到了18世纪，这种观念逐渐遭到扬弃。取而代之的是奥斯曼所提出的较为现代的新马尔萨斯政策。事实上，面对市政预算的压力、福利问题的扩大以及不断变更的融资形式，奥斯曼或许已无计可施。奥斯曼认为，市政府履行职责的最好方式在于提供工作而非提供福利，如果市政府已经试着创造工作机会，那么就on应该合理减轻市政府提供福利的义务。奥斯曼暗示，如果已经提供工作而贫穷依然存在，这就是穷人自己的错，这些人终将失去要求国家援助的权利。这种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因为1990年代英美改革福利体系时便是持此一论调。1870年代巴黎政府机制对于穷人、病人与老人所愿负的责任，已不同于1848年。加亚尔指出，官方对于福利、医疗与教育的态度有了转变，这种转变让人们感觉自己的权利遭到剥夺，同时也丧失共同体的感受，因而埋下1868到1871年社会动乱的根源。<sup>8</sup>新马尔萨斯政策激起民众广泛的回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往后巴黎公社曾试图恢复这些权利，甚至连奥斯曼也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福利制度，不过，奥斯曼发现最需要花费心力的福利问题其实是与日俱增的失业人口，以及兑现帝国过去所开的支票：帝国将提供完善的安全网，从摇篮照顾到坟墓。

146

奥斯曼对供给价格也采取类似原则。当价格飙涨时，社会抗争通常会迫使政府快速进行补助。然而奥斯曼却信任自由市场，至少他认为这个市场机制对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来说是有用的。如果价格受收成影响而出现波动，并进而出现困难，此时的解决方式是，当供给价格偏低时，面包师傅与肉贩要支付一笔资金充当周转金，当供给价格偏高时，面包师傅与肉贩则从周转金中取回资金。这个做法不会对市政预算构成负担，同时又可以稳定物价，奥斯曼因此成了1930年代常见的商品物价稳定计划的先驱。然而奥斯曼自己却不太欣赏这种做法。1860年后，鼓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成了政府的政策核心，奥斯曼也就顺势放弃这些计划。就在同一时期，空间藩篱被去除了，各地货物可以轻松输入巴黎，巴黎的粮食供应因此不受法国各地收成状况的影响。除此之外，巴黎内部的粮食分配已有改善，整座城市的粮食供给因而获得更大的保障。

由于巴黎市政府没有一套简单易行的指导原则来管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福利机制，因此奥斯曼只能依循本能寻觅出两条相当

现代的路径，不过这两种做法乍看之下与帝国中央集权的体制格格不入。首先，奥斯曼试图将所有的福利职能全交由民间办理（以教育为例，奥斯曼认为国家的角色仅限于帮助穷人入学）。其次，奥斯曼试图建立受中央监督的地方分权制度，以加强地方的责任与创制权。将巴黎的社会福利负担移往外省，并且将医疗、教育与济贫的责任分散给各行政区，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配合行政区划——仍保持中央与地方的上下级关系——使地方的权责相符。因此，各行政区取代了巴黎市，成为社会福利需求者求助的制度中心。

## 监视与控制

第二帝国是专制的警察国家，其监视与控制的触角延伸极为深远。除了直接的警察行动、密告者、间谍以及法律骚扰，帝国当局也试图控制信息的流通，动员大型宣传活动，并运用一切政治上的权力与施惠在朋友与敌人间进行合纵连横。<sup>8</sup>这个体系在法国乡间可以行得通，却很难施行于城市。在巴黎之所以窒碍难行，一方面是因为巴黎有着革命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巴黎人口的庞杂与城市特有的复杂性。奥斯曼与警察厅长（两人经常为了司法管辖问题起冲突）是监视与控制的主要推手，各政府局处首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等）也从中协助。法律也依照这个目的制定。第二共和时期曾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所有共和派的报纸都被查禁”，一位英国观察者语带讽刺地说，“只有奥尔良派、正统派（Legitimist）与波拿巴主义才允许发行”。<sup>9</sup>第二帝国新闻法规则进一步紧缩共和时期“秩序党”的新闻检查制度。连街头歌手与艺人都必须领取执照（这些人被当局视为是贩卖歌曲的小贩，可能散布社会主义与颠覆思想），而依据1853年的法律，他们唱的歌曲必须经过主管机关的盖章与核准。随着街头艺人的处处受限，大众文化的政治面向也受到扼杀。但从当时的人（如富尔内尔[Fournel]）遭遇这类人物的频率，以及杜米埃（兹举一例）以他们作为画中人物的频率可以看出，当局无法完全压制大众文化在这方面的发  
展。<sup>10</sup>

警察（工人总称他们为间谍）并不热衷于控制犯罪活动，他们真正投入的其实是巨细靡遗地搜集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信息并建

立档案。警方努力营造出肃杀的气氛，并且在1854年重整警察体系，但似乎没有多大成效。真正的恐惧其实来自无孔不入的密报网。“不管是在作坊还是城市，都有警方的组织，”蒲鲁东写道，“工人之间不再信任，也不再沟通。因为隔墙有耳。”<sup>11</sup>出租公寓受到严密监视，住户与进出公寓的人员记录簿要定期检查，公寓管理员则被编入警方的密报网中。皇帝于1852年否决工人结社、联盟与集会（加上罢工）的权利，代之以劳资调解委员会（用来解决业内争端的工人与雇主委员会）和工人互惠协会。为了避免这两个组织成为社会主义温床，皇帝还在组织当中任命行政官员（通常听命于警察厅长），定期汇报。1868年，公众集会权利终于立法通过，为了反制，政府建立了一套控制体系——“评估者”有权力监督“政治”集会，若集会不适当，则可予以解散，除此之外，“评估者”也要建立广泛的档案。宣传体系的复杂程度亦不下于控制体系。<sup>12</sup>通过官方与半官方媒体，新闻与信息的流通受到控制，所有的官方公告与行动（许多措施是在警察厅长的命令下进行）都是为了让上层（特别是皇帝与皇后）的丰功伟业深植人心，希望以慈善工作与官方赞助的节庆和博览会来弥补个人自由的丧失。这种体系有其局限。当资本流通完全自由放任时，竞争与技术发展将并肩竞逐，并且将擦出各种形式的文化运动与文化调适的火花，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要进行监视与控制势必极为困难。欧洲运输交通的日趋便利，使得布鲁塞尔成为政论文章的主要出版地，而要阻止这些作品流入法国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十分困难。新闻检查的进退两难足以说明问题的症结。巴黎报纸的流通量，从1852年的15万份，增加到1870年的100万份以上。<sup>13</sup>虽然报章杂志的发行追求的完全是金钱利益，但其种类的多样亦足以造成争议，并且足以触碰政府决策的神经。当列昂·赛以财政审慎为名，对于奥斯曼的财政政策多所抨击时，他同时也等于



FIGURE-052

街头艺人是巴黎街头生活的重要元素，要控制并防止他们进行任何政治宣传并不容易。杜米埃全力描绘出正在表演的街头音乐家。

148

“评估者”有权力监督“政治”集会，若集会不适当，则可予以解散，除此之外，“评估者”也要建立广泛的档案。宣传体系的复杂程度亦不下于控制体系。<sup>12</sup>通过官方与半官方媒体，新闻与信息的流通受到控制，所有的官方公告与行动（许多措施是在警察厅长的命令下进行）都是为了让上层（特别是皇帝与皇后）的丰功伟业深植人心，希望以慈善工作与官方赞助的节庆和博览会来弥补个人自由的丧失。这种体系有其局限。当资本流通完全自由放任时，竞争与技术发展将并肩竞逐，并且将擦出各种形式的文化运动与文化调适的火花，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要进行监视与控制势必极为困难。欧洲运输交通的日趋便利，使得布鲁塞尔成为政论文章的主要出版地，而要阻止这些作品流入法国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十分困难。新闻检查的进退两难足以说明问题的症结。巴黎报纸的流通量，从1852年的15万份，增加到1870年的100万份以上。<sup>13</sup>虽然报章杂志的发行追求的完全是金钱利益，但其种类的多样亦足以造成争议，并且足以触碰政府决策的神经。当列昂·赛以财政审慎为名，对于奥斯曼的财政政策多所抨击时，他同时也等于

贬损皇帝的权威。共和派反对者如费里，也借这个机会对时政痛加批评。除此之外，新闻检查也不仅限于政治，它也涉及公共道德问题。大部分歌曲之所以被当局禁止，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基于政治而是淫秽，<sup>14</sup>而政府也因起诉波德莱尔、福楼拜以及其他违反公序良俗的作者而引起轩然大波。新闻检查制度破坏了阶级团结，而阶级团结却是皇帝权力的真正基础。简言之，当时的政治体系已难适应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泽尔丁坚持认为，第二帝国当初建立的基础，便在于以资本主义促成社会进步，因此帝国日后会走向自由主义，乃是发展之初就已决定的事。<sup>15</sup>

在控制平民阶级上，也有相同的难处。对皇帝功业的宣传不能只放在慈善事业上。“节庆与面包”这句话只有前半段是对的，工人阶级确实在节庆中感到愉快，但后半段的面包可就没那么容易获得。1860年代，实质工资不断下降，成了社会进步的最大讽刺，同时也显示节庆不过是以工人阶级为代价而上演的令人不快的狂想曲。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要如何解释自己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皇帝试图以罢工权（1864年）及集会结社权（1868年）来收编巴黎工人。他甚至促成集体行动形式。1862年，法国政府甚至赞助工人前往伦敦博览会观摩，这些人回国之后便成立第一国际法国分会（不禁令人怀疑这些人是否只是帝国的工具）。大众文化在政府数年的压制下，表面上呈现睡眠状态，但到了1868年全面解禁之后，这些隐藏在地下的政治潜流却随即爆发出来。<sup>16</sup>

对于进行监视与控制的权力来说，都市转变的效果可说是利害参半。许多盗贼的巢穴与贫民窟，以及容易堆置街垒的狭窄街道都被扫除净尽，代之以容易控制的大道。然而流离失所的人口

149

---

## 形塑社会再生产的空间

---

“在权力空间里，权力并不以原貌示人，它隐藏在空间组织之中。”<sup>17</sup> 奥斯曼心里明白，他用来形塑空间的权力，同时也能影响



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奥斯曼希望巴黎能摆脱工业基础与工人阶级，如此巴黎或许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支持资产阶级秩序的非革命堡垒。奥斯曼的愿望显然是件相当浩大的工程，光是一个世代的时间是无法克竟全功的（事实上，到了20世纪最后几年，奥斯曼的梦想才完全实现）。不过奥斯曼还是持续地对巴黎市内的重工业、污染工业与轻工业施加压力，到了1870年，巴黎市中心绝大部分区域都已看不到工厂。而大部分工人阶级也被迫迁离市中心，虽然如此，奥斯曼仍嫌他们搬得不够远（图53）。市中心保留给彰显帝国权力的纪念碑与官署、金融与商业，以及急速增长的旅游服务业。新大道不仅提供军事控制的机会，也让（点燃煤气灯以及定期巡逻）资产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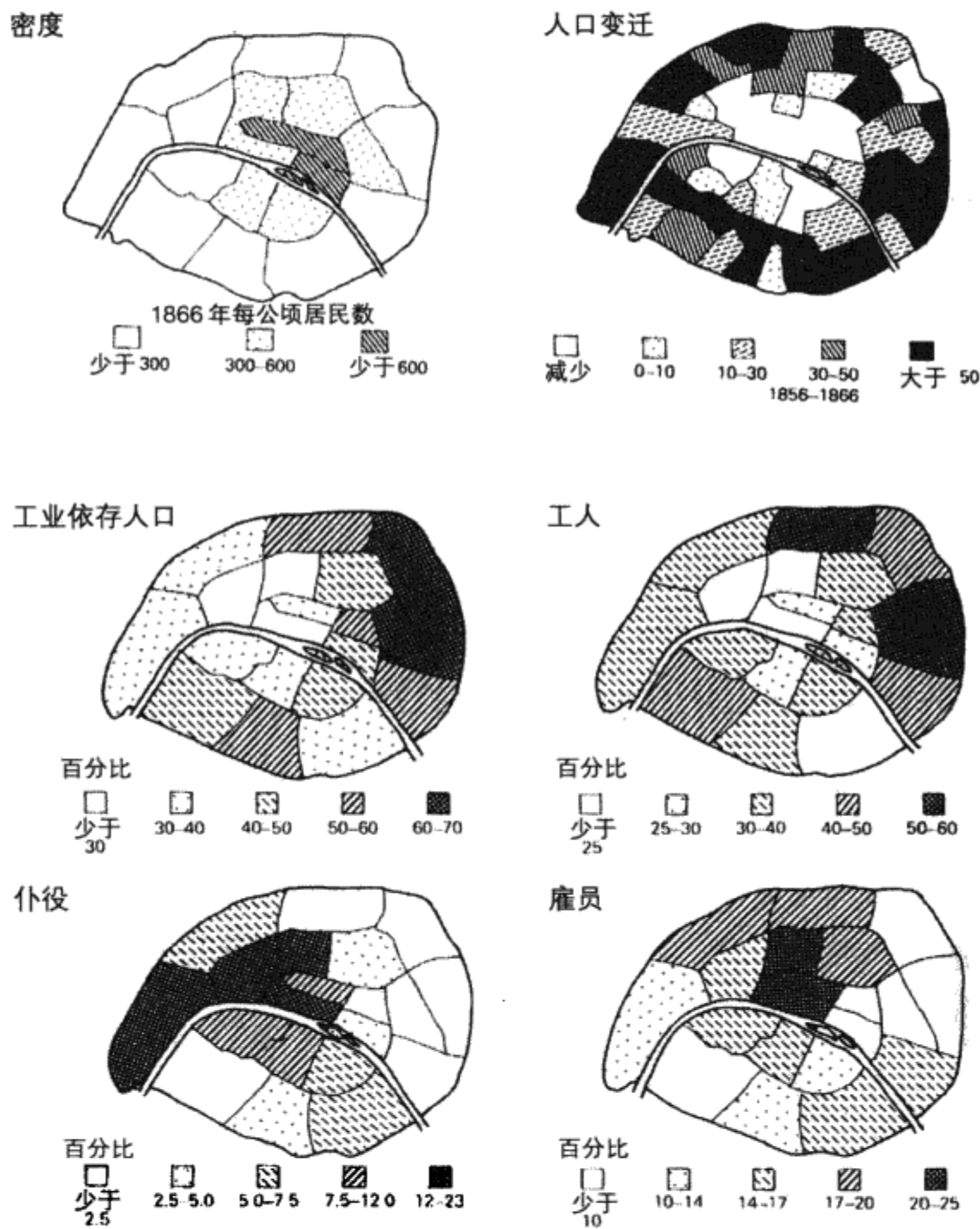


FIGURE-053  
1866年巴黎人口密度与1856到1866年巴黎人口变迁(根据Girard, 1981; Canfora-Argondona and Guerrand, 1976), 以及1872年巴黎各区工业依存人口、工人、雇员与仆役分布(根据Chevalier, 1950)。

级能在商业与娱乐区中来去自如。往都市主义“外向”形式发展的基本方针，连同其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效应，在此得到了确保（消费的确增加了，不过消费的增加并非整个发展得到确保的主因，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巴黎市中心的全新面貌让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住宅区域的扩大不只让资产阶级能远离犯罪阶级所带来的实际或想象的危险，也使巴黎成为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空间，可以不断再生产各种社会阶级。奥斯曼以其非凡的能力，协调各项社会进程、运用外溢效果（在某地的投资可以连带增加另外一处投资的价值）并且重塑巴黎的地理分布。

奥斯曼的做法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总是合于他的期望，因为他所试图协调的各项集体进程的实际方向总是莫衷一是（工业生产即是如此，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除此之外，奥斯曼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因此自然会引起众人的反对，这些反对声浪不只来自工人阶级，也来自不同派系的资产阶级。舍瓦利耶（皇帝宠爱的经济学家）反对工业撤出巴黎，他认为这将破坏就业稳定并对社会和平构成威胁。奥斯曼将工业全数撤离巴黎之后，拉扎尔利用颇具影响力的《市政评论》（*Rue Municipale*）非难佩雷尔兄弟的投机事业，同时也严厉批评奥斯曼的做法，因为他们的举动凸显了“老巴黎，奢华者的巴黎”与“新巴黎，贫穷者的巴黎”之间社会与地理的区别——拉扎尔认为这种区别只会激起社会暴动。之后，拉扎尔写了好几本书抨击奥斯曼的做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过等到这些书籍出版时，奥斯曼已经下台了。在一片讨伐声中，奥斯曼（与皇帝）必须寻求利益的结盟。<sup>18</sup>

---

## 寻求阶级联盟

---

对于任何一位政府首长来说，他的职责是为执政当局培养并巩固政治支持。由于拿破仑三世背后没有政党，也未能吸引各阶级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结盟，因此，他必须找出更基层的社会基础来支持他的权力，而非仅仅靠着他的姓氏与军方拥戴。<sup>19</sup> 奥斯曼必须在这座充满政治敌意的城市中建立起阶级联盟，一方面为皇帝的权力奠下更完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自己。奥斯曼戏剧性的下台容易使人忽略他成功的一面，尤其他所面对的状况是瞬

151

息万变的阶级分布（因都市快速增长与资本累积而形成）以及充满压力的现代化过程，这些现象势必激起“盲目的不满、难以平息的嫉妒以及政治上的敌意”。尽管如此，身为不可思议的“增长机器”的主导者，奥斯曼握有大量资源来进行分配，身旁因此簇拥着趋炎附势者。然而一旦资源耗尽，便树倒猢猻散。此外，如马克思经常提到的，资产阶级“总倾向于基于自身的私人动机而牺牲其所属阶级的一般利益”——奥斯曼同意马克思的说法，并且在《回忆录》中抱怨“社会普遍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奥斯曼缺乏有力政党的奥援，也无力进行阶级联盟而取得支持，因此他总是连番遭受短视近利者的背叛。<sup>20</sup>从这个角度来看，奥斯曼狡猾的融资伎俩应被视为是一种逼不得已的手段，为稳住权力，奥斯曼必须设法让国库充盈。

奥斯曼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也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奥斯曼是从整体来考虑空间结构，不受狭隘的私有财产权所局限。而地主阶级本身则分成封建地主与现代地主、大地主与小地主、市中心地主与市郊地主。加亚尔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他认为“帝国与巴黎地主之间的联盟关系似乎日趋紧密”。<sup>21</sup>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受了财产权意义转变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政府进行根本调整有关。无论如何，地主也许最有可能为狭隘的私人利益而背叛阶级利益。奥斯曼与佩雷尔兄弟的联盟关系——当它还持续的时候——极为强大，但此时金融资本也在转变。在金融流通上，1860年代末期佩雷尔兄弟的失败与逐渐抬头的财政保守主义，破坏了原先支持奥斯曼的坚强支柱。之前曾经提过，有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提拔的经济学家先声夺人，公开抨击奥斯曼的融资方法。与此同时，奥斯曼与工业界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到了帝国末期，工业界成为奥斯曼的坚定反对者。奥斯曼终于尝到将工业驱离巴黎的苦果。商业界虽然因奥斯曼的措施而受惠，但商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撷取，对于回报则相当冷淡。最有趣的是奥斯曼与工人的关系。早在1857年，工人在选举时将票投给共和派，这让奥斯曼感到愤怒与羞辱。<sup>22</sup>而奥斯曼也鲜少尝试经营他的民意基础。但令人惊讶的是，1868到1870年的骚乱期间，工人暴动很少将目标指向奥斯曼，除此之外，奥斯曼的解职还引起建筑业的不安与抗议。身为大量工作机会的提供者，奥斯曼明显

赢得至少其中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忠诚。就算出现租金过高的问题，工人也知道是地主侵吞这些钱，而不是奥斯曼。

更深层的不满使巴黎内部的阶级联盟特别难以维持稳定。巴黎本身的转变足以使人（贵族与工人都有相同感受）对“老巴黎”的消逝感到乡愁与不舍，并造成加亚尔所强调的共同体感受的普遍丧失。<sup>23</sup>旧日的方式与结构被颠覆了。奥斯曼对此心知肚明，他设立机构以收集、编目并记录这些已经消失的事物。他设立巴黎市立历史图书馆，并且聘请马维尔记录都市景观的变化。但已经失去的东西是无可取代的。除此之外，奥斯曼未能在巴黎建立民选政府形式也造成伤害。奥斯曼坚决不将巴黎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将其视为一座首都，各色各样瞬息万变“四处游走的”利益与个人在此来来去去，足以排除稳定而永续的共同体感受的形成。另一方面，巴黎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依归，听命于国家，为此，奥斯曼促成并护卫1855年的组织法（Organic Law），将所有官署的权力全交给由上层任命的首长而非民选官员。奥斯曼想转变巴黎的共同体性质，这也许是对的，但否认首都人民拥有主权却引发争议，并使许多工人与资产阶级倒向巴黎公社。<sup>24</sup>从这一点来看，奥斯曼未能维持阶级联盟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用什么方式去做。然而，奥斯曼的独裁做法其实与他身处的环境有关，当初也正是这种环境才引发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因此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断，奥斯曼不可能存续到自由主义帝国的出现。

奥斯曼巨塔般的身影在第二帝国时代支配了整个巴黎的政府机制。说奥斯曼差一点就无法安然度过资本快速累积下所释放的社会力量，并不是要贬低他的才能，事实上，奥斯曼这16年来一直是以极为巧妙的方式悠游于各派之间，并且以杰出的技巧与眼光稳定住摇摇欲坠的权力。不过，真正的风暴并非奥斯曼所创造的，也非奥斯曼所能驯服，它是法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下所产生的深层骚动，这个风暴最后将奥斯曼弃如敝屣，其冷酷的程度与奥斯曼当初将中古巴黎交给拆除工人如出一辙。在此过程中，巴黎逐渐散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气息——不管是外观还是行政的基础建设——直到今日。

# 抽象与具体的劳动

153 工厂工人、制造业工人以及手工工人全被大量集中到一个场所，连资本也经由看不见的线索发动起来，除此之外，它还直接指挥另一批大军：家庭工业的工人。

——马克思

工人的集体力量与权力证明其对七月王朝的倾覆是不可或缺的，而工人的悲惨状况随后又在1840年代繁衍出无可计数要求社会与工业改革的提议与运动。工作问题因此成为1848年巴黎工人关切的核心。然而，手工业传统下的技术工人——根据科尔邦(Corbon)在帝国中期写成的作品，这个优越阶级占劳动力的四成左右——扮演何种确切角色并不容易界定。<sup>1</sup>标准的说法是，这些工人对于自己的技术感到自信，却因长期不安定而败坏，他们相信工作是晋升之阶，但实际上却是越工作越困苦，这些工人相信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因此他们寻求新的工业秩序以减缓工作的不安定，改善他们的贫困，并且阻挡日渐增长的去技术化与剥削加大的趋势。不过，朗西埃却对手工业传统的力量与特性感到怀疑。<sup>2</sup>朗西埃的引证——来自工人诗人与工人作家大量投稿于《工厂报》(*L'Atelier*)的作品——明确指出浪漫化与同质化使人们误以为手工业工人全都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朗西埃仔细研究工人的作品与书信，发现工人在忙里偷闲之余，对于劳苦工作便能翻身并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只希望得到雇主的尊重，而非想要革命。他

154





FIGURE-054

杜米埃《工人》捕捉了巴黎工人某种自信又卑屈的特质，雇主普洛（Poulot）则认为这些工人太自以为是。

们希望受到平等对待，希望被当成人而非只是被雇用的双手。他们希望自己的问题能立即获得解决并且得到协助。他们对于布朗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感兴趣，大部分人则指望圣西门运动能解决他们的财务与就业问题，至于其中的社会改革理念他们并不关心。

朗西埃的说法是对革命浪漫主义（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劳工史家有时会抱持这种观点）的修正，然而他的叙述却未能捕捉到在街垒中奋战、参与卢森堡委员会（Luxembourg Commission）审议，以及主动支持卡贝、孔西代朗、蒲鲁东以及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工人们的情绪。事实上，大部分的工人似乎寻找的是某种社团、工人自主管理或互惠共生的形式，而非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但资产阶级与雇主的冥顽不灵逼得他们（如卡贝、孔西代朗、勒鲁与其他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好采取倾向革命的态度。虽然当时明显存在着许多混淆且变动的议程与途径（特别是诉诸暴力），但无疑地，大部分手工工人还是指望1848年社会共和国的创建能支持他们重新组织工作、改革社会生产关系，并且为未来数十年工人在社会上的发展预做准备。

155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工业的发展走上一条非常特殊的路径。19

世纪中叶的巴黎是法国最重要也最多元的制造业中心。尽管巴黎一直给人以大型昂贵的消费中心的形象，但事实上它一直是座工人阶级城市，对于工厂产量的增长极为依赖。举例来说，1866年，巴黎180万人口中有58%仰赖工业，只有13%仰赖商业。<sup>3</sup>但巴黎产业结构与组织的特征相当特殊（表四、五与六）。1847年，超过半数的制造业雇员少于两名，只有11%的企业雇员超过10名，有资格称为“大企业”（超过500名员工）的不超过425家。在许多事例中，很难区别谁是老板谁是员工，斯科特就曾指出1847到1848年的调查由于政治因素而使得分类不清。<sup>4</sup>由于手工工人已经发展出一套指挥的科层形式，因此在小企业几乎不可能构成强烈的阶级对立（这种状况一直是第二帝国时期的常态，并且引导了工人运动——尤其是受蒲鲁东影响的工人运动，他们反对罢工、鼓吹成立社团，并且将反对的对象局限在金融家、垄断企业、地主以及专制政府，而非反对私有财产制与资本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商业与制造业区别开来并不容易，因为店铺后头的工人与街道两旁的服饰店面其实是一体的。

这些状况随产业而异，也随位置而异。除了餐饮与粮食供应业外（在这个行业中，工业与商业几难分别），纺织与服饰业以及家具与冶金业支配并涵盖了各种“精品”，不仅过去，巴黎至今仍因这些商品而闻名于世。大部分巴黎传统地区并未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即便占有重要地位的纺织业，在1847年时大部分也仍分散在外省，只有服饰业集中于巴黎。说穿了，绝大多数的巴黎工业只为满足巴黎自身的市场。只有冶金与工程部门才勉强能辨识出一点资本主义工业的“现代”形式。

如此庞大的经济企业形式无法在一夕之间改头换面。它必须在工业混合、科技、组织以及地点上经历重大变迁。1848到1850年的不景气，造就一股令人惊讶的活力，这股活力首先感染了轻工业，然后于1853年后影响了建筑业、重工业与冶金业，同时也影响了服饰业。1860年代，增长的步调趋缓，尤其是大规模工业，并且随部门与位置而有不同的发展步调。

表四 巴黎的就业结构, 1847 与 1860 年

职业	一八四七年(旧城区)			一八六〇年(旧城区)		
	企业家数	员工数	每家企业员工数	企业家数	员工数	每家企业员工数
纺织与服饰业	38,305	162,710	4.2	49,875	145,260	2.9
家具业	7,499	42,843	5.7	10,638	46,375	4.4
冶金与工程业	7,459	55,543	7.4	9,742	68,629	7.0
平面印刷业	2,691	19,132	7.1	3,018	21,600	7.2
餐饮业	2,551	7,551	3.0	2,255	12,767	5.7
营建业	2,012	25,898	12.9	2,676	50,079	18.7
精密仪器业	1,569	5,509	3.5	2,120	7,808	3.7
化学业	1,534	9,988	6.5	2,712	14,335	5.3
运输设备业	530	6,456	12.2	638	7,642	12.0

资料来源: Daumas and Payen (1976)

表五 巴黎的经济依赖人口, 1866 年

职业	雇主	雇员与员工	家庭	总计	百分比
纺织与服饰业	26,633	182,466	103,964	313,063	25.3
营建业	5,673	79,827	71,747	157,247	12.7
美术设计业 <sup>a</sup>	11,897	73,519	60,449	145,865	11.8
冶金业	4,994	42,659	50,053	98,906	8.0
木材与家具业	5,282	27,882	33,093	66,257	5.3
运输业	9,728	35,022	48,938	93,688	7.6
商业	51,017	78,009	101,818	240,840	18.6
杂货业 <sup>b</sup>	10,794	50,789	58,435	120,018	9.7
未分类	2,073	4,608	5,417	12,098	1.0
总计	128,091	575,981	533,914	1,237,987	(100.0)

资料来源: Rougerie (1971), 页 10。(注意 1866 年巴黎总人口为 1 825 274; 见表一。)

a. 包括印刷、精品、精密仪器与贵金属。

b. 包括皮革、制陶、化学品。

表六 巴黎各产业产值，1847到1848年与1860年（10亿法郎）

行业	1847-1848	1860
餐饮业	226.9	1,087.9
服饰业	241.0	454.5
精品业	128.7	334.7
营建业	145.4	315.3
家具业	137.1	200.0
化学品与制陶业	74.6	193.6
贵金属业	134.8	183.4
重金属业	103.6	163.9
纺织业	105.8	120.0
皮革业	41.8	100.9
印刷业	51.2	94.2
马车制造业	52.4	93.9

资料来源：Gaillard (1977), 页 376

157 1847—1848年、1860年与1872年的调查，虽然有瑕疵，但已能重建产业发展的一般路径。<sup>5</sup>1860年的调查列出10.1万家企业，一共雇用41.6万名员工——比1847年增加了11%，净增加的员工数大部分来自被巴黎合并的郊区，至于旧市区工人反而减少了1.9万名。企业数量则增加了30%，显示小企业有着惊人的扩张。然而，雇用员工数少于两人的企业数量增加到了62%（1847到1848年是50%），而雇用员工数多于10人的企业数量则从11%降到7%。这种逐渐零碎化的现象在许多地区都可见到，但巴黎旧市区却最为明显。以服饰业为例，企业的数量增加了10%，但雇员却减少了20%。化学工业的数字更是吓人——企业数量多了45%，但工人数量却少了5%。1847到1848年的机器制造业，即大规模工业，每个企业平均有63名员工，到了1860年却逐渐零碎化而只剩下24名员工。

要对这种现象作出确切的诠释可能会引起争论。表面上，各项数据显示许多小企业发展迅速，工业结构也越来越零碎化，这段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帝国结束甚至更久。除此之外，小企业的发展与零碎化同时出现在市中心与周边地区。1847—1848年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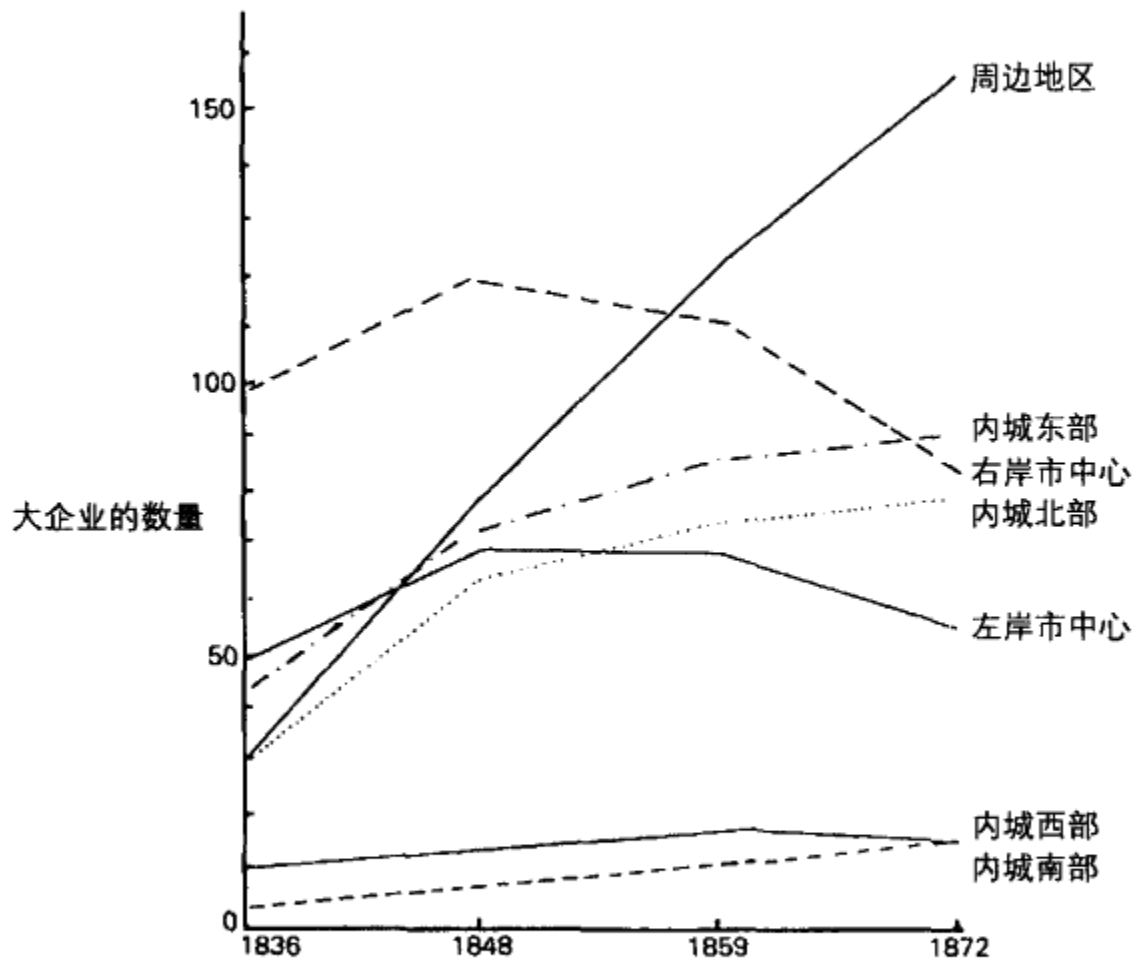


FIGURE-055  
巴黎各地区大企业的数量，根据 1836、1848、1859 与 1872 年的调查(引自 Daumas and Payen, 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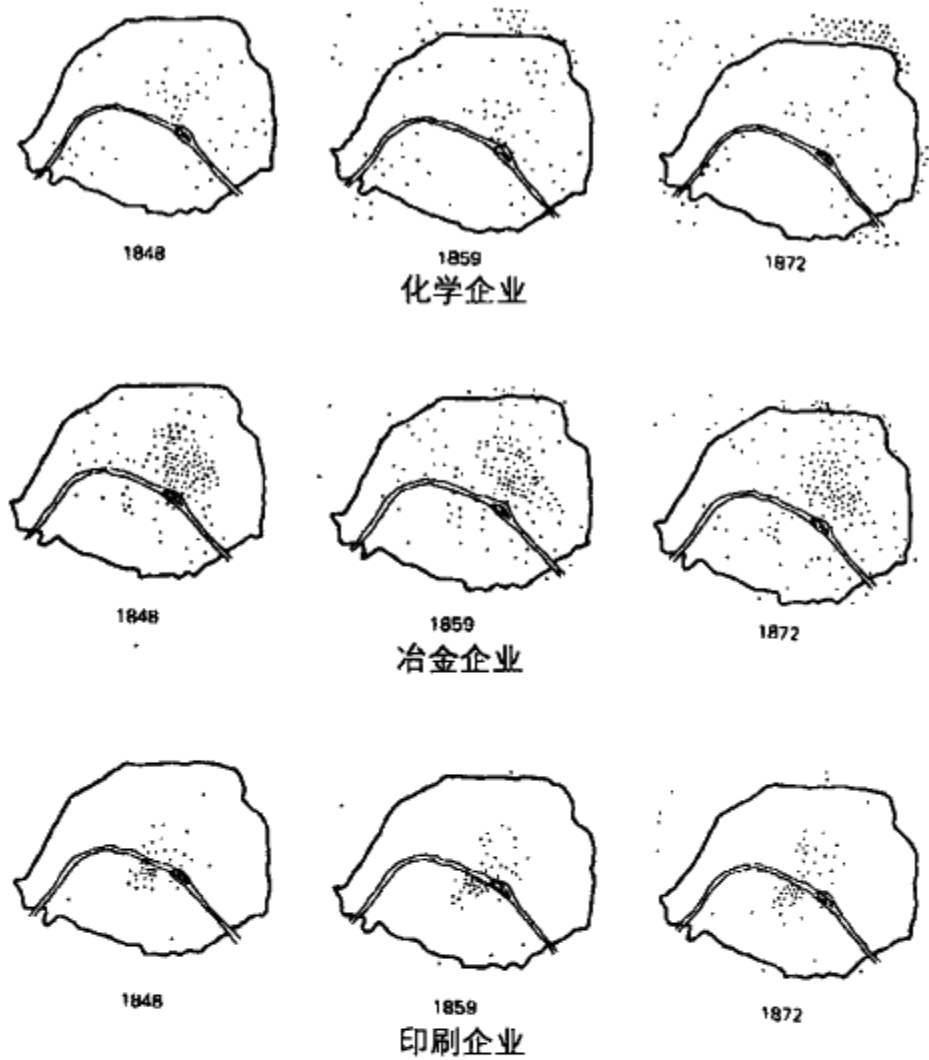


FIGURE-056  
巴黎大规模化学、冶金与印刷企业的位置，根据 1848、1859 与 1872 年的调查(引自 Retel, 1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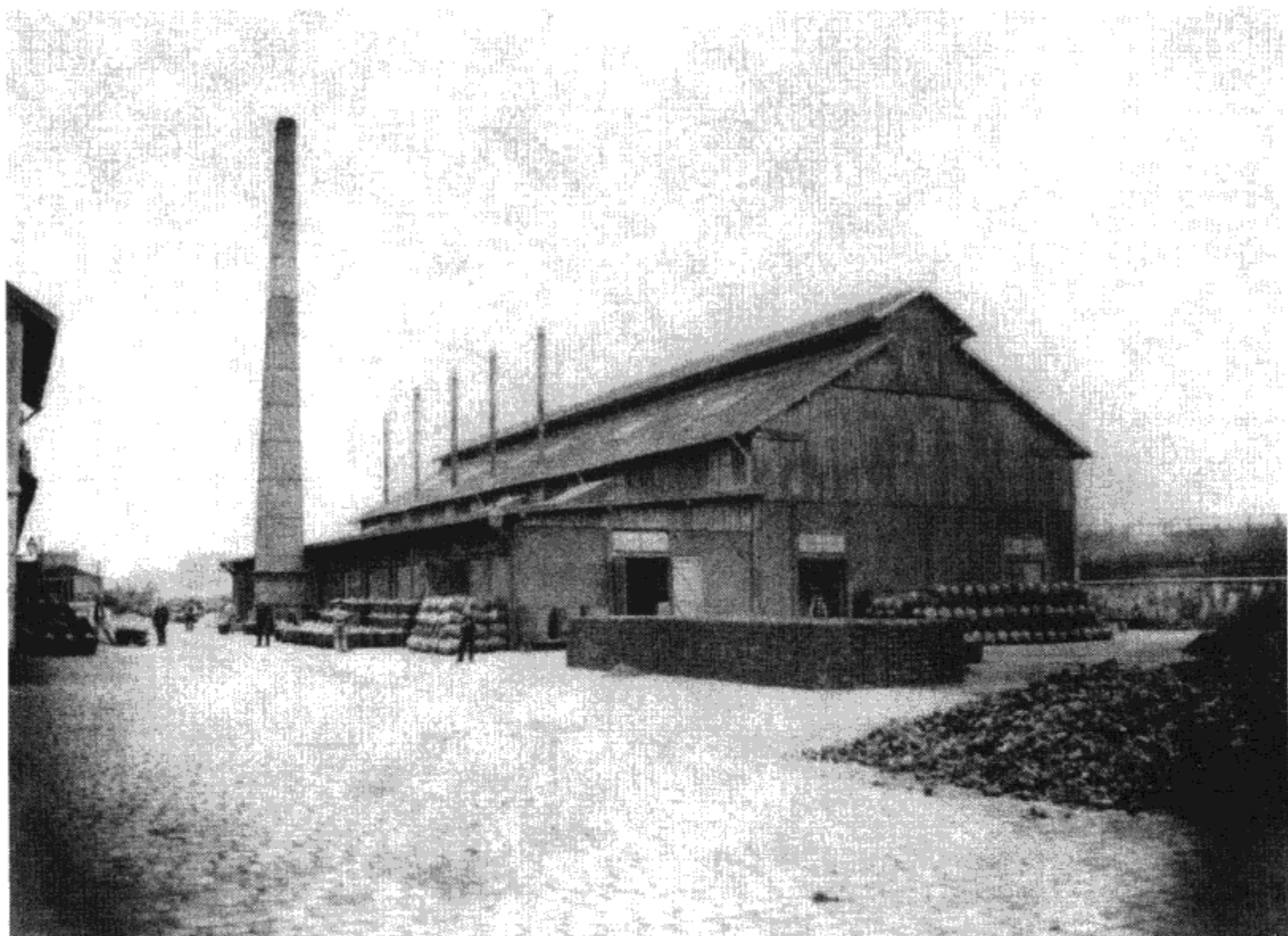
159 1860年（从1860年到1872年，大企业数量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之间大企业的强劲发展，与其移往市郊有关。然而即便往市郊发展，各产业的步调也不一致。大规模印刷业仍留在左岸市中心，冶金业只移到了内城北部与东部周边。至于大规模化学工厂则进一步往外移出。

化学工业的例子相当有趣，它捕捉到当时巴黎产业的复杂运动。一方面，大规模与污染性企业不是被迫移出市中心就是自愿迁往周边拥有运输网络且地价便宜的地点。另一方面，产品创新意味由大量出现的小企业来制造专门化的产品，例如瓷器、药品、人造珠宝、人造花；除此之外，有一些产业——主要是“精品业”——产生专门化的需求，例如少量的油漆、染料等，这些物品只需小规模生产就可满足。许多产业出现了类似的二元运动，不仅市郊大企业发展了，接近市中心的经济活动也逐渐零碎化与专门化。

160 高度专门化的发展，与一小群“优越”工人维持了他们的优越技术有关。零碎化与外包按件计酬也可说是为了维护手工工人所做的让步，此举可保存他们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名义上对自

FIGURE-057

大型工厂，如图中的化学企业，于1860年开始出现在市郊的维雷特（La Villette）。



身劳动过程的掌控。

然而，粗略的统计资料隐藏了社会关系的重大转变。加亚尔提出具说服力的说法，他认为真实的状况是，专门化的劳动出现日趋精细的分工现象，个人、小企业以及外包工人和按件计酬工人的产品都被整合进高效率的生产体系中。许多小企业不过是大企业的转包单位，他们隶属于资本家生产者或商人远距控制下的契约劳动体系。<sup>6</sup>资本家将工作分配给在家工作的按件计酬工人，可以省下间接成本，例如土地与能源。除此之外，借由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企业雇主可以降低劳动成本使获利极大化。即便工人名义上是独立的，却被迫卑躬屈膝与自我剥削，其野蛮与堕落的程度与工厂体系不相上下。

在此过程中，由工头、监工、转包商（1848年的社会立法认定转包为非法，但1852年后又合法化）与其他中间人所构成的可恨而压迫的体系就此牢固生根。因此就算手工工人仍很重要，他们的地位实际上却不断矮化。劳动的极度分工可以在某些领域生产出质量极高、技术完美的产品，但工人的薪资并没有因此提升，自由度也没有获得提高。相反，让原本独立的手工工人与雇主逐渐受到严格控制的商业与工业组织的形式支配。结果连普洛（他花很多时间批评他的工人在面对权威时的懒惰习惯与顽固不从）也承认，

巴黎工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都要来得辛苦……外省工人来到巴黎，却很少留下，因为要在此地过活必须仰赖贿赂……在巴黎，有些行业是按件计酬，工作20年之后就算还活着，也多半成了瘸子，而且筋疲力尽。<sup>7</sup>

在这项演变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力量，值得我们仔细观察。空间藩篱的撤除开放广大而珍贵的巴黎市场，使外省与外国能在此竞争（1860年开放自由贸易之后，更激励这段过程）。这也意味巴黎产业可以取得各地的原料与粮食，以喂饱它的劳工并以较低的成本满足对中间商品的需求。由于巴黎市场有强大的工业基础，这表示巴黎也可以轻易到外省及海外进行竞争，如同外省与外国到巴黎来进行竞争一样。

法国的出口贸易不断增加,其中巴黎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扩大,从1848年的11%增加到1860年代初的16%。<sup>8</sup>如人们所预期的,巴黎专门生产的奢侈消费品也在大量出口之列。在投资海外市场之后,巴黎开始对外出口,例如巴黎本地生产的蒸汽火车头与铁路设备有一半以上出口,蒸汽引擎则有五分之一出口,甚至连食品工业(如糖业)也能在外省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巴黎产业界与外省对手的差异在于它从不反对自由贸易,因为巴黎制造业显然在某些生产线足以主宰外省与国际市场。

162 不过巴黎在新国际分工上所占有优势也带来惩罚。巴黎产业越来越暴露在外国的市场变化无常之中。这个时期世界贸易的普遍扩张是一个巨大的恩惠,但实业家必须能快速适应外国人多变的口味、突然出现的关税壁垒、外国制造业的兴起(仿冒法国设计的恶习,虽然质量低劣,但价格便宜)与战争的妨碍(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果尤其可怕,因为美国当时是主要的出口市场)。巴黎产业也需要适应外贸的特有流动条件。例如对美贸易的增长,

FIGURE-058

戈布兰( Les Gobelins )的织毯业是典型高质量的手工业,它在第二帝国时期存续下来,后来因产品输往海外而获利(多雷绘)。



增加了季节性失业的问题。美国棉花原料于秋天运抵巴黎，美国买家收到现金之后，随即利用时间在当地购买商品，春天时将货物运回美国。一年里面只有三个月是密集交易的时期，另外九个月则是“淡季”。1860年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巴黎企业有淡季，这里面包括了三分之二以上制造“精品”的业者，以及一半以上的家具、服饰与珠宝业者，他们的淡季约四到六个月。<sup>9</sup>我随后将说明淡季现象对生产组织与劳动市场所造成的问题。

来自国外与外省的竞争，不只挑战了巴黎产业在国际与外省市场的地位，它们同时也垂涎于巴黎提供的、广大而扩展中的消费者与中间商品市场。1860年代，外来竞争渐趋白热化。起初，挑战来自大量生产的产品，外省与国外的生产者以较便宜的劳动与更容易取得的原料，加上明显下降的运费率而取得成本优势。鞋类生产因此分散到外省、加来海峡、瓦兹（L'Oise）与类似地方。然而凡是大规模生产出现的地方，奢侈品也能轻易到达。确切过程可以借由检视巴黎所出现的工业与商业新关系来获得最佳说明。

---

## 工业与金融及商业的关系

---

工业、金融与商业界的相对力量、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有明显的变化。某些大企业可以无视于金融家与商人的外在规训，但众多小规模产业可就无法如此。金融家与商人实际上成了确保具体劳动转变成抽象条件的代理人。

新信贷体系的兴起，从各方面来说都有利于大规模生产与服务。直接融资给工厂，使其运用现代技术形式与工业组织来进行生产，已成为可行的做法。始作俑者是佩雷尔兄弟，之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起而效尤。公共工程与建设规模的改变（国内与国外）与各种产品大众市场的形成（从百货公司的兴起就可看出，百货公司本身就是信贷体系的产物）也有利于大规模产业。新信贷结构吸收小额储蓄的同时，也吸干了小企业小额、地方性与通过个人关系得到的资金。信贷的分配重新洗牌，小生产者与手工业者越来越难取得信贷。

新信贷体系并未受到大多数实业家的欢迎，他们认为金融家

只想控制与购并——从佩雷尔兄弟的例子来看,这一点相当正确。生产者与金钱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充满了不信任。事实上,佩雷尔兄弟的失败也许与法兰西银行的工商业界力量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跟佩雷尔兄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私人间的敌对关系一样。第二帝国末期开始出现反对金融家过度垄断的声浪,并且得到手工业者与小微企业的喝彩,这部分说明了增长中的资产阶级反对帝国的经济政策。<sup>10</sup>

小规模的生产者与手工业者由于经常遭遇漫长淡季与各种交割日的问题,因此急需短期信贷。法兰西银行接受商业票据贴现业务,但只允许极少数顾客办理。<sup>11</sup>直到第二帝国末期才有其他金融机构起而弥补这个缝隙。在此之前只存在非正式的类型金融机构的体系,它们以亲戚间的纽带关系或买卖双方的小额信贷为基础——这个体系甚至伸展到较底层的工人阶级,如果在紧要关头未能借钱给他们,这些人可能就活不下去。这个体系衍生出巩固的新商人阶级,他们逐渐掌控了巴黎产业的组织与发展。

商业在巴黎经济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然而在19世纪中叶,制造业与商业的区别并不清楚,因此只要讲到商业界,往往包括各种专门行业(例如酿酒)。一般来说,商业只是工业的仆人。然而从第二帝国时期开始,生产与商业逐渐分野,权力关系逐渐反转成工业被迫随商业的命令起舞。<sup>12</sup>大致来说,转变是渐进的而非伤害的。店主往往喜欢保留服饰店而放弃工厂。但他们并未切断与生产者的直接联系。他们成了转包网络的中心,依照命令或按件计酬与外包生产。日趋自主的商人阶级成了代理人,将手工业者与手工工人正式包含到商人资本法则当中。科特罗(Cottereau)写道:“有时候,几百名伪手工工人与数十家作坊不过是大服饰业的触角末端。大服饰业往往雇用数千名员工,背后的管理者则是商人、实业家或百货公司。”更糟的是,这些“资本组织的新交会点……持续重新分配工作,重新组织营运,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将工作交给不具任何技术的劳动力;劳工、妇女、儿童与老人”。<sup>13</sup>

164 巴黎产业零碎化与专门化的程度令人吃惊,这使得巴黎在外省与国际市场上拥有极高的竞争力,产品质量也获得极高的评价。第二帝国时期,组织形式又更加完善。人造花的制作在1848年时已达到相当专门化的程度,不同的作坊各有其擅长的花种,到了



帝国末期，各作坊合组为一个体系，每个作坊只负责制作人造花的某个部分。迪康曾抱怨“无穷的劳动分工”在生产简单的小刀时竟需要九种不同的技术协调合作。<sup>14</sup>这种体系的运作完全仰赖商人企业家有效率的进行组织：供给原料、将无数分散的作坊或按件计酬的家庭组织起来进行精细的劳动分工、监督产品质量与产品流动时间，以及将最后成品送进明确界定的市场。

这些代理人重新组织巴黎产业以与外国竞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外国与外省的竞争带入巴黎市场的核心地带。在竞逐最大利润的压力下，巴黎商人绝不厌于寻找各种供给来源，不管是外省还是国外，并将指挥与外包的网络延伸到巴黎以外地区，前提是当地的成本（特别是劳动成本）必须够低。因此，他们一方面组织起来以对抗外在对手，另一方面却又刺激了外在竞争，有时则主动将各个生产流程组织起来往外省分散。外国与外省商人原本是以巡回或季节性的方式出现在巴黎，此时则倾向于在当地永久设点，并且运用国际与外省的通路，将货物源源不绝地运进巴黎市场。例子——如帽业与手套业——甚至出现在生产（移往外省）与设计及营销（仍留在巴黎）分离上面。<sup>15</sup>

商业的其他发展对巴黎产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冲击。大型百货公司的兴起意味着现成大众市场的形成。只要是能大量生产获利的，就有需求，不管它的用途、价值或质量如何。大众市场并不必然表示工厂大规模生产，但它的确暗示要有几家小作坊同时在不同的生产线生产（转包成了主流）。对于产品质量的下降以及手工业传统中的工作逐渐去技术化，工人们多有怨言，他们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某些行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大型百货公司如 165 廉价百货（Bon Marché，成立于1852年，到了1869年时交易量达到700万法郎）、罗浮百货（1855年）与春天百货（1865年）成了巴黎商业的中心装饰。<sup>16</sup>

到了1860年代，结构科层化的信贷体系逐渐成为工业发展的强大神经中枢，但它尚未往下延伸到小企业。对于许多小产业来说，商人——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信贷结构，只要商人有需要，它们就会提供服务——已经加入成为组织的力量。第二帝国时期商人阶级日渐取得自主的现象，可以从特定商人居住区的形成看出，例如西北市中心的昂坦道区，以及人数较少的林荫道区（Mail et

Sentier) 和东北市中心(天堂街[Rue Paradis]直到现在也跟过去一样,是相当热闹的玻璃与瓷器集散中心)。巴黎本地与出口所需的产品,不管是在巴黎、外省或国际进行制造,都是从这些市区逐渐组织起来的。这些市区也特别能提供白领就业机会,并且在巴黎社会空间的区分上留下了印记(见图53)。这些市区在政治、教育与宗教上的特殊传统,使得当地商人很少涉及与巴黎公社有关的任何活动,无论是参与还是镇压。

商人阶级的日趋自主与新金融力量的兴起,将巴黎产业编进复杂的控制之网中,商人对于获利的关心以及他们运营的地理范围,使他们采取重构巴黎产业的做法,目的是为了巴黎合乎新国际分工的条件。小规模生产者——曾经自傲而独立的手工工人与手工业者——逐渐被囚禁在贷款与债务以及特定指挥与控制供给的网络中,在整个生产体系中被迫沦为只做琐事的劳工,而且无法改变整个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去技术化与支配的过程——在1848年之前就已相当明显——便得以通过生产体系而继续运作下去。工人们相当清楚问题的本质在哪里。1867年工人委员会花了很长的时间争论这个问题,并且将社会信贷与工作自由的问题置于其社会议程的首要目标。不过在当时,资本社团已经支配劳动社团的高尚愿景达20年之久。



FIGURE-059

最早在1843年,杜米埃曾嘲弄新服饰店的组织。店员正在向顾客说明如何沿着复杂的路线在店里找到卖棉帽的地方。

## 工业、国家与私有财产

如我们所见,奥斯曼并不后悔他以直接拆除或援引禁止危害健康的法律等方式,将有毒或有害的工业(如制革业与化学业)逐出巴黎市中心。<sup>17</sup> 奥斯曼也以各种间接方式(征税、市郊合并、市政服务)将各项工业赶出巴黎市中心,只留下奢侈品与“精品”业者。奥斯曼的反工业政策有部分源自他想创造一座与整个西方文明相称的“帝国首都”,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想要让巴黎摆脱工人阶

级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便让工人没有机会在巴黎就业。事实上奥斯曼的计划只成功了一部分。<sup>18</sup>到了1870年，虽然巴黎市中心已经完全去工业化，但交通与都市基础建设的改善（煤气、自来水与下水道等）却让巴黎成为非常吸引人的城市。从某方面来说，奥斯曼采取的是两面做法，让它们彼此抵消。但奥斯曼未能注意工业的需要，他自己则隐约倒向住宅发展（例如，第三道路网的设计），工业界的反感因而日增，其力量之强大甚至足以阻碍皇帝的变换布置计划。1860年代，外省与国际竞争程度升高，与此同时，奥斯曼与工业界的战争白热化，巴黎工业不仅成为奥斯曼眼前的难题，也成为帝国的反对者。

租金是巴黎工业必须负担的重要成本。在新金融与商业区（证券交易所、昂坦道区）以及西部与西北部的高级住宅区，快速上涨的租金不是迫使既有的工业移出，就是迫使这些工业更群聚而密集地使用具有特定优势的区域空间。例如冶金业稍微往东北部分散，以取得良好交通及更优质的劳动来源（见图56）。接近市中心的高租金地区也是非常具吸引力的位置（奥斯曼将高租金地区比喻成维苏威火山的葡萄园，越靠近山顶，土地越肥沃）。对那些必须立即取得奢侈品消费市场的产业（或者是供给这些市场的产业），奥斯曼的比喻无疑相当真切。市中心位置的吸引力由于商业的集中而增加，例如大型百货公司、服务游客的饭店，以及吸引各色人等前来的中央市场。

公共工程与都市投资创造了一个似乎充满无尽需求的新市场（包括对昂贵家具与装潢的需求），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市中心。对许多产业来说——药品业、化妆品业、油漆业、冶金业（特别是装饰用的）、木工与时尚服饰业与精品业——市中心是个强烈诱因。但毕竟租金很高，所以出现调适的做法，例如按件计酬的外包工作增加，工人们不是忍受高租金成本（在拥挤的市区住宅中工作）就是忍受不易抵达市中心的成本。商人省下租金成本，并确保各生产线能组织成一个完整流程，将货物源源不绝地送进高需求地区。存活下来的独立工厂被卷入成本挤压的旋涡之中，不是被迫投入商人的怀抱，就是必须重整内部劳动分工以减少劳动成本。市中心不断上涨的租金向产业与劳工收取了高昂的费用，租金因此成了重构第二帝国时期巴黎产业的关键力量。



## 生产力、效率与科技

168 有一则普遍流行的神话（历史学家现在才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认为大规模产业之所以能取代小规模产业，主要是借由规模经济来获取优越效率所致。<sup>19</sup>然而，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小规模产业的持续存在似乎戳破了这则神话，小作坊之所以能活下来，无疑是因为它们优越的生产力与效率。然而，过度推演这种说法也相当危险。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的产业（如纺织业以及日后服饰业的某些部门）分散到外省去，而大规模工程业要不是移到市郊就是移到巴黎以外地区。那些留在市中心并且展现出活力与发展的小规模产业之所以获得规模经济并不是通过企业合并，而是借由产业间的联结与无数专门化任务的聚合而形成的。真正重要的不是企业的大小，而是无数生产者在商人与其他企业家的组织力下形成的地理上的集中。事实上，巴黎正是因为这一类型的规模

FIGURE-060

马维尔于1860年代中期拍摄的照片，制革工厂严重污染了海狸河。奥斯曼便是想把这些肮脏的工业赶出巴黎市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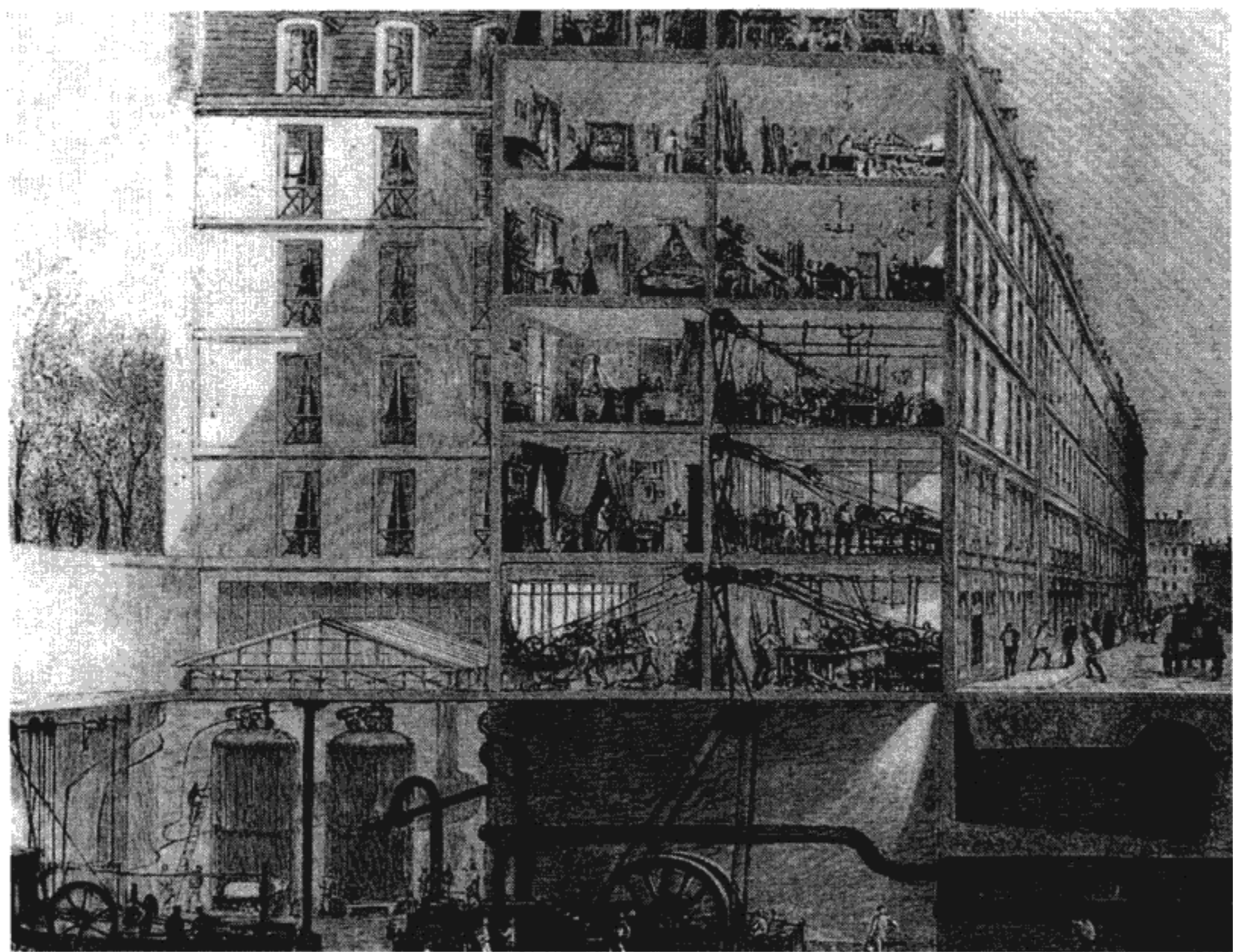


经济才得以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中打下竞争优势的基础。

另外还有一则较难破除的神话，认为小产业与手工业生产在新产品或新劳动过程上的创新能力较差。科尔邦在当时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他发现这些“优秀”工人与手工业者对于新生产线、新技术与科学的应用颇有兴趣，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提到这些工人只赞赏别的行业运用新事物，却反对自己的行业运用新事物。<sup>20</sup>虽然如此，产品创新成功的例子实在太多（尤其在奢侈品部门），小店主不可能用都不用。新技术也快速发展。工厂甚至将蒸汽引擎——当然马力并不大——并排起来集体使用。服饰业采用缝纫机，制革业使用动力切割机，木匠使用机械切锯，“精品”制造商则忙着在染色、上色、特殊调制、人造珠宝等方面进行创新发明。建筑业也有重大发明（如机械电梯的使用）。这里显现的是一幅充满生动发明与快速采用新劳动过程的图画。从1867年工人委员会与工人们的作品（如瓦尔兰[Varlin]）可以看出，手工工人并不是反对新技术，而是反对将这些技术强加在他们身上，成为产品标准化、去技术化与缩减工资的过程之一。<sup>21</sup>专门化、琐碎化的劳动分工，逐渐在商人与企业主的指挥下整合起来，劳动过程的转变也因此被赋予了特殊的性质。巴黎小型产业明显展现出来的技术活力，不见得是工人们所欣赏的那种活力。工人之所以如此是有理由的：普洛（一位以创新知名的实业家）坦承，当他在从事创新时，心里常存着三个关键目标——提高精确度、加速生产，以及“降低工人的自由意志”。<sup>22</sup>

萨维耶-爱德华·勒热纳（Xavier-Edouard Lejeune）的回忆录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一些指引。<sup>23</sup>勒热纳由居住在乡下的祖父母抚养长大，1855年，勒热纳10岁，前往投靠在巴黎的母亲（显然她被显贵的资产阶级之子所抛弃）。勒热纳发现他的母亲雇用了六到八名妇女，负责生产高质量的女性外套，并且以特殊渠道销售到零售市场。那一年刚好是服饰业繁荣的高点，国家支出与宫廷及巴黎对时尚的风靡刺激了需求。勒热纳的母亲住在接近市中心的宽敞屋子里，她雇了一名女仆，接待亲戚朋友。六年后，她只雇用一个人，并且被迫搬到租金较便宜的地区。她不再接待亲友，并且打发女仆离开；勒热纳有一阵子负责家务与采买，之后则基于“经济因素”到零售商店工作，他在店里有地方住有东西吃，而且





还能领到微薄的薪水。勒热纳的母亲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不景气下纺织机的出现与市场竞争的加剧。她逐渐沦为贫困（回忆录并没有提到1868年后的事，但之后的研究显示，她仍继续营业到1872年，但到了1874年就完全一贫如洗，她因此发了疯，并且被关进疯人院，直到她在1891年去世为止）。我怀疑这个故事是当时小店主工人的普遍境遇。

FIGURE-061  
蒸汽引擎的集体使用成了这段时期巴黎的产业特征。这张1872年的设计图说明这个系统——通过地下室的蒸汽引擎来运作，并将动力分配到上面的楼层——如何允许整栋建筑物由不同行业来使用。

## 劳动经验

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产业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要从如此多样的劳动经验中建构出综合性景象并不容易。奇闻逸事甚多，但其中一些似乎有所重复，这或许是因为这些故事反映了许多人共通的工作经验。

1865年，刚从洛林（Lorraine）抵达巴黎的移民，带着他的妻子与两名子女，在巴黎周边的贝尔维尔租下两间小室居住。他每

天早上五点出门，带着干面包皮，走四英里抵达市中心，在纽扣工厂里工作14小时，然后返家。付掉房租之后，他的工资只剩下一天一法郎（一公斤面包值0.37法郎），所以他顺便带点件工回家给妻子做，妻子长时间在家工作，但所得仍非常微薄。当时的俗话说，“劳工要的是活下去，而不是坐以待毙”。<sup>24</sup>

左拉从这些故事中取材，加强了他《酒店》(*L'Assommoir*，为了写这本小说，左拉曾仔细研读了普洛的作品)的戏剧效果。库波(Coupeau)与洁薇丝(Gervaise)拜访洛里勒(Lorilleux)夫妻紧邻在住家附近脏乱窒热的小工作室。这对夫妻一起工作，抽取金线来制作柱链。库波解释说，“这里有小环、粗链、表链与多条链子缠绕而成的链索”，不过洛里勒做的只有柱链(他算过，从12岁至今他已编了八公里长的链条，他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从“巴黎编到凡尔赛”)。“雇主提供成色良好的金线，工人只需从抽盘中抽取，并且注意让长短相同，在编链过程中必须反复加热金线五到六次以避免金线断裂”。这个工作肯定需要相当气力才能完成，但却是由妻子来做，因为洛里勒经常咳嗽，双手无法稳定抓好金线。洛里勒夫妇其实相当年轻，但工作的繁重与操劳使他们看起来相当憔悴。洛里勒示范如何扭曲、切割与焊接金线使其成为小环，这个工作“需要不间断且规律的操作，小环一个个衔接起来组成长长的链条，洛里勒的手脚很快，洁薇丝根本看不清楚他做了什么”。

在这么悲惨而贫困的环境下制造如此专门的奢侈品配件，实在相当讽刺，而这种场景也出现在左拉的作品中。唯有通过生产者严密的监控，才能让这个体系成为盛行的制度。许多工人代表参加了1867年万国博览会，其中立场温和的金匠代表在他们的报告中抱怨“资本主义的贪得无厌”，使工人无从防卫也无从抵抗“大型制造业中心昭然若揭且具毁灭性的恶行，这些制造业不仅累积资本享受自由，并且还成了某种合法的压迫根源，他们管制劳动并分配工作，以此创造出更专门化的职业”。<sup>25</sup>有趣的是，这篇报告写成的那一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刚好也于莱比锡出版。

洁薇丝拜访冶金工人古杰(Goujet)时看到完全不同的生产流程，在此之前，她在巴黎东北部工业区有一段胆战心惊的见闻。

171

大家都说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区。勒热纳当时在回忆录中提到：

庭院与死巷的深处尽是工厂与制造厂，房子从一楼到顶楼都是作坊，难以置信的工人密度使此区充满活泼与嘈杂的气氛。

在左拉的小说里，古杰向洁薇丝展示他是如何将烧得白热的金属锻制成六角铆钉，他使用五磅重的铁锤，一天能打出300根20毫米的铆钉。然而这项技术却遭受挑战，因为老板正打算安装新机器：

蒸汽引擎摆在角落，就放在一堵矮墙后面……他提高音量近乎咆哮地解释着，之后他走向机器，机器剪子大口吞下铁棒，每口咬下一定长度，之后则依序吐出它们，庞大而复杂的螺栓与铆钉机，一次强有力的旋转便能压制出螺帽，打磨机上装有生铁制的飞轮与铁球，愤怒地打磨每个零件，螺纹切割机由妇女操作，在螺栓与螺帽上切割出螺纹，切割机的轮子发出短促的碰撞声响，并且在机油润滑下闪闪发亮……机器如巨人般以平稳的轻松姿态生产出44毫米的铆钉……不到12小时，这台该死的机器就能生产出数百公斤的铆钉。古杰不是个有口才的人，但在某些时刻，他倒是挺乐意……打烂这台机器以宣泄自己的怒气，因为他的手臂比不上机器来得有力。古杰知道血肉之躯是斗不过钢铁的，但他仍感到苦恼。总有一天，机器将杀死所有的手工工人，工人每日的薪资已由12法郎缩减成9法郎，未来仍将有另一波的减薪。这些大机器生产铆钉与螺栓就像生产香肠一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古杰转身向紧跟在后的洁薇丝苦笑着说，……“也许有一天这机器会为全世界带来幸福”。<sup>26</sup>

资本主义的抽象力量便是以此影响第二帝国时期的具体劳动经验。

# 劳动力的买卖

只有当生产与生计工具的所有者，在市场上遭遇一个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时，（资本）才能转变成生命。此一历史条件构成了世界的历史。

173

——马克思

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加上巴黎的扩大建设，对第二帝国时期的劳动市场带来庞大的压力。劳动供给来自何处？工人在什么状况下，以什么方式将他们劳动力的权利让渡给他人？巴黎劳动力的量与质，对于经济活动的形式与地理分配又构成什么影响？

1848年，巴黎劳动力严重过剩。除了因巴黎工商业崩溃而失业的人口外，还有在不景气下涌进巴黎寻求传统保护的大批外省工人。1848年3月到4月间，登记加入国民作坊的人数从1.4万人增加到了11.7万人。<sup>1</sup>六月事件的镇压导致许多人逃出巴黎，然而失业仍是巴黎与外省的关键问题。巴黎的过剩劳动在1849到1850年的繁荣恢复期中部分获得吸收，不过1852年后经济活动剧烈向上爬升，使得劳动过剩造成的工资下跌现象逐渐转变成劳动稀少与名目工资率上涨——不过上涨大部分都被通胀抵消——并且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sup>2</sup>1850年代，大量移民潮涌入巴黎解决劳动稀少问题，之后到了1860年代，名目工资率停滞不前而实质工资率下跌，使得另一支工业后备军开始投入劳动——妇女。巴黎工商

业的劳动需求因此广泛获得满足。

174

劳动供给的质量难以详细分析。巴黎绝大多数纯手工业者已经消失——能掌控自己的劳动过程并且独立于市场交换之外的工人。科特罗认为1847年的经济生产人口中，手工业者占的比例不超过5%。但机器操作员也非常少。庞大的工人队伍可以区分成手工工人、技术工人以及无技术工人。手工工人在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特别是以师徒制的方式）；技术工人则局限在专业化的工作，分工特别细微；无技术工人则是四处游走的临时工，经常沦为贫穷的犯罪阶级，并被称为“危险阶级”或“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识字与懂得算术的工人也在急速发展的白领职业（因银行与商业的改革以及旅游事业的兴起而出现）中找到工作。<sup>3</sup>

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手工工人已经发展出非正式的控制劳动市场手段。<sup>4</sup>他们私底下组成法人形式的组织，集体与雇主协商工资率、工作条件与就业年限。劳动市场通常采取集中化的做法，并受集体控制，雇主从工人集中地或特定处所雇用工人，而工人在这些地方也能交换信息、对雇主施压并要求其他工人遵守集体

FIGURE-062

建筑业引进大量劳动移民到巴黎，其中有些人来自相当特别的地区。杜米埃在此评论，傍晚六点在巴黎大道上遇到利穆赞人(Limousin)的机会比在利穆赞首府利摩日(Limoges)的机会还多。





规范。虽然如此，工人力量仍无法保证持续而稳定的就业。人们总是从周期性失业、季节性失业与偶然性的失业延长（最后一项经常引起政治抗争与社会不安）来判断某个行业是否繁荣，而不是注意其工资的变化。控制体系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轻易地将移民手工工人整合到都市劳动市场当中（过去法国各地手工业同业公会也是如此，至少在此之前有200年的时间，手工业同业公会一直从事于组织外省移动劳工的工作）。

我们很难确实估算有多少比例的巴黎工人在这类劳动市场中运作，但数量应该相当庞大。手工工人以其行事风格与政治领导为1840年代的巴黎劳动市场设立了基调，并且也成了1848年工人运动的核心。工人团体成了资本家社团必须正面进行对抗的对象。

第二帝国时期，手工工人对劳动市场的控制日渐式微。<sup>5</sup>与此同时，通过越来越细分的零件与社会分工，生产也逐渐转向机械与工厂，手工工人的技术因此也必须重新加以界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相当详尽的描述。在某些产业中，手工技术不是被剔除，就是在精细的劳动分工中被专业化的技术所取代。在另一些产业中，机器操作员取代了手工工人。有些专业化技术是从劳动过程转变中产生的，这些技术通常可以垄断，至于其他专业化技术则相对来说容易模仿。当时的产业倾向于在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体系（不是工厂就是整合起来的作坊）中进行去技术化并且运用较容易模仿的技术。随着作坊越来越能轻易（基于技术与组织的变革）引进无技术的移民或妇女，使技术工人与无技术工人间的畛域逐渐模糊。巴黎劳动市场在规模上的爆炸性发展与空间上的逐渐分散，也使传统劳动市场控制趋于瓦解。“集中雇佣地”在1847到1848年时还是翁凯特（Enquete）评论的对象，但到了1870年竟完全消失不见。<sup>6</sup>绝大多数评论者都同意，跟1848年比起来，1870年劳动市场的特征，已转变成无所不在且充满竞争色彩的个人主义。

不过工人的力量与影响仍不可小觑。从普洛（1880年）对1870年巴黎作坊生活与习惯的生动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人仍具有自信，有时甚至态度倨傲，固执己见，喧闹不止，其独立的程度几乎已到了毫无纪律的地步（见表九）。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权威，其卖力让人觉得讽刺，普洛站在雇主的立场，轻蔑地嘲弄这

些工人的“高尚主义”(sublimism)。工人有些无可救药的信念,例如属于工人一分子的瓦尔兰就说:“绝大多数的工人并不需要向雇主学习,雇主其实无一技之长,他只是个剥削者。”<sup>7</sup>工人持续以集体方式对劳动市场施压,他们采取的做法通常是坚守在传统的居住区内,硬是不搬出去(即便遭遇都市更新与租金上涨)。需要工人技术的产业只好将公司的位置设在工人居住区附近(住附近解释了有些产业为什么紧邻着市中心往东北方向延伸)。第二帝国时期巴黎产业场所变化与创新模式主要受到工人力量影响,然而一旦产业经过去技术化以及重新组织之后,这些工人将不复重要。工人区往往在工人运动中扮演政治领袖的角色。巴黎公社时期,最具爆炸性的政治力量几乎全来自工人区。

1852年后,巴黎当局加紧镇压工人运动,但这反而加强了工人的力量与影响。工人被剥夺了结社权、联合权、结盟权、公共集会权以及罢工权,除此之外,他们还面对一连串的法律打击,如工作记录簿(每个工人都有一本)、司法争端(一旦雇主与工人发生意见冲突,根据法律,雇主胜诉)以及工人参与劳资调解委员会(conseils de prud'hommes,工人在当中总是居于少数)。工人也处处受到监视,任何非正式或公开的讨论都可能被认定是策划阴谋。然而,工人长久以来已习惯这种压制手段,也知道该如何隐秘地进行组织。工人诉诸讽刺而不庄重的戏谑作品,并将反抗行动的信息巧妙地编成密码,这些都成了阶级战争不可或缺的武器。所谓“高尚主义”的本质大致如是,这些作为也惹恼了一些像普洛这样的雇主。他们认为,不铲除工人运动则产业无法发展。然而巴黎的工人还拥有另一种力量。他们的技术与能力是巴黎产业的必需品。因此,工作记录簿的立法对手工工人来说便成了具文。<sup>8</sup>

到最后,真正破坏工人力量的不是政治打压,而是劳动过程的转变。随着抽象劳动的改变,手工工人必须提供的具体劳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工人仍有很多机会可以将自身力量塑造成另外一种形貌。师傅与工人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向上流动是可能的(借由婚姻或直接继承),尽管如此,这种机会已不像过去那么多。劳动体系本身的科层组织也使工人有机会在琐碎事务与社会劳动分工中担任管理人员、领班与转包商。工人的技术、教育与适应力使他们在新职业出现时能转业并精通新的技能。这些顺利

转业并且精通新技术的工人，不再是过去的手工工人，相反，他们成为“劳工贵族”的核心分子，并且在1871年后成为工会社会主义的基础。劳动过程转变的证据，可以从1864年后第一国际法国分会的演进看出：从原先主张的手工业传统互惠共生，转而主张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会意识。

1848到1870年，技术与职业模式曾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结构革命。新行业出现（例如电工），旧行业消灭（例如奥斯曼的公共工程使运水人消失）。机器技术被引进到工厂与作坊之中——缝纫机对服装事业造成的革命性影响，而我们也从中间看到负面效果——取代了旧式手工。店员、银行行员、经理、旅馆雇员与官僚也成了1860年代银行、商业、旅游业与政府中最引人注目的专业白领工作。往上流动的小资产阶级，其财富与权力不久即能与衰退中的店主相提并论。外省的移民与妇女都被卷入这场洪流，手工工人也在劳动市场中转变成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结构。

从所有的数据可以看出，第二帝国时期工资率提升了约两成左右，而且这种现象几乎扩及所有职业（表七），包括妇女。与工人所得比起来，工资率较不受失业与令人头痛的淡季效应影响，相对较为稳定（不过到了帝国末期也开始波动），因此较容易制表。迪沃（Duveau）引用了无数当时的论文资料，对淡季与工人年收入做了粗估。工人年收入依据职业而有所不同，男性从700到1500法郎，女性从345到685法郎。这些数字反映的大概是帝国中期的状况，帝国末期的数字应该还会更高。<sup>9</sup>

实质工资的波动走的是另外一套轨迹。生活成本提高几乎抵消了增长的名目工资。如果以工人日常必需品的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名目工资率的上升不仅被抵消，而且还赶不上物价上涨。如果从第二帝国时期影响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消费习惯革命来看，结果更是诡异。<sup>10</sup>无论如何，所有数据都显示，第二帝国时期的物价上涨从根本上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水平。托马斯（Thomas）<sup>11</sup>对当时四口之家一年生活成本（以法郎计价）提出了以下估计数字：

生活成本增加了两成，主要是由房租拉动的，因此民众的怨言也多集中于此。当我们比较迪沃的年收入数字（见表七），会发现平均而言只有技工与木匠才足以养活四口之家。其他职业如果要满足基本家庭所需，便需要其他的收入，例如妇女也去工作。这

表七 巴黎各项职业年收入与每日工资率，1847到1871年

职业	杜沃 ( Duveau ) 的估计, 1860 年		平均每日工资率		
	年收入	每日工资率	1847	1860	1871
男 性					
技工	1,500	5.00-6.50	4.50	4.50	5.00
木工	1,350	5.50-6.0	5.00	5.00	6.00
砖匠	1,150	4.50-5.50	4.00	5.00	5.00
帽工	1,150	4.00-5.00	4.00	5.00	6.50
珠宝匠			4.00	5.00	6.00
青铜匠			4.50	5.00	7.00
锁匠	1,050	4.00-5.00	4.00	4.50	4.50
印刷工			4.00	5.00	5.00
裁缝			3.50	4.50	5.00
细木工	1,000	4.00-5.00	3.50	4.00	5.00
油漆匠	980	4.50-5.00	3.50	4.50	6.00
补鞋匠	950	3.00-3.60	3.00	3.00	3.50
面包厂工人	900	4.00-5.00	4.25	5.00	6.60
牛马车驾驶	850	2.00-2.50			
家具木匠	700	3.00-4.00	3.50	4.50	5.00
临时工			2.50	3.00	3.25
建筑工			2.75	3.00	4.00
女 性					
洗衣妇	685	2.00-2.25			
时尚业	640	2.25-3.50			
制花业	420	1.50-2.25			
技工	387	1.50-2.25			
量身订作的裁缝	340	1.00-2.25			

资料来源: Duveau ( 1946), 页 320—328 ( cols.1-3); and Rougerie ( 1968a), 表 4 与表 6 ( cols.4-6 )。Simon ( 1861), 页 286-287, 对妇女就业的淡季做了评估。

种普遍现象引起了 1867 年工人委员会的讨论与关切。会中通过 ( 暂且不计一些荒唐的提议), 四口之家一年需要的金额介于 1670 到 2000 法郎之间, 然而就算木匠一年工作 337 天 ( 最罕见的状况)

也只能赚得 1470 法郎。单身男子一年基本需要是 700 法郎，在这种状况下，另一半也必须工作，否则在共组家庭上经常会遭受劝阻。妇女光凭自己所赚的钱不可能养活自己。而男女地位上的悬殊也对工人阶级生活造成巨大的社会效应。

年份	住房	食物 / 暖气等	总计
1852-1853	121	931	1,051
1854-1862	170	1,052	1,222
1864-1873	220	1,075	1,295

在名目与实质工资的整个波动图像上，还存在着一些时间安排与模式的变化。例如迪沃发现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两极化的现象，一端是人数少而拥有特权的工人，他们的收入足以支付生活成本（有些甚至可以置产），另一端是人数庞大而“不幸福”的工人，无论他们多努力工作也无法满足生活所需。迪沃并没有明确证据来证实这个趋势。但当时的描述已经给人一种印象，至少有一些工人已经拥有积蓄或能自由选择星期一不上班，并且出手阔绰去有音乐演奏的餐厅吃饭。<sup>12</sup>

179

然而，要做到收支平衡并非全凭个人的努力，主要还是得看经济的脸色。1857 年以前，整体经济状况不见起色。荒年、财政赤字加上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黄金流入市面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腾跃而工资不涨的现象。之后，情况快速获得改善，劳动短缺造成工资上扬，而运输费用降低也使物价下跌。1860 年代初期，工资与生活成本曾经约略达到均衡，但 1866 年后均衡又被打破，财政困难（动产信贷破产）、公共工程停顿加上外国竞争，使巴黎工人阶级生活陷入困境。不可否认，整体景象（经 Rougerie [1968a]、Duveau [1946] 与 Thomas [无出版年份] 确认）可能因职业、性别与位置而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些力量，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市中心与市郊)。地理零碎化也使原本同住一个屋檐之下的工人与雇主分隔两地，加速了师徒制的崩坏，也使非正式的劳动市场控制体系难以维持。虽然有些行业（例如木工）一直维持着统合主义的传统（corporatist tradition）直到巴黎公社覆灭，但其他的行业则在地理分散与零碎化的过程中丧失了集体力量。

如普洛的《高尚》（*Le Sublime*）所言，巴黎劳动市场向来没有集中化的传统，法国工人也一直是个人主义闻名于世。为了对抗新兴的地理模式与个人主义，光有统合主义传统是不够的。因此第一国际巴黎支部从互惠主义转向革命工会主义，可说是一种因应变局的做法。

---

## 外来移民

---

巴黎人口从1851年的未及130万，快速增长到1870年围城前夕的近200万（见表一），其中有40万到45万人是从外省移入。<sup>16</sup>巴黎内部大量的劳动后备军几乎全来自外省。这些移民之所以涌入巴黎，部分是由于1850年代农村的不景气，部分是由于空间关系的改变，摧毁了农村产业、破坏了地方自给自足的体系，并且造成法国农业现代化的缓慢。<sup>17</sup>对照当时巴黎公共工程所带动的繁荣与庞大就业机会，以及巴黎产业的复兴，不难理解为什么外省民众会涌向巴黎。许多年来，巴黎劳动市场一直将触角伸向外省，主要是在北方，但也有特殊例子，如来自法国农业省份克勒兹（Creuse）与利穆赞的石工。铁路的来临使巴黎招募工人的地域进一步往外扩展，地理区域也因而更形延伸而均质化。除此之外，巴黎劳动市场的多样与规模也足以吸引外省工人前来，不管当中的工资率差异有多大。1860年代，农村状况改善而巴黎工资停滞不前，移民仍持续涌入巴黎，只不过已不如1850年代的盛况。

移民整合到巴黎劳动市场的过程相当复杂。<sup>18</sup>首先，移民所拥有的技术与他们在巴黎所从事的工作，两者间几乎没什么关联性。许多人没有技术——至少就巴黎所提供的工作来说是如此——因此必须自己摸索工作机会。即便涌进了庞大的移民潮，巴黎产业仍面临技术劳工缺乏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寻求技术与组织的变革。绝大多数的移民证明他们可以学会新的技术。当然其中也有例外。

传统季节性移动的技术建筑工人现在成了永久性的工作，石工居住的出租公寓成了新移民交换就业信息的地方。某些特定地区的移民（来自奥弗涅[Auvergne]，或甚至圣安东尼区的德国人）远较一般移民更容易进入巴黎劳动市场。缺乏技术劳工的巴黎产业会直接从外省雇用劳工，例如从阿尔萨斯(Alsace)雇用木工与铁工。建筑业没有技术劳工缺乏的问题，但在进行公共工程的过程中也需要大量劳动力，移民潮的出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虽然这些移民的能力不足以负担传统的劳动形式，但却能很快学会新劳动过程所必需的技能。

大量涌入的无技术但适应力强的移民为巴黎产业带来各种可能。脏污的工作——白铅业是恶名昭彰的死亡陷阱，街上的人看到白铅工都避之唯恐不及——可以找到工人来做，产量的增加开启了许多半技术性的工作机会，新移民经过简易的训练就能开始工作。随着新移民定居于巴黎周边地区，市郊也吸引了新的产业进驻。大批无技术移民经过社会化过程后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之中，完全不同于手工工人的转变过程。巴黎劳动市场中出现巨大的社会分工，其政治效应反映在日后市郊工业工人对巴黎公社的冷漠上。

---

## 妇女就业

---

182 妇女就业——另一个过剩劳力的巨大储藏所——在1848年后经历了最独特的回旋。1847到1848年，妇女占了劳动力的41.2%（不包括家务），1860年减少到31%，到了1872年回升到41.3%。<sup>19</sup>1850年代妇女劳动参与减少，部分是因为统计上的异常，1860年巴黎市郊工业混合区并入巴黎市，当地的就业人口多半是男性。另一方面，1850年代大量涌入巴黎的移民也多半是男性，巴黎市中心原是主要的妇女工作集中地，此时也经历了去工业化及人口外移，使得妇女就业人口减少。男性薪水增加也让妇女没有意愿从事薪水极度微薄的工作——妇女薪资率不到男性的一半。移入巴黎的年轻单身妇女从事的多半是女仆的工作，通常是由在乡村拥有地产的贵族雇用，这些妇女居住的地区多半位于巴黎西部的非工业区。巴黎人口形式因此呈现出东男西女的现象。

1860年后，妇女劳动参与的普遍提升同样也有令人信服的说

法。巴黎产业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劳动成本——开始将脑筋动到工资低廉的妇女身上，对某些部门来说，雇用妇女更成了不得不做的决定。在移民人口逐年减少的情况下，1850年代分散到巴黎周边的广大妇女劳动后备军，此时成了雇主垂涎的目标。原本已经很低的妇女工资率，市郊的工资竟不到市中心的三分之一。妇女就业不仅造成工资率下调的压力，也成为某些行业雇主用来直接对抗手工工人的工具。1862年印刷作坊发起首次大规模（非法）罢工，妇女人力的运用却成功瓦解此次事件，令雇主与工人印象深刻。<sup>20</sup>虽然男性工人强烈抨击妇女就业，但到了1860年代，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因为光凭他们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养活家庭。1850年代移入巴黎的移民，到了1860年代开始组织家庭，妇女就业的产生纯粹是出于经济上的必要。

当然在这样的趋势下仍存在着无数细微的差异，这些差异取决于科技与组织的变化与产品的创新——变化与创新创造出新的职业（左拉所描述的专门看管与维护机器的人）也去除掉旧的职业。许多人开始争论妇女的教育与地位，以及女性劳工的组织问题。<sup>21</sup>一方面，巴黎女修道院成了组织严密、低薪与竞争力高的妇女劳动中心——此举引起男性工人的憎恨，在巴黎公社时期演变成反教士的情绪。另一方面，186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试图恢复1848年的实验，成立妇女生产消费合作社，后来在巴黎公社时期成为主要的组织力量。<sup>22</sup>这些现象促使我们面对更广泛的妇女地位问题，并值得我们以妇女的立场来进行思考。

# 妇女的状况

183 历史纪元的改变总决定于妇女朝向自由迈进的过程。

——马克思

“对一个女人来说，所谓的噩运，”米什莱（Michelet）在《女人》（*La Femme*，出版于1859年）中写道，“就是孤独终老。”米什莱以公立医院数量不成比例、无人领回的年轻女尸作为可怕的旁证，说明居住在外没有家庭屏障的女性终将落得无人收尸的下场。<sup>1</sup>他以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悲惨的生活实况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以此表现出资产阶级对不顺从而独立的女性的普遍恐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孤立的女人”（*femmes isolées*）这个词代表了“贫穷的领域，一个性泛滥、我行我素且桀骜不驯的世界……这些女人与娼妓的联结，使她们染上了‘道德麻风病’，让各大城市成了‘永久的感染源’；她们允许表达或坦白表现出‘激昂的热情’，在政治动荡的时期如1848年革命，威胁着要推翻整个社会秩序”。<sup>2</sup>因此，我们随后将会看到，性别、性欲与革命之间将建构起强烈的联结。

184 根据拿破仑法典，妇女在法律上被视为未成年人，因此对一个女人来说，在没有父亲、丈夫、亲戚、爱人、妓院老板、机构（如修道院与学校）或雇主的保护下，要自己一个人过生活虽非不可能，但就经济与社会层面来看却极为困难。尽管有许多男人严肃负起父权的责任，但更常出现的却是假“保护”之名行虐待之实（社会、经济、性），因此妇女或以个别或以集体，努力地用各



种方式在重重限制下为自己开创特殊地位。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通过就业所获得的收入是否能合理地使经济独立自主。妇女的工资（见表七）大部分甚至无法满足基本需要。朱尔·西蒙（Jules Simon）从1861年开始所进行的研究显示，一名妇女一天在家工作12小时，假定她遇到最短的淡季并且领到最慷慨的工资，估计她的年收入可以领到500法郎。扣掉基本的租金与衣物费用，每天大概剩下59生丁（centimes）购买食物——足以买到一些面包与牛奶。这是假设妇女身体健康，可以全力工作所做的估算。作坊或服务与零售业（举例来说，街上小贩与食物制备）的工作前景也很黯淡。<sup>3</sup>至于其他主要雇用妇女的行业（1870年，巴黎有7万名专职洗熨妇）工资也同样微薄。

具备技术的女裁缝、女缝纫工或女装订工偶尔能做到经济独立。<sup>4</sup>分散各地经营着自己的小事业的独立妇女（大部分是单身），主要分布在裁缝、缝纫工与洗熨妇等行业，但她们的生计总是仰人鼻息，因为当生意不佳时，她们无法取得资本与信贷渡过难关。服饰业订制衣物的做法逐渐被现成衣物所取代，而这也使独立女企业家竞争的优势逐渐丧失。供应现成衣物的新式百货公司提供新式工作机会给外形姣好的妇女，此举正密切呼应父权控制体系。1869年商业工人罢工，妇女工作机会因此大增，雇主自此开始大量仰赖较为“温驯”的女工。

185

FIGURE-063

杜米埃《啤酒馆的女子》（*La Muse de la Brasserie*）似乎不只启发了马奈的名画《福利·贝尔热的酒吧女侍》，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了法定假日。几年之间，不管在酒馆还是百货公司，性欲与商品化的联结成了标准的展示方式。



女仆——当时巴黎妇女最重要的职业（1861年，有111496人从事这项行业）——性质相当特殊。女仆工作提供适当的食物、有问题的居住环境与较和缓的劳动条件。但工时很长（一天通常工作15到18小时，随时待命）而且生活条件饱受限制（女仆就像其他妇女一样，在法律上被视为未成年人，须受到严格监督）。虽然女仆可以经常更换雇主，却不可能摆脱随时随地被雇主使唤的命运。所谓雇主的使唤有时指的是性（据说女仆必须留意少爷们的性需求，避免他们趁人不注意过度放纵身心）。由于意外怀孕通常会马上遭到解雇，在这种状况下，妇女不是堕胎就是去当妓女。“堕落的”女仆成了妓女并且生下私生子，也许最后的下场就是米什莱所说的无人认领的尸体。就工作机会而言，如果能避开危险，女仆这份工作并非没有吸引人之处。工资虽低，但却足以储蓄（女仆是数量最大的小存户团体），另外还能接受某程度的训练甚至教育；忠于职守的女仆到老还能得到一笔退休金或遗产。女仆工作是一条合理而安全的路径，让年轻乡村女性借此得到社会化而能在危险的都市生活中存活下去（她们集中在巴黎西部较安全的资产阶级地区）。虽然难有机会结婚（更甭提生儿育女）而且必须随时待命，但精明的年轻女仆往往存钱充当嫁妆并且学习家务管理的技能，对于店铺老板或手工业者来说，这样的女性倒不失为理想伴侣。而大部分的女仆也相当年轻（有四成不到25岁）。

受过教育的女性渴望担任家庭教师、陪伴者与学校老师，这些职业同样也少有行动自由，报酬一般来说也很微薄——4000名学校女教师年收入不到400法郎。<sup>5</sup> 唯独拥有独立财产的妇女（依据“嫁妆制度”[le régime dotal]结婚的女人，带着嫁妆走入婚姻，因而保有一定的权利与财产）才能避免男性主导的社会制度与习俗借由经济基础遂行社会支配。<sup>6</sup> 成为殷实的寡妇是许多人想望的目标，却鲜少有人能够达成。与丈夫分居的妇女（如乔治·桑），只有在经过法律斗争之后，才能再度取得自身财产的控制权——如果妻子未经丈夫同意而离家，丈夫拥有法律权力让妻子入监服刑，最长可达三年，因此，妻子对丈夫的法律对抗经常仰赖勒索敲诈来迫其让步。

一天工作12小时，仅靠面包与些许牛奶过活的单身职业妇女能做什么呢？大部分资产阶级评论者认为她们有两个基本选择：



FIGURE-064

多雷对歌剧院走廊（认识情妇的最佳地点）以及有歌舞杂耍表演的咖啡厅所做的描绘显示，妇女角色在空间中的定位取决于性。



以卖淫或与男人私通（正式或非正式）来补充收入。卖淫极为普遍（据说1850年代巴黎有3.4万名妇女从事这项活动），资产阶级对此表现出其一贯的伪善。<sup>7</sup>在受管制的建制中（妓院与其他领有执照的场所），妓女的活动与健康可以受到当局的监控。比较大的问题在于许多妇女规避登记自行下海当妓女（1850年代初，登记有案的妓女约有4000人）。“孤立的女人”一词（如斯科特指出的）不仅可适用于未受管制的妓女，也可用在独立的女裁缝或女缝纫工身上，构成了两者的联结。

从下层阶级的舞厅到上层阶级的歌剧院与戏剧院，卖淫与其他活动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并且逐渐与“情妇”这个职业混同。以姿色来换取银行家的部分资产（如左拉的娜娜[Nana]），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尽管如此，对女人来说这仍是很大的诱惑。除此之外，社会顶端的竞争极为激烈，高级妓女与资产阶级生活的好位置早就被占满了。（赫特福德侯爵[Marquis of Hertford]是否真的花了100万法郎只为与曾是拿破仑三世情妇的绝色女子卡斯蒂廖内伯爵夫人[Countess of Castiglione]共度一晚？）不过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隐姓埋名是轻而易举的，各种私通都有可能发生，但也不是没有风险。举例来说，许多来自外省的大学生拥有情妇已是惯常的现象，因此也相应产生了格里塞特（grisette）这门古怪的行业。一名暗地里注意巴黎大学生生活的英国观察家原本无法接受这种现象，但最后却大为称赞这些妇女。她们忠实地照顾这些学生，甚至帮他们管理预算，以此换取报酬来补贴微薄的工资。这些女子就像雨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不幸的芳汀（Fantine），当大学生各自返乡任职后，她们就被弃之不理，婚姻对她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有时她们可以因为孩子而得到一些支持，或许也会因过去的勤勉服侍而得到某种报酬（最好的状况是帮她开店——独立女店主中有许多人是这样起头的）。

格里塞特逐渐被所谓的“罗瑞特”（lorettes）所取代，有些人因此感到惋惜。<sup>8</sup>罗瑞特因主要聚集于罗瑞特圣母院（Notre Dame de Lorette）区而得名，她们是提供愉悦的女人，极尽诱惑之能事，只为了换取短暂的好处（食物、娱乐、礼物与金钱）。勒热纳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850年代他曾在百货公司当过售货小童，亲眼看到这些女子是怎么做生意的。勒热纳在下班前一刻被叫去代替



年长的售货员出勤，他带着商品去拜访可能的客户，却在某一家的门前碰到一个穿着透明便装的女子出来应门。勒热纳吓了一跳，女子向他解释自己现在没钱，并且建议勒热纳把东西留下来，让她考虑一下，改日再叫其他的售货员来收钱。勒热纳吓得赶紧拿了东西就跑。造访巴黎的英国人评论说，由于法律体系的建构似乎只“保障追求愉悦的男人”，因此会出现罗瑞特这种角色似乎相当合理適切。就当时的社会风尚来看，人们往往公开夸耀自己拥有情妇（象征中产阶级的富裕，表示有余力再供养一人），除此之外，在咖啡厅与大道上、戏剧院与歌剧院中资产阶级与情妇多的是碰头的机会，当中充满无限的可能与诱惑。举例来说，奥斯曼就与某位歌剧名伶有公开而长期的婚外情，而且后者在他的保护下，事业蒸蒸日上。

然而，妇女之所以卖淫，绝大部分是出于绝望与纯粹的饥饿（相较于洁薇丝的女儿娜娜在同名小说中的大起大落，这种状况还比较像左拉《酒店》的洁薇丝，因三天未进食而蹒跚行走于大道上）。卖淫就跟造成卖淫的贫穷一样，既普遍又令人不悦。只有少数精明的老鸨才能让卖淫成为合理事业——1870年，约有15%的妓院老板是女人——然而即便如此，仍无法改变妓院主要由男性掌控的局面。<sup>9</sup> 但对一个仅能靠面包与少量牛奶过活的女人来说，邀约外出共进晚餐或赠以廉价首饰已不只是小小的诱惑。而对家庭处于困境的已婚妇女来说，卖淫通常是唯一选择。实业家普洛甚至担心，工人阶级妇女（包括妻子）会以阶级报复与阶级战争的精神上街卖淫。

相较于卖淫，与有资力之人维持稳定的私通关系似乎才能带来真正的经济解放。“为了维持生活”，波勒·明克（Paule Minck）说道，妇女“找个爱人，然后便愤世嫉俗地嫁给他”。<sup>10</sup> 麻烦的是，妇女对男人有经济需要，反之对男人来说，除非妻子出去工作，否则妻儿也是经济负担。在这种不平等下，出现了各种关系。在巴黎工人阶级中，姘居的现象与婚姻一样常见。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婚姻的昂贵（为求许可所费不赀）以及环绕着各种法律程序（不满25岁须得父母同意）。有则笑话说1860年以前，许多人在第十三区（the Thirteenth Arrondissement）结婚——巴黎只有十二区。工人阶级当中很少有人结婚，一方面是出于宗教或经济理





189 由，另一方面则由于家庭长期与故乡省份联结。姘居有时意味着短暂私通，但许多都相当持续，有婚姻之实无婚姻之名。在这里，女性所遭遇的问题在于经济上没有能力进入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又没有地位主张分手后获得一笔金钱，因此女性只好在各方面受到支配男性的剥削。妇女要不是得外出工作（在作坊中，妇女经常受到性骚扰与暴力虐待<sup>11</sup>），就是被吸收成为男性的助手在家工作（如左拉在《酒店》中描述的金饰业）。妇女被录用并受到保护然后开始工作（在这种状况下，她们的劳动力比学徒便宜），如果她们怀孕便会遭到解雇。妇女一般都被期待要料理家务，然而工作的重担经常使她们无法扮演好妻子与好母亲的角色。

190 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各个产业所出现的惊人情况与劳动负担成为男性与女性共同反对的焦点。参加1862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的裁缝代表抱怨说，他们所隶属的家庭代工体系并未如资产阶级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可以让家庭的收入更高。一天工作16到18小时，加上妻子无偿的协助，人们已经没有时间过家庭生活。“当妻子休息的时候，丈夫就开始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并且为妻子接下来的工作预做准备；当他做完了或疲倦了，就轮到妻子起床而丈夫睡觉……在这种悲惨的环境下，女人如何能适当地教养孩子？”<sup>12</sup>更糟的是，当她们的丈夫因长年暴露在险恶的工作环境里而耗尽

FIGURE-065

格里塞特与罗瑞特是加瓦尔尼最喜欢的主题。在左图中，受格里塞特照顾的大学生说道，如果他当上司法部长，他会禁止女人妨碍大学生读书（女子回答说，他甭想再跟她说话）。在右图中，罗瑞特回应献殷勤者的说辞，后者说她总是如此美丽，而这正是她的可贵之处。

体力、生病与死亡时（经常发生在年轻时），妻子必须靠着微薄薪水照顾丈夫并供养家中其他成员。女性所能遭遇最糟的状况就是年轻时就成了工人的寡妇。

如果妇女因伴侣迷恋上别的女人而遭到遗弃（哪怕是娱乐场所或酒馆中的女人），她并没有真正可求助的对象。在失败的关系中坐困愁城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此许多女性演说家在1868年后的公众会议中强调，女性应有离婚与自由婚姻的权利。<sup>13</sup>然而把重点放在法律形式对工人阶级女性来说并无太大意义，这些女性每天最要紧的事就是努力工作以求得生存。事实上，即便在贫困的经济环境中，男女之间不管有无婚姻也还是能维持感情关系。许多男性在1867年工人委员会上以温暖的语气提到家庭生活的可贵，而曾经参与激昂的1848年运动，并且继续存活于第二帝国时期的极少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要求同工同酬的同时也承认家庭（以及女性作为母亲的重要角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普洛在他所雇用的工人中看到不少相互扶持的关系，其数量并不亚于随便的私通与充满争吵的婚姻。普洛抱怨女性玩弄“高尚主义”把戏的技巧不下于男性，而且妇女时常结党成派对雇主形成强大

FIGURE-C066

如杜米埃在此所描绘的，好妻子与资产阶级家庭具有某种安详与父权的沉静，这一点也可在许多印象派的画作中见到。



的挑战。勒普莱 (Le Play) 的社会研究显示, 妇女通常控制了家中的预算, 甚至配置男人的午饭钱。这种做法——雇主试图以发放实得工资券的方式来鼓励这种做法——使普洛将“好妻子”描绘成能善加管理家庭支出, 并鼓励丈夫养成朴素、勤勉的习惯。雇主试图联合工人妻子来控制工人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雇主会对妇女教育感兴趣)。但这样的策略罕能见效, 丈夫与妻子团结起来对抗雇主剥削似乎才是普遍现象。<sup>14</sup>

依照资产阶级的想法, “好妻子”有几个重要的理想角色。女性接近公众生活的限制增多, 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以及都市生活日趋失序与混乱, 这些都剧烈改变19世纪巴黎资产阶级妇女的角色。<sup>15</sup> 资产阶级妇女不只是家庭管理者与发号施令者 (过去贵族女性所避开的角色), 也是家庭内部空间的秩序创造者, 特别是空间与时间秩序。创造秩序更成了资产阶级妇女专属的工作; 她们管理仆役、记账, 并且对家庭内部组织施以严格的纪律, 既要表现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又要以进退有节的态度, 响应弥漫于街头与市场的混乱与不受节制的热情。外部空间充满了过度刺激与热情, 应该隔绝起来, 不使资产阶级妇女接近。“一个被围堵的女人——被围堵在紧身胸衣与房子之中——才是谨守分寸的女人”。如米什莱所描绘的, 女人应该是各种私人隐私的守卫者, 并且看顾着与市场截然不同的家庭场景。<sup>16</sup>

曾经有两位知名的女性印象派艺术家贝尔特·摩里索 (Berthe Morisot) 与玛丽·卡萨特 (Mary Cassatt) 在这方面倾注心力。然而如果我们据此认定当时跟米什莱或西蒙一样致力于推动女性家居与母职理想的妇女只是一小撮人, 而一般女性则多半反对这种说法, 我们可就大错特错。波洛克 (Pollock) 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大, 她认为摩里索与卡萨特的艺术反映出“有些地方对女人封闭, 唯有男性才能与他们的男女伙伴一同出现于街道、大众娱乐与商业或性交换的社交公众世界”。根据资产阶级的看法, 女人不该出现在某些地方, 摩里索与卡萨特的艺术的确反映出这一点。然而实际上女人是否真的不能出现在这些地方, 则又另当别论。<sup>17</sup>

杜米埃的画作所传达的又是另一种感觉, 他描绘巴黎公共空间与社会中不同阶级地位所显现的各种女性角色。有些资产阶级妇女尝试涉足工作与权力世界中, 甚至插手股票市场 (虽然她们

不能以自己的账户交易，却可躲在场外的走廊上，要求代理人以她们的名义进场买卖)。如我们将看到的，身为时尚的采购者、消费者与展示者，资产阶级女性在消费者文化以及商品作为一种景观的公众展现上扮演着关键角色。除此之外，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沙龙虽不如它们的前辈知名，也因充满了政治、金融与文化密谋而闻名于世。虽然如此，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好妻子”该走的路，好妻子的典型只需做到胜任家务，如奥利维耶·奥斯曼(Olivier Haussmann)。“家庭女性主义”产生于内部空间中，女性的权力全聚集于此。这一点也许正是女性印象派画家想捕捉与赞扬的。

在家庭中，女性身为教育者的角色也十分重要——这一点与蒲鲁东颇具影响力的主张相左，他认为子女的教育应在父亲的权威下进行。另一方面，妇女教育也成了公众激烈争执与关注的焦点。教会将女子教育视为禁脔，认为这是维持其道德影响力不朽的工具；然而资产阶级改革者如朱尔·西蒙与维克托·迪吕伊(Victor Duruy)则认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对各阶级的女性施以较自由派而彻底的教育。给予母亲一定程度的尊敬极为重要。举例来说，勒普莱的记录显示，尊敬母亲是木匠团体仪式的关键要素。在当时，每一首诗与每一篇小说的背后，都隐约浮现着“可怕的母亲”的身影(如波德莱尔与福楼拜)。如果当时流通的各种手册是可信的，那么性伴侣的角色似乎也不可小觑；令人痛苦的妇科疾病(高达八成的巴黎妇女深受其苦)发生率极高，因此人们很难维持固定的性伴侣。<sup>18</sup>性病也造成惊人的死亡人数与痛苦。

这些角色似乎也出现在最底层的工人阶级生活之中。<sup>19</sup>然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人阶级的妻子(或等同于妻子的人)被期待除了照顾家庭，还要补贴家庭收入，她们担任女缝纫工或外出工作，零售食物，在洗衣店工作，或在工作室与店铺担任男性的助手。处境比较好的工人可以让妻子卖杂货、卖酒或洗熨衣物等。有些妇女则似乎掌控了家中的管理大权，无论是财务、教育、医疗乃至家庭节育，全都由她决定。

女性因担任这些角色而受到信任，并且经常被当成极为珍贵的伴侣。大部分倡议改革的女性主义者遵循特里斯坦的看法，认为家庭是建立完善生活的核心制度，但他们也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为主流的社会关系与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真正的家庭生活是不

可能的。特里斯坦曾说过一句名言，工人阶级妇女的地位如同“无产阶级中的无产者”，这句话意味性别与阶级、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间存在着紧张感，然而一般也承认在第二帝国时期这种紧张感变得较为沉默。到了巴黎公社时期，妇女工会甚至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家庭节育引发棘手的堕胎问题。女仆、情妇与女演员有强烈的动机终止意外怀孕。工人阶级妇女也一样，一方面她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极为重要，但她们通常也默认丈夫的想法，后者认为“多生一张嘴跟自己抢饭吃，实在毫无意义”。与全国平均出生率相比，巴黎的出生率极低。之后的观察者认为，大规模的堕胎潮到了1850年代就已经出现，往后流传的各种人工流产方法（有些是民俗疗法，有些更有功效但却更为危险）则应源自更早的时期。<sup>20</sup>在这里，女性再度展现出对自己身体一定程度的控制，这与对家庭的管控相同，而与强烈公共性与政治性的女性主义大异其趣。

不管法律上是否允许，传统的家庭结构依然存在，并且让女性在这种情况下有各种选择，包括堕胎。资产阶级的婚姻许多纯粹只是投资生意，这种习惯往下扩散到店铺主人与“小商人”，形成独特的恶性效果。至于工人阶级关系则要比资产阶级想象的（如左拉）更加团结。普洛抱怨说，他曾经做过许多尝试，要让工人妻子在阶级斗争时能站在雇主这一边，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酒馆在星期六晚上固定挤满好几个家庭，他们庆祝这个礼拜又占了雇主一些便宜。曾经参与巴黎攻城战与巴黎公社的妇女——她们并未如资产阶级通常描述的那样，容易被激怒或者是因愤怒而变得凶残——以非常单纯的传统方式支持她们的男人。另一方面，就女性主义政治在当时成立的女性俱乐部与女性社团的显眼程度来看，女性所主张的已不只是离婚权与工作权，还在于通过集体的生产与消费组织来建立经济基础，从而达到解放女性的目的。参与巴黎公社的妇女队伍包括了缝纫工、裁缝、装订工、切割工、洗衣妇、修剪工与人造花工（女仆几乎没有参与），这些女性拥有长期支配经济基础的经验（她们大部分在40岁以上），她们跟男性一样，认为自己要的就是集体主义与合作式的政治。<sup>21</sup>

如果说第二帝国时期有哪一项主题特别显眼，那么一定是女性对家庭内部空间的控制日益增强，以及女性逐渐在公共生活中



被商品化。然而只要读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可明白，这种现象就跟土地或金融投机一样，并非什么新奇事物。虽然如此，从其他例子也能看出，第二帝国在经历了一场量子跃进之后，成功晋升到另一个实践平面。各阶级性关系与私通关系的货币化与商品化，以及女性在家庭经济与劳动市场中地位的渐形重要，这两者预示了女性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将有重大变化。但这场重大变化却被男性支配的传统法律结构与经济组织所堵塞。虽然如此，在社会关系逐渐货币化之下，一场游击战于焉展开，在这场战争中，女仆学会了如何利用甚至诈骗雇主；妓女学会了如何欺瞒恩客；罗瑞特学会了如何取代格里塞特；妻子或伴侣学会了如何看紧另一半的荷包；资产阶级妇女学会了如何领导形塑时尚的消费者文化；而工人女性则学会了如何接受新式工厂工作与勤务角色的挑战，并懂得探索其他的组织形式以构成未来能解放她们的经济基础。女性仿佛已经了解，如果她们是具有金钱价值的珍贵商品，那么她们就应该充分利用金钱民主这项工具来解放自己，不管是以消费者还是以生产者的身份。

# 劳动力的再生产

195

变动资本因此只是劳动的独特历史形式——劳工用来养活自己与家人的基金，必须由劳工自己去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生产体系。

——马克思

劳动力的再生产——与现在一样，过去的妇女对此膺有重任——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食物、睡眠、居住与足以令劳工恢复元气于第二天继续上工的休养问题。其次则是长期需求，此与通过生育、养育及教育小孩而形成的下一代工人有关。

我们也许可以公允地说，平均而言，广大男性工人能获取的资源仅能满足供日常所需，但却不足以满足养育孩子的长期需要。一般来说，这类判断与第二帝国时期巴黎人口统计的基本事实大致吻合（当然其中存在着细微差异）。举例来说，1866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巴黎人说自己是在巴黎出生的。即使到了1860年代，也就是大移民潮的高峰期过后，自然人口年增9000人，相较之下，每年的移入人口则是1.8万人。<sup>1</sup>劳动力长期的再生产似乎一直是外省事务。马克思曾指出，巴黎“持续吸收乡村原始而身体未败坏的分子”来满足自身的劳动需求。然而，巴黎与外省的关系不仅仅只有移民这个单纯事实。在巴黎工作的外省工人通常把孩子送回外省养育，即便是工人阶级也会请个农村奶妈来哺育子女，

这是当时法国普遍的做法，然而此举所造成的高死亡率，与其说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如说是有组织的杀婴。<sup>2</sup>无论如何，巴黎充斥着单身男子（1850年，有六成的男性年龄介于21到36岁之间）。结婚（就算包括订婚）年龄相对推迟（1853年，男性结婚年龄是29.5岁，到了1861年提高到近32岁），每个家庭的平均生育数是2.4，外省则是3.23，私生子占了28%，外省则只有8%。除此之外，巴黎的自然人口增长几乎完全集中在人口的年轻阶层，说明人口增长是人口移入所造成的结果。到了第二帝国末期，人口景象确实有了变化。家庭组成在1860年代开始勃兴，并且往市郊扩散，市中心的年龄结构只剩下单身与老年。市中心的长期贫民窟影响的主要是新移民与旧移民，之后家庭贫困的现象开始往郊区扩散，此时影响的则是年轻人（图69）。1850年代，主要由年轻未婚人口构成的大量移民潮，使巴黎人口的年龄结构逐区发生变化。资产阶级逐渐了解，自由运用劳动力的人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负有某种责任或自我利益。有些人（例如皇帝）认为，1848年事件的发生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忽略有关，即便如此，这些人还是未能确定介入的基础，更别提达成共识。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改革者对于这个问题颇为热衷。虽然他们只是提出大量观念而未能实行，但他们的探讨与论战却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与理念，在

FIGURE-067

杜米埃的《汤》描绘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再生产关系。对比资产阶级家庭的沉静（图67），工人妇女必须一边匆忙而饥饿地喝汤，一边以左胸哺育婴孩（其风格与杜米埃《共和国》[图23]大异其趣）。



巴黎公社创伤之后，成为第三共和国社会改革的基础。阶级力量的轮廓阻碍了资产阶级改革者在住宅、营养、教育、医疗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努力，其中的过程与原因值得加以谨慎的重构。

---

## 住 宅

---

第二帝国在住宅供应上曾经历一场剧烈的转变。资产阶级住宅深受金融、土地开发与建筑新体系的影响，使得巴黎内部逐渐出现住宅的区隔。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为满足工人阶级住宅需求而生的小规模投机建筑体系，主要分布在巴黎周边的开阔土地上。虽然住宅供应体系改变了，但工人收入相对较低，他们所能负担的住宅价格上限并不高。就业稳定而且是两人工作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1868年时这样的家庭一年可赚2000法郎，所能负担的房租不超过350法郎。350法郎或以下的房租可以租到什么样的房子，而这样的房子数量又有多少？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房屋也不多；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土地与建筑都很昂贵，地主毫不客气地求取8%或更多的利润，住宅条件令人触目惊心。

快速上涨的租金使工人人口的负担加重。早在1855年，列昂·赛就指出全巴黎市的房租上涨了二到三成，因此光是一间单人房的租金就不少于150法郎。科尔邦认为1862年工人阶级的房租比1848年之前高出了七成，托马斯则认为第二帝国时期的住宅成本每十年就增加五成。弗洛（Flaus）所收集的统计数据较低，第二帝国时期的涨幅介于50%—62%之间，租金在100法郎以下者则只上涨了19.5%。然而，要租到租金在100法郎以下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1866年，专供已登记的穷人承租的单人房，平均租金在100到200法郎之间。从约4万个贫穷家庭所支付的租金统计来看，1856年的平均租金是113法郎，到了1866年提高到了141法郎——虽然市郊并入巴黎后，便宜的郊区住宅也成为统计样本，但价格仍持续上升。人们一致认为，租金的涨幅超过工人名目工资的涨幅，尤其是在1860年代。<sup>3</sup>租金的上涨与房地产的普遍上扬一致，影响了所有阶级。凡是依靠固定所得或甚至萧条的农村房地产租金过活的人，以及只能支付不超过700法郎左右租金的人，尤其觉得日子难过。资产阶级中也可看到许多艰难而被迫搬家的例

出租房间人口，  
1876年

贫穷，18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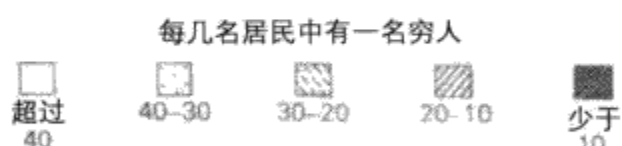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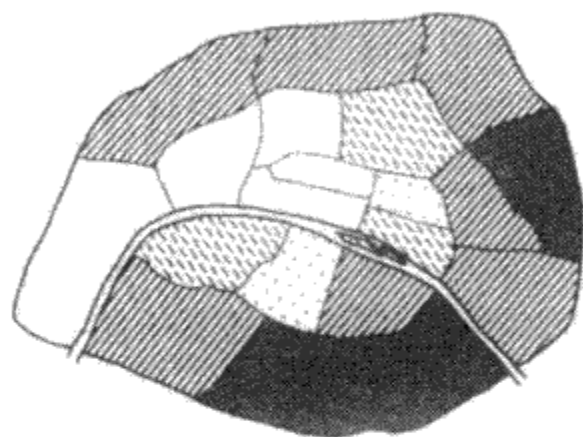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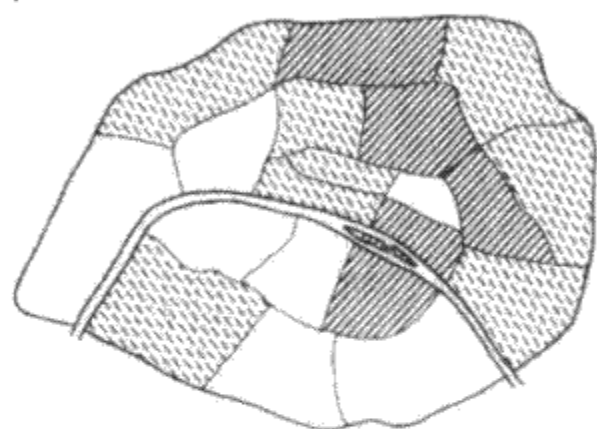


FIGURE-068  
1876年居住于出租房间的  
总人口与1869年巴黎的贫  
穷率（加亚尔,1977）

子。但对那些分享了第二帝国经济利益的人来说，上涨的租金根本不成问题。对于50万名在巴黎以自己的劳力维持生活的人来说，则又是另一回事。

面对这种情况，工人有几种调适方式。我们从许多人的小故事得知，当时的工人提高了住宅的预算比例。1860年，工人收入中有七分之一花在住宅上，在此之前则只有十分之一，而到了1870年，甚至达到三成。<sup>4</sup>工人也尽可能利用空间。对于只有一间斗室容身的家庭来说（1866年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贫穷人家是如此），要与别的家庭共同租用一间房间实在是强人所难，但如果家庭再穷一点，分租一室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分租一室对单身者来说较为简单，许多出租公寓的确建成像军营一样的形式，每间房间都放满了床，供低薪单身劳工居住。另外，在巴黎周边也能找到低廉的住宅，虽然租金较低，但步行上班的路程却更为遥远。事实上，巴黎周边住宅的投机使得当地租金不如想象的便宜，尤其是市郊的建筑商与房地产业者强烈倾向于从巴黎房地产繁荣中分一杯羹，于是他们便从工人身上赚取利润。最后一个渠道则是住进分布于巴黎周边或甚至接近市中心空旷地带的贫民窟（有时只是暂时的）。

工人的收入与租金相比明显不足，这一点成了巴黎住宅处境不可磨灭的印记。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工人移往市郊，他的部分著名论点便是基于这段历史而发。

198



卫生委员会抱怨临时设立的贫民窟就位于市中心新建筑的旁边。当地的生活条件令人吃惊，但每个人竟都对此视若无睹。<sup>5</sup>接近市中心的出租房屋数量激增且极为拥挤；通风不良、拥挤而疏于维护的出租房屋建成之后几乎马上就成为了贫民窟；而著名的“新增建筑”——有些新增建筑隐藏在奥斯曼华丽建筑外观的背后，将内院转变成高获利的工人阶级贫民窟——则是工人收入不足以负担体面住宅下所出现的折价品。奥斯曼的工程未能清除掉巴黎的贫民窟，却在工人收入停滞不前时带动租金全面上涨，因而加速了贫民窟形成的速度，即使是市中心也不例外。拉扎尔从市中心穿越巴黎到达堡垒，他算出其中未受市政府控制的巷弄、庭院、住家与贫民窟不少于 269 处。虽然大部分提供给贫穷家庭的住宅分布在巴黎东部郊区的半圆形地带，特别是集中在东南与东北地区，有些贫穷住宅甚至零散分布在主要由资产阶级居住的西部地带。

如此绝望的住宅环境势必产生一些社会效应，也许更加强了原本已相当坚牢的家庭组成障碍。西蒙与普洛将他们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生活的不稳定与杂交，归咎于高租金与不适当的住宅环境

FIGURE-069

杜米埃指责房东运用权力驱逐他们不欢迎的分子，如孩子与宠物就被迫晚上逗留在街上。



(普洛企图用这种说辞来掩盖他所支付的低工资与此事的关系)。此外,许多证据显示,不适当和不健康的住宅与持续存在(虽已逐渐减少)的疫病有关,如霍乱和伤寒。空间的缺乏迫使大部分的社会生活必须移转到大街上,而烹饪设备的阙如则使这个趋势更加恶化。人们不得不到咖啡馆与有余兴节目的餐厅吃喝,结果,这些地方便成了集体政治骚动与意识形成的中心。

资产阶级改革者深知这种状况并对此感到紧张,皇帝也了解通过“消灭贫穷”(引自皇帝写于1844年的短文)巩固工人阶级的支持,对他的统治至关重要,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统治期间竟未对此达成任何明显可见的改革。第二共和时期,在天主教改革者的驱策下,通过了管理有害健康环境的法律,但奥斯曼不是依自己的目的选择性地执行,就是将其视为空文不予理会——18年间,只检查了18%的住宅。<sup>6</sup>一连串“工人之城”建筑计划(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住宅,这是受到傅立叶的观念,集体工人阶级住宅法隆斯戴尔的启发)开始于1849年,路易·拿破仑捐助了一些基金,但不久这项计划便因保守派的恶意反对而中止,后者认为“工人之城”是社会主义意识的温床,也是潜在的革命炉灶。工人方面也不领情,他们觉得这些住宅比较像是监狱,晚上十点有门禁,里面的生活也受到严密控制。较能为保守右派与左派的蒲鲁东主义所接受的个别住宅提案,产生了许多设计构想(甚至为此在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中举办设计竞赛),但却少有行动,到了1870年,低收入住宅的补助方案只完成了63个单位,同时间合作社(皇帝再度慷慨认捐)所建的单位数也不到41个。

尽管与皇帝的利益息息相关,但行动还是失败(皇帝个人同时对集体主义式的与个别的住宅都施以资金援助,鼓吹各项文章评论与政府计划,并且负责将英国对这方面的讨论文章翻译成法文),其中有部分原因出在意识形态混乱上。傅立叶(主张集体主义模式)与蒲鲁东(强烈倾向于工人拥有个别房屋的所有权)之间的歧异造成左派分裂。然而一旦对地主的憎恨达到顶点,蒲鲁东的影响也随之水涨船高,因此也无人敢对巴黎公社所主张的土地所有权提出挑战。从天主教右派的勒普莱到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左派,在广泛的共识下,唯一可行的选项便是在私有财产制的架构下解决住宅问题。尽管如此,房屋所有权对工人来说并不可行,

除非政府补助。在这点上，政府遭遇强大地主阶级利益的阻挠——政府政治权力的基础越来越仰赖地主阶级——同时也与普遍通行的自由市场理念背道而驰，事实上，对某些人如奥斯曼来说，自由市场几乎已成为行动的核心准则。强大的阶级力量加上意识形态的混乱，使所有针对住宅问题所采取的行动陷入困境，同时也让奥斯曼清除贫民窟的计划停顿下来。一直要到巴黎公社之后，改革者才发现，令人同情的贫民窟才是革命行动的温床，而非“工人之城”，住宅改革这才开始正式上路。

---

## 营 养

---

农产品运费降低以及巴黎分配体系出现规模经济与效率，促成“消费革命”的出现。然而即使消费革命意味着社会各阶级的“饮食与品味逐渐阶层化”，但并不是所有工人都能从中受惠。面包、肉类与葡萄酒构成工人阶级特有的饮食基础（不同于外省工人），之后又逐渐添入别的食物，如新鲜蔬菜与乳制品。肉类很少直接端上餐桌，多半还是加在汤里，或做成炖肉当成每餐的主菜。随着食物供给逐渐多样与稳定，营养水平也开始改善，与此同时，生活成本也开始升高。1868到1869年的歉收，证明巴黎在面对农产品不足的问题时仍相当脆弱，其严重程度有如1853到1855年物价飞涨的翻版。因此，很明显地，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也使大多数人（资产阶级除外）并不能从多样化的食物来源中受惠。

食物分配体系具有一些重要特质。出租房屋的居民数量庞大，加上许多家庭屋内缺少烹饪设备（贫穷家庭中有63%只拥有一个炉灶来烹调食物），因此，不管是烹煮还是饮食都必须移到街上以及餐厅与咖啡馆。工人收入的周期性（特别在淡季期间）意味着大部分的食物都必须靠信贷来购买。然而，食物一般都是整批地运进高度集中的市场（巴黎果菜市场）或屠宰场（维雷特）或储酒仓库（贝尔希[Bercy]）。通过零售商、街头小贩等体系来进行的散装贩卖，靠的也是信贷。这种现象为小规模企业活动开启了无限可能，这些企业活动通常由妇女组织，不过与其他的生活方面一样，企业活动的最后控制者多半是男人。这个复杂的中间体系产生有趣的社会结果。工人们对于中间体系的观感相当暧昧。一

方面，中间体系提供许多补充就业（尤其是妇女）的机会，甚至也让工人有往上流动到小资产阶级的店主世界的机会。另一方面，中间体系决定什么时候该扩大信贷或不该扩大信贷，而这些决定经常攸关着个人的生死，因此中间体系常被视为小剥削者。1860年代，工人运动为了抵制中间体系，开始发起庞大的消费合作社运动，许多合作社都获得丰硕的成果。勒梅尔（Nathalie Lemel）与不屈不挠的瓦尔兰一起创立拉马麦脱（La Marmite），这是个食物合作社，工人只要每年认捐50法郎，就有权利每天享用远较餐馆便宜的现成食物。到了1870年，拉马麦脱已有三家分社，而且业务十分繁忙。<sup>8</sup>勒梅尔与瓦尔兰有两个目标。他们不只要照顾无处烹饪者的需要，也将合作社视为政治组织与集体行动的中心。

他们的作为正好坐实了资产阶级改革者长久以来的忧虑：巴黎广大的人口未能拥有稳定家庭生活所需的设备与舒适，最后势必走上街头与广场，轻易地成为政治煽动与集体行动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普洛很清楚地看出，有余兴节目的餐厅、咖啡馆与酒馆成了人们尖刻批评社会秩序与计划重组社会秩序的场所。这些地方也明显成为构成与表达工人阶级意识与文化的炉灶，而且在1867年后掀起政治风潮。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如西蒙之所以强调稳定家庭生活的美德（体面的房子与适当的烹饪设备），有部分便是为了回应这个潜伏的危险，尤其当饮食与政治已成为集体工人阶级文化的一部分时。

---

## 教 育

---

第二共和时期，改革者已经构思了一个涵盖两性、不受费用且世俗性的基本义务教育体系。在“秩序党”上台之后，改革者于1850年通过了法卢法（Falloux Law）。这部法律旨在推动二元的教育体系——宗教的与国家的教育体系——并且将所有教学置于各地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在这些委员会中，大学的传统权力已足以与教会、民选官员与官派官员并驾齐驱。然而一般认为，这项法律没带来什么好处，倒是加诸了许多责任，再加上国家吝于编列教育预算，因此第二帝国时期的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建树。<sup>9</sup>

这里面的问题有部分源自教育政策完全受到政教关系的左右



所致。皇帝为了赢得天主教徒的支持，在1863年之前，一直勉为其难地支持法卢法，并且尽可能不违反它的精神。1863年后，皇帝与教皇在对意大利政策上出现冲突，皇帝于是指派自由派思想家与改革者迪吕伊担任教育部部长。迪吕伊与强敌奋力一搏，在国家教育的推动上小有成就，并且削弱了教会力量。他对不收费用的基本义务教育与国家女子教育的提倡不遗余力，但却经常受到立法机关的阻拦与预算抵制。冲突还不仅止于此。除了冗长的哲学与神学争辩（例如宗教对上唯物论），资产阶级内部对于教育的目标也莫衷一是。有些资产阶级认为，教育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因此应该教诲学生尊敬权威、家庭以及传统宗教价值——用以解除1848年许多老师轻率提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连传统上反教士的共和派也认为，如果宗教能保卫资产阶级价值，那么剂量重一点亦无妨（因此共和派中有不少人支持法卢法）。然而麻烦出在教会内部所推广的宗教价值往往极为保守而落后。最晚到了1830年代，教会在传道时仍反对利息与信贷，而到了1850年代，教会对唯物的科学也不感兴趣。教会在这些事务上的食古不化，激起了大学生（特别是医学院的学生）猛烈的反教士主义，同时这批人也成了布朗基革命运动的核心。<sup>10</sup>

其他的资产阶级则视教育为带领广大群众进入现代精神的手段：灌输自由的科学研究与唯物的科学理想，以及适合于科学进步与普选制世界的理性素养。问题在于该怎么做。有些人（如蒲鲁东）对国家控制教育深恶痛绝，他们认为教育应该掌控在父亲手中（蒲鲁东的说法），但另一些人则担心，如果没有国家的集中控制，将无法抵御颠覆性宣传的蔓延。迪吕伊努力推动负责而进步的教育，不管是支持还是中伤他的都大有人在。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人们可以预料得到，教育供应将不会有太大进展，而教育内容也乏善可陈。尽管如此，1860年代针对教育的角色所发起的辩论，对于法国的政治生活有着持续的影响。<sup>11</sup>进步派的天主教徒与共和派人士在教育、住宅与其他社会福利项目上努力界定出某种哲学与实践，好让大众教育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获得崭新的意义。这场论辩在1870年之前的影响甚微，但意义却相当重大。

以巴黎从法国各处汲取劳动力的程度来看，如果未能提升全国的教育水平，终将对巴黎的劳动力素质产生严重的冲击。文盲



减少当然是件好事，然而1872年时巴黎人不识字的竟高达两成；能读写的人当中，许多人仅具最初步的教育形式，没有能力学习任何一种需要正规教育的技术。光凭巴黎的教育体系不可能抵消这个令人绝望的全国性景象。政府起初支持某些人的看法，认为教育只不过是一种控制手段。国家与教会设立的学校可以携手并进。<sup>12</sup> 依照奥斯曼的预算配置，花在教育上的开支简直少得可怜，完全无法与公共工程的巨额开支相比。奥斯曼仰赖教会学校与私立学校来满足新移民与新形成的市郊小区的需求，并且尽可能限制只让穷人子弟免费入学，也就是说，一般人就算进公立学校就读也要付费。教师年收入约1500法郎，一个人糊口足矣，但却不足以养家。基于纯粹预算上的考虑，奥斯曼（与为数不少的纳税人）倾向于由民间来负责教育事务，特别是交给宗教机构，而宗教机构中教师的薪水更低（约800法郎）。

一直要到1868年后，景象才开始更动，迪吕伊终于能施行免费公立教育原则，而格雷亚尔（Greard）则着手改革巴黎的教育供应。然而当时奥斯曼的自由放任与民营策略已经在巴黎形成一幅极为显著的教育供应地图。新并入巴黎的郊区构成了所谓的教育不毛之地，当地几乎不存在任何合适的公立学校，教会与私立学校也十分稀少，因为这里的父母根本没钱供孩子念书。奥斯曼对于市郊学校的忽视，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最好的印证，从1860到1864年，奥斯曼在合并的郊区设立新学校，所花的经费只有400万法郎，相较之下，新区政厅就花了4800万法郎，新道路的铺设花了6900万法郎，至于建筑新教堂则花了550万法郎。就学率相当低，不识字率则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这里的“破旧学校”聚集了“各年龄层的孩子，他们几乎没有共通点，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的无知程度”。这里是社会用来再生产贫穷与教育边缘化的工人阶级的空间。在巴黎西部的资产阶级居住区，奥斯曼的体系运作顺利，因为穷人免费入学的公立学校与资产阶级偏爱的教会与私立学校是完全分离的。在手工工人、小资产阶级与从事商业者所聚居的市中心区，公立学校被视为教育孩子技术与实用技艺的普遍方式，天主教学校反而很难打进这个圈子。由此可见，巴黎空间的社会区隔完全反映在教育供应地图上。<sup>13</sup>

教育体系的质量也有差异。虽然已经有进步派的天主教学校

(教会特别倾注心力于巴黎的教育上),但公立学校在科学与其他现代学科的教授上仍占了上风。1850年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使得教师加强对学生的监视,整个教育体系因而偏离了启蒙的唯物主义路线,转而重视控制与宗教上的灌输。然而就天主教学校传播不宽容与对传统价值的尊敬的程度来说,天主教学校已越来越不受自由派资产阶级欢迎,许多人宁愿把孩子转到新教学校。直到1860年代末迪吕伊进行改革之前,女子教育几乎全由教会筹办。有趣的是,有关道德教育与职业技术间的适当平衡问题,却是因妇女角色问题浮出水面,而跟着明显化。

正规教育体系未能生产出拥有现代技术的劳动力,原本还不是什么严重的事,然而如果其他更传统的技术形成模式也崩溃的话,就不可等闲视之。原本在1848年就已面临严重问题的学徒制体系,到了第二帝国时期整体陷入了危机之中。<sup>14</sup>在某些行业中,由于竞争的压力与工作内容的零碎化,使得学徒制降格成了廉价的童工形式。劳动市场在地理上的分散,工作地点与住宅的日渐分离,使得原本就容易出现虐待事件(除非有各当事人的密切监视与控制)的学徒制体系更加紧绷。学徒制体系似乎只有在少数几个行业中才能合理存续,例如珠宝业。除此之外,随着季节性迁徙逐渐转变成永久性定居,巴黎劳动市场的传统外省技术形成中心也停顿下来。因此,雇主与工人阶级同时产生以学校体系取代学徒制体系的需要,希望借由教育机构来进行职业训练与技术形成。少数几个在1860年代组成的民间教育机构获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些机构在巴黎公社之后率先发起了教育改革。然而只有小资产阶级或殷实的工人子弟才有时间或金钱进入这些机构上课。1860年代于市中心区成立的成人教育课程也面临同样的限制。

当时工人阶级的基本教育与现在一样是在家中进行的,而且根据资产阶级观察者的说法,家中教育一反蒲鲁东的训令经常是由妇女担任主要角色。西蒙之所以对女子教育有着强烈兴趣,部分源自于他发现妇女在家教导孩子的质量有改善的必要(不管是道德上还是技术上)。此后,儿童教育便遭遇这样的冲突,“要赚更多钱就必须少上学”——对家庭来说,这是攸关生存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么单纯的因素,使得许多未受教育的工人阶级对于义务教育与学徒制充满敌意。手工工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们尊

崇学徒制并且对于学徒制的衰亡感到哀伤。工人阶级中也只有手工工人对于免费的、义务性的与职业导向的教育最为拥护。巴黎有很多异议的自由思想者与大学生渴望（如布朗基分子）担任授课老师，一方面出于政治理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赚取少许金钱。例如瓦尔兰便从兼职教师那里接受教育并且学到了道德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sup>15</sup>比较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成员如普洛则看出其中潜藏的威胁：手工工人当中的自学成功者，可能会以其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他们的“高尚主义”）来领导未受教育的广大劳工从事政治暴动。自由思想的大学生构成布朗基革命运动的核心、加入共产国际或者固守着受民众欢迎的激进出版事业，而从1868年后大批未受教育的工人参与各种公众会议可以看出，这些大学生与手工工人一样担负起了激进化的角色。无政府主义者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就是在巴黎周边的教育不毛之地开启了她杰出而狂暴的教师事业。从这一点来看，资产阶级竟因为自己在教育改革与教育投资上的失败而得以收割成果——巴黎公社所带来的教训让他们铭记在心，而教育也成了稳定第三共和国的基石。

---

## 家庭的监控

---

家庭（不管是否合法组成）内部的运作实况一直是个谜。亲族体系在使移民融入巴黎生活与文化以及提供社会安全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同样引起争论。偶然出现的传记与自传（如纳多 [Nadaud]、瓦尔兰、米歇尔与爱德华·莫罗 [Edouard Moreau]）指出了在巴黎生活的社会网络中，家庭（或自由婚姻）与亲族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不过我们此处所处理的不只是在政治上活跃的人群，还包括了受过教育的手工工人或小资产阶级专业人员或店铺主人，我们知道这些人的社会条件与那些未受教育的广大移民完全不同。后者在选择配偶时多半优先考虑同乡，并且在移入巴黎时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故乡省份的家庭体系与亲族关系。<sup>16</sup>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巴黎这个熔炉对他们不具任何意义，借由来自布列塔尼、克勒兹、奥弗涅与阿尔萨斯等地的移民聚居而成的殖民地，第一代移民得以在巴黎生活的整体架构下保留外省的文化。不过也有例子显示，许多移民很快就融入了大规模都市文化的疏

离与混乱当中。医院中无人认领的尸体，许多因流浪而遭逮捕的孩子，孤儿与遭遗弃的幼童，这些都显示出根植于家庭与亲族组织的传统安全体系，在面对就业的不安全、悲惨的生活条件与其他巴黎生活中的病态和诱惑（酗酒、卖淫）时正逐渐崩解。

在存续的家庭与亲族体系中，年长的妇女似乎拥有某种程度的威望，这种地位来自她同时身兼母亲、养育者与教育者的身份，以及她是家中劳动力再生产的管理人。女性在家中的角色明显受到许多男人的重视，资产阶级改革者鼓励女性成为社会稳定的支柱，而教会则通过女子教育使女性成为宗教价值与道德的供应者。女性角色拥有双重的重要性，女性被期望能灌输孩子重要价值：一方面在家中能尊敬父亲的权威，另一方面出了家门则要尊敬教会或国家的权威。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是一种霸权思维，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当时所谓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不过是在自由婚姻中男女双方能彼此尊重。我们之前曾提到过，当时的女性如果未依附在男性之下，那无论在经济上或社会上都是很难存活的。

即便女性可以控制荷包，但荷包里的钱财通常不足以供养劳动力的再生产。淡季意味着在收入上存在着可怕的季节性紧绷，而租金支付日（一般都是预先支付三或六个月的租金）也让开支变得十分严峻。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如果没有其他形式的援助，家庭成员要住在一起相当困难。储蓄银行（1818年成立，1837年合并以鼓励工人阶级储蓄）的储蓄金总额大量增加，但到了1870年，每位存款者的平均储蓄金额却降到了250法郎——可以用来应急，但撑不了多久。其他方式——把小孩寄养在亲戚家——效果可能也同样有限，因为大部分的亲戚也面临同样的财务问题。<sup>17</sup>事实上，亲族体系真正的用处在于为那些急需工作者找到就业机会，如果亲戚帮不上忙，就只能寻求国家或慈善团体的支援。

巴黎传统上是欧洲的福利之都，它具

FIGURE-070

大多数状况下，杜米埃会以各种方式描绘家庭生活，不过其中唯独缺少田园牧歌式的景象。本图便是一幅充满灾难的插曲，与当时的印象派女画家如卡萨特与摩里索所刻画的理想沉静形成强烈对比。



有宗教与国家慈善的传统，所有穷人都有权向其提出救济。然而这个体系到了第二共和时期饱受保守共和派的抨击，最后逐渐被奥斯曼所废除。我们之前提过，奥斯曼对于福利问题向来抱持新马尔萨斯派的态度，亦即必须减轻财政负担并且将福利供应的工作丢回家庭责任架构之内——如果家庭有足够的财务资源来满足这项需求，这项策略（与现在一样）会较为合理。事实显示，医院与医疗不可能轻易废除，而贫穷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援助穷人一直是巴黎市预算的重大项目之一。

对于福利供应，奥斯曼采取将责任离心化与地方化的策略，而策略的推动则配合家庭与贫穷儿童市郊化的步伐。另一项策略则是仰赖互惠协会的形成以及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互助团体。政府采取几项步骤来鼓励这类组织，但却惊恐地发现这些组织可能成为秘密进行政治动员的大本营——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这些组织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其所进行的监督与控制，构成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安全斗争的一段有趣篇章。女性发现自己要进入这些组织相当困难，而她们也无法独立从中受惠——这项限制使得这些组织原本援助家庭的基本诉求大打折扣。除此之外，政府对这些组织的严密监视与控制也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专制国家在对穷人施予福利的同时也对其施以严密的监视，以此粗鲁地走向监控家庭之路，往后几个世代的资产阶级改革者则致力于将他们的步伐调整得更优雅而细致。



# 消费者主义、景观与休闲

209

将个人劳动与他人劳动联结起来的各项关系，看起来并不是工作时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

帝国的景观起初具有纯粹的政治面向，它的焦点在于以拿破仑事迹为中心的民粹主义以及帝国权力的展现上。奥斯曼的使命之一，便是让巴黎披上帝制罗马的大衣，使其成为欧洲文明的带领者与核心。宫廷典礼、皇室婚礼、葬礼与外国显贵的造访、阅兵（特别是打了胜仗之后由皇帝骑马前面引导的凯旋式，如1859年从意大利凯旋而归便是一例），这些都是营造景观以宣扬帝国权力的大好机会。奥斯曼之所以被任命为巴黎市长，有部分原因源自1852年春，也就是在帝国成立前夕，他精心策划了路易·拿破仑进入波尔多的盛大游行仪式。奥斯曼是安排景观的行家，他将巴黎市政厅改造成举办舞会与节庆的永久性景观中心。大道的落成典礼——塞瓦斯托波尔（1858）、马尔塞尔布（1861）与欧仁亲王大道（Prince Eugène, 1862）——宛如为纪念性建筑（如1860年的圣米歇尔喷泉[St. Michel Fountain]）揭幕般的隆重登场，在盛大的庆祝仪式中，慕名前来的民众莫不赞叹帝国的风华、优雅与权力。通过节日、庆典与舞会（1852年，即便是巴黎中央果菜市场的妇女——以共和派立场著称——也举办了庞大的公共舞会来庆

祝帝国即将成立)也可将民众对皇帝的支持动员起来。8月15日也被宣布为帝国纪念日(fête imperial)。

伴随着都市建筑重建而出现的永久性纪念建筑(空间与视野的设计集中在帝国权力的重要象征上)有助于支持新政权的正当性。公共工程的戏码与新建筑的华丽凸显出某种意在言外的节庆气氛,使帝国政权笼罩其中。1855与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则进一步增添了帝国的荣耀。然而根据范赞腾(1994,页211)的说法,1862年以后巴黎的戏剧性质却急速褪色,此时帝国的权力已逐渐不敌资本与商业这两个驱动巴黎重建的力量。此后,奥斯曼也逐渐丧失对都市过程的主导权。建筑师加尼耶(Garnier)在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以及8月15日的帝国纪念日中,竟被迫在没有民众协助或参与的情况下,为自己新完成的歌剧院外观举行落成典礼。<sup>1</sup>

210

景观,包括城市本身,乃是都市生活的基本要素,其中蕴涵的政治面向长久以来一直在正当性与社会控制的建构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七月王朝并不缺乏景观,但当局却未能善加利用以进行社会控制。周末假日工人们流连于市区外(如贝尔维尔)的酒吧与舞厅,到了晚上则满口秽言地返回市中心。这类景观往往造成暴乱与革命,构成潜在不安。尤其在1840年代,四旬斋前为期一个礼拜的嘉年华会被刻画成“前工业时代最后一出充满活力的纵欲戏码,与初生的大都会意识形态形成强烈对比”、“大杂烩式的杂交”、性别倒错的穿着、阶级区分的暂时消失,这些都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嘉年华会“也粗鲁嘲弄了巴黎各处景观与都市威胁之间所做的谨慎调整。嘉年华会在意大利大道与昂坦道上虚张声势,让各种姿态、外表与外观变得更为明确也更为虚假,同时将其搅拌混杂,仿佛这么做不会出什么乱子似的”。政府当局与未卷入这场狂乱的资产阶级对此感到忧虑与恐惧。<sup>2</sup>1848年2月晚间,在卡普辛大道上被以可怕的屠杀方式击毙的尸体,被民众抬着游行全城,以激起巴黎市民的革命传统。这种状况正是第二帝国时期的社会控制景观所要移除的,其目标在于将主动的表演者转变成被动的旁观者。贝尔维尔的嘉年华会在第二帝国时期因为移除、积极压制与行政手段(例如通过1860年的兼并将贝尔维尔划入巴黎市)而衰微。然而,贝尔维尔的麻烦形象一直挥之不去,最后在1860年代末又再度燃起终结帝国与发动革命的火种。

211

212



FIGURE-071

最早从1849年开始，杜米埃就已经发现景观有助于让民众解除一天工作的劳顿。

然而第二帝国的景观不仅仅展现了帝国的华丽。打从一开始，它便试图直接赞颂现代的诞生，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万国博览会中看出。如本雅明所言，这些是“商品拜物教的朝圣之地”，也是“资本主义文化幻影臻于极致”之所。<sup>3</sup>除此之外，这些景观也颂扬了现代科技。帝国景观在许多方面与商品化及资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深化的流通力量完全吻合。新大道不只创造就业，也促进商品、金钱与人潮的流通。万国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人潮，刺激了消费者需求。而所有这些景观也使技术、劳动、商品与金钱大为增加。对经济的刺激可说相当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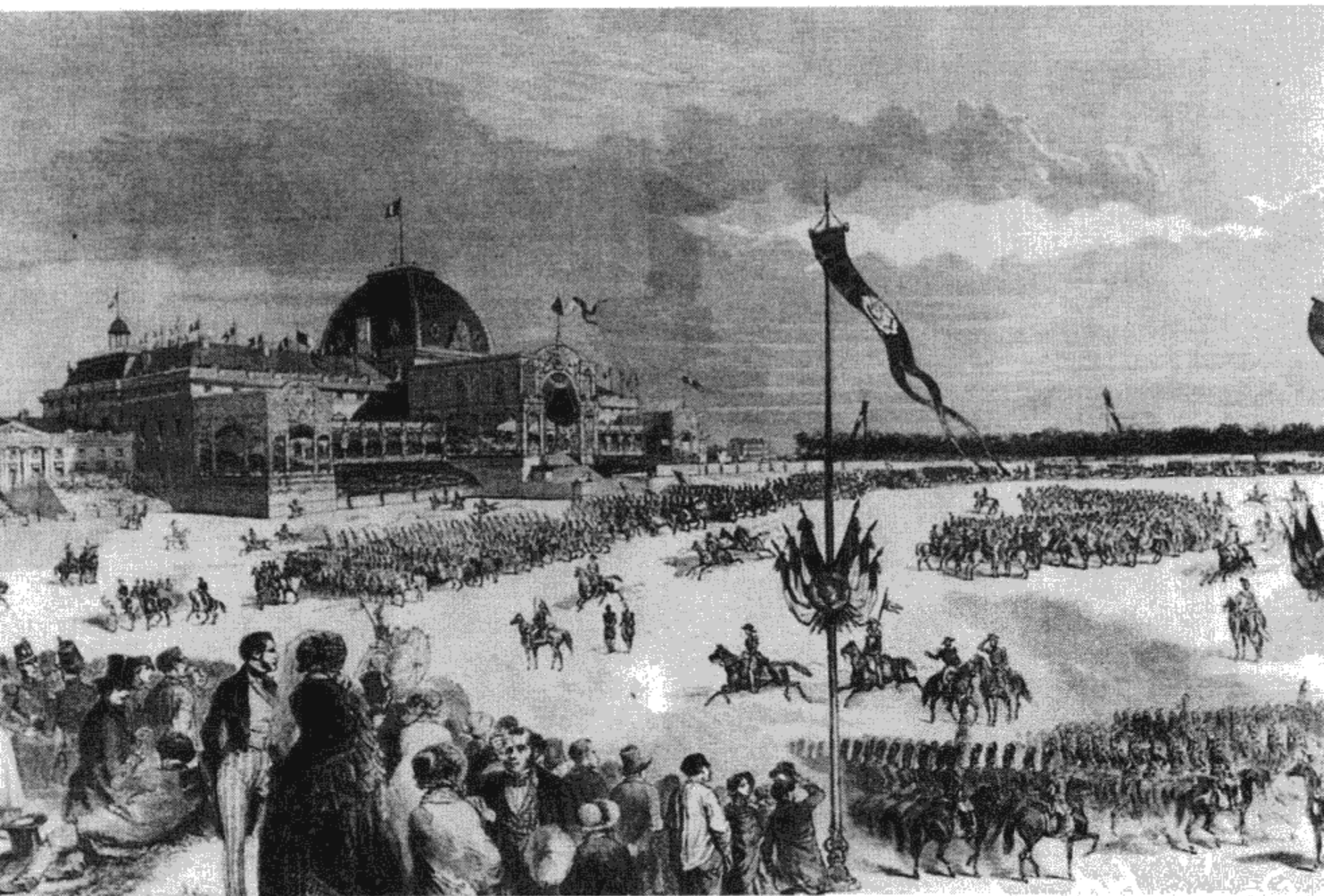
奥斯曼同时进行各层面的工作。运货马车与公共运输工具在新铺的碎石路（有些激进分子认为，之所以换铺碎石路是为了防止他们挖起大砾石来堆栈街垒）上熙来攘往，使新大道成了引人注目的景观。新百货公司与新咖啡馆——往外溢出到新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的出现，使得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疆界变得充满孔隙。有娱乐节目的餐馆、马戏团、音乐厅与戏剧院以及全民歌剧

院的激增，造成民众娱乐的蜂起（第二帝国文化的轻浮与奥芬巴赫[Offenbach]受欢迎的意大利嘲弄剧[以滑稽喜剧的形式出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公园（如布洛涅森林与蒙索公园）与广场（如神庙广场）转变成社交与休闲的地方，这种转变也有助于强调都市化的外向形式，使私人财富展示于公众面前。群众的社交活动因此逐渐转移到大道上，并且受到商业法则与警察力量的控制。

商品本身作为一种景观，其与日俱增的力量的最佳展现处便是新百货公司。于1852年开幕的廉价百货是最早的先驱，紧跟着的则是1855年的罗浮百货（其雏形可溯自1840年代）。这些高周转率的百货公司需要来自巴黎各区的大量顾客，而新大道则促进了人潮的流动。商店橱窗成为引人驻足凝望的引诱物。百货公司内堆置得高耸入云的商品本身便是一种景观。百货公司大门正对着街道，鼓励大众进到百货公司，即使光看不买也照样欢迎。大批接待员与推销员（特具魅力的年轻男性与女性）在百货公司内

FIGURE-072

军事阅兵在帝国场面的建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1852年5月的阅兵仪式预先在正式宣布帝国成立前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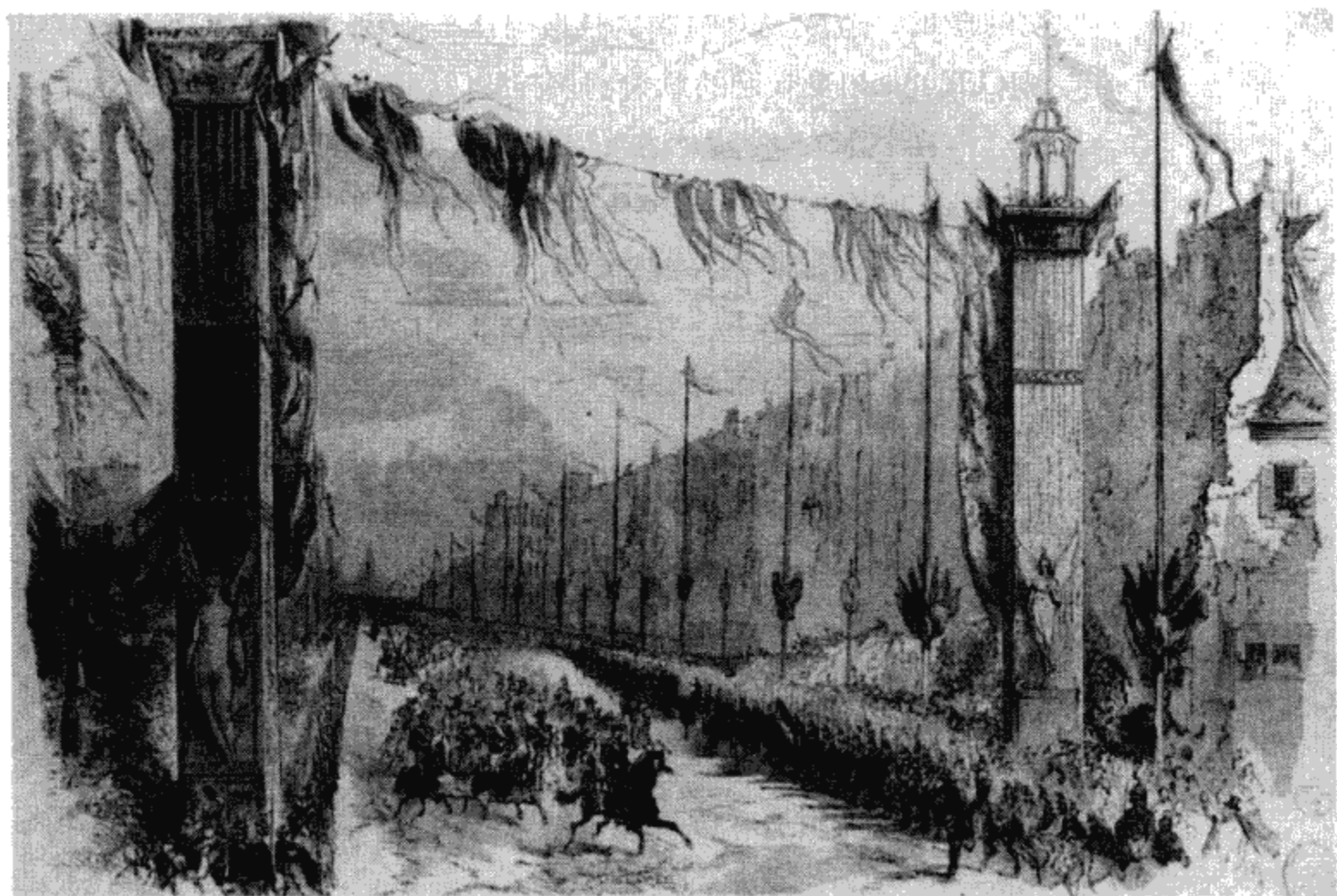


FIGURE-073

大道的落成仪式——1858年的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图，作者不详）与1862年的欧仁亲王大道（下图，托里尼[Thorigny]与利克斯）——也是用来展示的场所。





FIGURE-074

白天到布洛涅森林一游，晚间则前往歌剧院（这两幅画皆出自盖拉尔[Guerrard]之手），只要你付得起，便能享受娱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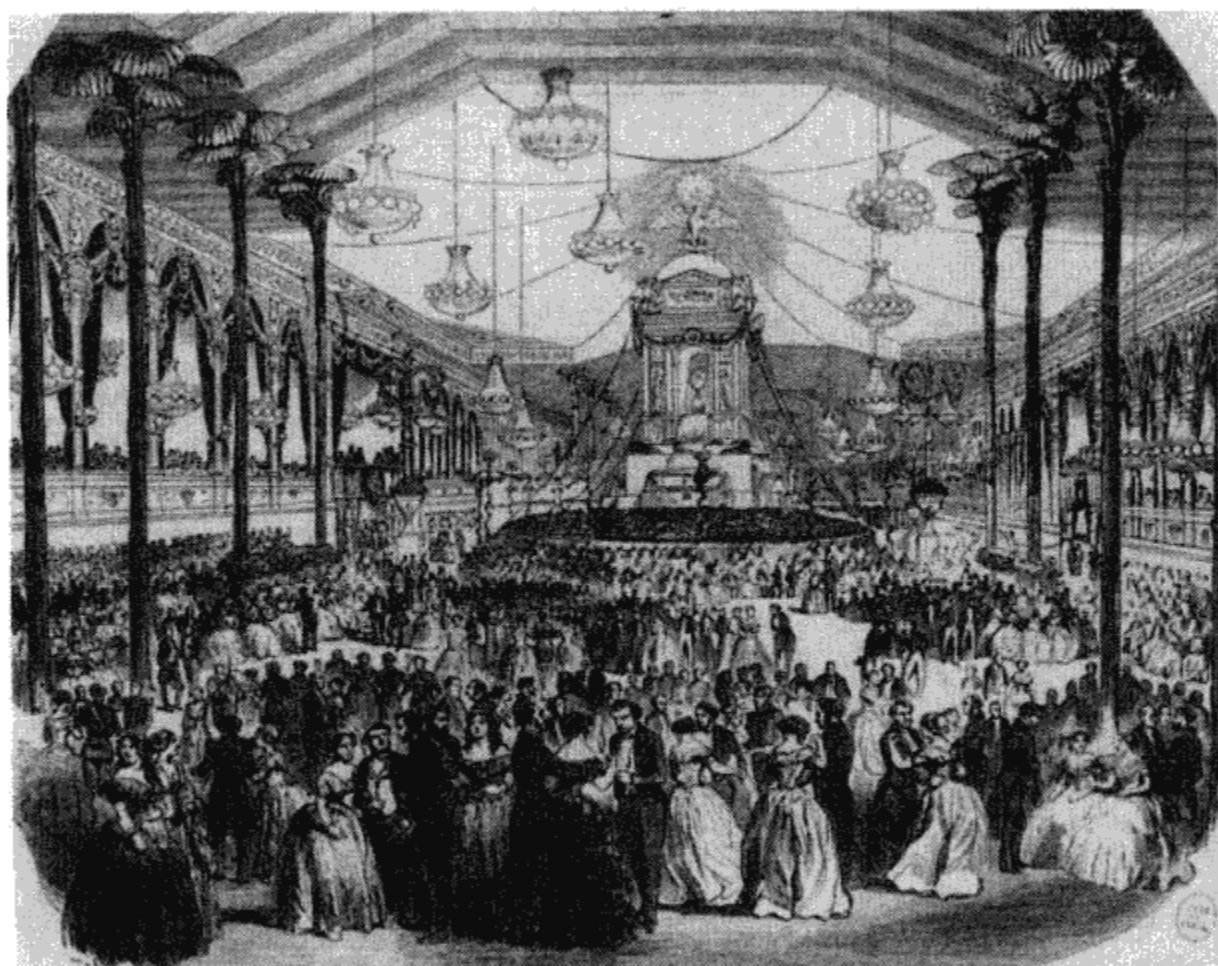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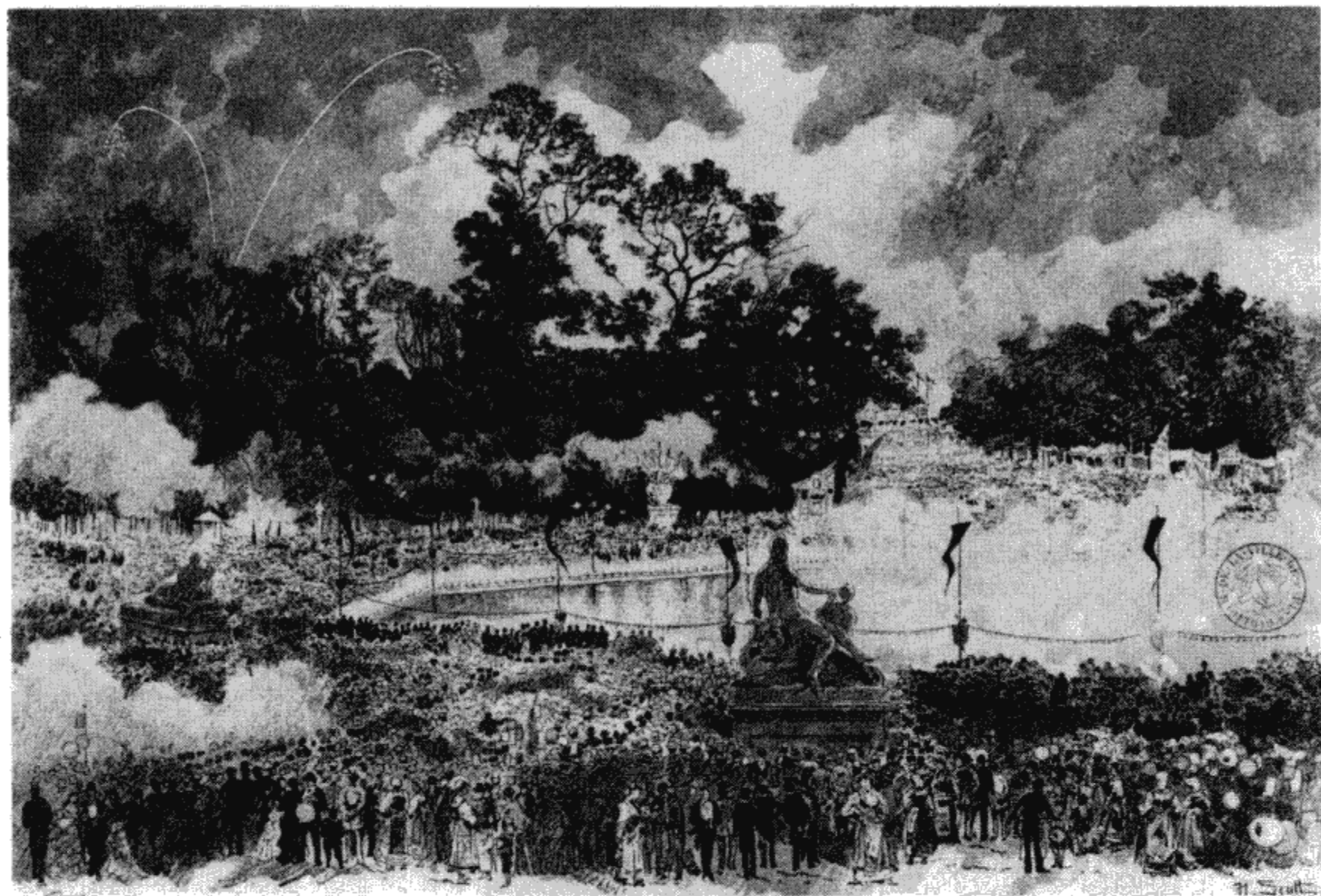


FIGURE-075

节日与舞会通常为庆祝而举办，尤其是在8月15日前后。连巴黎中央果菜市场与英诺森市场（Les Marches des Innocents）的妇女（她们向来同情共和）也在1853年8月组织活动庆贺帝国即将成立。之后，杜伊勒里花园每到8月15日与烟火展示时便挤满了人。



巡行的同时，也试着迎合消费者的欲望。这里面所牵涉的是露骨的性欲。不管此时的女性是担任买家还是卖家，其地位都远较过去来得吃重。穆瑞（Mouret）——左拉怀旧小说《妇女乐园》（*Au Bonheur des Dames*）中的虚构人物，经营一家与廉价百货同一类型的百货公司——向男爵（明显以奥斯曼为范本而创造的人物）解释“现代商业的技术”。穆瑞说，其中最重要的是：

剥削妇女。每件事物最终都将走向剥削妇女一途：周而复始的资本更新、商品累积的体系、吸引人潮的优惠价格，以及使人安心购买的标定价格。为了获得女性青睐，百货公司莫不全力竞争，以各种低价策略与炫目展示吸引注意。百货业者唤醒女性柔弱肉体中的新欲望，巨大的诱惑势必让女性屈膝，先是为家庭而采购，其次为了卖弄风情，最后则纯粹为了欲望而消费。百货公司为了让销售量增加十倍，也为了让奢侈品更普及，摇身一变成了恐怖的经销商，布景助人挥霍，破坏家庭，还吸引人追求最新时尚，哄抬物价……他厚颜无耻地对男爵笑着说：“只要抓住女人的心，什么东西都卖得出去。”<sup>4</sup>

最早出现的引诱方式是橱窗展示（刺激出新一批技术性且待遇不错的就业）。穆瑞被描绘成是“巴黎最好的橱窗装饰者，也是革命性的橱窗装饰者，他在展示艺术上创立了野蛮而庞大的装饰技法”。

早在七月王朝时期，大道就已被确立为重要的公共展示中心，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大道又再度受到重视并且被加以延伸扩大。大道的戏剧性质融合了剧院、咖啡馆与其他娱乐场所中的表演世界，使得大道沿线开展出许多展示资产阶级富裕、铺张浪费与女性时尚的空间。简言之，大道成了商品拜物教统治的公共空间。新铁路运输也促进新休闲形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与外国人出现，而利用周末假日到海边或乡间走走（印象派画家最喜爱的主题，然而杜米埃更为强调的，却是为了前往游憩地点而搭乘过度拥挤的“快乐列车”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也成了广受欢迎的活动。

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以及通过消费所造成的私人占用公共空



间的现象，三者所形成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具关键性。商品景观逐渐跨界支配了公共/私人空间，并且有效地将两者合而为一。当资产阶级妇女的角色随着拱廊街逐渐为百货公司所取代而更加重要时，她们仍无法改变被剥削的命运，尽管这一次她们担任的角色是消费者而非家庭的管理者。对妇女来说，逛街、看橱窗、购物以及在公共空间展示她们的战利品而非将其储藏于家中与闺房之内，乃是出于时尚的必要。妇女自己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尤其当庞大的大蓬裙开始流行时），不仅吸引目光，并且也成了商品与商业（其中散发着一股性欲与性交换的气息）的展览场。这种现象不仅明显抵触了资产阶级对家庭生活的崇拜——将女性拘禁在家中——桑内特（Sennett）认为，它也造成去政治化：



FIGURE-076  
乡间的休闲时光成为第二帝国的生活特征，但杜米埃却批评为了前往乡间而必须竞相搭乘过度拥挤的火车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注意这幅画与印象派画家典型呈现的平静景象之间的对比。

218

资本主义秩序具有一种力量，能让外表看来坚实的物质陷入充满问题与“神秘”的状态之中……在“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观察与表达——从人们想买什么、思考什么与赞同什么的角度来看——并非来自持续互动，而是由一段时间的被动、沉默与专注所造成的。对照之下，“私人空间”所意味的则是与他人接触后能直接表达自我的世界，私人空间意指一个由互动统治，但互动必须秘密进行的世界。<sup>5</sup>

然而，私人形象在一些重要的面向上反映了公共世界，即使其所反映的是完全颠倒的形象。举例来说，波德莱尔就充分认识到景观对内在心境的影响。“在某种近乎超自然的内心状态中，”他写道，“生命的深处几乎完全显露在我们眼前的景观中，不管有多平常，而景观也成了内在心境的象征。”<sup>6</sup>

这些消费者是从哪出现的？机械化的逐步开展（例如缝纫机的出现），原料成本的降低，生产与消费效率的改善以及劳动力剥削率的提升，使得许多商品（尤其是衣服）的价格下跌。这使某

些产品的消费者基础扩充到下层中产阶级乃至收入较多（或单身）的工人。旧有的区隔依然存在——托尔托尼咖啡馆（Tortoni's）与意大利大道主要仍聚集着上层资产阶级，神庙大道则是焦虑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由金钱民主制撑腰的广大消费者主义则在同时间于各处增生，有些空间（例如香榭丽舍大道）因此变得一团混乱。尽管巴黎市内住宅生态区划得更加分明，但外在空间——大道与公园（例如杜伊勒里）——的混杂仍难以控制。公共空间治安的维持也变得困难。高尚妇女与放荡女子间的界线需要更严密的监视才能厘清，而街头生活的政治活动——街头音乐家与小册子作者——也成了大量警察活动的焦点。在公共空间中，景观与商品化的狂乱面具背后，油然而生一股不安全、脆弱、资产阶级焦虑以及混乱的感受。

FIGURE-077

讽刺画家卡姆以碎石路取代大砾石路为主题。画中的妇女小心翼翼地将挖开的大砾石堆在路边，“打算日后有需要时可以用来堆筑街垒”。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思考波德莱尔散文诗《穷人的眼睛》（*The Eyes of the Poor*）是如何表现这股焦虑。<sup>7</sup>波德莱尔劈头就问他的爱人，她是否了解为什么他突然间如此恨她。在过去这一天中，他们极为亲密地分享彼此的想法与情感，仿佛两人已合而为一。之







FIGURE-078  
大蓬裙的流行时尚使杜米埃有许多机会做出幽默的评论。

后到了晚间：

你想到新大道转角处那家新开的咖啡馆前面坐坐。它的店面虽然还堆置着碎屑，却已自豪地展示出即将完成的风采。这是家令人目眩神迷的咖啡馆。初次点燃的煤气灯散发出热气，将墙壁照得雪白耀眼，广袤的镜面、金色的墙沿装饰线……仙子与女神头上顶着成堆的水果、馅饼与野味……所有历史与所有神话都是为了迎合贪食。

然而此时他们在街上看到一个胡须斑白年约40岁的男子，带着两个孩子，衣衫褴褛地凝视着咖啡馆，眼神充满对美的赞叹。父亲的眼睛说：“贫穷世界的金子大概全跑到这些墙壁上了。”而小男孩的眼睛则说：“不过这种房子只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才能进去。”男孩凝视的眼神充满了敬畏。波德莱尔说：

作曲家说，愉悦使灵魂高贵，使心肠变软。就我而言，那一晚的曲子正是如此。我不仅被那个家庭的眼睛所打动，也为我们享用着远逾解渴所需的醇酒感到些许羞惭。我将目光转向你的双眼，亲爱的，想从中读出我的想法；当我注视着你那深邃的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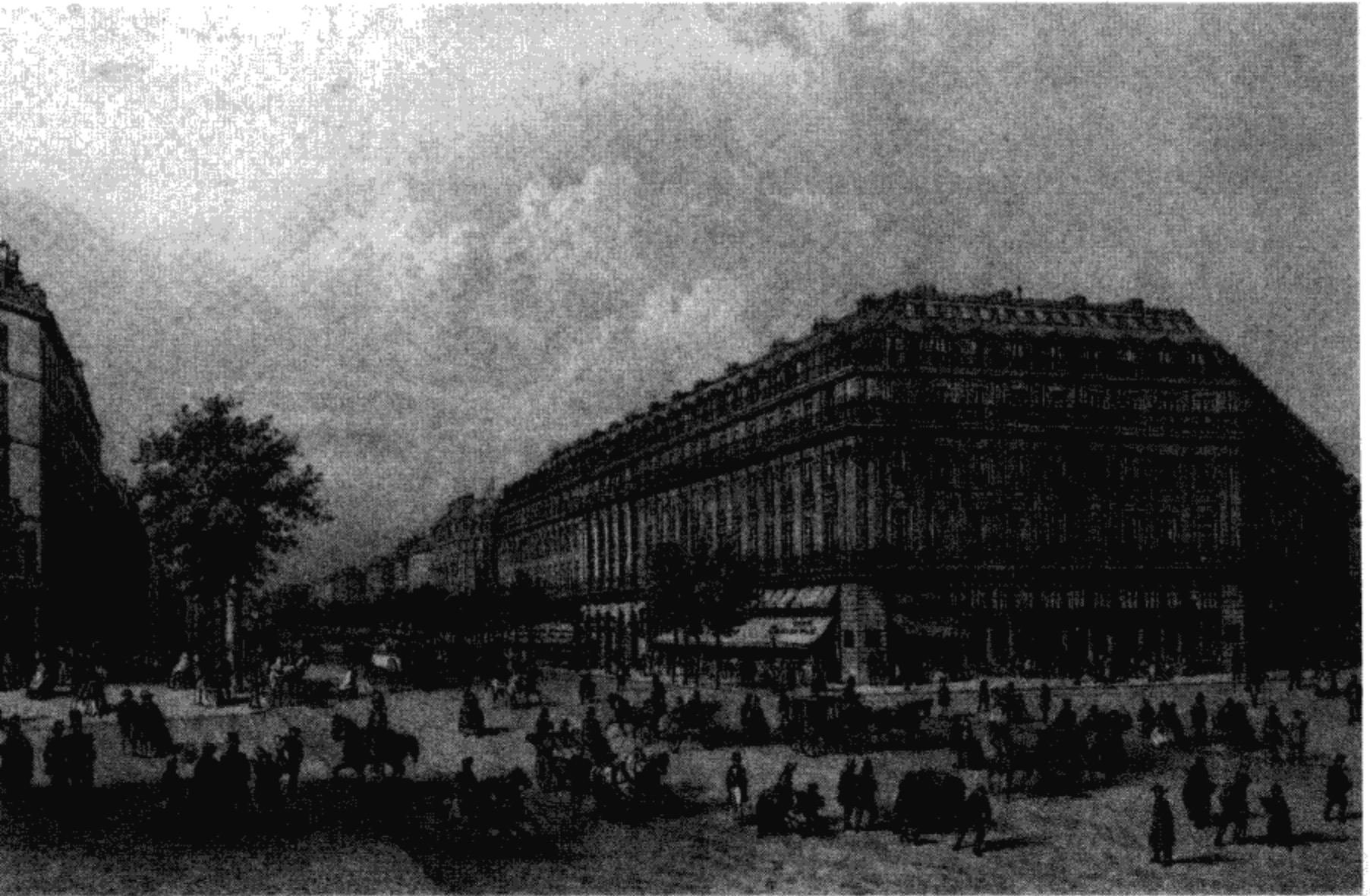


FIGURE-079

大道生活——著名的托尔托尼咖啡馆附近(盖拉尔所绘), 与新式大饭店(作者不详)附近——成为消费者主义式都市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取得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如此美丽而柔和，那对绿色的眼珠，善变的源头，月神掌管之地，你说道：“那些人睁大了双眼，实在令人感到难堪。你能不能叫老板赶走他们？”

“你可以发现，”波德莱尔做出结论，“我的小天使，要了解另一个人有多困难，想法有多么难以传达，即便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221

新大道的公共空间提供了环境，但其性质则部分须通过商业与私人活动，使其增添光彩与向外扩展才能获得。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疆界被描绘成多孔隙的。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显示了所有权、美学与社会关系上的模棱两可，以及公共空间控制上的争论点。波德莱尔的爱人希望有人能主张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咖啡馆本身也非纯粹的私人空间：只有经过选取，为了商业与消费目的的公众才能进入。贫穷的家庭将咖啡馆看成是一个排他空间，这个空间从穷人身上撷取黄金并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贫穷的家庭对此无法置若罔闻，但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如此也使得咖啡馆无法对他们视若无睹。波德莱尔视他们为现代性景观的一部分，象征构成巴黎的“数千流离失所的生命”。他珍惜这份差异与混合。但波德莱尔的爱人却希望将这些穷人赶走，正如卡芬雅克在1848年六月事件中清除大道上的革命分子一样。她借由隔离来追求安全与排除。

克拉克坚持主张，景观“绝非是一个安全置放于场所中的景象，它是一种对世界的叙述，并且总是与其他的叙述方式进行竞争，有时则会遭遇不同而顽固的社会实践形式的抵抗”。<sup>8</sup> 克拉克认为，奥斯曼化未能“将混乱的叙述与社会区分的叙述合而为一，也（未能）将其中一个形式绘制于另一个形式之上”。这些失败在《穷人的眼睛》中被完全凸显出来。商品化与景观的社会控制（“所有历史与所有神话都是为了迎合贪食”）遭遇到剥削穷人的清楚象征，因而引发了愤怒（“赶走他们”）或罪恶感（“我为我们享用着远逾解渴所需的醇酒感到些许羞惭”）。资产阶级在景观中所产生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相当明显。有部分的焦虑反映出，新阶级区分的出现，其基础在于消费与外观而非生产关系。阶级区分比以往更明显，而随着日常生活开始仿效那些掩人耳目的舞会或嘉年

华会所展示出来的外观，伪装也变得比现实重要。“脸孔被服饰所遮蔽，感情被景致所掩盖。”龚古尔（Goncourt）写道。<sup>9</sup>

这些现象对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认同影响如何，我们只能做出一些猜测。然而我怀疑桑内特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他认为自我在公共领域中的呈现取代了表述，而自我的呈现越来越被转化为商品化与景观。结果，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神秘化。在景观中，几乎没有人扮演主动的角色。因此，当个人成为景观的担负者（如果只是作为时装模特儿）时，公众人物便成了参与者；当个人所担负之物（亦即商品）比个人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更为重要时，个人就是被动的。同样，资产阶级往家庭生活退缩的现象也更为明显，因为在家庭里，也唯有在家庭里，才能获得亲密、信任与真实性。然而这么做的代价却是极度的隐秘、孤立与对暴露的持续恐惧，更甭提资产阶级妇女所面对的庞大压力——她们必须遵守新的要求，一方面成为商品价值的担负者，另一方面则必须守护资产阶级家庭所仅存的亲密与温暖，并且在这两者的矛盾中游移观望。

222

广大的工人群众必须在别处生活消费，他们大部分注定要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并且面对极不稳定的就业条件。男性移民人口大部分都到小饮食店吃喝，至于找乐子则到咖啡馆、舞厅、有娱乐节目的餐厅与酒馆。工人阶级的咖啡馆后来转变成巴尔扎克所说的“人民议会”——工人区知名人士聚集的地方——在第二帝国时期受到大量的管制与监视。然而咖啡馆数量无情的增长（从1851年的4000家到1885年的4.2万家），确保了它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上急速扩充的重要性。“咖啡馆也许对许多工人的生活来说是最稳定而可接近的空间。”妇女与家庭并未被排除在咖啡馆外——许多结婚仪式是在咖啡馆举行（老板当证婚人）。因此，咖啡馆或酒馆在工人阶级生活中扮演了制度、政治与社会的角色。工人“虽然经常更换居住地点，却总是待在同一地区，并且总是光顾同一家咖啡馆”。简言之，工人阶级的连带关系是借由咖啡馆或酒馆为中心而以邻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sup>10</sup>同样，对工人阶级妇女来说，1850年代后激增的洗衣店也成了社会互动、亲密与连带关系、传递八卦及偶然冲突的中心（这类场所在左拉《酒店》中有生动的描述<sup>11</sup>）。



比较幸运的男性工人过着相当不同的生活。他们集中在市中心，以小规模的商店作为社交、政治讨论与玩乐的中心（经常玩乐过度，引起当时评论家如普洛的抱怨）。这些地区昏暗肮脏的私人与商业空间，让公共空间蒙上一层阴影，而无产阶级街头生活的混杂骚乱，无法让居住于安全世界的焦虑资产阶级感到安心。这样的空间令人畏惧，而大多数资产阶级坚决避开这些地方。第二帝国当局试图进行管制，但成效不彰，住宅的缺乏与狭窄的环境，使得街道与咖啡馆在工人阶级区成为受仰赖的社交中心。

第二帝国起初极为强调帝国景观，但随着时光流逝，商品景观却逐渐占了上风。并不是每个人都欣赏这种变化。有一点名望的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以长文严厉抨击这些商品景观，并且辱骂女性在被卑劣的商品诱惑包围时所表现的软弱。龚古尔兄弟也同样感到惊骇，埃德蒙（Edmond）在1860年的日记中写道：

223 我们的巴黎，我们的出生地巴黎，充满1830年代与1848年风俗的巴黎，正在消失当中。从物质上来说，巴黎并没有消失，消失的是它的道德。社会生活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变迁。我可以看到妇女、孩子、丈夫与妻子，全家在咖啡馆中。家庭正濒临死亡。生活正面临公共化的威胁。上层阶级聚集的俱乐部，下层阶级聚集的咖啡馆——这便是社会与平民最后走上的道路。这种状况使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精神祖国中巡行的旅人。对于将来与现有的一切，我感到陌生，举例来说，新建的大道完全失去了巴尔扎克世界的气息，只让人联想到伦敦或未来的巴比伦。<sup>12</sup>

面对与日俱增的大道商品浪潮，如何才能让自己区别于这群广大而不安的购买者？波德莱尔着迷于群众中的某个男子，本雅明对此做了极为出色的分析——漫游者与纨绔子弟，在群众中随波逐流，神情显得相当陶醉——并且提供了相当有趣的男性参考点。<sup>13</sup>上升中的商品与金钱流通浪潮不可能消退。群众与金钱流通的匿名可以隐藏所有个人的秘密。在群众中不期而遇可以让我们看透拜物教的性质。而这就是波德莱尔细细品味的时刻，虽然他仍存在着焦虑。娼妓、拾荒者、赤贫而净耍老把戏的老小丑、衣



衫褴褛的老头、美丽而神秘的女郎，都成了都市戏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波德莱尔惊讶于在公园所看到的景象：“很难不被这群病弱的人口景观震慑住，他们吞咽着工厂的灰尘，呼吸着棉絮，身上的组织弥漫着白铅、水银以及为制造杰作所需的各种毒物。”<sup>14</sup>至少对寻欢的男性资产阶级来说，波德莱尔在不期而遇中重构了被金钱所碰触的各种双手，其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不安全感成了某种耽溺之物，而非畏惧之物。

然而在景观所促成的统治文化与和平景象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不平静的迹象。举例来说，当路易·拿破仑邀请各行各业的工人集体向他报告，对1867年万国博览会所展示的各项新科技奇观有何印象时，工人并未对当中的景观感到印象深刻，相反，他们向路易·拿破仑指出劳动与技术的堕落，以及产品质量的低劣。工人的结论是，最好能组成工人社团（这个神奇词汇此时又再度出现），辅以新科技，才能改善效率与劳动条件。人们此时也想起了博丹——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于1851年政变的街垒中被毫无意义地射杀——他们四处奔走，以募款的方式为博丹竖起了一座纪念碑，此举反映出一般民众对奥斯曼强加的帝国纪念性建筑的不满。与此同时，在某处安放自由神像的提案也首次被提出，这是一个极富政治意涵的动作。更糟糕的是，只要是与1848年或1851年抗争有关的人士过世，其丧礼往往演变成盛大的政治集会，人们往往在墓旁发表激昂的送葬演说。而当路易·拿破仑的侄子在1869年的争论中杀害共和派记者维克托·努瓦尔（Victor Noir）时，出席葬礼的民众至少有2万人。当从拉谢兹神父墓园与从贝尔维尔返家的群众汇聚成具威胁性的景观时，已预示了对政权的不满与革命的可能，此时象征的秩序也逐渐反转过来攻击自己。戏剧性质与景观是双方都可论述之物，随着帝国的衰微，景观的重心不只转向商品，也转向政治反对。

224

# 共同体与阶级

225 公社因此是根杠杆，可以将阶级存在与阶级统治所仰赖的经济根基连根拔起。

——马克思

个人培养了比金钱个人主义所给予更为广泛的忠诚，也忠于家庭与亲族。阶级与共同体正代表了这两种较为广泛的社会形貌。到了现代，人们倾向于将阶级与共同体划归两种互不相容的范畴，这两种范畴形成彼此敌对的意识与政治行动形式。然而奇怪的是，巴黎却未出现这种敌对现象，过去如此（见第二章），第二帝国时期也是如此。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阶级共同体与共同体阶级的观念，这并非意识形态的错乱，相反，这些观念有其真实的物质基础。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显然不只认为共同体与阶级是彼此兼容的范畴与身份，还认为两者的综合是任何进步的文明社会都必须努力达成的理想。这是1840年代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而社团观念——工人运动以及圣西门理想（金融资本实践的根基）的根本——不是忽视就是混淆共同体与阶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随着第二帝国的进展，共同体与阶级的概念与现实也历经快速的变迁。奥斯曼的工程以及巴黎土地与房地产市场的转变、颠覆了传统共同体的观念以及社会空间结构，金融结构与劳动过程的转变对阶级关系的物质基础也造成不小的冲击。唯有混淆阶级与共同



FIGURE-080  
杜米埃以火车车厢的阶级区分显示阶级的面貌。

体的区别，才能将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缔造巴黎公社——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阶级暴动。

227

这种做法当然惹来争议。古尔德 (Gould) 认为巴黎公社与阶级无关，并且主张这场反抗国家压迫并为市自治体争取自由的斗争，其精神完全来自共同体。多年来已有许多人尝试要将法国的革命传统“自治体化” (municipalize)。<sup>1</sup>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科布 (Cobb)，他反对索布尔 (Soboul) 所认为的 1789 年革命是由阶级发起的看法，另外还有卡斯泰尔 (Castells)，他放弃自己原先持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中转而将巴黎公社诠释成都市社会运动。此外，还有许多研究 (如弗格森) 强调巴黎的革命传统是社会力量的展现，主导了整个政治与文化变迁。与此相反，我将主张阶级与地方、邻里乃至于共同体混同的现象已有很长一段历史。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承认共同体在形塑阶级连带上具有重要性，这明显犯了严重错误。同样的道理，有人认为共同体连带与阶级毫无关系，这也是一种盲目。阶级与阶级意识在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中留下了痕迹，至于阶级定位则可从消费模式与生产关系中看出。

---

## 阶 级

---

多马尔重建了 1847 年巴黎人的财富状况，以社会经济范畴生动描绘出财富分配 (表八)。<sup>2</sup> 其中主要可分为四个族群。最顶端的是上层资产阶级，包括了企业人士 (商人、银行家、管理者与一些大规模工业的实业家)、地主士绅与高级公务员。这个阶级只占了总样本人口的 5%，却继承了 75.8% 的财富。下层阶级 (由最底层的四个范畴所构成) 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却只拥有 0.6% 的财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上层中产阶级，如公务员、律师、专业人士与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领取退休金者与靠利息维持生活者。我们之前提过的店主原本是上层中产阶级的骨干，但在整个社会比重上却逐渐走下坡 (人口比重差不多，但财富比重却从 1820 年的 13.7% 降到了 1847 年的 5.8%)。不过店主还是比下层中产阶级如雇员、下层管理人员 (主要是白领) 与独立营业者 (主要是手工工人与工匠) 高一个等级。阶级结构中的财富分配极为悬殊。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检视这个阶级结构。首先马克思所说的“城镇与乡村的古老对立，以及资本与地产的敌对”，明显出现在这个结构之中。乡村士绅与公务员在当中之所以占有不成比例的重要性，主要与巴黎在法国所位居的中心地位有关。农民阶级并不是那么显著，但却随处可见，他们不只是巴黎可资运用的劳动力后备军，同时也是政府税收的来源与地主可任意消费的非劳动所得。近十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七成以上的财富，并且仰赖非劳动所得维持生活。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实际需求，巴黎产业本身适足以满足这些需求。“闲散富人”或“消费阶级”的支配地位，以及受到夸大的公务员角色，对巴黎的生活、经济与政治有着重大意义。我们发现只有五分之一的高级资产阶级从事经济报酬活动，这深刻影响了资产阶级的行为、社会态度与内部区分。

表八 依社会经济范畴区分的财产继承状况，1847年

范畴	每名死者平均 遗产价值指数	无遗产者 所占百分比	死者人数 所占百分比	总财原 所占百分比
企业(商业、金融等)	7,623	26.3	1.0	13.8
地主	7,177	8.6	3.7	54.0
高级公务员	7,091	13.0	0.6	8.0
自由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	1,469	39.4	2.0	5.6
中级公务员	887	16.9	1.7	3.2
靠利息、租金与退休金维生者	709	38.2	5.7	8.3
店主	467	35.7	6.1	5.8
国家与私人雇员	71	52.8	2.7	0.4
家庭代工	61	48.5	1.8	0.2
神职人员	15	75.9	0.4	0.1
仆役	13	81.6	6.9	0.2
无法归类(各色各样的工作)	4	79.2	29.1	0.1
工人	2	92.8	30.2	0.1
手工工人	1	80.5	8.1	0.0
总计	503	72.6	100.0	100.0

注：我整合了各种不同图表的小门类，应该不至于影响整体景象。

资料来源：Daumard (1973)，页196—201。



广大下层阶级（占了多马尔 1847 年样本的 74.3%）的内部区分相当难以辨识。手工工人、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临时工人与家庭帮佣之间的差异显然可以作为内部区分的标准，不过普洛后来比较倾向于以工作态度、工作技术与纪律（表九）来做区别。当时的人最在意（带着相当大的恐惧）的是社会区分中争论最大的部分：即如何区分劳动阶级与“危险”阶级。1848 年以前，许多资产阶级将这两者混为一谈。<sup>3</sup>1848 年的工人运动界定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现实状态，但还是无法驱除资产阶级的幻影。尽管如此，至少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开始能对广大群众做出区别：街头小贩、拾荒者与清道夫、街头音乐家与变戏法的人、供人差遣的僮仆与扒手、家中或作坊中的临时工。对奥斯曼来说，这些人是巴黎“真正的流浪者”，他们不断更换工作，居无定所，对自治体毫无情感或忠诚度。对梯也尔来说，这些人是所谓的“卑贱之民”，他们把堆筑街垒与推翻政府当成闹剧或嘉年华会。马克思理所当然站在同情的立场。“流浪汉、退伍军人、出狱囚犯、脱逃船奴、诈欺犯、江湖郎中、游手好闲之徒、扒手、骗子、赌徒、皮条客、鸨母、挑夫、说书人、手风琴手、拾荒者、磨刀匠、补锅匠、乞丐”——“他们是渣滓、废物，无法被归类为任何阶级”——他们的面孔模糊、行事散漫，是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也是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时重要的支持力量。<sup>4</sup>

当时的观察家科尔邦试图从这些对比中找出一些戏剧因子。<sup>5</sup>“无用的阶级”只占了下层阶级的五分之一，当中有许多人就像拾荒者一样，由于太贫穷而变得被动又“无侵犯性”（除非有人笑他们穷）；他们未受到社会化，无法从事固定劳动，几乎无法进行生产与消费，同时缺乏智能、野心或对公众事务的关注。这个“堕落的”群体既无能又顽固，但他们终究不同于少数具有侵犯性的“危险阶级”，后者经常出现在雨果、休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立场各异的分析家如梯也尔与马克思也赋予“危险阶级”突出的政治影响力。与现在相同，当时的人面对如何界定“边缘性”或“非正式部门”，以及这两者的经济与政治角色的问题，一直充满了争论与混乱。由于就业的不稳定，“流落街头者”与工人间的界线势必充满了孔隙。为数众多的妇女受困于贫穷之中，被迫在街头营生，这使得最底层的人口增添了不少女性比重（往后我们将看到，

除了对革命的恐惧外，又穿插了对性别的恐惧)。尽管如此，流落街头者——不只在巴黎市内营生——仍是巴黎经济、生活与文化的重要力量。

下层阶级与位于下层阶级之上的社会经济群体，其间界线也因社会与经济的不稳定而出现混淆与孔隙。雨果曾经评论说，“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夹着一个含混不清的社会层次，其组成分子来自底层上升的卑贱之民与从上层降下的有教养人士，并且结合了两者的最糟糕的特质，既未保有工人的慷慨也未保有资产阶级高尚诚实的品格”。<sup>6</sup>许多店主（如我们所见，整体来说，店主的地位正急速衰微）濒临破产边缘。他们债务缠身，被迫以欺骗、节省的手段来保住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店面。店主无情地剥削上门的顾客，而为了改善经济，他们也不排除参与革命。许多工作坊主人也面临类似的处境。1848年时，大型工厂还相当罕见，生产时资本与劳动直接对立的物质条件还未充分显现。居巴黎产业主流的小型作坊，其工人与师傅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他们通常紧密结合构成同情与合作的纽带关系，工人与师傅之间并非只有日常的敌对关系。<sup>7</sup>工人与师傅都憎恨新式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与转包的“服装业”体系，他们自觉受到高级金融业与商业的压迫，因此对闲散的富人抱着敌视与嫉妒的态度——如普洛所抱怨的，富人必须仰赖胼手胝足工作维持生活的工人来帮他们积聚财富，但富人却对工人既嫌恶又轻视。在新式生产过程与债务的威胁下，态度激进的小作坊师傅资产阶级，在巴黎政治生活中具有比资本主义实业家更为重要的地位。

资产阶级内部也显现出一些混淆。所谓的“放荡不羁者”（La bohème）不仅只是那些装模作样、一贫如洗地过着放荡生活的年轻大学生。“放荡不羁者”真正的组成分子其实是那些异议的资产阶级，他们通常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希望当个作家、记者、画家与艺术家——以资产阶级的失败为名借题发挥，嘲弄资产阶级生活与文化的呆板无趣。库尔贝的咖啡馆朋友比其他层次的资产阶级更类似普洛口中的“高尚”工人。这种阶级界线混淆的状况，因大量大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外省，并且通常只仰赖微薄的零用钱过活）的添入而更形模糊。这些人对传统乃至资产阶级文化抱着怀疑、轻视的态度，并且也对其怀有野心，他们协助巴黎成为

表九 普洛 1870 年巴黎工人分类简表

	真正的工人	工人
工作习惯与技术	技术工人，并不总与“高尚者”(sublimes)一样能干——他们尽力满足雇主的需要以取得晋升。他们愿意在夜间与星期日工作，并且星期一决不缺席。他们不会因同事、朋友或家庭而离开工作岗位。	不具备应有的技术，但愿意在夜间与星期日工作并且星期一决不缺席。他们的工作动机完全来自赚取工资。
饮酒与社交活动	“节制饮酒的模范”。他们决不醉酒，并且懂得克制脾气或悲伤。他们从工作中找到慰藉。他们拒绝工坊中的同事情谊，同事们也因此不会理他们。	他们偶尔会喝得“酩酊大醉”，但通常是在星期日的家中。他们很少跟同事喝酒，因为他们的妻子不准。
婚前生活	他们宁找妓女也不愿勾搭良家妇女，结婚之后也不会在外头讨小老婆。	他们到处与洗衣妇、女仆等人上床。而为了节省租金，他们也选择与师傅同住。结婚之后，他们通常会跟情妇分手，而妻子多半来自同乡。
经济状况	这类工人的经济状况最好，有积蓄，参与互惠协会，并且将“高尚者”从协会中排除出去。他们的妻子通常担任公寓管理员或小零售商。	他们有时有多余的钱可以还债。他们的妻子通常担任公寓管理员或小零售商。
家庭生活	他们是一家之主，认为妻子先天上比他们低等。他们严格区隔家庭生活与工作生活。	通常由妻子掌管全家事务，丈夫的交友状况与行为举止通常受到妻子的控管。
政治	他们是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反对帝国与社会主义。他们接受善路鲁东的观点，“希望能公正地取得所有权”，并且希望能结合资本与劳动。他们阅读共和派的反对报刊，很少参加政治集会，反对乌托邦构想与煽动行为。他们捍卫共和国，但却受到社会主义者的轻视。	他们并非真的了解社会主义说词，并且拒绝较为前卫的理念。他们喜欢参与公共集会，并且容易受到煽动。

混合工人	单纯的“高尚者”
<p>技术水准最低，能力不足以指导他人。别人怎么做，他们就跟着怎么做，有时候星期一会跟别人一样不来上班。</p>	<p>技术工人，具有领导团队的才能，但经常将“剥削”雇主当成自己的职责。他们宁愿辞掉工作也不愿意服从严格的纪律，因此经常游走于各个师傅之间。他们星期一总是不上班，并且拒绝在星期日与夜间工作。</p>
<p>他们喝醉的地点大多是在家中，但也会跟同事喝酒，者是利用发薪日、星期一早晨与集体活动时喝酒庆祝。</p>	<p>每两个星期至少会有一天充分放松饮酒，通常星期六与星期一会喝个大醉，但星期日会用来陪伴家人。</p>
<p>他们要么是单身住在出租公寓里，就是娶了唠叨的妻子……或走上“高尚主义”。</p>	<p>他们要不是单身住在出租公寓，就是与人拼居。他们结婚是为了确保有子女能照顾他们的晚年生活。</p>
<p>他们一直有入不敷出的问题。</p>	<p>经济一直有困难，过一天算一天。经常负债，并且背上拖欠债务的恶名。妻子通常也是工人。</p>
<p>妻子就像警察一样令丈夫感到畏惧。妻子牢牢掌握了家中开支，并且成了工人与“高尚主义”交流的主要障碍。</p>	<p>如果妻子具有“资产阶级”态度，那么夫妻间势必出现许多冲突。妻子如果没工作，就只能向社会福利求助才能生存。至于有工作的妻子，她对雇主与工作的态度往往受到丈夫影响，夫妻两人对外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态度。</p>
<p>他们追随“上帝之子”(sons of God)的理念，并且阅读“上帝之子”推荐的读物。他们经常参与公共集会，并且完全顺从领导者理念。</p>	<p>每到发薪日，他们就想到社会主义，认为自己受到雇主与房东的剥削，并且视雇主与房东为窃贼。他们有时会参加公共集会，几乎总与“上帝之子”为伍。</p>

表九 普洛1870年巴黎工人分类简表(续)

	真正的“高尚者”	“上帝之子”和高尚者中的高尚者
工作习惯与技术	只有杰出技术的精英工人，由于拥有不可或缺的技术，使他们敢公开违背雇主而不用担心遭到报复。他们通常一星期只需工作三天半就能维持生活。	具有最强的领导能力及个人影响力，能够带领整个生产团队。他们组织集体的抗争行动对抗雇主，并且掌控了生产节奏。高尚者中的高尚者绝不顺从工坊纪律，他们在家工作，但却是倡导工人抵抗的先知。
饮酒与社交活动	简直可以称之为酒鬼，他们不喝酒就无法工作，也无法生活。	只有在节庆以及与朋友、家人相聚时才会喝醉。他们喜欢喝酒与讨论政治，但比较起来，他们对政治的沉迷更甚于醇酒。
婚前生活	他们小心维护自己的自由，并且独自居住或采取自由婚姻的形式。他们结婚只是为了拥有子女，好让自己晚年时有人照顾。	他们一直扮演“唐璜”(Don Juan)的角色，直到快四十岁为止，他们毫无顾忌地引诱工人下属的妻子与女儿。他们晚婚，并且生育子女以确保自己晚年有人照顾，但他们通常采取自由婚姻的形式。妻子通常也有工作。
经济状况	总是经济困难，并且缺乏资源养家，即使另一半也投入工作，生活也难以改善。	经济状况并没有那么困难，但就是不愿偿还拖欠零售商或房东的借款。
家庭生活	如果妻子并非如丈夫一样是个“高尚者”，夫妻之间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伴随而来的将是大量的暴力、酒后殴打与争吵。如果妻子是高尚者，那么夫妻在许多方面将可达致共识。妻子会“到外头做事”，并且毫无顾忌地伤害剥削者的利益来抚养自己的孩子。	随着丈夫年龄渐长并且活力渐失，妻子的控制力也与日俱增。
政治	他们几乎不谈政治，绝不阅读或参与公共集会，但他们仍专心聆听“上帝之子”的政治评论。	他们追随“上帝之子”的理念，并且阅读“上帝之子”推荐的读物。他们经常参与公共集会，并且完全顺从领导者的理念。

注：本表摘自里夫金与托马斯(Rifkin and Thomas, 1988)页104—111的完整分类。



“一座巨大的观念实验室”与乌托邦构想及意识形态的大厅。<sup>8</sup>这些人相对来说较为贫穷，因此被迫与街头民众及工人产生一些接触，并且熟知店主与放高利贷者的贪婪。他们形成革命阴谋的核心（如布朗基分子），活跃于第一国际，并且可能在左岸发动一场自发性的抗议运动。除此之外，这些人通常会与心生不满的“放荡不羁者”合流。资产阶级内部强大的异议运动——这个运动有时包括了相对富裕的律师与专业人士以及成功的作家与艺术家——其根源便在这些人身。

这个阶级结构在第二帝国时期曾经历一场转变。虽然缺乏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比较，但绝大多数的观察家都同意，如果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有任何变化，其转变的方向绝对是倾向贫富差距扩大。然而，各阶级内部也出现重大变化。企业活动（银行业、商业、有限公司）在上层资产阶级内部变得更为重要，上层资产阶级不仅吸纳了热衷圣西门观念的高级公务员（如奥斯曼），还吸收了一部分的地主阶级（他们将资金分散到股票市场与巴黎房地产，因此获得比停滞不前的农村地租更高的收益）。随着派系（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佩雷尔兄弟）间的敌对日渐加剧，传统房地产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商业与工业之间的区别。1870年时，上层资产阶级内部的区隔不下于1848年，但其区隔的方式却沿着完全不同的路线展开。

233

工人阶级内部也有类似的重大变化。劳动过程与工业结构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大型产业如印刷业、工程业乃至商业（大型百货公司）的兼并，使得工作场所中劳动与资本的对峙更加直接而严峻，这可从1862年印刷工人罢工与1869年商业工人罢工看出。手工工作遭到重组与去技术化，加深了小作坊师傅与无数中介业者的外来支配感（他们控制着高度零碎化的生产体系）。1867年裁缝师与青铜工人罢工，1869年制革工人与木工罢工，以及1870年卡伊（Cail）铸铁工人罢工，这些事件显示资本与劳动的对峙正不断升温，甚至连以家庭代工与小规模生产为主的行业也受到影响。对手工工人来说，成为小作坊师傅的前景似乎一天比一天黯淡，此时的小作坊师傅要不是逐渐沦为无产阶级，就是被迫将原本的工作分割出去，只从事其中某项工作环节以及承受所有分割后的后果。

即使1870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性格要比1848年时更为传统，工人阶级的分化却并未因此而稍有停止。“用来冶炼工人的坩埚相当微妙，”迪沃说，“巴黎创造出单一而整体的工人阶级生活，但整体内部的传统却因工人间的细微差异而呈现出多元的样貌。”<sup>9</sup>工业后备军与失业人口所面临的困苦状况并未获得缓解。这些人处于生存边缘，他们的数量因移民的涌入而大增，随着奥斯曼主持下的国家机制对社会福利供应采取新马尔萨斯主义方针，这些人也被并入庞大的非正式部门。然而即使奥斯曼愿意提供救济，他能做的也很有限，因为根据奥斯曼自己的估算，生存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将近有100万。尽管如此，1867年失业潮却惊动了皇帝，迫使他在各地开设施粥所赈济饥民。

中产阶级的内部组成也起了变化。当自由派专业人士、管理人员与公务员因经济进步而受惠时，靠领取租金与退休金维持生活的人面对巴黎高涨的生活成本与房租，财富却逐渐受到侵蚀（除非他们转而投入投机事业。如果左拉的《金钱》有一定的真实性，那么这些人在股市中一方面有可能将停滞不前的农村地租转变成更高的收益，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赔光所有家当）。就对巴黎房地产的控制力一天比一天衰退来看，店铺主人的地位持续下降，逐渐沦为下层中产阶级乃至更低的经济地位，能够摆脱这种命运的只有那些找出新买卖方式的店主（例如大型百货公司与专门精品店，这两种商店形式足以迎合上层阶级与大量游客的需要）。左拉《妇女乐园》中一段痛苦的描述记录了这个转变过程。与此同时，银行业与金融业的繁荣创造了一批白领中介业者，当中有些人收入相当丰厚。

234

巴黎的阶级结构在第二帝国时期出现全面性的改变。到了1870年，旧日阶级关系模式的轮廓——传统地主、手工工人与工匠、店主与政府雇员——仍很容易辨识。但此时另一种阶级结构却牢牢压在旧阶级关系模式上，并杂糅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由新上层资产阶级所操纵）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关系下，巴黎各领域的小规模工业与商业所不断涵盖的各种劳动（手工工人与技术工人）。无技术工人逐渐将手工工人的力量消耗殆尽。经济力量也在这样的结构下转变。金融家巩固自身在工业界与商业界——至少在巴黎——所拥有的权力；工人当中则有一小部分，

开始在人数不断增加的无技术劳工与贫民之中取得劳动贵族的特权地位。这些转变使紧张感急遽升高，并且清楚表现在1868到1871年之间巴黎激烈的阶级斗争上。

---

## 共同体

---

与现在一样，当时共同体的理想与现实难以分清。以巴黎而言，奥斯曼与共同体理想毫无瓜葛，就算巴黎确实存在着共同体，他也视若无睹。巴黎人口是由移民、流浪者与富人——以及各色各样追求声色犬马之辈（不只是工人，还有大学生、律师、商人等），这些人不可能拥有稳定或忠诚的共同体意识——所构成的“漂浮与搅动之海”。<sup>10</sup> 巴黎是一国的首都，“本身不断地被核心化”，而且也应该被如此看待。

奥斯曼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从梯也尔到罗斯柴尔德，许多上层资产阶级都认为巴黎是“国家权力斗争的地理钥匙”，其内部纷扰与革命倾向使其无法成为任何阶级的共同体。<sup>11</sup> 尽管如此，许多在巴黎围城与巴黎公社中战死的群众却是为了忠于巴黎而牺牲。他们与库尔贝一样，参与公社的理由只是因为巴黎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共同体至少该享有别人所拥有的一点点自由。而当人们阅读1867年的《巴黎指南》（由为数约125名巴黎最有声望的作者集体写成）时，很难不屈服于众人以热情与恒久忠诚营造而成的城市强大意象。然而《巴黎指南》也告诉我们有多少巴黎人是以小规模邻里、市区乃至刚成立七年的行政区为单位来理解共同体。这种忠诚也相当重要。在巴黎公社期间，许多人宁可以市区分界为准也不愿以城墙来进行防卫，因此使得反动的军事力量得以猝不及防地攻入巴黎。

“共同体”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在意义的界定上很难不对别人的感受与行动造成冒犯。例如奥斯曼的判断便是以与农村共同体意象进行比较来做依据。奥斯曼相当清楚，巴黎所盛行的是“金钱的共同体”，而非农村生活典型的紧密人际关

235

式：建立于帝国的荣光之上，并且流淌着权威、慈爱、权力与进步的象征，他希望借此将巴黎的“流浪者”汇聚起来。如我们所见，奥斯曼利用公共工程（特别是公共工程所具有的纪念性）、万国博览会、大型节庆与烟火表演、皇室出巡与宫廷生活的华丽与铺张，以及帝国纪念日的各项装饰，来建立与专制统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新国际秩序兼容的共同体意识。

简言之，奥斯曼试图推销的是一个新颖而现代的共同体概念，金钱力量将在当中被赞颂为华丽大道上、百货公司里、咖啡馆与赛马以及“商品拜物教的盛大庆典”——万国博览会中的景观与展示。无论这种力量有多么空泛与肤浅，不管巴黎公社对这项建制做出多少反抗，如加亚尔所坚称的，<sup>12</sup>这项令人瞩目的尝试还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不只第二帝国时期如此，其影响甚至延续到第二帝国之后。奥斯曼将巴黎市政府职务分散到各个行政分区中，并且陆续在各分区树立起象征性建筑（例如区政厅），企图借由科层化的控制体系来整合地方忠诚。令人惊讶的是，奥斯曼的做法再次获得成功。对新行政分区的忠诚很快就建立起来。也许这是因为行政分区是征召国民卫队的基本单位，之后这些国民卫队很自然地成为地方直接民主的最大推动者。奥斯曼由上而下的政策施行，却成了底层草根民主的表现工具。

地方直接民主的情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表现在1789年巴黎各区与1848年的政治俱乐部，以及1868年后公共集会的组织方式上。这项政治文化有着坚强的连续性，并且认为地方共同体与民主彼此缺一不可。这种意识形态影响到经济领域，蒲鲁东所主张的互助主义、合作、同盟与自由联合在这方面获得了大量支持。不过蒲鲁东之所以能成为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真正的原因在于他通过广受手工工人传统乃至小雇主欢迎的经济组织，清晰地展现了共同体意识。长久以来，巴黎一直被分割成各个区块与都市聚落，每个地区各有其特定的人口特性、经济活动形式乃至生活风格。经常受到重视的邻里酒馆是促成外地人在当地形成连带关系的重要场所。此外，不断涌入的移民通常在巴黎市内各有其特定的“收容区”，其分布的依据则是移民的原籍或所从事的行业，至于巴黎的“流浪者”则通常会运用自己的亲族网络在巴黎迷宫中找到出路。

从勒费比尔到加亚尔，各持立场的学者认为奥斯曼的改造工程、土地投机以及帝国统治瓦解了传统的共同体意识，但却未能代之以稳固之物。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行政机构拒绝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将使共同体意识获得政治表达的权利——此举成了巴黎市民的肉中刺。因此，巴黎公社可以诠释成阶级联盟的一种尝试，企图重新找回已经丧失的共同体意识，重新回到过去被迫迁出的市中心空间，以及重新主张身为巴黎市民的权利。<sup>13</sup>

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还需要更细致的说明将其固定下来。举例来说，认为共同体观念在1848年时可以较为稳定而稳固地灌输，这完全是出于幻想。至于有人主张奥斯曼瓦解了共同体意识，这种说法并无充分论据，人们可以轻易地予以驳斥并视其为一种浪漫的怀旧与回想。比较清楚的是，与共同体建构有关的现实与意识形态，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这段过程不仅转变了阶级关系，也对共同体造成了巨大冲击。金钱共同体瓦解了所有社会连带的纽带关系，特别是在资产阶级之间（早在1830年代，巴尔扎克就曾抱怨这个过程）。

奥斯曼以新颖且更加雄伟的空间尺度来构思都市化。他同时联结了原本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而在联结的过程中，也让各共同

体在都市母体中各自发展出专业化的角色。社会再生产中所进行的空间专业化变得更为重要，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生产与劳务供应上。奥斯曼的计划也的确消除了一些共同体（例如西岱岛），打破了共同体之间的藩篱，并且赞助共同体的士绅化、移置与移除。

奥斯曼的做法让社会上所有阶级（不管是否直接受到奥斯曼做法的影响）对已逝的过去产生深刻的乡愁。摄影师纳达尔（Nadar）坦承身处于自己的国家之中，却感觉像个外人。“他们摧毁了一切事物，甚至连记忆也不放过。”纳达尔悲伤地说。<sup>14</sup>然而无论被移置者的失落感或“丧失家园之痛”有多大，集体记忆实际维持的时间

FIGURE-081

讽刺画家达尔茹(Darjou)回应奥斯曼的评论，后者认为巴黎不是共同体，而是流浪者的城市。达尔茹指出，奥斯曼的拆除工程是造成人们到处流浪的主因。







往往出乎意外地短暂，而人类的调适速度也相当快。舍瓦利耶提到老西岱岛的记忆与意象在旧建筑拆除后是如何瞬时消逝无踪。<sup>15</sup> 共同体的消失——许多资产阶级观察家哀悼——主要或许源自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崩解，而后者的崩解则是人口快速增长、居住地区隔离与社会供应（从教会到学校）未能赶上社会再生产空间的快速重组所致。奥斯曼在社会福利上抱持新马尔萨斯主义，并且坚持专制统治反对巴黎市自治，这些做法无疑造成更大的危险。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贝尔维尔不是个共同体，而是贝尔维尔成为资产阶级畏惧的那种共同体，警察无法深入其中，政府无法管制，人民阶级以狂热的热情与政治憎恨掌控当地。这可以从1855年警察厅长的抱怨中看出：

在环境逼迫下，工人不得不搬出巴黎市中心，这对工人的行为与道德明显产生不幸的影响。过去这些工人住在比较高的公寓楼层，至于比较低的楼层则住着商人以及其他收入优渥的家庭。同一幢公寓的住户之间往往培养出休戚与共的连带关系。当工人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邻居的帮助，人性尊严使得工人阶级养成谨守规范的习惯。之后工人被迫搬迁到圣马丁运河乃至城门以北地区，他们住的地方没有资产阶级家庭，表面上摆脱了昔日邻居的控制，实际上却是断绝了接受资助的机会。<sup>16</sup>

FIGURE-082

这帧 1860 年代末期的照片记录了西岱岛上的拆除工程，其规模之大，即便以今日的标准来看也令人咋舌。

工业、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与转变；移民与郊区化；劳动市场与师徒制的失去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转变；逐渐增多的空间区域与分区专业化（商业区、手工工作区、工人阶级再生产区等）；住宅的重组、社会福利供应与教育——这些都在压倒性的金钱计算的压倒性力量下结合，助长共同体意识与经验出现重大变化。不管1848年的共同体意识是什么，它已经完全改观，但其一致性与发展性未尝稍减，直到1870年时仍是如此（如巴黎公社所显示的）。让我们更进一步探究当中的差异。

---

## 阶级共同体与共同体阶级

---

1848年6月的工人运动被从300多个省府征召而来的国民卫队所击溃。在巴黎商业轨道中运行的资产阶级在“远距离信息沟通上比工人阶级占优势，后者虽然拥有坚强的地方连带，却几乎不具备区域性或全国性的行动能力”。<sup>17</sup>资产阶级可以运用广布周边的商业空间网络来维持其经济与政治力量。

而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存在着重要的问题与原则。“共同体”具有共同的领域吗？如果有，疆界要如何固定？或者，“共同体”只意指利益的共同体，与特定的空间疆界无关？事实上，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界定了一个超越空间限制的阶级利益共同体。这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功的秘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各国首都建立了家族的联络网），然而鉴于1848年的教训以及为保障自身的阶级利益，从事商业与政府事务的上层资产阶级（如佩雷尔兄弟、梯也尔与奥斯曼）也逐渐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规划与发展。梯也尔动员军队镇压巴黎公社的方式与1848年如出一辙。资产阶级发现他们可以运用空间上的指挥优势痛击工人运动，不管后者在特定地区的地方连带有多紧密。

工人也被迫从阶级与空间的角度来重新定义共同体。工人在1848年所发起的运动，其主要特征在于仇视外籍劳工以及同情各地受压迫的民众（与波兰民众联合起来，于1848年5月在巴黎街头引发极大不安）。新空间关系与变迁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促使一些作家（如科尔邦）主张，劳动问题无法从地方找到解决方式，（至



FIGURE - 083

为了满足需求，工人阶级必须寻找巴黎周边的住屋（通常是临时搭建）或市中心内较大的内院住宅，后者通常十分拥挤。

少)必须放眼整个欧洲才能获得解决。<sup>18</sup>问题出在如何让国际主义视角与工人阶级传统中的互助主义及统合主义情感兼容。同业公会与法国手工艺传统提供了某种思考新工人组织的基础,使其能以兼容于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对空间进行支配。这是新成立的第一国际所要面对的问题。结果,第一国际在资产阶级队伍中引发巨大而无法控制的恐慌,因为第一国际所界定的阶级共同体“跨越了各省、工业重镇与国界”,其力量足以与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建立的影响力相提并论。<sup>19</sup>

实际上,资产阶级的恐惧是毫无道理的。第一国际联结的脆弱,以及高度地方化互助主义的有力残余,明显表现在1870年战争与巴黎公社中。对照之下,1869年成立的巴黎市工会联盟(Fédération des Chambres Syndicales Ouvrières)——由甫合法化的工会所共同组成的组织(由瓦尔兰领导)——则顺利形成以奥斯曼都市化规模为单位,以工人视角看待劳动问题的做法。这个组织将地方性互助主义的强大传统与直接民主融入以市为单位的阶级斗争策略中,借此改善劳动过程与就业条件。另一方面,它也成为形貌多变的混合物,赋予巴黎公社力量。

经过界定的共同体,其所涵盖的空间随都市化规模的转变与空间藩篱的撤除而变迁。但共同体空间也会因新阶级形貌与阶级斗争而变,当中的参与者了解,只要能掌握空间与空间网络便能掌握社会权力。阶级与共同体的演变在此处交错,创造出令人感兴趣的新可能与新形貌。

与新阶级共同体并存的还有新形式的共同体阶级。巴黎的社会空间一直存在区别。长久以来,市中心的纸醉金迷一直与市郊的一贫如洗形成强烈的对比,资产阶级的西区与工人阶级的东区,进步的右岸与传统而满布大学生的左岸。<sup>20</sup>整体模式中存在着许多空间交错。沉郁的贫民窟中混杂着富丽的宅邸;在左岸与沼泽区,手工工人与工匠的工作场所邻近贵族的住所;另外还有日渐稀少的著名的垂直区隔(富有的资产阶级住在二楼,楼下是精品店,工人家庭则住在顶楼),让不同阶级有社交接触的机会。工业与商业的师傅与员工,传统上住在一起,市中心尤其如此,尽管奥斯曼努力将市中心去工业化,这个模式仍持续着。

虽然奥斯曼并未刻意在巴黎进行空间区隔,但他所进行的工



程以及房地产市场变动后所产生的土地运用与地租效果，却造成相当程度的空间区隔，其中绝大多数反映出阶级区分。贫民窟的移除与房地产的投机事业巩固了资产阶级在西区的势力，至于北部与东部的周边地区则因不同的土地开发体系，而形成毫无上层阶级居住的低收入住宅区。在贝尔维尔、维雷特与蒙马特这些广大地区居住的，都是一般工人而非特定职业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在往后巴黎公社的暴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土地使用的竞争也巩固了商业与金融区，工业与商业活动也紧密群聚于市中心的特定区域——左岸的印刷业，内城东北部的冶金业，工艺美术博物馆附近的皮革业，大道沿线的成衣业。每个类型的就业区通常会赋予周遭住宅区一定的社会形貌——白领雇员集中在商业区以北，手工工人聚居在东北方向的中心，印刷工人与书籍装订工（非常好战的团体）则住在左岸。块状地与畸零地，市中心与市周边，乃至各区之间的窄小隙地，在1870年时也呈现出远较1848年明显的阶级或职业色彩。

虽然这与奥斯曼所释放出来的空间规模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但其中也反映出劳动过程、工业结构与新兴阶级关系模式的根本变化（整体来说，技术与职业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如往日重要）。商业与金融力量的巩固，工人与师傅之间的逐渐分离，以及允许去技术化的劳动分工专业化，这些都显现在新阶级共同体的生产中。旧模式仍可辨识——左岸的混杂一如以往——但上面已覆盖了一层更猛烈而明确的社会再生产空间结构。空间组织以及伴随的共同体意识，被卷入阶级形貌再生产的过程之中。桑内特的结论相当透彻，“地方主义与下层阶级在第二帝国时期结合在一起”，不是因为工人一定要如此，而是因为社会力量强加这种认同在工人身上。<sup>21</sup>

普洛对巴黎工人的“高尚主义”所做的描述向来带有偏见，然而却最能说明阶级共同体确切的运作方式。身为重要的实业家与雇主，普洛对于工作场所中的不服从以及反对专制和阶级对立的态度感到愤怒。他认为家庭组成的失败是问题的主要部分（因此他试图收编妇女并且推广“受人尊敬”的家庭生活形式）。邻里酒吧是个问题。工人乃至全家大小都习惯到酒吧里诉苦，一般这些怨言不可能在作坊的压迫环境或家庭代工的孤立中听到。酒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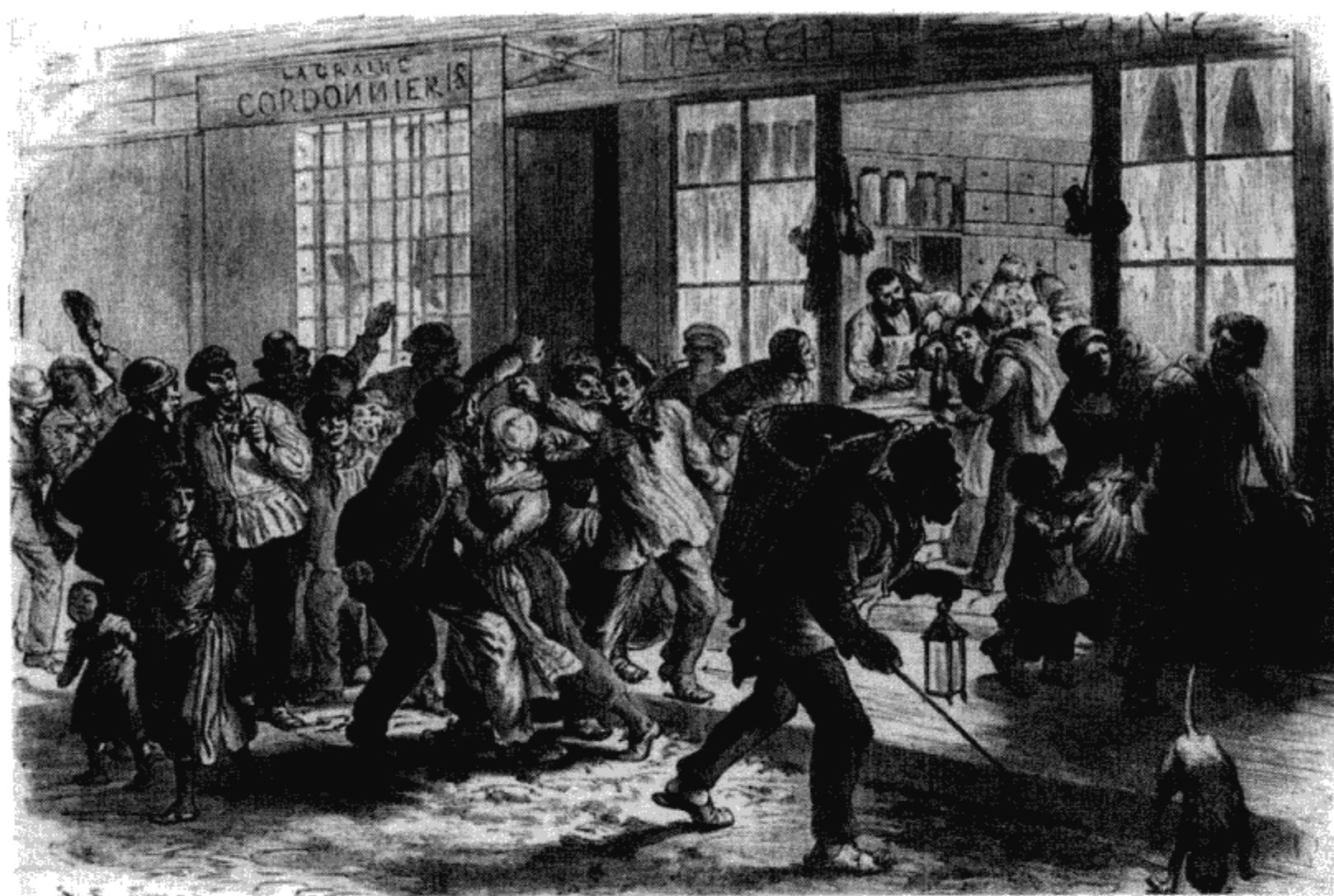


FIGURE-084

工人阶级在巴黎中央果菜市场附近的街头生活（勒库特[Le Couteux]绘）以及在酒馆的夜生活（克雷蓬[Crepon]绘）与资产阶级的上流生活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妇女与幼童完全融入了酒馆场景之中。

顾客绝大多数是街坊邻居，与职业的种类无关，<sup>22</sup>因此看法的产生往往建立在一般工人阶级的状况，而非只局限于特定行业的劳动条件。但酒吧本身也可能是紧张的来源，如桑内特就指出：“当咖啡馆成了同事之间放言高论的场所，社会秩序就受到威胁；当咖啡馆成了酗酒的地方，人们无法畅所欲言，社会秩序反而得到维持。”正因如此，社会主义者如瓦尔兰才创立食物合作社（拉马麦脱）作为表达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空间。普洛承认（而事实通常也是如此），即便不是由其所诱发，阶级连带与阶级认同在共同体组织下，会变得更为强大（矿工共同体可说是这方面的典范）。阶级认同与共同体一样，很容易在工作场所中凝聚。普洛的挫折感在于，他可以在工作场所中彰显自己的控制力，但到了共同体空间便无能为力。

古尔德不同意这种看法。“巴黎市中心的重建，工人在地理上散布到各个工业化行业中，以及大量人口扩散到新设立的巴黎周边行政区内，”他写道，“这些现象创造出有利于社会抗议模式的条件，共同体的集体身份也因此与以工作为基础的技艺身份（以及技艺身份的那位躲躲藏藏的表亲，阶级）分离。”邻里是“集体身份的基础，与劳动世界几乎没有关系”。因此，巴黎公社的“基础在于都市共同体的认同而非技艺与阶级的认同”。<sup>23</sup>古尔德宣称自己是以“中立”的经验证据为基础做出这项结论，并且对于无视事实擅自做出阶级诠释的人相当不满。

古尔德坚持新周边空间（如贝尔维尔）对巴黎公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些空间并非根据技艺来划定，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却忽略了这些空间与“技艺的那位躲躲藏藏的表亲，阶级”的关系。古尔德的论据在贝尔维尔 1848 到 1872 年间在阶级集中上并未大幅提升（据他的说法，1872 年贝尔维尔大量增加的人口中，有八成是工人，这个惊人的比例使贝尔维尔维持稳定）。普洛无疑相当赞同古尔德的说法，他认为邻里网络与邻里机构对社会连带的形成相当重要，但他也相当惊讶这些居然与阶级无关。古尔德用来说明阶级连带的主要证据，是工人阶级结婚时证婚人的阶级成分——为工人证婚的人士几乎清一色是店主与雇主。据此，古尔德认为邻里间的社会网络并不存在阶级基础。古尔德忽略一个事实，即姘居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婚姻才是例外（1881 年，普

洛努力想建立一个鼓励工人阶级结婚的社会，理由在此)。大部分的工人不愿结婚，因为结婚太昂贵也太麻烦。至于想结婚的工人，其用意不外乎是往上层流动以寻得名声地位，因此他们通常找来“有头有脸的人士”帮他们证婚（如医生、律师、当地名人）。

我们提过不只一次，工人与小店主之间的区别充满孔隙，这并非主要的阶级区隔——银行家与金融家、地主、商人资本家、实业家与转包商的整个压迫网一直是工人的主要阶级敌人，我很怀疑这当中会有人去担任古尔德资料中的证婚人。证婚人是地方社会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个中意涵却费人猜疑。根据艾诺（Haine）的说法，酒馆与咖啡馆老板经常担任顾客的证婚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缺乏阶级连带，因为酒馆与咖啡馆通常是阶级意识展现的中心。<sup>24</sup>然而，古尔德还是正确指出自治体争取自由的议题在巴黎公社之前与巴黎公社期间一直是个关键性的请求。不过证据也充分显示双方——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都将自治体争取自由的议题转化成阶级需求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有部分（有时不是那么容易）与资产阶级政治共和主义的较激进形式合流。

古尔德认为“没有证据显示”1868年后出现的公共集会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然而他的立论过于薄弱，因此未能引起共鸣。事实上，瓦尔兰的自信主张正可驳斥古尔德的说法，前者认为早在1869年，长达八个月的公共讨论已经显示“共产主义体系越来越受到作坊中辛苦劳动者的欢迎，这些工人的微薄工资仅能勉强不饥饿”。而1870年米利埃（Millière）发人深省的新闻文章则指出，“社会公社”的前景与危险是解决工人阶级生活的良方。<sup>25</sup>如我们所见，从1830年代开始（姑且以此为起点），身体政治的控制所引发的激烈论战一直沿着阶级路线展开，“共产主义”与“公社”间的联合在这个过程中活跃复兴。在一个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城市里，要求自治体自治的呼声相当高昂，如果说当时不存在阶级利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如果巴黎公社只是要求自治体自由，为什么共和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多半支持共和主义）要如此迅速地逃离巴黎，为什么君主派分子（长久以来，这些人一直努力争取政治分权）会组成军事领导核心在1871年5月“血腥周”中将公社成员当成“红色分子”而予以残杀？

有趣的是，在古尔德所搜集的证据中，有许多与社会（阶级）关系显著的空间亲缘性，以及邻里机构和新行政分区作为社会连带处所的重要性有关，并且也与我在此所提供的说法完全一致。巴黎公社的确不同于1848年事件，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奥斯曼所激烈进行的生活空间重组，劳动过程的剧烈转变，资本累积的组织，以及国家权力的部署。阶级共同体与共同体阶级，成为第二帝国日常生活与政治中越来越显著的特征，如果这两者未能紧密混合，巴黎公社就无法以日后的面目出现。

# 自然关系

人类的肉体与精神生命与自然联结在一起，这意味着自然与其自身相联结，因为人类本是自然的一部分。

245

——马克思

奥斯曼化并没有让巴尔扎克乌托邦主义的田园渴望空手而归，同时也未曾忘怀法兰西国度源自中古时代、哥特式与基督教根源所传达的正当性（将哥特式大教堂恢复原状的伟大建筑师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曾经两度装饰圣母院，一次[匆促之下]是为了庆祝帝国成立，另一次则是在奥斯曼的邀请下庆祝路易·拿破仑的婚礼）。奥斯曼也回应了1830年代“卫生学者”的一连串提议，后者重视健康与卫生，并且主张应让人类的身体与精神接近“纯粹”自然的治疗力量以重获生机。奥斯曼遵照这些提议，特别是1843年梅纳迪耶所提出的建议，在巴黎市广设公园与开放空间（发挥“都市之肺”的功能）。奥斯曼个人对这些议题相当感兴趣，于是邀请了自己的杰出顾问（特别是阿尔方与贝尔格朗）来思考解决之道。布洛涅森林（七月王朝时期，此处被称为“冷清的不毛之地”，后来路易·拿破仑将此处当成恢复元气的休憩之地）、温森斯（Vincennes）、卢森堡公园（Jardins de Luxembourg）、壮观的肖蒙高地（Buttes Chaumont，此处原本是垃圾场）、蒙索公园，甚至一些较小的空间如神庙广场，这些地方在阿尔方的指挥下，不是进行些微改造就是完全改头换面，好将



自然的概念带进巴黎。

246 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概念完全是根据特定范畴建构出来的。岩窟与瀑布，适合野餐的湖边与乡间景致，宁静的乡间小路与村舍，这些全都精心安排于巴黎市内的特定空间中，不仅有田园与纯朴的视野，还包括了哥特式设计以及借由亲近原始无威胁（因此是温驯的）的纯净自然以恢复活力的浪漫概念。<sup>1</sup>这些策略可以实现几个目的。不仅可以将“自然景观”带进巴黎并为帝国增添光彩，也可收编1840年代的政治化浪漫主义，并促使政治化浪漫主义被动隐居于巴黎的自然开放空间中。

248 这些策略诉诸特定的文化传统——工人与资产阶级普遍接受这个文化传统——其根源至少可上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然而这项文化传统的出现并非出于自主，而是与资本主义演进的脚步息息相关。<sup>2</sup>自然（与亲近自然）的商品化以及金融资本与信贷不断扩增的影响力，与七月王朝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劳动力日渐贫困所造成的过度拥挤、有害健康与杂乱无章——这是马克思所谓机器与现代工业来临前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制造”期的产物——使得自然关系在复辟时期及之后渐渐获得重视。（拉马丁与乔治·桑的）浪漫主义与（巴尔扎克陈述的）田园乌托邦主义有部分出于对都市生活堕落状况所做的响应。傅立叶主义者特别钟情于恢复自然关系，认为这是乌托邦计划的中心教义。而从实务的角度来看，七月王朝的卫生学者（维莱姆、弗雷吉耶与帕朗-迪沙特莱[Parent-Duchatelet]）提出越来越多生活条件落后的证据，显示巴黎与外省城市人口正处于恶劣环境中。他们一方面以清洁与公共卫生措施作为解决良策（尤其针对霍乱肆虐），另一方面提出的报告也呈现出各色各样的情感：从傅立叶主义者对文明失败的厌恶，到渴望与充满生命的自然维持健康关系的浪漫情怀。至于产生这种情感的条件也与资本主义发展蓄积的步伐有着密切关联。

249 奥斯曼——他向来如此——将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规模做了一些调整，因此产生不同的效果：

1850年，市立公园面积有47英亩。20年后奥斯曼被迫去职时，公园面积已广达4500英亩。他为巴黎市增添了18个街区的绿地——并入巴黎市的郊区也新增了7个街区的绿地——行道树数量



FIGURE-085

邻里重新曝露在阳光与新鲜空气之中,当地居民——如杜米埃所描绘的——终于能看清楚自己种的是玫瑰还是紫罗兰。

增加到原来的两倍,至于一些大道沿线则刻意加种树木,使其两侧各有两排行道树。除此之外,奥斯曼还在公有地上种植树木……巴黎的绿化对奥斯曼来说是一项政治行动。<sup>3</sup>

这是属于栗树的时代,春时花开,秋时叶红,景致大为不同。如果阿尔方为巴黎整体设计(特别是布洛涅森林)贡献了才智,那么他从波尔多找来的园艺家巴里耶-德尚(Barillet-Deschamps)则为闯入巴黎公园与广场的人提供了浓郁的浪漫气息。

面对饮水与污水问题,奥斯曼的选择刻不容缓,1850年,巴黎在这方面的建设远远落后于英国与美国城市,甚至还比不上一些欧洲城市(如柏林)。范尼·特罗洛普(Fannie Trollope)在1835年造访巴黎时曾描述她所见到的恶心景象,而这些景象到了1848年仍没改善多少。“同样糟糕的是巴黎的卧室与厨房经常缺水,”特罗洛普写道,“此外还有更无效率且造成无穷恶果的部分,排水沟与下水道的阙如是法国城市的共同缺点,这是最大的问题。”<sup>4</sup>马维尔许多1850年代的街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在雨刚停了之后拍的,但这些明显可见的街道水流其实都是未处理的污水而非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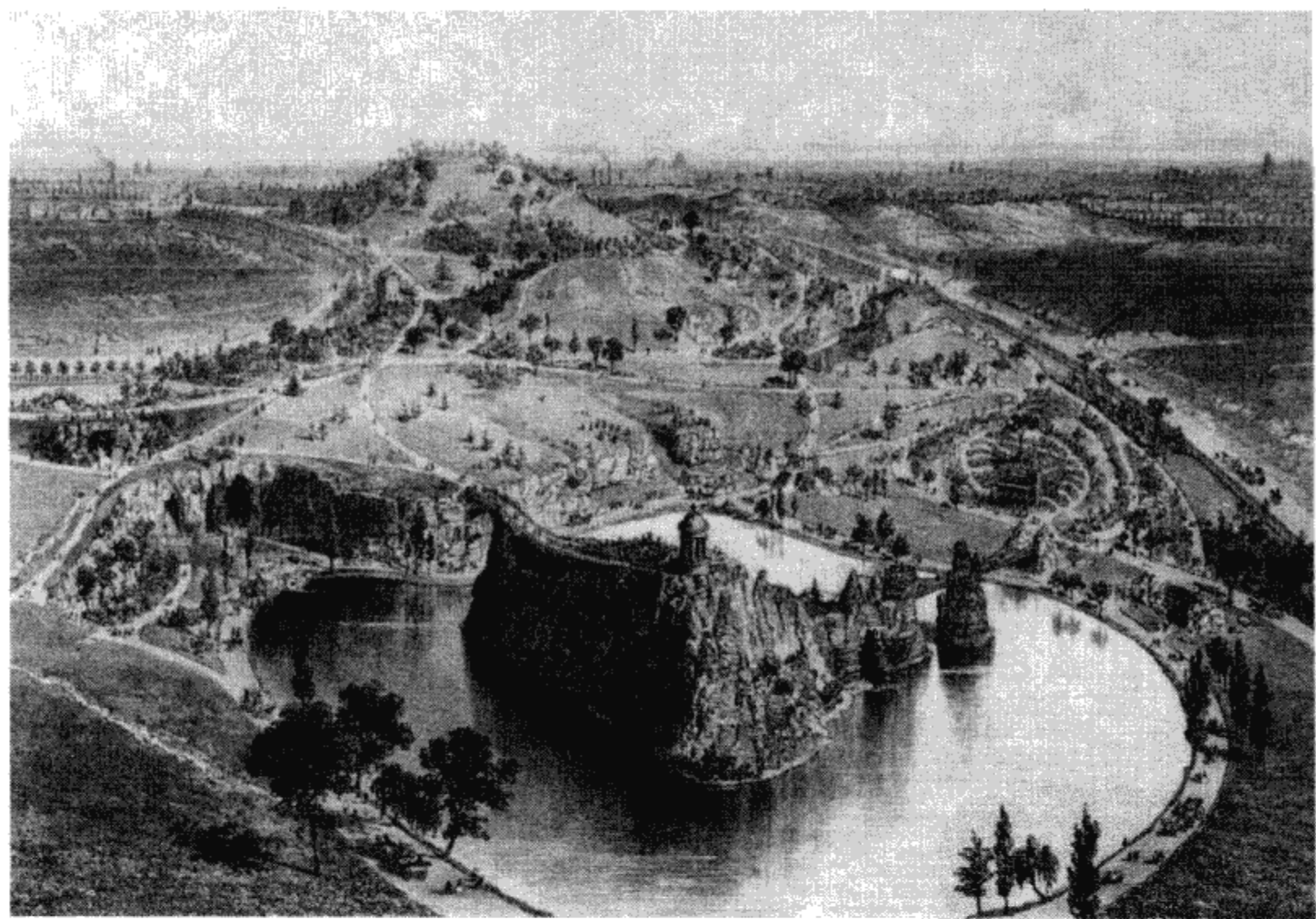


FIGURE-086

七月王朝时期，布洛涅森林从原本“冷清的不毛之地”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田园景象（上图，马维尔拍摄），并且还添上无数哥特式风格的建筑，这完全是阿尔方的杰作。除此之外，过去巴黎的垃圾场在经过整顿之后也成为美丽绝伦的肖蒙高地公园（下图，沙尔庞捷[Charpentier]与伯努瓦[Benoist]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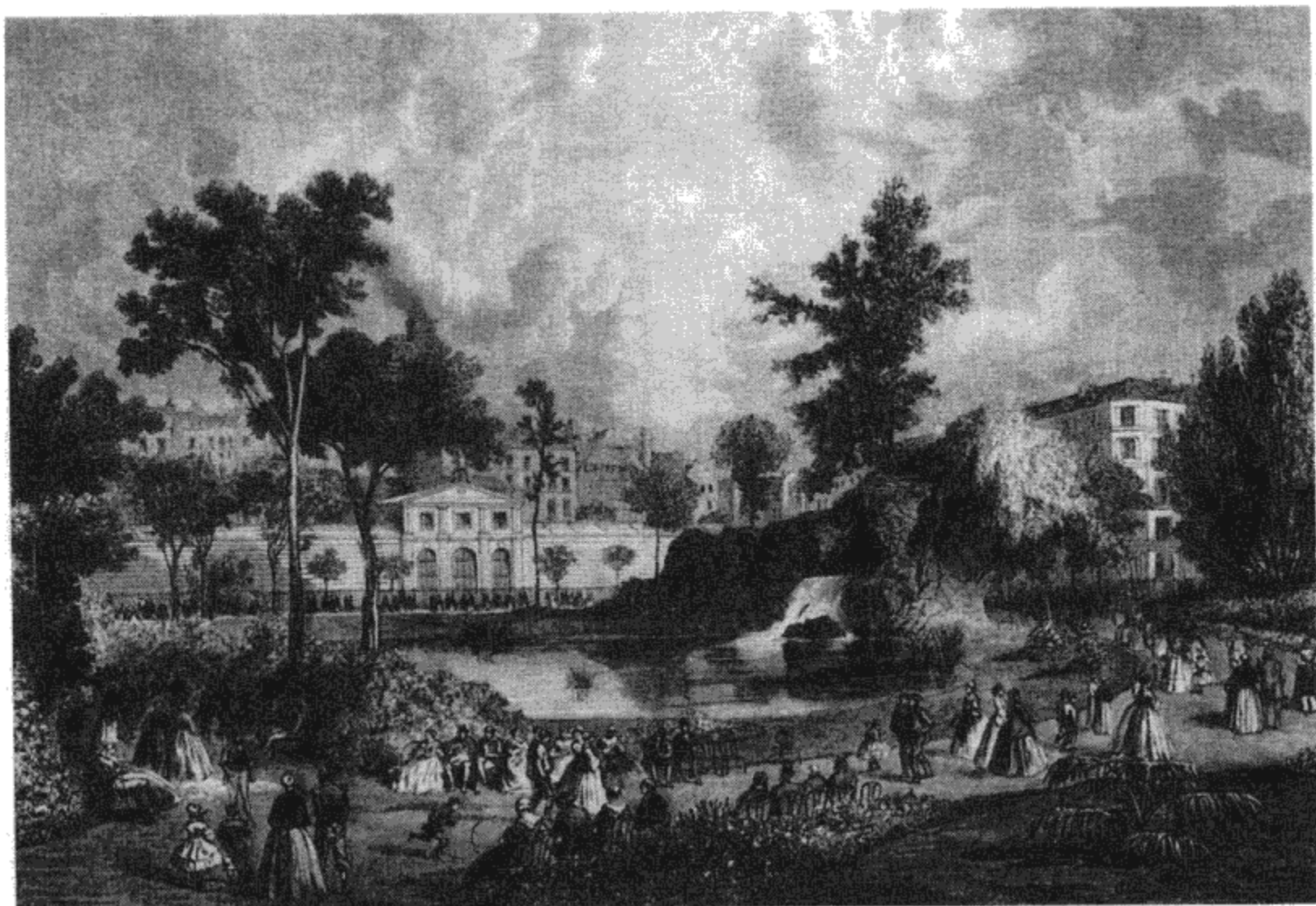


FIGURE-087

神庙广场经过重新设计之后(顺便将1793年法王及其家族在此囚禁数月然后遭到处决的人民记忆抹得一干二净),将草木流水带进巴黎的核心地带。它融合了阿尔方的公园、希托夫的区政厅以及巴尔塔遮风避雨的市场,使都市空间成了休闲、行政与市场三者合鸣的管弦乐曲。

1848到1849年爆发的霍乱疫情,以及1855年的另一次霍乱,使其中的利害关系更形升高,尽管霍乱的原因无法确定,但一般认为与有害健康的环境脱不了关系。

奥斯曼重塑巴黎地底的故事被反复传诵,并且被大家当成戏剧性的、壮观的乃至英雄式的事迹喝彩着。<sup>5</sup>水供应已经获得改善。1850年,巴黎每日的水供应量有2700万加仑,如果平均分配(事实并非如此)则每个居民每日有26加仑的水可用。到了1870年,每个居民每日用水量增加到50加仑(仍然远少于伦敦),而进行中的工程不久即可让用水量增加到64加仑。不过在用水分配上,奥斯曼并没有那么成功。1870年,有半数家户没有自来水,而商业区用水分配的管线也很脆弱。于是在奥斯曼的支持下,贝尔格朗决定将饮用水与非饮用水的供应分开,后者专门用于喷泉、道路清洁与工业用途。起初这个做法降低了新鲜饮用水的供应成本。但为了在巴黎区域内辨识、取得且适当供应质量良好的新鲜饮用水,势必要花上一番工夫,其中遭遇技术上的困难。然而奥斯曼最后还是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他所建设的输水道可以从距巴黎有一段距离的杜伊(Dhuis)与瓦讷(Vanne)水源地输送饮水,这

251

些建设以古罗马输水道为蓝本，运水之外还散发出帝国的气息。这些输水道的高度充足，引水进入巴黎后还能借由重力作用将水输送到全市各个角落。

供水的增加使人更加在意污水的处理。1850年，道路本身仍是主要的下水道。1852年（当时奥斯曼尚未担任巴黎市长），巴黎市长下令“街上所有新建筑物以及进行重大修缮的建筑物都必须装设下水道管线”。但为了更加彰显效果，巴黎所有街道也必须埋设下水道。奥斯曼的作风一如以往，他将规模予以扩大。“第二帝国时期巴黎街道的长度增加了一倍（从424公里到850公里），下水道系统则增加超过原来的五倍（从143公里到773公里）”。<sup>6</sup>更重要的是，造好的下水道系统的空间足以容纳并便于修缮水管与其他地下基础建设（如日后的电缆）。

巴黎的地下因此成了观赏用景观。原本害怕地底藏了什么的达官贵人与资产阶级也到下水道去游览，其中包括了社会最底层的低等物种（雨果《悲惨世界》对巴黎下水道的著名描述强调了这一点）。奥斯曼在对市议会提出报告时，曾说了这么一段著名的话：

这些地下画廊将成为首都的器官，在暗无天日下如人体器官般运作。纯净而新鲜的饮水以及光与热，都将如各种液体般流通，其运行与补充维持着生命的存在。这些液体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运转，并在不打破巴黎平稳运行与不破坏巴黎美丽外观下维持着公众的健康。<sup>7</sup>

冈迪（Gandy）将这段话诠释成一种返归前现代概念（认为自然是活的而非死的）的论述，它显示“经济交换的循环动力如何压制都市秩序的有机概念，并且在自然与都市社会之间设立一套新的关系”。<sup>8</sup>然而，冈迪认为这套新关系在奥斯曼时期还未能实



FIGURE-088

马维尔的巴黎旧照片有许多看起来是在雨后不久拍摄的，因为街上看起来总是水流横溢。然而这些水流绝大多数都是未处理的污水。要改善这个不卫生的环境还需要许多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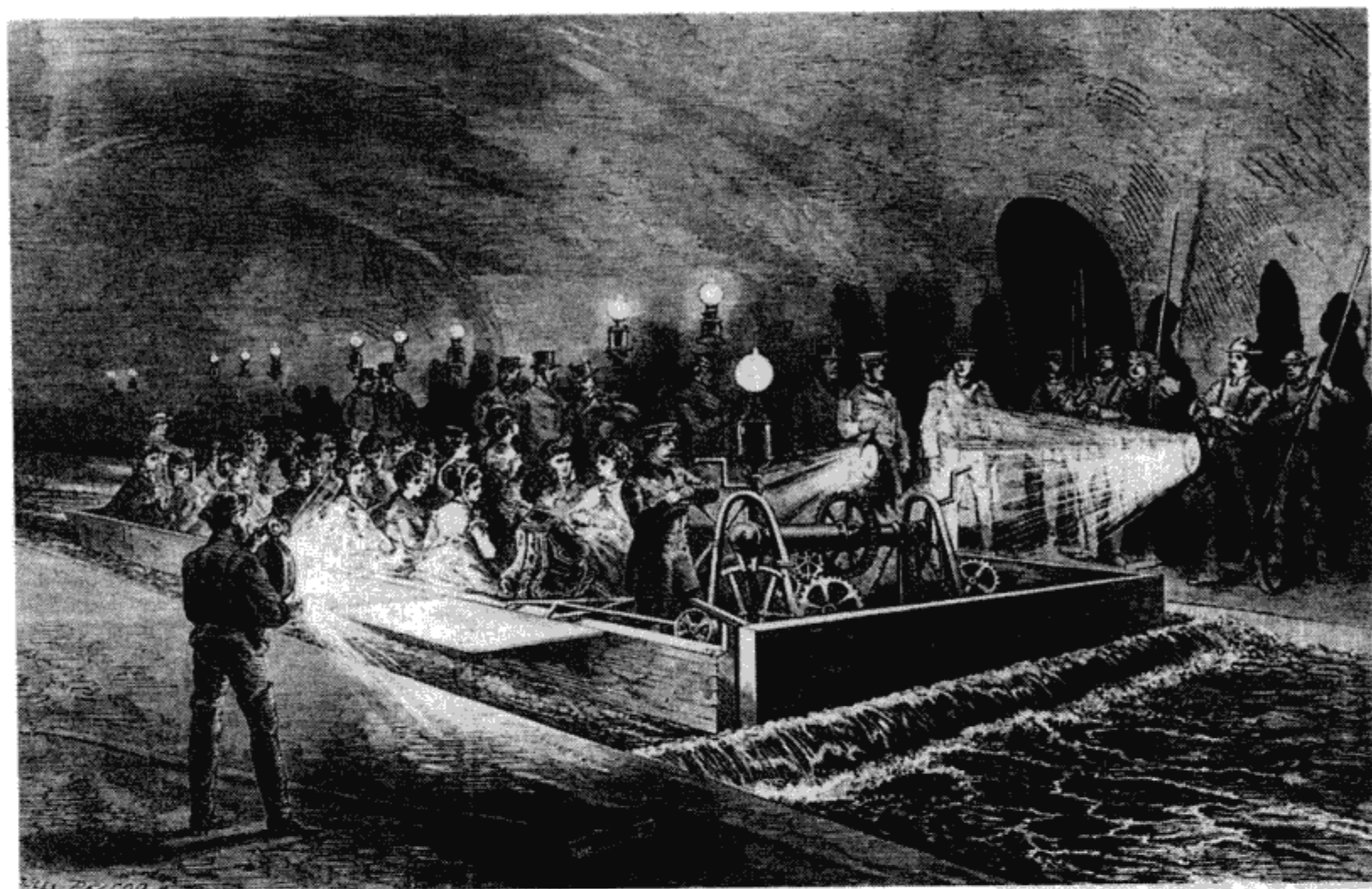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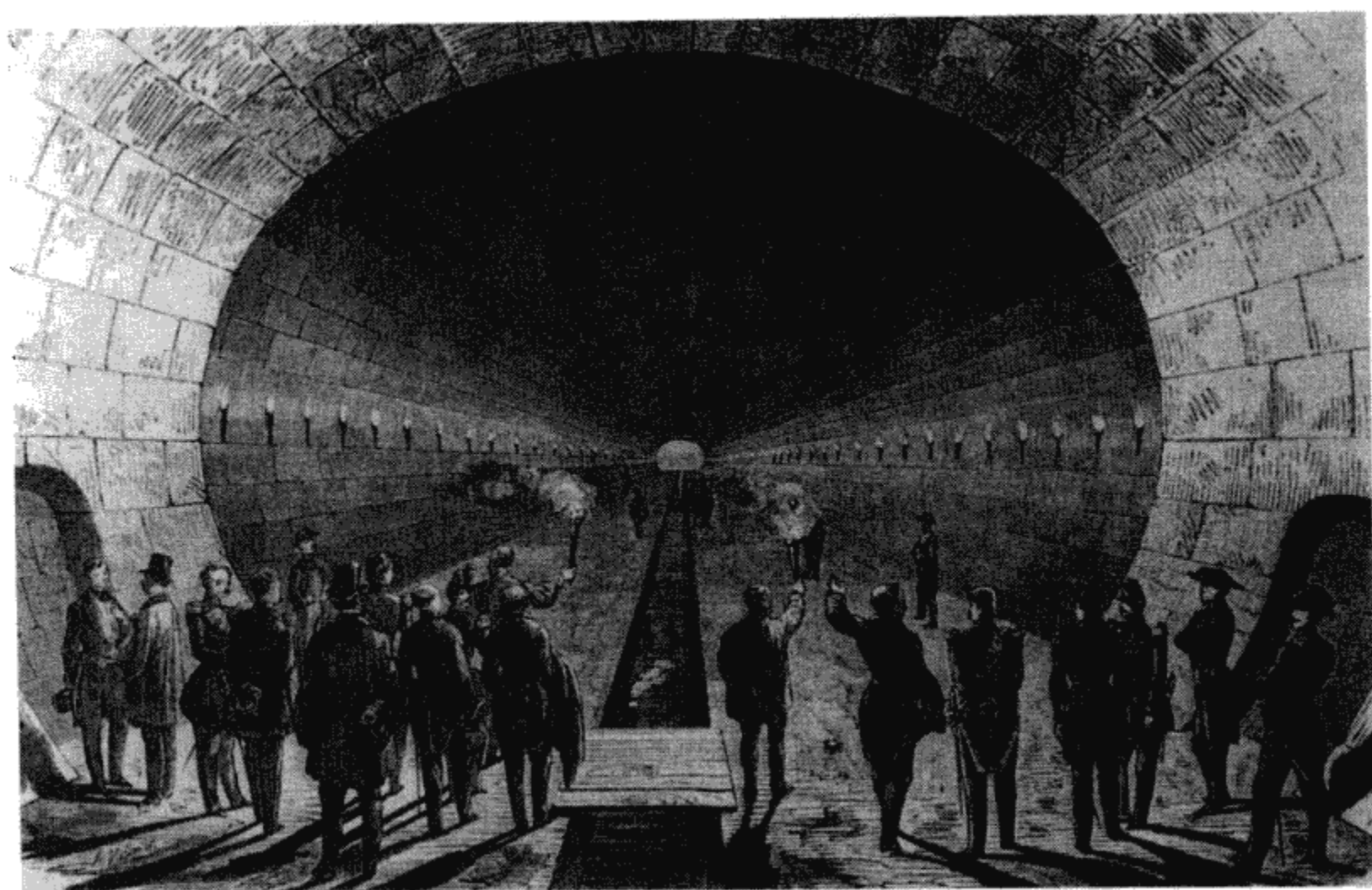


FIGURE-089

新下水道相当宽广(上图,瓦朗坦[Valentin]绘),足够容纳前来参观的资产阶级与特权阶级(下图,佩尔寇克[Peicoq]绘)。之所以会有下水道的参观活动,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向资产阶级保证地底下并没有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描述的那种邪恶力量。

现，必须等到19世纪末才能达成。奥斯曼的语言也许只是一种策略，他引用七月王朝卫生学家的说法，其中所弥漫的生物学论证与有机隐喻向来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在机械工程语言尚未成为现代性的技术语言之前，奥斯曼也有可能受到循环与新陈代谢等隐喻的吸引，并将其运用在实际状况中（今日有许多环保学者重新以新陈代谢的概念作为永续都市发展观念的基础）。贝尔格朗审慎的科学研究与报告，以及奥斯曼为了说服多疑而谨慎的市议会所准备的备忘录，都尽量避免使用有机的说法并且以机械的角度进行分析。然而，贝尔格朗与奥斯曼的确强调循环的观念，而这个隐喻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强调在建造健康都市环境的过程中，空气、阳光、水与污水的自由循环；另一方面，它在同时间也唤起了整个城市金钱、人群与商品的自由循环的联结，仿佛这些事物完全是出于自然。资本的循环因此成了“自然之物”，而首都的重塑（大道、公园空间、广场与纪念性建筑）则被诠释成是符合自然的设计。

# 科学与情感，现代性与传统

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与社会存在条件之上，矗立着一座具有特定与独特形式的情感、幻想、思维模式与生命观的上层建筑。

253

——马克思

细察内在意识是个相当危险的尝试，但这些能激励人们行动的希望与梦想、畏惧与想象，却值得我们探索。虽然如此，超过一个世纪前的巴黎人的思想与情感该如何重建毕竟是个难题。可以确定的是，至少还有大量的文献记录（来自民间与饱学之士，加上讽刺画、绘画、雕刻、建筑、工程等）告诉我们有些人是如何感受、思想与行动的。然而，许多人并未留下有形的记号，广大群众仍是沉默的多数。而为了取得大众思想与大众文化的残缺片段，必须在语言方面进行缜密研究——语汇、动作、民间歌曲、戏剧与大众出版物（例如《普及科学》[*La Science pour Tous*]；《勒罗歇·邦唐》[*Le Roger Bontemps*]；《孩子的一周零用钱》[*La Semaine des Enfants*]）。<sup>1</sup>

第二帝国时期向来有实证主义时代之称。然而以现代标准来看，第二帝国时期的实证主义却是耐人寻味，充满了怀疑、暧昧与紧张。思想家“试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彼此互不兼容的渴望与信仰进行协调”。<sup>2</sup>对知识分子、艺术家与学者来说为真之事，对许多工人来说也同样为真；虽然工人热情地支持进步，但只要牵涉上劳动过程，他们却往往成为进步的阻碍者。科尔邦写

道：“能够读写、拥有诗人灵魂、拥有强烈物质与精神上的渴望。并且支持进步工人，在谈到自己职业时，却摇身一变成了反动、倒退的蒙昧主义者。”<sup>3</sup>当然，对手工工人来说，他们的技艺就是他们的科学，因此让他们去技术化实在不能称之为进步之举，如手工工人领袖瓦尔兰所不断抱怨的。由于巴黎处于思想骚动的核心地区，不只法国的知识阶层荟萃于此，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双重力量下，巴黎不断受到两方的拉扯而游移其间。工人越来越屈服在资本主义的金钱力量下，而作家与艺术家也开始出卖灵魂，听从市场的指挥，两者在此出现交集。放荡不羁者与工人在经验上的雷同，促使前者支持后者的革命行动。

许多人震撼于科学的功用。其中医学的成果尤其重要。不只医学学生经常成为1860年代政治与科学运动的急先锋，就连冷酷解剖私密的人体形象也成为一种共通的科学典范。如果人体可以解剖，身体政治有何不可？科学不只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态度，即努力去除事物的神秘面纱并穿透、解剖事物的内在本质。这种态度甚至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运动基础。不只是科学家，连作家、诗人、经济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与哲学家都渴望科学。“科学不受传统道德与礼教动机的束缚；科学之所以‘纯粹’，某种意义上是因为人们希望自身的技艺能够‘纯粹’，而科学的客观与不偏不倚，也与人们决心要避免感情用事与不公开显露个人情感有关。”圣伯夫（Sainte-Beuve）在赞美《包法利夫人》时写道，每个作家的野心，乃是“执笔如执解剖刀”。医生之子福楼拜终其一生着迷于尸体解剖。“这真是一件怪事，我居然被医学研究所吸引”，福楼拜写道，但“现在流行的思想风气就是如此”。福楼拜早年的好友迪康随后写了六册巴黎“尸体解剖肢解”研究（如埃德蒙·龚古尔在日记中所陈述的，迪康在《回忆录》中也用类似的方式解剖了福楼拜）。德拉克洛瓦在此影响下转而认为科学“就像从肖邦（Chopin）这种人身上所证明的那样，其本身就是艺术，是以天分装饰的纯粹理性”。许多艺术家认为自己工作时的精神状态与巴斯德（Pasteur）这类科学家接近，后者揭开了发酵的神秘面纱。<sup>4</sup>

其他人感觉到艺术与科学间不断加深的鸿沟，并试着要弥缝它。“时机将至，”波德莱尔写道：“人们将了解，凡是文学，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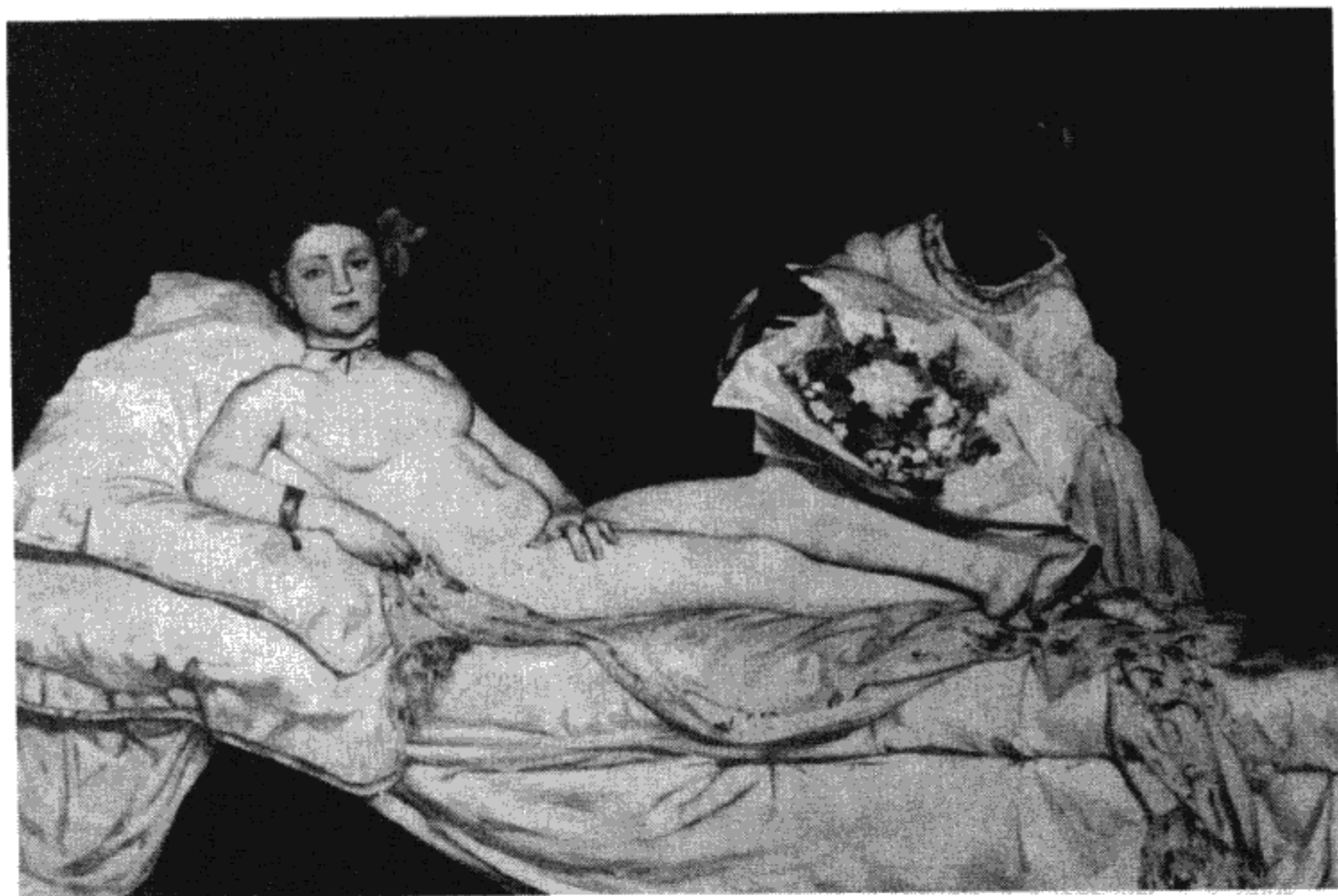


FIGURE-090

现代性响应传统的方式，以美丽的面貌表现在马奈的《奥林匹亚》上，这幅画明显是以提香 (Titian)《乌比诺的维纳斯》( *Venus of Urbino* ) 为模特儿。只不过原本乖巧的狗儿被换成难以驾驭的猫咪 (象征中产阶级强大的共济会运动)，女仆则更加世俗化，其力量也更加暧昧，如当时许多批评家所抱怨的，裸体女子看起来不太像高级妓女，倒像是一般的娼妇。



拒绝与科学及哲学友好并进，等于是自寻死路。”雨果也有同样的想法：“通过科学，我们将了解诗人的崇高视野与社会之美……处于目前的文明阶段，真实确切乃是达到灿烂华美的必要因子，科学取向不仅有助艺术情感，也能使其完整；梦想也需要懂得计算。”<sup>5</sup>像瓦尔兰这样的手工工人当然同意这一点，毕竟他之所以受教育便是为此。史家米什莱甚至还有一套计划。他寻求“真理之诗与纯粹，借此穿透真实直指本质……并且破除分隔自由文学与科学文学的愚蠢藩篱”。<sup>6</sup>

256

由于很少有人能区别科学与情感，混乱与暧昧于焉产生。科学心态虽有助于思想家从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最重要的、普遍受到相信的宗教神秘主义的陷阱中解放，但它并不能使思想家停止思考社会进步的方向及其与传统的关系。“少量的科学会让你远离宗教，大量的科学则会让你回到宗教。”福楼拜说道。圣西门较早曾率先坚持，若没有革新的基督教力量驱动道德目的，他的新社会科学就无法产生任何建树。孔德(Comte, 早期与圣西门合作)追随圣西门的脚步，发表同样的看法。孔德在1830年代主张抽象的、体系的与理论的实证主义，到了1840年代，他的思想却沾染较多的人道主义。孔德在他位于索邦广场的住处写出一篇篇的论文，致力于为实证主义的人道教堂奠下基石。

那些最关注于建构社会科学的人并不想将事实与价值区隔开来。1848年之前，社会科学被区分成大体系者如孔德、圣西门与傅立叶(他们的抽象与玄思或许有一点启发性)，以及经验主义者如1840年代的卫生学者(穷人暴露于极容易生病与堕落的环境里，危险阶级也容易在当中孳生，这些学者只专注于如何移除这些不良环境，并以马尔萨斯式的角度对其进行描述)。然而这两种取向都无法产生清楚明晰的社会科学。这使得蒲鲁东将法国内部越来越明显的资本主义、贫穷与犯罪问题联结起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册只在1867年于德国出版——甚至让这个联结变得更清楚。后来成为布朗基运动核心的医学学生，也使用唯物主义的手术刀来解剖社会及社会病症。另外还可看到一些比较不那么令人振奋的趋势。勒普莱在1850年代结合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建构了支持基督教皇旨的新社会科学。他对家计与家庭生活进行广泛研究，用以确保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基督教

家庭观。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也以相同的勤勉，致力于建立“客观”社会科学以实现其政治目的。<sup>7</sup>

如果不提及阶级关系与阶级联盟等这些造成1848年革命、保守共和国与帝国的复杂演变，就很难理解这些混乱的逆流。在1848年革命中，如我们所见，街垒的进步派社会民主人士加入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放荡不羁者（如库尔贝与波德莱尔）、浪漫主义者（拉马丁、乔治·桑）、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卡贝、勃朗）与雅各宾派分子（布朗基、德勒克吕兹[Delescluze]），以及工人、大学生、街头群众与“危险阶级”代表。苦涩的六月事件完全粉碎了联盟。不管他们真实的角色为何，浪漫主义者与社会主义乌托邦人士在1848年说辞上加诸的强大意识形态印记，已完全被六月镇压所玷辱。“诗人做不了实事。”福楼拜讥讽地说。蒲鲁东发现街垒中的煽动行为既无味又空泛，完全不求实际。虽然如此，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仍是防止各种思维模式臣服于宗教的第一道防线。此外还必须建立其他的防卫与抗议手段：

257

乌托邦主义现在一般已被实证主义所取代。民众的神秘信仰与精神重生的期许则让步于对人性更谨慎的悲观主义。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因为美丽的幻象已在他们眼前粉碎，而他们言谈与写作风格也改变了。<sup>8</sup>

此时，库尔贝在艺术上突然转入现实主义（许多人称之为“社会主义”），波德莱尔猛烈而毫不妥协地拥抱现代性（1848年的暴力赋予现代性较具悲剧性的向度），蒲鲁东起初感到困惑，之后则完全反对乌托邦构想。库尔贝、波德莱尔与蒲鲁东可以有共同的目标，而实际上他们也的确朝着同一目标前进。<sup>9</sup>他们对浪漫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幻灭正是社会对1848年的典型反应，之后他们便转向现实主义与实践科学，并将其视为解放人类情感的工具。他们的内心也许仍是浪漫主义者，但却是手持解剖刀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准备好要在遭遇宗教与帝国专制统治时遁入实证主义与超然科学的盾牌后寻求庇护。不少资产阶级有着类似的结论，但原因却大不相同。有人写道，应组织专业学校来训练有能力的工人、工头、工厂经理以应付“生产战斗”，而非制造出“失业的年轻人，

使其因无能而受苦，并因此成为天生的请愿者，不断向官署提出要求而扰乱国家正常运作。”<sup>10</sup>

帝国对产业与社会的进步相当关注，因此对于整个风潮开始转向现实主义与科学表示欢迎，同时也从旁予以鼓励与收编。表面上，帝国通过开展万国博览会来赞颂新科技，并建立工人委员会来检视科技变迁的成果与应用。然而实际上大多数评论者都同意，法国的科技水平在19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之后则日渐衰退，到了19世纪末则变得相对平庸，而直到1864年为止，第二帝国非但未能反转此一趋势，反而助长了恶化的过程。“政府几乎未曾资助过研究经费——如巴斯德就因无法获得资金而陷入困境——政府政策（如拒绝让大学生享有讨论政治问题的言论自由）使各大学陷入骚动，大学生因而被迫上街抗议或像布朗基分子一样进行地下阴谋。科学与实证主义、自由思想与唯物主义变成了抗议的形式。宗教的神秘主义、实施言论检查的专制主义与第二帝国文化的轻佻，都成了抗议所针对的主要目标。

258 帝国政策的矛盾，也必须从路易·拿破仑赖以维持权力的阶级联盟出现松动的角度方能理解。路易·拿破仑试图以传统当幌子，暗地里鼓吹现代性，并利用帝国的专制主义来支持私有资本积累的自由权利，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却也是不幸的根源。路易·拿破仑之所以在历史上占有如此奇特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他利用了1848年阶级关系的不稳定，借机将所有充满幻灭与恐惧的阶级全聚集在承诺给予稳定、安全也许还有民族光荣的传说之下。不过，路易·拿破仑知道自己必须有所作为。他写道：“走在时代观念前面，观念就会追随你，并支持你。落在时代观念后面，观念就会拽着你向前。与时代观念逆行，观念就会将你推翻。”<sup>12</sup>然而，问题在于拿破仑必须向天主教会寻求奥援，偏偏处于社会底层的天主教徒既反动又缺乏教养，他们在教皇的领导下，完全不愿与进步、自由主义及现代文明妥协。可以确定的是，另外还有一批不为罗马当局所喜爱的进步派天主教人士，这些人如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支持政变，但之后则因痛悔天主教徒与帝国的结盟而被检察官起诉。直到1860年代联盟崩解为止，天主教会与帝国合作所产生的净效果，是让大部分的教育事业全成了社会控制的工具，用来灌输传统价值而非社会进步的观念。这种情况又加

上言论检查，使大学内部的思想自由运动转而成为对帝国的激烈批判。

帝国也因游移于现代性与传统之间而显得相当脆弱。帝国为了追求社会与科技的进步，因此在思想与行动上不得不与传统阶级与传统概念（宗教、君主的权威与工匠的自尊）的力量相对立。除此之外，帝国的基础在于传说，偏偏传说又禁不起细密的检视。当中最令人困窘的部分有二：第一帝国如何从第一共和中兴起，以及第一帝国最终如何崩溃。检察机关有技巧地让人们对这方面的话题保持沉默，并且禁绝一切与此相关的民众表演与剧作（即便是大仲马[Alexander Dumas]的作品也不例外）。雨果在流亡海外时曾痛批“小拿破仑”的种种不法行径，此时也参与争论。雨果从阴谋的观点出发，他在《悲惨世界》中不加说明地精彩描述了滑铁卢之役，并以社论的口吻评论拿破仑一世若是在滑铁卢获胜，“将违反19世纪的潮流”，“对文明来说，让如此广袤的世界完全遵从于单一个人的心智是相当可怕的”，“唯有伟人消失，伟大的世界方能诞生”。虽然《悲惨世界》是在布鲁塞尔出版，但到1862年时，巴黎已“人手一册”，想必雨果的想法已传达到读者心中。<sup>13</sup>

这种援引传统的方式并非新创。像历史学家与作家米什莱、梯也尔与拉马丁对法国大革命意义所做的阐释，便已对1840年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共和派人士援引1852年后的历史与传统来发表政治观点。他们除了表述传统观点外，也杜撰传统。这并非指控他们扭曲，而是指他们在阅读历史时往往为了特定政治目的而动员了传统。传统似乎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即便其尚未达到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所说的那种程度：“宛若活人脑中的噩梦”，连社会进步都得仰赖对传统的召唤。<sup>14</sup>而在这方面，艺术家、诗人、小说家与历史学家倒是有着共通的理念。马奈在第二帝国时期的作品中，有许多是借由表述古典主题（1863年饱受争议的作品《奥林匹亚》，便是直接取材自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来描绘现代生活。弗里德(Fried)指出，马奈的做法不仅响应了米什莱1846到1848年政治与共和主义论文，并且也满足波德莱尔的请求，即以艺术表述现代生活中的英雄主义。<sup>15</sup>

手工工人的经验也是一样。他们的抗争迫使大多数巴黎产业进行调整。手工工人激烈保卫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并且运用

统合主义战术达到目的。当皇帝邀请他们视察科技进步的种种好处，并且记录下他们对1867年万国博览会的观感时，这些工人的响应却是要求皇帝要保卫工匠传统。<sup>16</sup>尽管如此，工人力量在面对新国际分工的竞争与技术变迁时，还是不免遭受腐蚀乃至淹没。这对工人阶级运动所组织的知识分子以及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试图找出通往未来的路，但这条路必须以坚持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例如布朗基主义者就认为这个意识形态是发源自法国大革命）构成巨大的难题。大量移入的移民多半是无技术工人，他们带有堕落的乡村传统与褊狭的地方视角，对工人运动毫无帮助。不过政变也显示乡村有着相当程度的革命意识与抗争，巴黎向来以向落后乡村出口革命情感自豪，此时却反过来从乡村输入革命情感。乡村本身是产生阶级关系与阶级论战的场所，也是阶级政治的温床，然而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大部分巴黎人对此却宁可视而不见。

巴黎工业与商业的新物质环境与阶级关系，还需要一条全新而毫无传统的政治分析与行动路线。原本植根于互助主义与统合主义传统的第一国际，必须创造出新的传统来处理1868到1871年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使得巴黎公社增加些许前瞻与现代主义的色彩。遗憾的是，这个创造传统的过程一直要等到1871年许多公社成员牺牲之后才开始产生效果。意识不仅植根于现在，也植根于过去与对过去的诠释中。

奥斯曼所创造的现代性，本身即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拆除与重建所造成的“创造性破坏”在革命精神中可以找到先例。虽然奥斯曼从未提到革命，但1848年街垒的创造性破坏却帮他铺好了道路。而他果断的行动意愿也换来许多人的掌声。阿布（About）在1867年版《巴黎指南》中写道：“就像认为人性如同白板的18世纪伟大破坏者一样，我对创造性的破坏既喝彩又赞扬。”然而奥斯曼未能从现代性与传统、科学与情感之间的斗争中超脱出来。奥斯曼随后被赞扬或被非难为都市计划上的现代性使徒，而他之所以继续从事原本的工作，部分是因为他对传统的深刻要求。“如果伏尔泰能看到今日的巴黎景观，他将发现巴黎的美丽远超过他的期许，”奥斯曼在《回忆录》中写道，“伏尔泰将无法理解为什么巴黎人，他的后人，他高贵灵魂的后裔要攻击、批评与束缚巴



黎。”奥斯曼直接诉诸启蒙的理性传统以及各类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Rousseau]与圣西门）——甚至还包括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如勃朗与傅立叶——的公开期望，借此将理性与秩序加诸这座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的顽强城市之上。维德勒（Vidler）认为，巴黎的奥斯曼化将“理性主义的分析技术与旧体制的形式工具（如第一帝国及其制度所重新恢复的）推导至逻辑的极端”。<sup>17</sup>我怀疑，这些传统根源乃是奥斯曼的工程为人接受的原因之一。除了阿布之外，其他作者也在具影响力的1867年版《巴黎指南》（几位杰出作家合著，以增色当年的万国博览会）中明确地从传统的角度赞扬奥斯曼的工程。

但巴黎长久以来就被称为病态的城市。因此奥斯曼便以外科医生的姿态出现：

在漫长的染病过程中，病人一直承受着痛苦，在外科医生的努力下，巴黎的身体终于能一劳永逸地从疾病、癌症与疫疾中被解救出来。“切割”与“刺穿”成为描述手术的形容词，凡地形遭到破坏之处，便须“开肠剖肚”以重建动脉恢复血流。这些一再被病理学家、外科医生乃至批判者所复诵的隐喻，在与科学的行动本质混淆之后，便坚定地根植于都市计划的无意识模拟中。<sup>18</sup>

“卫生科学”与“外科医学”的隐喻相当有效且引人注目。奥斯曼在处理巴黎的新陈代谢功能时——空气、饮水与污水的循环——运用了具象化的策略，将城市塑造成一具必须将其维持生活功能予以涤净的活躯体。受人喜爱的布洛涅森林与温森斯被称为巨大的都市之肺。不过奥斯曼多半以不带感情的方式将巴黎看成是一座人造物，并且认为必须从机械、自然科学原理与技术来理解巴黎。用来对巴黎进行三角测量的高塔，象征着以巴黎为整体的新空间视角，如同奥斯曼对直线几何学与精准测量的强调，希望以此规划饮水与污水的流动。奥斯曼将工程科学付诸实践，并要求做到确实、完善与一丝不——如雨果所说的，伏尔泰与狄德罗的“梦想”就是“学会计算”，或者用卡莫纳（Carmona）比较喜欢的说法，梦想家（路易·拿破仑）会找到某个会计划的人（奥斯曼）。不过，如我们所见，奥斯曼也尝试迎合甚至操纵民众

的心理——因此才有了精致的街道陈设（长椅、煤气灯、贩卖亭）、纪念碑、喷泉（如圣米歇尔广场）、林荫大道以及公园中的哥特式岩穴。奥斯曼试图在伟大设计的细微之处也注入浪漫的情调，用以彰显启蒙运动的理性与帝国的权威这两个孪生理想。

261

如果城市的身体完全改观，灵魂将会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吵。例如，深知“破坏将带来自然愉悦”的波德莱尔，对于巴黎的转变不仅无法抗议，也未曾提出抗议。他的名句：“唉！城市面貌改变的速度竟快过人心”，这句话与其说是用来批判当时的变化，不如说是直言批评人们缺乏赶上现状的能力。对于关切卫生问题的人来说（特别是针对曾在1848到1849年间肆虐，而后又在1853到1855年与1865年短暂复发的霍乱疫情所进行的防堵），改建工程作为洁净身体与灵魂的形式相当受欢迎。然而也有许多人指责改建工程侵害了巴黎的内脏。巴黎在外科医师的刀下奄奄一息，它将成为巴比伦（或者是更糟糕，它会变成美国城市或像伦敦一样！）。巴黎的真实灵魂与本质不只因为外观改变而破坏，也因帝国纪念日的道德沦丧而毁灭。

哀悼之声随处可见，并且通常伴随着一股怀旧之情。人们经常想起旧巴黎被破坏而往日记忆因此烟消云散。左拉在《猎物》中插入一段醒目的场景。曾经在工人委员会中负责估算土地征收赔偿的成员，在回到幼年曾居住的街坊参观时，看到当初住的建筑正在拆除，拆毁的部分刚好露出过去所住房间的壁纸以及他曾“放入300法郎，一枚一枚硬币完好叠着”的碗橱，不禁百感交集。这样的主题杜米埃援用了不只一次。相反，沙卡尔“似乎从漫步拆除工地中得到不少乐趣……他沿着切割的纹路走着，带着一股始作俑者般的神秘愉悦，仿佛是他自己亲身以钢铁手指紧握鹤嘴锄掘出第一道抓痕似的。沙卡尔跳过这条泥淖溪流最末一个泥水坑，想着瓦砾堆下有300万法郎正等着他取用”。没有别的地方能比这部描绘奥斯曼化粗俗的杰出小说更能表现出创造性破坏的无耻欣喜。<sup>19</sup>

怀旧也可以是强有力的政治武器。君主派作家路易丝·弗约（Louis Veuillot）在其深具影响力的作品《巴黎的气味》（*Les Odeurs de Paris*）中，运用了怀旧题材并产生了巨大效果。他想到父亲当初降生的屋子遭到拆除，写道：“我遭到驱逐，其他人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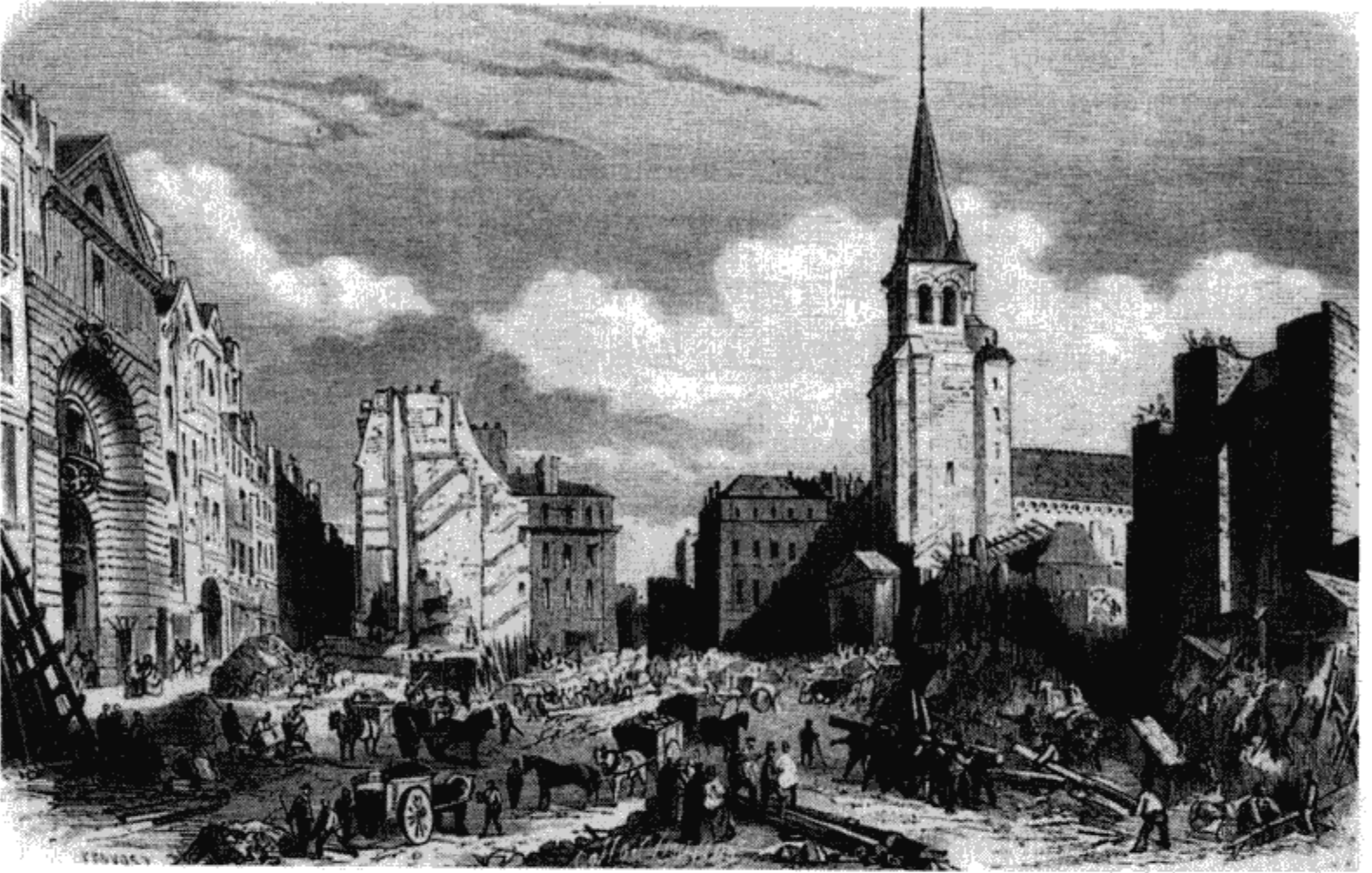


FIGURE-091

拆除的景象——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图，兰东[Linton]与托里尼的作品）与雷恩街（rue de Rennes，下图，科松[Cosson]、斯梅顿[Smeeton]与普罗沃的作品）——当时的人通常以平版印刷加以记录保留。

来定居在那儿，而我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到处都覆盖着污秽的人行道。这是一座没有过去，充满无记忆的精神、无泪的心肝与无爱的灵魂的城市，这是一座游荡着居无定所的群众与流窜着人类碎砾的城市，纵然可以发展为世界的首都，也无法拥有任何市民。”费里（1868年）分析奥斯曼的创造性会计，当他面对“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堂皇而令人难以忍受的新住宅、富裕的群众、令人难以忍受的庸俗、令人惊骇的唯物主义时”，不禁为“老巴黎，伏尔泰、狄德罗与德穆兰（Desmoulins）的巴黎，1830与1848年的巴黎”流下大量的眼泪（就算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也是见风使舵）。<sup>20</sup>当奥斯曼辩护自己的工程完全是遵循伏尔泰与狄德罗的传统时，他心里一定想起了上面这段话。在他最后一部于1865年出版的作品中，蒲鲁东看到巴黎的外观完全被力量与疯狂所摧毁，他仍坚持巴黎的精神并没有被击溃，老巴黎被埋在新巴黎底下，老巴黎人则被洪水般的世界主义者与外国人所淹没，但老巴黎将如幽灵一般从过去复活并且唤起对自由的追求。对富尔内尔和其他人来说，问题出在奥斯曼在几何学上对直线的依赖，造成了单调、同构型与乏味。富尔内尔抱怨说，很快巴黎将如同大型的法隆斯戴尔，所有事物都予以均分并予以铲平使其处于相同的高度上。巴黎的多样化完全被抹杀，代之以单一化的城市面貌。富尔内尔说，巴黎只有一条街道——里沃利街，而这条街被复制于各处，这或许能解释雨果神秘的响应方式，当时他正流亡国外，有人问他是否想念巴黎，“巴黎是个理念”，他说道，至于其余的就是“里沃利街，我一直很讨厌里沃利街”。<sup>21</sup>

当然，面对这些感受我们很难区别哪些是真正的失落感，哪些只是君主派人士与共和派人士所采取的战术手段（我怀疑费里属于此类），以过去的黄金时代作为攻击帝国统治的凭据。然而奥斯曼的工程只是其中一个引爆点。旧行业的消失、新行业与新所有权结构的兴起、信贷机构的出现、投机事业的支配、时空感的压缩、公共生活与公共景观的转变、粗野的消费者主义（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对此表示哀悼）、移民与市郊化所造成的邻里不稳定——这些都产生了令人不满的失落感，并且容易在新巴黎取代老巴黎的过程中引起为全面的愤怒。被时代遗弃的人，如波德莱尔的老小丑，不可能被现代性与进步的童话所安抚，也不可能相信





FIGURE-092

这两幅讽刺画中，杜米埃以怀旧为题，描绘市民在奥斯曼所造成的变迁中丧失的东西。第一幅画，男人惊讶地发现他的房子已经被拆了，那种感觉就像遭遇了丧妻之痛。第二幅画，男人抱怨利穆赞工人的冷淡，他们拆除的房间正是男主人当初的蜜月新房，而工人对于男主人旧日的记忆毫无尊重之意。

现代性与进步是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与解放之物。

如何解读这些现象是个问题。当然某些事物消失了。但这些消失的事物是什么，又真的值得令人遗憾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光环的丢失》（*Loss of a Halo*）为例来思考。<sup>22</sup>波德莱尔记录了一个诗人与一个朋友在某个声名狼藉之地偶遇的情景（根据龚古尔兄弟的日记，这其中多半是出于真人真事，当波德莱尔从妓院走出来时，碰巧遇到正要进妓院的圣伯夫，圣伯夫看到波德莱尔感到很高兴，于是改变主意跟波德莱尔喝酒去了）。诗人解释说，由于对来往的马匹车辆感到畏惧，他急忙穿越大道，“踩踏在泥泞与沸腾般的混乱中，疾驰的死神从四面八方向我奔来”（这份紧张感的视觉呈现，可从杜米埃《新巴黎》的生动描绘中看出。见图27）。急速移动使他的光环从头上脱落，掉进“泥泞的碎石子路中”。他因为过于惊恐而未能实时拾起，只能扔下光环，但之后却发现丢失光环反而有好处，因为现在他可以“到处行走而不被人察觉，可以跟寻常人一样，耽溺于荒淫之中”。此外，想到“某个拙劣的诗人”可能会把光环捡起来戴在头上，他不禁一阵雀跃。

《光环的丢失》引起许多讨论。沃尔法特（Wohlfarth）提到当他对照《光环的丢失》与《共产党宣言》的意象时感受到的震撼：“资产阶级，无论从事何种令人尊崇与敬畏的职业，此时都被摘下了光环。”资本主义将“医师、律师、教士、诗人、科学家转变成



受薪劳工”。对沃尔法特来说，这首诗意味着“作家在资本主义城市盲目、割喉的自由放任中陷入困境：交通使得诗人的传统外观变得过时，并且迫使诗人在活命与留下光环之间做选择”。难道还有比这种说法更能表现手工工人在1848年革命时所面临的困境？贝尔曼 (Berman) 提出另一个角度的诠释。他将焦点放在交通上：

现代人的原型，如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被掷入现代城市交通漩涡中的行人，孤零零地对抗庞大、快速而致命的质量与能量凝聚物。快速发展的街道与大道交通不知时空限制为何物，外溢到每个都市空间中，将自身的速度加诸每个人的时间之上，将整个现代环境改造成“不断移动的混乱状况”……这让大道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完美象征：个别资本主义单位的理性，使得将这些单位结合起来的系统陷入无政府的理性之中。<sup>23</sup>

266

贝尔曼说，波德莱尔“希望从交通中，从无政府的能量中孕育出艺术作品……因‘光环的丢失’而得到某物”。只有拙劣的诗人才会试图捡起传统的光环并且戴上它。除此之外，贝尔曼也认为奥斯曼是资本主义开发商的原型，也是创造性破坏的大天使。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本身即为巴黎转变下的创造性产物，就跟杜米埃的讽刺画一样。沃尔法特有不同的看法。诗人最后出现在声名狼藉的场所并不令人意外。这里“波德莱尔预见到资产阶级社会将逐渐商品化并成为冷漠的卖淫狂欢场”。这样的景象也回应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劳动堕落看法，以及他认为的金钱关系穿透社会生活之中：“普世性的卖淫似乎已成了个人天分、才华、能力与活动的社会性格发展必要的一环。”<sup>24</sup> 波德莱尔对娼妓的着迷——娼妓同时兼具商品与人的特质，通过娼妓的性行为，金钱于焉流动——以及共同体意识的瓦解（只剩依靠金钱流通而存在的共同体意识），以美丽的词句呈现在他的《黄昏》(*Crepuscule du Soir*) 中：

映照随着风震颤的灯火，  
街上的娼妓又开始蠢蠢欲动：  
就像蚁丘开启了洞口，各种隐秘的路径



FIGURE-093

里沃利街以其直线延伸的造型，经常被视为奥斯曼的代表与象征。因此，流亡海外的雨果评论说，巴黎仍是个伟大的理念，但它在外观上看来俨然与里沃利街一模一样，而“我讨厌里沃利街”。

可以通达各个神秘的处所，  
又像敌人挖掘着堡垒地基，  
或苹果内的虫子，吃着自己该吃的东西，  
娼妓安稳地在拥塞不堪的市中心内穿梭不停。<sup>25</sup>

在金钱与资本流通下，巴黎成了卖淫的场所（见加瓦尔尼的讽刺画，图40）。或者如沃尔法特的结论所云，所谓声名狼藉之所指的就是巴黎，诗人“就像老寻芳客在寻找老情妇一样”，寻找着巴黎这个老娼妇，如同《巴黎的忧郁》结语所说的那样。波德莱尔称巴黎为“妓院与医院、监狱、炼狱与地狱”，他宣告：“败德的城市，我爱慕你。”

在帝国权威的庇护下改造巴黎，当中所产生的紧张感绝非奥斯曼所能化解。而他的重建计划势必将招来政治与情感反应。奥斯曼将巴黎交给了资本家、投机客以及银行家。他让巴黎沦为卖淫的狂欢场。奥斯曼的批评者一方面觉得自己被排除在这座狂欢场外，另一方面也认为整个过程既可憎又猥亵。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波德莱尔对巴黎的娼妓意象就有了特定意义。巴黎的意象争议不断，第二帝国时期刚好是转折点。巴黎长久以来一直被描绘成女性形象。巴尔扎克（见第一章）认为巴黎是神秘的、善变的并且经常是可收买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的、不修边幅的与不可预测的，特别在革命中是如此。左拉作品中的巴黎形象则相当不同，巴黎是个堕落而受到残忍对待的女性，“被开肠剖肚，流血不止”，它是“投机者的猎物，贪婪消费的受害者”。<sup>26</sup> 受到如此残忍对待的女性，在革命时期除了起而响应，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性别与巴黎的意象在此构成了古怪的联结——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联结预示了1871年妇女与巴黎将面临的灾难。

# 说辞与表述

在可由自然科学的精确予以测定的生产经济条件的物质转变与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简言之，人类赖以意识冲突并为此而战的意识形态形式之间进行区别，总有其必要。

267

——马克思

人们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向自己与他人表述自我与他人？人们如何描绘巴黎社会的轮廓，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与空间位置以及当时正在进行的剧烈转变？而这些表述又是如何在政治论述的说辞中改换位置、运用与形塑？这些问题虽然简单扼要，却不易回答。

1848年的经验提供给往后从事革命者一个参考的基准。“秩序”与“混乱”是代号，但代号背后则隐藏了一些不可遗忘的经验。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就是个明显的例子。5月15日，当国民会议遭到政治俱乐部攻击时，“有个从未谋面的男人上台，从那天起，我对这个人的记忆只有厌恶与恐惧。他的脸颊苍白瘦削，嘴唇毫无血色，看起来好像生了病，皮肤惨白散发着一股邪气，说是行尸走肉也不为过；就我目光所及，他身上穿的并不是亚麻织品，只是一件破旧的黑色大礼服，外加他不断挥动的细长肢体；我想他大概是住在下水道，而且才刚从那里出来。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布朗基”。6月24日，托克维尔在街上被一个驾着运菜车的老女人拦住去路。托克维尔“很不客气地叫她让路”。

她非但不让，反而下了车，气冲冲地往我这里冲来，我不得不慌乱地防卫自己。我看着她脸上那副令人惊恐而可憎的表情，那是一张充满煽动热情与内战愤慨的脸，我全身不禁为之一颤……仿佛广大群众的情绪已经点燃，连个人的情感也随之沸腾。<sup>1</sup>

资产阶级恐惧的不只是公共秩序的崩溃，还包括了摆脱束缚的情感所带来的恐怖、脱缰的热情、娼妓与好色的妇女、从地下巴黎的下水道爆发出来的邪恶，以及阴魂不散的危险阶级。对混乱的恐惧被过度渲染，无怪乎“秩序党”采取了严刑峻法的压制方式，先是创建了没有共和派人士参与的共和国，之后则沦落到把帝国当成唯一的希望。然而帝国并没有带来秩序，反而必须以积极的监控与警察的压制来保持表面上的安定。那么，谁或什么是造成混乱的元凶呢？工人指向（如果他们能倾诉心声的话）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及其所带来的周期性投机、市场崩溃与失业；脱缰的贪婪与逐利的热情；工作稳定性、技术与工人尊严的受到破坏；以及以全体利益为名而肆无忌惮地行阶级战争之实。工人也责难移民与外国人、不公平的竞争，以及那些不给予他们尊严或权利的无情官僚与冷漠当局。资产阶级责怪不尽责与轻率的政府、颠覆分子、放荡不羁者、荒淫的女子、自由思想家、社会主义者、四海为家的外邦人，以及乌托邦主义者，这些人只需稍加挑衅便可能刺激“卑贱群众”起而作乱与革命。工人与资产阶级都聚集起来要求保卫秩序，但他们心里面所想的“秩序”却不尽相同，手工工人要求通过结社来保存他们的技术，地主与银行家则要求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前来造访的英国人惊讶地发现，接待他们的东道主在宣称“社会”极具威胁性时，其实指的是这些东道主自己所跻身的上流圈子。<sup>2</sup>相同的词汇却明显有不同的意义，因此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正确地诠释这些意义。

这件任务因政治压制与检查制度而更形困难。各种隐喻与讽喻的意义，不管是假托还是令人费解的讽刺，都成了政治论述的一环，而且似乎都已广泛为人所理解。天主教素有重视象征主义与讽喻的传统，这些都可在政治上发挥功用（包括教会本身，尤其教会在1860年后转而与帝国对立）。劳工的统合主义传统，以





FIGURE-094

巴黎经常以女性形式出现，此处将巴黎描绘成被绑卧在地的妇女，身上爬满了无数建筑工人。

及共济会运动（连同其人会议式），提供了各种暗号与语言。而历史的改写，特别是革命时期的历史，也形塑了人民的想象。检查制度也察觉到这类问题——他们将一首单纯的歌曲列为禁歌，只因为当中提到了一种帽子，可能指涉了共和派人士的自由帽。<sup>3</sup>然而，如果帝国的批评者将葬礼、节庆与其他公共事件转变成自发性的群众抗议场所，政府当局又当如何？问题不在于2.5万名工人会因为24小时前预告将举办共和派领袖妻子的葬礼而出现，而在于任何的葬礼都有在墓旁致哀悼词的传统，而这个致词的过程往往演变成群众的政治集会。

表述与沟通的意义繁衍得十分快速。除了报纸流通量暴增，还伴随着政治多样化与懂得如何规避检察机关监督的技术熟练编辑的出现。另外一些人则倾向于直接表达自身的观点，并且因遭到查禁而感到光荣。到了1860年代末期，每个月都有新报章杂志发行。当具影响力的报纸如《集合报》（*Le Rappel*）控制在激进程度不下于流亡海外的雨果的批评者手上时，政府势必得面临许多麻烦。随着民众对教育、罗曼史与旅行的喜好逐渐增长，商业也

趁此良机利用报纸大作宣传，廉价的报纸杂志因此大为盛行。这些小报的内容多半无涉政治，但对读者来说也吸收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到了1860年，廉价文学已经比每日报纸的发行量更大且更受欢迎。更糟的是，这些出版物几乎全是画报形式。图画与讽刺画——杜米埃的作品即为著名的例子——乃是政治嘲讽与政治争论的庞大动力。库尔贝曾于1848到1851年间大肆批评时政，创造了属于民众的艺术，这一点不会为人所轻易遗忘。<sup>4</sup>



270

沙龙仍然属于政治场合，不仅吸引平民阶级，也吸引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希望一个礼拜选一天，将当天的入场费提高，如此一来他们就不用与满身汗臭的工人贱民挤在一块儿）。尽管政府禁止雨果的剧作上演，但却无法阻止《悲惨世界》的传布，这本书打从1862年于比利时印行开始就几乎人手一册。而此处也存在另一个问题。运输与交通系统的改善以及大量的外国游客（1855到1863年间，来自英格兰的游客增加了十倍之多）使得外国新闻与评论加速流入法国，与此同时，将海外流亡人士的政治论文偷渡入境的能力也大为增强。1859年，皇帝决定特赦海外流亡人士，其用意不在于宽宏大量，而是认为与其让这些入滞留国外，不如让他们回到法国，反而便于监视。由于洞悉皇帝的用意，蒲鲁东有一段时间留在国外，而勃朗与雨果则是只要帝国存在一天，都选择留在国外。

要从意象、表述与政治说辞的漩涡与混乱中找出主流议题或许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不过有些主题的确需要更深入的说明，而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人主要的关切大多集中在秩序与混乱、现代性与传统的拉扯上面。

FIGURE-095

展示新艺术的沙龙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沙龙实在太热门，因此资产阶级坚持要收入场费，好让他们能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在当时，进入沙龙完全免费（如这幅杜米埃讽刺画所描绘的），因此通常是人山人海。

## 地理的想象

铁路网延伸出来的触角，以及海上航班与电报联结的日渐规律与加快，动摇了人们原本的时空视野。信息、商品、金钱与人员在1870年时环绕世界的速度远快于1850年。国际劳动分工不断增强的竞争与依赖，使巴黎从地方的束缚中解放，但也使其更容易受到远地事件的伤害（例如美国南北战争中断了生棉的进口，并影响了巴黎制品对重要市场的出口）。海外探险（巩固法国位于北美的殖民力量、对意大利战役、克里米亚战争、企图拥立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为墨西哥皇帝却胎死腹中、开凿苏伊士运河）也产生了地方效应。市场商品不断地混合（从基本食物到奢侈的舶来品），每日都造成空间关系的变化。快速增加的报纸杂志（通过电报传递新闻）将信息送到人们的午餐桌上，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外投资、价格波动、因地缘政治对立而起的获利良机，到外国各种古怪习惯的故事。附上照片之后，空间与时间似乎就完全缩到单一的影像之中。每征服一次空间（铁路路线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就是一次热烈庆祝的庆典，如同万国博览会，不仅强调了新地理的联结，也鼓吹了新科技。

271

人们无需离开巴黎，便能体验空间关系转变的震撼。内心的地理世界因此必须调适并且学会欣赏构成当下全球政经活动空间的地理变动与“他者”世界。这尤其意味着，要顺从市场物品交换（例如，我们可以想想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描述萝莎内特房间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舶来品，本书原版第87页引用）所隐匿的社会与空间关系。小报上充斥着各种旅行见闻与受欢迎的地理杂谈，显示当时公众对这方面充满了好奇。<sup>5</sup>然而旅行与旅行文学除了扩展心智外，也很容易以偏概全与增添恐惧。如此一来，“他者”世界又怎能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广泛为人所理解？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我们将看到——“他者”是在广泛的种族主义与排除异己的角度下被建构出来的，不仅对国内政治，也对法国即将组建完成的整个海外殖民帝国有相当不利的影响。

法国的地理想象长久以来一直受到环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重重阻挠。孟德斯鸠与卢梭都认为并非所有气候都能产生自由这个

果实，因此并非所有民族都能享有自由。“独裁主义适合热带气候，野蛮主义适合寒带气候，而好的政府则适合温带地区”。<sup>6</sup>到了1870年，这种说法已被一些作家如戈比诺（Gobineau，他颇具影响力的作品《论人种的不平等》[*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于1855年问世，主张北欧人种的优越）转化成单一的坐标方格，并以此将一些标准如“文明的”、“野蛮的”与“未开化的”直接放诸世界地图之上。<sup>7</sup>野蛮人有时被描绘成高贵之人，然而一般民众的想象长久以来已因卢梭理想被库珀的故事所取代（巴尔扎克经常提到）的影响，并且发现野蛮人在自然状态中过着次等人类的生活，因此普遍认为野蛮人没有资格拥有权利或公民资格。野蛮人虽然拥有充分、明确而不可小觑的政治组织形式，但他们的价值观与实践（特别当他们不是基督徒时）却与文明格格不入。

这个诠释的坐标方格松散地架构在整个世界与巴黎之上。资产阶级例行性地将生活在贝尔维尔“边界”上的工人描绘成野蛮人。批评者有时会认为是奥斯曼推动社会区隔才造成这种结果。“一座城市，如果它的邻里街坊被区隔成拥有财富过着优雅生活的人，以及注定要为生计奔走的人，那么这样的城市将不能算是基督教城市，而只是一座野蛮人的城市”。<sup>8</sup>如果工人是“野蛮人”、“卑贱群众”、罪犯与“危险阶级”，如资产阶级经常描绘的那样，那么1848年革命的确显示出工人内心存在的野蛮性格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然而雨果却自豪地宣称，工人是“文明的野蛮人”。虽然如此，在1848与1871年时，工人结社的结局，却由“文明”与“秩序”的力量取得道德权利，并且将革命分子当成狗或野蛮人而加以屠杀。以如此激进的角度来表述工人阶级巴黎这个“他者”，正可说明这场阶级战争何以如此凶残与暴力。对贵族与君主派人士来说，将自身统治权利的基础建立在种族优越论亦非罕见之举（北欧的）法兰克人优越于（塞尔特）高卢人（工人与农人）。<sup>9</sup>因此也难怪镇压1848年革命的凶残行动会交给卡芬雅克，这位将领的杀人本领是从对抗“野蛮人”的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战争中磨炼出来的。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米什莱视文明为“理性、精神、西方（男性要将自己与自然的起源区隔开来，并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自然之上）、东方（女性）的斗争产物”。情欲化的种族主义与



其中所带有的性别形象，经由一些画家如德拉克洛瓦与许多浪漫主义作家的增色，产生了萨义德（Said）所说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sup>10</sup> 东方被视为是文明赖以发源的子宫，是非理性与情欲女性特质的处所，同时也是野蛮实践的所在。这种意象并未随人类交流的日益频繁而改变。当福楼拜于1849年沿尼罗河往上游进发时，他跟许多之前曾探寻这条航路的人一样，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从对东方女人的肉欲中“找到另一个家”。福楼拜之后的作品完全显现了这一点。希策曼（Hitzman）将这种现象诠释为“向古代世界做无意识的投射，深刻反映出面对可怕母亲时的焦虑不安”。<sup>11</sup> 它也表现出对“具破坏性的、阉割的女性性欲”的深刻恐惧（类似雨果与托克维尔所记录的1848年革命以及往后再度爆发的1871年巴黎公社）。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诠释，便很难理解福楼拜《萨朗波》（*Salammbô*，生动描绘了强烈情感抒发下的暴力场景）与他写给母亲的信的内容。

如果推论至此便行打住，不免过于简化。如萨义德指出的，东方所构成的威胁除了想象的放纵性爱外，还破坏资产阶级的家庭观与家庭崇拜（尽管完全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幻想）。欧洲与资本主义的“时间、空间与个人身份的理性”，对立于“不可想象的古代、残酷之美与无穷的距离”。米什莱与圣西门分子因此以优越的启蒙理性之名，利用铁路、运河与商业插入（这个词汇带有声名狼藉的性意涵）东方并支配东方。东方顺服于西方乃是文明进展的必要条件，如同女性应顺服于男性的权威与控制。在《金钱》中，左拉所虚构的沙卡尔（大致以真实生活中的佩雷尔兄弟为蓝本）根据西方标准与西方商业和资本主义理想（见前，页122 [原版]）来改造东方。<sup>12</sup> 然而福楼拜却不采取这条进路。许多读者嗜读小报中有关后宫、王子与天方夜谭的故事，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价值与文化，福楼拜利用东方神话探索自身人格中的“他者”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层面。回想在埃及的旅程，福楼拜写道：

我们所缺乏的不是风格，也不是手指的熟练度与拉琴弓的天分。我们有大型的管弦乐团、丰富色彩的调色盘与各种资源。我们或许还拥有过去从未有的诡诈巧计。不，我们缺乏的是固有的原则，事物的灵魂以及主体的真正理念。我们勤做笔记，到处旅



行；空虚！空虚！我们成为学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医生、补鞋匠与有品位的人。这些能给我们什么好处？我们的情感、活力与热情又在哪里？该从何处启程？又该前往何处？我们精于吸吮，我们经常舌吻，我们彼此爱抚的时间长达几小时：然而——该办的正事！射精，生小孩！<sup>13</sup>

那么，“主体的真正理念”又是什么？福楼拜注意到，“旅行使人谦逊”。很明显地，他并未将东方的观念据为己有。他看穿了东方神话，认为它只不过是西方的神经病症。在他的小说《萨朗波》中，在充满东方色彩的场景之下，他戏剧性地预见到男性歇斯底里下的暴怒，造成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暴力。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种诠释模式。例如埃利泽·雷克吕斯(Elisée Reclus)就寻找一种完全不同于米什莱或福楼拜的世界地理理解。雷克吕斯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和谐，不仅“人”与自然是如此，“地球上各个文化之间也是如此”。这种说法背后预设着乌托邦的观点。“迄今人类分裂成不同的潮流，但终将汇合成单一的河流，我们将一起流向大海，所有的生命将在那里流逝并且重获新生”。雷克吕斯——蒲鲁东的赞美者、巴枯宁(Bakunin)的共谋者、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以及克罗波特金(Kropotkin)未来的合作者——摆脱“进步派”米什莱所加诸的心理剧(psychodrama)，并且产生了具有巴黎手工工人乐观互助主义气味的地理观点。雷克吕斯支持第一国际将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的计划。雷克吕斯的地理思想，呈现在他从1860年代开始写就的大量作品中（他的作品长久以来一直为人所忽视，直到现在才受到重视），提供了不同的理解与呈现“他者”的方式，不仅充分而精彩地表现出个人尊严，也说明了潜在和谐。<sup>14</sup>与圣日耳曼区富裕沙龙刺眼的帝国主义特质比较，这种说法无疑较能与巴黎作坊的观点一致。

274

然而，东方主义只能说明一般性的观点。同样的过程固然可增进对世界的知识，却也容易造成对世界的误解。在不断变迁的国家空间经济中，城市与乡村以及巴黎与各省的关系意象，往往被阶级利益与阶级偏见所混淆。虽然资产阶级圈子普遍（如巴尔扎克所显示的）对乡村与外省生活有着一定程度的否定感，但乡

村仍是流入巴黎的各种非劳动所得的稳定基础。与巴黎的狂暴不安相比，乡村也是顺服与反动的宁静避风港（有时并非如此）。每当情势失去控制，受到威胁的资产阶级（乃至艺术家与作家如德拉克洛瓦、福楼拜与乔治·桑）便逃到乡村，而乡村也是动员军队与国民卫队打击1848与1871年巴黎叛乱的地方。外省法国是巴黎生活与法国政治赖以建立的、稳固而不可见的磐石。乔治·桑的小说所呈现的乡村恬静景象更加确认了这一点。而在乔治·桑的鼓励下，就连工人诗人（许多人来自外省）也天真地主张不具威胁性的社会主义。

因此，当1851年政变发生时，人们没有预料到乡村居然会出现广泛的反抗运动。它显示出乡村的阶级关系、不满与革命情感。库尔贝将这种情感带入1851年的沙龙中，尤其是他的画作《奥南的葬礼》，麻烦的是库尔贝明确呈现出法国的乡村与外省面貌，表现出惊人的现实主义，并以此赢得“绘画界蒲鲁东”的称号。<sup>15</sup>涌入巴黎的新工人都是来自乡村，充满了暧昧的阶级经验，他们将自己在利穆赞、克勒兹、瓦尔、塞纳-马恩省-瓦兹（Seine-et-Oise）与杜省（Doubs）的经验带入巴黎，他们身上烙印着特定的革命情感。1868到1871年的工人运动，其中许多领导人如瓦尔兰都是出身外省与乡村。不过到了第二帝国末期却出现诡异的反

FIGURE-096

随着新运输模式的出现以及奥斯曼将大片郊区并入巴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幅杜米埃的讽刺画中，两个农人庆贺自己突然间成了巴黎人。



转：即便是平民阶级也能到乡间游憩，接触自然被商品化之后变成了一种消费品，其重要性不下于为新工业与住宅开发商寻找新空地。<sup>16</sup>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印象派画家开始了他们的画作。

巴黎的内部转变与市郊化的开启在人们的理解上总是蒙上了一层政治面纱。评论者接踵其后，却只是有样学样地重蹈暧昧不明的覆辙，浑然不知何以如此。贝尔曼认为波德莱尔《穷人的眼睛》显示出奥斯曼的大道如何在“无意间打开了自我封闭且深奥传统的都市贫民世界”，并且发现“以往的神秘原来是一片悲惨”。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奥斯曼化所造成的空间区隔乃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正确。第二帝国时期，外向性、公共性与集体化风格的都市主义工程改变了巴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平衡。公共投资的组织是以私人利益为中心，而公共空间也遭到私人的占用。对资产阶级来说，外部空间成了内部空间，而全景、透视与照相术则将外部空间引进到内部空间里来。<sup>17</sup>煤气灯照亮的大道、炫目的商店橱窗、街旁的露天咖啡座（第二帝国的发明），这些——如我们所见——都成了向金钱与商品力量行臣服礼的走廊，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的游戏空间。在《穷人的眼睛》中，波德莱尔的爱人要求咖啡馆老板让那对衣衫褴褛的父子打包走人，其中所显示的意义已非以往我们所熟悉的遭逢贫穷的场面，而是一种私有财产凌驾于公共空间的现象（见前，页133 [原版]）。

276

讽刺的是，新的交通工具（大道、街道与公共马车）与照明工具使得巴黎受到前所未有的详细检视。都市空间的体验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英雄莫罗，游走于巴黎的各个空间及市郊，所到之处收集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体验，其空间感受不同于巴尔扎克。虽然同样都有分散的现象，但比较特别的是莫罗可以自由地移动，甚至可以自由进出1848年革命的空间。随着金钱与商品的易手，莫罗也轻易在空间与空间、关系与关系之间游走，并且同样感到讽刺与疲惫。不过，莫罗在四处徘徊之余也并非完全不受限制，他所移动的地区大致与金钱循环集中的地区相同。莫罗没有理由待在手工业者支配的贝尔维尔或甚至巴黎部分东部地区。他去的地方只局限在巴黎的资产阶级区及其邻近地带。对福楼拜来说，这样的区隔天经地义，就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其中的问题，到了左拉的民族志研究才将其他地区带

回到文学的核心地带。

资产阶级并不喜欢遇到“他者”，如工人阶级或危险阶级（就像《穷人的眼睛》中波德莱尔的爱人）。资产阶级还有另一层恐惧：群众很可能包藏颠覆的因子或者会突然变成狂暴的暴民。这种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娼妓混杂在群众当中，在大道上来去自如，完全无视于警察的禁令与驱逐。当布朗基决定检阅他的秘密军队时，命令一下达，2000名士兵，他们互不相识，甚至也不认识布朗基，混在战神广场上的群众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布朗基面前通过。<sup>18</sup>如果资产阶级要维持自身的阶级地位与权力，就必须控制空间与群众。如同1848年，1868到1871年进退维谷的局面，起因于共和派资产阶级必须开放空间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在遭到削弱下，资产阶级无法抵挡来自工人阶级与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压力。正因如此，来自贝尔维尔的平民阶级再度占领巴黎市中心，才会具有如此重要的象征性。而就当时的大环境而论，不管是出于想象还是事实，穷人与工人阶级其实是不许住在战略要地的，甚至还必须远离被视为资产阶级内部空间的大道。外表看起来开放了更多空间，实际上却通过强制贫民窟化与激烈地进行排他等社会实践来施以更多的区隔与封锁。左拉在回顾时，面对相同的巴黎空间，他所看到的是封闭，而福楼拜所看到的却是开放。因此，资产阶级的地理想象企图将社会空间的排他与秩序加诸奥斯曼工程所开启的空间上。

---

## 集权与分权

---

传统中央集权国家、市民社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法国政治争论的焦点。君主制与教会都认为，处于科层分明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应该尊敬权威。雅各宾派期盼一个强大而中央集权的权力，但也希望其正当性能根植于摆脱市民社会科层的人民主权意志之中。雅各宾派抨击工人组织剥夺了劳工的自由，而其批判的火力跟他们攻击宗教一样猛烈。第二帝国为了凌驾于工人与教会世界之上，便借由普选制将皇帝的地位予以正当化，使其拥有普世性的权威。然而还是有强大的批判声浪批评这种中央集权形式。一位英国访问者认为法国的政治体系是

277

“共产主义的一种粗劣形式”，并且不理解为什么法国人会如此赞赏这种政治学说在实际上的运用结果——就理论形式看也是如此——“为法国人带来极大的恐怖”。<sup>19</sup> 帝国的反对者逐渐将攻击火力集中在中央过度集权上，尤其是在经济、政治或领土方面。第二帝国时期成立专门负责资本集中的有力机构，借此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与间接影响。佩雷尔兄弟与奥斯曼之间的联结是国家垄断或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典型组织。他们控制银行、运输、交通、出版、都市服务与房地产投机等事业，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生活能够逃脱金融资本与国家的掌握。如此便引发资本主义性质以及竞争和垄断哪个更优的争论，并且衍生出松散的圣西门派意识形态与实践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教条之争。虽然圣西门派分子并未发展出一套融贯的经济理论，但他们却能针对广泛的社会问题提出实际可行的看法，许多人因此受到影响，在一般性生产主题的号召下分野出各式各样的做法。皇帝以“马背上的圣西门”（圣伯夫的名言）之姿进入帝国，但在离开帝国时却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商人。舍瓦利耶——圣西门派的创始成员，之后成为经济学教授——于1860年与英国协商自由贸易协议后，就成为自由主义的信徒。至于佩雷尔兄弟则是逐渐沿着实用而自利的路线发展。尽管如此，圣西门的教条还是给予帝国经济政策与资本集中正当性。

另一方面，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巴师夏（Bastiat）与列昂·赛则是大力提倡市场自由与竞争（可能的好处已经在1852年时强加于工人阶级身上）。1850年代末期，巴黎私有财产权的重申与国家权力产生冲突，佩雷尔兄弟的权势日隆也令人感到疑虑，因此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便被动员来作为攻击帝国政策的工具。在实业家或银行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操弄下，这场论战看起来充满伪善与自利。不过到了1860年代，资产阶级与工人运动逐渐有了共识，认为过度的经济集权必须予以限制。虽然双方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相同，但还是在反对更进一步的资本集中之下组成了强有力的阶级同盟（蒲鲁东主义者如迪谢纳，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提拔的列昂·赛也加入）。佩雷尔兄弟与奥斯曼的崩跌、帝国往自由主义转向，以及“经济学家”（自由派人士）越来越受到信任与看重，都说明了这个联盟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



政治分权的问题也激起类似的热潮。从皇帝往下到各省省长与副省长、官派市长与地方议会、官派互惠协会会长、工人雇主委员会等，全都受到第二帝国严格权力科层的监控。地方民主完全不受重视，但地方自治却由于远离巴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讽刺的是，地方精英所努力推动的新运输与交通系统，反而使中央政府更能轻易地控制地方，因而减损了地方的自主权利。伴随日渐扩大的空间整合而来的却是要求地方自治的怒吼。1860年代，正统派、奥尔良派、共和派与社会主义分子全都一致支持地方自治。但波拿巴主义分子支持地方自治，却是要将地方变成实行中央集权的工具；君主派人士支持地方自治，则是要求让地方显贵与教士获得实权；共和派人士支持地方自治，则是希望地方民主能成为核心制度（由地方资产阶级或人民当中的民主派人士进行统治）；共产党员支持地方自治，因为只有公社中才能形成政治连带；而互助主义者如蒲鲁东支持地方自治，是希望以此来作为联邦制的基础。历史学家对此做了无数次的讨论，他们经常引用罗伯斯庇尔与比较具备民主心灵的吉隆地派（Girondists）的想法来做比较，并且几乎一面倒地支持后者。到了1860年代末期，“分权几乎已成为全国一致的看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必然成为众矢之的。<sup>20</sup>

然而，要区别无权力者（尤其是那些君主派人士）的纯粹机会主义论点与蒲鲁东的信仰并不容易（他希望借由理想中独立而自主的社团来削弱国家，他还认为若不对生产组织进行根本性的重整以对抗资本集中，就不可能进行政治重组）。无论基础为何，努力推动政治分权的行动毕竟是事实，而此举也让巴黎自治的问题直接浮出水面。事实上，关键在于几乎没有人反对公社这个观念，这一点可从1871年时许多来自各方的力量群集起来支持巴黎公社中得到印证。

不过这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如奥斯曼所坚定指出的，如果不是巴黎，“集权又能如何”。由于畏惧巴黎集中庞大的经济、政治、行政与文化力量，许多原本支持分权的省份在谈到让巴黎这座具影响力的城市自治时（即便巴黎在政治倾向上不一定是“红色”，但却很容易激进化），纷纷表示异议。许多巴黎资产阶级如梯也尔也有同样的恐惧。在这样的恐惧驱使下，两方结成了同盟，

并以极为激昂的方式处置巴黎公社。尽管如此，许多支持分权的巴黎人也自豪地认为巴黎是“欧洲的头、脑与心脏”——有位英国访问者语带讽刺地说，这个观点“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欧洲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滑稽的事”。<sup>21</sup>蒲鲁东因此希望巴黎能“摘去首都的冠冕”，“在联邦制的圣战中率先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公社”。布朗基同意革命必须从巴黎开始，但身为雅各宾派的他认为革命巴黎应征服、统治并将启蒙运动带到各落后省份。因此，布朗基主义者与互助主义者携手创造并保卫巴黎公社，并不如外表看来那么奇怪。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对自治体的自由来说，巴黎公社不过是一场暴乱。持这种看法的要不是社会民主派人士，如格林伯格（Greenberg），就是纯粹站在共同体而与阶级无关的立场，如古尔德，然而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当然，不同的派别对于巴黎公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互助主义者与共产党来说，巴黎公社是一面盾牌，使他们可以在庇护下从事较为坚实的工作，例如重新组织生产、分配与消费，并与其他中心的其他运动结盟。对布朗基主义者来说，即便巴黎公社未能解放世界，那也至少是从政治上解放法国的第一步。对共和派的各区区区长来说，巴黎公社是将巴黎各区整合到共和政府体系的第一步，而在必要的状况下，也是用来对抗君主派反动的防卫利器。对各派人士来说，定义巴黎公社能对抗什么要比定义巴黎公社能做什么简单得多。吊诡的是，各省强烈的分权情感居然可以轻易动员，打击一座权力集中的城市内部的分权运动。

---

## 两座城市，两个民族

---

四点钟。另一个巴黎醒了，工作的巴黎。两座城市几乎互不相识，一座在正午起床，另一座则在八点休息。它们很少正眼瞧过对方，除非——通常是如此——是在悲伤而阴郁的革命之日；它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它们是两个民族。<sup>22</sup>

不管实际上的阶级结构与社会空间区隔有多复杂，巴黎作为一座被区隔成两个阶级与两个空间的城市，这种过度转化的形象不断出现在当时的表述上。这个形象由来已久。1848年之前，“另

一个巴黎” (other Paris) 被看成是“危险阶级”，他们的贫困有时会激发人们的怜悯，但绝大多数时间还是令人感到恐怖、恶心与厌恶。一些词汇如“粗鄙无文”与“野蛮”，以及一些诨名如“野兽”等，为资产阶级的意象涂上种族主义的色彩，同时也成了资产阶级杀戮工人与穷人的借口。<sup>23</sup>“平等大获全胜，”福楼拜在提到1848年时写道，“同样都成了残忍的兽类，嗜血凶残的程度也雷同；富人的盲从与穷人的狂热旗鼓相当，贵族感染群众的愤怒，棉制睡帽与红色软帽一样野蛮。”<sup>24</sup>虽然1848年证明了劳动阶级与危险阶级之间存在着差异，但1848年先是承诺随后却又拒绝让工人拥有实质的政治权力。权力最后还是落到——演变到最后成了定局——街垒中的资产阶级方。之后，许多资产阶级觉得另一方街垒能做的他们也可以做。原本属于危险阶级的形象，如今不仅出现在劳动阶级身上，也出现在劳动阶级的辩护者身上，例如布朗基。除此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地方曾经堆筑过街垒，城市的哪个部分属于“另一边”。街垒等于是一条简单的分隔线。1848年经验便在这个简单化与两极化的社会与物理空间表述中继续残存下去。

资产阶级在表述“另一个”巴黎时，往往受其接触性质的影响。绝大多数上层资产阶级要不是在经济上不活跃（在巴黎）就是担任政府公职，至于在经济上活跃的则倾向专注于高级金融业。与工人有实际往来的实业家（如普洛）人数极少且相当罕见，而且无论如何都会被认为是不入流。然而巴黎是工人阶级城市，在日渐组织化之下，炫耀性消费者可以如拉扎尔所言“在不受蜜蜂干扰下静静地品尝蜂蜜的滋味”。<sup>25</sup>“另一个”巴黎的形象并非建立在人际接触上，而是出于偶然与通常是运气欠佳的巧遇（如波德莱尔在《穷人的眼睛》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改革者对于工人阶级巴黎状况的报道（姑且不论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政治劝说），与其说是减缓不如说是加强了人们对于工人堕落与败坏的形象。住在这样的兽圈里，人类怎能不跟兽类一样？这一类的种族说理不只出现在具影响力的圈子里，也毫无顾忌地出现在文学表述上。而这也成了响应巴黎公社的一贯模式。诗人泰奥菲勒·戈蒂埃 (Theophile Gautier) 写道，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有封闭的洞穴供

野生动物、臭气熏天的野兽、有毒的野兽居住，文明难以驯服他们本性中难以控制的任性胡为，他们嗜血，在焚烧与烟火中得到乐趣，他们喜爱偷窃，将无礼当成爱的姿态，他们不仅没有心肝，灵魂也有欠缺，这群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族裔，白昼时一无所长，却渴望陷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深处。某日，驯兽师一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动物园的门上，这些凶猛的生物便在人心惶惶的城市里发出野蛮的嘶吼。笼门大开，1793年的鬣狗与巴黎公社的大猩猩倾巢而出。<sup>26</sup>

281 这类恶毒的情感暴力可谓俯拾皆是。1860年代，人们在阅读像《两个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这类具影响力的报刊时，很难不脸色苍白。这种暴力有着耐人寻味的特质，它仿佛是一种内在渴望，想要驱走恶鬼，烧除社会上令人发疼的痛处，并寻找最终的解决良方，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只有三种人是值得尊敬的：教士、战士与诗人，”波德莱尔写道，“认知、杀戮与创造。”福楼拜坦承，他对政治的唯一印象就是暴乱：“我瞧不起现代的专制政治，因为它既愚蠢又孱弱，缺乏信仰的勇气。”他又说：“我深深崇拜古代的专制政治，我认为那是人类极致的展现。”<sup>27</sup>《萨朗波》中被征服者遭受杀戮暴力的场景引发对虐待狂的指控。然而这样的场景却应验在巴黎公社身上，龚古尔在为这



FIGURE-097

1848年6月暴乱时，巴黎的街垒分布显示出城市的东部与西部之间有着强烈的政治区别(引自Girard, 1981)。

场残酷的流血冲突找理由时说，为了让红色的血流尽，必须杀光这群好战的红色分子。资产阶级害怕重蹈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覆辙，于是建立了形象与表述来合理化自己对另一个巴黎所做的先制恐怖行动。

革命分子，特别是那些来自大学生与放荡不羁者队伍的革命分子，则将形象反转过来。他们认为工人高贵、技术熟练、自食其力、聪明、慷慨并且有领导能力。在他们眼中，“另一个巴黎”，即巴黎西半部，居住着投机者、股市贪婪者、靠租金维持生活者、依人维持生活者与放高利贷者，他们吸取工人的血并且摧毁他们的尊严与自尊。工人背负着闲散富人这个重担，因此工人阶级巴黎有充分的权利起而革命。布朗基主义者将这个想法推广。他们视巴黎为革命的炉灶，解放不只是一定要扩及法国其他地区，还要扩及全世界，如同1789年。除此之外，革命要在“另一个”巴黎才能找到根源，特别是在贝尔维尔与拉谢兹神父区。<sup>28</sup>布朗基分子的同情者——例如具影响力的古斯塔夫·弗路朗斯（Gustave Flourens，人体解剖学教授，在巴黎公社初期被杀）——必须进到这个地区才能开始发展革命的根基。而在布朗基主义者的说辞中，毫不掩饰地表露其宣泄革命暴力的企图（公开援引埃贝尔主义者[Hebertist]1793年的革命净化理想）。

并不是每个人都抱有这种两极化的意象。然而即便是那些试图缓和极端说法的人士，最后通常也是加强了一般的论点。当时的写作者如欧第冈（Audiganne）、科尔邦与普洛至少与巴黎工人有过密切接触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性格速写。欧第冈写道：

巴黎工人极善于交际、开放，具有宏大的想法与强烈的慈善关怀，表现在外则是相互扶持与包容。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玩乐与挥霍完全没有节制，沉溺于淫佚愉悦之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凭着一股热情就参与暴乱，如同加入节庆一样，他们无视后果，一心想打破日常生活的单调无聊并以此取乐。对平等与国籍的崇拜是他们的印记。<sup>29</sup>

巴黎工人的不负责任当然饱受清教激进资产阶级（例如普洛）的诅咒。然而许多了解工人阶级的评论者，如社会主义者瓦莱



(Vallé)，他因为同情受压迫者而搬到巴黎的工人阶级区居住，却惊讶于当地工人的温情与慷慨。因此，人们更有理由对于工人阶级巴黎遭受极端的评价与压迫感到遗憾。然而，在要求减轻工人阶级负担的同时，改革者却不得不进行更严苛的批评与压迫。科尔邦哀叹阶级区分的永久化与日渐加深，并且认为虽然穷人并不憎恨富人，但穷人本身的危险状况加上富者越富，必然构成对富人安全的威胁。除此之外，这个威胁还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巴黎的转变——强制将工人人口从市中心移到市周边地区——使得首都变成两座城市，一座是富人之城，另一座是穷人之城……遭受剥夺的阶级在富人外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警戒线。”拉扎尔提到他所看到的颇具威胁性的景象时说，“贫困的洪水在贝尔维尔高涨，”他写道，“奢侈品之河却在巴黎新区达到高峰。”<sup>30</sup>上层资产阶级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红色分子”就淹没在贝尔维尔的贫困洪水之中。以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造访当地来看，这样的说法徒然加深了资产阶级的恐惧。有些报纸如《费加罗报》(*Le Figaro*)与《箴言报》(*Le Moniteur*)的社论说，当地住的“全是人渣”。记者萨尔塞(Sarcey)写道，你在那里可以发现“最贫困与恨意最深的人，嫉妒、懒散与愤怒的骚动不断沸腾，未尝稍止”。<sup>31</sup>

---

## 共产党员、资本家与结社的梦想

---

布朗基虽然令资产阶级不寒而栗，但却未能在工人阶级当中建立群众基础。事实上，布朗基似乎有一段时间完全失去了影响力，但他仍是遥不可及、毫不妥协且遭受监禁的象征。一直到了1860年代，布朗基主义运动才又起死回生，当时主要的构成分子是好战的无神论知识分子与大学生，这些人受到布朗基身受磨难的感召而聚集在一起，并且以纯净作为他们的运动目标。<sup>32</sup>1868到1871年积极斗争期间，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热心以及愿意泅泳于流入“另一个巴黎”的“贫困之河”中，布朗基主义者获得了许多追随者。他们之所以缺乏群众影响力，有部分原因跟他们的选择有关。1848年的经验与通过普选而建立的帝国，使他们对于无知与资产阶级支配大众传媒工具下的群众民主感到怀疑。布朗基主义者根植于法国革命传统的纯粹形式（其代表人物为巴贝

夫、埃贝尔[Hébert]与博纳罗蒂)，这使得他们坚持具有叛乱性格的雅各宾政治路线。在警察严密监视下，他们必须组成秘密小队，虽然可以防止外人渗透，却也封闭了群众参与的可能。通过叛乱暴力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目标。

布朗基主义者的影响力也受到阶级结构的限制，因为阶级结构与布朗基主义者所传达的信息无法轻易兼容。布朗基主义者对上层资产阶级掌控的国家体制发动叛乱，虽有其道理，可惜的是他们未能看出帝国末期巴黎市内由小作坊与家庭代工支配的工作组织问题，以及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界线模糊的问题。事实上，1830年代初以降，巴黎作坊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肥沃温床。

共产党的口号，“取之于有能力者，用之于有需要者”，这话听起来颇能诱惑贫苦大众，并且对于面对就业不稳定与受到科技变迁摧残的手工工人来说也有强大的影响。不过科尔邦指出，共产党有两种。一种是企图将自身的制度施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并且增加国家权力来处置私有财产。1848年，他们组成国家作坊作为国家所有制、保证工作权与分配平等的先声。因此，社会主义者如勃朗、拉斯帕伊(Raspail)与巴尔贝斯(Barbes)便与布朗基有了共同目标(不过他们彼此之间仍有敌对关系)，在1848年4月16日与5月15日发动了胎死腹中的夺权运动。其他如卡贝主义者(伊卡利亚人[Icarians])与傅立叶主义者则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奉行自己的教条，希望以自身为例说服民众了解集体组织与共产主义的好处。1848年挫败之后，卡贝主义者与傅立叶主义者选择移民或被迫流亡，他们大部分前往他们唯一的希望之地：美国。

然而，蒲鲁东却从1848年经验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觉得叛乱运动不过是以另一个压迫而支配的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工作问题不可能通过政治渠道解决。政府不管由谁控制，作为敌人的属性不可能改变。这让蒲鲁东不只同布朗基主义者与共产党发生冲突，也使他自绝于所有将政治共和国视为社会变迁必要前导的人。解放工人的斗争必须从作坊开始，并且要实施可行的计划而非乌托邦的空想。合作社与互助主义代表了劳动过程中的新工人民主概念，而其支柱在于相互信贷银行、相互保险与互助会、合作住房计划等。这个计划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避免国家的干涉并且

为国家的衰亡立下基础。重要的是，它可以绕过作坊中的阶级对立并且召集小师傅（利用竞争以及信贷与市场的变化来威胁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奋斗。

蒲鲁东支持住宅、零售等私有财产权，但前提是这些财产必须向所有人开放；他反对罢工与工会，并且对于结社的观念深感怀疑（到了1860年，结社已经成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蒲鲁东的观念影响深远。我们因此看到克莱芒（Clément）——1867年工人委员会的鞋匠代表——公然反对并责难那些期望以罢工、阶级斗争与其他对抗形式来推动工人运动的人。<sup>33</sup> 克莱芒认为，通过“劳工的工作连带、合作、彼此了解、与家人的共处”、自身资本的累积以及去除外在所有制对他们的生杀予夺，将可侵蚀私有财产制与避免阶级斗争。然而在这些围绕着第二帝国巴黎劳动组织打转的论辩中，有个概念发挥了特殊的力量与魔力：结社。结社之所以能获得中心地位，部分是因为其深刻植根于传统，同时也因为它有着暧昧不明的优点。结社不仅在1830年代的圣西门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对当时的傅立叶主义与初试啼声的工人社会主义（见第二章）也至关重要。起初，结社这个观念是用来克服私有财产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阶级冲突、社会无政府、自私自利与社会不平等。在圣西门派眼中，结社意味着结合所有资本家，不论大小，动员起来从事具有生产力与对社会有利的事业，让整个市民社会，包括工人自己，拥抱在社会进步的和谐之中。1830年代，佩雷尔兄弟受到圣西门意识形态的熏陶，到了1850年代，他们将其付诸实践，试图建构一种具民主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社的观念因此获得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并且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即便是马克思——他嘲讽资本家社团这个想法只会点燃投机的热潮——也同意此举或许能构成“往新生产模式过渡的形式”，并且赋予佩雷尔兄弟“混合了骗子与预言家的愉快性格”。<sup>34</sup>

在工人运动中，结社这个观念经历了重大的演变。社团最早出现于1830年代，它意味着生产者协会、互助会以及其他日后蒲鲁东认可的形式。但是科技变迁的破坏造成压迫，而往后资本主义的剥削遂将“结社”转变成阶级与统合主义抗争的代号。结社的最初意义在巴黎的支配地位似乎一直维持到1848到1851年。临时政府在1848年颁布的法令保证工作权也保证工人的结社权——

目的是为了工人能享受劳动的正当利益。结社权一词相当暧昧。它是指组织工会的权利还是指组织生产者合作社的权利？实际上，结社权这个词吸引所有手工工人，他们了解财富来自劳动，并且将生产工人自由结社视为捕捉劳动成果的手段，并确保在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下让社会和平重组。<sup>35</sup>

1851年，政府无情镇压所有的工人组织形式（只留下互助会与一些受帝国严密控制的组织），工人不得不将活动转入地下，从那时起，蒲鲁东便致力于以志愿而非国家统制的形式恢复工人组织。但科尔邦却认为1848年后，结社观念已逐渐失去立足之地，不仅成了社会主义未来的高贵愿景，在实际运作上也是如此。有鉴于劳动过程的重组，与巴黎产业中资本与劳动的逐渐分野，必须建立集体性的凭借，才能抵抗劳动的去技术化与实质收入的不断下降。科尔邦指出，1860年代统合主义情感的复兴与统合主义形式（废除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动员，目的在于护卫工人阶级利益并且对劳动市场自由化提出挑战。<sup>36</sup>因此，“结社”也意味着组成工会集体协商工资率与工作条件的权利。这两个意义同时存在于1860年代末。结社自由成了1867年工人委员会会议中所有工人的一项要求。但工人们不是借由结社来指涉别的事物，就是利用结社一词的暧昧不明来进行政治操作。

## 梦想社会主义之城

1869年，莫瓦兰（Moilin）出版了一本乌托邦小册子，《公元2000年的巴黎》（*Paris en l'An 2000*）。<sup>37</sup>身为专注而博学的医生（莫瓦兰曾是名医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的助手），莫瓦兰在霍乱横行期间曾照顾过第一区的穷人，因此获得极高的赞誉。1860年代，他逐渐迷上以秩序与社会正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未来，并因此与当局发生龃龉。莫瓦兰预测，到了公元2000年，会有社会主义政府将巴黎完全改造，并且提升众人的福利。国家将拥有所有房地产，去除所有房地产投机事业与地主所有制。巴黎的改造将交由建筑师来完成，他们将移除所有破旧的贫民窟与不卫生的结构。然而这个过程将是渐进的，并且将避免奥斯曼拆除工程中所发生的野蛮与阶级偏见。都市的组织最终仿效傅立叶的法隆

斯戴尔结构，方形的住宅街区，街区正中央的空间则是花园与中庭，可作为社会与一般活动之用。巴黎内部的联结则是一连串以天桥和通道连通的二楼拱廊街，并且设有电梯。如此便为全体都市人口（对于那些爱闲逛的人来说尤其理想）提供了彼此联结的购物与散步空间以及一个可遮风避雨的交通系统。作坊坐落在一楼，在设计上强调采光与通风，确保工作环境处于最佳状况。

西岱岛与圣路易岛（Ile St.Louis）被巨大的建筑物——国际宫所盘踞（Palais Internationale，有佩瑞蒙的影子，见前，原版页83—85），当中还有高架铁路通过，国际宫如同接待处，引导人们进入永续不绝的世界展览馆，使人感受到普世的博爱与人性的团结。政府办公大楼与社会主义神庙（取代圣母院）也坐落在这里，后者是新秩序仪式与崇拜的中心。许多市民活动都在这里举办，借此营造每个人对巴黎的认同感。国际宫高处的露台使人可以远眺，并欣赏整个巴黎市景的一致与和谐。环绕着宫殿的巨柱，支撑着以新建筑工法完成的巨大玻璃与钢铁圆顶。

到了2000年时，收入不均已大幅获得改善（差距只在一到五法郎之间），而且多亏了公有制，平等精神也进入工作组织当中。教育制度与学徒制的改革造就了慷慨的社会习性、互助与雇佣平等。财产所有制已相当罕见，租金恰到好处，住宅街区则住着各色各样的人。家仆已经废止。许多妇女依照自身的能力工作，但她们仍没有政治权利（向蒲鲁东让步？），且家庭仍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虽然离婚制度已经受到承认，而卖淫仍受禁止）。在知识领域上，最显著的就是巴黎科学院（妇女与孩童可以经由普选进入科学院）内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对展览、舞会、音乐会、戏剧、报刊与竞逐荣誉标记（共和国奖章最受人重视）的强烈喜好，一直是重要的文化生活特征。大型咖啡馆（在此人们不会酗酒）是社交与交谈的中心。巴黎人并未忘记如何享乐，闲逛和漫游的技巧仍广受欣赏。本雅明淡然地指出，莫瓦兰不仅推演了傅立叶的思想，还预想了一座理想都市的形貌，只不过他是从消费以及将帝国纪念日民主化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有组织的生产来思考。

于1848年彻底溃败的乌托邦思想，二十年后又重新振作。莫瓦兰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他在3月的头三天曾担任代理区长。到了5月27日，莫瓦兰被凡尔赛军队逮捕，带



到设于卢森堡花园的简易军事法庭受审，并且随即被判处死刑。法官说，他的罪名不在于他的行为，而在于“他是社会主义党的领袖之一，他的才智、性格以及对群众的影响力皆足以构成危险；简单地说，凡是思虑周密而睿智的政府，只要找到正当的借口，就应该将这种人连根拔除”。<sup>38</sup>莫瓦兰获准暂缓行刑12小时好与他已经怀孕的伴侣成婚，之后便于1871年5月28日清晨与卢森堡花园被执行枪决。

---

## 性别、性与革命

---

在巴黎公社成立前不久，埃德蒙·龚古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们提及妇女的紧张与过于激动……以及不得不必须镇压妇女暴乱的恐惧。”巴黎公社结束后，这种恐惧成了一种“凶恶女性”、“女战士及悍妇”的传说，她们“用猥亵而恬不知耻的淫行来激起、燃烧男人的欲望……她们褪下衣物，袒胸露乳”，煽动并引领着巴黎的火炬。许多妇女被拉出屋子与街垒并随即予以枪决，乌塞(Houssaye)看着她们的尸体，沉思了一下，然后写道：“这些妇女的脸孔都已不成人形，我所看到的只是罪行与邪恶的形象。就算涂了膏油，她们仍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值得判处一千次的死刑。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她们：面目可憎。”<sup>39</sup>

妇女在暴乱与革命中以及在巴黎公社“女性煽动者”的角色中所呈现出来的凶残与野蛮形象相当鲜明，但军事法院却几乎提不出这方面的证据——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审判。<sup>40</sup>左拉大量引用迪康对巴黎公社的描述，在《芽月》(*Germinal*)中插入一段愤怒的妇女将村里的店主处以私刑并阉割的恐怖场景。这种形象并不罕见，事实上整个第二帝国时期都可见其踪影。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妇女、自由与共和国（还有革命）之间的联结一直不断在形成（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这种形象如此深植人心，以至于如我们所见，描绘女性的方式成了紧张的图像对立焦点。在1848年六月事件中，《伦敦检查者报》(*London Examiner*)报道的一则事件仿佛重演了德拉克洛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虽然结局并不令人愉快）：

287

一个着装整齐的年轻女性举起旗子，翻过街垒，冲向国民卫队，嘴里喊着挑衅的言语……子弹射中了她，当场死亡。另一个女性随之而起，捡起旗子，开始向国民卫队丢掷石块……卫队立时就杀了她。

雨果记录下相同的事件。但他却说这两个女人是“妓女，美丽、衣衫不整而令人恐惧”。她们不仅口出秽言，还将衣服褪至腰际，大叫：“懦夫！开火啊，你敢吗？对准我的肚子打啊！”“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雨果阴郁地说。<sup>41</sup>如我们所见，托克维尔同样吐露了所有资产阶级的恐惧，他们将不愿屈服且难以控制的妇女当成是革命的侦探，而福楼拜延续这个传统，他曾描绘1848年娼妓在杜伊勒里宫模仿自由女神姿态的场景。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对德法吉夫人（Madame Defarge）与“复仇”的描述也传达了相同的观念。

同样的事件，雨果的描述却充满讽刺，当中的象征主义也绝不可能消失。如果共和国未曾射杀街垒上的自由女神呢？随后的景象将沿着社会共和国与政治共和国路线的不同而一分为二。“谨慎的秩序与和解共和国”所需要的表述完全不同于人民共和国“激烈而反叛”的形象：“乍看之下，穿着工人服装的阵营仿佛将拥有一个戴着红帽穿着绷线女用紧身上衣的共和国，至于穿着黑色西装的绅士阵营所拥有的则是如淑女般的共和国，头上戴着叶饰，从头到脚包裹着长袍。”<sup>42</sup>1848年后，高尚的共和派人士开始着手驯服这类形象（巴托尔迪[Bartholdi]最早在1860年代末讨论过自由女神像计划，这座女神像现立于纽约港）。至于工人则坚持较具革命性的形象。他们组成“玛丽安娜主义的阴谋”（Mariannist conspiracies），虽然设于巴黎的组织于1855年被破获，但他们绝大多数的分支机构都分布在乡村地区。妇女的解放，“土地与土地上一切事物”的国有化，以及基本生活、就业与教育的保障，全都列入他们的计划当中。这种情感明显顽强而不易改变。当妇女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1867年工人委员会时，一位工人感动得落泪：“夫人，一看到你走进来，我相信我眼前出现的是自由女神。无论何时，只要女性与男性一同出席会议，就代表自由与正义的

统治开始。女性万岁！自由万岁！”<sup>43</sup>

妇女专属于家庭乃是资产阶级屹立不摇的信仰。即便是激进的共和派人士如米什莱，以及社会主义分子都信奉此一想法。蒲鲁东的《娼妇政治》(*Pornocratie*)中包含了“极端反女性主义者反对女性解放的所有残忍反动观念”。<sup>44</sup>这种想法还受到其他观念的推波助澜，例如对家庭生活的崇拜（与此并行的则是自由女神形象的驯化）、婚姻概念（将婚姻当成公司在经营）的物质支撑、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的逐渐分离，以及完善管理的家庭经济对资产阶级的成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妇女专属于家庭的思维也与某种特殊的财产与继承制度有关，事实上，如果资产阶级不像贵族一样家财万贯，却想学习贵族的习惯与行为规范，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身陷于工人阶级放荡生活的幽灵与贵族的高贵义务之间动弹不得。对资产阶级来说，控制女人是维持阶级地位的必要手段，而大部分的妇女似乎也都能接受这样的安排。甚至连乔治·桑也在1860年代致力于鼓吹家庭价值，虽然她位于乡村的地产并未受到巴黎公社的搅扰，但她却在巴黎公社结束后以最尖刻的语气攻击公社成员。异议妇女如德埃里古(d'Hericourt)并未受到太多关注，而独立的女性主义政治学说也相当罕见——妇女投票权的问题（在英格兰引起争论）还未浮出水面。一直要到帝国末期，才有一群妇女（路易丝·米歇尔、波勒·明克与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弗 [Elizabeth Dmitrieff]）开始大声疾呼妇女权利并且组织像妇女联盟(Union des Femmes)这种在巴黎公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团体。<sup>45</sup>

这些现象背后所具有的社会心理意义耐人寻味。托克维尔在阳具统治社会中所遭遇的自由形象，是一个恐怖而难以驾驭的女性，更糟的是，是个公娼。而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与阶级地位的维持取决于对女性的控制，女性的自由形象势必对资产阶级男性的深层心理造成冲击。马奈的女性表述（《奥林匹亚》与《草地上的午餐》[*Déjeuner sur l'Herbe*]）似乎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愤怒，因为

289

说辞暴力并不容易。甚至连解决传统共和派的表述也是个难题。

米什莱的《女人》于1859年首次出版，这是著名共和派史家所写的深具影响力的短文。当1867年工人委员会将注意力转向妇女时，有位迪帕（Dupas）博士详细说明了米什莱的露骨想法。他认为，女性在身体力量、智力、道德关注或对公共事务的投入上都无法与男性相比，但作为妻子与母亲，她的爱与投入远超过男性千倍。男人是文明的代表，女人则是自然的造物（“女人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是可憎的。”波德莱尔气急败坏地说，而另一方面，马奈《草地上的午餐》似乎也同时再现并戏仿了米什莱所极力反对之物）。



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其解决之道有创造的一面也有毁灭的一面。一旦没有男人的拘束，女人天性不洁的一面（表现在月经上）就会占上风并且爆发成激烈的歇斯底里（这很可能就是雨果、托克维尔与反巴黎公社者对于自己在革命过程中所见所闻的心得）。迪帕继续表示，工作的妇女与脱离男性掌握的妇女造成社会的道德污点；这种令人不悦的处境使社会暴露在作坊所制造的堕落与歇斯底里中。唯一正面的解决方式乃是在男人的支配下达成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他解释说，男人是“1”，女人是“0”，唯一能增加他们的社会力量的方法，就是将“1”放在“0”前面，这样就可以得到10）。然而要紧的是，女性也该得到尊敬与同情，这才是米什莱思想的核心。女性被分派担任受难圣母玛丽亚的角色，唯有在尊敬父权男性的控制下，她才能卸下自然的重担并且释放出爱与投入的巨大能力。<sup>48</sup>不过重要的是，这样的观点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工人出面支持，甚至还引起了绝大多数工人的谴责。

西蒙也出席了工人委员会，但他却采取全然不同的观点。他对于妇女工作感到难过，认为这将摧毁家庭，忽视孩童，并且剥夺男人稳定、贴心与充满情感的家庭环境，而这正是男人赖以重新振作身体与灵魂的条件。必须找出一些方法来保存家庭。然而

FIGURE-098

杜米埃描绘1848年妇女威胁冲进国民会议争取离婚权，显示出资产阶级对女性主义以及妇女参政的政治后果的恐惧。

西蒙知道，对绝大部分的工人阶级来说，妇女工作有其必要。他也知道产业需要妇女的劳动力。西蒙对于反对妇女工作的观点大加挞伐，他认为如此将侵害宝贵的自由（市场自由），而且妇女也的确需要就业。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找到有地位而报酬优厚的工作以避免女性沦为放荡与卖淫。解答是由国家提供义务教育。此举除了让妇女能增加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的论点），也能改善她们在家庭中身为教育者的技术。1860年代末期的教育改革的确开启了这项可能，而且明显获得工人乃至好战女性主义者的赏识。西蒙由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在1869年的选举中获胜，而他的观念也受到好战女性主义者的欣赏。然而如几个工人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的，改善后的妇女教育将增加妇女可资竞争的工作项目并且将使工资下降。西蒙的想法受到产业界的支持，他们认为西蒙的提议对他们有利。<sup>49</sup>

工人的想法又如何呢？第一国际成员弗里堡（Fribourg）在工人委员会中发言支持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即赞同蒲鲁东的观点。后者认为女性属于家庭，须从属于男性的权威。虽然蒲鲁东的作品充满了仇视女性的想法，但工人情感却没有因此支持米什莱或迪帕的论点。首先，工人情感中有一种传统，认为男人对家庭劳动力有法律上与道德上的权利。他们也存有保护家庭的欲望并且认为男性的权威是保护家庭的前提。因此，男人理应获得较女人为高的薪水。但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女修道院或作坊开始动员妇女劳动力，导致男女劳动力之间的竞争加剧，因而造成男性对女性敌视的升温。1862年印刷工人的罢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厂方大量引进比男性工人工资少三分之一的女性工人，使得罢工完全破局，而这正是男性工人所恐惧的。短期的做法是提升男人的工资使其足以养家，同时立法禁止女人进入作坊。印刷工人向皇帝请愿的内容不过是如此。而为了让请愿成功，工人倒也不反对在请愿书中引用米什莱的论点。他们指出暴露在作坊中所产生的歇斯底里，并且认为——也许是正确的——妇女暴露在工作场合与有毒物质中，容易造成死胎与流产。由于工人们的极力主张，法国代表便在1866年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会议中强迫通过决议，禁止妇女进入作坊并限制妇女只能待在家中。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明克曾在第一国际巴黎分会上反对这样



的态度。她在1868年的一场公众集会中表示：“我们不想被当成圣母玛丽亚，也不想被当成奴隶，我们希望被当成一般人一样看待，虽然有个体差异，但应受平等对待，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我们应该为自身的经济解放团结起来。”明克的男性盟友瓦尔兰在工人委员会上反驳弗里堡：“妇女的工作权是她们能真正解放的唯一凭借，”反对这一点的人“只是要让女人一直处于男人的支配之下”。瓦尔兰至少言行一致，他在书籍装订工的工会规章中明确规定女人有与男人同工同酬的权利。<sup>50</sup>鞋匠工会则认为，要让妇女加入工会是进步之举，但前提是女人发问必须通过书面或者通过男性成员。

291

表述与说辞在工人委员会会议中上各展所长，但少有交集。然而真正的悲剧早已铭记在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巴黎公社后的恐怖清算，显示阶级与性别的敌对在彼此推波助澜之下，释放出大量的暴力与恐怖。许多接受军事审判的妇女其实只是医护人员或伙食人员，却被罗织的邪恶罪名与指控所神秘化。她们原为了高贵愿景而活，如今却被认定是歇斯底里。

当私人表述变成公众的说辞时，这些表述便成了个人与集体行动的凭借与动机。当然，重构人们说过的话容易，要重现人们心中所想的事难。在这个领域中，个人的变异性极大，任何一般性的陈述经常会造成极大的误导。然而，在无数冲突的观念漩涡中，还是存在着能说明动机的广泛主题。最后的测试场当然是付诸行动。许多曾被思考过的主题从来没有取得物质力量的地位，因为它只深锁在梦想的领域。我们在这里所检视的主题不属于这一类。巴黎公社的经验将所有的主题都付诸社会生活之中，而且在此过程中经常抱持报复的心态。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日常生活的井然有序至少可以让我们合理地推断说辞与表述的方式，以及科学与情感的内容，并不只是少数人用来打发闲暇的无聊事。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补充另一个范畴：沉默的大众——我们无法追溯沉默大众的观念，却能追溯他们策略性的沉默。

# 都市转变的地缘政治学

人类……不可避免只为自己设定可以解决的任务，而从详密的检视中我们发现，问题总是产生于解决的物质条件出现或至少处于形成之中的时候。

293

——马克思

“当皇帝的斗篷终于披在路易·波拿巴肩上时，”马克思于1852年预言，“拿破仑的铜像将从旺多姆凯旋柱（Vendôme Column）的顶端坠落。”<sup>1</sup>1871年5月16日，这座令人憎恨的象征物在巴黎公社群众面前倒塌，暂时转移了人们对围困巴黎的反动势力炮火威胁的注意。而从预言那一刻到事件发生，中间隔着为期十八年的“凶残闹剧”。

这场凶残暴行有两个源头，有时彼此互补，但终归是相互冲突。帝国除了保护自己，也保护它统治的市民社会，以国家力量的独断来碰触每个臣民，从被驱离于大道之外的街头艺人，到被排除于有利可图的城市放贷业务之外的银行家，无一不在它的掌握之中。另一方面，资本流通与累积的力量也不断加快脚步，它以与对巴黎既有环境进行创造性破坏相同的凶残手法，来转变劳动过程、空间整合、信贷关系、生活条件与阶级关系。1848年以降，国家力量的独断似乎成了私有财产制与资本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帝国日渐沦为公开的笑柄，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现代性

不可能从帝国传统中诞生，帝国权力没有也不能拥有稳定的阶级基础，而原先设想的全能政府完全无法应付全知的市场理性。圣西门派分子与自由派政治经济学者之间的裂痕因此象征了政治与经济过程中深刻的敌对现象。

294 拿破仑三世维持权力的策略相当简单：“满足大多数阶级的利益，至于自己则加入上层阶级。”<sup>2</sup> 遗憾的是，资本积累的爆炸力却逐渐腐蚀了他的策略。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双方敌对日益加深（富人之所以支持帝国，主要是因为帝国能对抗社会主义的要求）。皇帝只要往一方挪动一步，势必造成与另一方的疏离。除此之外，工人记得（多半是加油添醋）当初他们曾经协助建立共和国，而共和国会为工人的社会关切发声。部分资产阶级要求市场的自由与平等，他们也倾向于强调共和派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不仅与社会共和国的计划相左，也与帝国的专制主义产生冲突。

295 共和国政治与社会概念的分裂——在1848年相当明显——仍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不管是过去或现在，人们往往可以利用这种概念上的分裂来进行区隔与统治。然而它却不能让政治权力获得稳固的阶级基础。帝国由于涉入资本主义进步的漩涡太深，因此招来传统主义者与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天主教徒）的不满，这些人不仅反对新物质主义，也不愿接受逐渐形成的新阶级形貌。一旦过度囤积与贬值的问题再度出现，帝国权威背后的共识将难以维持，甚至有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帝国必须同时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以及因阶级光谱或派系斗争而出现的政局动荡。1862  
296 年，皇帝邀请詹姆士·罗斯柴尔德造访他的乡村别墅（此举令佩雷尔兄弟大为懊恼），同年，皇帝又资助20万法郎作为工人代表前往伦敦的旅费（马克思正热切地在当地等着他们，工人代表返国后便成立了第一国际巴黎分会），然而不管怎么做，总有受冷落的阶级。而这种游走于阶级之间的做法，非但不能减轻问题，反而更让人忧心，一旦帝国崩溃，什么可以取代现有的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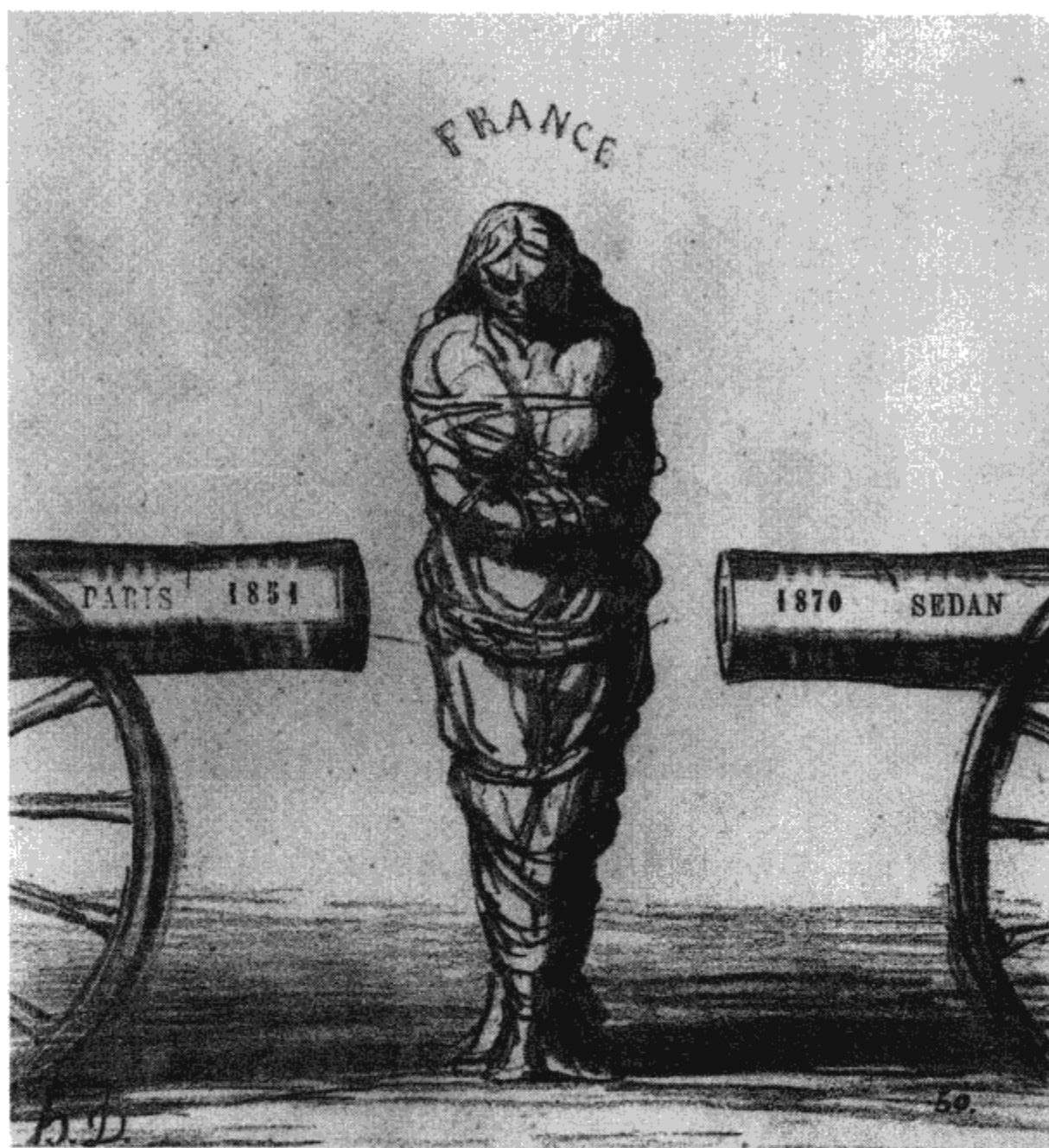
君主派人士虽极有力量，却提不出实际良策。他们内部派系庞杂，有极保守的天主教人士、传统主义者以及反资本主义进步的各种反动情感。君主派大本营在法国乡村，第二帝国时期，他们在巴黎的影响力只局限在左岸贵族区的传统沙龙中。帝国有自己的支持者，特别是巴黎西部的金融资本家、国家公务员与资产

阶级地主，他们都相当满意奥斯曼的施政，至于右岸的贸易、商业与专业服务中心（如法律）则成了共和主义的据点，但这些人通常抱持着实用的金融投机心态，帝国因此有许多收编他们的机会。蒙马特大道上的马德里咖啡馆是地缘政治的汇聚点，吸引了共和主义以及无社会地位而时有放荡不羁情感的作家前来，使此处成了出版与信息交流的重镇。左岸的共和主义则是另外一番风貌。大学生与学院人士的产物，较不实用但却较具革命性与乌托邦色彩，能将不同派别的人士结合起来与工人和手工业者结为同盟，或使其采取革命与阴谋政治的形式。巴黎的工人阶级区分布在广大的周边地带，从西北部往东再延伸到西南部（最密集的区域集中在东北部），是坚实的共和主义区域，但这些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并对于1848年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倒戈怀恨在心。

1860年代在巴黎展开的斗争，预示了巴黎公社的诞生，其规模也相当庞大。这场斗争旨在为共同体与阶级概念灌注政治意

FIGURE-099

杜米埃的第二帝国历史观点，他让传统自由之神的女性形象手脚遭受捆绑，并被放置在两门大炮当中，一门是1851年政变，另一门则是皇帝于1870年败于色当（Sedan）。



义，辨明阶级联盟与阶级对抗的真正基础，并找出可资动员与刺激需求的政治、经济、组织与物理空间。从各种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转变巴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地缘政治斗争。

资本家与帝国的分道扬镳并不是以戏剧性的对立而呈现，而是在缓慢侵蚀中逐渐将彼此的有机联结消磨一空。巴黎地主对公用征收的反抗，法兰西银行对圣西门派廉价信贷的抗争，实业家对奥斯曼百般刁难的不满，以及金融资本对小店主的支配引发部分资产阶级的不满。虽然有些地主站在帝国那一边，但更多却是日渐疏远。讽刺的是，帝国越是能成功压制工人，资产阶级就越能自由表达心中的不满。而对立越升高，工人可以运作的政治空

297



FIGURE-100

1871年5月16日，巴黎公社成员推倒了旺多姆凯旋柱。在这张布拉克艾（Braquehais）拍摄的照片中，画家库尔贝（他后来被命令要自掏腰包支付凯旋柱的重建费用）就站在后排那群人的正中位置。这座凯旋柱有段曲折的历史。1815年王室复辟期间，肖代（Chaudet）的皇帝像（以俘获的奥地利大炮制成）被拆卸下来，熔解之后重铸成新桥上后来遭到摧毁的亨利四世像。原本立于柱顶的拿破仑皇帝像被简单的百合花徽（fleur-de-lis）所取代。七月王朝急于将自己联结于革命以及拿破仑的民粹主义，于是在1834年又重新在柱顶安放拿破仑像，不过形象却改为披着战袍的公民士兵。1863年，瑟尔（Seurre）的雕像被迪蒙（Dumont）的拿破仑皇帝像所取代，后者身穿古代服饰，手执罗马时代的胜利象征。巴黎公社成员所倾覆的正是这座雕像。



间就越大。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说辞庇荫了工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对声浪的升高也迫使帝国向工人献媚以巩固其民意基础。

共和党的重建是第二帝国时期一项重大的成就。由于重建必须仰赖法国境内各种意见潮流的结合，因此巴黎的发展就成了关键。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被强力而不连贯地灌输到自由派专业人士圈子中（这些人将共和国当成取得自主的阶级权力的凭借），并且在贸易、工业与商业界拥有潜在的支持力量，不过此时它也需要一个比1848年时更为精确的定义。街垒中粗暴易怒的女性主义形象应该穿上女用紧身胸衣，使其变得温顺而高尚。大学生、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的无社会地位者共和主义则必须加以抵制与控制。不过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想要成功，尚须工人阶级的支持。如何获得工人的支持，并且无需对共和国的社会概念——一般来说，这种概念总是威胁着私有财产制、金钱力量、资本流通，乃至父权与家庭——做出太大让步，这是新生的共和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治自由、合法性、表现自由与代议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较有可能取得共识。因此，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便试图将这些议题列为政治辩论的核心。结社自由、工人权利与代议制度的问题较为棘手。而与社会共和国相关的辩论，也必须退居到改革者认定较为安全的问题之后，如教育改革。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为父权辩护时总会变得相当暴力，在面对社会主义时态度也全无道德考虑。然而即便如此，在巴黎公社的浴血中，共和国的社会与政治概念在进行死斗的同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盟的条件却始终保持开放，随时可以进行协商。

1860年代初，工人阶级政治的复兴初始靠的是重新主张传统制度权利。虽然受到帝国的管制，互助会仍以合法的外观掩护各种地下工人组织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后来构成非法的工会形式（所有的罢工活动都是他们策划的），并在1850年代引发当局的大举告发。虽然如此，这些偷天换日的做法在政治上的间接效果却难以控制。葬礼的重要性便是一例，不仅有关键的好处，同时也能召集所有成员前来聆听经常演变成政治演说的墓旁致词。帝国也无意攻击互助会，因为它需要互助会游说并动员工人阶级支持。

298

而且有许多证据显示，即便到了1860年代初，社团与联盟仍然运作正常，并未受到告发。<sup>3</sup>互助会因此成了意识形成的中心以及组织并表达集体需求的工具。当手工工人着手对抗科技与组织变迁的破坏与无技术移民的大量涌入时，隐藏在互助会中的统合主义形式也逐渐浮出水面。互助会架构的运用有着重要影响。它弥合了工作与生活的区别，也使生产与消费问题的关切合而为一。互助会也巩固了巴黎产业脉络中的互助主义与合作社路线。不管是意识还是政治行动，它们全都从互助会的一体性中汲取了力量。

机构建立与现代化的浪潮——这些都是日后行政机构可以运用的——在1862年后最为明显。皇帝受到上层阶级君主派人士与保守天主教徒所组成的联盟的不断攻击，也饱受复兴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威胁，因此被迫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然而各省省长告诉他，工人阶级此时也正陷入困境之中。皇帝颁布法令拉拢工人使其能支持产业发展与帝国，然而除了托兰（Tolain）的冗长解释，皇帝几乎没能得到草根人士的响应。托兰得到面见皇帝的机会以及组织工人委员会的权利，皇帝也同意由各互助会的领袖组成工人委员会，此举等于承认了互助会现实上的统合主义与职业角色。讽刺的是，委员会开议的时间刚好碰上首次巴黎手工工人大罢工（即1862年的印刷工人罢工）。即便民众普遍同情他们（包括许多共和派人士），但印刷工人领袖还是因结盟罪而入狱。皇帝决定赦免他们，实际上等于让反结盟与反结社的法律处于悬而未决的地位。赦令颁布之时，受皇帝资助前往伦敦博览会的工人刚好返国，他们也开始四处传布英国人通过工会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工资的信息。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不管是帝国还是工人都愿承认阶级斗争的现实。1860年代初，工人阶级政治的开启，引发了互助主义的情感浪潮。互助会的数量与会员人数大量攀升，相互信贷银



FIGURE-101  
杜米埃描绘“好资产阶级”所遇到的小矛盾，特别是当他们碰上各种严重的政治难题时。

行（例如工人信贷银行）、消费者合作社（有两家在1864年成立）与合作社住宅计划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一些甚至得到皇帝个人的襄助）。政府也在1864年批准了第一国际的组织章程。同时，帝国也请奥利维耶（后来于1869年成为帝国的自由派领袖）重拟联合法。新法的立法意旨在于避免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赋予工人阶级罢工权，但禁止工人进行组织或聚众。书籍装订工与青铜工人紧跟切石工人之后开始进行罢工，要求工资不变但工时缩短。不过1860年代初劳工运动的主要焦点在于组织权与劳动条件而非工资水平。蒲鲁东此时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猛烈抨击罢工与工会（他几乎完全接受奥利维耶订的新法）并且积极推动互助主义的工人民主（也要求女人全都回到她们专属的家庭领域）。1866年，参加日内瓦第一国际大会的法国代表在托兰领军下携带了一份货真价实的蒲鲁东主义与互助主义特许，证明这些观念对工人阶级意识有相当的影响。工人运动也遭遇挫折。建立独立工人报纸的尝试很快就遭到打压，其中一部分来自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对。划定独立政治空间的企图也同样失败。1864年，手工工人在一些激进共和派人士的协助下发表了60条宣言（Manifesto of the Sixty），正式将工人权利列为政治议题。这项行动唤起了令人恐惧的阶级斗争幽灵，并且引发不必要的也不合理的猜疑，人们怀疑工人运动是帝国用来打击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诉求的手段。当60条宣言的签署者与第一国际巴黎分会的创立者托兰于1863年担任独立工人候选人为工人运动奔走时，他受到共和派报纸的中伤，并且在选区中受到反对派的排挤，最后他在国会大选中的得票数竟不到500票，而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在巴黎则取得压倒性多数而赢得权力。

1867到1868年的经济不景气标志着阶级力量的剧烈重组，以及工人好战性与说辞的转折点。所谓的“百万富翁罢工”（millionaires' strike）正好见证了法兰西银行金库中大量累积的资本过剩、公共工程与巴黎上层阶级房地产市场的停滞，以及物价暴涨所造成的激烈的国际竞争与高失业率。佩雷尔兄弟的垮台、人心惶惶的股票市场，以及与普鲁士之间日渐升高的地缘政治冲突，侵蚀了帝国专制主义早先所赋予的安全感。1867年万国博览会的景观在某种层次上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然而许多人仍感到

相当讽刺。万国博览会在欢庆商品拜物教与消费者主义的同时，实质收入也在减少。它不仅引进了竞争商品，也让普鲁士王进入巴黎的心脏地带，而当时正值国际竞争与地缘政治紧张白热化的阶段。

工人运动因此变得更为好战，并且将主要关切的焦点转向实质工资而非组织权利。以第一国际内部来说，托兰与弗里堡这些互助主义者下台，取而代之的是瓦尔兰与马隆（Malon）等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的年纪尚小，较少受到1848年记忆的影响，他们的经验主要来自1860年代阶级冲突的实况。第一国际在当时所受到的迫害加速了创会领袖轮替的速度，增加了巴黎工人对他们的信赖感，并且迫使第一国际转入地下而与好战的布朗基主义者相遇——这些布朗基主义者以转型为工人阶级组织作为自身的革命策略。然而即便瓦尔兰（他只是其中一例）快速转向集体主义政治，致力于组织与联合各工会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群众行动的发动者，他仍固守一些互助主义的组织原则，作为往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sup>4</sup>至于手工工人则是横跨于阶级组织与互助主义间的暧昧关系上，明显未察觉其中的紧张之处。

1867年，青铜工人（第一国际首次出资援助）、裁缝与建筑工人发动大罢工，主要的诉求是提高工资。同年，对于生活水平的广泛不满演变成街头抗议，连无组织与无技术的工人也加入抗争。这是自1848年来，首次有贝尔维尔的无组织工人加入内城手工工人的行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街垒零星出现，但随即被治安部队扫除净尽。资产阶级也没有被重大让步所蒙骗。返归准代议政府（以国会中议长发言台的恢复作为象征）等于开启了请愿的渠道。而民众确实有一堆苦水要吐。1860年代初的言论自由运动已经将左岸变成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不安情绪的温床。实业家埋怨奥斯曼，而作坊师傅与店主则大肆批评信贷条件与政府支持的大垄断商。经济不景气以及普鲁士于萨多瓦（Sadowa）击败奥地利（更甬提在墨西哥方面的失利）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后者在掌权时曾经承诺要带来和平与繁荣，但现在看起来是一事无成。一些像梯也尔这样的资产阶级长久以来一直被排除于国家财富与权力的盛宴之外，此时正摩拳擦掌准备引发骚动与不安而从中取利。甚至连君主派人士也能找到借口（例如分权）来聚集民众的不满情绪。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1868到1871年惊人斗争的前奏。然而这场前奏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提出了何种阶级联盟可以取代帝国的问题。君主派是否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让共和派陷入困境？资产阶级共和派是否能压制工人阶级运动，好让政治共和国远离社会主义者的魔掌？激进自由思想家与无社会地位共和派是否能与工人运动结盟，进而克服手工工人的偏见，包容无技术工人，并以此创立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帝国是否可以借由收编、警察力量与挑衅将各派系成员予以区隔、操作并各个击破？事实上，帝国被迫一再做出让步。它放松了新闻检查（1868年5月）并允许“非政治性”的公众集会（1868年6月）。1869年，承认组织工

301

会权利。但国家绝不会放弃它用来挑衅与压制的权力。

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希望能与对立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不过却随即在1867年底遭到逮捕。这些拥有身份地位的共和派人士根本不愿搭理阶级联盟的要求。工人也同样抨击这项战术，因为他们还牢记着1848年政治共和国是怎么背叛他们的。第一国际第二波领导人试图找出能建立自身运动实力的独立空间。瓦尔兰带领书籍装订工互助会，并在1869年将其改造成活力充沛而团结的工会。1867年，他协助建立周延的消费者合作社体系（拉马麦脱），将廉价食物、政治与消费结合起来，其方式比由住在宿舍的工人群众前往光顾的酒馆或提供娱乐节目的餐馆连贯得多。瓦尔兰大力支持女性在工作场所与工人组织中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他推动巴黎各工会的联合运动（约有两万个以上的工会），并且领导第一国际跨越国界将各国工人阶级行动统合起来。正是这种广泛的地缘政治斗争概念使得“诚实的资产阶级”大为惊恐。而对瓦尔兰来说，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将不安的无组织与无技术工人群众整合到以手工工人为基础的工人运动之中。到了1870年，他

302

与其他人所搭建的戏台还不足以担此重任。了解到自身的弱点，瓦尔兰于是寻求与激进且倾向革命的资产阶级非主流派进行战术结盟。

在**放荡不羁者**与学生运动中总是可以看到这类非主流派。布朗基主义者过去就曾着手组织这样的不满情绪以利计划的进行。然而新闻检查放松之后却释放出更大的不满。报社经营者罗什福尔（Rochefort）因《路灯报》（*La Lanterne*，这是一份充满激进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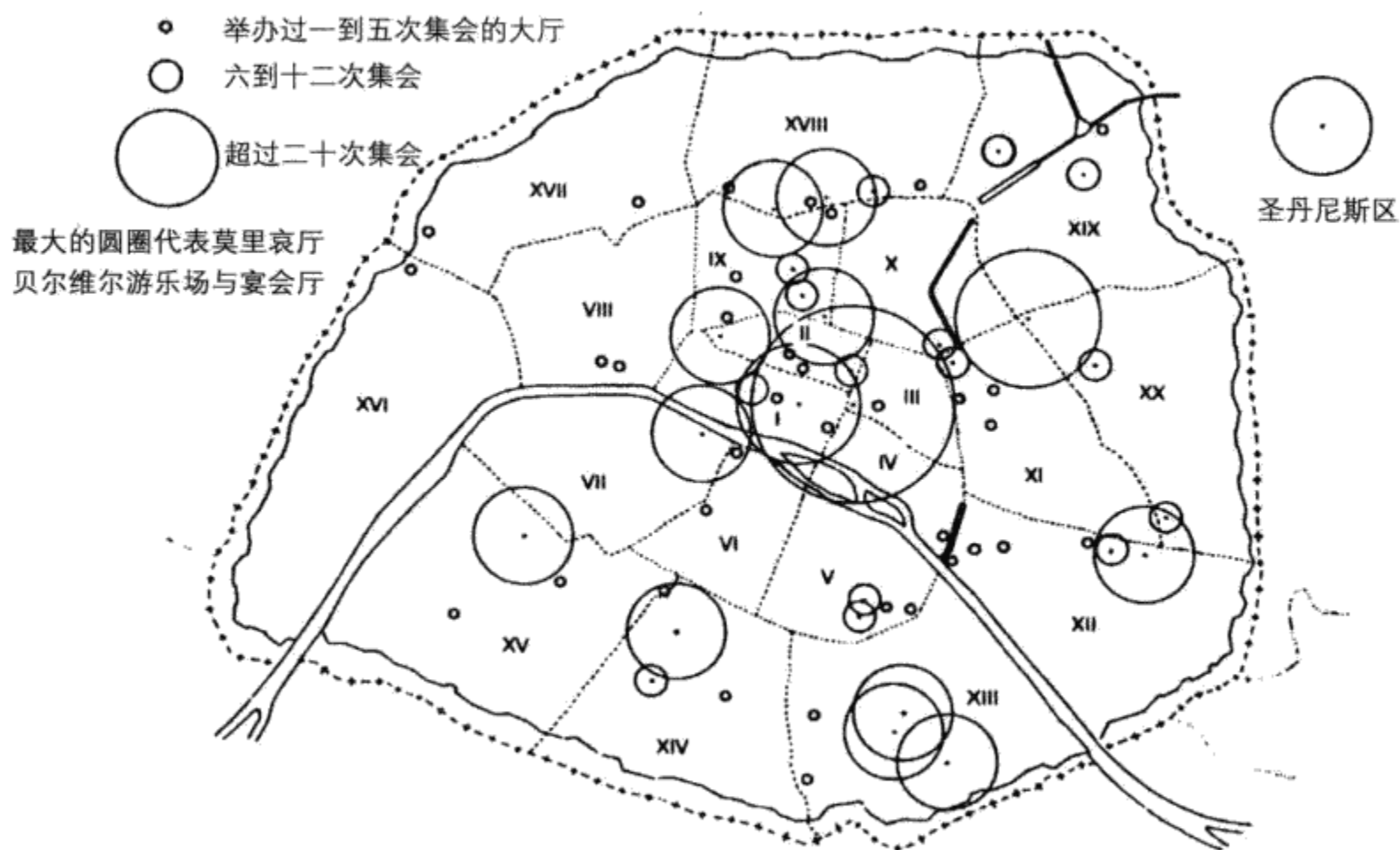


FIGURE-102  
巴黎公众集会的地点与频率，1868—1870年

判与革命说辞的报纸，罗什福尔因为这份报纸而成了监狱的常客，而这份报纸也让保守的资产阶级惊骇不已）而瞬间成为不满群众心中的英雄。瓦尔兰了解这股运动的力量，因而与其建立战术同盟以确保社会问题可以恰当地整合到激进的共和派计划当中。另一方面，激进共和派则设法消除1848年背叛的记忆。1868年，他们试图使人忆起在1851年的街垒中，曾有一位名叫博丹的共和派代表牺牲生命。他们提议在亡者节发动大批群众前往博丹的墓前致意。政府企图阻止他们前往，而那些抵达蒙马特墓园的人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坟墓上。于是接下来便有公众认捐的想法。政府对相关人士的起诉只是引起更多对政变“罪行”的关注，并且让年轻律师甘必大（Gambetta）突然成为激进派运动的英雄。博丹的象征性复活是一种传统的创造，其过程可谓神来之笔。它使人们注意到帝国的不正当性，并且象征性地说明资产阶级在工人斗争空间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这是蒙马特墓园的特殊功能）。借由这样的过程，激进资产阶级便能在象征性的统一下拥抱“另一个巴黎”。

1868年6月28日开始的“非政治”公众集会是难得一见的大事。这些集会几乎集中在充满不满情绪的地区，政府的监控完全

无法阻止这些集会转变成大众教育与政治意识提升的场所。<sup>5</sup>这种地缘政治现象预示了巴黎公社的出现。集会不只是不均匀地分布在巴黎空间中，连听众、主题与场所也很快出现分化的现象。政治经济学者与资产阶级改革者将集会看成是向大众宣传运动宗旨的大好良机，然而他们却在“另一个巴黎”的集会中因言语无法服人而经常被轰出场。激进派、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与其他革命分子主导了巴黎各区例行的政治戏码。政治经济学家与改革者被迫撤退到比较安全的左岸与右岸市中心，将巴黎北部与东北部拱手让给了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分子。看来“另一个巴黎”现在已成为民众政治鼓动的专属空间。除此之外，这股趋势也因民众街头文化、革命歌曲与民谣——它们蛰伏了将近20年，现在突然从阴暗的地底下喷发——的复活而得到加强。

这种鼓噪对拥有身份地位的资产阶级来说当然会造成不安，对于帝国支持者也一样。帝国是否能以法律与秩序之名重新汇集不满者的情绪？除非它能做出重大让步。1869年，当局面对财政保守的资产阶级批评，不得不否决奥斯曼难以捉摸的金融政策。1868年，费里在《奥斯曼的神奇账户》中攻击奥斯曼种种不确切。接下来的发展耐人寻味。首先，奥斯曼被迫减少公共工程，建筑业与巴黎产业因此更为萧条，社会不满也更为加深。其次，攻击奥斯曼的人并未否认工程的好处，甚至有许多人在1869年要求完成奥斯曼的计划，而这些人（如罗斯柴尔德）也很乐意借钱给急需钱的市政府。情势似乎越来越明显，奥斯曼其实只是皇帝的替罪羊，一路力挺的皇帝此时也自身难保。

随后1869年5月的选举之战充满了政治鼓动的气氛。当奥利维耶试图将帝国自由派势力引进巴黎市中心时，暴乱随之展开。位于沙特莱（Châtelet）的群众在驱散前，闹哄哄地前往传统的革命炉灶圣安东尼区。次日，约有2万名群众前往手工工人区；又过了一天，1.5万名群众在索邦集结，之后出发前往巴士底，但却发现道路被封锁了。此时，奥斯曼的大道成了战场。原本被资产阶级行人与消费者占用的空间，突然被大批涌入的不满工人、大学生、店主与街头群众接管。6月12日，群众甚至渗透到歌剧院附近，并在那里堆筑了第一座真正的街垒。资产阶级的反应是驱

逐这些讨厌的群众，并且重申自身的大道权利。皇帝认为行经歌剧院与圣丹尼斯港( Port-Saint-Denis)之间的对抗地带具有象征价值，然而当他走过时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沉默。

304 不过大道上的群众当中也潜伏着秘密。举例来说，我们不清楚暴力煽动与“白色短上衣”是否是秘密警察活动时的秘语？当然，群众有充足的机会可以威胁法律与秩序，并把那些拥有身份地位的资产阶级吓回到帝国的臂膀里。我们也不清楚群众的精神里到底存有多少革命因子。要求两万名以上聚众游行的守法共和派人士散去，通常不是件难事。皇帝的侄子枪杀了激进派记者努瓦尔，引起超过10万名以上的群众上街抗议，但在罗什福尔的要求下，群众安静散去，并没有与阻挡他们前往巴黎市中心的部队起冲突。然而就在前一天，罗什福尔却以超乎暗示的语气表示，革命的日子近了。当时布朗基主义者也想发动暴乱，但却得不到支持。整个情势相当不稳定，但领导班子却也混沌不明。对立情感的暧昧与零散是否可以被克服，在经过改造之后走向革命？

1869年5月与6月的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激进派的同情者只在贝尔维尔取得席次，甘必大的政治技巧高明，人也相当可靠，足以成为稳健社会主义者与左派资产阶级间的意见桥梁。除此之外，政治共和派几乎横扫了整个国会席次；甚至连非常保守的梯也尔也在资产阶级西区以些微票数击败了帝国的候选人。一年后的公民投票，其结果所呈现的意义难以诠释，激进左派所推动的弃权票并未明显增加，“否定”的票数虽然大增，仍不足以撼动帝国的地位。看起来要成立社会共和国，必须先对平民阶级进行彻底的组织与教育。而社会主义者也以此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公众集会为邻里组织奠定了基础，而在各地所讨论的主题也激励了工会、消费者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女性主义组织的形成。这些便构成了组织的基本建设，在巴黎公社时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虽然他们彼此间存在着歧见、个人的仇恨与邻里的冲突，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同样抱持革命的政治立场。而这种反对形式也与街头抗议的方向不太一样。商业、制革业与木工业的罢工以及工会与邻里之间的联结，各有不同的韵律与目标，因此相对来说较能防止警方渗透。社会主义者与布朗基主义者在此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要求耐心地进行革命运动，后者则要求自发而暴力的叛乱行动。

到了1870年，资产阶级已明显开始寻求合法摆脱帝国艰难局面的方式，同时也拒绝与“红色分子”结盟。资产阶级运用它在新闻界的资源与影响力，强有力地法律与秩序的信息灌输到工人与小资产阶级身上。然而，日常不满的情绪还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恶化与经济的停滞不前而渐渐具有威胁性。1870年2月贝尔维尔的冲突造成数人死亡，许多人被捕，大量的财物受损（多半是那些不受欢迎的店主与地主的财产）。卡伊火车头工厂大罢工显示出工人的愤慨已达一定程度，同时以往隐而不显的工人组织也浮出水面。随着帝国的胆怯与资产阶级的坚决不退让，工人的不满情绪也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情况极为严峻，但第一国际领导人（不同于布朗基主义者）仍认为政治条件尚未成熟到可以发动社会革命的地步。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巴黎公社的下场证明了这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巴黎公社在建构用来统合巴黎（与法国）零散空间中各分散要素的革命组织时，其所涵盖的分子有多远、多广与多深。悲剧在于整个情势迫使巴黎公社必须为护卫一场正在倾覆的运动而提早上场。然而，这个情势的出现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出人意表。因为所有的迹象显示，“诚实的资产阶级”——由梯也尔领

FIGURE-103

奥斯曼下台之后，众人的炮火开始指向他的创造性会计，人们怀疑他强取豪夺了公众的财产。在迈利（Mailly）的讽刺画中，奥斯曼脸上被烙上窃贼的字眼，牌子上写的则是奥斯曼出卖巴黎是为了摧毁巴黎。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奥斯曼个人从工程中获取利益。



军——不只关注于如何控制帝国以擷取政治权力果实，同时也决意要彻底处理掉这些“红色分子”，使其屈从于“最后解决”的卑贱烙印之下。因此，这段凶残闹剧的最后一幕便留待1871年5月的“血腥周”上场，约有3万名巴黎公社成员牺牲。

巴黎公社的详细内容已经超越了我们讨论的范围，但其中绝大部分根源于第二帝国时期巴黎转变的过程与影响。组织市立妇女作坊；鼓励成立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社；禁止面包厂夜间工作；租金延期支付、债务收取与市立当铺的物件出售等，这些都反映了巴黎工人阶级多年来的痛处。手工工人的集结；工会的加强；从1868到1870年公众集会场所中崛起的邻里俱乐部的活力，以及这些俱乐部在防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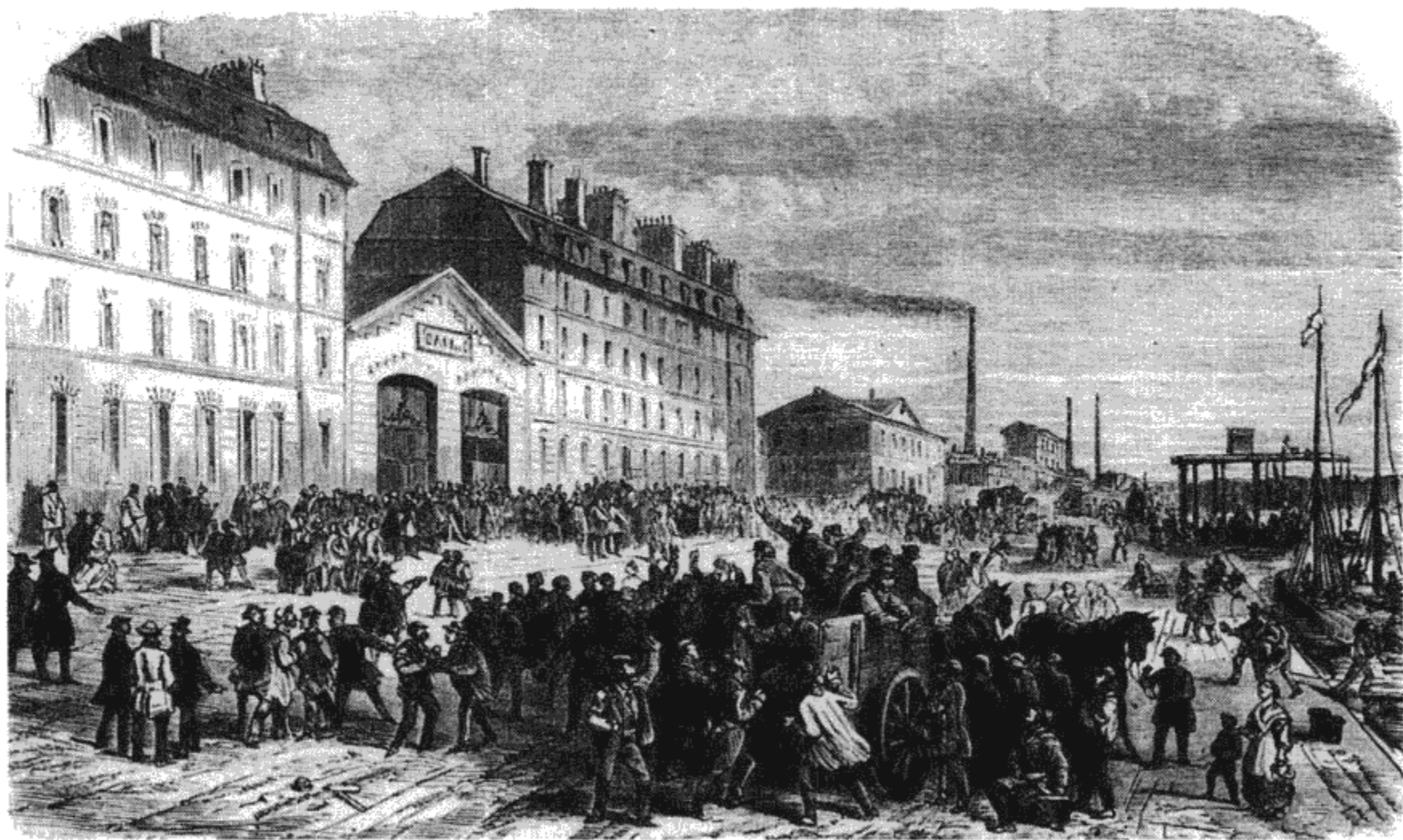


FIGURE-104

1870年卡伊大工厂的工人罢工，其影响与重要性都引起资产阶级报纸的关注。

乡土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妇女工会的建立；以及将各种运作中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以化解集权与分权、科层与民主（二十区委员会、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与巴黎公社本身）之间的紧张，这些都见证了从旧关系中产生的新组织形式努力追求的过程。劳工部的创立以及一连串朝向义务与非宗教的基础与专业教育的强力措施也见证了社会的深刻关切。

然而事实上，巴黎公社从未挑战过私有财产制或金钱权力。它所征收的只有废弃的作坊与住宅，并且降伏于法兰西银行的正当性之前（马克思与列宁都曾提过这段插曲）。大多数人寻求的是遵守原则、能相互接受的妥协而非对立（即便是布朗基主义者，有些在实际运作时也遵行此一方向）。然而反对巴黎公社的力量仍有增无减。随着紧张升高，各区“稳健”的共和派区长（当他们前往凡尔赛进行斡旋时却遭到无情对待）与巴黎公社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深。勉为其难鼓起勇气，面对1870年普鲁士军围城艰难的资产阶级，很快就展现出威吓的态度，于1871年3月21与22日发起“秩序之友”（Friends of Order）的游行示威，之后则让巴黎西部成为反动势力可轻易突破的地点。巴黎公社时期的投票模式相当容易预测。不同的是，此次的霸权力量掌握在工人运动之手。



梯也尔在与普鲁士签订了屈辱的投降书之后，将国民会议从波尔多迁往凡尔赛，1871年3月18日，在未能解除巴黎武装之下，梯也尔带领所有行政官员撤出巴黎。梯也尔的做法显示乡村的反动势力远大于巴黎公社对都市与乡村连带的微弱号召。梯也尔借由恶意的宣传，将无知而恐惧的农民动员起来组成军队，准备进行无情的屠杀（如果这些农民并未受命将红色魔鬼逐出罪恶而不信神的巴黎呢？）。梯也尔的举动显示他存心要来一场宣泄性的了断，并且毫不考虑后果。一旦丧失了对凡尔赛发动先制奇袭的机会，巴黎公社就几乎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只能等待末日的到来。压力造成内部的分裂，并且使巴黎公社原本就相当焦虑的阶级与派系联盟更加不满与敌对。以华丽的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激进资产阶级；实事求是的爱国者；徒托空言与梦想的小贩；被各种事件迷惑的工人；企图做出一贯服人的解释的工会领袖；忠于乡土、城市与国家者；集权主义者与分权主义者，大家各持立场难有共识，巴黎公会上下离心，在政治实践上也充满内部冲突。这些裂痕由来已久，其根源来自传统，并且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来临与帝国政治和资本经济间的冲突，而让整个演变过程变得相当混乱。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写道：“所有死去世代的传统宛若活人脑中的噩梦。”只是这次是工人阶级运动被噩梦所纠缠。巴黎公社是为了破除源自1789年精神的纯蒲鲁东主义与纯雅各宾主义而必须偿付的高额代价。这场悲剧在于巴黎公社想努力实现的另一种途径的现代性，早已胎死于资产阶级社会腹中，资产阶级社会绝不可能超越政治，而将社会共和国视为未来实现的目标。

巴黎公社是单一、独特而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都市史中最特出的一页。巴黎公社的火花因战争——普鲁士军围城下的绝望——与战败的屈辱而点燃，但真正供其燃烧的原料却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在本书中，我试图说明经济、社会组织、政治与文化上的复杂模式，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各色各样的人物，如梯也尔与瓦尔兰、明克与米什莱、奥斯曼与拉扎尔、路易·拿破仑、蒲鲁东与布朗基、佩雷尔兄弟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在街头歌手与诗人、拾荒者与手工工人、银行家与娼妓、仆役与闲散的富人、大学生与格里塞特、游客、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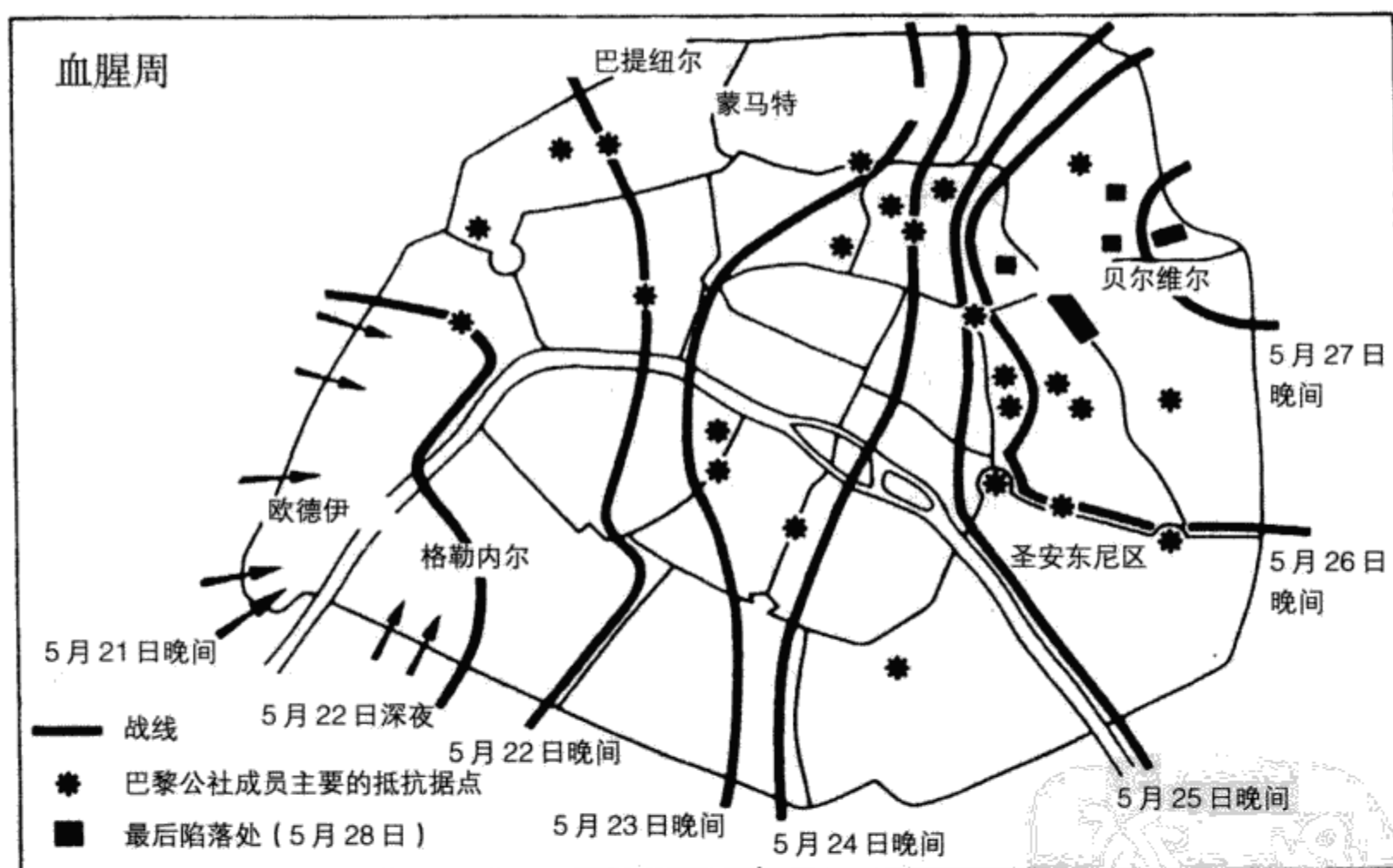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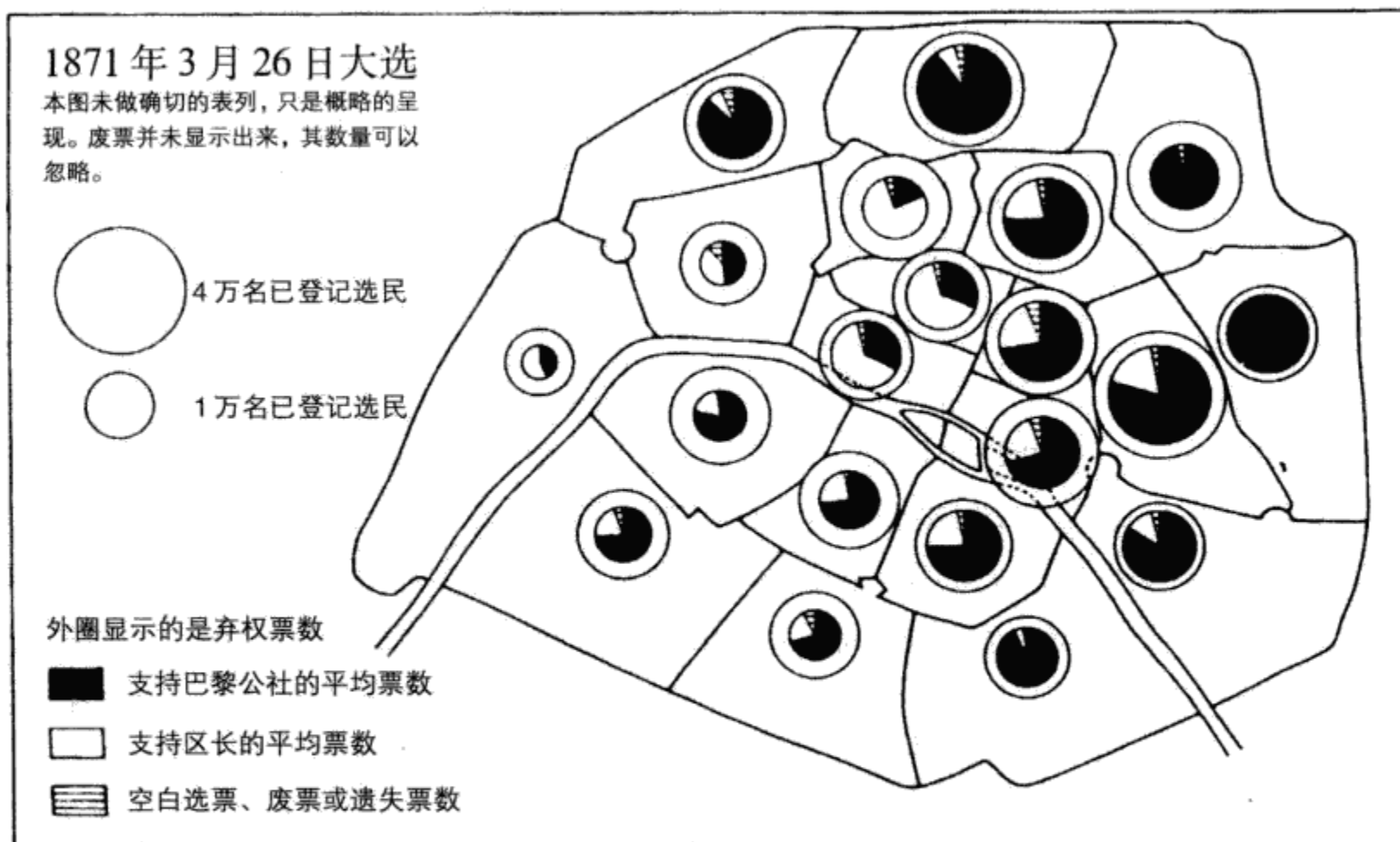


FIGURE-105  
 1871年3月26日的选举，与1871年5月“血腥周”期间重新占领巴黎的阶段，这两张图清楚说明了巴黎内部政治关系的东不均衡。西部投票人数的寡少显示巴黎有许多较富裕的市民已经逃往乡间。

主与当铺老板、娱乐餐馆老板与房地产投机客、地主、律师与教授的漩涡中打转。这些人因不同的原因来到相同的城市空间中，他们偶尔会在大道或街垒中相遇，并且各自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与控制自身的历史与地理存在的社会条件。但他们无法在自己选择的历史与地理条件中进行塑造与控制，这一点是自明的。巴黎公社是从改造权力与社会关系的尝试中产生的，这些关系有其特定的阶级面貌，并且建构于特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空间之中，而这种空间本身即充满了大量戏剧化的转折。我们可以从这类的斗争研究中学到许多，而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赞赏与启悟之处。



第三部分  
尾 声





# 建造圣心堂

圣心堂 (Basilica of Sacré-Coeur) 坐落在蒙马特高地的战略要地上，俯瞰巴黎，拥有着居高临下之势。圣心堂五座白色大理石圆顶与耸立两旁的钟楼，从巴黎每个区皆可遥望。走在旧巴黎稠密而多孔穴的街道网，偶然之间就可瞥见圣心堂的踪影。圣心堂引人注目，雄伟壮观，不管是带着小孩漫步于卢森堡公园的少妇，或是辛苦爬上圣母院顶端，或轻松搭着电扶梯在蓬皮杜中心 (Centre Beaubourg) 冉冉上升的游客，还是在格勒内尔 (Grenelle) 搭乘地下铁穿过塞纳—马恩省河或涌进北车站的上班族，以及每周日下午到肖蒙高地公园岩石顶端闲逛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全都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就连在法比安上校广场 (Place du Colonel Fabien) ——位于贝尔维尔与维雷特这两个传统工人阶级区的边缘，这些地区在我们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上玩滚球 (boule) 的老人也能清楚看到圣心堂。

在寒冷的冬日里，寒风鞭打着穿梭于拉谢兹神父墓园古老墓碑间的落叶，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墓前的台阶上可以望见圣心堂。虽然现在圣心堂已几乎隐藏在国防部现代办公大楼群之后，但从20多公里外位于圣日耳曼昂莱 (St.Germain-en-Laye) 的亨利四世别馆 (即梯也尔去世之处) 看，圣心堂的身影仍一览无遗。然而同样是在拉谢兹神父墓园，地形却千变万化，走到著名的巴黎公社成员墙 (Mur des Fédérés)，圣心堂又再度隐没，1871年5月27日，最后残存的巴黎公社士兵在经过墓园的激烈战斗之后，在此被团团围住，旋即被杀。站在爬满藤蔓的墙壁之前，

只见参天的古老栗树，哪还有圣心堂的踪影。而从这座虔诚天主教徒的朝圣地远望，只见丘顶鬼影憧憧的梯也尔之墓，谁也不知还有块社会主义者、工人及其领导分子的朝圣地隐没于山丘之后。

312 几乎没有人怀疑圣心堂的美丽与典雅。但许多人也坦承，圣心堂的醒目及独特风格有着某种高傲的威严感，连在它脚边伸展的巴黎也不得不向它表示敬意。在晴朗的日子里，远处可见到圣心堂闪烁的光芒，即便是在最阴暗的日子里，它的圆顶似乎能捕捉最微小的光点并向外放射出白色大理石的光辉。夜晚，在强光的照明下，圣心堂仿佛孤悬于太空之中，充满了天界的灵魅气息。圣心堂因此投射出一种圣徒般的高洁形象，令人铭记在心。然而，人们从中记住了什么？

313 前往圣心堂寻找答案的游客必须先登上蒙马特的陡坡。停下来喘口气的人将看到眼前是一片往远方展开的城市景象，屋顶、烟囱、圆顶、钟塔、纪念碑——1872年10月，一个起雾的晦暗早晨，巴黎大主教同样登上了这片陡坡，他所看到的老巴黎景色与今日相差无几。当他爬上丘顶，太阳奇迹般地驱走了云雾，壮观的巴黎全景尽收眼底。大主教先是惊叹，随后大声喊道：“就是这里，殉道者就是在这里牺牲，必须让圣心安息于此，才能召唤世人前来！”<sup>1</sup>如此，这座壮丽的圣心堂纪念的殉道者又是谁？

进入这座圣地的游客，一开始都会震撼于圆顶与后殿上的巨大耶稣像。基督展开双臂，露出胸前的圣心。底下则是拉丁格言——高卢悔罪（GALLIA POENITENS）。在这道严厉的训诫“法兰西悔罪”底下，则是一口大金棺，里面画着耶稣的圣心，燃烧的激情、充盈的鲜血以及环绕四周的荆棘。日日夜夜，此地灯火通明，朝圣者络绎不绝地前来祷告。在圣心堂入口处的圣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Saint Marguerite Marie Alacoque）真人尺寸塑像对面，刻有这位圣徒的书信——时间，1689年；地点，帕赖勒莫尼亚勒（Paray-le-Monial）——信中告诉我们圣心崇拜的信息：

永恒的父希望在受难的屈辱与愤怒中经历苦痛与苦闷的圣子宝心能得到补偿，并且要修建一座让圣心形象受到尊崇与臣服的礼拜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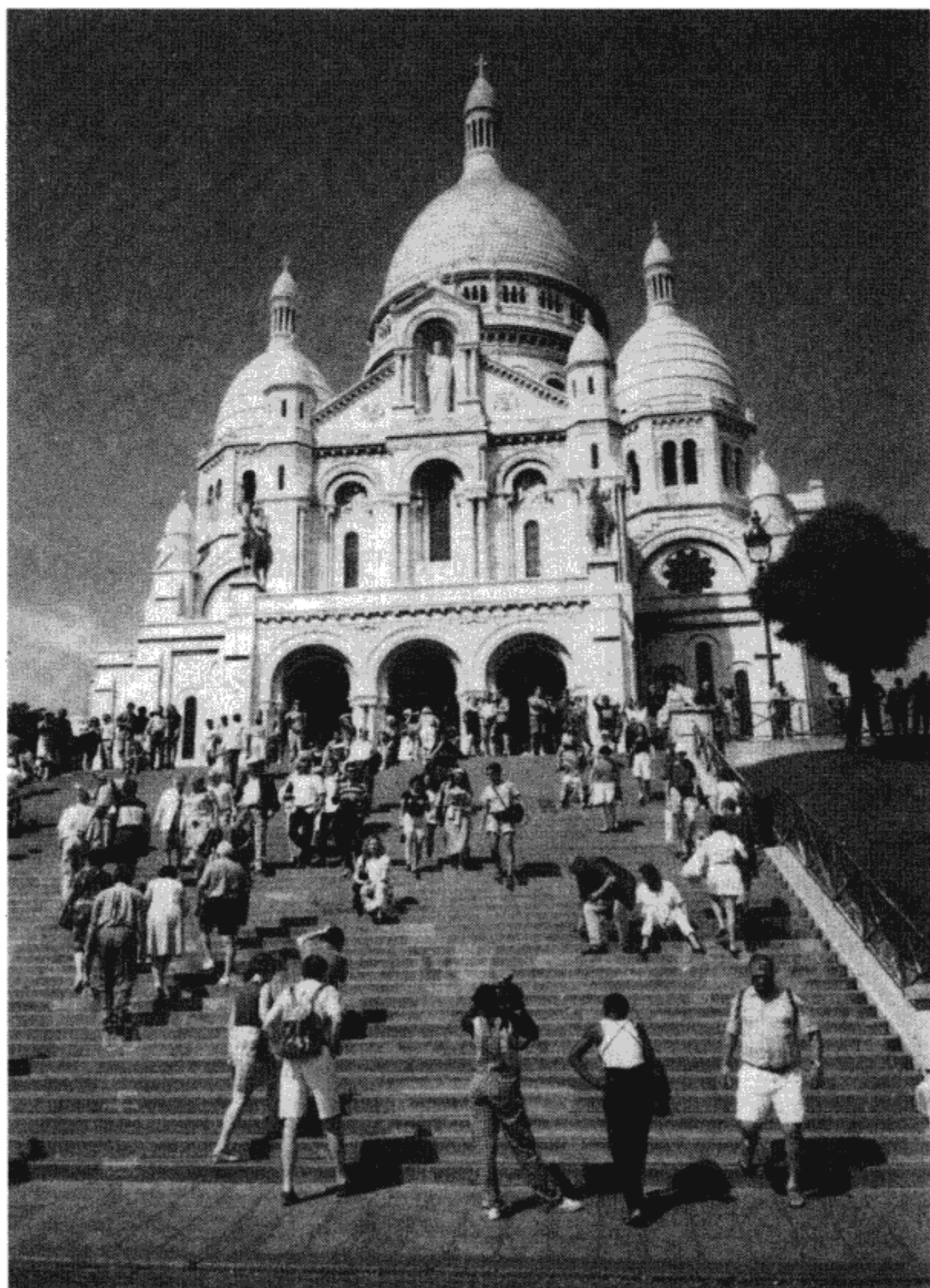


FIGURE-106  
圣心堂

向耶稣圣心祈祷早在17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根据圣经，这种仪式始于百夫长拿枪刺入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肋旁之时。但受到幻象困扰的玛格丽特·玛丽却将圣心崇拜转变成天主教会的特定仪式。尽管她的人生充满审判与磨难，行事风格严厉而严谨，圣心崇拜所投射出来的基督形象却充满温暖与慈爱，布满悔罪与温和的神秘主义。<sup>2</sup>玛格丽特·玛丽与她的门徒热切地宣传圣心崇拜。她曾写信给路易十四宣称自己传达的是基督的信息，她要求国王悔罪，为了拯救法国，国王应向圣心奉献，将圣心画在王旗上面，并且修建礼拜堂来荣耀圣心。圣心堂内的石刻文字正是引

自这封1689年的书信。

圣心崇拜的传布相当缓慢。它与18世纪法国的理性主义相抵触，后者深刻影响了天主教徒的信仰模式。除此之外，圣心崇拜也直接与詹森主义者（Jansenists）所投射出来的坚忍、严谨与自律的耶稣形象对立。到了18世纪末，圣心崇拜逐渐有了重要且具潜在影响力的支持者。路易十六本人及家人都信仰圣心。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遭到囚禁，他发誓在他获释三个月内，将公开宣布信仰圣心并以此来拯救法国（至于法国为什么需要拯救，他并没有说明，也不需要说明）。路易十六也发誓要建造礼拜堂来崇拜圣心。不过他获释的方式不允许他实现誓言，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王后在最后一次诵念圣心祷文后便上了断头台。

这些事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们预示了圣心崇拜与旧体制反动君主主义之间的关联性，这一点对我们的故事极为重要。这种关联性使得圣心崇拜的支持者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原则。反过来说，自由、平等与博爱原则的信仰者也很少迷恋圣心崇拜。革命时期的法国绝非宣传圣心崇拜的安全之地，当时的人必须小心藏好玛格丽特·玛丽的遗骨与遗物——现在展示于帕赖勒莫尼亚勒。

1815年君主制的复辟，使得局势有了改变。波旁王室在欧洲列强的环伺下试图尽可能地恢复旧社会秩序，而要求为革命时期暴行悔罪的声浪也甚嚣尘上。路易十八未能实现死去兄长的圣心誓言，但至少能在兄长一家草草埋葬之处，用他自己的钱修建赎罪礼拜堂（Chapel of Expiation）：高卢悔罪。

宣传圣心崇拜的组织出现，并且于1819年向罗马教廷要求给玛格丽特·玛丽以荣耀。保守君主制主义与圣心崇拜之间的联结更加巩固，而圣心崇拜也在保守天主教徒之间流传。然而法国天主教会中的自由派与进步派人士仍对圣心崇拜有所疑虑。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另一个蹂躏国内、破坏社会秩序的大敌，它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压力与紧张。这个问题在七月王朝时期还不明显，一直要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初年才出现一波大浪潮，使得法国的经济部门、制度结构与社会秩序经历剧烈的转变。从保守天主教徒的立场来看，这种转变威胁到法国的神圣生活，因为它带来一连串无知而冷酷的物质主义、浮华而道德败坏的资产



阶级文化，以及日趋激化的阶级紧张。集结于圣心崇拜旗帜下的，不只是那些从天性与环境上来看容易受温和而宽恕的基督形象吸引的虔诚者，以及那些梦想恢复旧社会秩序的人士，还包括那些觉得自己受到新社会秩序的物质主义价值威胁的人。在新社会秩序中，金钱成了圣杯，金融资本的教皇制威胁教皇的权威，而财神爷则威胁要取代上帝成为人们主要的崇拜对象。

除了这些情况外，法国天主教徒于1860年代又有更具体的不满。拿破仑三世终于决定（在经过无数次犹豫不决之后）站在意大利统一这一边，在政治与军事上协助意大利中部各邦从教皇的世俗权力中解放。教皇不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但在军事压力下只能隐居梵蒂冈不再露面，直到他的世俗权力恢复为止。站在这样的有利位置下，教皇对法国的政策与横扫法国的道德沦丧发表了严厉的谴责。教皇希望以这种方式召集法国天主教徒主动支持他的诉求，而时机刚好对他有利。1864年，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为玛格丽特·玛丽行宣福礼，圣心崇拜成了所有保守反对势力的口号。到法国南部帕赖勒莫尼亚勒朝圣的时代于焉展开。朝圣者前去为自己在公开与私下的逾矩行为悔罪（许多人是在新铁路的运送下到达目的地，而这些铁路却是金融巨子协助修筑的）。他们为法国的物质主义与腐化财富悔罪，为法国限制教皇的世俗权力悔罪，同时也为古老社会秩序的传统价值的消逝悔罪。高卢悔罪。

刚走进巴黎圣心堂的正门，游客便可读到以下刻文：

主后1875年6月16日，神圣教皇庇护九世治下，巴黎大主教吉贝尔（Guibert）阁下批准，亚历山大·勒让蒂（Alexander Legentil）与于贝尔·罗奥·德弗勒里（Hubert Rohault de Fleury）实现1870到1871年战争时期许下的誓言，根据1873年7月23日国民会议决议与建筑师阿巴迪（Abadie）设计执行，耶稣圣心堂由枢机主教吉贝尔庄严地举行奠基……

让我们剖开这段密封的历史并且找出里面埋藏了些什么。1870年夏，俾斯麦大军对法连战皆捷，法国举国上下笼罩着一股末日将来之感。许多人将军事的失利诠释为神意，是对犯错而道

德败坏的法国一次正义的报复。抱着这样的想法，欧仁妮皇后在催促下与她的家人与廷臣穿着丧服，从杜伊勒里宫步行到圣母院，公开将自己奉献给圣心。虽然皇后从善如流，但为时以晚。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于色当战败被俘；9月4日，共和国于市政厅前成立并且组织国防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se）。同日，欧仁妮皇后小心翼翼地逃离巴黎，并且在皇帝的催促下将所有值钱财物运往英格兰。

色当失败结束了帝国却未结束战争。普军蜂拥而至，9月20日，他们已将巴黎团团围住，并且一直维持围城的态势，直到来年的1月28日。勒让蒂与其他有身份地位的资产阶级市民相同，也在普军来临之前逃离巴黎到外省避难。他在普瓦捷（Poitiers）过着艰苦的生活，并且为巴黎的命运感到苦闷，他于12月初立下誓言，“如果上帝拯救巴黎与法兰西以及至高无上的教皇，他将用家财在巴黎兴建一座圣所奉献给圣心”。他寻求其他的支持者共同立誓，很快就得到德弗勒里的大力赞助。<sup>3</sup>然而勒让蒂的誓言并未受到热烈的对待，他很快就发现，外省“对巴黎充满了仇恨情感”。由于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因此我们可以暂时岔开主题，先来讨论这个现象背后的基础。

旧制度时期，法国国家体制已经具有强烈中央集权的性格，到了法国大革命与帝国时期，此一倾向更是加强。中央集权因此成了法国政治组织的基础，并且赋予巴黎一个相对于法国其他各省更为重要的地位。巴黎在行政、经济与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得到确保。但1789年的事件也显示巴黎人不仅能组成政府，也能毁灭政府。巴黎人善于运用权力，并且乐于成为拥有权利负担责任的特权阶级，他们常将自己认为是“进步”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认为是落后、保守与大部分属于乡村的法国各省身上。巴黎的资产阶级，不管基于何种政治理由，总是轻视外省生活的褊狭（即便他们经常要仰赖乡村租金来维持城市里的舒适生活）并且觉得农民令人作呕且不可理解。从望远镜的另一端来看，巴黎被一般人视为是权力、支配与机会的中心，同时也受到嫉妒与憎恨。巴黎除了因权力与权威过于集中而与外省敌对，许多小镇与乡村也对大城市汇集了特权、物质成功、道德败坏、邪恶与社会不安相当敌视。法国的特点在于“城乡矛盾”的紧张主要聚焦在巴黎与外省

的关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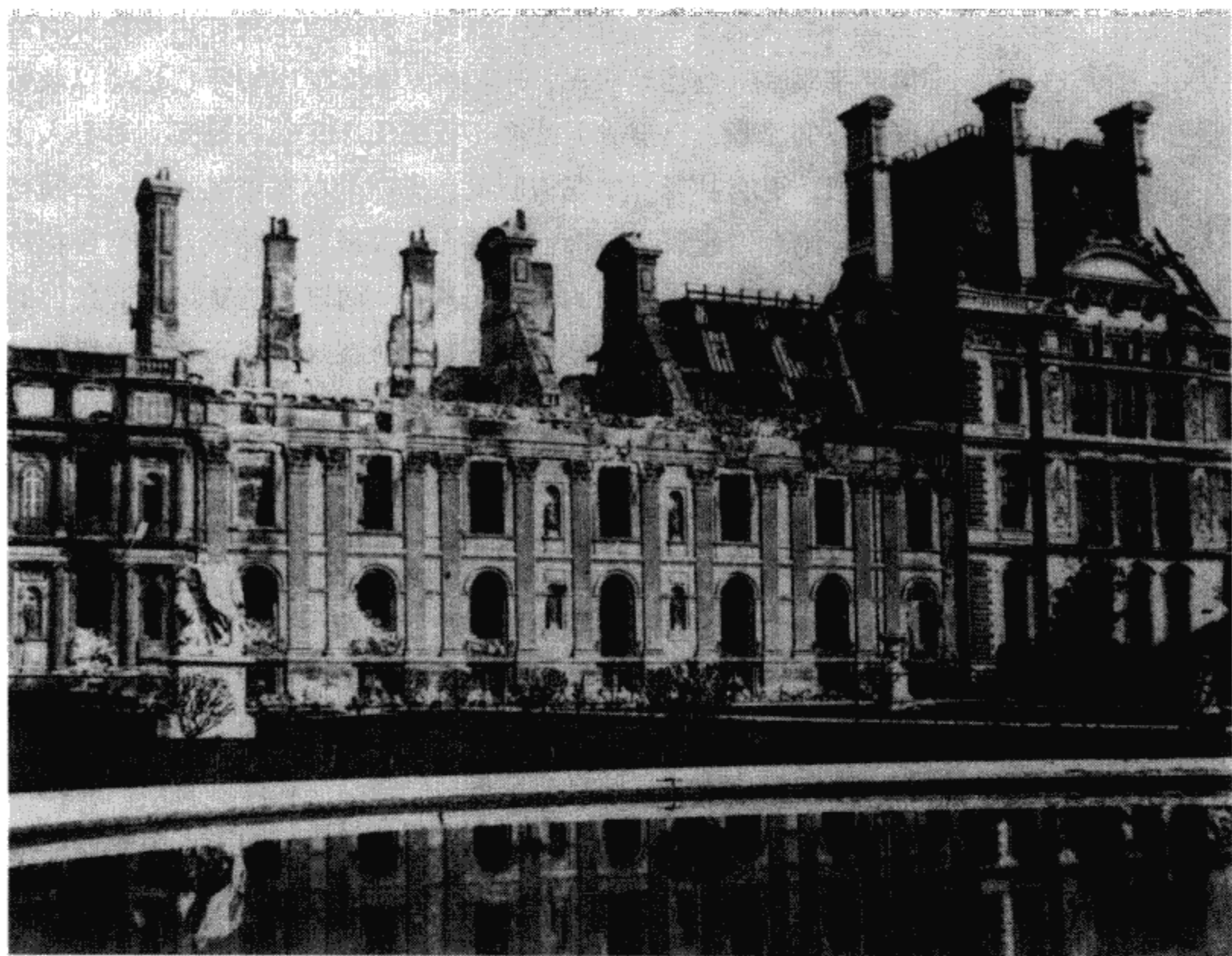
第二帝国时期，这些紧张更加尖锐化。随着铁路的开通，巴黎成为全国空间整合的中心点，经济因此大为繁荣。巴黎开始与崛起的全球经济接轨。巴黎在不断扩张的法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巨幅增加，其人口也增长迅速，大部分是由于乡村劳工的大量移入。随着巴黎成为金融、投机与商业运作的中心，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也更形快速。巴黎的财富与活力同外省的停滞与落后（除了少数的例外，如马赛、里昂、波尔多与米卢斯[Mulhouse]）形成的对比越来越鲜明。除此之外，巴黎市内的贫富对比也越来越惊人，并且逐渐表现在地理区别上，例如西部的富裕资产阶级区与北、东与南部的工人阶级区。贝尔维尔成了外国领土，西部的资产阶级市民很少有人敢冒险前往贝尔维尔。贝尔维尔人口在1853到1870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但资产阶级报纸往往用最贬抑而恐惧的字眼来描绘当地居民。随着经济增长在1860年代趋缓以及帝国权威的衰颓，巴黎成为社会不安的温床，很容易受到有心人士的煽惑。更有甚者，如我们所见，奥斯曼以宽敞的大道、公园与花园、纪念性建筑来装饰巴黎。为了完成这些建设，奥斯曼花费巨额成本与运用最狡猾的金融工具，然而这样的功绩并非勤俭的外省所乐见。奥斯曼所投射出来的公众富足形象与资产阶级的炫耀性消费相互辉映，而这些资产阶级当中，有许多是因为投机于奥斯曼主导的国家资助改造工程才变得富有。

普军围城期间，不管法国外省与乡村的天主教徒有多虔诚，此时已无心力自掏腰包在巴黎再建一座纪念性建筑。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更为特定的理由反对勒让蒂的提议。当外省与乡村的情感仍充斥着君主主义之时，巴黎人早已用其惯常的独断独行宣布共和国成立。除此之外，身陷围城之中的巴黎人仍坚决主张战斗不愿和谈，他们宣称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而外省则强烈倾向结束与普鲁士的冲突。当时有传言指出，巴黎的工人阶级已建立了新的唯物主义政治，还有人绘声绘影地表示城内充满了革命热潮，这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巴黎在缺少拥有身份地位的资产阶级市民领导下，已经落入激进派乃至社会主义哲学的掌握。由于遭到围城的巴黎与非占领区之间的通信完全仰赖信鸽与气球，很容易造成信息误读，再加上乡村反共和派与都市反君主派的敌



FIGURE-107

巴黎公社最后数日，大火在巴黎肆虐，留下满目疮痍的景象。在许多现存的照片中（拍摄者绝大多数姓名不详），我们找到了一张大火仍在延烧的国王街（Rue Royale）照片。许多主要的公共建筑，如市政厅、财政部与杜伊勒里宫，全成了废墟。1880年代，杜伊勒里宫终于被主政的共和政府拆除，部分原因是重建成本高昂，另外也因为它是令人痛恨的王室与拿破仑权力的象征。



对关系，彼此之间很难不造成误解。

勒让蒂因此认为在誓约中不特别提及巴黎才是明智之举。然而到了1871年2月底，教皇出面为他的誓约背书，从那时起，他的运动开始聚集了一些支持力量。3月19日，有小册子开始鼓吹誓约。<sup>4</sup>小册子的作者力主誓约精神必须是全国性的，全体法国人必须弥补法国所犯下的罪行。他们想在巴黎修建一座纪念性建筑，然而反对者却认为巴黎不应再做装饰，支持者对此的回应是：“即便巴黎化为灰烬，我们仍将公开承认法国的错误并且宣布这是上帝对废墟所施的惩罚。”

小册子出现的时机以及措词意外地具有预言的效果。3月18日，巴黎人走上了不归路，他们以巴黎公社为名建立了自治政府。巴黎公社成员实际犯下的或人们想象他们犯下的罪行，不久即震撼并激怒了资产阶级，外省的舆论尤其激烈。而既然巴黎很多地区都已在异常残暴的内战中化为灰烬，那么在灰烬中修建赎罪堂的构想，似乎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响应。德弗勒里相当满意地提到：“往后几个月，巴黎化为一片灰烬的景象一直在人们脑中盘旋，久久不散。”<sup>5</sup>让我们对这段历史稍做回顾。

巴黎公社的根源起自一连串彼此交织的复杂事件。正因巴黎在法国内部具有政治重要性，所以长久以来巴黎一直不被允许建立代议形式的自治政府，总是由中央政府直辖。19世纪，主要由共和派占多数的巴黎市在君主派人士（不管是拥戴波旁王朝的“正统派”还是“奥尔良派”）或专制的波拿巴主义人士统治下经常感到愤愤不平。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要求由来已久（如我们所见，各党派都称这种自治政府为“公社”）而且广受市民的支持。

于1870年9月4日建立的国防政府既不激进也不革命，它是共和派政府，<sup>6</sup>它相当胆怯而愚蠢。虽然国防政府努力在困境中维持局面，但仍不足以作为它表现拙劣的借口。举例来说，国防政府无法得到君主派人士的尊敬，并且一直对右派的反动人士相当恐惧。当驻防东部的军队在巴赞（Bazaine）将军率领下于10月27日在梅斯（Metz）投降普军时，巴赞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投降是因为他是君主派分子，无法为共和政府而战。有些拒绝投降的军官认为巴赞重视自己的政治立场更甚于国家荣誉。这个事件往后几年一直困扰着法国政治。罗塞尔（Rossel）——后来暂时由他



指挥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并且被独断地判处死刑与处死）——当时是巴赞麾下军官，他对巴赞毫无爱国情操感到震惊。<sup>7</sup>

然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紧张，还是比不上传统而顽固的资产阶级与开始自立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真实或想象的对抗。无论如何，在1860年代，资产阶级已经警觉到工人阶级组织与政治俱乐部的出现、第一国际巴黎分会的成立、工人阶级思想的沸腾以及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哲学的再次兴起。而工人阶级——他们并不像对手所畏惧的那样有组织与团结——显然也展现出他们具有充分的新兴阶级意识。

320 没有工人阶级的协助，国防政府无法抵挡普鲁士胜利的浪潮，也无法打破巴黎遭到围城的局面。尽管左派领导人最初反对这场皇帝个人的战争，此时还是愿意伸出援手。布朗基承诺给予政府“有力而绝对的支持”，连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也投入组织防卫巴黎，他们尽力劝阻德国工人不要参与这场手足相残的斗争。工人阶级骚动的中心贝尔维尔为了国家，以共和国之名而集合起来。<sup>8</sup>

资产阶级感觉眼前是个陷阱。当时一位资产阶级评论家写道，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夹在普鲁士人以及所谓的“红色分子”之间。他继续写道：“我不知道这两个恶魔哪一个比较可怕；资产阶级痛恨外国人，但他们更怕贝尔维尔人。”<sup>9</sup>就算他们很想打败外国人，也绝不会让工人阶级大军担任他们的前锋。这将不会是法国史上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选择投降德国人，留下左派成为爱国阵线的主要力量。1871年，对“内敌”的恐惧超越了国家尊严。

法国人未能突破巴黎围城，人们起初认为是普军优越而法军愚蠢的结果。然而随着一次又一次承诺胜利的出击功败垂成，正直的爱国者开始怀疑，是否当权者准备叛国而不愿采用各种诡计来取胜。国防政府逐渐被视为“叛国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ction）——马克思后来用这个词热情地为巴黎公社辩护并产生压倒性的效果。<sup>10</sup>国防政府也同样不愿响应巴黎人组成民主自治政府的要求，因为许多拥有身份地位的资产阶级早已逃离巴黎，如果举行选举只是将自治权力送进左派的手中。鉴于右翼君主派人士的猜疑，国防政府不敢对这个长久以来的要求稍做让步。因此，这个请求被无限期搁置。

最早从10月31日开始，各种不同的事件已经纠结起来在巴黎

引发暴乱运动。就在巴赞耻辱投降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出政府正与普鲁士进行停战协议。巴黎人上街抗议，其中包括令人生畏的贝尔维尔群众，他们抓住几个政府官员当人质，要求政府必须口头保证进行全市选举与不准投降。这个事件显然触碰到右派的敏感神经。勒让蒂在12月时感受到一股“对巴黎的仇恨”，其直接的导火线便在于此。政府仍持续抵抗外侮，不过局势的转变使人逐渐清楚看出，政府在对抗贝尔维尔人上面所付出的心力显然要比对抗普鲁士人多得多。

巴黎之围继续持续。不断恶化的城市条件为不稳的社会局势带来无法确知的影响。<sup>11</sup>政府在面对市民需求时展现出全然的无能与迟钝，等于是对原本已在燃烧的不满情绪添上柴火。市民以猫狗为食，有特权的则分食动物园内小象波吕克斯(Pollux)的肉(象鼻一磅40法郎)。鼠肉——“味道介于猪肉与松鸡肉之间”——一块从60生丁涨到4法郎。政府一直拖到1月才采取基本的面包配给措施，但为时已晚。粮食减少，面包中掺杂了骨头充数，更糟的是有些骨头还是从墓穴里挖出来临时磨碎洒上的，可想而知

321



FIGURE-108

讽刺画家卡姆加入年迈的杜米埃，试图从1870年巴黎被围的那几个悲惨月份中抽绎出一些幽默的元素。这里我们看到巴黎人排成一列准备分取晚上的鼠肉；卡姆也提醒读者，在食用鼠肉时小心猫会跟着窜进嘴里。

这种东西吃起来并不可口。因此，一般平民在毫不知情下吃了自己的祖宗，至于奢侈的咖啡馆生活则由囤积居奇的商人支持着，里面卖着价格高得吓人的商品。留在城中的富人仍不改旧习，过着奢华的日子，只是这回他们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政府完全无视于无特权者的感受，纵容商人牟利并且让富人继续进行炫耀性消费。

到了12月底，反对国防政府的激进派势力越来越大。1月7日，出现了著名的红色告示(Affiche Rouge)。在巴黎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联署下，这张告示指控政府因为优柔寡断、驽钝与迟疑，将国家带向覆亡的边缘；告示指出政府不知如何治国也不知如何作战，并且坚信让这样的政权继续，最后终将走向投降一途。告示宣布一项计划，要统一进行资源征集、配给以及密集攻势，最后并以著名的口号结束：“让人民做主！让公社做主！”<sup>12</sup> 布告在巴黎各处张贴之后，马上收到效果。军方做出决定性的响应，并且

322



FIGURE-109

从1840年代开始，梯也尔经常成为杜米埃笔下的人物。1870年，梯也尔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使杜米埃又有了批判评论的机会。在左图中（出版于1871年2月24日），梯也尔正在波尔多指挥新选出来的国民会议（但“人们看不到提词员”），而在右图中（出版于4月21日，此时巴黎公社已宣布成立），我们看到梯也尔发狂似的抽打着马匹，马匹拖着国家这辆马车朝着凡尔赛方向前进，无视巴黎（被描绘成自由女神像的样子）以及往另一个方向拉扯的马匹，不过巴黎似乎不以为然地转头看着梯也尔。国家的瓦解在此已有了不祥的先兆。

组织最后一次大型出击，而其结果则是另一次愚蠢至极的军事失败，其伤亡也更为惨重。利萨加雷（Lissagaray）写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被送去当炮灰。”<sup>13</sup>对于那些实际参与军事行动的人来说，政府叛国的事实已相当确凿。这使得资产阶级中正直的爱国者，将爱国情操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与异议的激进派和工人阶级结盟。

巴黎人在愠怒与被动下，被迫在1月底签订停战协议。法国必须先举办全国大选组成制宪会议后，才能进行协商并批准和约。停战协议规定法军必须解除武装，但巴黎的国民卫队却不在此限，事实上也很难令他们放下武器，这使得后者仍具有战斗能力。在普军监视下，日常物资运进饱受饥饿之苦的巴黎。残余的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逃往乡村避难处，贫困、未领军饷与士气低落的士兵则涌入城市，造成社会与政治的压力。在2月大选中，巴黎选出了激进共和派议员（勃朗、雨果、甘必大，甚至还包括了加里波第[Garibaldi]）。但是乡村与外省则坚决投票支持和平。由于左派反对投降条约，国防政府中的共和派因主战而受到严重拖累，波拿巴主义不被信任，因此主张和平的选票全投给了君主派人士。巴黎共和派惊讶地发现自己必须在国民会议中面对占多数的君主派人士。已经73岁的梯也尔被选为国民会议主席，部分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另外也因为君主派人士不想为将来要签署的耻辱和约负责。

2月26日（这个时间很接近1848年二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梯也尔签订了初步的和平协议。他将阿尔萨斯与洛林割让给德国。更糟的是，梯也尔答应让普军于3月1日象征性地占领巴黎，此举很容易演变成浴血战，因为有许多巴黎人威胁要发动武装战斗。幸亏有左派的组织力量（他们了解普鲁士将会摧毁他们，因此愿意执行梯也尔的命令）与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这个新神秘团体的协助，才免于大乱。普鲁士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进行阅兵游行，群众只是冷峻而沉默地旁观着，所有的重要纪念建筑物都盖上了黑纱。这个耻辱不会被轻易遗忘，而梯也尔也饱受指责。梯也尔也同意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而在这一点上，梯也尔堪称是个爱国者，他拒绝俾斯麦由普鲁士银行借款给法国的建议。梯也尔将这个特权保留给法国人，并且让这灾难的一年转变成法国金融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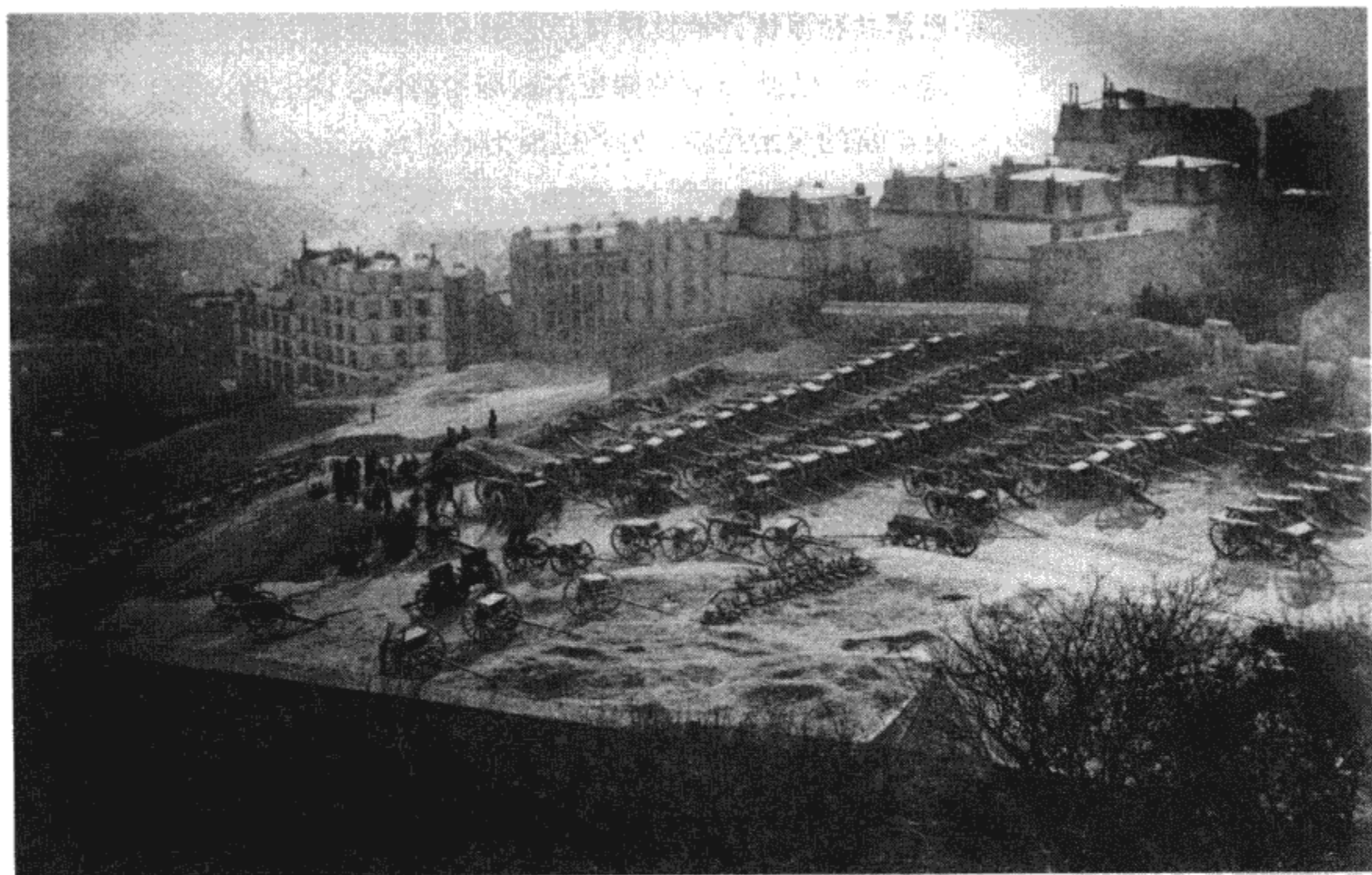


层有史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sup>14</sup>金融界人士告诉梯也尔，如果他要筹得款项，就必须先处理掉“巴黎那些恶棍”。对此梯也尔特别拿手。早在1834年担任路易·菲利普的内政部长时，他就曾负责对法国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梯也尔素来瞧不起这些“卑贱群众”，他早就准备好要对付他们——他曾于1848年向路易·菲利普提出这项计划，现在他终于可以付诸实行。梯也尔将运用全国的保守主义之力一举击碎巴黎的激进主义。

3月18日早上，巴黎人醒来发现剩余的法国军队正进到巴黎市内接收大炮，明显是要将从9月4日开始加入国民卫队的大批民众解除武装。巴黎工人阶级区的民众，开始自动地要求政府归还这些原为他们所有的大炮（毕竟，这些难道不是在围城期间，民众以自己收集来的金属铸造的？）。蒙马特高地上，疲倦的法军士兵在集结的炮兵连上站岗，面对越来越浮躁而愤怒的群众。勒孔特（Lecomte）将军下令部队开火。他连续下了三次命令，士兵们却无动于衷，并且还将枪托朝上欣喜地加入群众的行列。愤怒的暴民俘虏了勒孔特将军，使其成了阶下囚。民众偶然间俘获了托马（Thomas）将军，他在1848年六月事件中的残杀罪行令人痛恨

FIGURE-110

这是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蒙马特大炮是在围城期间由民众贡献金属在巴黎工房中熔化铸造而成。这些大炮是造成巴黎与凡而赛决裂的引爆点。





不已。这两名将领被带到罗西耶尔街（Rue des Rosiers）六号的花园里，在一团混乱与愤怒的争论中，这两个人被推到墙边射杀。

这是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蒙马特大炮是在围城期间由民众贡献金属在巴黎作坊中熔化铸造而成。这些大炮是造成巴黎与凡尔赛决裂的引爆点。

这个事件相当关键。保守派有了殉道者，梯也尔便可在这些不服从的巴黎人身上冠上谋杀者与刺杀者的恶名。蒙马特高地长久以来一直是基督教圣徒的殉道处，现在保守派天主教徒又可在殉教者的名单上添上勒孔特与托马的名字。往后数月乃至数年，随着建造圣心堂的斗争逐渐展开，越来越多人主张要在此地修建一座建筑物以纪念那些“为了守护基督教社会而牺牲的过去殉道者”。<sup>15</sup>1873年，国民会议通过立法支持兴建圣心堂时，曾经引用上面这句话。1875年6月16日，奠基典礼完成之后，德弗勒里很高兴圣心堂即将在此地兴建，“这块原本如此神圣的地方，被撒旦选来恣意行恐怖之事，虽然带来了毁灭，却也给予了教会两个如此荣耀的殉道者。”德弗勒里又说，“是的，就是此地，巴黎公社成立之处，托马与勒孔特两位将军遭到杀害之所，圣心将在此建造起来。”他欣喜于“许多良善的基督徒现在都能坚决爱上帝，上帝深知该如何击败邪恶心灵，毁弃邪恶者的计划并且在邪恶者原本要掘墓的地方安置摇篮”。德弗勒里将基督教信众对比于“充斥着狂乱恶魔与居住着仇视宗教与教会的居民的山丘”。<sup>16</sup>高卢悔罪。梯也尔对于3月18日的事件所做的响应，是将军队与政府官员全部撤离巴黎。他准备在安全距离外的凡尔赛发号施令，有系统地进攻并且收复巴黎。俾斯麦对于重建法军以扑灭巴黎的激进分子一事并不反对，不仅如此，他还释放了俘虏与物资来协助梯也尔。然而俾斯麦还是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军驻扎在巴黎四周，静观事件的发展。

巴黎人被孤立了，同时也对局势的急转直下感到惊讶，然而在国民卫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他们不仅接管空无一人的行政机构，还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与效率恢复运作（甚至连剧场也重新开放），同时也在3月26日举行大选。3月28日，巴黎公社成为政治事实。<sup>17</sup>这是巴黎平民欢喜庆祝的一天，也是资产阶级惊惶失措的一天。然而，巴黎公社的政治却有点名不符实。虽然法国史

上第一次有大量的工人担任民意代表，但巴黎公社实际上虽然仍掌握在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之手。巴黎公社由各种政治流派组成，包括往雅各宾派倾斜的稳健共和派人士、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布朗基主义的革命分子，为了决定采取激进路线还是社会主义路线，派系主义往往造成许多激烈争论。巴黎公社充满了追悔过去的怀旧气氛，不过从某方面来说，它也指向一种能主动探究结社原则，以及社会组织的行政与生产原则，且较为平等的现代主义未来。然而，这些想法没有一样能够实现，因为不管巴黎公社成员的现代性主张是什么，他们最终都将被反动的保守主义浪潮所推翻。梯也尔于4月初发动攻击，巴黎第二次围城开始。法国乡村与外省开始动手摧毁工人阶级的巴黎。

对巴黎公社来说，往后发生的是一连串的灾难。当凡尔赛军队终于攻破巴黎外围的防线时——梯也尔于1840年代所建——他们快速地横扫穿过巴黎西部的资产阶级区，并且沿着奥斯曼所修筑、通往工人阶级区的大道，进行缓慢而无情的屠杀。街垒遍布各处，但军方已部署了大炮来轰击这些障碍物，并且用燃烧弹将公社成员藏身的建筑物烧个精光。法国史上最邪恶而血腥的杀戮

FIGURE-111  
公社成员在阿勒马尼街  
(Rued'Allemagne) 堆筑  
街垒，1871年3月。





FIGURE-112

最后约有 300 名公社成员于 1871 年 5 月的“血腥周”被捕，他们在拉谢兹神父墓园的巴黎公社成员墙前遭到任意射杀，往后数十年，这面墙成为朝圣者必来之所（达尔琼[Alfred Darjon]的不透明水彩画）。

就此展开。凡尔赛军队毫不留情。除了街头巷战的死伤外，从大部分人的描述来看，这方面的数量并不大，还有大规模未经审判即予以处死的情况。莫瓦兰因他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观点而遭处死；共和派代表与巴黎公社的批评者米利埃，只因某个上尉军官刚好不喜欢他的报纸文章而遭处死（他被迫跪在先贤祠的台阶上，并且被要求为自己的罪乞求宽恕——他并没有照做，反而喊出“巴黎公社万岁”，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卢森堡花园、位于洛鲍（Lobau）的军营，以及拉谢兹神父墓园中著名而仍受尊崇的围墙，随着行刑队执行任务而不断回响着枪声。有 2 万到 3 万的公社成员在此丧失生命。高卢悔罪——以报复的方式。

在这段悲伤的历史中，有个事件引起我们注意。5 月 28 日早上，筋疲力尽的瓦尔兰——书籍装订工，第二帝国时期工会与食物合作社的组织者，国民卫队的成员，聪明、受尊敬、严谨正直而且投入的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成员与勇敢的战士——遭到指认与逮捕。他被带到罗西耶尔街当初处死勒孔特与托马的房子里。被判处死刑后，瓦尔兰在蒙马特高地游街示众，有人说十分钟，有人说数小时，他在这里受到善变的暴民的虐待、殴打与羞辱。最后，他被带到墙边枪决（他的脸已经被打凹了，一只眼睛掉出了

327

328

眼窝)。瓦尔兰当时才32岁，行刑队开了两次枪将他杀死。就在第二次开枪之前，毫无悔意的瓦尔兰叫道：“巴黎公社万岁！”瓦尔兰的传记作家称其为“瓦尔兰在十字架上受难”。左派因此有了自己的殉道者。而圣心堂坐落的地点正位于瓦尔兰的遇难处。<sup>18</sup>

人们口中所称的“血腥周”，对于财产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公社成员并不迷恋私有财产制的特权，也不反对将可恨的象征



铲除殆尽。旺多姆凯旋柱——拿破仑三世钟爱之物——在5月16日的隆重仪式下拉倒在地，象征专制统治的终结。画家库尔贝后来必须为此事负责，他自掏腰包支付凯旋柱的重建费用。公社成员也下令拆除赎罪礼拜堂，这是路易十八用来让巴黎人记住当初处死他兄长的罪行，但并未执行。而当梯也尔显露他真正的意图时，公社成员也乐于一块一块地将他在巴黎的寓所拆个精光，龚古尔觉得这种象征性动作“只会带来负面效果”。然而不分青红皂白地焚烧巴黎又是另一回事。炮轰巴黎时已造成大火，但公社成员溃退时也基于战略考虑故意在城中纵火。有传言说巴黎公社为了报复，便尽可能地烧尽所有的东西。另外一则有关可憎的女性纵火者的错误传闻则在凡尔赛的报纸传开，凡是有嫌疑的妇女就被当场枪毙。资产阶级日记作家奥德乌（Audéoud）得意地记下他如何在布朗什街（Rue Blanche）告发一名盛装打扮的妇女打算纵火，只因为她拿了两个瓶子（里面装了些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这名妇女将猛然冲来的醉酒士兵推开，士兵却朝她背后开枪。<sup>19</sup>

不管实情为何，纵火犯的传言甚嚣尘上。不到一年的时间，教皇就已经将巴黎公社的成员描述成“来自地狱的恶魔，将地狱之火带到巴黎街头”。城市灰烬成为巴黎公社对抗教会的罪行象征，并且培养出建造圣心堂能量的沃土。难怪德弗勒里暗自庆幸这句话说得好——“即便巴黎化为灰烬”。他指出，这句话使人强烈感受到“巴黎公社的纵火犯正逐渐让这个世界堕入恐怖之中”。<sup>20</sup>

巴黎公社的结局毫无可喜之处。尸体弃置于街头，恶臭令人难以忍受。举例来说，有300左右具尸体被草草丢入奥斯曼美丽

FIGURE-113

凡尔赛军队杀害的巴黎公社成员( 迪斯德里[Disderi] 摄)。有人将白色花圈放在右下角年轻妇女手里( 自由女神的象征，将再次遭到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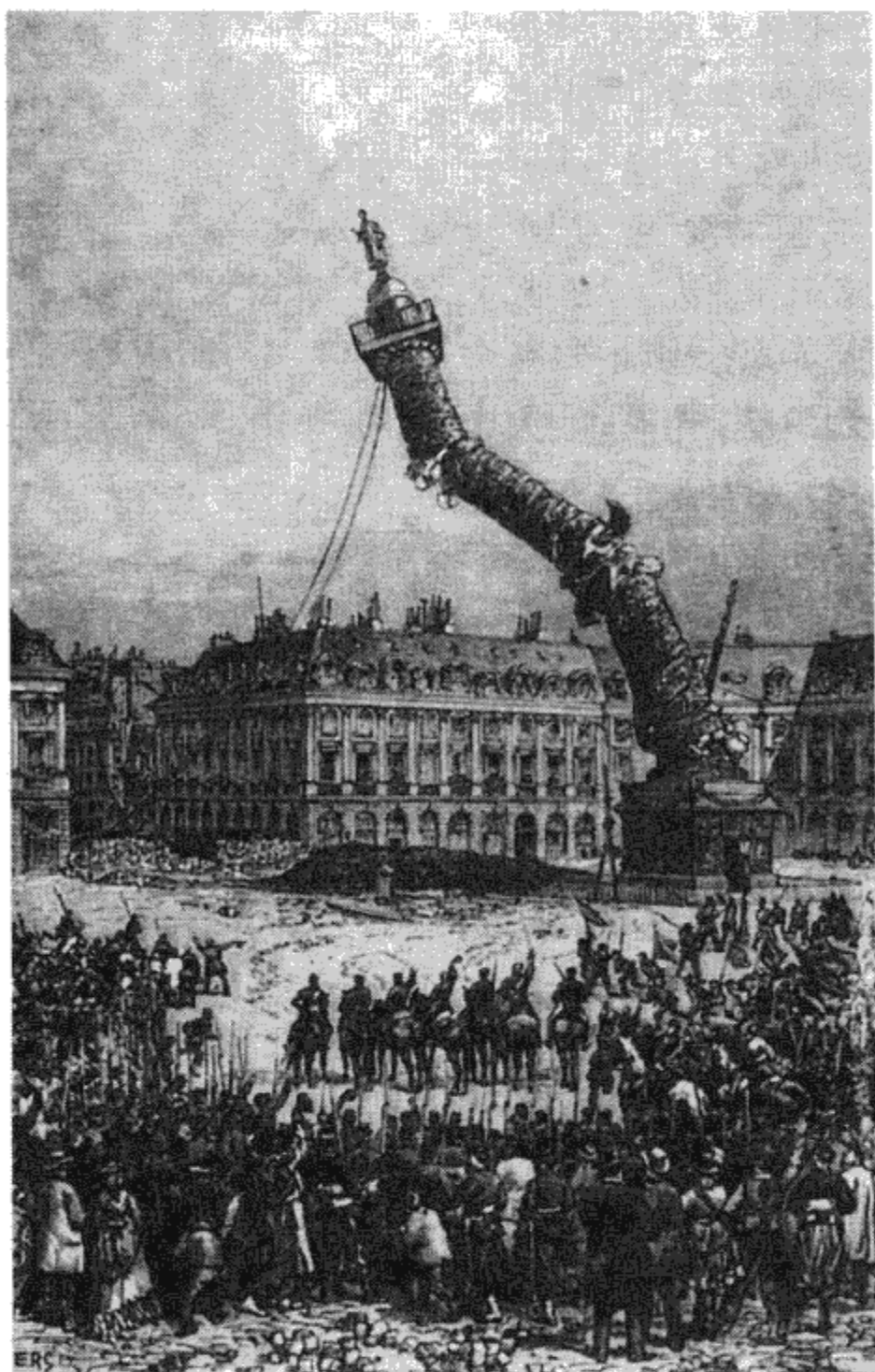
的肖蒙高地公园的湖中（它曾经是用来绞死低劣罪犯的刑场，后来成了巴黎市的垃圾场），几天后这些尸体浮出湖面、肿胀不堪，人们才不得不将其从湖中拖出。这些尸体在火葬场焚烧，数日都无法烧尽。奥德乌愉快地看着所有的尸体“布满弹孔、脏臭腐烂”，并且将“尸臭味”当成是“和平的芬芳香味，就算敏感的鼻子因此抗议，灵魂仍感到喜悦”。奥德乌又说：“我们也变得残忍而无情，能用他们的血浸泡洗涤双手，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然而流血也让许多资产阶级开始感到反胃，一直要到大部分具有虐待狂倾向的资产阶级大喊“停止”，流血行动才告一段落。著名日记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试图说服自己这些事件全都是出于正义，他写道：“没有和解也没有讨价还价，这倒是件好事。解决的方式很野蛮，完全凭借武力，并且使人扬弃懦弱的妥协方案……选择以

FIGURE-114

旺多姆凯旋柱的倾覆——  
摩尔（Meaulle）与维耶  
（Viers）绘——创造了不少  
乐趣，也显示这些建筑物  
与纪念碑对巴黎人来说具  
有深刻的政治象征意义。

流血来涤净一切。这样的整肃行动，借由杀光人口中好战的部分而将下一场革命延缓了一个世代。如果掌权者有足够的胆子将这次所做的事再度如法炮制一遍，那么旧社会未来将有20年的清静日子可过。”<sup>21</sup>这些话完全说出了梯也尔的内心感受。不过当龚古尔日后行经贝尔维尔，看见“丑陋沉默的脸孔”时，他不由得认为这是一块“被征服但并未臣服的区域”。难道没有别的方法来驱除革命的威胁吗？

1870到1871年的经验，连同拿破仑三世与第二帝国腐化“节庆物质主义”间的对峙，使得天主教徒普遍开始深切反思。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认为法国有罪，因此产生赎罪的主张与虔信的运动，其行动不仅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气势，连规模也相当庞大。强硬并且主张教皇至上论的天主教徒绝对支持返归法律与秩序，并主张政治的解决方案必须奠基于对权威的尊敬。坚守法律与秩序承诺的人正是那些君主派人士，而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些顽固的天主





教徒。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对此感到忧虑惊讶，但他们没有立场来做动员，因为教皇认为这是法国“该承受的天谴”。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阻止君主派人士与顽固天主教徒之间纽带关系的逐步加强。而正是这个强大联盟确保了圣心堂的修建。

330 然而，对于原先立誓的人来说，马上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这个虔诚的愿望。这需要官方的行动。勒让蒂与德弗勒里寻求新任巴黎大主教的协助。与梯也尔同样都是都尔人的吉贝尔，在受到说服下出任巴黎大主教一职。前面三任大主教都因暴力而死亡：第一任死于1848年的暴乱之中；第二任于1863年遭到暗杀；第三任则死于巴黎公社时期。巴黎公社成员早先曾决定取得一些人质以应对凡尔赛方面将采取的屠杀行动。大主教被当成主要人质，巴黎公社成员想用他来换回布朗基。梯也尔拒绝协商，显然，对他而言，一个死而殉道的大主教（事实上这位大主教是自由派天主教徒）要比用活的大主教换走充满活力与威胁性的布朗基更有价值。在“血腥周”期间，有些巴黎公社成员尽其所能地采取报复行动。5月24日，凡尔赛军队以最血腥而残酷的方式一路杀进巴黎，只要有担任公社中重要角色的嫌疑者一律处决，大主教也在此时被枪决。在最后一个礼拜，有72个人质被杀，其中24名是教士。与1789年一样，巴黎公社也具有强烈的反教士倾向。大整肃之后，留下了2万具巴黎公社成员的死尸，约有4万人被囚禁，无数人逃亡。梯也尔于6月14日写信给吉贝尔，向他保证：“‘红色分子’已经完全被压制住了，明天开始便不会再出现这些人的踪影。他们在经过这场失败的战斗之后，50年内都不可能恢复元气。”<sup>22</sup>在梯也尔再三保证之下，吉贝尔来到巴黎。

332 新任大主教对于修建纪念性建筑以纪念圣心的运动印象深刻。1872年1月18日，吉贝尔正式接下建造圣心堂的担子。他在给勒让蒂与德弗勒里的信上提到：

你们已经对我们国家的罪恶有了通盘的考虑……从群众的心态以及从惩罚不尽的背教者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世上普遍存在着反抗上帝与基督的阴谋，社会屈从于与胜利的外敌进行的恐怖战争中，然而再恐怖也比不上国境之内同胞手足的自相残杀。在支吾之间，我们成了上帝的叛徒，因而落入无政府的深渊之中。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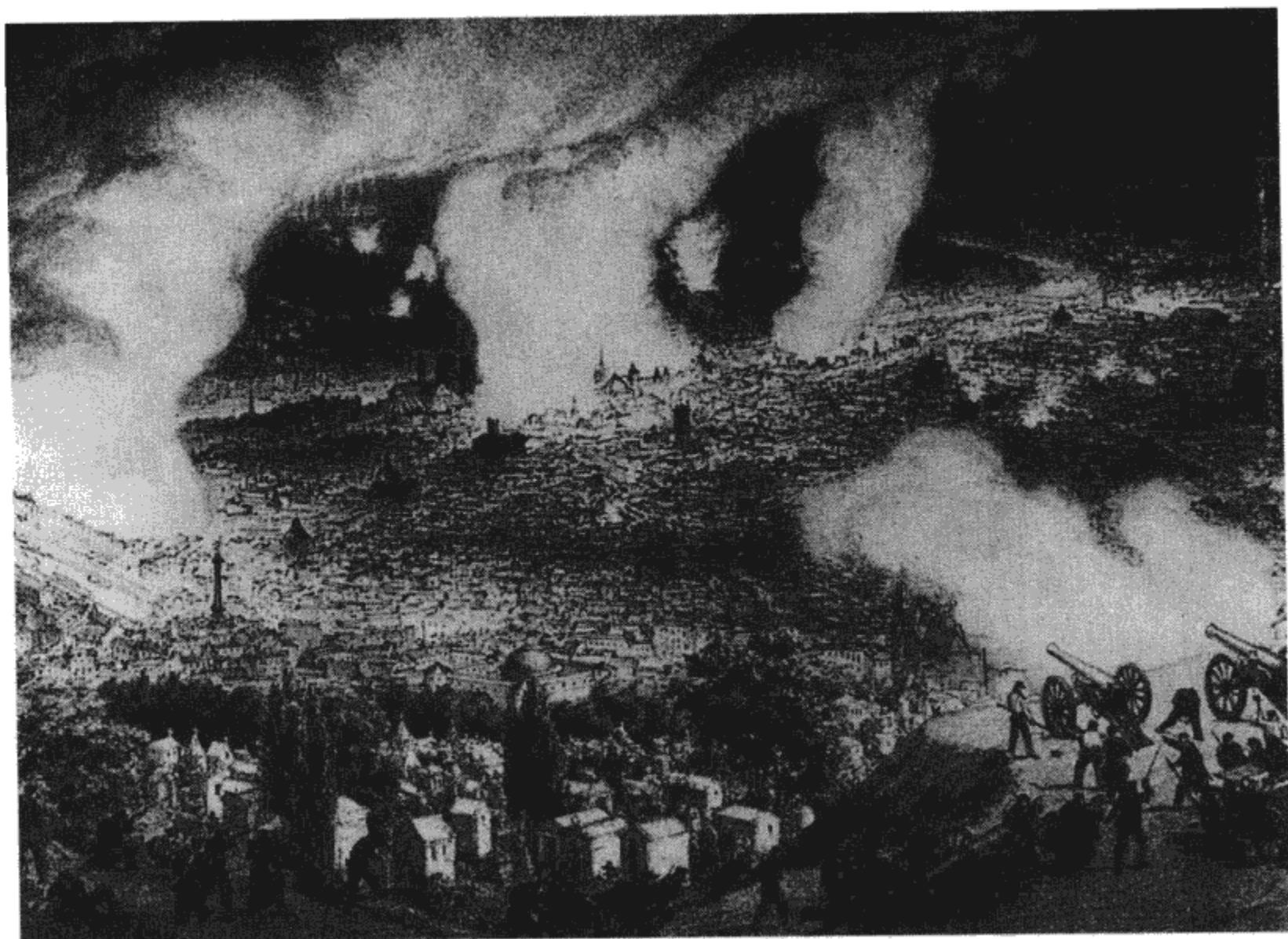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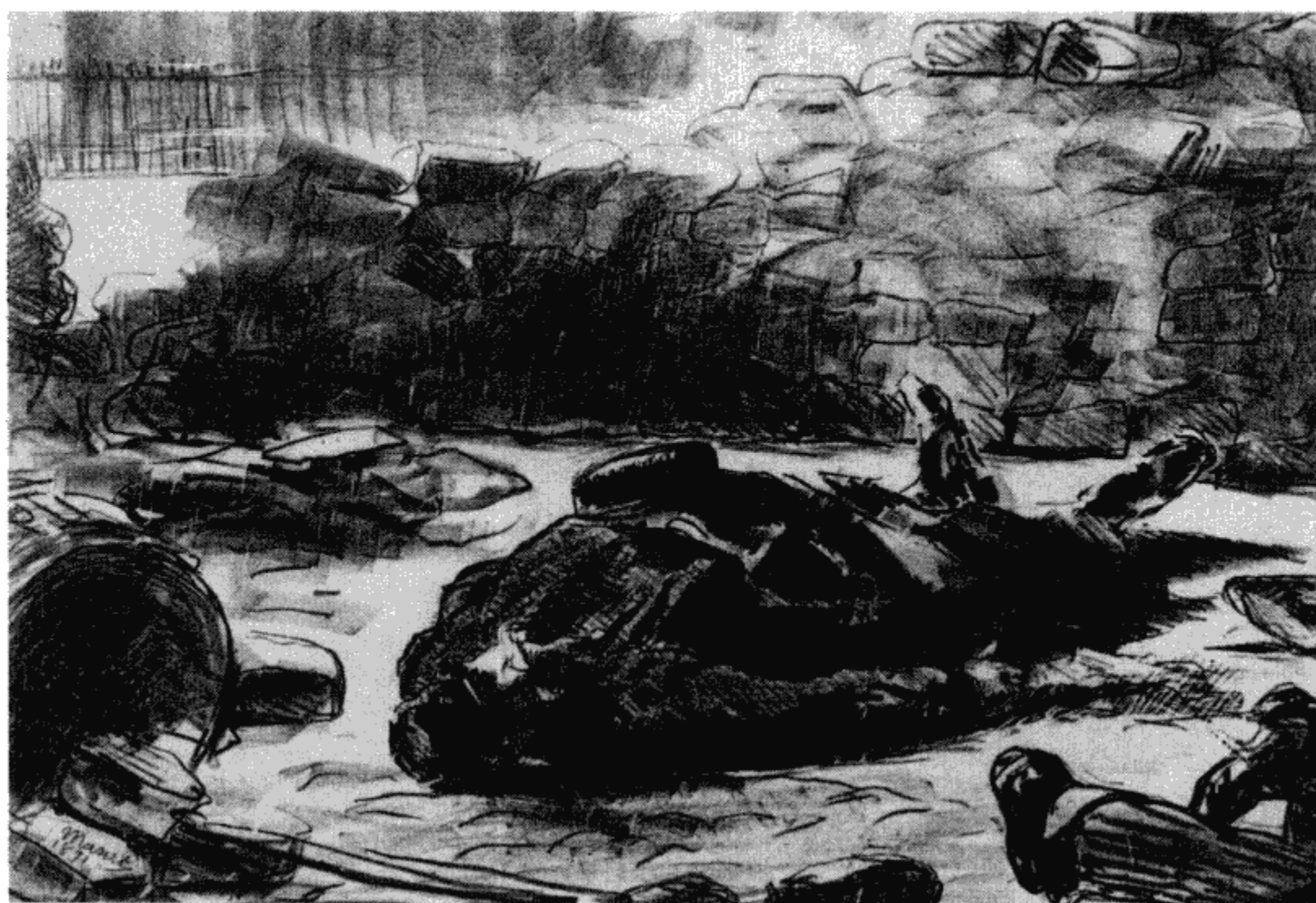


FIGURE-115

从蒙马特丘顶看到的巴黎公社最后数日的巴黎大火景象，这一幕捕捉到了德弗勒里内心的念头，他曾评论建造圣心堂的誓约是在偶然中成为一个适当可行的做法，因为“巴黎已化为灰烬。”

兰西的土地上呈现出恐怖的景象，没有任何秩序存在，而未来所带来的却是更大的恐怖……这座教堂代表公众的悔恨与补偿，它将矗立于我们之中，对那些为了荣耀邪恶与不虔诚的纪念性建筑与工程表示抗议。<sup>23</sup>

到了1872年7月，极保守的教皇庇护九世——此时仍等待从梵蒂冈的囚禁中获释——正式批准建造圣心堂的誓约。盛大的宣传活动于焉展开，运动也获得了支持。到了1872年底，已经募得100万法郎以上的资金，剩下要做的就是将誓约转变成明显可见的具体实相。第一步是选址。勒让蒂希望使用尚未完成的歌剧院基地，他认为歌剧院“是一座奢侈、猥亵、品味低俗且声名狼藉的纪念性建筑”。<sup>24</sup>一开始由夏尔·罗奥·德弗勒里（Charles Rohault de Fleury，与于贝尔·罗奥·德弗勒里无任何关系）于1860年所做的朴素设计，在瓦莱夫斯基伯爵（Count Walewski，“他的名声很暧昧，他既是拿破仑的私生子，又是拿破仑三世宠妾的丈夫”<sup>25</sup>）的坚持下遭到弃置。取而代之的设计是加尼耶的作品（一直存在



**FIGURE-116**  
对巴黎公社所发生的种种感到悔恨与厌恶的，起初只局限在社会民主倾向的共和派人士身上。马奈（上图）对整个事件感到震撼不已，并且画了几幅图来哀悼街垒中的死难者。杜米埃（下图）在他最后的几幅画中，难过而痛切地评论了“工人自相残杀的景象”。

到今日),勒让蒂认为这个设计最能够代替“邪恶而不虔诚的纪念性建筑”,再也没有比在现场建造一座教堂更能够抹去帝国的记忆。这意味着将1867年完成的歌剧院立面完全拆除。勒让蒂可能没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巴黎公社成员拉倒旺多姆凯旋柱如出一辙。

到了1872年10月底,大主教已经主掌整个修建事务,他选了蒙马特丘顶作为兴建之地,因为只有在此处才能象征性地支配整个巴黎。建筑地有一部分属于公有财产,因此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与积极支持。而此时政府正考虑在当地建设军事碉堡。不过大主教指出军事碉堡不受民众欢迎,而他所提议的堡垒较不冒犯民众且更为可靠。梯也尔与部长——明显在说服下相信意识形态的防御比军事防御更有利——于是鼓励大主教正式进行他的计划。1873年3月5日的信中说明了上述事实。大主教要求政府通过特别法,宣布圣心堂的建造属于公用事业,如此便可适用征收法来取得建筑地。

特别法悖逆了长期以来政教分离的感受。不过保守派天主教徒却相当支持这项计划。梯也尔耽搁延宕,他的犹豫使计划悬而未决。君主派人士认为时机成熟,1873年5月24日,他们逼迫梯也尔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极保守的保皇派人士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两年前他曾率领凡尔赛军队血腥镇压巴黎公社。此时法国再次陷入政治骚乱之中,君主制复辟似乎近在眼前。

麦克马洪政府很快就拟定了法律,这个举动乃是它建立道德秩序统治的计划之一。依照麦克马洪的想法,所有富人与特权阶级(在社会的维护上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在国王与教会的权威共同领导下,有权利与责任保护法国免于前不久才发生的社会动乱,并且要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的深渊之中。教会还动员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重建道德秩序感。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于1873年6月29日在帕赖勒莫尼亚勒举行。3万名朝圣者,包括50名国民会议议员,前往该地公开向圣心奉献。<sup>26</sup>

在这样的气氛下,委员会于7月11日向国民会议报告法律研究结果;委员会中有四分之一的成员支持誓约。委员会认为,建造赎罪堂无疑与公用事业相关。在蒙马特丘顶上建造这样的纪念性建筑,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确是恰当而正确之举,因为该地



正是殉道者流血之所（包括最近的牺牲者）。“借由兴建赎罪堂来抹去加在我们悲伤之上的罪恶”，有其必要，而“蒙受如此苦难”的法兰西也必须“恳求上帝的保护与恩宠，无论成败，一以神之旨意为依归”。<sup>27</sup>

随后在7月22日与23日所进行的辩论，有部分围绕在立法技术以及政教关系的法律意涵上。强硬的天主教徒不顾一切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他们希望国民会议能正式承担起这份全国性的任务，这个纪念性建筑“不仅为了抗议巴黎公社的动武，也是安抚与和谐的象征”。修正案遭到否决，但法律案却以244票的多数顺利通过。辩论中唯一的异议来自巴黎一位激进的共和派代表：

334 当你们想在巴黎的制高点——自由思想与革命的源头——建造天主教的纪念性建筑时，你们心里存的是什么念头？将当地变成教会战胜革命的地方。是的，这就是你们想扑灭的东西——你们称之为革命的黑死病。你们想复兴的是天主教信仰，你们这么做等于与现代精神为敌……我知道巴黎人的感受，我也像巴黎人一样感染了革命黑死病，我可以告诉你们，巴黎人将不会被你们信仰的虚矫所教化，相反，他们会变得更加愤慨……不仅未能产生熏陶的效果，反而迫使我们走向自由思想，走向革命。当民众看到这些君主派党羽与革命之敌的主张，他们将会认定天主教与君主制已经合而为一，反对其中之一必须连同另一个一起反对。<sup>28</sup>

有了征收的法律权力，委员会便可实现计划取得蒙马特丘顶的土地。他们收集募得款项并且准备筹募更多的经费，好让建筑物能如同想象般巨大。举办教堂设计比赛并且进行评判。建筑物必须宏伟壮观，符合基督教传统，但要完全不同于第二帝国时期建造的“邪恶而不虔诚的纪念性建筑”。在提出并公开展示的78件作品中，建筑师阿巴迪雀屏中选。这项选择引起争议，并且随即有人指控有太多内部人士影响了比赛结果，而保守天主教徒也对他们所看到的“东方主义”设计感到难过。他们问道：为什么教堂的风格不能更具有法国风（当时所谓的法国风，指的是13世纪的哥特式传统，甚至如同维奥莱－勒杜克那种理性化风格）？然而阿巴迪壮丽的圆顶、纯净的白色大理石，以及细节处不加雕饰



的简朴感，令委员会印象深刻——毕竟，还有什么样的建筑更能区别于歌剧院的庄严华丽呢？<sup>29</sup>

到了1875年春，万事齐备，就等着放下第一块基石。然而很明显，激进派与共和派的巴黎还没有真正悔罪。大主教抱怨建造圣心堂的行动根本就被当成是挑衅行为，用意在埋葬1789年原则。大主教说，就算1789年原则意外死亡并且被埋葬，他也不会祈祷让这些原则复生。这个说法引起可悲的争论，大主教无法置身事外。大主教印制了传单，对于“宗教之敌”仇视建造计划的态度表示震惊。他无法容忍人们竟然对信仰与虔诚做出政治性的诠释。大主教向他的读者保证，政治“与启示无关，我们的工作乃是从深刻信仰中所得到的启示。要化解国家的苦难，政治是帮不上忙的，因为这些苦难的源头是道德与宗教，其解决良方自当归于道德与宗教”。他又说，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不可说成是政治工作，因为政治的目标是对立，“而我们的工作则是为了结合众人。整个社会能再度言和，乃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最终目标”。<sup>30</sup>

一直采取防卫姿态的政府对于即将到来的盛大奠基仪式感到紧张不已，担心将会爆发丑陋的对峙。政府不断商议各种预防措施。委员会必须在避免各种挑衅动作下放入第一块基石。教皇也前来协助他们，并且宣布当天是天主教徒的圣心奉献日。在重重防护下，尽可能低调的奠基仪式顺利完成了。工程也开始进行。高卢悔罪终于能以有形的象征形式出现。

335

从奠基典礼到1919年最后的教堂奉献礼，这40年间也是麻烦不断。在将这座庞大的结构物安置于丘顶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上的困难，开采石膏数年之后地基开始松动。结构成本的急速增加，加上圣心崇拜热潮的消退，使得财务发生困难。阿巴迪于1884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一方面增添，另一方面删减了原设计（最著名的增添便是中央圆顶大幅加高）。而政治争议仍旧持续。负责建造事务的委员会很早就已经决定了鼓励捐献的策略。个人与家庭可以购买石材，而圣心的参观者将看到许多石材上刻着捐献者的名字。鼓励各地区与组织认捐特定的礼拜堂建设。国民会议的成员、军队、教士等都用这种方式来投入建设。每座特定的礼拜堂都有其独特的来历。

举例来说，在位于地下的礼拜堂中，有一座名叫耶稣—教师

的礼拜堂，如德弗勒里所说的，这让人想起“法国有一项大罪便是愚昧地创立无上帝的学校教育”。<sup>31</sup>1871年后，在保存教会教育权的激烈斗争中落败的人士，便将他们的资财挹注于这座耶稣—教师礼拜堂。而位于耶稣—教师礼拜堂旁边，也就是地下最远程的位置，接近过去罗西耶尔街通过的路线，还有一座耶稣—工人礼拜堂。天主教工人想出钱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礼拜堂，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勒让蒂写道，这不仅显示工人对“可怕的不虔诚——大量工人阶级身陷其中——所做的抗议”，也表现出工人决心抗拒“不虔诚的地狱社团，它几乎让整个欧洲都成了它的奴隶与受害者”。当时的人几乎都会提到第一国际，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在资产阶级圈子中，人们普遍认为巴黎公社是受了第一国际这个“地狱”社团的邪恶影响——完全错误的观点。然而也许是命运的作弄，它经常相当讽刺地扭曲了历史，耶稣—工人礼拜堂几乎刚好就坐落在“瓦尔兰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地方。因此，这座高高矗立的圣心堂，原本是用来纪念两名右派殉道者所流的鲜血，却在无意间凭吊了位于地下深处的左派殉道者。

勒让蒂对于整个事件的诠释明显是扭曲的。在巴黎公社将要结束时，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德米恩（Albert de Munn）的年轻天主教徒惊慌地看着巴黎公社成员遭到屠杀。震惊之余，他不禁困惑于“一个依法构成的社会对这些人所做的事”，并且认定这些人的苦难有绝大部分源自富裕阶级的冷漠。1872年春，德米恩前往充满怨恨的贝尔维尔，并且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工人俱乐部”（cercles-ouvriers）。<sup>32</sup>这是法国即将出现新天主教形式的前兆——通过社会行动来满足工人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这种组织与圣心运动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强硬教皇至上论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异，通过这样的组织，工人的涓滴捐献开始流入蒙马特丘顶的圣心堂建设中。

然而，政治局势越来越艰难。法国最后还是通过了共和国宪法（主要是因为君主派人士的强硬），而今受到更便捷的交通、大众教育与工业发展所形成的现代化过程的支配。法国开始接受稳健的共和主义形式并且对于1871年国民会议所充斥的落后君主主义感到幻灭。在巴黎，“不顺服”的贝尔维尔人与他们的蒙马特、维雷特邻居开始重新为自己辩护，其来临之速出乎梯也尔当初的

预期。随着这几个区要求赦免流亡巴黎公社成员的呼声不断升高，对圣心堂的仇视也与日俱增。反对建设计划的骚动似乎越演越烈。

1880年8月3日，民众在市议会前请愿——“巨大的自由女神像将放置在蒙马特丘顶，圣心堂前面，巴黎市的土地上”。当时法国共和派人士以美国作为社会范本，这是一个没有君主主义与其他封建样式也能完美运作的社会。为了要深入了解这个模板；同时也为了表示自己深刻依附在自由、共和主义与民主原则之下，法国共和派于是筹募基金捐赠了现在矗立于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请愿的民众说，为什么不用类似的纪念性建筑来抹去令人痛恨的圣心堂外观呢？<sup>33</sup>

共和派认为，不管反对的主张为何，圣心堂都象征着右派的不容忍与盲信——它是对文明的侮辱，对现代原则的违抗，对过去的回忆，同时也是法国的伤痕。巴黎人似乎对于自己坚守1789年原则毫无悔意，决心要抹去他们所认为的“天主教盲信”代表物，因此决定要建造一座大主教所认为的“用来荣耀邪恶与不虔诚”的纪念性建筑。10月7日，市议会改变战术。议员们说圣心堂“不断地挑起内战”，因此以61比3的票数要求政府“废除1873年的公用事业法”，并且将土地收归国有，用来建造真正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建筑物。市议会巧妙规避如何补偿圣心堂捐款者的问题——此时圣心堂的工程还停留在地基阶段——就直接将提案送交政府。1882年夏，议会开始讨论这项提案。

吉贝尔大主教再度公开为这项工程辩护。他对于目前为止大家耳熟能详的反圣心堂看法提出挑战，而他的理由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吉贝尔坚持这项工程并非受到政治的影响，而是基于基督教的情感与爱国情操。对于那些反对工程具有赎罪性格的人，吉贝尔只是简单地回答，没有人有资格说自己的国家不会犯错。至于圣心崇拜的适当性，他觉得只有教会内部的人才有权利下判断。对于那些将圣心堂描述为挑起内战之物的人，吉贝尔回应说：“内战与暴乱难道是我们基督教堂造成的？那些时常来上教堂的人难道会受到煽动去反抗法律？我们可曾在瘫痪巴黎街道的失序与暴力中看到这类人参与其中？”他又指出，拿破仑原想在蒙马特建造一座和平教堂，“但最后真正的建造者却是我们”。<sup>34</sup>然后他考虑到停止建设后的负面效果。停建将广泛伤害基督徒的情感并将引

337

起不和。如果宗教事业屈从于政府突发的政治想法，这将构成恶劣的先例（他漫不经心地略过了1873年法律所立下的先例）。除此之外，还有复杂的赔偿问题，不只是赔偿捐款者，还要赔偿已经进行的工程。最后，吉贝尔指出这项工程提供了600个家庭的就业机会——剥夺“巴黎主要的就业来源是不人道的”。

议会中的巴黎代表——1882年时，巴黎代表主要由改革路线的共和派人士组成，如（来自贝尔维尔的）甘必大与（来自蒙马特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对于这些论点不感兴趣。争论不断升温而激昂。政府宣称其反对1873年法律的立场不变，但却反对废除该法，因为这么做必须支付1200万法郎以上的赔偿金给教会。为了化解左派的愤怒，政府官员表示，如果废除1873年法律，大主教将可卸下这份极端艰巨的重任，而教会也能得到数百万



FIGURE-117  
自由女神像在运往纽约之前先停放在巴黎作坊中。

338

法郎来从事宣传工作，“其效果将不是推动废法的人乐于见到的”。

然而，激进共和派人士并不打算将圣心视为耗资甚巨却一无是处的东西。他们也不想支付赔偿金。共和派想废除的是圣心堂所代表的令人憎恨的虔诚教士主义，他们想以思想自由的纪念性建筑取而代之。共和派人士直截了当地将内战的责任归咎于君主派人士与强硬天主教徒的联盟。克列孟梭提出了激进的看法。他宣称1873年法律是个侮辱，是国民会议企图将圣心崇拜强加于法国的举动，“过去我们为人权奋斗，现在仍应如此，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克列孟梭宣称，1873年法律是教士反动的产物，“它让革命法国蒙羞，也让不断向教会斗争以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我们必须向教会讨饶。我们必须以政治行动来响应政治行动。”不这么做将使法国屈从于不可容忍的圣心召唤之下。<sup>35</sup>

克列孟梭以热烈的演说煽起了反教士的情感烈焰，使得议会以261票对199票通过废除1873年法律。看起来圣心堂即将面临



崩塌的命运（此时的圣心堂连一面墙都还没盖起来）。不过最后却因技术问题而逃过一劫。法律在会期表决的时间太晚，不合乎颁布的形式要件。政府方面担心法律废除后将面临大量费用与责任，于是偷偷地阻止议案再次送入议会，如此等到下个会期，议会便忙着处理别的更为重大的议案而忘了此事。巴黎共和派人士在议会所赢得的是象征而无实益的胜利。松了口气的大主教便开始加紧工作。

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1897年2月，议会中再度出现动议。反教士的共和主义这回有了重大进展，它拥有工人运动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圣心堂的内部已经启用，并且于1891年开放礼拜，而圆顶即将完成（圆顶上的十字架于1899年受到正式祝福）。虽然圣心堂仍被视为是“引起内战之物”，但拆掉这么一座庞大的建筑物不免让人感到惊恐。就在此时，原本以天主教之名护卫圣心堂的德米恩，发现将圣心堂的命运区别于衰微的君主派诉求之

外，对圣心堂有利。教会开始学到教训，而圣心崇拜也开始呼应变迁的社会局势而获得新意义。到了1899年，较具改革心态的教皇终于将圣心崇拜奉献给种族、社会正义与和解的和谐理想。<sup>36</sup>

不过社会主义代表对于这些巧妙的收编手法并不领情。他们坚持拆掉这个令人怨恨的象征，即便它已接近完成，也不管这种做法将必须付出3000万法郎的赔偿金给800万名捐款人。议会中大多数人都对这项提案感到吃惊。这项动议后来以322对196票遭到否决。这也是圣心堂最后一次受到官方行动的威胁。随着圆顶于1899年完成，人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到钟楼的建造上，钟楼最后在1912年完成。到了1914年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式奉献礼定在10月17日，却因对德战争而耽搁。只有等到这场血腥冲突结束，圣心堂才行了奉献礼。胜利的法国——在克列孟梭激昂演

339

FIGURE-118  
圣心是吸血鬼，《路灯报》  
1896年的海报。





说的引导下——欢乐地庆祝这座一个世代前在对德作战失利时构思的纪念性建筑的奉献礼。高卢悔罪最后终于获得回报。

这段饱受折磨的历史，其静默的回音至今仍回荡着。1971年2月，在警察追逐下，示威者躲进了圣心堂。他们坚守当地，要求激进派同志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占领这座“建筑在巴黎公社成员尸体之上，抹杀在巴黎飘扬的红旗记忆”的教堂。纵火者的传说随即从古老的停泊处挣脱，惊慌失措的院长将警察找来圣心堂，以防止火灾发生。“红色分子”在野蛮的景象中被逐出教堂。为了纪念死去的巴黎公社成员，行为艺术家皮尼翁-埃内斯特（Pignon-Ernest）在圣心堂下方的阶梯上覆盖了裹尸布，上面画了5月巴黎公社成员的死亡景象。这是在圣心堂举办的巴黎公社百年纪念。作为事件的尾声，1976年有颗炸弹在圣心堂引爆，造成其中一个圆顶严重受损。同一天，据说有游客在拉谢兹神父墓园发现，在布朗基的墓前放着一朵红玫瑰。

340 德弗勒里希望“在（其他人）原本要掘墓的地方安置摇篮”。但游客看着如同陵寝般的圣心堂时，或许会猜想这里面到底埋葬着谁？1789年的精神？法兰西的罪？强硬天主教与反动君主主义的联盟？像勒孔特与托马这类殉道者的鲜血？或者是瓦尔兰以及跟他一起遭到无情屠杀的两万名巴黎公社成员？

圣心堂将秘密埋藏在坟墓般的静谧之中。唯有熟知这段历史、了解已逝人们何以为这座教堂建造与否而斗争的生者，才能真正掘出埋入坟中的秘密，并从墓穴的死寂中解救出丰富的体验，将其转变成喧嚣的新生摇篮。

## 注 解

341

### 导 论

1. Harsin (2002), 262 提供了证据来挑战正统说法。Delattre (2000), 108-111 近来对于这个说法所做的摘要, 认定这个说法源自丹尼尔·施特恩(Daniel Stern, 又名玛丽·达固尔[Marie d'Agoult]) 当时的回忆录, 《1848 年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e 1848*)。Agulhon (1983) 对于革命及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方面的陈述。
2. Flaubert, 《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 转引自 Agulhon, 1983), 页 39-40。
3. Guedalla, P. (1922), 页 163-164。
4. 路易·拿破仑究竟是如何夺权的, 已经成为许多论述的焦点, 当然其中也包括马克思(1963)。阿居隆(Agulhon, 1983) 比较审慎, 同时也相当仔细地评估了历史意见与历史记录。
5. 卡塞尔(Casselle, 2000) 收集了最完整的证据。但波维(Bowie) 与戴加尔和皮农(Des Cars and Pinon, 1991) 所编辑的文集已经足能指出这一点, 而最近卡莫纳(Carmona, 2002) 写的奥斯曼传记, 也承认奥斯曼的《回忆录》并不是那么可靠。
6. 贾妮(Janis, 1986) 全数展出了勒塞克 1851 到 1852 年的破坏照片, 至于德·泰基(De Thèzy) 则重制了大部分马尔维尔的相片记录。
7. 引自 Hamburg (1981), 页 9。
8. Weeks (1999), 页 28 以及 Carmona (2002) 证实了这段叙述, 其根据来自奥斯曼的《回忆录》。
9. Loyer (1988), 页 67。
10. Steegmuller (1950), 页 168。
11. Flaubert (1979b), 页 134。
12. 见 Klein (1967) 与 Clark (1973a) 的叙述。
13. Baudelaire (1981), 页 104-107。
14. Baudelaire (1983b), 页 56-57。
15. Baudelaire (1981), 页 402-408。
16. Baudelaire (1947), 页 25-27。
17. Kempl (1995) 针对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仰慕与赞美提供了一段非常有趣的讨论。另外也可参见 Prawer (1978)。
18. Clark 讨论了杜米埃(1973a)。比较传统的评价, 参见 Passeron (1979)。
19. Schorske (1981)。
20. Benjamin (1999)。很多人对这本书做了有趣的评释, 在这当中, 我认为 Frisby (1988)、Gillock (1996) 以及 Buck-Morss (1991) 对我的目的帮助最大。
21. 我特别引用加亚尔的作品(1977), 因为我非常推崇这书并且在往后的章节中大量引用她的发现。

342

22. Scott (1988)。
23. Rancière (1989)。
24. 最完整的理论陈述发表于哈维(1996)。启发了(但并非决定,我要赶紧添上这一句)最早的巴黎研究形式(在本书中仍然适用)的理论架构铺陈在哈维(1982)中。

## 第一章

1. Baudelaire (1965), 页 119-120。
2. 巴尔扎克,《十三人社的历史》(*History of the Thirteen*, HT), 页 311, 330。
3. Prendergast (1992)、Marcus (1999) 以及 Sierle (2001) 都是杰出的文学批评研究者,他们对于巴尔扎克在都市生活上的理解,投以相当的注意。
4. 七星诗社版《作品集》(*Collected Works*) 第一册里有巴尔扎克于1845年所决定的作品组织。导读的文章,作者是皮埃尔-乔治·卡斯泰(Pierre-Georges Castex),至于出版年表与巴尔扎克作品的修改则交给罗杰·皮洛(Roger Pierrot)。
5. Balzac, HT, 页 132。
6. Jameson (1982), 页 157。
7. 巴尔扎克,《农民》,页 22;《驴皮记》(WAS), 页 268-269; 页 189。
8. Balzac, WAS, 页 137-138。
9. Balzac, HT, 页 132。
10. Balzac, HT, 页 180。
11. Balzac, HT, 页 82。
12. 参见 Kemple (1995)。
13. 巴尔扎克,《农民》,页 38, 108; 也可见 Scott (1985)。
14. 巴尔扎克,《农民》,页 215。
15. Clark's (1973b), 页 120-124 描述库尔贝的画《奥南的葬礼》(*Burial at Ornans*, 画中描绘了乡村的阶级关系)越来越受到敌视,当它从奥南移到巴黎展览时也出现有趣的类似情况。克

拉克(Clark)评论说,巴黎的资产阶级在面对与他们先入为主的想法不合的图像时,会对于他们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感到受伤与困惑。

16. 巴尔扎克,《幻灭》(LI), 页 170-182。
17. Balzac, HT, 页 33、56、151, 309-315: 辛美尔(1971)的引文来自他著名的论文《首要之都与心生活》(*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8. 巴尔扎克,《赛查·皮罗托盛衰记》(*César Birotteau*), 页 75。
19. Balzac, HT, 页 311、325; 另外也可参见 Poulet (1959), 页 137。
20. Marx (1967), 页 151;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21. Balzac, HT, 页 312-318。
22. Balzac, HT, 页 64。
23. 巴尔扎克,《贝姨》(*Cousin Bette*, CB), 页 428。
24. 巴尔扎克,《高老头》(*Old Goriot*, OG), 页 249。
25. 引自 Farrant (2001), 页 129。
26. Balzac, HT, 页 309-310。
27. Balzac, HT, 页 312-313。
28. Balzac, HT, 页 318-320。
29. Balzac, HT, 页 321。
30. Balzac, HT, 页 322: 谈工作条件部分, 参见 页 318。
31. Balzac, HT, 页 324。
32. Balzac, HT, 页 325。
33. Balzac, HT, 页 318。
34. Balzac, HT, 页 31, 34, 181。
35. Balzac, HT, 页 178。
36. Balzac, HT, 页 112。
37. Balzac, HT, 页 37, 87, 128。
38. 这种在空间之上漫游以及陷入空间之中的对比,是这个时期经济上与政治上的重要主题。往后我将讨论,巴黎公社(空间中的革命)主要是被反动力量的优越能力所摧毁。反动力量将控制空间,并动员法国其他地区来摧毁巴

黎的革命运动。我在导论中曾经提过,这也是梯也尔于1848年2月向路易·菲利普敦促采取的战术。

39. Marcus (1999), 页 74。
40. Balzac, HT, 页 31。
41. Dargan(1985)、Farrant(2001)与Stierle(2001)都强烈地指出这一点。
42. 这段文字出自巴尔扎克《高老头》, 页 27-33。
43. Marcus (1999)。
44. Balzac, HT, 页 366。
45. Balzac, HT, 页 305。
46. 巴尔扎克,《未知的杰作》。
47. 巴尔扎克,《邦斯舅舅》(CP), 页 148。
48. Benjamin, (1999), 页 19。
49. Balzac, HT, 页 382。
50. Poulet, (1959), 页 106。
51. Balzac, HT。
52. 引自 L. Marx (1964), 页 164。
53. K. Marx(1973), 页 539; 另外也可参见Harvey (1989), 第三部分。
54. 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页 173, 174。
55. Balzac, WAS, 页 53-54。
56. Balzac, WAS, 页 198-199。
57. 引自 Poulet (1959), 页 103-105。
58. 引自 Poulet (1959), 页 99-100。
59. Balzac, HT, 页 32-33, 324。
60. Balzac, HT, 页 147。
61. Balzac, OG, 页 304。
62. 引自 Poulet (1959), 页 126。
63. 巴尔扎克,《夏倍上校》。
64. Boyer (1994), 页 187-197; 372-379 ——我认为布瓦耶的作品在解决都市记忆问题上有很高的启发性。
65. K.Marx (1963), 页 18。
66. Halbwachs (1992)、Boyer (1994) 与 Benjamin (1968) 都强调这项区别, 特别是 Benjamin 的《论历史哲学》(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接下来的引文引自Benjami和Boyer。

67. Balzac, HT。
68. Rossi (1982), 页 130。
69. Ferguson (1994) 清楚说明这一点。
70. K. Marx (1967) 的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有精彩分析。
71. 从波德莱尔开始, 漫游者这类人物就在 19 世纪巴黎引起奇幻的想象。Benjamin (1999) 花费许多时间谈论漫游者。Wilson (1992) 对于漫游者的历史提供了有益而具批判性的概观。
72. 巴尔扎克,《婚姻生理学》, 页 123-124。
73. Jameson (1995), 页 226。
74. Balzac, HT, 页 190。
75. Poulet (1959), 页 110。另外也可参见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Louis Lambert), 页 246。

## 第二章

1. Clark (1984), 页 36。
2. Kantorowicz (1957)。
3. Agulhon (1981)。
4. 巴尔扎克,《农民》, 页 183。
5. 福楼拜,《情感教育》, 页 290。
6. Foucault (1984), 页 241。
7. Agulhon (1981), 页 57。
8. 塞萨尔·达利的贡献在 Becherer (1984) 中有大篇幅的讨论。
9. Ionescu (1976) 所收集的文本非常有用, 我在往后的章节里大量运用了这些资料。
10. Hill (1975), 关于 1840 年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角色, 见 Agulhon (1983)。
11. Rose (1978) 是一本相当好的巴贝夫传记。
12. Corcoran (1983) 所收集的乌托邦思想文献相当珍贵, 我在本书中大量运用了这些资料, 1848 年革命史学会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所收藏的评论与分析也很丰富。Dommanget (1926, 1957, 1970) 对于布朗基的生平与作品有详尽的介绍。Tristan

- (1843, 1982) 提供了历史与政治的洞见。
13. Benjamin (1999), 页 736。
  14. Benjamin (1999), 页 25-26。
  15. Durkheim (1958) 花了很大的篇幅企图恢复圣西门的地位, 然而当时的人却认为欧古斯·孔德 (August Comte, 曾是圣西门的学生, 后来两人决裂) 才是当代社会理论的原创者。
  16. 见 Ionescu (1976), 页 153。
  17. 见 Ionescu (1976), 页 80 和 Taylor (1975), 页 32。
  18. 见 Ionescu (1976), 页 210。
  19. Rancière (1989) 以精彩而争议的口吻重建了选拔出来的工人作家与工人诗人的思想与动机, 这些人曾在 1830 与 1840 年代为工人报纸写文章。
  20. Bakunin (1976) 的勒鲁生平是主要的资料来源。
  21. Baguley (2000) 深入探讨了 1840 年代路易·拿破仑对乌托邦主义的运用, 及其对第二帝国政策的影响。
  22. 傅立叶的作品有两种英文版本, 都相当不错, 分别出版于 1971 年与 1976 年; 1971 年版的导论由贝谢 (Beecher) 和毕昂维纽 (Bienvenue) 所写, 对于傅立叶的生平与时代有清楚的说明。Beecher (2002) 详尽介绍了孔西代朗的生平。
  23. Beecher and Bienvenue (1971), 页 36。
  24. Johnson (1974) 页 66, 提供了许多有关各种运动和出版品的背景资料, 不过主要的重点还是放在卡贝及伊卡利亚派上面。
  25. 引自 Corcoran (1983), 页 113; 1848 年革命史学会收集的资料非常丰富。
  26. Sewell (1980)。
  27. 引自 Bakunin (1976), 页 99。
  28. Rancière (1989)。
  29. 引自 Valette (1981)。
  30. 引自 C.Moses (1984), 页 91。
  31. 引自 C.Moses (1984), 页 83, 111。
  32. Vincent (1984), 页 144-146。普鲁东的传记与研究相当多; 我主要使用的文献是 Vincent (1984) 与 Hyams (1979)。
  33. Moss (1976) 提供了很多关于社团的信息; Agulhon (1983) 也相当关注这个问题。最基本的资料则来自 Gossez (1967)。
  34. 参见 Vincent (1984), 页 141。共产党大会上的一些演讲稿收录在 Corcoran (1983), 页 72-79。
  35. 参见 Corcoran (1983), 页 188-196。
  36. 参见 Corcoran (1983), 页 81-82。
  37. Johnson (1974), 页 107。
  38. Rancière (1989), XXVi。英译本的导论简介约翰斯顿和休厄尔对朗西埃论点的回应。
  39. Beecher and Bienvenue (1971), 页 33-34。
  40. 对乌托邦的攻击始于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
  41. Piore and Sable (1984); Harvey (1989), 第二部分。
  42. Becherer (1984)
  43. 引自 Marrey (1981, 193)。
  44. Pinon (1991)。
  45. Becher and Bienvenue (1971), 页 2-7。
  46. Marrey (1981), 页 203-204。
  47. 参见 Corcoran (1983), 页 193。
  48. Benlamin (1999), 页 635。
  49. 佩瑞蒙这个人物近年来被重新挖掘出来(连同梅纳迪耶[Meynadier]、朗克坦以及达利)。最近的资料有 Marrey (1981)、Papayanis (2001)、Moret (2001)、Roncayalo (2002), 以及 Des Cars and Pinon (1991)。Boyer (1994) 有简短的思想梗概。
  50. Marchand (1993) 相当关注梅纳迪耶的观念。
  51. Ferguson (1994) 有效运用了巴尔扎克与福楼拜之间的对比。
  52. Ferguson (1994), 页 95。
  53. 福楼拜, 《情感教育》(1964), 页 18, 257。



54. Ferguson (1994), 页 99。

### 第三章

1. Ferguson (1994) 将叙述的主要焦点放在革命传统上面。
2. Chevalier (1973), 页 45。
3. M9rx (1963, 1964); Agulhon (1983); Dautry (1977)。
4. 除了奥斯曼自己写的不太可靠的《回忆录》外, 另外还有几本有关奥斯曼生平的传记作品。其中最完整的(因此也最乏味)就是 Des Cars (1978) 和 Carmona (2002年英译本)。Lameyre (1958) 比较有可读性。最近出版的生动的英文作品, 见 Weeks (1999)。
5. Van Zanten (1994), 页 199-23。
6. 有几本叙述第二帝国巴黎转变的杰出作品, 例如 Girard (1952) 和 Galliard (1977); 英文方面的权威作品是 Pinkney (1958), 后来由 Jardine (1995) 深入补充。

### 第四章

1. Leon (1976), 页 241; Clout (1977)。
2. Girard (1952), 页 111。
3. Baudelaire (1983b), 页 73。
4. Plessis (1973), 页 110。
5. Miller (1981), 页 37。
6. 这场消费类型革命强烈地表现出所得、阶级地位与阶级主张, 当时的评论者如 Fourne (1858, 1865) 就曾指出这一点。
7. Retel (1977)
8. Giedion (1974) 给予正面评价, 比较有趣的是 Robert Moses (1942), 他曾在 1950 与 1960 年代模仿奥斯曼的方式在纽约推行公共建设, 并且对奥斯曼早年事业的贡献、方法和缺点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 (见 Caro, 1974)。
9. Haussmann, (1890-1893), 第二册, 页 34。
10. Girard (1952), 页 118。

11. Greenberg (1971); Hazareesingh (1998)。
12. Haussmann (1890-1893), 第二册, 页 202。
13. Schivelbusch (1977)。
14. Zola (1954), 页 76-79。

### 第五章

1. Autin (1984); Bouvier (1967); Zola (1991)。
2. Harvey (1982), 第十章, 是这个论点的基础。
3. Tudesq (1956)。
4. Marx (1967), 第三册, 页 592; (1973), 页 156。
5. Dupont-Ferrier (1925); Levy-Leboyer (1976)。
6. Autin (1984); Plessis (1982)。
7. Autin (1984), 页 186。
8. Miller (1981), 页 28。
9. Lescure (1980), 页 19。
10. Zola (1991), 页 117-118。
11. Zola (1954a), 页 76。
12. Plessis (1982), 页 87。
13. Duchêne (1869)。
14. Autin (1984), 页 249-256。
15. Hyams (1979), 页 154-71; Vincent (1984)。
16. Kelso (1936), 页 102。
17. Workers Commission of 1867, *Rapports des delegations ouvrières* (1969), vol.1, 页 126。

### 第六章

1. Daumard (1965), 页 23-35。这部作品是巴黎当地土地利息的基本资料来源。Sutcliffe (1970) 也非常有用。
2. Daumard (1965), 页 137。
3. Galliard (1977), 页 85-120。
4. Daumard (1965), 页 228。
5. Gaillard (1977), 页 136。
6. Galliard (1977), 页 110-112。
7. 参见 Pinkney (1958), 页 185-187; Sutcliffe (1970), 页 40-41; Galliard (1977) 页 27-30。Haussmann (1890-1893), vol. 2, 页 310, 371

也提供了类似的叙述。另外也可参见 Daumard (1965), 页 215。

8. Halbwachs (1928)
9. Massa-Gille (1973), chapter 5; Sutcliffe (1970), 页 117。
10. Zola (1954a), 页 108。
11. Gaillard (1977), 页 121-127 and Daumard (1965), 页 267。
12. Gaillard (1977), 页 104-15; 页 127-44; Lameyre (1958), 页 152。
13. Girard (1981), 页 186; Gaillard (1977), 页 82。
14. Sutcliffe (1970), 页 118。
15. Girard (1981), 页 173-175; Sutcliffe (1970), 页 158; Daumard (1965)。
16. Autin, (1984), 页 186; Lameyre (1958), 页 140-142; Gaillard (1977), 页 92; Halbwachs (190)。
17. Gaillard (1977)。
18. Sutcliffe (1970); Gaillard (1977), 页 85-100。

## 第七章

1. Gramsci (1971), 页 212-223; Zeldin (1958, 1963)。对路易·拿破仑较为友善的看法, 见 Baguley (2000) 与 Carmona (2002), 这些著作不同于过去典型的研究, 而属于比较认同路易·拿破仑贡献的修正说法。
2. Pinkney (1958); Massa-Gille (1973); Sutcliffe (1970)。
3. Ferry (1868) 是关键文本。也可见 Sutcliffe (1970), 页 42。
4. A.Thomas (n.d.), 页 65。
5. Pinkney (1958), 页 178; 债务融资的意义在 Harvey (1982) 页 266-270 中受到检视。
6. Rougerie (1965), 页 129-134。
7. Gaillard (1977), 页 224-230, 269-273, 331-334; Kulstein (1969), 页 100。
8. Kulstein (1969); Zeldin (1958)。

9. St. John (1854), 页 25。
10. Clark (1973a), 页 121; Rifkin (1979)。富尔内尔 (1858, 1865) 的叙述包含了相当丰富的街头生活细节。
11. Payne (1966); A.Thomas (n.d.), 页 174。
12. Dalotel, Faure and, Freimuth (1980); Kulstein (1969)。
13. Bellet (1967)。
14. Rifkin (1979)。
15. Zeldin (1958, 1963)。
16. Corbon (1863), 页 93; Duveau (1946); Rifkin (1979); Rancière and Vauday (1988)。
17. Lefebvre (1974), 页 370。
18. Lazare (1869, 1870)。
19. Marx (1963) 即是从这里开始研究。
20. Haussmann (1890-1893), vol.2, 页 371。
21. Caillard (1977), 页 136。
22. Haussmann (1890-1893), vol.2, 页 200。
23. Gaillard (1977), 页 331-332。
24. Haussmann (1890-1893), vol.2, 页 197-202。

## 第八章

1. Corbon (1863); Sewell (1980)。
2. Rancière (1989)。
3. Chevalier (1950), 页 75。
4. Scott (1988), 第六章; Sewell (1980)。
5. Daumas and Payen (1976); Chevalier (1950); Gaillard (1977); Retel (1977); Scott (1988)。
6. Cocrereau (1980); Girard (1981), 页 115-216; Gaillard (1977), 页 390; Duveau (1946), 页 252-269。
7. Cottreatu (1988), 页 121。
8. Gaillard (1977), 页 380-391。
9. Chevalier (1950), 页 96; Gaillard (1977), 页 443。
10. Duchêne (1869)。
11. Plessis (1982)。

12. Gaillard (1977), 页 286。
13. Marx(1967), vol.1, 页 342; Cottereau(1988), 页 146-148。
14. Du Camp (1875), vol.6, 页 235。
15. Gaillard (1977); 页 378: 页 446。
16. Miller (1981)。
17. Daumas and Payen (1976), 页 147。
18. Daulnas and Payeu (1976), 页 35; Zeldin (1958), 页 76。
19. Hershberg (1981) 在仔细分析 19 世纪费城的资料后, 强烈地提出这个论点。
20. Corbon (1863)。
21. Foulon (1934); Lejeune (1977)。
22. Cottereau (1988), 页 130。
23. Lejeune and Lejeune (1984)。
24. Lepidis and Jacomln (1975), 页 230。
25. Cottereau (1988), 页 144。
26. Lejeune and Lejeune(1984), 页 102-103; Zola (1970), 页 176, 177。

## 第九章

1. McKay (1933)。
2. Rougerie (1965, 1968b)。
3. Hanagan (1980, 1982); Cottereau (1980), 页 70。
4. Sewell (1980)。
5. Chevalier (1950); Gaillard (1977), Cottereau (1988), and Rancière (1989) 都认同这个基本趋势。
6. Retel (1977), 页 199-207。
7. Poulot (1980) 的描述相当吸引人, 瓦尔兰的说法则出自 1867 年工人委员会《工人代表报告》(*Rapport des delegationsouvrières*, 1869 年), 第一册, 页 99。
8. A.Thomas (无出版年份); Sewell (1980); Hanagan (1982); Duveau (1946)。
9. Rougerie (1968a); Duveau (1946)。

10. Galliard (1977), 页 245-246。
11. A.Thomas (无出版年份), 页 179。
12. Poulot (1980)。
13. Duveau (1946), 页 236-248。
14. Chevalier (1950), 页 96; Fribourg (1872)。
15. Lazare (1869, 1870), Cochin (1864), 页 83; Duveau (1946), 页 363; Gaillard (1977), 页 417。
16. Chevalier (1950); Pinkney (1958), 页 152。
17. Price (1981); Weber (1976); 详细的例子见 Nadaud 的回忆录 (1895)。
18. Chevalier (1950), 页 233; Pinkney (1953; 1958), 页 157-161; Gaillard (1977), 页 405; Rougerie (1965)。
19. Duveau (1946), 页 284-295; Gaillard(1977), 页 406-411。
20. Duveau (1946), 页 327; E.Thomas (无出版年份), 页 200。
21. Simon (1861); Leroy-Beaulieu (1868)。
22. Vanier (1960), 页 109; Dalotel (1981)。

## 第十章

1. Michelet (1981), 页 65; 另外也可参见 Galliard (1977), 页 222-224, 以及 Scott(1988), 页 147。
2. E.Thomas (1966)。
3. E.Thomas (1966), 第一章; Simon (1861)。
4. Scott (1988); Miller (1981); McBride (1976, 1977-1978); Lejeune and Lejeune (1984)。
5. E.Thomas(1966) : Michel(1981) 。
6. F.Green (1965), 页 95。
7. Zeldin (1973), 页 307; Corbin (1978); Harsin (1985)。
8. St. John (1854), 页 233-308; Lejeune and Lejeune (1984)。
9. Harsin (1985); 另外也可参见 Poulot (1980)。
10. Dalotel (1981), 页 134 。
11. Scott (1988), 页 101; Cottereau (1980)。

12. Rancière and Vauday (1988)。
13. Dalatel (1981), 页 72。
14. Cottereau (1980), 页 25-27; Le Play (1983), 页 9; (1878), 页 5, 427-430。
15. Hellerstein (1976); McBride (1976), 页 21-22。
16. Michelet (1981)。
17. Wilson (1992) 对 Pollock (1988, 页 62) 所做的批判相当有用。
18. Le Play (1983), 页 9; Zeldin (1973), vol.1, 页 293-303。
19. Berlanstein (1979-1980); Le Play (1983), 页 149; 页 274。Cottereau (1980) 强烈主张, 即便普鲁东认为教育子女是父亲的事, 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大致上仍不构成冲突。
20. Corbon (1863), 页 65; McLaren (1978)。
21. Poulot (1980); E.Thomas (1966); C.Moses (1984)。

## 第十一章

1. Chevalier (1950), 页 50; Marx (1967), vol. 1, 页 269。
2. Fay-Sallois (1980); Chevalier (1950), 页 46-52; Girard (1981), 页 136; Gaillard (1977), 页 225。
3. Guerrand (1966), 页 85; Corbon (1863), 页 181; A.Thomas (n.d.), 页 179; Flaus (1949); Gaillard (1977), 页 129-131; Lameyre (1958), 页 174。
4. Poulot (1980), 页 146; Audiganne (1854), vol. 2, 页 379。
5. Engels (1935); Gaillard (1977), 页 209; Commission des Logements Insalubres de Paris (1866); Lazare (1869); Poulot (1980), 页 146。
6. Guerrand (1966), 页 105, 109。
7. Gaillard (1977), 页 233-267; Duveau (1946), 页 328-343。

8. Foulon (1934), 页 56-67。
9. Anderson (1970), 页 1975。
10. Hutton (1981)。
11. Auspitz (1982)。
12. Gaillard (1977), 页 281。
13. Girard (1981), 页 288-289; Gaillard (1977), 页 270。
14. Gaillard (1977), 页 416-423。
15. Foulon (1934), 页 20-26; Dalotel, Faure, and Freirmuth (1980); Michel (1981)。
16. Duveau (1946); LePlay (1983)。
17. Fay. Sallois (1980); Donzelot (1977)。

## 第十二章

1. VanZanten (1994), 页 211; Truesdell (1977) 整部作品都致力于探讨景观的问题。目前为止, 最有趣的观点出自 Sennett (1978) 的作品, 他从一般性的脉络——资本主义的巴黎在那几年是如何演变的——来理解戏剧性质与景观。T.Clark (1984) 则是从商品化与景观之间的关系来理解 1860 年代艺术家在印象派运动当中所呈现的感受。
2. N.Green (1990), 页 77-80; Rnacière (1988)。
3. Benjamin (1973), 页 165-167。
4. Zola (1995), 页 76-77; 关于时尚, 参见 Vanier (1960)。
5. Sennett (1978), 页 145-148。
6. 引自 Bachelard, 页 192。
7. Baudelaire (1947), 页 51-53。
8. T.Clark (1984), 页 36。
9. Goncourt (1962), 页 53; 另外也可参见 Sennett (1978)。
10. Haine (1996), 页 57; 页 162-163。
11. Goubert (1986), 页 74-76。
12. Vanier (1960), 页 178-180; Goncourt (1962), 页 53。
13. Benjamin (1973)。

14. Benjamin (1973), 页 74。

### 第十三章

1. Gould (1995)。另外也可参见 Cobb (1975); Castells (1983); Ferguson (1994)。
2. Daumard (1965, 1973)。
3. Chevalier (1973); Haussmann (1890-1893), vol.2, 页 200。
4. Marx (1963), 页 75; (1964), 页 47; Chevalier (1973)。
5. Corbon (1863), 页 34-48。
6. Hugo (1976), 页 15。
7. Sewell (1980), 页 259。
8. Zeldin (1973), 页 48。
9. Duveau (1946), 页 218; Kulstein (1969); Corbon (1863)。
10. Haussmann (1890-1893), vol.1, 页 200。
11. Greenberg (1971), 页 80; Rougerie (1965), 页 75。
12. Gaillard (1977), 页 231。
13. Lefebvre (1974); Gaillard (1977); Geenberg (1971)。
14. 《巴黎指南》1983年版 (1867), 页 170; M. Fried (1963)。
15. Chevalier (1973), 页 300。
16. 引自 Chevalier (1973), 页 198-199。
17. Margadant (1982), 页 106。
18. Corbon (1863), 页 102。
19. Reybaud (1869)。
20. Copping (1858), 页 5。
21. Sennett (1978), 页 137。
22. Poulot (1980); Haine (1996); Sennett (1978), 页 25。
23. Gould (1995)。
24. Cottureau (1988), 页 155; Berthier (1998); Haine (1999)。
25. 参见 Rifkin and Thomas (1988)。

### 第十四章

1. Jordan (1995) 特别介绍了奥斯曼工程的各种面向。
2. N.Green (1990)。
3. Reid (1991); Goubert (1986); Gandy (1999); Jordan (1995)。
4. Trollope, 引自 Reid (1991), 页 38。
5. Pinkney (1958), 页 125-126。
6. Reid (1991), 页 30; Pinkney (1958), 页 132。
7. 引自 Gandy (1999), 页 24。
8. Gandy (1999), 页 14。

### 第十五章

1. Rifkin (1979)。
2. Charlton (1959), 页 2。
3. Corbon (1863), 页 83。
4. Charlton (1959), 页 10; Flaubert (1982), 页 15; Du Camp (1875); Goncourt (1962), 页 275; Delacroix (1980), 页 96。
5. Baudelaire之文, 引自 Klein (1967), 页 86; Hugo (1976), 页 1047。
6. Foulon (1934); Michelet (1981), 页 350; Flaubert (1976), 页 325。
7. Chevalier (1973), 页 269; Scott (1988); Le Play (1878)。
8. Fortescue (1983); Zeldin (1973), 页 39。
9. T.Clark (1973a, 1973b); Rubin (1980)。
10. Gildea (1983), 页 321。
11. Foxand Weisz (1980); Weisz (1983); Williams (1965)。
12. 引自 Zeldin (1958), 页 101; F.Green (1965), 第三章。
13. Rifkin (1979); Hugo (1976); Tchernorf (1906), 页 517。
14. Marx (1963), 页 15。
15. Michael Fried (1969); Baudelaire (1981)。



16. Rancière and Vauday (1988)。
17. 《巴黎指南》1983年版(1867), 页33; Hausmann(1890-1893), vol. 2, 页533; Vidler (1978), 页84。
18. Vidler (1978), 91。
19. Zola (1954a)。
20. Veuillot (1867), 页ix; Ferry (1868)。
21. Goncourt (1962), 页61。
22. Baudelaire (1947), 页91。
23. Berman (1982), 页155-164; Wohlforth (1970)。
24. Wohlforth (1970); Marx (1973), 页163。
25. David Paul 译, 引自 Benjamin (1973), 页57。
26. Zola, (1954a), 页78-79。

## 第十六章

1. 引自T.J.Clark(1973a), 页16以及Hertz(1985), 页173-174。
2. St. Jhon (1854), 页91。
3. Rifkin (1979)。
4. Tchernoff (1906), 页506-526; Copping (1858), 页80; T.J.Clark (1973a); F.Green (1965)
5. Copping (1858)。
6. 引自Glacken(1967), 页595; Gobineau(1853-1855); Biddiss (1970)。
7. Ellingson (2001) 分析了高贵野蛮人的神话。
8. Laurentie, 引自 Hazareesingh (1998), 页127。
9. Chevalier (1973); Marchand (1993)。
10. Gossmann (1974); Said (1979)。
11. Hitzman (1981); Said (1979), 页167。
12. Michele (1981); Zola (1991)。
13. Flaubert (1979a), 页198-199。
14. 引自Chardak(1997); Dunbar(1978), 页52。
15. T.J.Clark (1973b)。
16. N.Green (1990)。
17. Berman (1982), 页153; Benjamin (1973);

- Vidler (1978)。
18. Dommanget (1969)。
19. St. John (1854), 页11。
20. Hazareesingh (1998); Greenberg (1971), 页24。
21. Hausmann (1890-1893), vol.2, 页202; St. John (1854), 页14; Greenberg(1971); Gould (1995)。
22. 《巴黎指南》(1867), 页30。
23. Chevalier (1973), 页360-361。
24. Flaubert (1964), 页334。
25. Lazare (1870), 页60。
26. 引自Lidsky (1970), 页46。
27. Baudelaire, (1983b), 页67; Flaubert(1979b), 页49; Goncourt, 转引自Becker (1969)。
28. Hutton (1981), 页66。
29. Audtganne(1854, 1865)。另外也可参见Corbon (1863); Poulot (1980)。
30. Vallés (1871-1873); Corbon (1863), 页209; Lazare (1869, 1870, 1872)。
31. Lepidis and Jacomin (1975), 页285。
32. Hutton (1981); Dommanget (1916, 1969)。
33. Corbon(1863), 110; Hyams (1979); 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Ouvrière de 1867 (1867), 页28-33。
34. Marx (1967), vol.3, 页441。
35. Sewell (1980), 页243-276。
36. Corbon (1863), 页122-141。
37. Moilin (1869); Bernard (2001)。
38. Lissagaray (1976), 页393。
39. 引自Lidsky(1970), 页45, 115; Thomas(1966), 页181。
40. 最完整的研究是 Thomas (1966)。
41. Hertz (1983)。
42. Agulhon (1981), 页99。
43. A.Thomas (n.d.), 页164; 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Ouvrière de 1867 (1867), 页

100; Moon (1975); C.Moses (1984)。

44. Hyams (1979), 页 174。

45. D'Hericourt (1860); F.Green (1965), 页 95;  
E.Thomas (1966), 页 70-87。

46. Reff (1982); T.Clark (1984)。

353 47. Agullhon (1981), 页 185; Hertz (1983)。

48. Michelet (1981); Baudelaire (1983b), 页 531;  
*Procès-verbux de la Commission Ouvrière de  
1867* (1867)。

49. Simon (1861): 另外也可参见 *Procès-verbux  
de la Commission Ouvrière de 1867* (1867), 页  
213-17; Scott (1988)。

50. Dalotel (1981), 页 122; *Procès-verbux de la  
Commission Ouvrière de 1867* (1867), 页 233。

## 第十七章

1. Marx (1963), 页 135。

2. Zeldin (1958), 页 10。

3. Thomas (n.d.), 页 192。

4. Lejeune (1977); Rougerie (1968b)。

5. 这场政治意识的战争, 其详细内容可参见 Dalotel,  
Faure, and Freirmuth (1980)。

## 第十八章

1. Jonquet (1890), 页 54。

2. Dansette (1965); Jonquet (1890)。

3. Rohault de Fleury (1903-1909)。这部圣心堂建  
筑史分为四册, 是最主要的资料来源。这部书  
并没有公开发行与流通, 因此目前存在的数量  
极少。圣心堂图书馆藏有完整四册, 其他则见  
于国家图书馆。两册的文献与评释集参见  
Benoist (1992)。

4. Rohault de Fleury (1903-1909), vol.1, 页 10-  
13。

5. Ibid。

6. Guillemin (1956)。

7. E.Thomas (1967)。

8. Lissagaray (1976)。

9. Bruhat, Dautry and Tersen (1971), 页 75。

10. Marx and Lenin (1968); Cerf (1971)。

11. Lazare (1872); Becker (1969)。

12. Bruhat, Dautry, and Tersen (1971); Edwards  
(1971)。

13. Lissagaray (1976), 页 75。

14. Guillemin (1971); Bruhat, Dautry, and Tersen  
(1971), 页 104-105; Dreyfus (1928), 页 266。

15. Rohault de Fleury (1903-1909), vol.1, 页 88,  
264。

16. Rohault de Fleury (1903-1909), vol.1, 页  
264。

17. 有关巴黎公社的叙述, 数量与种类均相当繁  
多。我引用最多的是 Bruhat, Dautry, and Tersen  
(1971); Lissagaray (1976), 他自己即是参与  
者; Rougerie (1971); Jellinek (1937); Edwards  
(1971)。Du Camp (1878) 的视角完全属于右  
派立场, 而 Lidsky (1970) 则收集了当时所有  
仇视巴黎公社的作品。事件当时与之后的摄影  
作品成了近年来人们感兴趣的题材; 大量的收  
藏参见 Noel (1000) 以及 Réunion des Musée  
Nationaux (2000)。泼油纵火者的神话已经过  
E.Thomas (1966) 的彻底调查, 而 Rougerie  
(1965) 详细检视了所有参与者的审判记录, 找  
出谁是参与者并了解其动机。

18. Foulon (1934)。

19. 奥德乌的说法引自 Jellinek (1937), 页 339。  
Becker (1969), 页 18, 他从龚古尔在巴黎公社  
时期所写的日记中选辑了一些描述。

20. Rohault de Fleury (1903-1909), vol.1, 页 13。

21. Becker (1969), 页 312。

22. Guillemin (1971), 页 295-296; Rohault de  
Fleury (1903-1909), vol.1, 页 365。

23. Rohault de Fleury (1903-1909), vol.1, 页 17。

24. Jonquet (1890), 页 85-87。

25. Pinkney (1958), 页 85-87; 另外也可参见

354

- Woolf ( 1988 )。
26. Dansette ( 1965 ), 页 340-345。
27. Rohault de Fleury ( 1903-1909 ), vo1.1, 页 88。
28. Ibid.
29. Abadie ( 1988 ), 页 222-224。
30. Rohault de Fleury ( 1903-1909 ), vol.1, 页 244。
31. Rohault de Fleury ( 1903, 1909 ), vol.1, 页 269。
32. Dansette ( 1965 ), 页 56-358; Lepidis and  
Jacomin ( 1975 ), 页 271-272。
33. Ville de Paris, Procès-verbaux ( August 3, Oc-  
tober 7, and December 2, 1880 )。
34. Rohault de Fleury ( 1903, 1909 ), vo1.2, 页  
71-73。
35. Rohault de Fleury ( 1903-1909 ), 页 71-76。
36. Lesourd ( 1973 ), 页 224-225。

## 参考书目

- Abadie, P. 1988. *Paul Abadie, Architecte, 1812-1884*. Paris.
- Agulhon, M. 1981 (1979). *Marianne into Battle: Republican Imagery and Symbolism in France, 1789-1880*. Trans. J. Lloyd. London.
- . 1983 (1973).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 1848-1852*. Trans. J. Lloyd. London.
- Allison, J. 1932. *Monsieur Thiers*. New York.
- Anderson, R. 1970.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Conflicts in French Society*. Ed. T. Zeldin. London.
- . 1975. *Education in France, 1848-1870*. Oxford.
- Audiganne, A. 1854. *Les Populations Ouvrières et les Industries de la France dans le Mouvement Social d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 1865. *Les Ouvriers d'à Présent et la Nouvelle Économie du Travail*. Paris.
- Auspitz, K. 1982. *The Radical Bourgeoisie: The Ligue de l'Enseign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hird Republic*. London.
- Autin, J. 1984. *Les Frères Pereire*. Paris.
- Baguley, D. 2000. *Napoleon III and His Regime*. Baton Rouge, La.
- Bakunin, J. 1976. *Pierre Leroux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1797-1848*. New York.
- Balzac, H. de. 1951. *Old Goriot (OG)*. Trans. M. Crawford. Harmondsworth, U.K.
- . 1955. *Eugenie Grandet (EG)*. Trans. M. Crawford. Harmondsworth, U.K.
- . 1965. *Cousin Bette (CBE)*. Trans. M. Crawford. Harmondsworth, U.K.
- . 1968. *Cousin Pons (CP)*. Translated H. Hunt. Harmondsworth, U.K.
- . 1970. *A Harlot High and Low (HHL)*. Trans. R. Heppenstall. Harmondsworth, U.K.
- . 1971. *Lost Illusions (LI)*. Trans. H. Hunt. Harmondsworth, U.K.
- . 1974. *History of the Thirteen (HT)*. Trans. H. Hunt. Harmondsworth, U.K.
- . 1976. *La Comédie Humaine*. Vol. 1. Paris (Pléiade edition).
- . 1977. *The Wild Ass's Skin (WAS)*. Trans. H. Hunt. Harmondsworth, U.K.
- . 1994. *César Birotteau (CBI)*. Trans. R. Buss. Harmondsworth, U.K.
- . 1997a. *Colonel Chabert (CC)*. Trans. C. Cosman. New York.
- . 1997b. *The Physiology of Marriage*. Baltimore.
- . 2001. *The Unknown Masterpiece*. Trans. R. Howard. New York.
- . N.d., *The Old Maid (OM)*. London and New York, Chesterfield Society, *The Works of Honore de Balzac*. vol. 14.

- . de. N.d. *The Peasantry*. London and New York, Chesterfield Society, *The Works of Honore de Balzac*, vol. 20.
- Bartier, J., et al. 1981. 1848: *Les Utopismes Sociaux*. Paris.
- Baudelaire, C. 1947 (1869). *Paris Spleen*. Ed. and trans. L. Varese. New York.
- . 1981 (1845–1864). *Selected Writings on Art and Artists*. 2nd ed., repr. Trans. P. E. Charvet. London.
- . 1983a (1857). *Les Fleurs du Mal*. Trans. R. Howard. Boston.
- . 1983b. *Intimate Journals*. Rev. ed., repr. Trans. C. Isherwood. San Francisco.
- Becherer, R. 1984. *Science plus Sentiment: Cesar Daly's Formula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Ann Arbor, Mich.
- Becker, G., ed. 1969. *Paris Under Siege, 1970–71: From the Goncourt Journal*. Ithaca, N.Y.
- Beecher, J. 2002. *Victor Considerant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nch Romantic Socialism*. Berkeley, Calif.
- Beecher, J. and R. Bienvenu, 1971. "Introduction." In C. Fourier,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Trans. and ed. Beecher and Bienvenu. Boston.
- Bellet, R. 1967. *Presse et Journalism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 Benjamin, W. 1968. *Illuminations*. Trans. H. Zohn. New York.
- . 1973.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 Zohn. London.
- . 1999.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 Eiland and K. McLaughlin. Cambridge, Mass.
- Benoist, J. 1992. *La Basilique de Sacre-Coeur a Montmartre*. 2 vols. Paris.
- Berlanstein, L. 1979–1980. "Growing Up as Work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The Case of Orphans of the Prince Imperial."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1: 551–576.
- Berman, M.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 Bernard, J.-P. 2001. *Les Deux Paris: Les Représentations de Paris dans le Second Moitié d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Berthier, P. 1998.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a Comédie Humaine de Balzac*. Paris.
- Biddiss, M. 1970. *Father of Racist Ideolog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Count Gobineau*. New York.
- Bouvier, J. 1967. *Les Rothschild*. Paris.
- Bowie, K, ed. 2001. *La Modernité Avant Haussmann: Formes de L'espace Urbain à Paris, 1801–1853*. Paris.
- Boyer, C. 1994.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Its Historical Imagery and Architectural Entertainments*, Cambridge, Mass.
- Braudel, F., and E. Labrousse, eds. 1976.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 3. Paris.
- Bruhat, J., J. Dautry, and E. Tersen. 1971. *La Commune de 1871*. Paris.
- Canfora-Argandona, E., and R. H. Guerrand. 1976. *La Répartition de la Population: Les Conditions de Logement des Classes Ouvrières à Paris au XIX siècle*. Paris.
- Casselle, P. 2000. "Commission des Embellissements de Paris: Rapport à l'Empereur Napoleon III Rédigé par le Comte Henri Simeon." *Cahiers de la Rotonde*, 23.
-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Calif.
- Cerf, M. 1971. *Edouard Moreau*. Paris.
- Chardak, H. 1997. *Elisée Reclus: Une Vie*. Paris.
- Charlery, S. 1931. *Histoire du Saint-Simonisme*. Paris.
- Charlton, D. 1959. *Positivist Thought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1852–1870*. Oxford.
- Chevalier, L. 1950. *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 1973 (1958). *Labo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Trans. F. Jellinek. Princeton, N.J.
- Clark, T. 1984.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London.
- Clark, T. J. 1973a. *The 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London.
- . 1973b. *Image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London.
- Clout, H. 1977. *Them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 London.
- Cobb, R. 1975. *A Sense of Place*. London.
- Cochin, A. 1864. *Paris: Sa Population, Son Industries*. Paris.
- Commission des Logements Insalubres de Paris. 1866. *Rapport Générale sur les Travaux de la Commission Pendant les Années 1862–1865*. Paris.



- Copping, E. 1858. *Aspects of Paris*. London.
- Corbin, A. 1978. *Les Filles de Noce: 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 aux 19ème et 20ème Siècles*. Paris.
- Corbon, A. 1863. *La Secret du Peuple de Paris*. Paris.
- Corcoran, P. 1983. *Before Marx: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n France, 1830–48*. London.
- Cottureau, A. 1980. "Etude Préalable." In D. Poulot, *Le Sublime*. Paris.
- . 1988. "Dennis Poulot's *Le Sublime*—a Preliminary Study." In A. Rifkin and R. Thomas, eds., *Voices of the People*. London.
- Dalotel, A. 1981. *Paule Minck: Communarde et Féministe*. Paris.
- Dalotel, A., A. Faure, and J. C. Freirmuth. 1980. *Aux Origines de la Commune: Le Mouvement des Réunions Publiques à Paris, 1868–1870*. Paris.
- Dansette, A. 1965.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aris.
- Dargan, J. 1985. *Balzac and the Drama of Perspective*. Lexington, Ky.
- Daumard, A. 1965. *Maisons de Paris et Propriétaires Parisien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 ed. 1973. *Les Fortunes Française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Daumas, M., and J. Payen, eds. 1976. *Evolution de la Géographie Industrielle de Paris et Sa Proche Banlieue au XIXème Siècle*. 2 vols. Paris.
- Dautry, J. 1977. *1848 et la IIème République*. Paris.
- Delacroix, E. 1980 (1926). *The Journal of Eugene Delacroix*. Trans. L. Norton, ed. H. Wellington. Ithaca, N.Y.
- Delattre, S. 2000. *Les Douze Heures Noires: La Nuit à Pari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Des Cars, J., and P. Pinon, eds. 1991. *Paris-Haussmann: Le Pari Haussmann*. Paris.
- De Thèzy, M. 1994. *Marville*. Paris.
- D'Hericourt, J. 1860. *La femme affranchi*. Paris.
- Dommanget, M. 1957. *Les idé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d'Auguste Blanqui*, Paris.
- . 1969. *Blanqui et l'opposition révolutionnaire à la fin du Second Empire*. Paris.
- . 1970 (1926). *Blanqui*. Reprint. Paris.
- Donzelot, J. 1977. *La Police des Familles*. Paris.
- Dreyfus, R. 1928. *Monsieur Thiers Contre l'Empire: La Guerre et la Commune*. Paris.
- Du Camp, M. 1875. *Paris: Ses Organes, Ses Fonctions et Sa Vi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ème Siècle*. 6 vols. Paris.
- . 1878. *Les Convulsions de Paris*, 4 vols. Paris.
- Duchene, G. 1869. *L'Empire Industriel*. Paris.
- Dunbar, G. 1978. *Elisée Reclus*. Hamden, Conn.
- Dupont-Ferrier, P. 1925. *Le Marché Financier de Paris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 Durkheim, E. 1958,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 Trans. C. Sattler. Yellow Springs, Ohio.
- Duveau, G. 1946. *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 Edwards, S. 1971. *The Paris Commune*. Chicago.
- Ellingson, T. 2001.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 Berkeley, Calif.
- Engels, F. 1935 (1872). *The Housing Question*. New York.
- Farrant, T. 2001. "Du Livre Illustré à la Ville-Spectacle." In K. Bowie, ed., *La Modernité Avant Haussmann*. Paris.
- Fay-Salloy, F. 1980. *Les Nourrices à Paris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Ferguson, P. 1994. *Paris as Revolution: Writing the 19th Century City*. Berkeley, Calif.
- Ferry, J. 1868. *Comptes Fantastiques d'Haussmann*. Paris.
- Flaubert, G. 1964 (1869). *Sentimental Education*. Trans. R. Baldick. Harmondsworth, U.K.
- . 1976 (1881). *Bouvard and Pecuchet*. Trans. A. J. Krailsheimer. Harmondsworth, U.K.
- . 1979a. *Flaubert in Egypt*. Trans. and ed. F. Steegmuller. Chicago.
- . 1979b. *Letters, 1830–1857*. Trans. and ed. F. Steegmuller. London.
- . 1982. *Letters, 1857–1880*. Trans. and ed. F. Steegmuller. London.

- Flaus, L. 1949. "Les fluctuations de la Construction d'Habitations Urbaines"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May-June 1949).
- Fortescue, W. 1983. *Alphonse de Lamarti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 Foucault, M.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binow. Harmondsworth, U.K.
- Foulon, M. 1934. *Eugène Varlin*. Clermont-Ferand.
- Fourier, C. 1971. *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 Selected Texts* Trans. and ed. J. Beecher and R. Bienvenu. Boston.
- . 1996. *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Ed. G. S. Jones and I. Patterson. Cambridge.
- Fournel, V. 1858. *Ce Qu'on Voit dans les Rues de Paris*. Paris.
- . 1865. *Paris Nouveau et Paris Future*. Paris.
- Fox, R., and G. Weisz. 1980. *The Organis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France, 1808-1914*. London.
- Fribourg, A. 1872. *Le Paupérisme Parisien*. Paris.
- Fried, M. 1963. "Grieving for a Lost Home," In L. Duhl, ed., *The Urban Condition*. New York.
- Fried, Michael, 1969. "Manet's Sources: Aspects of His Art, 1859-65." *Artforum* 7, no. 7: 1-82.
- Gaillard, J. 1977. *Paris: La Ville, 1852-1870*. Paris.
- Gandy, M. 1999. "The Paris Sewers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Urban Space."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24: 23-44.
- Giedion, S. 1941. *Space, Time,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
- Gildea, R. 1983. *Education in Provincial France, 1800-1914*. Oxford.
- Girard, L. 1952. *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 . 1981.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e Second Empire*. Paris.
- Glacken, C. 1967.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Berkeley, Calif.
- Gobineau, A., Comte de. 1853-1855.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Paris.
- Gossez, R. 1967. *Les Ouvriers de Paris: L'Organisation, 1848-51*. Paris.
- Gossman, L. 1974. "The Go-between: Jules Michelet, 1798-1874." *MLN* 89: 503-541.
- Goubert, J.-P. 1986. *The Conquest of Water*. Oxford.
- Gould, R.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 Q. Hoare and G. N. Smith. London.
- Green, F. 1965. *A Comparative View of French and British Civilization, 1850-1870*. London.
- Green, N. 1990. *The Spectacle of Nature: Landscape and Bourgeois Cul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Manchester, U.K.
- Greenberg, L. 1971. *Sisters of Liberty: Marseille, Lyon, Paris, and the Relation to a Centralized State, 1868-71*. Cambridge, Mass.
- Guedalla, P. 1922. *The Second Empire*. New York.
- Guerrand, R.-H. 1966. *Les Origines du Logement Social en France*. Paris.
- Haine, W. 1996. *The World of the Paris Café*. Baltimore.
- Halbwachs, M. 1909. *Les Expropriations et le Prix de Terrain, 1860-1900*. Paris.
- . 1928. *La Population et les Tracés des Voies à Paris Depuis un Siècle*. Paris.
- Hambourg, M. 1981. "Charles Marville's Old Paris." In French Institute/Alliance Française, *Charles Marville: Photographs of Paris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Empire on Loan from the Musée Carnavalet*. Paris and New York.
- Hanagan, M. 1980.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Urbana, Ill.
- Hanagan, M. 1982. "Urbanization, Worker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Social Protest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In J. Merriman, ed., *French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 Harsin, J. 1985. *Policing Prostit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Princeton, N.J.
- . 2002. *Barricades: The War of the Street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1830-1848*, New York.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 .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 Hausmann, G.-E. 1890–1893. *Memoires du Baron Hausmann*. 2 vols. Paris.
- Hazareesingh, S. 1998. *From Subject to Citizen: The Second Empire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rench Democracy*. Princeton, N.J.
- Hellerstein, E. 1976. "French Women and the Orderly Household."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3: 378–389.
- Hershberg, T. 1981. *Philadelphia: Work, Space, Family, and the Group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 Hertz, N. 1983. "Medusa's Head: Male Hysteria under Political Pressure." *Representations* 4: 37–54.
- Hill, C. 1975.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U.K.
- Hitzman, A. 1981. "Rome Is to Carthage as Male Is to Female: Michelet, Berlioz, Flaubert and the Myths of the Second Empir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8: 378–380.
- Hugo, V. 1976 (1862). *Les Misérables*. Trans. N. Denny. Harmondsworth, U.K.
- Hutton, P. 1981. *The Cult of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The Blanquists in French Politics, 1864–1893*. Berkeley, Calif.
- Hyams, E. 1979. *Pierre-Joseph Proudhon: His Revolutionary Life, Mind, and Works*. London.
- Ionescu, G. 1976.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int-Simon*. Trans. and ed. G. Ionescu. Oxford.
- Jameson, F. 1982.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London.
- . 1995. "Fredric Jameson on *La Cousine Bette*." In M. Tilby, ed., *Balzac*. London.
- Janis, E. 1986. "Demolition Picturesque: Photographs of Paris in 1852 and 1853 by Henri Le Secq." In P. Walch and T. Barrow, eds., *Perspectives on Photography: Essays in Honor of Beaumont Newhall*. Albuquerque, N.M.
- Jellinek, F. 193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 Johnson, C. 1974.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Cabet and the Icarians, 1839–1851*. Ithaca, N.Y.
- Kantorowicz, E. 1957. *The King's Two Bodies*. Princeton, N.J.
- Kelso, M. 1936.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D. McKay, ed.,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New York.
- Kemple, T. 1995. *Reading Marx Writing: Melodrama, the Market and the "Grundrisse"*. Stanford, Calif.
- Klein, R. 1967. "Some Notes on Baudelaire and Revolution." *Yale French Studies* 39: 85–97.
- Kulstein, D. 1969. *Napoleon III and the Working Class*. San Jose, Calif.
- Lameyre, G.-N. 1958. *Hausmann, Préfet de Paris*. Paris.
- Lavedan, P. 1975. *Histoire de l'Urbanisme à Paris*. Paris.
- Lazare, L. 1869. *Les Quartiers Pauvres de Paris*. Paris.
- . 1870. *Les Quartiers Pauvres de Paris: Le XXème Arrondissement*. Paris.
- . 1872. *La France et Paris*. Paris.
- Lefebvre, H. 1967. *La Proclamation de la Commune*. Paris.
- . 1974.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 . 1976 (1973).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Trans. F. Bryant. London.
- Lejeune, M., and P. Lejeune. 1984. *Calicot: Xavier-Edouard Lejeune*. Paris.
- Lejeune, P. 1977. *Eugène Varlin: Pratique Militante et Écrits d'un Ouvrier Communard*. Paris.
- Leon, P. 1976. "La Conquête de l'Espace Nationale." In F. Braudel and E. Labrousse, ed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 3. Paris.
- Lepidis, C., and E. Jacomin. 1975. *Belleville*. Paris.
- Le Play, F. 1878. *Les Ouvriers Européens*. 6 vols. Paris.
- . 1983. *Ouvriers de Deux Mondes*. Abridged ed. Paris.
- Leroy-Beaulieu, P. 1868. *De l'État Moral et Intellectuel des Populations Ouvrières et Son Influence sur le Taux de Salariés*. Paris.
- Lescure, M. 1980. *Les Sociétés Immobilières en France au XIXème Siècle*. Paris.

- Lesourd, P. 1973. *Montmartre*. Paris.
- Levy-Leboyer, M. 1976. "Le Crédit et la Monnaie: L'Évolution Institutionnelle." In F. Braudel and E. Labrousse, ed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Vol. 3. Paris.
- Lidsky, P. 1970. *Les Écrivains contre la Commune*. Paris.
- Lissagaray, P.-O. 1976 (1876). *Histoire de la Commune*. Paris.
- Lynch, K. 1964.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 Marchand, B. 1993. *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 Paris.
- Marcus, S. 1999. *Apartment Stories: City and Home in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and London*, Berkeley, Calif.
- Margadant, T. 1982. "Proto-urba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Second Republic." In J. Merriman, ed., *French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 Marrey, B. 1981. "Les Réalisations des Utopistes dans les Travaux Publics et l'Architecture: 1840–1848." In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t des Révolutions du XIX<sup>ème</sup> Siecle, *1848: Les Utopismes sociaux*. Paris.
- Marx, K. 1963 (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 . 1964.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New York.
- . 1967. *Capital*. 3 vols. New York.
- . 1972.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3 vols. London.
- . 1973.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U.K.
- Marx, K., and F. Engels, 1952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 Marx, K., and V. I. Lenin, 1968.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 Marx, L. 1964.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London.
- Massa-Gille, G. 1973. *Histoire des Emprunts de la Ville de Paris, 1814–1875*. Paris.
- McBride, T. 1976. *The Domestic Revolution*. New York.
- . 1977–1978. "A Woman's World: Department Stores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1870–1920,"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0: 664–683.
- McKay, D. 1933. *The National Workshops: A Stud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Cambridge, Mass.
- McLaren, A. 1978. "Abortion in France: Women and the Regulation of Family Siz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0, 461–485.
- Meynadier, H. 1843. *Paris sous le Point de Vue Pittoresque*. Paris.
- Michel, L. 1981 (1886). *The Red Virgin*. Trans. B. Lowry and E. Gunter. University, Ala.
- Michelet, J. 1973 (1845). *The People*. Trans. J. McKay, Urbana, Ill.
- . 1981. *La Femme*. Paris.
- Miller, M. 1981. *The Bon Marché: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1869–1920*. London.
-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de la Communication, des Grands Travaux et du Bicentenaire. 1988. *Paul Abadie: Architecte 1812–1884*. Paris.
- Moilin, T. 1869. *Paris en l'An 2000*. Paris.
- Molotch, H. 1976.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309–32.
- Moncan, P., and C. Mahout. 1991. *Le Paris du Baron Haussmann: Paris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 Moon, S. 1975. "The Saint-Simonian Association of Working Class Women, 1830–1850."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5: 274–280.
- Moret, F. 2001. "Penser la Ville en Fourieriste: Les Projets pour Paris de Perreymond." In K. Bowie, ed., *La Modernité Avant Haussmann*. Paris.
- Moses, C. 1984. *French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bany, N.Y.
- Moses, R. 1942. "What Happened to Haussmann." *Architectural Forum* 77 (July): 1–10.
- Moss, B.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1830–1914*. Berkeley, Calif.
- Nadaud, M. 1895. *Mémoires de Léonard, Ancien Garçon Maçon*. Bourgneuf.
- Noel, B., ed. 2000. *La Commune: Paris 1871*. Paris.

- Papayanis, N. 2001. "L'Émergence de l'Urbanisme Moderne à Paris." In K. Bowie, ed., *La Modernité Avant Haussmann*. Paris.
- Paris Guide*. 1983 (1867). Paris.
- Payne, H. 1966. *The Police State of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Seattle, Wash.
- Pinkney, D. 1953. "Migrations to Paris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5: 1–12.
- . 1958.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 Princeton, N.J.
- Piore, M., and C. Sable.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 Plessis, A. 1973. *De la Fête Impériale au Mur des Fédérés, 1852–1871*. Paris.
- . 1982. *La Banque de France et Ses Deux Cents Actionnaires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 Pollock, G. 1988.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the Histories of Art*. London.
- Poulet, G. 1959. *The Interior Distance*. Trans. E. Coleman. Baltimore.
- Poulot, D. 1980 (1870). *Le Sublime*. Paris.
- Prawer, S. 1978.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 Prendergast, C. 1992. *Paris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 Price, R. 1975.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France*. London.
- . 1983.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London.
- Procès-Verbaux de la Commission Ouvrière de 1867*. 1867. Paris.
- Rabinow, P. 1989. *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ss.
- Rancière, J. 1988. "Good Times or Pleasure at the Barriers." In A. Rifkin and R. Thomas, eds., *Voices of the People*. London.
- . 1989. *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Trans. John Drury. Philadelphia.
- Rancière, J., and P. Vauday. 1988. "Going to the Expo: The Worker, His Wife and Machines." In A. Rifkin and R. Thomas, eds., *Voices of the People*. London.
- Reff, T. 1982. *Manet and Modern Paris*. Washington, D.C.
- Retel, J. 1977. *Éléments Pour une Histoire du Peuple de Paris au 19eme Siècle*. Paris.
-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0. *La Commune Photographiée*. Paris.
- Reybaud, L. 1869. "Les Agitations Ouvrières et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Revue des Deux Mondes* 81: 871–902.
- Rifkin, A. 1979. "Cultural Movements and the Paris Commune." *Art History* 2: 210–222.
- Rifkin, A., and R. Thomas, eds. 1988. *Voices of the People: The Politics and Life of "La Sociale"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Empire*. London.
- Robb, G. 2000. *Balzac: A Biography*. London.
- Rohault de Fleury, H. 1903–1909. *Historique de la Basilique du Sacré-Coeur*. 4 vols. Limited ed. Paris.
- Roncayalo, M. 2002. *Lectures de Ville: Formes et Temps*. Marseille.
- Rose, R. 1978.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Stanford, Calif.
- Rossi, A. 1982.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
- Rougerie, J. 1965. *Procès des Communards*. Paris.
- . 1968a. "Remarques sur l'Histoire des Salaires à Paris au Dix-neuvième siècle." *Le Mouvement Sociale* 63: 71–108.
- . 1968b. "Les Sections Française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Travailleurs." *Colloques Internationales du CNRS*. Paris.
- . 1971. *Paris Libre*. Paris.
- Rubin, J. 1980. *Realism and Social Vision in Courbet and Proudhon*. Princeton, N.J.
-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 Saint-Simon, H., Comte de. 1952. *Selected Writings*. Ed. and trans. F. M. H. Markham. Oxford.
- . 1975. *Selected Writings on Science, Industry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Trans. K. Taylor. London.
- Saisselin, R. 1984. *The Bourgeois and the Bibelot*. New Brunswick, N.J.



- Schivelbusch, W. 1977. *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Calif.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onn.
- Scott, J. W.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 Sennett, R. 1970. *The Uses of Disord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New York.
- . 1978. *The Fall of Public Ma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Sewell, W. H.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 Simmel, G. 1971.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Simmel's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 D. Levine. Chicago.
- . 1978 (1920).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Trans. T. Bottomore and D. Frisby. London.
- Simon, J. 1861. *L'Ouvrière*. Paris.
- Smith, W. 1991. *Napoleon III*. London.
-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t des Révolutions du XIX<sup>ème</sup> Siècle. 1981. *1848: Les Utopismes Sociaux*. Paris.
- St. John, B. 1854. *Purple Tints of Paris*. New York.
- Stegmuller, F. 1950. *Flaubert and Madame Bovary: A Double Portrait*. New York.
- Stierle, K. 2001. *La Capitale des Signes: Paris et Son Discours*. Paris.
- Sutcliffe, A. 1970. *The Autumn of Central Paris*. London.
- Taylor, K. 1975. "Introduction." In Saint-Simon, *Selected Writings on Science . . .* Ed. Taylor. London.
- Tchernoff, I. 1906. *Le Parti Républicain*. Paris.
- Thomas, A. N.d. *Le Second Empire, 1852–1870*. Paris.
- Thomas, E. 1966 (1963). *The Women Incendiaries*. Trans. J. Atkinson and S. Atkinson. New York.
- . 1967. *Rosell (1844–1871)*. Paris.
- Tilly, L. A., and J. A. Scott. 1978.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 Tristan, F. 1843. *L'Union Ouvrière*. Paris
- . 1982 (1840). *The London Journal of Flora Tristan*. Trans. J. Hawkes. London.
- Truesdell, M. 1997. *Spectacular Politics: Louis-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Fête Impériale, 1849–70*. Oxford.
- Tudesq, A.-J. 1956. "La Crise de 1847, Vue par les Milieux d'Affaires Parisiens." *Etude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19: 4–36.
- Valette, J. 1981. "Utopie Sociale et Utopistes Sociaux en France vers 1848."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13–110.
- Vanier, H. 1960. *La Mode et Ses Metiers*. Paris.
- Vidler, A. 1978. "The Scenes of the Street: Transformations in Ideal and Reality, 1750–1871" In S. Anderson, ed., *On Streets*. Cambridge, Mass.
- Ville de Paris, Conseil Municipal. 1880. *Procès Verbaux*. Paris.
- Vincent, K. 1984.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Oxford.
- Weeks, W. 1999. *The Man Who Made Paris Paris: The Illustrated Biography of Georges-Eugene Haussmann*. London.
- Wolf, P. 1988. "Symbol of the Second Empire: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Paris Opera House." In D. Cosgrove, and S.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 Zola, E. 1954a (1872). *The Kill (La Curée)*. Trans. A. Texiera de Mattos. New York.
- . 1954b (1885). *Germinal*. Trans. L. Tancock. Harmondsworth, U.K.
- . 1970 (1876). *l'Assommoir*. Trans. L. Tancock. Harmondsworth, U.K.
- . 1991 (1891). *Money (L'Argent)*. Trans. E. Vizetelly, Stroud.
- . 1995 (1883). *The Ladies Paradise (Au Bonheur des Dames)*. Trans. Brian Nelson. Oxford.

## 谢辞以及提供图文的机构与人士致谢表

- Academic Press 35  
Amgueddfa ac Orielau Cenedlaethol Cymru/National Museums & Galleries of Wales 54  
Artography 6, 14, 17, 26, 42, 51, 83, 92, 94, 116 (bottom)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2  
Beth Lieberman 25, 36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3, 15, 21, 24, 27, 37, 40, 59, 63, 70, 71, 76, 77, 85, 95, 98, 99,  
101  
Collections d’Affiches, Alain Gesgon 118  
Editions du Seuil 105  
Editions de la Couverte 102  
The Phillips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66  
Photothèque des Musées de la Ville de Paris/Cliché Andreani 8, 43, 75A, 78, 79A, 79B,  
91A; Bertheir, 9, 75B; Briant, 3, 4, 19, 32B, 33, 38, 46, 86A, 107A; Degraes, 18, 44,  
84B, 114, 116; Giet, 89A, 89B; Habouzit, 11, 28A, 82, 84A, 86B, 108A; inconnu,  
74A; Joffre, 16, 29, 30, 32A, 91B, 100, 104, 107B, 110, 111, 112, 113, 115; Ladet, 10,  
28B, 31, 39, 57, 69, 73A, 81, 87, 103; Lifeman, 88; Pierrain, 5, 7, 52, 60, 65A, 108B;  
Trocaz, 34A, 72, 73B; Toumazet, 65B, 74B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 NY 1, 22, 23, 67, 90B  
Scala/Art Resource, NY 90A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2  
The Walters Art Museum, Baltimore 80

# 索引

## A

- Agricultural and Domestic Association* (Fourier) 《农业与家庭社团》(傅立叶), 75
- Agulhon, M. 阿居隆, 62
- Arcades project (Benjamin) 拱廊街计划(本雅明), 18, 24
- Arrondissements* 巴黎市分区, 112, 136, 146, 234—235, 242, 244, 286, 306, 321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草根民主与, 235
- Association 社团, 结社, 74—76, 154  
Class/corporatist resistance 阶级/统合主义的抵抗, 284  
Organized labor and 有组织的劳工与, 284—285  
Universal association 普世性社团, 75
- Association of capital 资本联合, 117, 134
- Au Bonheur des Dames* (Zola) 《妇女乐园》(左拉), 216
- Audiganne, A. 欧第冈, 281
- Authoritarianism 专制主义, 141, 146, 294
- Autogestion (worker self-management) 工人自主管理, 79, 154

## B

- Babeuf, François 巴贝夫, 弗朗索瓦, 66, 83
- Bailly, J. S. 巴伊, 100
- Bakunin, J. 巴枯宁, 273
- Baltard 巴尔塔, 11—13, 100, 127
-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4, 13—17, 63, 93, 115, 193, 222, 271  
*César Birotteau* 《赛查·皮罗托盛衰记》, 29, 82, 125

- Chouans, The* 《舒昂党人》，26, 29
- city as fetish object 巴黎是拜物教对象，54—57
- Class relation and moral order 阶级关系与道德秩序，28, 36—39, 229
- Colonel Chabert* 《夏倍尔上校》，52
- Country Doctor, The* 《乡村医生》，27
- Cousin Bette* 《贝姨》，32, 34, 42, 44, 46, 55—56, 125, 127
- Cousin Pons* 《邦斯舅舅》，41, 46—47, 55
- Duchesse de Langeais, The* 《朗热公爵夫人》，45—46, 53
- Eugénie Grandet* 《欧也妮·葛朗台》，33
- “Ferragus” “费拉居斯”，40, 51
- Girl with the Golden Eyes, The* 《金眼女郎》，36, 44, 51, 86—87
- on history and memory 论历史与记忆，53—54
- History of the Thirteen* 《十三人社的历史》，40—41
- “Human Comedy, The” “人间喜剧”，17, 25, 28—29, 36, 54—56
- interiority and fear of intimacy 内部空间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恐惧，44—47
- Lost Illusions* 《幻灭》，29, 32, 37, 39, 42, 55
- On myths of modernity 论现代性的神话，23, 52—54
- Old Goriot* 《高老头》，29, 39, 43, 51, 55, 86, 115, 125
- Old Maid, The* 《老姑娘》，23
- On Paris as “rushing stream” 论巴黎是“湍流”，32—36
- Peasantry, The* 《农民》，26, 29, 63
- Physiology of Marriage, The* 《婚姻生理学》，55
- provinces and the city 外省与巴黎，29—32
- Quest of the Absolute, The* 《绝对之探求》，48
- ruling modern aristocracy 统治的现代贵族，28
- space and time themes in, 空间与时间的主题，47—50, 55
- on spatial patterns and moral order 论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40—41
- on streets/public spaces as spectacle 论作为景观的街道/公共空间，41—44
- synoptic vision of 整体观点，50—51
- Unknown Masterpiece* 《未知的杰作》，46
- utopianism of 乌托邦主义，26—29, 47
- Wild Ass' s Skin, The* 《驴皮记》，26-27
- Bank of France 法兰西银行，119—121, 163, 299, 306

- Banking system 银行体系, 118, 另外也可参见 *Crédit System* 信贷体系
- Basilica of Sacré-Coeur, building of 圣心堂, 建造, 311—340
- Commune violence and aftermath 公社暴力与之后, 327—330
  - cult of Sacré Heart 圣心崇拜, 313—314
  - history of construction 建造史, 335—339
  - Legentile's vow to build 勒让蒂的建造誓约, 316—317, 329—330
  - martyrs Thomas and Lecomte 殉道者托马与勒孔特, 325, 327—328
  - Montmartre as symbolic domination 蒙马特是支配的象征, 332
  - as public utility project 作为公用事业计划, 333, 336—338
- Bastiat, F 巴师夏, 277
- Baudelaire, C., 波德莱尔, 3, 57, 109, 148, 192, 218, 223, 255, 257, 259, 261, 263, 289
- “*Crepuscule du Soir*” “黄昏”, 265—266
  - Eyes of the Poor, The* 《穷人的眼睛》, 220—221, 275—276, 280—281
  - Loss of a Halo* 《光环的丢失》, 265
  - modernity and 现代性与, 14—15, 23, 257
  - “*Old Clown, The*” 《老小丑》, 15—16, 54
  - Paris Spleen* 《巴黎的忧郁》, 15, 266
- Baudin 博丹, 7, 302
- Bazard, Saint-Amand 巴扎尔, 圣阿芒, 69
- Benjamin, Walter 本雅明, 瓦尔特, 13, 18—19, 23—24, 46, 53, 67, 82—83, 212, 223, 286
- Berger 贝尔热, 8, 12, 86, 100
- Berman, M. 贝尔曼, 265, 275
- Bismarck, O. 俾斯麦, 323, 325
- Blanc, Louis 勃朗, 路易, 4, 7, 70—71, 75-76, 79, 86, 260, 270
- Blanqui, August 布朗基, 66, 71—73, 77, 83, 86, 97, 154, 282, 320
- Blanquist movement 布朗基主义运动, 203, 205
- Body politic 身体政治; 另外也可参见 *Second Empire* 第二帝国
- 1840 social radicalism of 1840 年社会激进主义, 71—73
  - association and 社团与, 74—76
  - city as 城市作为, 64, 88
  - community/communism 共同体 / 共产主义, 76—78
  - co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of 构成与治理, 64—65



equality and 平等, 73—74  
 icon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图像表述, 62—64  
 individualism vs. socialism 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 69  
 king as person/state 作为人/国家的国王, 61  
 Liberty/Revolution as woman 作为女性的自由/革命, 62, 64, 287  
 moral incentives of 道德动机, 68  
 post-Revolution of 1848, 1848 年革命之后, 86  
 rational change of, 理性变革, 65  
 religion and 宗教与, 69  
 Saint-Simon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圣西门论政治制度, 67—68  
 women's role in 女性角色, 69  
 work and labor 工作与劳动, 78—80, 97  
 Bonapartism 波拿巴主义, 6—7, 85  
*Book of Compagnonnage* (Perdiguier) 《同业公会书》(佩蒂吉耶), 71  
 Bouilhet, Louis 布耶, 路易, 13—14  
 Boyer, Christine 布瓦耶, 克里斯蒂娜, 52—53  
 Buchez 比谢, 75, 80  
 Buonarroti 博纳罗蒂, 66  
*Burial at Ornans*(Courbet) 《奥南的葬礼》(库尔贝), 275  
 Burnham, Daniel 伯纳姆, 丹尼尔, 112

## ■

Cabet, Etienne 卡贝, 艾蒂安, 16, 71—72, 74—80, 83, 86 154  
 Capital 资本  
   association of capital 资本的联合, 117, 134  
   mobilization of 动员, 114, 133  
   octroi tax base 入市税税基, 143  
   state intervention and 国家介入与, 142—144  
   variable capital 变动资本, 195  
*Capital* (Marx) 《资本论》(马克思), 16, 36, 170, 256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80, 102, 115, 142, 265, 282—285  
   experience of laboring and 劳动经验与, 170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发展与转变, 295

-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产业结构, 155
- moral aspects of 道德面向, 119, 148
- Carnival spectacle 节庆景观, 211—212
- Cassatt, Mary 卡萨特, 玛丽, 191
- Castells, M. 卡斯泰尔, 227
- Cavaignac, Louis 卡维尼亚克, 6—7, 272
- Censorship 检查制度, 146, 148, 300
- Centralization 中央集权, 114, 276—279
- César Birroteau* (Balzac) 《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巴尔扎克), 29, 82, 125
- Chemical industry 化学工业, 159—160
- Chevalier, Michel 舍瓦利耶, 69, 88, 95, 150, 237
- Chouans, The* (Balzac) 《舒昂党人》(巴尔扎克), 26, 29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68, 74
-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The* (Castells) 《城市与草根》(卡斯泰尔), 227
- Cité ouvrières “工人之城”, 70, 82, 200—201 City 城市, 另外也可参见 Paris 巴黎
- as body politic 作为身体政治, 64, 88
- ideal 理想, 63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Freud) 《文明及其不满》(弗洛伊德), 71
- Clark, T., 克拉克, T., 221
- Clark, T. J., 克拉克, T. J., 59, 88
- Class relations 阶级关系, 28—29, 227—234
- Balzac's country and city 巴尔扎克的乡村与城市, 29—32
- bourgeoisie and la bohème 资产阶级与放荡不羁者, 232, 256, 302
- class alliance 阶级联盟, 150—152
- class struggle and historical change 阶级斗争与历史变迁, 69
- community and 共同体与, 225
- dangerous classes 危险阶级, 229, 279
- haute bourgeoisie of business 上层商业资产阶级, 227, 283, 294
- lower class 下层阶级, 227, 229
- Paris and moral order 巴黎与道德秩序, 36—39, 279—282
- Poulot's typology of Parisian workers 普洛的巴黎工人分类, 230—231
- upper middle class 上层中产阶级, 227
- working class 工人阶级, 232, 301—302

-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Marx) 《法国阶级斗争, 1848—1850》(马克思), 97
- Cobb, R. 科布, 227
- Cochin, A. 科尚, 180
- Code of Community(1842) 共同体法规 (1842), 77
- Code Napoleon 拿破仑法典, 183
- Colonel Chabert* (Balzac) 《夏倍尔上校》(巴尔扎克), 52
- Commodity fetish 商品拜物教, 215—217
- Commune, as political institution 巴黎公社, 作为政治机构, 276
- Communication systems 交通系统, 269—271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73, 76—78, 225, 282—285
-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 48, 265
- Community 共同体, 234—238
- community of interest 利益共同体, 238
  - definition of 定义, 234—235, 238
  - displacement and memory 移置与记忆, 236—237, 261
  - Hausmann and 奥斯曼与, 234—235
  - social commune 社会公社, 244
  - workers' class and space 工人阶级与空间, 238
- Compagnie des Omnibus de Paris 巴黎公共马车公司, 113, 123
- Compagnie Immobilière 不动产公司, 120
- Compagnonnage system 同业工会体系, 175, 238
- Comptes Fantastiques d'Hausmann* (Ferry) 《奥斯曼的神奇账户》(费里), 143, 303
- 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 巴黎贴现银行, 120
- Comte, Auguste 孔德, 欧古斯, 256
- Conseils de prud'hommes (councils of workers/employers) 劳资调解委员会, 147, 176
- Considérant, Victor 孔西代朗, 维克托, 7, 70, 81, 83—85, 154
-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立宪君主制, 4
- Consumer cooperatives 消费者合作社, 301
- Consumerism, spectacle, and leisure 消费者主义、景观与休闲, 209—224
- Cafes and working class 咖啡馆与工人阶级, 222—223
  - commercial and public space 商业与公共空间, 217, 221
  - commodity fetish 商品拜物教, 215—217
  - exploitation of women and 剥削女性与, 216—217

- mass consumerism 大众消费者主义, 220
- Consumption 消费, 201—202
- Cooper, James Fenimore 库珀, 詹姆斯·费尼莫尔, 30, 271
- Corbon, A. 科尔邦, 153, 168, 197, 253, 281—284
- Cottereau, A. 科特罗, 163, 174
- Country Doctor, The* (Balzac) 《乡村医生》(巴尔扎克), 27
- Courbet, Gustave 库尔贝, 古斯塔夫, 3, 15, 99, 232, 234, 257, 269, 275, 328
- Cousin Bette* (Balzac) 《贝姨》(巴尔扎克), 32, 34, 42, 44, 46, 55—56, 125, 127
- Cousin Pons* (Balzac) 《邦斯舅舅》(巴尔扎克), 41, 46—47, 55
- Craft workers 手工工人, 97, 153, 155, 175, 179, 234, 259, 306
- Manifesto of the Sixty 60条宣言, 299—300
-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的破坏, 1, 10, 259, 266
- Crédit au Travail 工人信贷, 123, 298
- Crédit Foncier 土地信贷, 120—121, 134—135
- Cré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工商信贷, 120
- Crédit Lyonnais 里昂信贷, 119
-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贷, 119—121, 143, 179
- Crédit system 信贷体系, 118, 162—163; 另外可以参见 Money, credit, and finance 金钱, 信贷与金融
- Marx on 马克思, 117—119
- reorganization of 重组, 122—124
- rise of banking/financing 银行/金融的兴起, 119—121
- “Crepuscule du Soir” (Baudelaire) 《黄昏》(波德莱尔), 266
- D**
- Daly, César 达利, 塞萨尔, 64, 80—81, 83, 85
- Danton, G. J. 丹东, 64
- Daumard, A., 多马尔, 127—129, 131, 133, 227—228
- Daumier, H. 杜米埃, 8—9, 17, 37, 61, 64—65, 69, 88, 115, 147, 192, 216, 261, 265, 269
- David, J.L. 戴维, 3
- De Fleury, Rohault 德弗勒里, 罗奥, 319, 329, 332, 335
- De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267, 272, 287—289

Decentralization 分权, 276—279  
*Déjeunersur l' Herbe* (Manet) 《草地上的午餐》(马奈), 289  
Delacroix, E. 德拉克洛瓦, 3, 62, 255, 272, 287  
Deroin, Jeanne 德鲁安, 让娜, 76, 86  
Descartes, Rene 笛卡儿, 50  
Dézamy 德萨米, 77, 83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287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115, 260  
Division of labor 分工, 75, 102, 160—161, 164  
Dmitrieff Elizabeth 德米特里弗, 伊丽莎白, 288  
Du Camp, Maxime 迪康, 马克西姆, 13, 164, 255, 286  
*Duchesse de Langeais, The* (Balzac) 《朗热公爵夫人》(巴尔扎克), 45—46, 53  
Duman, Alexandre 大仲马, 122  
Duruy, Victor 迪吕伊, 维克托, 192, 202—203  
Duveau, G. 迪沃, 177—179, 233  
Duveyrier 迪韦里耶, 64

## 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经济自由化, 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Marx) 《经济学与哲学手稿》(马克思), 16  
Education 教育, 202—205, 290  
Efficiency 效率, 167—169  
Egalitarianism 平等主义, 73  
Egalite 平等, 73  
*Eighteenth Brumaire* (Marx) 《雾月十八》(马克思), 97, 258, 308  
Enfantin, Barthelemy 昂方坦, 巴泰勒米, 69, 73—74, 77, 83, 88  
Engels, F. 恩格斯, 78  
Enquete of 1847—1848 1847—1848 年的翁凯特, 175  
Enquete of 1860 1860年的翁凯特, 157, 162  
Equality 平等, 73—74  
    Women's freedom and equality 女性的自由与平等, 73—74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Gobineau) 《论人种的不平等》(戈比诺), 271  
*Eugénie Grandet* (Balzac) 《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 33



Export trade 出口贸易, 161

Extinction of Pauperism, The 《消灭贫穷》, 69

*Eyes of the Poor, The* (Baudelaire) 《穷人的眼睛》(波德莱尔), 220—221, 275—276, 280

## F

Falloux Law of 1850 1850年法卢法, 202—203

Family 家庭

household formation 家庭组成, 196, 200

policing of 监控, 205—207

*Faust* (Goethe) 《浮士德》(歌德), 48, 50

February Revolution 二月革命, 97

Femmes isolées 孤立的女人, 183, 187

Ferguson, P 弗格森, 87, 227 368

“Ferragus” (Balzac) 《费拉居斯》(巴尔扎克), 40, 51

Ferry, Jules 费里, 朱尔, 143, 148, 261, 303

Fête imperale 帝国纪念日, 235, 261, 286

Feudalism 封建主义, 67

Finance capital 金融资本, 102, 134; 另外可以参见 Money, credit, and finance 金钱, 信贷与金融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3—4, 13—17, 64, 86, 88, 148, 192, 256, 271—273, 275—276, 279, 281, 287

Foucault, Michel 福柯, 64

Fourier, C. 傅立叶, 64—65, 67, 69—83, 200, 256, 260, 285

Fournel, V. 富尔内尔, 263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115

Frègier 弗雷吉耶, 71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65, 67

Freud, S. 弗洛伊德, 71 Fribourg, A. 弗里堡, 299

Fried, M. 弗里德, 259

## G

Gaillard, J. 加亚尔, 19, 128, 132, 136, 138, 145, 151—152, 160, 235—236

Gambetta, L. M. 甘必大, 302, 304

Gautier, Theophile 戈蒂埃, 泰奥菲勒, 280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Keynes) 《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凯恩斯), 34

*Girl with the Golden Eyes, The* (Balzac) 《金眼女郎》(巴尔扎克), 36, 44, 51, 86—87

Gobineau, A., Comte de 哥比诺, 271

Goethe, J. W. 歌德, 48, 50

Goncourt, Edmond de 龚固尔, 埃德蒙, 221—222, 255, 263, 265, 281, 286, 329

Gould, R 古尔德, 227, 242, 244, 279

Govern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1870) 国防政府(1870年), 316, 319—323 Gramsci, A. 葛兰西, 141

Greard 格雷亚尔, 203

Greenberg, L. 格林伯格, 279

*Grundrisse* (Marx)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 48

Guedella, P. 格德利亚, 5

Guibert, Monsignor 吉贝尔, 329—331, 337

Guizot, François 基佐, 弗朗索瓦, 125

## ■

Haine, W. 艾诺, 242

Halbwachs, M. 阿尔布瓦克斯, 133

Hanska, Madame 汉斯卡夫人, 4

*Harlot High and Low, The* 《交际花盛衰记》, 29, 39, 44, 55

Hausmann, George-Eugène 奥斯曼, 3—4, 7—14, 16, 39, 50—51, 59, 84—88, 118—119, 188, 277

anti-industry policies 反工业政策, 165—167

attention to details 注意细节, 100

circulation of capital 资本流通, 114, 134—135, 142—143

community and 共同体与, 234—238

constructed concept of nature 建构的自然概念 245—246

criticism of 批评, 272, 278, 303

education and 教育与, 203—204

financing of 融资, 143—144, 148

health and sanitation issues 健康与公共卫生议题, 249, 251—252

housing stock and 住宅存量与, 198—200

- labor market and 劳动市场与, 145—146
- modernity and urban question 现代性与都市问题, 80—85, 259
- octroi tax base 入市税税基 143
- Paris and concept of urban space 巴黎与都市空间概念 110—111, 114, 122, 131, 239, 241, 260, 275
- power under Louis Napoleon 路易·拿破仑时期的权力, 99—100, 107, 149—151
- propertied interests and 地主与, 131—134, 151—152, 225
- rents and land uses 租金与土地使用, 138, 166
- spectacle of Empire and 帝国景观与, 209
- urban plan and vision 都市计划与视野, 100
- welfare provisions 福利供应, 205—207
- Hegel, G. W. F. 黑格尔, 48
- Hill, Christopher 希尔, 65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Paris* 《巴黎通史》, 10
- History of the Thirteenth* (Balzac) 《十三人社的历史》(巴尔扎克), 40—41
- Hittorff Jacques 希托夫, 雅克, 12, 82, 100
- Household formation 家庭组成, 196, 200
- Housing 住宅, 197—201, 另外可以参见 Property market 房地产市场
- cités ouvrières “工人之城” 70, 82, 200
- new construction 新建设, 135—136
- Hugo, Victor 雨果, 3, 54, 71, 97, 114, 187, 229, 251, 255, 258, 260, 269—270, 272, 287, 289
- “Human Comedy, The”(Balzac) 《人间喜剧》(巴尔扎克), 17, 25, 28—29, 36, 54—56

## I

- Immigration 移入, 180—181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69
- Ingres, J. A. 安格尔, 3
-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 238—239, 273, 299, 319, 335

## J

- Jacobins 雅各宾派, 72—73, 97, 256

Jameson, Fredric 詹姆森, 弗雷德里克, 26, 57

Johnston 约翰斯顿, 78

July Monarchy (1839) 七月王朝 (1839年), 4—5, 8, 70, 107, 113, 128, 130, 153, 210, 248

## K

Kantorowicz, E. 坎托罗维奇, 61

Keynes, John Maynard 凯恩斯, 34

Kropotkin, P. 克罗波特金, 273

## L

La bohème 放荡不羁者, 232, 256, 302

*La Curée (The Kill)*(Zola) 《猎物》(左拉), 51, 116, 122, 133, 261

*La Femme* (Michelet) 《女人》(米什莱), 183, 289

Labor 劳动, 另外也可参见 Work and organized labor ass 工作与有组织的劳动  
association and 社团与, 294—295

business volume of industries(1847—1848/1860) 巴黎各产业产值 (1847到1848年与1860年),  
157

buying and selling of 买卖, 173—179

division of labor 分工, 75, 102, 160—161, 164

economically dependent population (1866) 经济依赖人口 (1866年), 156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Paris (1847/1860 巴黎的就业结构 (1847年 / 1860年), 156

employment/unemployment 就业 / 失业, 144—145

experience of 经验, 170—171

finance and commerce 金融与商业, 162—165

housing budget and 住宅预算与, 198

immigration 移入, 180—181

labor supply 劳动供给, 173—174

production of labor 劳动的生产, 102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and technology 生产力, 效率, 与科技, 167—169

recession of 1867—1868 and 1867到1868年的经济不景气, 299—300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 劳动力的再生产, 195—207

small/large industry 小 / 大产业, 157—159, 167—169

social division of 社会分工, 78, 96

- state's management of 国家管理, 144—146
- struggles of 1868—1871 and 1868到1871年的斗争, 300
-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gmentation in 时空的零碎化, 179—180
- women's employment 妇女就业, 181—182
- Ladies' Paradise, The* (Zola) 《妇女乐园》(左拉), 233
- Lafargue, Paul 拉法尔格, 保罗, 16
- Lamartine, Alphonse Marie Louis de 拉马丁, 3—4, 6, 14—15, 71, 74, 86, 97, 248, 258
- Lanquetin 朗克坦, 82, 85
- Large-scale industry 大规模产业, 157—159, 167—168
- L'Argent* (Money)(Zola) 《金钱》(左拉), 117, 122
- L'Assommoir* (Zola) 《酒店》(左拉), 170, 188—189, 222
- Lazare, Louis 拉扎尔, 路易, 131, 140, 150, 180
- Lecomte, General 勒孔特, 324, 327
- Ledru-Rolin 赖德律—洛兰, 7
- Lefebvre, Henri 勒费比尔, 亨利, 18, 236
- Leisure 休闲, 209—224
- Lejeune, Xavier-Edouard 勒热纳, 萨维耶—爱德华, 169, 187—188
- Lemel, Nathalie 勒梅尔, 201—202
- Lenin, V 列宁, 66, 79, 406
- Leo, Andree 里欧, 288
- Leroux, Pierre 勒鲁, 皮埃尔, 69, 71—73, 75, 79—80, 83, 86
- Les Halles 巴黎中央果菜市场, 10—12, 98, 100, 113
- Les Misérables* (Hugo) 《悲惨世界》, 187, 251, 258, 270
- Les Mysteres de Paris* (Sue) 《巴黎的秘密》(休), 25
- Les Odeurs de Paris* (Veillot) 《巴黎的气味》(弗约), 261
-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学, 74
- Libert Leading the People* (Delacroix) 《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洛瓦), 62, 287
- Loss of a Halo* (Baudelaire) 《光环的丢失》(波德莱尔), 265
- Lost Illusion* (Balzac) 《幻灭》(巴尔扎克), 29, 32, 37, 39, 42, 55
- Louis Napoleon 路易·拿破仑, 6—7, 9—10, 12—13, 15, 69—70, 88, 97—100, 107, 141, 143—144, 200, 209, 223
- Louis Philippe 路易·菲利普, 4, 62, 65, 125
- L'Union Ouvriere* (Tristan) 《工会》(特里斯坦), 61, 72



Luxembourg Commission 卢森堡委员会, 154

## M

- Madame Bovary* (Flaubert) 《包法利夫人》(福楼拜), 14, 255
- Mairie (city hall) 区政厅, 112, 204, 235
- Manet, E. 马奈, 3, 259, 288—289
- Manufacturer class 制造业者阶级, 36, 155
- Marchand, B. 马尔尚, 85
- Marcus, Sharon 马库斯, 沙伦, 41
- Marguerite Marie 玛格丽特·玛丽, 313—315
- “Marianne” “玛丽安娜”, 62, 287
- Marrey, B. 马雷, 82
- Marville 马维尔 8, 19
- Marx, Karl 马克思, 1, 10, 29, 33, 46, 59, 66, 69, 78—79, 89, 102, 151, 266, 306, 320
- association and 结社与, 284
  - Capital* 《资本论》, 16, 36, 170, 175, 256
  - class structure 阶级结构, 227, 229
  -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法国阶级斗争, 1848—1850》, 97
  - Commodities fetishism 商品拜物教, 54—55
  - Crédit system 信贷体系, 117—119
  -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经济学与哲学手稿》, 16
  - Eighteenth Brumaire* 《雾月十八》, 97, 258, 308
  - Grundrisse*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48
  - Paris and 巴黎与, 16—17
  - Utopianism and 乌托邦主义与, 53
- Mass consumerism 群众消费者主义, 220
- Memoires* (Flaubert) 《回忆录》(福楼拜), 255
- Memoires* (Haussmann) 《回忆录》(奥斯曼) 8—9, 13, 99, 151, 259
- Meynadier, H. 梅纳迪耶, 84—85, 115
- Michel, Louise 米歇尔, 路易丝, 206, 288
- Michelet, J. 米什莱, 183, 185, 191, 258—259, 272—273, 288—289
- Middle class (upper/lower) 中产阶级(上层/下层), 37
- Millière 米利埃, 244, 326

“Millionaires’ strike” “百万富翁的罢工”, 299

Minck, Paule 明克, 波勒, 188, 288, 290

Modernity 现代性

after 1848 1848年后, 85—86

Balzac’s Paris and 巴尔扎克的巴黎与, 32—35, 52—54

sense of 波德莱尔 14—15, 23, 257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创造性的毁灭, 1, 16, 259, 266

myth of 神话, 1, 17, 50, 57

prior to Haussmann 奥斯曼之前, 80—85

Molin, T. 莫瓦兰, 285—286, 326

Molé, Louis 莫莱, 路易, 4

Monarchists 君主派人士, 296

Money, credit, and finance 金钱, 信贷与金融, 117—124; 另外可以参见 *Crédit system* 信贷体系

Financial reform 金融改革, 119

Paris transformation and 巴黎转变与, 120—122

Pereires’ *Crédit Mobilier* 佩雷尔兄弟的动产信贷, 119—121

Montesquieu, Baron 孟德斯鸠, 271

Moreau, Edouard 莫罗, 爱德华, 206

Morisot, Berthe 摩里索, 贝尔特, 191

Musset, Alfred de 缪塞, 3, 71

Mutual benefit societies 互惠协会 297, 301

Mutualism 互助主义 154

## **N**

Nadar 纳达尔, 236

Nadaud, M. 纳多, 206

Neo-Malthusian policy 新马尔萨斯政策, 145, 207, 233, 237

“New Town of the Paris of the Saint-Simonians, The” (Duveyrier) “新城镇或圣西门分子的巴黎”(迪韦里耶), 64

Noir, Victor 努瓦尔, 维克托, 223, 304

Nonpolitical meetings 非政治集会, 302

Nutrition 营养, 201—202

◎

- Octroi tax base 入市税税基, 143  
“Old Clown, The” (Baudelaire) 《老小丑》(波德莱尔), 15—16, 54  
*Old Goriot* (Balzac) 《高老头》(巴尔扎克), 29, 39, 43, 51, 55, 86, 115, 125  
*Old Maid, The* (Balzac) 《老姑娘》(巴尔扎克), 23  
Ollivier, Emile 奥利维耶, 埃米尔, 100, 298, 303  
*Olympia* (Manet) 《奥林匹亚》(马奈), 289  
*On Humanity* (Leroux) 《论人性》(勒鲁), 71  
Organic Law of 1855 1855年组织法, 152  
*Organization of Work, The* (Blanc) 《工作组织》(勃朗), 71, 75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272—276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 16

▣

-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The (Clark) 《现代生活的绘画》(克拉克), 59  
Palais de l'Industrie 工业博物馆, 13  
Paris 巴黎  
    in 1848 1848年  
        aftermath of riots 暴乱之后, 5—6, 94, 97—99, 283, 293  
        counterrevolution and 反革命与, 85  
        Foreign Ministry riot 外交部暴乱, 3—4  
        Haussmann's reconstruction plans 奥斯曼的重建计划, 8—10  
        industry of 产业, 19  
        Marx and 马克思与, 16—17  
        Order/disorder in 秩序/失序, 267—269  
        “other” Paris “另一个”巴黎, 280—281  
        Tuileries sacking 劫掠杜伊勒里, 4, 7, 15, 64  
        workers' movement 工人运动, 153, 238  
    in 1850s 1850年代, 93—94, 99  
        labor market 劳动市场, 104—145  
        new space relations 新空间关系, 144  
        rural resistance to 1851 coup 农村对1851年政变的反抗, 275  
        surplus of capital/labor 资本/劳动剩余, 118

- in 1860s, working-class politics of 1860年代, 工人阶级政治, 296—298
- in 1870, siege of 1870年代, 围城, 320—321
- Balzac on 巴尔扎克论, 参见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 as capitalist city 资本主义城市, 55, 266
- as city of modernity 现代性之都, 32—33, 266, 316
- economically dependent population (1866) 经济依赖人口 (1866年), 156
-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1847/1860) 就业结构 (1847年 / 1860年), 156
- export trade and 出口贸易与, 161
- Fourier on urban question 傅立叶论都市问题, 82
- Haussmann and 奥斯曼与, 参见 Haussmann, Georges-Eugène 奥斯曼
- metropolitan and national space 大都会与全国空间, 84
- population (1831—1876) 人口 (1831到1876年), 95
- public spaces of spectacle of 公共的景观空间, 41—44
- self-government of 自治政府, 278
- spatial pattern and moral order 空间模式与道德秩序, 40—41
- suburbanization of 郊区化, 275
- Paris Commune of 1871 1871年巴黎公社, 4, 67, 81, 99, 114, 145, 180, 182, 193, 200—201, 225, 242, 273, 278, 286, 305, 308, 319, 325—29
- Paris en l'An 2000* (Moilin) 《公元2000年的巴黎》(莫瓦兰), 285
- Paris Pittoresque et Monumentale* (Meynadier) 《美丽而不朽的巴黎》(梅纳迪耶), 84
- Paris Spleen* (Baudelaire) 《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 15, 266
- Park, Robert 帕克, 罗伯特, 40
- Party of Order 秩序党, 85
- Pasteur, Louis 巴斯德, 255, 257
- Peasantry, The* (Balzac) 《农民》(巴尔扎克) 26, 29, 63
- People's Bank 人民银行, 123
- Perdiguier, Agricola 佩蒂吉耶, 阿格里科尔, 71, 73
- Pereire brothers 佩雷尔兄弟, 69, 113, 117—123, 134—135, 137—138, 143, 151, 163, 238, 277, 299
- Perreymont 佩瑞蒙, 81, 83—85, 115, 285
- Persigny, J. G. 佩尔西尼, 118, 142
- Phalanstères 法隆斯戴尔, 71, 75, 78, 82, 200, 263, 285
- Physiology of Marriage, The* (Balzac) 《婚姻生理学》, 55

- Picasso, Pablo 毕加索, 46
- Piore, M. 皮奥里, 79—80
- Place de la Concorde 协和广场, 82
- Pollock, G. 波洛克, 191
- Pope, Alexander 蒲柏, 48
- Poulot, Denis 普洛, 160, 169—170, 175—176, 180, 190, 200, 205, 228, 241—242  
 typology of Parisian Workers 巴黎工人分类, 230—233
- Productivity 生产力, 167—169
- Proletarian class 无产阶级, 36, 66
- Promenades in London* (Tristan) 《漫步伦敦》(特里斯坦), 71
- Propertied interest 地主, 102
- Property market 房地产市场  
 apartment house design 公寓楼房设计, 125  
 circulation of capital 资本流通, 133—137  
 financial returns of 财务报酬, 127—128, 131  
 gentrification of Paris 巴黎的绅士化, 138—139  
 Haussmann and 奥斯曼与, 131, 151  
 housing construction speculation 住宅建设投机, 135—136  
 industry and 工业与, 165—167  
 landlord class and 地主阶级与, 151  
 land-use rationale 土地利用形式, 137  
 personal wealth and 个人财产, 129  
 scarcity of units 土地单位的稀少性, 127  
 speculation in 投机, 125  
 state and 国家与, 165—166
- Proudhon, Pierre 蒲鲁东, 15, 71—72, 74—77, 79—80, 83, 86, 123, 131, 147, 154—155, 192, 200, 203, 236, 256, 270, 273, 283—284, 299
- Psychogeography of place 地方的心理地理学, 42
- Public meetings 公众集会, 301—302
- Public space 公共空间, 217, 221

◎

*Quest of the Absolute, The* (Balzac) 《绝对之探求》(巴尔扎克), 48



## R

- Rambuteau 朗比托, 8, 81—82, 84, 86
- Rancière, J. 朗西埃, 19, 69, 78, 153—154
- Rawls, John 罗尔斯, 79
- Real wages 实质工资, 177—178
- Realism 现实主义, 257
- Recession of 1867—1868 1867到1868年的经济不景气, 299
- Reclus, Elisée 雷克吕斯, 埃利泽, 273
- Renan, Ernest 勒南, 欧内斯特, 222
- Rent and the propertied interest 地主, 125—140, 166, 197; 另外可以参见 Property market 房地产市场
- Republic 共和国
- ideal of 理想, 64
  - political-social conceptions of 政治—社会概念, 295—296
- Retail industry 零售业, 111, 164—165
- Revolution of 1830 1830年革命, 65, 96
- Revolution of 1848 1848年革命, 59, 70, 89, 97—99, 144, 256, 267
- Revolution of 1870—1871 1870到1871年革命, 89, 99
- Revue Générale de l'Architecture et des Travaux Publics* (Daly) 《建筑与公共工程杂志》(达利), 80—81, 85
- Rifkin, A. 里夫金, 230
- Robespierre, M. 罗伯斯庇尔, 71, 278
- Rochefort, V. H. 罗什福尔, 304
-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59, 97, 248, 256
- Rose, R. 罗斯, 66
- Rossi, Aldo 罗西, 54
- Rothschild family 罗斯柴尔德家族, 117—119, 121, 123, 143, 151, 163, 234, 238, 277
- Rougerie, J. 鲁哲里, 156, 177, 179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梭, 260, 271

## S

- Sable, S. 萨布莱, 79—80
- Said, E. 赛义德, 272

- Saint-Simon, H., Comte de 圣西门, 1, 10, 14, 16, 28, 64—65, 67—68, 70—72, 74, 79, 83, 114, 225, 256, 260
- Saint-Simonian feminists 圣西门派女性主义者, 72
- Saint-Simonian movement 圣西门派运动, 78—79, 81, 83, 107, 110, 117, 123, 154
- “state productive expenditures” 国家生产性支出, 142
- Salammbô* (Flaubert) 《萨朗波》(福楼拜), 272—273, 281
- “Salon of 1846, The” 《1846年的沙龙》, 23
- Sand, George 乔治·桑, 3, 70—71, 74—75, 97, 185, 248, 274, 288
- Say, Leon 赛, 列昂, 143, 148, 197, 277
- Schorske, Carl 休斯克, 17—19
- Science of Man* (Enfantin) 《人学》(昂方坦), 88
- Scientific advances 科学进步, 255, 257
- Scott, James 斯科特, 詹姆斯, 29, 155, 187
- Second Empire 第二帝国, 17—18, 25, 59, 69, 75, 79, 82, 86, 88, 98
- as authoritarian state 专制国家, 146—149, 294
- 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in 集权/分权, 276—279
- class conflict 阶级冲突, 155
- financial reform 金融改革, 119
- industry, finance, and commerce 工业, 金融与商业, 162—165
- organized labor in 有组织的劳动, 284
- popular culture of 大众文化, 253
- republican party and 共和党与, 297
- social reforms of 社会改革, 202—203
- spectacle and monumentality of 景观与纪念性建筑, 209—212, 222—223
- transformation of Paris 巴黎的转变, 102, 114, 116
-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 运输与交通体系, 109—110
- urban health and hygiene issues 都市健康与公共卫生议题, 105, 245
-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The* (Piore and Sable) 《第二次产业分隔》(皮奥里与萨布莱), 79
- Senior, Nassau 西尼尔, 144
- Sennett, R. 桑内特, 217, 221, 241
- Sentimental Education* (Flaubert) 《情感教育》(福楼拜), 3—5, 14, 64, 86—88, 271, 275
- Sewell, W. H. 休厄尔, 72
- Simeon, Count 西梅翁伯爵, 9

- Simmel, G. 西梅尔, 33
- Simon, Jules 西蒙, 177, 184, 191—192, 202
- Small scale industry 小规模产业, 157—159, 167—168, 232, 283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68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59, 69, 71, 97, 285—286
- Socialist utopianism 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 59
- Société des Saisons 四季社, 66
- Society for the Rights of Man 人权学会, 72
- Space relations 空间关系, 107, 116, 149, 241, 271
- State 国家, 102, 141—152; 另外可以参见 Body politic 身体政治; Second Empire 第二帝国
- circulation of capital and 资本流通与, 142—144
  - class alliance 阶级联盟, 150—152
  - control of populace 控制民众, 148
  - industry and 工业与, 165—166
  - labor power management and 劳动力管理, 144—146
  - Louis Napoleon's authoritarianism 路易拿破仑的专制主义, 141
  - private property and 私有财产与, 165—166
  -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社会再生产与, 149—150
  -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监视与控制, 146—149
- 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19
- State productive expenditures 国家生产性支出, 142
- Stegmuller, F. 斯蒂格马勒, 13
- Stern, Daniel 施特恩, 丹尼尔, 3
- “Studies on the City of Paris” (Perreymond) 《巴黎市研究》(佩瑞蒙), 84 Suburbanization 市郊化, 275
- Sue, Eugène 休, 欧仁, 25, 127, 229
-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69, 110, 271

## **T**

- Tale of Two Cities* (Dickens) 《双城记》, 狄更斯, 287
- Technology 科技, 167—169
- Temptation of Saint Anthony* (Flaubert) 《圣安东尼的诱惑》(福楼拜), 13
-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The* (Fourier) 《四次运动的理论》(傅立叶), 70

Thiers, Adolphe 梯也尔, 阿道夫, 4, 7, 81, 85, 97—98, 229, 234, 238, 258, 278, 305—306, 323, 325—326, 328  
Third Republic 第三共和国, 197  
Thomas, A. 托马斯, 178—179  
Thomas, Clement 托马, 324, 327  
Tourism 旅游业, 174  
Trade unions 工会, 297  
Transportation system 运输系统, 270  
Tristan, Flora 特里斯坦, 弗洛拉, 61, 71—75, 192—193  
Tuileries Palace 杜伊勒里宫, 4, 7, 15, 64, 109

## U

Union of Associations (1849) 工会 (1849年), 76  
Universal Expositions 万国博览会, 114, 120, 200, 212, 235, 257, 259, 271, 299  
*Unknown Masterpiece* (Balzac) 《未知的杰作》(巴尔扎克), 46  
Upper class 上层阶级, 39  
Urban planning 都市计划, 112  
Urban space 都市空间, 111, 131  
    spectacle and 景观与, 210  
Urban transformation 都市转变, 293  
Utopianism 乌托邦主义, 256—257  
    of Balzac 巴尔扎克, 26—29, 47, 53, 248  
    Marx on 马克思, 53

## V

Van Zanern 范赞腾, 101, 210  
Varlin, Eugène 瓦尔兰, 169, 201—202, 205—206, 239, 255, 299—302, 327—328, 335  
Vendôme Column 旺多姆凯旋柱, 328  
Veillot, Louis 弗约, 261  
Villermé, L.-R. 维莱姆, 71  
Voltaire 伏尔泰, 115, 260  
*Voyage in Icaria* (Cabet) 《伊卡利亚之旅》(卡贝), 71

## W

*What is Property* 《什么是所有权》，71

*Wild Ass's Skin, The* (Balzac) 《驴皮记》(巴尔扎克)，26—27

Wohlfarth 沃尔法特，265—266

Women 妇女

Bourgeois “good wife” 资产阶级的“好妻子”，190，192

as buyers/sellers 买家/卖家，216

condition of 状况，183—194

domestic employment of 家庭代工，185

family and family structures 家庭与家庭结构，193，206—207

femmes isolées 孤立的女人，183，187

freedom and equality of 自由与平等，73—74

gender, sexuality, and revolution 性别，性与革命 286—291

liberty/revolution/Marianne 自由/革命/玛丽安娜，62，64，287

prostitution and 娼妓与，187—188

in workforce 劳动力，103，177—178，181—182

Women's Union 妇女工会，193

Work and organized labor 工作与有组织的劳动，78—80，103，232，306

1860s working-class politics 1860年代工人阶级政治，297—299

abstract/concrete labor 抽象/具体劳动，153—171

annual incomes and wages (1847—1871) 年收入与工资(1847到1871年)，177—178，184

experience of laboring 劳动经验，170—171

labor supply 劳动供给，174—175

Proudhon's labor num é raire 蒲鲁东的劳动货币，79

recession of 1867—1868 and 1867到1868年的经济不景气，299

reform goals of 改革目标，154—155

“sublimism” of “高尚主义”，175—176，190，205，232，241

women in workforce 妇女劳动力，103，177—178，181—182

Worker self-management 工人自我管理，79

Workers' Commission of 1867 1867年工人委员会，165，169，178，180，190，283，285，289—290

Workers' parliament 工人议会，5



**Z**

Zeldin 泽尔丁, 141, 148

Zola, Emile 左拉, 125, 170—171, 182, 187—189, 193, 216, 266, 286, 289

*Au Bonheur des Dames* 《妇女乐园》, 216

*La Curée (The Kill)* 《猎物》, 51, 116, 122, 133, 261

*Ladies' Paradise, The* 《妇女乐园》, 233

*L'Argent (Money)* 《金钱》 117, 122, 233, 273

*L'Assommoir* 《酒店》, 170, 188—189, 222

当你阅读奥斯曼的、巴尔扎克的，以及哈维的巴黎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类似情景。或许，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本雅明用意象蒙太奇重构了“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让我们置身于漫游者、“波希米亚人”、拾荒者、妓女之中，行走在拱廊、林荫大道乃至街垒之间。大卫·哈维给出的是更冷峻的分析和论证：“巴黎，现代性之都”与其说是现代人间天城蓝图的实现，不如说是帝国和资本的联手杰作。从本雅明到哈维，我们看到了西方左翼的巴黎研究从文化批评到政治经济分析的深化。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哈维的巴黎是对本雅明的巴黎的补充，而不是一种对抗。本雅明的巴黎，看上去像是美学；而哈维的巴黎，是政治经济学。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无法效仿，而哈维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的完美一课。本雅明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天才，哈维则是一个能让众人学习的典范。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持续十七年的巴黎大改造，将贫苦的老巴黎人驱赶至郊区，换来一个光鲜的“现代性之都”，随后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二者有何内在联系？当贫困在郊区被“世袭”下来，2005年巴黎北郊的穷孩子走上街头焚烧富人的汽车，2007年郊区青年再次暴动，甚至端起了猎枪——“巴黎骚乱”，这场现代巴黎的“样板戏”一次次上演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还是那次大改造的影子。一百多年前，让老巴黎天翻地覆的铁铲，所制造的贫富分区等“遗产”，对今日之城市动荡，负有怎样的责任？这正是我想在这本书中找到的答案。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

本书简体字版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北京奥贝特

ISBN 978-7-5633-9162-2



9 787563 391622 >

定价：39.00元